

歷史與現場

從大歷史的角度讀 蔣介石日記

蔣介石不是大獨裁者：他缺乏做獨裁者的工具。
他也不可能成爲民主鬥士：他縱使有此宏願，也無此機會。

黃仁宇◎著



歷史與現場

42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蔣介石無疑是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爭議性之大也無出其右。

其實，他對中國命運的影響仍未結束，也永遠難以蓋棺論定。

史學家黃仁宇曾為國軍下級軍官十年，

今日中國的發展途轍，始終是他榮懷不去的關注焦點。

但是他說：「我不因主見而寫歷史，只因長久披閱歷史，

新的展望不期而然的湧現心頭。」

此中關鍵與區別，讀者可以親自體驗。

他此番選擇棘手課題，闡明中國由「中世紀國家」步向現代的掙扎和轉折，

筆下往往令人低徊。

書中對海外關於蔣介石的評議，多有精采的辨析；

揀擇與排比史料的方式，更別具隻眼，言人所不能言。

本書在深入、衡平地檢視蔣介石的歷史定位時，

不但針對蔣介石個人，提供了嶄新的觀察角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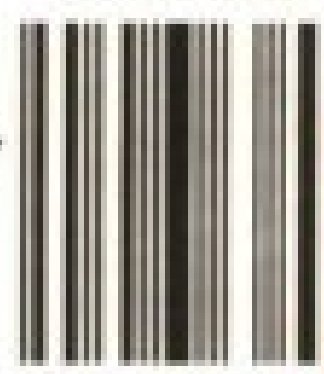
而且就1949年前後的歷史發展，呈現了另一個思考方向。

5440148

ISBN 957-13-0962-1 (628)



00330



時報
出版

9 789571 309620

BC42

NT\$ 330

歷史與現場 ④2

從大歷史的角度
讀蔣介石日記

黃仁宇◎著

- 一、本書配圖由出版公司編輯安排，承蒙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張玉法先生與沈松僑先生多方協助，謹此致謝。
- 二、本書地圖和戰役示意圖由師範大學地理系吳信政教授根據著者草稿繪製。
- 三、但內中錯誤仍由著者負責。

▶ 蔣介石於二十三歲那一年在日本高田第十三師團野砲兵第十九聯隊入伍。圖為當時蔣與義兄黃郛合影。黃郛於北伐後隱居莫干山六年，至1933年應蔣之命北上，收拾長城抗戰後的殘局。



▶ 蔣介石在1911年與留日同學張群、陳益卿、楊霽春等在東京合影。





◀ 辛亥革命後約十年中，
蔣介石的生涯介於遊俠
浪人和革命志士之間。
圖爲此期間留影。



◀ 蔣介石與陳潔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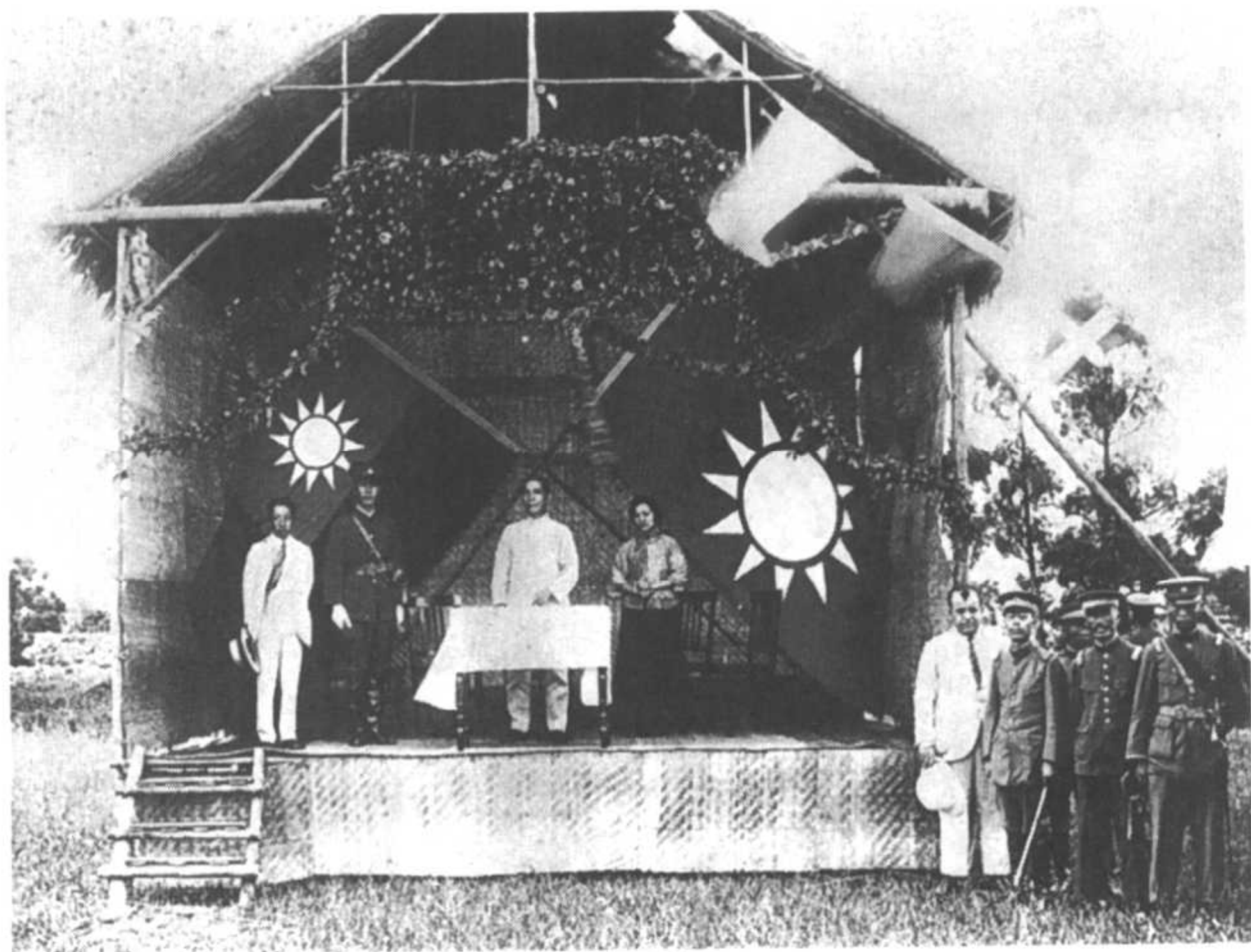
► 蔣介石日記已公開的部份，除宋美齡外，不提及及其他妻室。毛思誠輯蔣介石《日記類鈔》，其中有關於陳潔如的記載，蔣介石在審閱時，均用墨筆抹去。經仔細辨識，尚依稀可見。



► 黃埔軍校今貌。軍校為國民黨黨立，曾一度稱「國民軍軍官學校」或「國民革命軍官學校」。初期發畢業證書時，逕稱「陸軍軍官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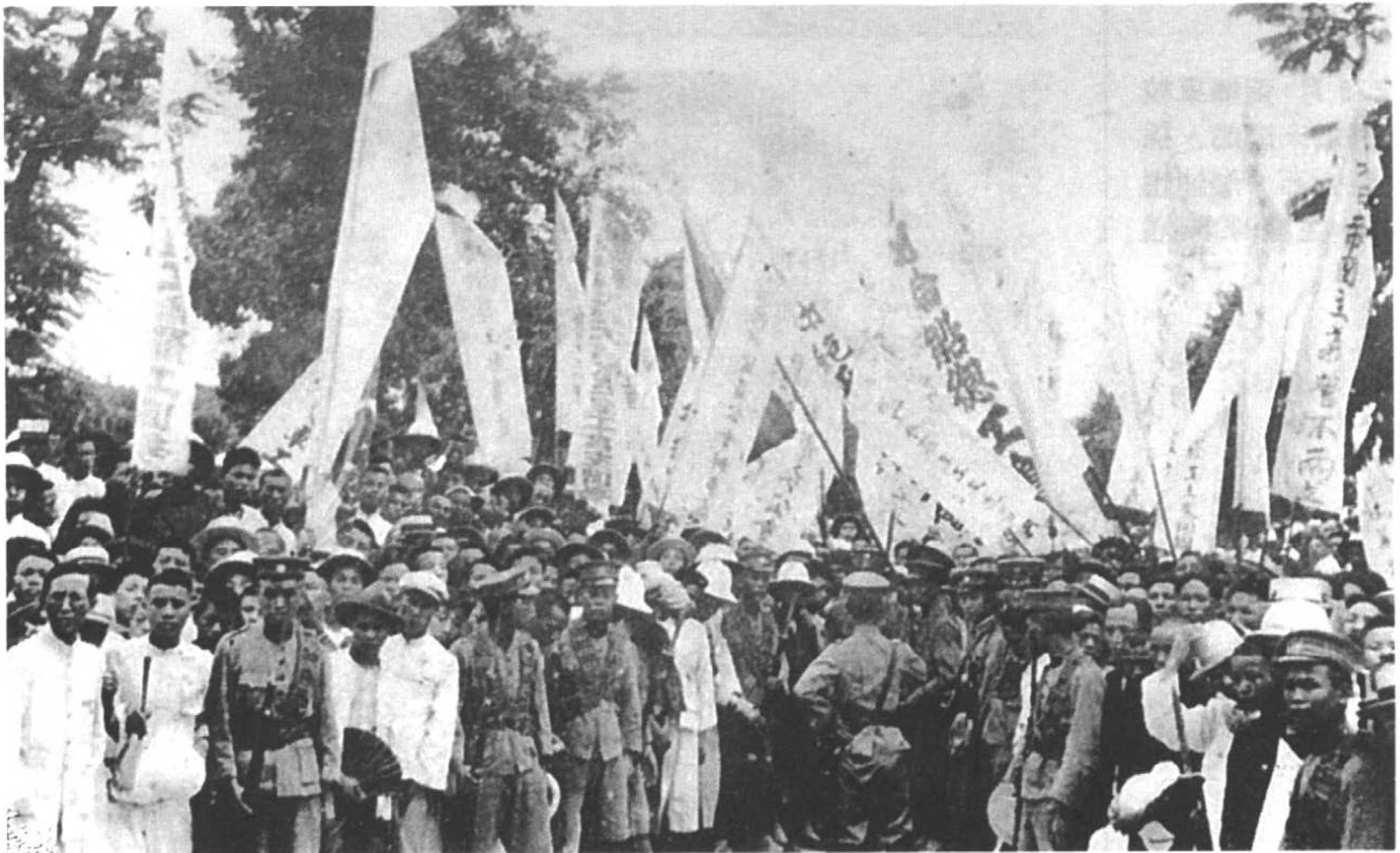
► 1924年5月，黃埔軍校成立。圖為宋慶齡、孫中山、蔣介石、廖仲愷6月16日在開學典禮上。





◀ 黃埔軍校初創時的蔣介石。

▼ 1925年7月，廣州的大本營改組成立國民政府。圖為成立大會一景。同時，軍事委員會成立，黃埔軍校校軍和所屬各軍改稱國民革命軍。一年後，北伐開始。



▶ 蔣介石與汪精衛在廣州合影（1925年）。



▶ 孫中山逝世後，黃埔軍校內部左右派之爭日趨尖銳。1925年間，蔣介石會對左派「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右派「孫文主義學會」之間的鬥爭，表示憂慮。聯合會係由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組成，這張泛黃的照片便是該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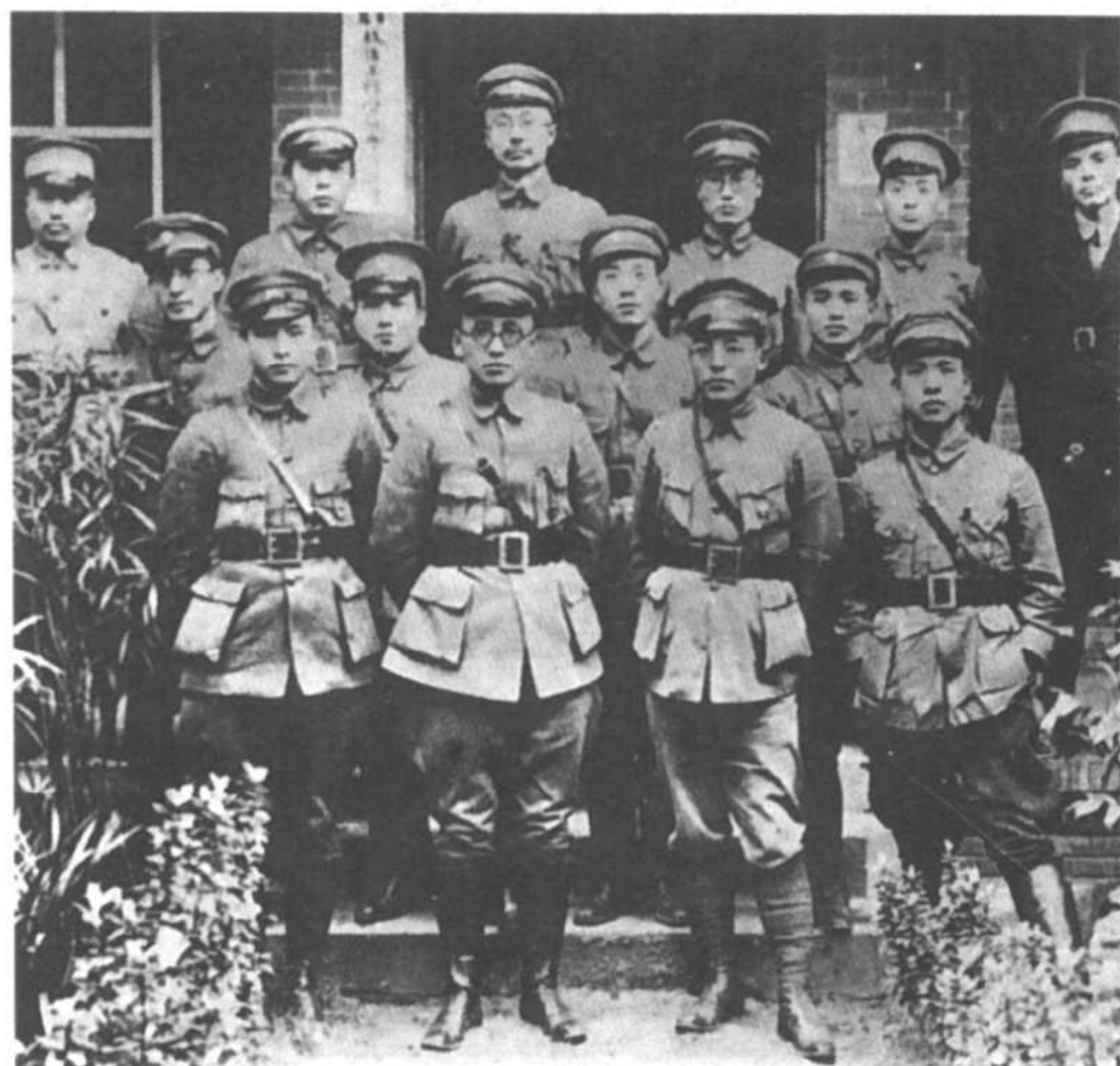


▶ 廖仲愷在左翼運動中的地位，可以從他遇刺（1925年8月20日）後年餘江西農運團體的這幅畫報窺知。





▲ 1926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在會中提出「改良士兵經濟生活案」。此時，廣州正展開一波波的權力鬥爭。前一年9月，蔣介石發動政變，解除了許崇智的權力；當年3月，發生中山艦事件，汪精衛離粵。圖為大會代表合影，蔣站在第一排邊邊（左起第四人）第一排右起第十人為汪精衛，第九人為譚延闓。



▼ 北伐前，蔣介石與湖漢民合影。

◀ 許多共產黨員在北伐軍中擔任政治工作。圖為部分政治工作人員在南昌合影。左起前排：二為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三為第三軍副黨代表朱克靖，四為第二軍副黨代表李富春；左起後排：二為政治部秘書李一氓，三為第六軍副黨代表林伯渠。

► 1925年6月，香港工會發動長期罷工，對港府要求政治自由。廣東工人則組織糾察隊，封鎖香港，使香港出入貿易和金融陷入困境。1926年9月，在蔣介石的催促下，國民政府通令解散廣州罷工委員會糾察隊，恢復廣州、香港間的正常交通，始結束長達一年三個月的對英大罷工。

圖為在珠江水面巡邏的省港大罷工工人糾察隊。



◀ 1927年1月上旬，漢口、九江的群眾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與英人發生衝突，所幸未造成重大傷害。後經外長陳友仁交涉，中國收回兩地的英租界。圖為武漢近三十萬人的反英示威大會。

► 1927年3月，北伐軍入南京，軍民攻擊外人，引起江中英美軍艦轟擊下關報復。同時上海英租界英國水兵亦上岸巡行示威。





► 爲「清黨」出過力的杜月笙。



▲ 1927年春，爲配合北伐
▼ 軍向上海和南京進軍，
上海工人在共產黨策畫
下組織武裝糾察隊，在
敵後解決了孫傳芳軍。
但隨後即遭國民革命軍
包圍攻擊。上圖和下圖
爲上海工人武裝糾察隊
。



▶ 1927年「清黨」期間的人犯。



▲ 寧漢分裂期間，鮑羅廷在武漢向群眾演說。不久，汪精衛的武漢政府也與共產黨決裂，國共合作正式結束。

目錄

第一篇

1

黃埔建軍、北伐、清黨

蔣日記之內容體裁及與中國近代史的關係——現有資料及其限制——讀日記者應有之基本認識——蔣之家世、婚姻及早年行徑——黃埔軍校之創建——一九二四年之廣州——教導團、「校軍」、「黨軍」及東征——廣州政變，中山艦事件，蔣取得領導人地位——以上諸事與蔣之心理狀態——初期容共政策以及內中之矛盾——軍校第三期同學錄序——北伐，從武昌到南昌——統帥，「主軍」，「他軍」及收容軍閥部隊——現代軍隊與中世紀社會背景——蔣之人身統御及經理——陳獨秀、鮑羅廷與鄧演達——清黨及其在大歷史上的解釋

安內與攘外

下野，訪日——中原大戰——權謀與道德——內戰之社會背景——津浦線、隴海線及平漢線——戰後之財政及中央與地方之新平衡——胡漢民——江西剿共——圍剿與反圍剿——毛澤東與紅軍——九一八與忍辱負重——淞滬抗戰——熱河事件——長城戰役及塘沽協定——「我屈則國伸」——何梅協定與秦土協定——憂患及修養——精神訓練與國民道德

第三篇

161

不畏鯨吞，而怕蠶食

盧溝橋事變——蔣之「四點最低立場」——廬山談話——淞滬戰役——華東戰場被突破——南京失陷——軍令與動員——初期作戰的犧牲及其意義——供應與後勤——和議與德使陶德曼之調停——「戰敗者無禮之言辭」——武漢期間之整備——蔣之「三種賭博」——各種作戰因素無法協定情形——台兒莊及徐州——指揮系統內實情——「中共問題」之初期露面——兩種群眾運動——黃河決堤及長沙大火——汪精衛之降日——軍校校長、四川省政府主席及農民銀行理事長——戰局僵持與磁鐵戰術——「中世紀國家」之實情——「貪污無能——吃缺與走私——人力資源之每況愈下——高層機構與基層組織——「敵必殺余而甘心乎？」——蔣人身上之弱點——「正義——權宜——正義」——鄂梯、程澤潤、廖齡奇、張德能——「若非中華民族其誰能之？」——新四軍事件——刻板印象與機動外交——《走上珍珠港的道路》——「臨時妥協辦法」及「基本整體提議」——「物極必反，能不戒懼？」

「四強之一」及其負擔

中國之「大轉機」——印度蘭伽——中國駐印軍之由來——史迪威：「約瑟夫叔父」——「槓桿作用」——中國戰區與遠征軍——「戈登心理狀態」——第一次緬甸戰役——「出乎意外之和善」——人本主義——器材或人事？——蔣之「三項要求」——居里——蘇德戰爭、新疆與中共——衢州慘敗，河南飢荒——《中國之命運》——「整風運動」——鄂西戰役——三叉會議——「摩洛哥的蘇丹」——索摩維爾——美和愛娜——宋子文——「宮闈政治」之由來——開羅會議——邱吉爾與羅斯福——十億借款與成都機場——常德戰役——余程萬——迪克西代表團——東西兩戰場——一號作戰——第二次緬甸戰役——英發爾及密支那——Y部隊在滇西——湘桂戰役——「拒絕，接受與緩和」——衡陽及方先覺——不要「一死報國」——最後之攤牌——「斧頭落下來了」——「不開明，冷心腸，獨裁之政體」——魏德邁及「黑金鋼鑽」——「抗倭戰事之理想恐成夢幻矣」——勝利廣播

第五篇

卷尾瑣語

《蔣介石初傳》或《蔣介石粗傳》——「上、下、中」的三段改革——隋唐與英法——知其不可而為之——二十世紀之動員、明清的社會——土地改革為勝敗之關鍵——認錯與不服輸——各階段奮鬥之成果——二十一字結論

地圖與戰役示意圖目錄

北伐路線	77		
中原之戰：馮閻軍進展之最高潮		1	03
共軍第一次對國軍反圍剿示意圖		1	12
共軍第二次對國軍反圍剿示意圖		1	12
第三次圍剿示意圖：國軍攻勢		1	16
第三次反圍剿示意圖：紅軍反攻		1	16
長城戰役及塘沽協定	133		
華東戰場發展態勢圖	182		
台兒莊戰役概見圖	203		
第一次緬甸戰役示意圖	302		
鄂西戰役示意圖	326		
第二次緬甸戰役示意圖	369		
日軍攻略長沙衡陽示意圖	381		
衡陽攻防戰示意圖	397		

第一篇

黃埔建軍、北伐、清黨

- 蔣日記之內容體裁及與中國近代史的關係——
- 現有資料及其限制——
- 讀日記者應有之基本認識——
- 蔣之家世、婚姻及早年行徑——
- 黃埔軍校之創建——
- 一九二四年之廣州——
- 教導團、「校軍」、「黨軍」及東征——
- 廣州政變，中山艦事件，蔣取得領導人地位——
- 以上諸事與蔣之心理狀態——
- 初期容共政策以及內中之矛盾——
- 軍校第三期同學錄序——
- 北伐，從武昌到南昌——
- 統帥，「主軍」，「他軍」及收容軍閥部隊——
- 現代軍隊與中世紀社會背景——
- 蔣之人身統御及經理——
- 陳獨秀、鮑羅廷與鄧演達——
- 清黨及其在大歷史上的解釋——

在刻下中國現代史看來不如人意的時候，將蔣介石的日記公佈，可能有匡正的功效。

我所謂不能令人如意，大概由於敘述脫節，評論者沒有看清自己的立場。比如說有些人所作的蔣介石傳記寫來唯恭必敬，讀來有如新添了一部《二十七史》，內中又來了一篇《太祖本紀》。殊不知他蔣先生易箠之日還以為自己是一個大革命家。還有些人恣意批評，不顧及客觀條件及各種背景上之層次。凡是「貪污無能」，「放棄群眾，不知改革」和「迷信軍事力量」的各色罪名，說時也不費力，即可信口盤出，隨手拋來。好像中國人聚全國之精英，經營幾十年，連門前一團穢水尚沒有看到。倒是外國的一個研究生，做了一篇博士論文便將如此疏忽大意的地方指正過來。

世間無這樣的「歷史」。以上只代表各人以極窄狹的眼光，面臨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動態，所產生的一種局部反應。

別的不說，這樣寫下的歷史也就平淡無奇，讀來索然寡味。中國過去一個世紀的經歷。既包含著極大規模的顛簸，也有無數的縱橫曲折。不僅人與人之關係間產生了各種驚險離奇的波瀾，尚且在各人心目中引起無限塊壘之起伏。如果當中激昂憂怨的情節概可以用「善惡」兩字形容，也可見得作者並沒有將筆下題材通盤掌握。如果中國互世紀的歷史尚是如此的簡陋單調，則我們如何可以產生腸斷魂迴的文藝讀物和看來膽戰心驚的藝術傑作？

在實用的場合上講，以上的情形也亟待糾正。如果我們想增進台灣海峽兩岸文化上的接觸，則先必須對中國現代史之展開，有最基本之共識。再以美國而論：白宮及行政部門與衆院參院對中國大陸方面之態度不同，相持業已多年。其間之差異源遠流長，也仍是由於對中國歷史之看法立場上已有差異。

至此我們也可以問及：要是蔣介石與毛澤東及他們之接班人所走路線全屬錯誤，所做工作又彼此對銷，則何以中國尚能生存至今，而且從一九二〇年間至一九九〇年間尚有顯著之差別？難道今昔之不同全是負因素作祟？並且我們如果更正，則尚須將歷史向後推七十年，恢復到創立黃埔軍校與北伐以前的階段中去？

倘非如此，則可見得我們過去所寫的歷史並未將中國長期革命的積極性格全般托出。更沒有將前述三段人物所領導的群眾運動之所產生的聯貫關係研究得明白。他們在人身關係上或為對頭，可是在大範圍內卻又不經意的彼此支持。有如蔣介石曾在他的日記裡寫出：

凡事有敗必有成，亦有成必有敗。今日認為惡因者，或適為他日之善果。而今日所獲惡果，在昔日反視為善因者。以此證之，無事不在矛盾之中，並無絕對之善果也。（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在這種因果循環的過程中，各種行動在歷史上的長久意義，可能與當事人眼中所看出的不同。我一向提倡的「大歷史」，也無非將他所說的因果關係，拉長放大，使之超過人身經驗。

在這種要求之下將他自己所作日記公佈，首先即會大規模的充實了現有的原始資料。他開始作日記於一九一五年，以後即未間斷。據說只有最前三年的業已散失，那麼自一九一八年至他去世（一九七五）前五十多年的紀錄都應當存在。無論他是否中國的領導人，在政治舞台上曾否產生作用，僅以此資料之雄偉與完整，已是世間難得，也必致使所有關心中國現代史的人物拭目以待。

可是目下我們尚面臨著兩重困難：第一，刻下我作此文時尚無從確定此日記現藏何處（詳本書九

頁)。第二，他的日記不是我們一般人心目中所想像的日記，只將所面臨的人物與情事，並帶著個人觀感記錄下來。這樣無主旨之客觀不是他立身做事之方案。我可以斷言：他在寫日記時即存心以筆下之文字作為修養和施政的工具。有時所記不僅是直覺上的個人觀感，而強迫的帶上了一段「應當如此」的想法。他在一九四四年和蔣經國交換批閱彼此之日記，即在當年元月二日寫出：「此最有益於倫理與修養也。」即此一點，對未曾受過中國儒教和其實踐主義的影響之讀者講，已是「不真」；有些人更因為他引用傳統文墨，可能斥之為保守與反動。



以上兩種困難都有應付之辦法。現在先說我們自己評閱蔣介石言行之前應有的準備。

中國的抗戰動員了三百萬至五百萬的兵力，在統一的軍令之下，以全國為戰場，和強敵作生死戰八年，其情形已是洪荒以來所未有。而緊接著又是毛澤東及中共領導之下的土地革命，其程度與範圍亦超過於隋唐之均田。茲後自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共三十年仍未有定局。當中經過「三面紅旗」和「文化大革命」之醞釀，最後才有鄧小平所主持的對外開放與經濟改革。時至今日「資本主義」已不復為一個壞名辭，已可以在北京的《人民日報》露面，甚至作為標榜。

除非我們認為歷史全無意義，以上的牽扯反覆全是愚人蠻漢作壞事之紀錄，則可以自此看清：以上各節綜合起來，已經具備著人類歷史裡最龐大的一次長期革命之輪廓。縱使當中有局部之重疊反覆，大致卻仍是呈直線式的展開。亦即次一段之工作，利用前一段之成果。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治史者不能首先即利用分析法。迎在目前的現象既是龐然大物，超過了

以往的歷史經驗，其組織尙未具定型，那我們如何分析？凡分析先必在此龐大的形象之中割裂一部，和既有的經驗對照。所以過去引用西方傳統治學辦法的，以費正清教授爲代表，所得純係以歐美之尋常標準，衡量中國非常時期之大規模動態。其以小權大不說，尙且忽視兩者時間上之差異。這一派人物之指責中國之不徹底改革，有時讀來似乎軀殼未備之前，先指責其不注重健康。

既稱大歷史，則在分析之前必有一段歸納，使治史者自己看清當前問題之全貌。

中國的長期革命，旨在脫離舊式農業管制之方式，進而採取商業原則作爲組織結構之根本。傳統農業社會各事一成不變，人與人之關係爲單元，有如中國傳統所標榜之「尊卑、男女、長幼」的秩序。商業著眼於廣泛之分配，務必促成社會內各事物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所以在「權利與義務」之大前提下，人與人之關係爲多元，自此也才談得上自由平等。

可是要將前者蛻變而爲後者，有等於脫胎換骨。首先即須創造一個高層機構，次之又要翻轉社會之低層機構，以便剔除內部阻礙交換之成份，使各種因素統能接受權利與義務之攤派，然後才能敷設上下之間法制性之聯繫，構成永久體制。因爲牽涉廣泛及於全民。干預之程度又深，影響到各人思想、信仰、財產、職位，以及衣食住行，所以每一國家必受有內外至大之壓力，才如是豁然改圖。在過程中也難免流血暴動，並且曠日持久。舉凡英國五十七世紀之動亂，經過內戰弒君與復辟各階段，最後由光榮革命完成。法國亦經過大革命，又演變而爲拿破侖戰爭，震盪中外數十年，同出於這一疇範。美國將英國業已改造完成之系統加於一個空曠地區之上，好像避免了這段煎逼。只是南部用奴工，違反了公平而自由交換之原則，仍待數十年後因南北戰爭而改正。

從上述程序看來，蔣介石和國民黨因藉著北伐與抗戰替新中國創造了一個高層機構，使中國能

獨立自主。毛澤東與中共則利用土地革命剔除了鄉紳地主保甲在農村裡的壟斷，使社會上下層因素同有平均發軔之機會（台灣由「耕者有其田」法案及其他政策替代）。今日海峽兩岸一體重商，亦即希望在商業條例中覓得上下之聯繫，使整個組織能依數目字管理。即是香港的基本法，也仍著重的提出既有的普通法（原有農業社會裡的習慣法）和衡平法（適應商業社會中之需要）除經立法程序修訂者外，仍在一九九七年後有效，也仍是繼續著英國自光榮革命以來所獲成果。

蔣先生與毛先生行動於歷史之前端，他們不可能和我們一樣站在歷史後端綜覽全部經過。所以他們縱各對中國有空前的貢獻，治史者不能將他們或二者之一的言論與見解全部視作玉音綸典，聖旨成憲。至於以一個經營業已幾百年之標準去衡量大規模動盪和改造過程中之事物，只有做得文不對題，前已言之。

我們今日檢討蔣介石日記，也必須具有這樣的信念。如是，我豈不是先造成結論，再在原始資料中尋覓支持我見解之證據？這說來也是。本來歷史之主要用途，即是闡明已經發生的事情及其原因；並非由作史者憑空製造應當如是之目標（有如大小事項立即符合西方標準），又預作進度表，再抱怨當事人不肖，沒有貫徹我之理想（有如上述貪污無能之責譴）。此外讀者亦可將上述三段程序作為假說，在原始資料中找到支持或修正之因素。總之，歷史研究無非從已知事項擴廣而探得未知事項。這X殿後或頂前沒有基本之差別。只是要在前後之間加入正面、側面資料，使所敘完整。再舉一個隱喻：我建議從大歷史之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希望從中提供資料，促成修訂中國現代史，等於先賦予骨骼，次填補之以筋肉，亦即外國人所謂flesh out。



我第一次知道蔣介石有日記在西安事變後。他的《西安半月記》在我們學生時代曾經廣泛的傳誦。內中提到張學良讀到他的日記被內容感動。這本小冊子又提及他批評張爲「小事精明」，可見得他日記裡也有個人角度的觀察，而且涉及機微。一九四二年我在重慶衛戍總部工作數月，更體會到他蔣先生對文字檔案之重視。這時候他經常向軍事機關下手令，手令出於親筆，但是受令者無從保有，只能閱看抄錄，原件仍由傳令官攜回侍從室歸檔。後來更獲悉侍從室尚保存國民政府及國軍各重要官員之自傳。自傳奉命撰寫，其格式一定，所用紙張尚由侍從室發給。再則蔣傳見人員之談話，均有侍從秘書記錄。他的演講稿也保存完好。在這多方面他保持了中國宮廷裡重視記錄之傳統。有朝一日這些文件全部公開，可能使不少學者終生閱讀不盡，預卜當中有些將成爲「蔣介石專家」。

我既無能力也無此宏願成爲中國現代史專家。此間文字不過指出，如果讀者引用「次級資料」(secondary source)，則此種資料早已氾濫到無可下手。一九四五年，我在中國駐印軍(時稱X-Force)和滇西國軍(時稱Y-Force)在緬甸南坎附近會師之前夕，曾在新三十師前進指揮所見到艾薩克斯(Harold Issacs)，那時他在《新聞周刊》任特派員。因在戰鬥行軍狀態，我們都蹲在地上吃飯，晚餐只有米飯及酸白菜。我們既爲貼鄰，不免打開話匣。他即用中國話和我說起：「中國的老百姓好，政府裡的人不好！」如此籠統批判，既無邏輯，也不能分辨，我即此已想到他成見已深。前美國駐瀋陽總領事克勞浦(Edmund Clubb)後執教於哥倫比亞大學。他的標準教科書裡提及一九四六年春國軍入長春時云：「五月二十五日蔣介石去瀋陽，在隔著相當的距離去照顧鄭洞國率領國軍收復長

春。」我那時在鄭副司令長官處任低級幕僚，就知道幕後指揮國軍進入長春的，實爲克勞浦指摘爲「無能」的司令長官杜聿明，而非克認爲「能幹」的鄭洞國（因爲杜聿明在緬甸時與史迪威衝突，鄭則受蔣介石指示，百般遷就）。而且我又在五月三十日在長春大房身飛機場眼見蔣委員長蒞臨，向高級將領訓話，並非「隔著相當的距離」遙制。如是意見及傳聞多於事實之資料已不勝枚舉。這也就是我們必須借重於原始資料的原因；亦即堅持綜合先於分析之用意。

迄至今日，我們尙無從確切證實此日記現存何處，究有多少冊，其紙張與裝訂如何。只能自最熟悉此中人士之口頭獲悉，見及原件的人員屈指可數，因仍屬蔣家私有，惟暫交台北國家安全局保管。至於傳聞某人曾見此日記，或謂閱看此日記爲現下台灣高級官員的職務之一部，大概所指爲抄件。此抄件原屬《大溪檔案》。檔案自大溪遷出後分屬總統府及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但總統府資料室仍總攬其成。大概傳抄此日記之一部，在蔣生前已開始。現下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即藏有《蔣介石日記類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所刊《雪白血紅》（一九八九）也在文中提及蔣所作「一周反省錄」，更像從日記輾轉抄出。

原件尙未公開，以日記爲主體所編修之史料已有數起。在目下情形我們只能倚以代替無從窺見之原件。流傳較早者爲毛思誠所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共二十冊，分爲八編。所記至一九二六年年底，蔣三十九歲（足歲，下同）開始北伐時爲止，刊印於一九三七年三月，可算作抗戰之前夕。其「例言」內稱，書爲「個人紀年史傳」，而又「所印極少」。可見得當日僅供內部人士參閱。編者毛思誠爲蔣介石中學前之塾師，亦曾於一九二五年任黃埔軍校秘書，對蔣之思想教育有相當影響。一九三五年蔣曾以軍事委員會名義重印明代大學士張居正之文件，稱《張江陵全集》，刻下

一部藏在密西根大學東亞圖書館。書中蔣出名作序，毛則作「增識」，可見彼此文字之間關係密切。我現用之《蔣介石先生》係香港龍門書局影印本，借自哈佛燕京圖書館。

《蔣介石先生》雖則按日記事，又附有無數書信講稿之全文，只是敘及某日某夜某時，蔣在何處見何人作何事，極盡其詳，顯係以日記作主幹編成。但大體保持第三人稱，引用日記則稱「公曰」。然亦有一部份以第一人身稱「余」。前哥倫大學韋慕庭教授(C. Martin Wilbur)在《劍橋中國史》內引用此書時即在正式書銜之下加註「亦稱《蔣氏日記》(Chiang's Diary)」。

一九七三年日本《產經新聞》取得國民政府同意，派編輯古屋奎二等五人往台北編纂《蔣介石秘錄》由政府及黨史委員會提供材料達四千萬字，包括「蔣總統講稿日記、回憶錄等」。《秘錄》自稱偏重中日關係，實際上亦著重中美關係及國共關係。全文在《產經新聞》連載，開始於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五日(當時蔣尚在人世)至一九七六年年年底載完。連載時一面即由台北中央日報社譯為中文(內文件部份即還原)，刊刻成書，稱《蔣總統秘錄——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共十五冊，自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八年全書刊完。《秘錄》引用日記部份均明顯的標明。我所用的中譯本由台北時報出版公司供給。此書亦有英文節譯。譯者張純明(Chun-ming Chang)，書稱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由紐約聖約翰大學出版。《秘錄》之流傳，應已相當普遍。一九八六年接近蔣百年冥壽時，台北曾舉行「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會」，與會的即有十四人之論文曾引用此書，包括古屋奎二本人。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八卷分裝十二冊，主編秦孝儀，前任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現任故宮博物院長。此書刊印於一九七八年，去蔣逝世已三年。只是以篇幅之巨，其內容又大抵與前述《秘

錄》重複，所以其整備似應在蔣生前。此書大致亦採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體制，但內容缺乏前書之慷慨直言。其「編纂例言」稱作書時「採編年與紀事本末體例而互用之」。其在時間上與《蔣介石先生》重複之一部，篇幅不及前書十分之一。以後引用文件書稿亦只至一九四九年。自是至蔣逝世之二十六年間，「惟以史料未備，暫編大事年表，姑相接續耳」。我所用之一部借自主編人。據稱「迄今此書尙只在內部流通」。台北之中正紀念堂亦有此書一部，陳列於蔣生前所用衣飾勳章附近，似應屬珍品。不過上述一九八六年之學術討論會亦有十篇論文在註釋之內引用《長編初稿》。此中又一篇稱其資料得自《總統蔣公大事長編》，無「初稿」字樣，其「總編纂」亦爲秦孝儀，刊印者則爲台北中山圖書公司，發行於一九六八，尙在《初稿》之前十年。這些地方只顯示蔣介石日記經過一段審核流傳抄寫，早已不始自今日。可是以「日記」本身作研究考察之對象的文字，迄今尙未發現。

《大事長編》引用蔣介石日記頻繁。一般均在日期之下稱「公自記曰」或「自記所感曰」。所以編時以日記爲主體，可是讀來又像編年紀事而以日記條文列證鑲補。一般摘錄自日記極爲簡短，有時其本人所記與侍從所記不可區分。有如開羅會議時，初見英首相，有「公謂初見邱吉爾之印象較之平日所想像者爲佳也」（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此「公謂」二字，似指隨從所記。有時亦將日記體裁改作記事體裁。有如衡陽被圍戰事緊張時，《大事長編》提及：「是夜公前後起床禱告三次，幾未入眠也。」（一九四四年八月七日）又有記事不便，摘錄日記一段替代者。例如「公自記曰：國內共匪，圖謀陷余者已十九年；國外倭寇與我惡戰者已有十三年之久，余實已心碎精疲，幾不能久持。……」〔此處六點從原文〕而今又遭黨內如此之凌辱，與國內如此之諷刺；此種橫逆與恥辱之來，實爲有

生以來未有之窘困。然余於此，如不積極奮鬥，將何以對已死之先烈乎？況今日之實力猶遠勝於十三年以來任何時期，只要余能自立不撼，當不足為慮也。」（一九四四年九月三十日）

當時湘桂戰爭挫敗，蔣又要求撤換史迪威，構成中美外交危機，此處前有省略部份，後稱黨內凌辱，國內諷刺，必與此數事有關，記事者又不願直書，所以用此辦法對付。涂克門女士作《史迪威及美國在華經驗》(Barbara Tuchman: *Silwell and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45*)一書稱上述日記記事三日之後，即十月二日，蔣在國民黨中常會之星期一例會曾拍案咆哮，說及史迪威必須撤換，不容姑縱，似更表示黨內凌辱實有其事，蔣亦未忍氣接受（涂稱此消息得自美國駐華大使館，她懷疑蔣故意將他激怒情形洩露）。

《大事長編》提及蔣不僅作日記，而且日記之中又均有「本月感想」及「一年之所感」。只是不知是否經常如此，曾未間斷。書中引摘最長一段為一九三八年一年之所感。內有蔣對本身工作之評語，又自責「德性進步甚渺，修養不足，暴躁未減」，也提及一年讀書心得。全長約九百五十字。



如果讀者準備一眼從「日記」中看到新鮮而帶刺激性之秘聞軼事，必將失望。因為現已發表之日記，企圖保全功德無瑕之標準；內中甚多有意義之處，尚須研究琢磨，才可體會看出。但有時亦間有出人意外者，有如：「人生實一大冒險，無此冒險性，即無人生矣。」（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驟看起來，此語應出自毛澤東，而不當出諸蔣介石。抗戰剛近周年時，希特勒召回德國軍事顧問，蔣一度不許他們離職。日記中寫著：「余不准德顧問自由離職，是為公也。德如因此束縛緯兒行動，

以爲報復，則爲私也。私而不能害公，吾於緯兒之安危聽之而已。」（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如果軍事顧問無心服務，強留之何益？可見得當日撤退之消息仍使蔣相當震撼，才有此強迫留職之舉措。茲後顧問團離華，蔣緯國在德亦無被扣留情事，直到珍珠港事變之後由德赴美。又在前述湘桂戰爭期間，蔣除日夜禱告外，尙在日記上發願：「願主賜我衡陽戰事勝利，當在南嶽峰頂建立大鐵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似此他的宗教信仰帶有極濃厚之原始解釋性格，更用不著說當日事態之緊急。

此外日記有無數自我警束及自我策勵之辭句，不僅單調重複，而且站在今日客觀之立場，尙令人懷疑作日記者之矛盾心情。有如抗戰初起時，「惟信仰可以移山也」（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三日之後則寫著：「寧爲玉碎，毋爲瓦全。存亡盛衰之理，冥冥之中自有主宰，吾何憂懼！」（八月二十日）更八日之後，再有：「近日戰局漸趨劣勢，人心動搖。此次戰爭本無倖勝之理，惟冀能堅持到底耳！」（八月二十八日）

蔣給本身以極度紀律之束縛，有人以爲其生性缺乏幽默感。亦有西方人士認之爲魯鈍者，至此絕對低估此人。他遠在一九二三年遊俄歸國後，即留有下項紀錄：「某日晨醒，自省過去之愆尤，爲人鄙薄者乃在戲語太多，爲人嫉妒者乃在驕氣未除。而其病根，皆起於輕燥二字。此後惟以拘謹自持，謙和接物。寧人笑我迂腐，而不願人目我狂且也。」（未記月日）又直到他奉令創辦黃埔軍校後，他寫信給胡漢民與汪精衛，猶且自承：「五六年前懵懵懂懂不知如何做人」，並且「人人言弟好色，殊不知此爲無聊之甚者，至不得已事」（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當時所謂「好色」，加以下文牽入，無非嫖娼宿妓，有朋輩脫拉。這一方面固然證實蔣介石壯年尙躑躅於上海之十里洋場中，有做游俠

浪人之趨向；一方面則顯示民國初年舊體制業已崩潰，新體系尚未登場，既無中國本位之新型經濟，年輕人除任教於大學或為外人服務外，就業之機會極少，社交生活更受限制。

而且蔣介石最大之困擾則是找不到一個現代型之楷模，適合於當日中國之環境和他預備領導之群眾。即以軍隊而論，其本身即為社會產物。當組織新社會尚未曾著手之際，不能立即期望各人「預度」此新社會內「應有的」行動標準，協同的照此做去，有如汽車尚未發明，即在街中裝上紅綠燈，期望各人嚴守交通規則。我在國軍內之經驗，即不僅部隊長之間人身關係濃厚，即我們下級幕僚對部隊長亦復如此。總之，權利義務之觀念馬虎，忠厚誠懇之需要佔先。甚至下迄士兵，亦復如此，通常「有面子」與「無面子」的著想超過紀律與階級服從之習慣。此概為農村社會裡諸事尚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人與人之關係單元化之成果。如果此種積習過強，其部隊即帶軍閥性格。可是事勢如此，亦非任何批評與指摘即能立即更正。蔣介石為現實主義者，他一面倡言革命，一面又效法於古人。凡此都出於當日社會環境之強迫性，可是側面看來，他所用之工具及他預期的目的極不調和。

蔣介石寫出：他曾希望以太平天國的典章制度作藍本。可是和他以前的蔡鐸一樣，尋覓太平天國的資料不得頭緒，反而發現中興名臣之偉大（一九二四年十月未註日）。他之崇拜曾國藩，常賦予攻擊他之人士以口實。其實他最景慕於曾氏的，乃是「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之蠻勁。至於他之服膺於張居正，並非因張之「去卻時代性之擁護君權」，亦不因他「忠鯁過人」，而是因為張之「志趣」與「功業」。此中區別已由《張江陵全集》之序文明白指出。張居正曾表示：「僕嘗有言，使余為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所以以上各人之言行，都與蔣本人常在矛盾之中走極端，卻又在某些場合之中通融妥協的態度至為接近。再有如他之取法於戚繼光，則純從技術

角度著眼。比如蔣親撰之「戰鬥秘訣」（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即與戚繼光在《練兵實記》裡的訓話極為相似。他頒布的「革命軍連坐法」，更是由戚之「申連坐」條文仿效編成。

而最使蔣介石在各人心目之中莫衷一是的，還是他之取法於王陽明。簡率說來，蔣介石為操縱人類思潮之大能手，包括他自己的思潮。這給作史者最大的困難乃是「信不信由你」，能理解而無從證實。例如他在日記裡不斷的提出「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如果這信念完全出自客觀，有如日在中天，那他何必又如舊式之潛水艇，每隔二、三日必須出水發動柴油機，充足電池式的提醒自己？所以從一個不信任的立場上講，他胸中並無把握，所說純係自欺欺人。而站在一個同情於他而忠信於他的人看來，這不僅是一種思維的方法，而且全部出諸真理。

然而明代思想家王陽明不承認知識出自客觀。他的口語為「天下無心外之物」。又說：「爾未看花時，此花與爾心同歸於寂；爾來看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這當中有一點不合邏輯之處：本來王陽明「應當」說出：花之存在與否，不是問題之關鍵。在我看來，只有我對花之反應才可算數。可是這樣一個客觀之存在與一個主觀之反應打破了他的宇宙一元論，如是他也不考究存在與不存在這一問題，而只囫圇道出，天下無心外之物。陳榮捷教授是當代研究王學之威權。他就說出王陽明的哲學短於邏輯，而長於行事之決斷。因為以行動代替知識，可能打開局面，而用不著左右思量，顧慮多端，反而遲疑不決。這種好勇的精神最符合日本人之胃口。東鄉平八郎於日俄戰爭時在對馬海峽擊滅沙俄艦隊，即鑄有「一生低首拜陽明」的圖章。蔣介石自己說出他十八歲而知有「王學」，以後在日本看到海陸軍軍官都讀王陽明之《傳習錄》，於是他也仿效。自此他也可以算做一生低首拜陽明的信徒。台北之草山經他住過，即改名為陽明山，也可見得他仰慕之真切。

以下一段出自蔣介石日記，內中全未提及王陽明，可是先採取行動，次考慮後果的方針，與日人心目中的王學如出一轍。而且內中的「瞑眩瘳疾」，亦即猛開藥方，使受者頭暈眼花，典故出自《書經》「藥勿瞑眩，厥疾弗瘳」，尤其自認其行動不合邏輯：

余性行狂直愚拙，故對人對事皆無戒懼，更無疑慮，所謂直道而行者乎？因之此身雖入險境，而不知其為冒險；已當萬難，而不知其為犯難。及至險難一一暴露，方知此身已陷重圍，乃不得不發奮拚命，惡戰苦鬥以自救。而自救之道，一則攻堅致強，一則蹈瑕抵隙。至余之處事決策，多用瞑眩瘳疾之方，孤注一擲之舉，以為最後之一著。而此最後一著則為起死回生，絕處逢生之機，亦即兵家所謂置之死地，蹈之亡地，而後生後存之道。此余一生之所以不能不茹苦含辛者在此，而無數次之蒙羞忍辱者亦在此。故世人認余必為智勇兼全之人，而余自覺為狂直愚拙，所恃者惟道與義而已；惟能以道與義自恃，乃能蹈瑕抵隙，先聲奪人；亦惟狂直愚拙乃能無畏無忌攻堅致強乎？（一九四四年二月五日）

其實蔣胸有城府並不完全如此段的粗魯孟浪，以下還要提及。只是他因著王陽明的影響，提倡「艱苦卓絕」，全從主觀著眼，以不可能為可能，不承認困難，甚至否定事實，固然使他成大功，有如東江之役、北伐之役與抗戰勝利，也使他在無數西洋人面前和受過西方教育的人士前產生深厚之隔膜。即是他與蔣夫人情愛彌篤（有如日記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五日及十一月二十四日各段記載），有時他之執拗仍使蔣宋美齡不能完全信服。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史迪威在他日記裡寫出，蔣夫人曾承應設法改變蔣氏，她甚至以美國

語氣說出：「除了謀殺他之外，一切都來！」（此時夫人亦叩蔣命前往說服史迪威，使他向蔣道歉。詳本書三三六頁）。多年之後，蒙巴頓爵士接見涂克門女士，他追憶到開羅會議時，曾與蔣商談，由夫人翻譯。及至蒙氏說及雨季之前空運噸數不能如中國要求時引起蔣夫婦之間一段冗長之討論。後因蒙氏催促，夫人出於無奈，只好說：「信不信由你，他不知有雨季！」我想此段並非說蔣氏不知世間有雨季一事，而是他不承認以雨季為藉口，延遲軍事行動。這一點須與蔣介石所受日本軍事教育之經驗對照，方可徹底瞭解。

以傳統中國之愛門面，又加以抗戰時之百般無奈，總是壞消息多好消息少，更再因王陽明哲學之從主觀，任直覺，只有使中國之戰時宣傳，成爲一種不負責任之事業。因之引起西方盟國尤其美國之莫大反感。白修德 (Theodore White) 原爲重慶國際宣傳處所聘僱員。他在回憶錄中寫出：「實際上我被僱去操縱美國輿論。這政府需要生存，一線希望乃在策動美國新聞界，希望得到美國支援，對抗日本。於是必須說謊，必須欺騙，必須採取一切方法，說服美國，未來兩國前途端在並肩作戰對付日本。」白修德在國民政府裡工作了八個月，茲後即成了「暴露」後者「黑幕」之「專家」。他的文字曾未申明將「實際如此」與「應當如此」說得撲朔迷離，乃是中國文獻之成規。他當然也未提及王陽明。在他看來，凡稱日人爲「倭寇」，以退卻爲「向敵側翼轉進」，公佈殺敵擄獲「無算」，已都是「管制新聞」，也都帶欺騙性質。

此種反應，以及由是產生的中外間之隔閡，至今尙影響到台北主持檔案的政策。比如說主持人一方面希望將已編整之蔣日記廣爲傳播，一方面對日記原件之出處又諱莫如深。此中不僅涉及幾十年來之故習，也與蔣介石本人之思想信仰有關。可是在我看來，我們今日當急於將他所謂「置之死

地」，「孤注一擲」，尤其「瞑眩瘳疾」，「蹈瑕抵隙」，以及「攻堅致強」的原委道出。其目的不在揭穿內幕，也不是替前人洗刷，而是促進一部較完整之中國現代史的出現，以減輕下一代意識形態之負擔。



大凡作自傳和回憶錄的總有替本身辯白，掩非飾過的趨向，所以一般說來此類文字不可盡信。而蔣氏日記卻已明白道出，是一種促進修養之工具。再從他保持紀錄的習慣看來，寫日記亦可算作他行政工作之一部份。再加以王陽明之影響，他的日記始終帶有信仰的成份。這些因素既可以視作軍事思想，或戰場心理，亦可視為革命哲學，總之就與一般不同。比如說，這便和史迪威的日記有一日千里的距離。

可是這種哲學也是一種動的哲學，以本人心潮斷定花之色彩，不可能始終前後一致。《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提及沙基慘案之後，「自是日記冊上公日書仇英標語以自針，至次年秋北伐緊急時乃止」。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廣州各界舉行援助上海五卅慘案遊行示威，黃埔軍校師生官兵由何應欽率領，於沙基口遭沙面租界之英軍射擊，死工人民眾六十人，黨軍學生二十三人，傷者五百餘人。蔣介石聞訊據說「體發高熱」，「幾暈倒」，次日臥病於要塞部，這也即是每日寫仇英標語之由來。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日，日軍阻礙北伐，發生濟南慘案。《大事長編》也說及自此之後蔣介石日記每日有「雪恥」一欄，數年之內從未間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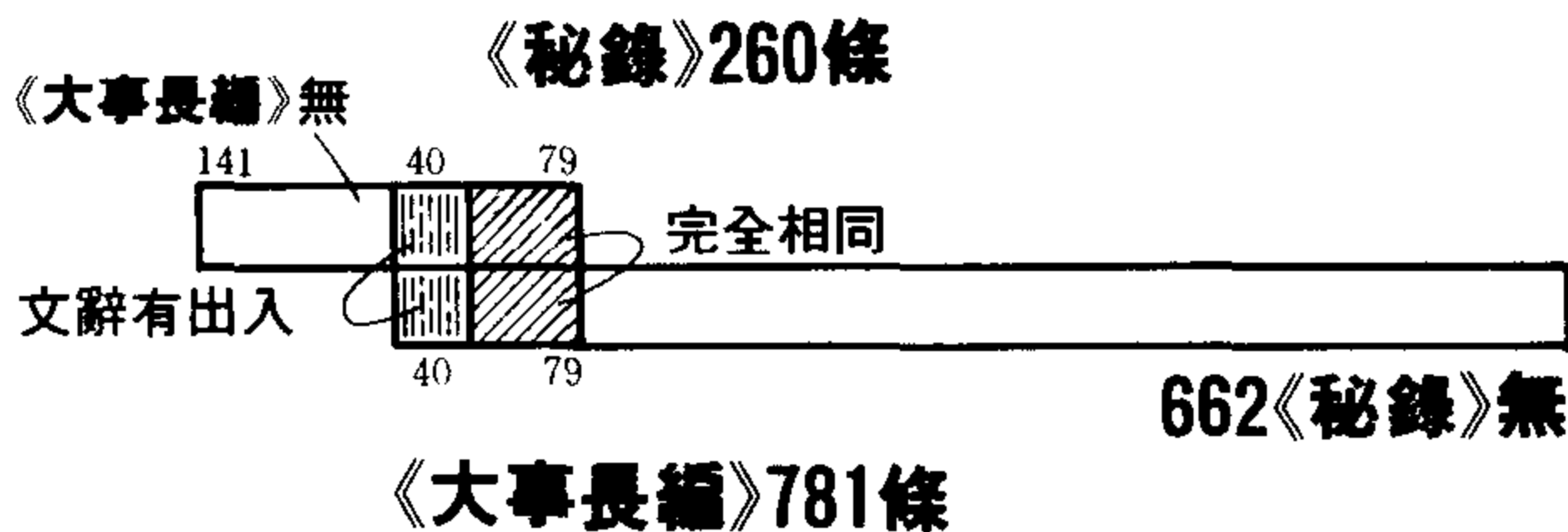
然則一個國家的內政外交，不能全由感情決定。蔣介石熟讀《孫子兵法》，他當然知道「怒可以復喜，忿可以復悅，而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他是一個極端感情充沛的人，也是一個極端以紀律約束自己的人。此亦即他注重修養之由來，也是他提倡「忍辱負重」之主因。如是環境的需要，逼迫著使他有經常在矛盾之中走極端的趨勢。這種衝突不免在他日記裡流露，有時尚且影響到他的視聽。

一九四二年二月蔣介石訪印度，曾接到邱吉爾的來電，囑他不要在甘地和印政府之間產生是非，當時蔣之反應不見於現已發表之日記。可是我們可以想見他對邱無好感。以後邱吉爾邀他赴倫敦參加太平洋戰時會議，他當然以元首的資格不願屈尊下降。可是後來蔣夫人訪美，那時候邱吉爾也在美，羅斯福曾提議邀兩方在白宮午餐見面，也由蔣夫人謝絕。邱在他的回憶錄裡寫出：「夫人認為我應當以朝香的方式去紐約拜訪她。」以後蔣夫人遍遊美國各處，尚謝絕英王及后之出名邀請遊英（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八日）。所以兩方成見已深。直到開羅會議時，環境變更，蔣介石覺得邱吉爾給他的印象較前為佳，實有上述背景。

現已發表之日記，只有當中挑選出來之片段，而且其斟酌尚在蔣生前，這當然不是作史者能自信可以全部掌握左右逢源的資料。只是在原件尚未公佈之前，以目下已能採用一部所涉及時間之長（約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四五年抗戰結束，前後二十年）所概括內容之廣泛，而作日記者之一般態度又已明悉，所以我們利用此資料，注重作日記者情緒之激變，及其前後觀點之不同，再充分引用側背之證據，不難將蔣介石一生最重要的幾個問題，得到初步較合邏輯之解釋。

嚴格說來，蔣一生不用「代寫作手」(ghost writer)，他親自執筆的文件已有無數的影印發表。

兩種資料內摘引蔣日記之處



即是由陳布雷和陶希聖代筆的講稿書稿也經他斟酌審核再三，有時改稿五六次之多，所以已是蔣心血之作。在同樣情形下，我們看到「日記」包括所附文件內容有前後不同的地方，可以揣想其修訂經過蔣介石本人作主。

刻下我們發現文字之中有重大之不同者為〈軍校第三期同學錄序〉（原作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其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所轉載者，呼籲國共合作，與當日情景符合，亦與此書（指《蔣介石先生》）付印時，即西安事變之後抗戰開始之前的政治氣氛融合。其載在《大事長編》之同序則已將全文大幅修改，當中有一千七百餘字之不同。似此全面轉向，不可能無蔣本人認可，以下尙有機會道及。此間我們即可暫時放棄考證之立場，將「序」與「同學錄」分離，認為兩篇文字同出於蔣介石，其內容代表前後政策之不同。

將《大事長編》與《蔣總統秘錄》比較，內容亦有不同之處。有如抗戰期間，即自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長編》引用日記七百八十一處，《秘錄》則引用二百六十處。內中互相重疊者一百一十九條。可是此一百一十九條中，又只有七十九條文字完全相同。其他四十條或者辭句之間稍有不同；或此間多數字，彼處少數字。

例如開羅會議時，蔣曾分別的單獨晤見邱吉爾及羅斯福。其見邱時，日記上綜合其印象，在《大事長編》有：「蓋以日來余與邱吉爾相見已有四次，認定其乃爲一現實的英國式之老政治家，實不失爲盎格魯撒克遜民族之典型人物。其深謀遠慮，老成持重，於現代政治家中實爲罕見。」（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秘錄》則有：「邱氏爲英國式之政治家，實不失爲盎格魯撒克遜之典型人物。雖其思想與精神氣魄不能與羅斯福同日而語，而其深謀遠慮，老成持重，則現代政治家中，實所罕見。」

及見羅斯福時日記在《大事長編》有下列一節：「會談完時，彼對余慨然曰：『現在所最成問題，令人痛苦者，就是邱吉爾的問題。』」又曰：「英國總不願中國成爲強國。」（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其在《秘錄》則有：「彼對余慨然嘆曰：『現在最令人痛苦者，就是邱吉爾的問題。』」又稱：「英國總不願中國成爲強國。」

蔣介石行文迅速，可是他也有給自己文字竄改修飾的習慣。以上之抄件經過他自己訂正？還是抄寫時的錯誤？目下無法獲知。理論上《蔣總統秘錄》又經過兩道翻譯（不過翻譯不能產生上述之參差，有如提出羅斯福之思想氣魄），所以更難斷定，好在這些小處之不同與我目前準備所作重點上之綜合關係不深，只是讀者不能不明悉資料之中有此複雜性。

除非特別申明，本文引用日記之處，根據《蔣介石先生》及《大事長編》，不出自《秘錄》。



蔣介石生於一八八七年。他的祖父與父親都是鹽商，在中國農村社會中家道可算富庶。他的家

▼提倡國共合作：實現
三民主義即是貫徹共
產主義。

七人嗟乎死固壯矣而生者悲慘焉其有極以師弟之親部屬之愛每得其死者屢耗心酸腸割不知其所止雖百臂而終難自解既知死者不能復生履者不能復全乃必欲驅此至親至愛情逾骨肉手足者而使之死焉傷焉以我今日憐悼之哀而推於其死者履者之父母之妻子之兄弟其孤苦悽愴更爲何如乎嗚呼何其忍心乃爾中正之罪誠焉死而莫贖焉矣甚矣處動心忍性之逆境當風雨飄搖殘破軍落之危局極惡戰苦關之全力而其所得之結果徒喪失我寶貴而難得之信徒不期莊嚴燦爛之實境竟成爲白骨之骸赤血之淵而於民生之痛苦民權之斷喪民族之衰弱皆無補於萬一至今軍閥作惡如故也列強橫行且有加而無已也五卅

時先烈之死者爲共產乎抑爲非共產而三民乎中正茲預言以答後吾死者之問曰一吾敢率國民黨內共產與非共產諸同志集合於國民黨青天白日之旗下以實行我總理革命主義而死也吾願死於青天白日之旗下吾爲國民革命而死吾爲三民主義而死亦即爲共產主義而死也吾願與黨內死者諸同志同穴安眠於地下吾願本黨後死諸同志不分畛域不生裂痕始終生死本我親愛精誠之校訓團結精神繼續我先死者之事業以完成我國民革命之責任直接以實行我總理之三民主義即間接以實行國際之共產主義也三民主義之成功與共產主義之發展實相爲用而不相悖者也吾並不望後死者入彼出此尤不願其較長爭

慘案之仇未報也不平等條約之恥未雪也而我總理實志以殺一牛之抱負及其遺我之明訓其果有見諸實行乎殺我同志者敵人也而驅我同志就死殉難者中正也喪失如許之同志尙不能實行主義於萬一上何以見總理在天之靈下何以慰殉難將士之魂縱人不責我我之神明乃能暴然自安而無疚乎此恨綿綿雖傾珠江之水而不足以洗淨黃埔之血痕與淚迹矣嗟乎總理逝矣先烈亡矣而其神其靈不昧不爽者惟在其所遺本校後死而未亡同志一練之命脈耳吾人之罪足告慰先烈者亦惟此而已此一練未絕之命脈所遺者何是乃總理一練相傳之國民黨內共產與非共產二者彙集而成之血統也吾人至今悔不問明當

勝冰炭水火以斬斷我輩已死者之命脈不然生者之是否安心姑置不問而我輩死者誠爲枉死之冤魂而不能瞑目於地下矣然則如之何而可曰知止於至善行乎生者心之所安者而行之止乎生者心之所安者而止之不止不行不行不止革命之道一以貫之大學曰一物有本末事有始終一未有本末倒置始終不一而成其事者也闡明革命之理實行革命之道不爲外物所誘不爲感情所累以至誠之義力求三民主義之發展以至精之理實行國民革命之成功未有中國之國民革命而可不實行三民主義者也亦未有今日之國際革命而能遺忘共產主義者也中國革命不能不承認爲世界革命中之一部而實行三民主義則共產主義即

▲自此以下迄至結尾一段凡一七二七字全文與《大事長編》所載不同。

▼「而已」以下與《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所載根本不同。

境，當風雨飄搖殘破零落之危局，極惡艱苦鬥之全力，而其所得之結果，徒喪失我寶貴而難得之信徒。不期莊嚴燦爛之黃埔，竟成爲白骨之嶽，赤血之淵，而於民生之痛苦，民權之斷喪，民族之衰弱，皆無補於萬一。至今軍閥作惡如故也，列強橫行，且有加而無已也，五卅慘案之仇未報也，不平等條約之恥未雪也；而我總理會志以歿，一生之抱負，及其遺我之明訓，其果有見諸實行乎？殺我同志者，敵人也，而驅我同志就死殉難者，中正也；喪失如許之同志，尚不能實行主義於萬一，上何以見總理在天之靈，下何以慰殉難將士之魂，縱人不責我，我之神明，乃能泰然自安而無疚乎？此恨綿綿，雖傾珠江之水，而不足以洗淨黃埔之血痕與淚迹矣！嗟乎！總理逝矣！先烈亡矣！而其神其靈，不昧不爽者，惟在其所遺本校後死而未亡同志一線之命脈耳！吾人之聊足告慰先烈者，亦惟此而已。吾願與黨內死者諸同志同穴安眠於地下，吾願本黨後死諸同志不分畛域，不生裂痕，終始生死，本我親愛精誠之校訓，團結精神，繼續我先死者之事業，以完成我國民革命之責任，直接以實行我總理之三民主義也。吾並不望後死者較長爭勝，冰炭水火，以斬斷我輩已死者之命脈；不然，生者之是否安心，姑置不問，而我輩死者，誠爲枉死之冤魂，而不能瞑目於地下矣。然則如之何而可？

世至今還保持著若干神秘性。比如說他一生對他所受母愛極端的表揚。但是他八歲喪父，他不可能對生父毫無記憶。實際上除了由朱執信所作一篇墓志銘之外，他對此公絕少提及。他的母親年輕孀居，後改嫁蔣氏。除此之外我們對她所知極微。據他在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致汪精衛和胡漢民的書緘，他母親的管教至爲嚴格，包括「夏楚」（最少是打手心）。而且她在宗教上的信仰與習慣，給

他的影響，至為深刻。

在蔣母主持之下，蔣幼年經塾師督促，受過一段傳統式的教育，顯然的著眼於科舉。可是中國的科舉停止於一九〇五年，蔣則在兩年之前改受新式教育。他於一九〇六年去日本，希望入士官學校，時年十八歲。只因爲中國學生往日學習陸軍概由保定軍校保送，蔣不得其門而入，卻在東京認識了陳英士，從此與革命黨人交往。

蔣再度往日本已經過保定保送。按例中國學生須先入振武學堂，此是士官學校之預備教育，爲期三年。他在一九一〇年畢業時已二十三歲，被分發至高田第十九聯隊之野礮兵隊受入伍教育，任二等兵。多年之後他還敘及當日兵營生活。大凡嚴冬大雪，士兵以冷水洗臉，又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用稻草擦馬，務必擦得馬血脈流通，全身發熱。吃飯則終日不得一飽，二等兵又承受上等兵各項差遣，供其凌虐。他認爲這一切都是中國軍人應當效法的地方，因爲能增強其能力與耐性也。

提及以上各節時，即原始資料中引用年月亦有出入。蔣亦未曾說明他既經過入伍階段，何以始終未入士官學校。但是辛亥革命時（一九一一年）他曾參加陳英士主持之上海獨立運動，自任團長。以後陳被袁世凱刺死（一九一六年），他又爲之發喪致祭。此間前後約十年中，蔣介石翱翔於游俠浪人及革命志士的生活之間，雖專家亦難斷定其一時之行止。

直到一九一八年孫總理任陳炯明爲援閩粵軍總司令，蔣在陳部下初任作戰科主任，繼充第二支隊長，才算重履軍旅生涯。自是他的傳記才有確實線索可尋。以後他仍有數度離職家居情事，只是時間不長。所以我們可以斷說，他在一九一八年加入孫總理軍政府之陣容，已開始奠定今後作爲中國領導人近半個世紀事業之基礎。

蔣家也和當日中國很多人家一樣，充滿著社會間新舊之矛盾。例如他幼弟瑞青只三歲而殤，他母親仍爲之配冥婦王氏（人家亡女年齡相仿，配爲陰曹夫婦），名義上蔣介石之長子經國會指定爲此冥夫婦之繼子。蔣自己於一九〇一年「與毛氏女結婚」，那時他實足年齡不滿十四歲。《蔣介石先生》又提及他於一九一二年「回國鄉居納妾姚氏」。實際上蔣結婚四次。宋美齡之前妻室爲毛福梅、姚冶誠與陳潔如。內陳潔如之照片見於蔣北伐期間。日記之已公開部份，除宋美齡外，不提及及其他妻室。她們與他的公眾生活關係至淺。只是她們之存在，已爲閒話之題材，也在非正式場合之中供評議者用作口實。

例如最近在台北行銷之所謂《陳潔如回憶錄》敘及蔣宋聯姻，由孔祥熙夫人提出，內中以宋子文任財政部長作爲條件之一，時在寧漢分裂之前夕，應爲一九二七年。作者尙不知宋子文早已於一九二五年在廣州即任國民政府之財政部長，又經過武漢與南京，在蔣宋聯姻前後未曾間斷，即無提出作爲條件之可能及必要。如是最基本之資料作者尙不能掌握，此書之可靠性可想而知。

蔣介石雖被孫總理識見多年，但是直到一九二二年陳炯明叛變時他親往廣州與總理共患難後，才算被「納入內圈」。只是至此他在國民黨內資望仍淺，較他資深的尙有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等。而他又恃才傲物，不願居下。總理倚爲將才者前有陳炯明，後有許崇智，因之只能任之爲幕僚顧問。此情景可在他一九二四年三月二日致孫總理書文長三千四百餘字中窺見之。

迄至此日他還存怨望，不願繼續籌辦軍校事務，因不甘心「專心辦學，不問軍事政治」。也料不到曾幾何時，蔣中正字介石，以黃埔校長之身分，既過問軍事，也干預政治，因之爲國民黨在廣東打開局面。

一九二四年蔣介石主持黃埔軍校訓練期間和他在一九二五年初指揮東征戰事期間現存史料不稱日記。但是《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將當時之演講稿、文件書牘收羅得極為詳盡，有時所紀事顯然據日記抄錄。有如初向東江進軍一段：

晨起準備各事，發令畢，淚涔涔下。火車機壞，煤又不濟。悶坐常平站久候。因感吟一絕
曰：「親率三千子弟兵，鷓鴣未靖此東征。艱難革命成孤憤，揮劍長空涕淚橫。」九時開車，
下午一時到塘頭廈。（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

此種情景不可能倩人代作。所以我們可以將全部文稿包括附件泛稱為「日記」。上抄七言絕詩也表現了黃埔初創設時的特殊情形。

軍校為中國國民黨立，曾一度稱「國民軍軍官學校」，或「國民革命軍官學校」。初期發畢業證書時，逕自稱為「陸軍軍官學校」。只因校址在珠江口之黃埔島，時人稱之黃埔，以後也以此在歷史上成名。

當一九二四年五月三日孫總理以大元帥名義任命蔣介石為校長時，第一期學生業已招考完畢，即將入校。考試在上海及廣州舉行，原則上廣泛的多收北方人。據第一期學生徐向前（後為人民解放軍元帥）稱，考試時政治思想佔先，其他數學等並不重要。在六月十六日舉行開學典禮時有學生四百九十九人。入學不久，所有學生集體的加入國民黨，連原有共產黨員在內（徐即已為共產黨）；同年十

一月三十日畢業考試時及格者四百五十六人。大概又一年之後此中半數以上死於戰場。東征時蔣介石所發表之佈告稱「校軍」，他本人稱「本校長」。黃埔軍校亦設有參謀長與參謀處（參謀長錢大鈞，參謀處長陳焯）。蔣介石於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在〈第一期同學錄序〉內稱：「第一期隨余出征之五百子弟與教導團三千同志之軍死傷幾達三分之一。」至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他在軍校演講又提及：「第一期學生原只有四百六十名，但連第二、三、四期已畢業的、未畢業的，今天共有五千五百四十名學生了。可是第一期學生，而今只存一百四十名了。其餘的都是非死即傷。其中派去外省宣傳的不過是最少數。」這種種傳奇性格顯示著後面還有待說明之背景。

當年黃埔教授部主任王柏齡在他作《黃埔軍校開創之回憶》說出：軍校初籌備時，各人以爲訓練期間至少一年，蔣介石獨稱三個月，並且說及若再延遲，中國可在此期間亡國，最後才折衷爲六個月。原來在廣東省境內陳炯明部仍盤踞東江汕頭惠州一帶。粵軍許崇智因循苟且，不足爲恃。滇軍楊希閔與桂軍劉震寰尙且霸佔著廣州一帶財政機構，可能與北方軍閥互相聯繫。所謂「關餘」原係廣州海關之收入扣除歷來向外借款及戰敗賠償軍費攤付本利之剩餘。孫總理希圖截獲作廣州政府之開銷，因外強反對，並派軍艦在珠江口示威，此計不酬之後，孫才決定全面親蘇。據費正清言迄至一九二五年，俄顧問之在中國者近千人（中國資料稱約一百人），對香港英人產生相當之刺激。從五卅及沙基慘案以來，香港及廣州之英行，遇著華人之長期罷工，勢成僵局，港督斯塔蒲司（Sir Stubbs）主張採取武力干涉政策。

孫總理以胡漢民爲廣東省長，廖仲愷爲財政廳長，他自己的公署則稱「大本營」。於理他有南來議會之支持，似應統率三軍，掌握著廣東省全部民政財政。而實際他所領的只是一個空銜，他的機

構尙存在於南方軍閥呼息之下。軍校剛成立，孫又提倡北伐，自往韶關。此時後方尙有被人席捲之可能。各軍閥見蔣辦理軍校，監視之中不能無敵視態度。

黃埔剛開設時即無軍械。只因蔣介石曾在事前去石井兵工廠（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五日），廠長爲國民黨員，不久即秘密運來步鎗五百枝。所以日後蔣介石不僅可以誇言「我個人親自指導出來的」黃埔一期學生約五百人，而同數的步鎗，也是他第一筆本錢，他即以此走上了統一中國大業之道路。

據第一期學生鄧文儀稱，軍校剛成立，即有斷炊之虞。王柏齡也說及爲了經費，蔣介石常親身出面向外借錢。有一次借來尙是汪精衛夫人陳璧君之私蓄，日後加倍奉還。

可是黃埔校舍，原爲海軍學校遺址，島上亦有長洲要塞。孫總理任蔣爲軍校校長時，即已派之兼許崇智之參謀長。不久（一九二四年七月七日）又任之爲長洲要塞司令，下轄海軍艦艇若干艘。事也湊巧，至此剛一月，即有「商械」事件。

原來當年五月，廣州市政廳此時已歸國民黨掌握，公佈擬修築馬路，擬向各商店徵資產稅爲經費，引起全市七十二行店罷市反對，由省政府通令取消原議了事。只是因此市內「商團」已開始與附近縣市議立聯防章程，作爲今後以武力抵制之憑藉。八月九日有輪船「哈輔號」由香港開駛廣州，掛挪威國旗，上載大批軍火。孫總理得悉，令蔣介石對付。蔣即親率軍艦在珠江口將該輪截獲解黃埔，卸下步鎗、手機關鎗、駁壳鎗等九千餘枝，查係商團訂購，此輪船仍許其自行開去。

顯然的，商團除非蓄意反叛，無需此大批軍火。所以有人說他們與陳炯明策應，也有人以爲他們受英人指使，擬組織商人政府。

商團要求發還軍火不得，乃於九月十二日準備罷市。長洲要塞恐被襲擊，亦開始戒嚴。黃埔第

一期學生分爲四隊。第三、四兩隊曾於八月十三日由教官率領往「省城維持治安，鎮壓謠言」。九月十二日第一隊學生又爲孫總理「隨駕護衛」，亦由教官率領前往韶關，出勤達四星期之久。所以第一期學生不僅學程短，而且任外勤時間亦多，表示著黃埔自始即非一般之「學校」。校長蔣介石於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三日向學生訓話即提出：「不要以爲求學和打仗是兩件事。」

此押扣商團軍械一事經過互長時間的談判。有提議鎗械發還，由商團「捐助」北伐軍費五十萬元了事；有提議發還一半，以一半武裝北伐軍；亦有提議每鎗標價五十元，等於指令商人贖還。更足以影響決心者乃是十月間有俄艦一艘逃過英人之監視，下碇於黃埔，卸下野礮、山礮、輕重機鎗等，又有式樣一致之步鎗八千枝、彈藥稱是。至此商械已不重要。廣州市內尚有親國民黨軍政府之「民團」與「工團」，可以配給此項武器。

在此談判期間，孫蔣間往來之文件大致都保存完好。孫望蔣放棄黃埔，將所有彈械全部運往韶關，即以此組成北伐軍之基幹。蔣則堅持「死守黃埔島」，並且預言「三月之內，必有一支勁旅，可作基幹之用，以之掃蕩一切殘孽，先圖鞏固革命根據地之廣州」，若非如此，則「吾黨永無立足之地」。倘非他再三堅持，則軍校成立不及半年即將脫離黃埔，成爲「韶關軍校」。

商團在發還軍械一部後背信，只能以武力解決。政府軍以由韶關調回之湘軍三千人爲主力，助以民團，黃埔軍校第二、三兩隊學生亦參加戰鬥。大概作戰並不劇烈，文件內無死傷人數，但市內建築有相當破壞，看來一切行動均在十月十六日天未明前。至十六日晚間即有商團副團長乞和。兩日後廣州解嚴，再一日而黃埔第一期學生學習期滿，分發各部隊見習，好像以上見習，全不能算數。蔣介石所謂「三月之內必有勁旅」，則是以上情事轉變之中，黃埔軍校不僅招考第二期學生入校，

將其他軍事教育機關合併（有些學生亦稱第一期或第二期，所以各處所載總人數不同），設立特種兵科，尙且成立「教導團」，又於一九二五年初之後發動兩次東征，「循軍校全體學生參戰要求」，使「校本部行營」變爲一個野戰軍司令部外，「黃埔」之本身，已有似於置放溪中之竹籃，只有流水出入其間，曾未間斷，難於固定的說出一時之情貌。有時入伍生在戰場上護送軍用品，有時尙未畢業之學生已被派往北方偵報軍情，或送莫斯科留學。第二期學生一面準備畢業試驗，一面在黃埔島上任總預備隊。第三期於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舉行開學典禮，但是茲後立即擔任沿海警戒。至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始「調回埔校訓練」，然則不出兩月，即在一月六日舉行畢業試驗，十七日舉行畢業典禮（亦有三期學生稱受訓一年者）。第四期學生「及各軍官學校併合總計二、六七〇餘人」，補考入伍生即前後支續數月，達七次之多。因爲入伍生繼續入校，第五期至第六期無法有計劃的區分，只好規定凡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以前入伍者概屬第五期，八月一日之後則爲第六期。黃埔校舍早已無法容納如是許多之學生，於是擴充至廣州城內，亦在各城市設立分校。

在此空前膨脹之過程中，其財政問題如何解決，至今尙無人能確切概述。只從各人回憶錄看來，即在開創初期，情形最黯淡之際，廖仲愷爲軍校黨代表，實際責任爲募款。雖然他無從籌辦巨款解決問題；但從各人稱頌中看出，他必是竭盡全力在各處設法接濟。韋慕庭主張在研究此段歷史時注重俄文資料，因俄人在此期間已資助二百萬元也。至於爾後之發展則較明朗。軍校第一次東征，打破陳炯明窺粵之企圖，回頭又解決楊希閔和劉震寰部才能讓國民黨政府將各財政機構接收到手。自是大本營改組爲國民政府（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宋子文爲財政部長（九月二十二日），局面已逐漸打開。

在這一年稍長的時間，黃埔軍校本身即爲打開局面之工具。值此諸事紛至沓來之際，學生之基

本訓練並未放鬆，有如王柏齡之追紘，雖說初期黃埔之教育實際上仍與戰場及作戰時之後方勤務不可區分。在此期間校長蔣介石日理萬機，舉凡軍服軍帽之設計、教官之選用、教程之內容，以及校舍內之經理衛生等，無不有他親身切眼的參與決定。再從他留下的講稿看來，校長經常保持與第一期學生之密切接觸（以後第一期畢業生多為其他各期學生之長官）。所講話大白為人宗旨、生活目的，小至外套風帽、痰盂廁所。技術方面的講到步鎗射程，常步速率；側面的又講到內外情勢，遊俄經歷。學生逃亡與關禁閉，更是話題。所以一年之後（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一日），蔣提及「第一期學生可說是由我個人親自指導出來的多」，確是符合情景。

除此之外尙未為一般人注重的：黃埔軍校不僅培養軍官而且練兵。假使沒有教導團，則上述廣東被軍閥割據情形，政府之承受其呼息，稅收無法統一，外強壓境，商團謀變的狀況無從打破。

募兵開始於一九二四年七月，去蔣被任黃埔校長才二月，機構設於上海，由陳果夫主持。此間所募兵多係浙江人（此亦效法曾國藩、戚繼光辦法），除注重蔣之家鄉奉化縣外，及於紹興、金華、台州與處州。再次之則及於江蘇與安徽兩省。每次募足數十人或數百人，即分批南送。迄今尙無適當的紀錄統計其總人數及所募兵員日後事業上之發展，我們只知道募兵「耗費甚大」。根據所述情形只能揣想教導第一、二兩團總人數約三千中，多數來自長江下游。又從蔣介石書緘及訓話中提到士兵寄餉贍家，可想見其為良家子弟，可能多數為農民。因為離家既遠，又不通廣東方言，亦不易逃亡。此外教導團亦在廣州招收學兵，以「年齡在十八歲至二十四歲，身體強壯，粗通文理之有志青年」為對象。所用純為日後之軍士及准尉。湘軍所保送之學兵一批人數不多，只六十八人。教導團之特色為一切從頭造起，不沾染現有體制之惡習。

及至一九二四年冬季，第一期學生畢業在即，此教導團之募兵亦編組成軍。黃埔總教官何應欽爲團長，軍事教官陳繼承、顧祝同均爲營長，連長多由前學生總隊內之區隊長充任，畢業學生則爲排長，亦有暫任班長者。教導團仿蘇俄黨軍體制，每一單位均有黨代表。

這支軍隊之人員經過一層甄選，又受過思想及精神訓練，在戰場上更有「革命軍連坐法」之制裁，而且金錢上的策勵也並未放棄（攻惠州時「攻城先鋒隊」每名犒賞金三十元，存候登城後給領），所以戰無不勝，同時也死傷慘重。第一次東征開始於一九二五年二月，至四月底回師廣州平息楊劉之叛變。東征時教導團任右翼，粵軍之一師又一旅爲左翼。初時蔣介石以該軍參謀長之資格指揮。以後許崇智仍出入戰場，現存紀錄顯示他與蔣介石發生人身上之衝突（二月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八日，三月八日）。雖則一路功成，而蔣仍有其情緒之低潮，如日記所示：「犧牲子弟同志如此其多，又皆爲優秀份子，而後退之官長與黨代表又須置之於法，是皆一手所陶成，心何以忍，而不殺又壞紀律，左右縈思，誠不願以帶兵殺人爲事也。」（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以上所敘甚可能在專家前發生質疑與爭執，而且新證據仍待發現。只是綜合看來，又參對這段歷史之前情後景，我們可以斷言：中國近代史有了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廣東局勢之突破，已展開新的一頁。迄至主持黃埔之前，蔣介石未露頭角；東征之後，他開始成爲家傳戶曉之人物。軍校師生除上段所列諸人外，尚有軍事教官陳誠、錢大鈞，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第一次東征時軍法處長），政治教官聶榮臻，教授部副主任葉劍英（日後此二人同爲人民解放軍元帥）等在中國今後五十年之歷史中具有

不同之貢獻。至於第一期學生在中國軍事史上成名者尙不可勝計。

第一次東征只暫時解除陳炯明之威脅，並未消滅其實力。「校軍」退後，其部隊捲土重來。於是一九二五年十月又有第二次東征。此次以蔣直轄之第一軍（以前校軍，後稱黨軍，至此爲「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及李濟深之第四軍（原粵軍，以前以省區爲名之各軍至此已改稱爲第二至第六軍）爲骨幹，一直攻入福建境內，將陳部徹底解決爲止。可是如此之戰功不計，蔣介石之建軍工作內最有創造性的一段，已早因黃埔之成立教導第一、第二兩團而達最高潮。因爲以前全係無中生有，以後則團擴爲旅，師又成軍，無非繼續膨脹擴大也。

雖則在此階段蔣介石得到蘇聯及中國共產黨人之支持，但是新軍之全部設計，下至技術中之細節，始終未脫離他之掌握。雖孫總理亦無從改變他之決策，可以從他們彼此緘件中看出。再以他用校長身分與大部黃埔師生保持密切之人身關係，凡此都與他所景慕之曾國藩、戚繼光的事業有若干相似之處。

當中最大之不同，即曾、戚建立新軍旨在扶持彼此之國家（當日即爲朝廷）與現有之社會。蔣介石在一九二五年所處環境，則國家業已名存而實亡（不然何以兩個政府如南北朝之對立），而他身歷之社會（產生上述童婚納妾現象，以嫖妓爲名士風流等）亦無可救藥，所以他之言革命，有如他在一九二三年所述「自省過去之愆尤」，不可能爲不真。也只有在此情形下，他之創辦黃埔，又在校門大書「升官發財請往他處，貪生畏死勿入斯門」，才能使當日有志之士望風從命。

今日讀史者尙不能不察：民國初年之軍閥割據，實爲歷史發展之必然後果。舊社會依賴「尊卑、男女、長幼」之秩序，靠昊天誥命的皇權支持。又以科舉取士，用詩云子曰不離口的學究作廟堂間

與農村中之聯繫。然則科舉已在一九〇五年停止，皇權又被辛亥革命推翻，詩云子曰與尊卑男女尚在五四運動期間被整體的批判，那麼中國靠甚麼存在？難道當日國民識字率只百分之五，國庫囊空如洗，關稅由外人掌握的環境內所頒佈的憲法與所組織的議會真能算數？

實際上中國已失去了合理存在之邏輯，不然何以孫總理稱中國爲「一盤散沙」？此一盤散沙尙未全部被沖刷至太平洋深淵中去者，因尙有私人軍事力量在也。此亦即軍閥體制存在之總因。

軍閥除了日無法紀，魚肉人民外，靠兩個組織原則作主。他們彼此間之聯繫以傳統之忠義標榜。只是假裝的多，著實的少，於是才經常有內訌及戰場上倒戈情事。次之則他們的經濟來源，純係地方上之稅捐，並無系統，由各人自出心裁的榨取。

本來中國爲著適應新時代之需要，亟應擴大政府之職權，又需抵禦外侮，軍備更不可少。照理軍人應於此時發生決定性之影響。如在旁的國家，若干軍閥甚可因此而革面洗心成爲維新志士。只以中國幅員之大，人身關係之道德甚難在三兩個省區之外有效。而且舊社會無支持新制度之資源，是以財政困難。地方上之零碎收入則無架構，更難使受其供應之軍隊行動一致。我們看到蔣介石於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致廖仲愷緘及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一日致許崇智之密呈，可以體會即在當日之廣東引用關餘既受阻，只能以鴉片稅捐爲收入大宗，以商人承包，大概取其繳納容易。其餘絲捐、印花稅及火油捐爲數少而難能整體化。各軍則稱不得不「自求生命」。所以他們即縱有心爲善，亦無從擺脫此種客觀條件；質言之，雖欲避免軍閥之行止亦不可得。

此時如要改革，無從由內部整頓，只有與現存體制絕緣，由外輸入人員器材經費編制，另製造一種新生力量，蔣介石執行此方案時，即組合各因素，亦絕緣於一座海濱島上，因之才立即見效。

可是如是構成之純真，亦僅維持於一時。一到部隊擴充，核心人員分散，其效率亦因之降低。

而且革命熱潮端在一鼓作氣。蔣介石非不明悉。他在一九二五年九月九日對黃埔第二期的畢業生說及：「如果對於革命事業起頭非常奮發，等到一年不成功，二年不成功便將朝氣變為暮氣，熱血化為冷血，這不但是不革命，而且做了反革命。」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蔣介石在他的日記中寫出：「余邇來行動，已近於軍閥，尙能負革命之責耶？懲之！」

《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書中解釋，乃是當日他因公搭乘由汕頭赴潮州的客車，回時令車久候，可能對負責員工及其他乘客之歉咎。儘管表面看來如此，或者日記上下文文義如此，他既說「邇來行動」，則感到歉疚的已非只一端，同時既在軍事期間，也不當以此將列車久候之小事記掛心頭。看來他需要懲戒自己的已超過書中解釋的範圍。

自一九二五年七月廣州的大本營改組而為國民政府，至次年七月北伐開始之一年中，據蔣自己說來，他曾遭遇到一連串損害及中傷他的陰謀。可是從留下的紀錄裡看來，他自己在當日廣州的權力鬥爭中也並無迴避退讓模樣，而且採取主動，每次結果都佔上風。如果我們自尋常人身關係的角度觀測，則當中是非極難判斷。況且若干內幕，例如他說及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共產黨人企圖將他綁架於中山艦，送至海參威，其實情至今無法斷定，可能永為歷史之謎。另一方面如從大處著眼，則歷史發展之線索，不難一目瞭然。即以前述他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的演講作背景，經他訓練已

畢業及仍在學的黄埔軍官學生既已超過五千五百人，則根據當日實際情形，並臆度蔣介石之志趣與性格，他之掌握廣州軍政府之領導權已是指顧間事。因經他訓練之黄埔學生縱有陣亡，以平均至少每人帶兵二十人計，可以供他佈置之軍隊已逾十萬人也。

而且此一年內，南方之軍政府也已介入一個進退之間的微妙關頭。表面看來，廣州政局經過過去一段奮鬥，已達小康局面。實際上則內部不能協調之因素仍然如故。例如軍政、民政與黨政之分歧，軍費分配之不公平，各軍之部落習慣，與新舊之爭執等。再加以國民黨因親俄容共政策所引起左右派之傾軋，只因孫中山之突然去世而變本加厲。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孫總理因段祺瑞執政之邀而去北京，原希望召開國民大會而促成中國之統一，乃於次年三月十二日病逝。他原已派胡漢民為留守，時人亦稱胡為「代帥」。可是七月一日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時，則以汪精衛為主席，因幕後已有俄顧問鮑羅廷主持。國民政府委員十六人，蔣介石亦未入列。胡漢民為外交部長，許崇智為軍事部長，廖仲愷則為財政部長。蔣僅為軍事委員會八個委員之一，委員長仍由汪精衛兼。

八月二十日廖仲愷在廣州被刺死，政府由鮑羅廷建議組織特別委員會處理此事，汪精衛、許崇智及蔣介石任委員。鮑羅廷以胡漢民之堂弟胡毅生反共最力嫌疑重大，而且業已在逃。當日汪精衛與廖仲愷稱左派，胡漢民則為右派，所以胡本人亦不能辭其咎，調查之後曾被禁押於黄埔，以後特別委員會於九月一日決定將之「放洋」。

此案發生未滿一月，蔣介石又於九月十九日在廣州發動政變，由黄埔學生及蔣直轄部隊將許崇智之一部粵軍監視，對外稱許部反革命。其實蔣介石名義上仍兼許之參謀長，兩人嫌隙已深。許在

廣州「狂嫖闊賭」，生活靡爛，而且許軍一萬五千人，每月餉九十餘萬元，其他部隊則遠不及此數。蔣介石將內外部署妥貼，又將許之家屬送至海船，才告訴許崇智本人，謂他在廣州人事上有問題，請暫去上海休養，「期以三月，師出長江，歸還坐鎮」。次日由蔣派粵軍旅長陳銘樞將之押往上海。許崇智自此終生作寓公，再未過問政治。事後蔣將粵軍整個改編，一部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三師，隸屬蔣本人之第一軍。同時執行胡漢民之放洋，即予以出使俄國名義，乘俄艦離廣東，作短期流放之後將來回國派以次要之任務。此亦在日後成為蔣介石對付其政敵之經常辦法。至於宋子文於此時出任財政部長兼廣東省財政廳長，則不僅使刻下的財政問題有了著落，而且展開了蔣宋兩人長期事業上之合作（蔣宋之聯姻則在兩年後。至一九四〇年間，蔣也有擯斥宋之情事，但已與現下所說無關）。

以上之發展若非由汪精衛主動安排，至少有他的同意與支持。因此時蔣尚兼任廣州衛戍司令，事變之前夕曾奉有軍事委員會命令：「廣州衛戍司令全權處理粵局」也。

驅許成功之後，蔣主持第二次東征，其情形已如上述。回師之後，適值國民黨在廣州於一九二六年初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此時蔣、汪仍有一度合作。蔣介石被推為中央執行委員九個常委之一，此為蔣初次列入黨內要津。然其在軍中仍只為六個軍長之一。只兩月之後，即有中山艦事件。

對蔣介石言，中山艦不僅對他個人，而且在中國政治史上也是一個重要關鍵。事出後約一月，他在一次公開談話裡說及：

但這要等我死了之後才可以完全發表，因為這種內容太離奇太複雜了。萬萬想不到的事情，都在這革命史上表現出來。如果我不是當著這件事的人，我亦不相信這件事情。（一九二六年四月

二十日)

同時他也說及：「你們只看法國大革命史，就可以曉得這回事情。」

可是中山艦事件雖然複雜，卻沒有他說及的這般神秘。蔣介石的軍事力量飛速膨脹，已引起各方之反感。當日在廣州與香港間，有人散佈各種謠言，甚至「倒蔣」之傳單已經出現。其傳聞間常見於報紙。曾任蔣衛士之黃埔第一期學生宓熙之回憶錄裡也說及：在此期間，蔣遇到好幾次謀殺他的企圖。有一次他的汽車被打翻，內中乘車衛士二死一傷，恰巧蔣不在車中。

中山艦是國民政府所轄軍艦較大之一艘，平日也間供蔣來往黃埔與廣州間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代理海軍局長李之龍將之駛泊黃埔，上載有第二師士兵。李之龍原在芝罘學海軍，黃埔第一期畢業，也是共產黨員，此時因著海軍局的責任已向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汪精衛直接報告。

在此事發生期間，鮑羅廷已暫時回俄。蘇俄顧問團由主任季山嘉(Kissanga，亦即庫比雪夫 Kuybyshev)負責，此人強烈的反對北伐。大概此時蘇俄認為中共之組織尚未成熟，不願見到蔣及黃埔之力量繼續擴充。黃埔的經費被裁減，第二師的經費增多，可能由俄顧問通過汪精衛決定。第二師也轄蔣之第一軍。蔣獲得的消息，則是師長王懋功被勸誘倒蔣，成功之後軍委會預備將第三師及第二十師編為第七軍，軍長由王懋功升任。所以蔣介石對外申訴著：有人已預先提出「報酬我部下反叛的代價」。

十八日蔣介石原在黃埔接得密報後乘小艇秘密往廣州。他原未令中山艦駛往何處，此時聽到李之龍說及開赴黃埔出於他自己的命令，更為詫異。而再增加他懷疑的則是十九日他在廣州，中山艦

也駛還廣州，據說通宵升火，顯有異動。再根據蔣之口語，「有一同志——他的名字不能公佈」，前後問他三次今天是否還黃埔。至此蔣已決定此乃一串陰謀，這也是日後他在《蘇俄在中國》書裡提及企圖綁架他赴海參威的故事之由來。內中所述「有一同志」無乃汪精衛。

蔣決定採取行動時，立即在廣州戒嚴，奪取中山艦，拘捕李之龍和各軍黨代表多人，監視俄顧問，繳其衛隊械，並解除廣州工會之武裝。

此案最近經過蔣永敬之詳細研究。他引用大陸發現的一部資料，認為李之龍無綁架企圖。只是背後各種令人懷疑之因素確實存在。主要則是汪精衛對蔣介石態度曖昧，他存心令蔣去職，卻又不公開執行，只希望蔣因之自去。一部反蔣謠言，尙由國民黨右派製造。他們希望更離間兩人，以便由蔣出面限制俄顧問及共產黨人之活動。中山艦之來往，只偶與以上契機巧合，也有人矯傳令旨，謊報情況。

作者又認為：「這一事件的發生，不過是廣州內部緊張情勢之突破而已。換言之，即縱無中山艦事件的發生，也會有其他類似事件的爆發。」他又提出蔣介石在三月二十日採取行動之前，準備暫時退避至汕頭。以下一段也抄自南京檔案館之「蔣介石日記」，此段為現下臺灣所公佈之文件內所未有：

上午準備回汕休養。而乃對方設法陷害，必欲使我無地容身，思之怒髮衝冠。下午五時行至半途，自忖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實，氣骨安在？故決回東山，犧牲個人一切以報黨國也。否則國魂消盡矣。終夜議事，四時詣經理處，下令鎮壓中山艦陰謀，以其欲擺佈陷害我也。（一

九二六年三月十九至二十日)

《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提及此事，書中則有：

十九日上午晤汪兆銘，回寓會客。公以共產黨挑撥離間，與其買空賣空之卑劣行動，其欲陷害本黨篡奪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於此當機立斷，何以救黨？何以自救？乃決心犧牲個人，不顧一切，誓報黨國。竟夕與各幹部密議。至四時詣經理處下定變各令。公曰：「權利可以糞土，責任豈可放棄乎？生命可以犧牲，主義豈可以敝屣乎？此時再不決心，更待何時？若不殉黨何顏立世？直前奮鬥而已！」（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

這兩段文字有基本上相似之處，亦有絕對之不同。前段提及此事關鍵，尙未脫離人身衝突，後段則指出全係公眾之利害。在刻下日記原本未出現之前看來，後段似根據前段修飾而作，除非兩者均經過修訂。

蔣永敬之觀察，李之龍被拘禁後即於四月十四日開釋，「此亦顯示之龍並未犯下嚴重之罪行」。此人又隔一年餘在清黨期間，才為李濟深所捕殺。

果真如是，則蔣介石誤聽傳言，行動過激，不久已獲得真相。可是蔣終生未放棄中山艦綁架他赴海參威與汪精衛預聞之一說。抗戰期間汪精衛降日，蔣在他日記裡寫出：

回憶民國十五年彼投共賣友，不惜禍黨誤國，余以至誠待之如總理。而彼為共黨所欺，以一時之利害，而放棄公私情義，不惜與蘇共協力謀我，思誘我上中山艦運往海參威。此種非人

所爲之事，而彼竟樂於爲之，是則何怪其今日通敵圖降，以打破我抗戰計劃，使我不能成功。其不識大體，不顧國家至此，余乃復與之合作，欲使之自拔，豈不拙乎？然而要亦力求余心所安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據與汪精衛接近的人士說及，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展開之後，汪非常震怒。他曾說：「我是國府主席，又是軍事委員會主席，介石這樣舉動，事前一點也不通知我，這不是造反嗎？」又說：「我在黨有我的地位和歷史，並不是蔣介石能反對掉的！」當蔣採取各種行動時，各項紀錄全未提出對方抵抗模樣。《蔣介石先生》據蔣日記寫出：「下午五時往晤汪兆銘。」（三月二十日）「上午擬致汪緘，未成稿。自謂：『既不願以僞待友，又不能以誠罄我。故苦思難以執筆。』傍晚訪汪病，見其怒氣猶未息也。」（三月二十一日）

可是中山艦案情之內幕無法徹底澄清，其後果則顯而易見。當局勢明朗化之後，汪精衛於五月十一日離粵赴法國遊歷，至次年北伐期間寧漢分裂之際才回國。

事變之後，蔣竭力與其他軍長疏通，尤其與譚延闓和朱培德接近（他們任第二、第三兩軍軍長）。又有了張靜江和宋子文的支持。四月十六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舉行聯席會議，通過譚延闓爲政治委員會主席，蔣介石爲軍事委員會主席。六月一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任蔣爲組織部長。五日，國民政府又任蔣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下轄八個軍。二十九日，中央政治會議通過蔣爲國民政府委員。七月五日政治會議歸併於中央委員會常務會議，六日決定蔣爲主席，只在北伐期間

由張靜江代理。譚延闓與張靜江在國民黨內資深，但很少表現個人性格，所以至此蔣介石已積黨、政、軍大權於一身。

第二師及第二十師之師長，早已由他派親信劉峙與錢大鈞接充。他自己原有的第一軍軍長任務也已交卸由何應欽替代。三月二十日事件之後，他又辭退俄顧問季山嘉等十餘人，勒令之回國。並且要求中國共產黨之黨員退出黃埔軍校及第一軍，另成立特別訓練班訓練這批人員。又成立國民黨與中共之聯席會議，以後中共給予他們在國民黨內跨黨的黨員之指示，先要送聯席會議備案。共產黨人在黃埔所組織之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國民黨右派與之抗衡之孫文學會，則同時取消。鮑羅廷回粵後與蔣介石會商長久，「多有爭執」，只是他也覺得在中共羽翼尚未豐滿之關頭，不能與國民黨決裂，只得妥協將就。而蔣亦不願走極端，拒絕右派人士聯英之建議。此等人士正在提出，如果國民黨政府制止香港及廣州之罷工，則英人將對政策作大幅度的調整，甚至提供借款。

有了今日歷史之縱深，我們可以倒看回去。顯而易見的，經過上述糾葛與波瀾之後，北伐成爲蔣介石惟一之出路。一九二六年之廣州，有如漢武帝對衛青所說之情況，「一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這也是上文蔣永敬提出尙有其他類是待爆發事件之由來。可是蔣介石無從預知，他之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也只是他爲中國製造一個新式高層機構的過程中，先樹立初步之間架。即是他終身之「攻堅致強」和「蹈瑕抵隙」，也仍不過粗率的掙扎出來一個勉強能獨立自主之門面。以中國幅員之大，需要改革程度之深，如要改造低層，勢必引用不同的政治思想，發動不同的群眾運動。蔣介石因藉著中山艦案件，顯示著兩種工作尙待分割。此種待分割之性格，終因他所主持之「清黨」，於次年構成事實。

過去有不少的歷史家曾用道德之名義，對此數事提出指摘。因為當事人既是同類相殘，而且又慘酷少恩，作史者也不免在紙筆之間盡其誅伐之能事。只是這樣的處置歷史，純以歷史爲人身經驗內之產物。而實際上此數事之發展，多有非人身經驗之因素(impersonal factors)作主。我們只要在蔣介石的日記裡看到他在一九二五年下半年至一九二六年上半年之徘徊掙扎，便可以想見在此種因素支配之下，他自身處境之艱難。



這一年也是蔣介石取得政權，開始將他的地位整頓鞏固的一年。在這一年之前，他態度光明磊落，有話即說，也不較後果，如果與同事意見不合，他也毫不戀棧，說得合則留不合則去，可能立即回浙家居。即對孫總理，他也無忌憚。有如他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致廖仲愷的長信、提及：

以孫先生之事業言之，其精神上歷史上早已成功。至於事實上時代上欲求成功，其責任在吾輩而非孫先生一人之事也。

這在眾人都把孫中山捧爲偶像時，他獨自倡言，有等於說及至此孫中山僅有虛名，並無實際之功業。他既能以此見諸言辭，也膽敢將之出於紙墨。而且他在同信內責備孫科，責備鄒魯，甚至責備廖仲愷本人，也都說得慷慨淋漓，不留分寸。至於他與許崇智之積不相得，更是毫無掩飾。這種態度已不復見於中山艦事件之後。

以後他指責汪精衛，即欲吞不吐。所謂「既不願以僞待友，又不能以誠罄我」，有等於說如不扯

謊，全部存真，即可能對他本身不利。

《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尚且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日程有下列之記載：「公曰：『軍隊不出動則已，如一出動，即不能事事拘束，難保無自由及不規則之形態，以後戒之！』」又曰：『掾屬乏才，實無改造一切能力，孤苦伶仃，誰與爲助？言之痛心！』又曰：『今日方知孤臣孽子操心之危，處境之苦。若非親歷其境者，決非想像所能及其萬一也！』」

如此可見得尚有難言之隱者已是蔣介石自己，而不僅爲對方。這一段也承認發動兵變總是過猶不及，他的行動已逾越他本人心目中認爲適當之尺度。然則兵變既有如是事實上之成功，爲甚麼他又在埋怨部下屬僚，而尤其是文職人員能力之薄弱？是他們沒有在各種文件上把他的行動解釋得更圓通合理？或是他們沒有把指令寫得剴切，使事變更貫徹其目標？除非有更實際之證據發現，我們無法全憑自己的想像力替一切問題找到解答。

只是當中之一端則表現得非常明顯：蔣介石自稱孤苦伶仃，又把自己比擬爲孤臣孽子，則表示這次兵變，他有參與之幹部，卻無身分相埒之同謀。這也與他在事後大權獨攬之情景吻合。可是他始終沒有以獲得名位爲榮；反而深切的感到一切經過情非得已。如果我們把蔣介石所目擊身受全般托出，事實上已無從否定他之申敘爲真。

讀者此時務必想及迄至一九二五年年底，蔣介石仍是經常與黃埔（一九二六年後稱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師生接觸。他一向出入戰場，也親對教導團士兵訓話。在很多場合中，他一再鼓吹革命軍人抱必死之決心。有時親勸士兵之參加敢死隊者將獎金寄匯回家。在多次訓話中，他提到歷次戰役陣亡者姓名。在《軍校第三期同學錄》的序裡他寫出：「而驅我同志就死難者中正也。」一九二六年一月

十三日他向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的「改良士兵經濟生活案」內有下開文句：「當兵者處處皆有死機，非爲求生，豈爲求死？其所以捨生而求死者，亦即由死而求生也。」更有一次他在日記裡寫出：「觸目非部下棺材，即同志苦狀，焉得不爲之心摧？」（一九二六年二月五日）所以在種種情形之下他對部下學生和所屬將士，或死或生，不能全無責任感。

並且他不可能忘記黃埔師生在廣州西堤口遊行示威，抗議五卅慘案，又被英軍從沙面以機關鎗掃射之沉痛。他也不能放却在紅湖戰場不得不將後退之部屬施以連坐法處死刑之淒慘心情。這一切必與他所說孤臣孽子之境遇有關。所以蔣介石縱參加一九二六年春季廣州之權力鬥爭，他實有他超過本人身關係之利害的動機在：他的宗旨必須貫徹。

古今中外之言革命者自武則天至列寧，有一段共通的理解：他們的生命可放棄，名譽可受毀折，個人道德可有虧損，但是功業必須完成。自一九二六年年初，蔣介石已進入這樣一個公眾道德與私人道德互相衝突的境界。如在西方，此事已無庸置疑。四百年前馬基維利(Machiavelli)早已明白宣告。注重前者，忽視後者，「因爲不做壞事，甚難救護國家」。馬所著書至今尙爲很多美國大學學生所必讀。

刻下我人無蔣介石涉獵於馬基維利之著作的證據。只是自一九二五年的冬天，他已閱讀到好幾本不平常的書籍，包括《政治社會史》、《經濟思想史》、《列寧叢書第五種》、《泰戈爾傳》、《法國革命史》、《俄國革命史》與《革命心理》（原文未列入編著者姓名、出版地點。又看來此等書籍似有人推薦）。迄至次年北伐開始，蔣之日記不時顯現出受有諸書之影響。有如下列各節：

今而知革命心理皆由神秘勢力與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實極微弱條件。（一九二六年三月三日）

政治生活全係權謀，至於道義則不可復問矣。（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恐怖與憎惡二者乃為暴動之動力。感情與神秘之勢力在革命心理學中佔重要地位，而宗教式的信仰亦為革命心理惟一之要素耳。順應時勢，迎合衆心，為革命領袖惟一之要件。吾何能之？（一九二六年三月五日）

雖然他說到「吾何能之」，仍表現他已相信所說為至理，不然他不可能將乖妄之說抄入日記而不批判。他在公眾談話之中已將他自己三月二十日所臨經驗與法國大革命相提並論，有如前述。他的日記裡尚有以下一則：「俄國革命之方法非其新發明，十有八九皆取法於法國，其經驗實可寶貴。」（一九二六年六月九日）

法國經驗有何值得珍視之處？舊體制崩潰之後，新體制之高層機構實由丹敦而產生。他所創立之公眾安全委員會總攬內政外交，又有任命將官之權。但是羅伯斯卑爾將此主政較溫和之丹敦送上斷頭臺，又將更激進之赫伯亦送上斷頭台。最後羅伯斯卑爾本人亦被送上斷頭台。可是公眾安全委員會之大權並未因之而中斷。此項權力經過熱天反動及五人執政期間，曾由巴拉及西野掌握；他們以之交付與拿破侖。拿破侖更發動並推廣對外戰爭，因此將一部問題外界化（externalize the problem）才算將大革命結束。

蔣介石非拿破侖，汪精衛當然更非羅伯斯卑爾，以上程序只能相對的比較。但是蔣氏似已體會

革命過程中有非人身因素所主，有如政權由暴力製造，暴力又靠恐怖及憎惡支持，當中之問題尙可外界化等。

然則蔣介石亦非列寧。即使他徹底瞭解上述之原則，將之全部付諸實施，他仍有「吾何能之」的感慨。這一方面固然由於他本人過於容易感情激動（他的日記裡常有「熱淚盈眶」的記述），一方面又因他自幼承受傳統人本主義（humanism）之教育，習慣上不易擺脫忠恕之觀念而隨即揭發「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之立場。而尤以國民黨名義上仍有五十萬黨員，雖則廣州已習慣於軍政府之管制，他之行動無論是否自衛，仍須通過各機構才能合法。所以他在取得領導權之前，經過一段長期之踟躕。

他心緒不寧的狀態開始於一九二五年之下半年。例如廖仲愷被刺前五日，《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提及：「公以近日氣暴，思讀性理書以養之。」（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五日）解決許崇智問題之後又有：「公起床謂朝旭初升，雲呈五色，頓覺神志一軒。又謂：『邇多憤氣，幾以國人萎靡不振，皆爲可殺。戒之戒之！』」（一九二五年十月七日）

及至三月二十日處理中山艦事件之前後，其衷心矛盾更逾常時。從現有資料看來，此可能爲蔣畢生所未有。例如：「悶坐愁城，不如意事連續而至，所謂屋倒適逢連夜雨也。」（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八日）「政治生活誠非人所過耳。處境若此，萬萬想不到也。道德云乎哉？感情云乎哉？」（二月二十二日）「是夜不能安眠，自謂憂患抑鬱，莫甚於此者。」（二月二十五日）「是日神志稍寧，夜始安寐，忽又發生一件不測事無法解決。自謂最後決心，只有強制執行，否則爲害於黨國，不可名狀也。」

（二月二十八日）

即是他之接受法國革命之教訓，也並不是前後一致，無所猶豫。中山艦事件前約二周，他曾留下如是一段之紀錄：「儘日在校看《革命心理》下卷。因嘆法國甲古班黨以其信仰之強固嫉妬與殘暴專橫造成勢力，故不可恃耳。」（三月四日）

愈接近三月十八日，他的心情愈至低潮。有如：「單槍匹馬，前虎後狼，孤孽顛危，此吾今日之處境也。總理與諸先烈在天有靈，必憐而呵護之，不使我陷於絕地乎？」（三月五日）此後《蔣介石先生》書中，再以第三人身記出：「公爲進退問題扼腕終日，夜不成眠。」（三月十一日）然後又摘抄日記：「近來所受苦痛至不能說不忍說。且非夢想所能及者。是何異佛入地獄耶！」（三月十七日）

及至打擊汪精衛成功，他的行動取得合法根據，各種職位在其掌握，而限制俄顧問及在國民黨內之中共黨員也依他的方針辦理後，蔣介石顯然已增強其本身之自信，他之態度，也趨強硬。從此中國歷史與他的傳記同時展開新的一頁。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他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名義發出北伐軍之動員令。同日他記在日記：「國人無心肝，所部無血性，不自求進步，而一般萎靡若此，若非濟之以猛與嚴，何能復興民族，完成革命？惟雷霆霹靂之威，足以消散陰霾耳。」

即在處置中山艦事件後，軍校教育長鄧演達曾質問蔣，謂其行動近於反革命。蔣即答覆：「如他人爲之即爲反革命，以總理與余爲之，則無論何人，應認爲革命應取之態度。」（四月二日）至此他已看穿，完成中國之革命並非立即製造出來一種理想上完美、合理、合法之體制，首先應在樹立威權。所以有些人士堅持蔣介石亦尙未脫離軍閥色彩。即兩年後美軍史迪威中校在美軍於天津發行的報紙《哨兵》上作文，雖然說及蔣介石可能將中國整頓得好，仍稱之爲「一派系之頭腦」。

從文字上的證據看來，蔣介石之反共起先無意識形態的成份在。他最初尚無意於反共。北伐之前，他仇恨英國，對美國不滿，仍希望在聯俄容共的政策下找到出路。以後他對中共的嫉視乃由實踐的經驗得來。

他最初採取那樣的立場，出於好幾個原因。一九二〇年間的初期，一般人都以為共產主義無乃是一種崇高的理想，只適用於工業先進的國家，很少人會將日後在國際間製造各種陰謀，以及在生產落後的國家領導農民暴動的姿態，比擬於共產黨人。蔣介石於一九二三年赴俄考察，固然看出蘇聯若干缺點，但是在紀錄裡也提及他們的各種長處。（蘇聯的名辭使用於一九二二年，可是中國人仍稱之為俄國。）他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致廖仲愷書，曾指出：「中國共產黨員在俄者，但罵他人為美奴、英奴與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為一俄奴矣。」但是遲至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九日，他仍讓蔣經國往莫斯科入孫文大學。蔣介石是現實主義者，他認為主義與事實是兩件事。對中國國民黨而言，他早就認為，如果只推行主義以求獲得政權，需十年二十年。此見解早於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覆廖仲愷書中即敘述得明白。再則在他作為中國領導人之前，缺乏現實條件之拘束，蔣介石之政治思想實不如一般人想像之落後保守。他曾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七日看過一本題為《軍隊之根本問題》的小冊子後，寫下「全民武裝與官長公舉」之方案。倘使此為原作者之意見，則他並未予以指斥反駁。又在北伐軍業已發動之後，他可能因接到留俄黃埔第一期學生鄧文儀關於蘇聯土地國有之報告的影響，也曾親自考慮到中國的土地問題（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甚至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他在中央政治學校（在南京時代，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又析分為軍官學校及政治學校）演講，也仍提及「整理土

地是我們國計民生一個生死關鍵」。此時他已奠都於南京四年，而且即將對江西蘇維埃區發動第四次圍剿矣。

在廣州期間，共產黨的問題給他兩重困難：一是因為聯俄容共政策，他不能脫離俄顧問之羈絆（孫總理曾說：「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而且對各種問題，動輒要蔣詢問「鮑顧問」意見）。俄人又經常給蔣在統御經理上發生問題，使他無獨立自主之感。二是中共黨員一入國民黨之任何組織，即使國民黨內產生左右兩派之爭併，使他對組織系統無法掌握。

以上敘述中山艦案件時已提及俄顧問問題。至於中共在軍中帶著分裂性的影響，雖六十年後黃埔第一期學生徐向前猶可作見證。他曾寫下：「黃埔軍校初期所以有這樣的革命性、進步性，是與許多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努力奮鬥分不開的。」

左右派之爭併因孫總理逝世而更尖銳化。不久《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即有以下的記載：「孫文學會與青年軍人聯合會左右對峙，公甚憂之。」（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九日）他在汕頭市總商會的歡迎會上致辭也不得不分辯國民黨非共產黨，國民革命軍非共產黨軍。他的演講辭有下一段：

怎樣說中國不適宜實行共產呢？因為中國的商家富翁的資產最多的不過幾百萬，至於過千萬的實在很少。如果與歐洲英美的大資本家比較起來，算不得是一個資本家。至於中等產業只能養活他自己，更說不上是資本家，中國現在是這樣情形。怎樣能夠說共產呢？共產是實行於大資本的國家如英美等國。因為大資本家漸漸發生起來，不止是工農受資本家的壓迫，就是小資本家也要被壓迫不能生活。大資本家為害如此，所以激成一般主張共產。……（一九二五年

十一月十六日)

這種見解，反映著本世紀初期一般開明的中國人之看法。蔣介石提及此處時也表彰著他是孫總理的忠實信徒。孫在《三民主義》裡說起，中國只有「大貧」與「小貧」。所以民生主義是「共將來的產」而不是「共現在的產」。針對著內外的需要，除了平均地權，中國固然在某些方面要「節制私人資本」，可是在另些方面仍要「扶植私人資本」。概括起來，這是一種實事求是，帶妥協性的辦法，企圖實施一種極為溫和的社會主義。其精義在建設，也仍有一個創造新體系之大輪廓在後。

從日後的發展看來，這種主張，亦有它不合實際的地方。中國的問題固然是整個體制之全部落伍。在經濟較前進的部門，如新式的工商業和交通業等，已是百廢待舉，扶植猶不及，遑言節制。而落後之部門如農村中，卻已面臨人口過剩土地不敷分配，貧農在高利貸壓迫下達到了無從苟延殘喘之盡頭。最後「如不輸血只有開刀」的情形已不是依據世界標準較量貧富的問題；而是中國本身生死存亡的問題，有如韓丁(William Hinton)在《翻身》一書內所描寫。

然則這種最後關頭之景況，也待八年抗戰，再加四年內戰，把一切可供救濟的資源耗費殆盡，才如是促成，整個暴露。

從本世紀最初的四分之一年代看來，國民黨容共之目的無非聯俄。中共內之前進人士不妨懷抱著他們大同世界的理想，既已跨黨宣誓而入國民黨，則首先必須承擔國民革命之使命，這有等於不要求回教徒放棄伊斯蘭而受洗之為基督徒，於是要求保持教堂內之和諧也就費盡氣力。可是蔣介石繼承著孫總理之政策，亦無從異議，因為他取得國民黨領導人之地位，一方面固出於黃埔建軍之成就，

一方面也因他自稱爲總理之遺命的執行人。況且此刻蘇俄之援助仍不可少（迄至北伐前夕，國民革命軍每師只有步鎗三千枝），更不容他自作主張。

所以不論他內心觀感如何，孫總理逝世之一年內，他仍在呼籲兩黨之和衷共濟。他在《軍校第三期同學錄》之序，提及先期黃埔師生死難之衆，有下列一段：

總理逝矣先烈亡矣，而其神其靈不昧不爽者，惟在其所遺本校後死而未亡一線之命脈耳。吾人之既足告慰先烈者，亦惟此而已。此一線命脈所遺者何是？乃總理一脈相傳之國民黨內共產非共產二者凝集而成之血統也。吾人至今悔不問明當時先烈之死者爲共產乎？抑爲非共產而三民乎？中正茲預言以答後吾死者之問曰：「吾敢率國民黨內共產非共產諸同志集合於國民黨青天白日旗下，以實行我總理革命主義而死也。吾願與黨內死者諸同志，同穴安眠於地下。吾願本黨後死諸同志不分畛域，不生裂痕，始終生死，本我親愛精誠之校訓，團結精神，繼續我先死者之事業以完成我國民革命之責任，直接以實行我總理三民主義，即間接以實行國際之共產主義也。三民主義之成功與共產主義之發展，實相爲用而不相悖者也。吾亦不望後死者入彼出此，亦不願其較長爭勝，冰炭水火，以斬斷我輩已死者之命脈。不然生者之是否安心，姑置不問，而我輩死者誠爲枉死之冤魂，而不能瞑目於地下矣」。（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這一段文字，可能給爲他寫傳記的人帶來無限之困難（一九八四年北京黃埔同學會即將此序全長三千七百餘字重印於《黃埔軍校建校六十週年紀念冊》）。在此序內蔣介石仍認爲他自己「是陣亡將士之領導人，所以也可以作爲他們之發言人。他強調爲三民主義而死，即爲共產主義而死。如果生者仍以主義相

爭執，則死者爲冤死。如果他不是衷心誠意如是著想，即已冒犯西人所謂「褻瀆聖明」(sacrilege)之罪愆。可是要是此段文字確實表示他的心情，那又何至於三個月後，中山艦事件發生時，他又留下了一段「公以共產黨挑撥離間，與其買空賣空之卑劣行動，其欲陷害本黨，篡奪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的紀錄（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詳上中山艦事件）？更有令人難能置信者，則半個世紀之後《大事長編》又將此序在書內排出，卻將全文大幅修訂，刪去文句達一千七百字，包括以上全段及他箴勸國共合作之各句（詳本書二〇頁）。

經過一段思量，尤其將蔣之宗教思想、哲學思想與政治思想一體投入計算之後，我覺得除非有其他確鑿不移之證據發現，足以使吾人另作論斷，我們無從懷疑蔣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作此序時有意欺騙。他甚至可能爲不真，而不能爲不誠。這也就是說，他因著強迫自己從積極方面想去之習慣，可能口出大言，過度樂觀，超過他冷靜頭腦之判斷。本來他大可以用黃埔校長之身分告誡軍校師生大敵當前，應當放棄黨派之爭，即已完成了他在同學錄上作序之任務。而他一定要搬出總理與先烈，先死者與未死者，又引用「命脈」與「血統」半實際半抽象之名辭，更將「其神其靈，不昧不爽」與「枉死之冤魂」，及「不能瞑目於地下」字句加入，表示他已罄本身之精神與玄學上所能掌握之概念，發出宏願，願見國民革命在國共合作之條件下完成（讀者注意序內上段「願」字疊見）。此項思潮，經他筆下渲染，立即化爲事實。他自己既能發此願，也能立即要求黃埔師生視之爲先烈遺囑，遵照施行。

蔣介石一生確有數度大幅度轉向之情事。如上文所提及從舊社會家庭習慣蛻變而爲新時代人物，又放棄游俠浪人的姿態而爲革命志士。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七日在廣州接見美國新聞記者時曾提

及「基督教之虛偽」，可是在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五日卻受浸禮爲基督徒；一般人公認此係與宋家聯姻之影響，然則其入教去與宋美齡結婚已近三年。所以此等轉向一經伊始則終生再未渝變，無投機取巧之形貌，況且他在爲第三期同學錄作序時如果能預想三個月後即須修訂此呼籲國共合作之立場，再一年之後更須整個的採取相反之宗旨，當初也斷不會將此宗旨與立場以重複而帶宗教性格之辭語斬釘截鐵的寫出。更只見得其病在估計錯誤，而非有意矇騙。

事實上，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蔣之至友戴季陶曾來長緘「痛詆共產黨」。十二月三日又有軍校學生十餘人會同第一師政治部主任前來訴狀，報告「共產勢張，四周都非同志」。當時蔣介石如作若何區處，其行動並不見於現已公佈之日記。只有十二月二日記事內稱：

公聞本黨搗亂分子在北京希圖標異，現因國民軍勃興，不能活動，行將無形取消，悲懼交深。

所謂「搗亂分子」，無非國民黨之「西山派」。他們在北京首先揭發反共之旗幟。蔣介石認爲他們在「希圖標異」。然則其被馮玉祥之國民軍監視，不能立足，卻又「憂懼」。但是他曾未對西山派表示同情。除以軍校校長身分在黃埔第三期同學錄堅持國共合作之外，他尙且以東征軍總指揮之名義發表〈忠告海內外各黨部同志書〉，指斥西山派之行動「無一不悖於本黨之紀律與總理之意旨」。他更著重的說：「中國革命不成，列強敢於侮我，皆國民勇於私鬥，黨員徒爭意氣，團體慣於破裂。」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當一九二五年蔣介石草擬這些文字時，他已有替新中國創造一個高層機構之趨向，其首部工作

便在使國家獨立自主。在這種大前提之下，衆志成城乃必要之要求。曾國藩曾說：「不爲聖賢，便爲禽獸。」蔣則仿倣著他的語氣寫出：「不爲革命，便爲叛徒。」有了這樣的決心，他已準備視違反此基本原則之人物爲大逆不道。他決未想到以中國幅員之大，內部因素之複雜，即一個形貌上的大統一之局面亦須由內憂外患之鍛鍊而成。此非一個單純的道德問題，而是內中牽扯上無數技術問題。然則批評他的人指斥他迷信武力，不在基層解決問題，不爭取群眾，亦屬偏見。以後事實證明：此兩種工作分屬兩種群眾運動。蔣介石之方案爲先造成一個高層機構，縱缺乏適當之法制之支持，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卻仍不可少。



北伐與清黨在事實上不可分割。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北伐軍下動員令，至十月十日攻佔武昌，十一月九日攻佔南昌，至此吳佩孚與孫傳芳之主力均被解決。以後肅清江浙地區長江三角洲一帶軍閥殘部不過時間上事，因對方組織已被擊潰，其士氣已渙散，而且若干將領如未投誠則在準備接洽改變陣容也。一九二七年三月國民革命軍進入京滬地區，而四月十二日即有上海清黨事件之展開。

至今敘述此事之次級資料當中之最帶普及性者，仍爲艾薩克斯的《中國革命之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原作發表於一九三八年，改正本行於一九五二年)。據他的敘述，蔣介石於三月杪抵達上海，可是當他尚在長江中游時，上海之青幫領袖黃金榮即前往軍前接見，貢獻以幫會力量打擊工會組織之陰謀。蔣即派親信楊虎著手計劃。蔣到滬之後，首由紳商供給借款三百萬元，數日之後又收七百萬元。各紳商更承應資助一千五百萬，以蔣打擊工會及共產黨人爲條件；同時由黃金榮與

杜月笙組織與左派敵對之右派工會。

四月十二日之事變雖箭在弦上，但各方仍諱莫如深。甚至代表第三國際之共產黨人亦在掩飾此嚴重之態勢。所以當時上海工人組織武裝糾察隊，在敵後解決孫傳芳軍，歡迎國民革命軍之來臨，至此全被出賣。四月十二日之行動由蔣軍司令部於凌晨四時以軍號發動，由租界內之幫會分子依計劃與中國地區內之白崇禧所屬部協同攻擊各工會組織；在閘北一部尚利用欺騙伎倆。當幫派分子與湖州公會接觸開火之際，有北伐軍上前聲稱奉命解決青幫武裝，承望工會合作。工會人物信以為真，當其警戒鬆懈之際，青幫分子三百餘人擁入工會之內將所有人員逮捕，包括周恩來在內。只有商務印書館之一部未為此伎倆所乘，其抗拒之戰爭支續數小時，迄至正午工人糾察隊或戰死或彈盡援絕，建築物才被佔領。據上海工部局估計，工人在四月十二日死者近四百人（《紐約時報》稱死者在一百人以上）。艾薩克斯更引用《字林西報》稱：「士兵將共產黨人解除武裝之後的行動無從知曉，因中國官方不會作廣告將之宣揚也。」

四月十二日之事變及以後清黨之行動誠有其黑暗之一面，無人能為之洗刷。可是艾氏所著書卻漏脫了當中幾個重要之環節。《中國革命之悲劇》書內有長篇大論表示著者思想前進，對中國群眾同情。然則其所謂群眾全憑血氣，無組織無步驟，一經投機分子利用，甚可能產生不良後果，有如查登(Donald A. Jardon)教授所述，造成與義和團相似之局面。一九二七年初當北伐軍進入長江中游之際，即有此等群眾在漢口與九江與英人衝突。此兩處事件均未產生重要之災害，經過外長陳友仁之交涉，中國尚能收回兩地租界。可是自此之後，外強已決定不再讓步。三月二十四日北伐軍入南京，軍民攻擊外人，即受到江中英美軍艦轟擊下關報復。此時英國又已增派巡洋艦一整隊、陸軍一

師，只因不願立即激動中國群眾，暫時留置於香港。美國亦由國務卿凱洛格在四月一日發表談話，申明無意在上海撤僑，今後尙當竭力保護當地美國軍民之生命財產，隨即有巡洋艦「理芝門」(Richmond)及「瑪堡赫德」(Marblehead)之離美來華。日本縱否認有對華動員之準備，但其軍事行動及於大連與青島，已昭然若揭。

與秘密結社之幫會來往爲國民黨之傳統習慣，始自滿清年間，至軍閥割據時期亦未放棄。青幫領袖黃金榮、杜月笙等在上海中外界具有其特殊之社會地位，至少明暗身分各半，並未如美國新聞界及作家之所指摘，全爲犯罪圈內人物。凡此並非吾人有意提倡應當如此，而係數十年前確曾如此。大概租界內外人之組織系統無法控制中國社會，而有賴於青幫，是以彼等亦具有兩棲性格。蔣介石與其領導人接觸，亦係從未隱瞞之事實。總之革命家爲改造社會之工具，但以中國問題之大、程度之深，此項改造工作務須走上縱橫曲折之途徑，牽連數十載；即任何革命家亦無從立即交出一個新社會。如果歷史家不顧及此中情節，立即用道德名義褒貶，只會阻塞從技術角度之檢討。

至於北伐軍向剛接收之城市或尙待解放之城市勸募墊借銀餉，亦數見不鮮。有如武昌城尙未攻克之際，蔣介石即以總司令名義向湖北總商會接洽。九月十二日又電告宋子文（時任財政部長駐廣州）擬向漢口商會籌借二百萬元。十二月二十七日又批准唐生智向宜昌商會暫借三十萬元。此亦當日財政稅收尙未組織就緒無可避免的辦法。蔣在十二月三十一日與宋子文電內稱：「各軍鬧餉，皆係伙食不能發足，欠餉又未發清。兄將上月與本月舊欠伙食概不承認發給，以致各軍長爲難。」而宋亦有其本身爲難之處。再追溯回去，則因中國傳統政府只著重維持「尊卑、男女、長幼」之社會秩序，無視於現代組織，其貽誤至少已六百年，倉卒之中即奪得政權，亦不能立即另闢途徑。從以後發展

看來，必須經過抗戰階段，取得獨立自主之立場，才談得上全面改造。

如果將以上客觀之背景全部置之度外，只說「中國的老百姓好，政府裡的人不好」，亦等於繼續此樣之貽誤。看來在北伐之前，即蔣介石本人亦未曾預睹他本身將面臨之困難。他在一九二六年除夕書於南昌軍中：

今日已是十五年最後一天，範圍擴大責任加重。黨務糾紛說不出記不下的痛苦日多一日，所見聞之革命怪現狀至堪悲愕。大海茫茫，何時能達彼岸？總理期我事業，父母生我意義，果爲何如？每一念及，惟有莫怠莫荒，不屈不撓，奮鬥力前，毋負黨國，如是而已矣。



在私人寫下的文字中，蔣介石曾未自恃爲「強人」。他縱未自承良心有虧，但是他也並未堅持自身所作事，全部合於世俗之倫理與道德。《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八日有下列一段的記載：

晚後唏然曰：「三年來酸辛淚時自暗吞。歷史無事實；事實決不能記載也。知我者其惟鬼神乎？」

十一月八日去上海之清黨行動尙約有半年，記述上段心情時，蔣之軍事的成功已近於一種澄清階段。當國民革命軍由廣東向湖南推進時以唐生智爲先鋒，長沙可謂不攻而克，以後攻取鐵道線上

汀泗橋及賀勝橋兩處險要，雙方死傷均多，然其解決亦迅速。只有進兵至武昌城下時，不意吳佩孚部隊決心堅守，北伐軍又缺乏攻城礮，以致戰局膠著達四十天。蔣雖決心取得此重鎮，九月四日至五日攻擊準備時尙且揚言「雖至全軍覆沒，積屍纍邱，亦非所恤」；一到死傷狼藉，而對方堅壁如故，也只能下令暫停，而不久江西之軍事行動亦陷逆境。

右翼在江西之行動原採取「攻勢防禦」，預計孫傳芳不過指使福建之周蔭人威脅贛南，不料孫集團由南京傾巢而出，於是南昌之爭奪戰亦進入拉鋸狀態。北伐軍兩度進入又兩次被逐出，攻者處於外線作戰之態勢，總因地形困難，部隊間之協同不易，曾一度陷於危殆。只有武昌攻下之後才整個的改變計劃：一方面放棄對南昌之圍攻，一方面先調集部隊，集中行動於南潯鐵路上各城市，以斷敵歸路。新戰略至十一月上旬而生效。五日佔領九江；八日南昌城內殘敵只三千餘，已接洽開城投降改編。至此北伐開始才滿四個月，國民革命軍已取得三省省會，吳佩孚與孫傳芳兩個軍閥集團已大致被擊破。蔣介石麾下對敵之殺傷鹵獲不計其數，收編對方部隊至少亦在本軍兩倍以上。既有長江中游之要鎮在握，而何應欽部自廣東東江進兵福建及浙江，又有敵後之策應，預計東南指日可定。蔣總司令叱咤風雲，業已電邀孫總理夫人、孔祥熙夫人攜其「三妹」（宋美齡）往南昌「同來一敘」，理應躊躇滿志。而他此時反留下一段須鬼神作見證之心情的紀錄，只表示他曾未左右如意，所行事大致與本心相違。

自蔣介石個人之紀錄看來，北伐而在一九二七年春佔領京滬地區，並不出自他的初衷。動員之前一年，即一九二五年七月，他所作〈軍政意見書〉尙且著重建設廣東，從基本事業做起，設立製鋼廠紡織廠，成立新型海陸空軍。其向外發展則於〈建議軍事委員會六大計劃〉中提出，應由四川

伸展至陝西「使西南與西北啣接一氣」；其顧慮為沿江沿海發展，必遭英國干預。他提出此建議時尚引用其他國家之歷史作見證：「土耳其革命不成於君士坦丁，而成於安哥拉；蘇聯革命受帝國主義列強封鎖，不建都於列寧格勒，而建都於莫斯科。」

韋慕庭教授引用俄文資料，指出北伐之戰略計劃，草自加倫（Galen，亦稱白魯傑[V. K. Blyukher]），內中述及佔領武漢之後，進取上海不難。當時蔣之觀感如何不見於其文件。只是既採取向長江一帶進軍之計劃，蔣介石即堅持做得徹底，此時倒又有加倫之反對。《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稱因孫傳芳調其精銳主力援贛，「戰略亦略有變更」（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其實此時之戰略變更方在伊始。以後之發展，尚有九十度轉向之形勢。

北伐之前夕，北洋軍閥只在多次內戰之後保持極不穩定表面上之平衡。直系孫傳芳割據京滬，其勢力及於江蘇、安徽、江西、浙江與福建，自稱「五省聯帥」。其後則有佔領山東之奉系張宗昌。華中則有直系之吳佩孚，其所轄河南與湖北境內有鞏縣及漢陽兩大兵工廠。其西北則為馮玉祥之國軍。更北則為奉系之張作霖，所轄為東北及內蒙古。楔入東北與西北之間者則為閻錫山，所轄為山西及綏遠。

北伐軍之行動最初即因軍閥爭權，彼此企圖擴充地盤，國民政府亦望從中收漁人之利。一九二六年湖南省長趙恆惕企圖財政集中，引起湘軍第四師師長唐生智叛變。唐將趙驅逐後，吳佩孚以第三師師長葉開鑫為湘軍總司令兼湖南省長，開始討唐。唐生智之轄區在湘南，與廣東毗鄰，於是向國民政府求援，廣西之李宗仁與白崇禧亦恐吳佩孚之勢力伸入湘南，才開始與廣州全面合作。此時國民政府原已將境內各部隊編為六個軍。廣西部隊加入後編為第七軍，自後又授唐生智為國民革命

軍第八軍軍長。是以用升官辦法糾結收買對方將領，爲軍閥作戰時之經常手段，至此亦爲革命軍採納。

蔣介石主持是項政策日後最爲批評者詬病，其實其權力確係來自公開授與。蔣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不久，即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爲「軍人部長」（一九二六年七月五日），有充分之人事權，及於各軍長及軍中黨代表。其所擬對付之軍閥可以牽一髮而動全身之情形，又可以自上述唐生智、趙恆惕、葉開鑫、吳佩孚及孫傳芳諸人之行動，表現無餘。所以善爲利用此種情形，可以使對方土崩瓦解；如拒而不用，則須與全國爲敵。況且唐生智之例一開，亦無從再珍惜名器。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六日蔣介石發表討吳宣言，即以傳統之「時不可再，曷興乎來」相號召，並且明白指出：「除與本軍甘心爲敵，冥頑負固者外，如有向義輸誠，倒戈來歸，不願供軍閥個人犧牲者，或同情於革命，不中帝國主義以華制華自相殘殺之毒計者，中正無不視爲同志，期共安危」，已發出了來者不拒之諾言。而遣派軍閥部隊以新任務，使之脫離原有地盤，又不得不付與津貼，因此也不能分劃收買與不收買。總之，奪取政權與推行主義改造社會不能並行。

國民革命軍於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下動員令，七月十一日蔣介石即通知唐生智已任命黔軍部隊之彭漢章與王天培爲第九軍及第十軍軍長，用以增強左翼。八月十日又任命孫傳芳部下之師長方本仁爲第十一軍軍長；隨即又任命孫部另一師長賴世璜爲第十四軍軍長。九月又以吳佩孚下轄之師長任應岐，樊鐘秀、劉佐龍分別爲第十二軍、第十三軍及第十五軍軍長。至此軍興不及三月，擁軍長銜之將領已倍增。至翌年北伐軍進入京滬地區時，已擁有四十個軍之名號；至一九二八年二月，號稱有五十個軍。雖說內中亦有各軍如在四川者，只佔名號，並未實際參預北伐。

如是氾濫之擴充，勢必影響到經理與士氣。但是當初之八個軍雖號稱十萬人，加倫將軍十一月提出之報告卻謂實在兵力不過五萬一千人，似專指戰鬥兵員。《大事長編》可能根據蔣日記或近身文件記載，稱「此時國民革命軍雖擁有八個軍十萬人之師，然隨征長江者，實不過五萬」（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而其在江西一役，即死傷一萬五千人（韋慕庭教授解釋，此係自廣東出發之部隊之死傷，不包括反正部隊）。但北伐軍亦俘虜孫傳芳部下四萬人。所以蔣介石拉攏對方將領，吸收其兵員，事在必然，否則無從與吳佩孚及孫傳芳兩個集團同時作戰，而尚能席捲長江以南也。

郭廷以稱，北伐之前在廣州籌備軍費五百萬元，供兩個月用，似根據蔣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呈黨中央及國民政府之文件所提出。但如以編制十萬人，每兵每月薪餉最低限度十元計，而軍官薪餉及其他經理裝備補充又二倍計，其預算已極窄狹或不敷。況且軍興伊始，兵力又立即擴充一倍，是以蔣立即感到財政困難。八月十三日在長沙，蔣介石即請國民政府准許其在軍中印行「中央銀行兌換券」五百萬元，以新佔領區域之收入為擔保，由現在廣州之中央銀行承認將來兌現。以後看來此計劃雖付諸實施，則已產生無限周折。而廣州應付之「五省流通券」及「公債券」，又常緩到；所付「毫洋」鈔票又與湖北湖南用「大元」區域之情形更有抵觸。再有通貨貶值，是以蔣經常為此等事焦慮。

在旁人看來，則蔣介石以總司令名義收買部隊，自發津貼，尚且自向軍隊行經各處之商民「商借」，難能避免破壞財政統一之指摘。其與宋子文之緘電，亦可看出兩方時有爭執。（日後宋子文參加武漢政府，失望之餘才全力支持蔣介石。）

而站在蔣之立場看，則戰場上之機緣稍縱即逝，部隊欠餉則將士嘩變。此時北伐軍不僅與對方

兵戎相見，而財政上之鬥爭尤屬重要，如國民革命軍與軍閥均在爭取尙存觀望心態之海軍，事關生死。蔣介石在九月三十日曾於南昌前線電譚延闓（國民政府主席）及宋子文稱：「今日總部（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只存萬元，而前方催發伙食，急如星火，窘迫至此，無以爲計，中正惟有引咎自裁，以謝將士而已，如何盼覆。」

蔣以統帥而用自殺要挾，亦可見得問題之嚴重。

當日蔣在軍中重要文電，大致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而保存完好。內中最重要之特點爲人身關係濃厚。例如南昌攻城戰之際，第六軍曾一度劃歸第三軍軍長指揮。如照其他各國習慣，此種臨時派遣，以一紙命令行之即可。而蔣致程潛之電報稱「程軍長頌雲兄」。文稱：「右翼總指揮前令朱軍長（第三軍軍長朱培德）兼任，以彼時第六軍（即程軍）歸中央軍總預備隊也。今貴軍加入右翼作戰，爲求統一指揮起見，在弟未入贛以前，歸益之兄指揮，屈尊請諒之。」（一九二六年九月二日）因之軍隊區分不能脫離私人交誼氣息。

（軍中公文用「字」相稱之習慣沿用至抗戰之後。一九四二年我在重慶衛戍總部任參謀時，即必須牢記總司令劉峙爲「經扶」，李宗仁爲「德鄰」，薛岳爲「伯陵」，何應欽爲「敬之」，戴笠爲「雨農」。一九四七年國軍仿用美軍公文格式，此習慣方被放棄。）

以人身關係作爲統御之張本，勢必在部下之間分出親疏。由廣東出發時之八個軍內，只有第一軍可算爲蔣之「主軍」。蔣最初即將之分割使用：第二十師錢大鈞留守廣州；軍長何應欽率第三及第十四師防衛潮州汕頭，日後乘機向福建浙江進展；蔣親率王柏齡之第一師及劉峙之第二師北上。江西戰局展開後即以第一師配屬程潛之第六軍，第二師則參加武昌之攻城戰。至此每一戰場及後方重

地，均有主帥之親軍。蔣介石曾在軍中日記裡寫出：「現局並未大壞，除學生不計外，足有五師之衆。如能發憤圖強，何事不可爲？」（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三日）所謂五師之衆即上述第一軍建制內之五個師，其將領係蔣親派，均屬前黃埔教職員，當中幹部亦多軍校畢業生及原教導團幹部。此所以總司令認爲可以「共生死」者。以後蔣又電告何應欽不能令第一及第二師歸還第一軍建制之理由：「本擬派第一、第二兩師入閩，以對浙問題應速決，而身邊亦不可無主軍，故暫難派遣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八日）

可是身爲總司令之主軍，並非必然的一種特權，因爲蔣介石經常用以擔任最艱難之任務，蓋非如此即不易策動其他之部隊也。前述武昌攻城不下時，他曾親對劉峙說及：「爾等如再不爭氣，何以立世見人？」他之所謂「雖至全軍覆沒，積屍纍邱，亦非所恤」，亦係在此時提出（一九二六年九月四日），即此亦可窺見：除非先將壓力加於親信將士，他甚難駕馭群下。以後第一師在江西作戰又不利，他留下的紀錄稱：「此次始謀不臧，兩師分屬擔任最艱危之任務，使我忠勇將士死亡過半，犧牲程度如此之大，而反受人譏刺，中正之罪尙能自贖乎？」（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五日）可是王柏齡終因南昌之役撤職，其部下一團長鎗斃。

所謂譏刺，則表示軍中之公衆意見，縱用非正式的形式提出，仍足以左右視聽，影響統帥之決心。至此也可以看出，傳統的「愛面子」，背後確有實際上之要求，非僅裝飾求門面。即在武昌攻城戰中，劉峙所屬第四團一度在敵方射程之內通過前線，爲吳佩孚之礮兵轟擊，死傷十餘人。蔣之日記提及此事「爲他軍輕侮，憤惜殊甚」（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是以戰術上之錯誤，釀成災害，首先即須顧及「非嫡系」部隊之指摘，其羞辱超過實際之痛惜。



一九二六年七月七日，中共中央局書記陳獨秀在《嚮導》雜誌第一六一期發表〈論國民革命軍之北伐〉一文，為蔣介石在八月二十三日閱及。文內支持廣東對軍閥之防禦戰爭，但指出刻下革命的力量還沒有膨脹向外發展的可能。國民革命軍的軍費，也無法解決。如果北伐採取攻勢行動，「若其中夾雜有投機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慾的活動，即有相當的成功，也只是軍事投機的勝利，而不是革命的勝利」（全文複印於本書六六頁）。

在當日，這抗議不是沒有相當的理由，也曾使蔣相當震怒。他曾於八月二十四日致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要求對中共中央提出交涉，因為《嚮導》係共產黨的機關報紙。

可是蔣介石三年前尚不過孫總理的偏裨顧問。在籌備黃埔時孫最初猶責成他「專心辦學而不過問軍事政治」。至此剛兩年，已統兵十萬。他當日鼓吹北伐時尚主張只用軍費兩個月，佔領武漢，「聯合孫傳芳，使之中立」（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在他閱及此文時，則已全面的收買對方將領，擴大戰事，並且不久之後即要求廣州政府續籌軍費三個月（九月十六日）。所以他即使不全為「個人權位慾的活動」，也很難避免「軍事投機」的指責。

然則我人提倡以大歷史的眼光重新檢討這些事蹟，因著視野之放寬，立論又將不同。陳獨秀寫下這段論文時墨索里尼已統治義大利，希特勒尚未登場。最為阻礙中國發展者似為英國而非日本。美國尚在提倡「恢復到正常狀態裡去」（Return to normalcy），以便歌舞昇平，保持其孤立之外交政

論國民政府之北伐

獨 秀

北伐的意義，是南方的革命勢力向北發展，討伐北洋軍閥的一種軍事行動，而不能代表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在此時北伐聲中，我們若不懂得這個意義，便會發生許多錯誤的觀念及行動。

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是各階級革命的民衆起來推翻帝國主義與軍閥以自求解放；全民族經濟解放，尤其是解除一般農工平民迫切的困苦。北伐只是討伐北洋軍閥的一種軍事行動，還說不上是和帝國主義者直接的武裝衝突。這種軍事行動，對於推翻軍閥確是一種重要方法，然亦僅僅是一種重要方法，而不是一無二的方法；在軍閥統治之下的民衆，若認北伐是推翻軍閥解放人民之唯一無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軍之到來，自己不努力進行革命工作，這便是大錯。這便和前代人民仰望弔民伐罪的王師是一樣，完全失了近代革命的意義。再論到北伐軍之本身，必須他真是革命的勢力向外發展，然後北伐才算是革命的軍事行動；若其中夾雜有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慾的活動，即有相當的成功，也只是軍事投機之勝利，而不是革命的勝利。至於因北伐增籌戰費，而搜刮及於平民，因北伐而剝奪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犧牲了革命之目的，連弔民伐罪的意義都沒有。

現在廣州國民政府之北伐是怎樣呢？在第一點，他自然還不是直接的和帝國主義者武裝衝突。在第二點，廣東以外的各省人民，確有坐待北伐軍到來之幻想。在第三點，我們敢肯定的說，現在國民政府之北伐還不是由於革命力量澎漲而向外發展，乃是因爲吳佩孚進攻湖南，國民政府不得不出兵援湖南以自衛。在第四點，國民政府之北伐戰費，應該發行軍事公債，向紳富籌募，如果因北伐而預征錢糧和抽收賭捐，向農工平民搜刮，不但當年中山先生不曾因北伐搜刮平民，即現時唐生智在湖南，軍費并不比廣東寬裕，他只發行般實公債，而未向農民誅求，國民政府對農民政策總不應該比唐生智不如。國民二軍之潰敗，對農民政策之失策乃是最重要的原因；近來國民政府對農民的態度，已經使農民懷疑，若再因北伐戰費而預征錢糧和抽收賭捐，若更進而剝奪廣東革命的民衆從護法政府以來所獲得的

些少自由，反而給予反革命的貴紳土豪貪官奸商以充分的自由，則我們在野黨應該向政府嚴重警告，必須北伐與民衆利益雙方兼顧，如此才能鞏固國民政府。

在上述情形之下，所謂革命軍事行動的北伐，現在尚未成問題；因爲在國民政府內部的政治狀況上，在整個的國民政府之實力上，在國民政府所屬軍隊之戰鬥力及革命的意識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時期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禦，怎樣的防禦吳佩孚之南伐，防禦反赤軍勢力之擾害廣東，防禦廣東內部買辦土豪官僚右派響應反赤。

帝國主義者早已定下了吳張分途討滅南北二赤的計劃，如此英吳日張分據南北，才能和緩他們當中的衝突；現在英吳對日張在北方既不能不大大讓步，則吳佩孚南下進攻廣東，無論對國民軍作戰勝敗，都必得張作霖之援助而實行。吳佩孚一回漢口，必以全力取湖南，再由湖南進攻廣西，屆時動搖不定的小軍閥如贛鄂閩周，都必然決定態度，奉吳令一致向廣東進攻；不但如此，還有香港帝國主義者封鎖於外，陳林魏邦平舊部，勾結土匪土豪官僚買辦，擾亂於內；如果竟至如此，國民政府能否支持下去，當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并不是我們神經過敏，這樣危險的局勢，實已迫在目前，絲毫不容我們忽視。

所以現時國民政府的職任，已經不是北伐而是「防禦戰爭」，廣東民衆的口號，也已經不是北伐而是「防禦戰爭」，全國民衆的口號也，已經不是響應北伐而是「擁護革命根據地廣東」！

將陷於四面圍攻的國民政府，他的領袖們，應該和衷共濟，尤其要尊重人民的自由與權利（革命軍正爲此和軍閥戰爭，也就是革命軍和軍閥不同之一點）。使人民心悅誠服的和國民政府合作，以戰勝此困難，使此困難不但不能覆滅國民政府，轉而能夠鞏固國民政府領袖及其軍隊和一切民衆的革命意志與戰鬥力，然後再聯合全國民衆革命的勢力，進而北伐，才能夠以革命的北伐力量完成國民革命。

策。史達林剛在權力鬥爭中佔優勢，尙未提及集體農場與日後之整肅。若是中國尙在因循苟且，坐待革命力量成長，並非當日世界必所不容。

只是三五年後，世界經濟不景氣傳佈全球，民主國家及極權國家界線分割分明，如中國尙未因爭取主動而保持本身立場，其情形實不堪設想。這樣看來，當日之北伐確已做到蔣介石所謂「孤注一擲」與「瞑眩瘳疾」的階段。其整個發展既非蔣介石與陳獨秀所可逆睹，我們也因此只能在事後認可其在歷史上之長期的合理性。

又，在一九二六年國民政府能在廣東坐待革命力量之成長？有了最近歷史學之展開，使我們覺悟到若非當日有決斷之行動如北伐者，中國之命運無從革新，革命力量亦斷難自然的成長。只到最近我們才深切的瞭解：中國在二十世紀的社會經濟猶受明太祖於十四世紀末以《大誥》治天下之長遠影響。在朱元璋策劃之下，土地佔有以無數之小自耕農爲主體。過去我們尙以爲佃農之被壓迫爲一切問題之淵藪，而忽略土地分割至小，基層生產者收入不足，再受比鄰近親放債收租之盤剝，才造成社會上無可改進之死結。

更須由朱元璋負責者，爲明清帝國財政與稅收之設施。簡言之，即不設中央銀櫃。戶部負責中央集權之監督而不承當各地之執行。全國以無數之稅收機關與無數之開銷機關對排（如所有之縣皆爲稅收機關。所有之千戶所有如現代軍隊之團部或營部者皆爲開銷機關）。用椿數極多而每椿數量至少之銀物側面交納收受，無中層之綜合分配，亦不受民間經濟之誘導與牽制。因著是項安排，公私財物始終無法集中，帶服務性質之事業，包括現代性格之民法無從發展，統計不能著實，具有現代性之大規模商業亦因缺乏支撐不克登場。政府受各種條件限制，也只能維持傳統衙門性格。十九世紀雖有改革，

也僅能在局部作膚淺之修正，而不及動搖其基層之體制。所以一方面人民收入低薄，一方面整個國家與社會缺乏有效之組織結構。日後毛澤東提出中國之「一窮二白」，實緣於此數百年一息相傳之體制。

軍隊雖為改革社會之工具，然其本身又為社會之產物。除非社會進展到某種程度，無法使軍隊完全脫離舊體制之形貌。蔣介石所以注重人身關係，一方面係因其缺乏總攬全局，整個的公平分配之資源；一方面亦因其所面臨之社會習慣仍是與明清近，與外界之二十世紀遠。其麾下之將領既須顧及各人部下之向背，蔣為統帥，又必考慮到各軍師長之行止與反應。歸根結底仍是因為中國農村氣息濃厚，社會之中層曾未產生一種公平而自由交換之經理體制，此時無從憑空出現支持如是體制之人文因素。北伐軍稱國民革命軍，亦無從擺脫此種習慣與背景。



北伐期間不少重要文件由蔣自擬。例如一九二六年八月四日其日記有「上午擬電稿訓令約六七通」，十月一日「五時起床，擬電稿數通」。北伐開始之作戰宣言、討伐孫傳芳之通電、國民革命軍口號、新兵問答，以及克復福州後之軍事報告，長達數千言，或出自總司令蔣之手筆，或由其口授由秘書錄出。他在草擬討孫通電時久不成稿，當時記下其經驗：「軍事政治之先機，全在小腦作用，幾微真理，稍縱即逝。」（一九二六年九月八日）雖在作戰期間，蔣介石仍有一日批答公文百件以上之紀錄。如十一月二十八日「批閱文書約百數十件」；十二月十四日又有「辦公桌上積牘數百件」，「盡一日批了之」。如即以三分鐘處理公文一件，百件公文已是五小時之工作。是以蔣策勵自己至遲六時

起床，雖病猶掙扎辦公見客。

各軍之津貼犒賞由蔣親定，在江西前線時，蔣曾電令武漢之財政委員會以後凡與廣州中央政府交涉時須預先經過其同意（十月五日）。軍餉、鎗械、子彈亦須有彼「親批」二字方可發給（九月三十日）。蔣批發之軍火，可以少至礮彈一百發。其干預軍隊區分，下至特種兵之連。人事行政部份涉及黃埔軍校者，及於中隊長。軍校第四期學生畢業，前十名概送蔣之總司令部服務，其他二千餘人整隊至南昌，經校長蔣介石親自點名訓話後分發各部隊。

蔣在遊俄期間已對空軍感覺興趣，北伐時因鮑羅廷購得飛機六架，僱用駕駛員十人，以後凡各地飛機場之建築，航空器材之整備，陸空聯絡信號及飛機之派遣，均經過其親自指示，南昌作戰後，又感到部隊外線作戰無線電之聯絡重要，於是蔣親令軍校教育長方鼎英添購器材，詳及其種類數量。又另令陳果夫爲之物色主持訓練人才；此係因兩人均在廣州，而陳又代蔣爲國民黨之組織部長也。

蔣不通過幕僚，直接區處統御經理事項，有時係迫於需要。如上提及姓名之軍閥部隊師長因反正而升軍長者，彭漢章及王天培即在任不及一年而撤職，其他也少有善始終，這當然不便事前吩咐提及。北伐軍雖與孫傳芳部在戰場接觸，但兩方使節絡繹來往。有時孫之代表經蔣親自接見。因事屬機微，蔣給廣州之報告與予武漢方面之指示亦前後不同。

蔣之日記中有时亦表示對各種糾葛煩厭。例如：「政治禁如亂絲，令人觸結心煩。」（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可是我人一再仔細觀察其紀錄，則又覺得其經常衡量各人之心境與能力（蔣作敵我判斷時，不以人數及番號計，而以實計鎗數計），對時間之因素特別注意，因之不可能對政治權謀不感到興趣，以

其確實與作戰互為表裏，彼此都為一種帶創意之操作也。賀耀祖原為湘軍第一師師長，在唐生智叛變趙恆惕時未投順廣州，理論上亦仍受吳佩孚節制，至國民革命軍已奪取湖南後方歸正。其部隊駐湘西石門，至此已受原黔軍之一旅長現為北伐軍師長賀龍（後為人民解放軍元帥）攻擊。兩賀原有嫌隙，賀龍之黔軍早已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九軍。賀耀祖部則不僅投誠晚，而且失去上峰支持，而地處偏僻，其人員武器易被併吞。以後唐生智部隊向鄂西發展，賀耀祖更感受四面楚歌。但是蔣介石責成賀耀祖將原湘軍第一及第二兩師合編而為獨立第二師，名義上或有貶損，責成其向江西戰場效命，賀本人又經蔣親自召見。其傳見之旨意不直接送賀駐地，而由在後方長沙之一「袁宣慰使」轉達。以後賀耀祖果然感誠效命，一戰而克復九江，開北伐軍在江西戰勝之門，翌年更為蔣麾下得力之軍長之一，在抗戰期間曾任蔣之侍從室主任。

從上述各節看來，蔣介石即在北伐初期，已有創造一種新中央體制之動向，如：不待力量成熟即企圖席捲江西問鼎中原，原則上接受宋子文之中央財政，以軍校學生填補各部隊之幹部，提倡軍用航空並初步建造無線電聯絡網。然則各種企圖之後，仍待其人身操作。這一方面固然由於草創伊始，無成例可沿，蔣只能以本身勤奮代替組織制度之不足；一方面則因他不放棄只有自己才能身體力行之優越感。他因之說及：「凡事非親辦即無著落。」（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可是人身關係操之過切，亦能產生相反之後果：一方面愈廣為招攬，一方面則對所屬均難信任。一方面愈以公誠無私之力量感召，一方面則更促成彼此在心理上之計算。其情形有如《蔣介石先生》中一段之所敘：

晚，會見各將領去後嘆曰：「甚矣，氣度寬宏，肝膽忠義之將，實不多見，但有感痛而已。」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

還有一個現實的例子：蔣初有意拉攏唐生智，從紀錄看來，他們兩人於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二日在長沙的密談，至少也經過兩三小時，以後蔣也有致唐的親筆信（談話及信件內容已無可考）。蔣離開武昌前線往江西時，即讓唐以北伐軍前敵總指揮的名義總攬湖北軍事，顯然的希望用他的力量平衡在武漢俄顧問、共產黨員及國民黨左派。可是曾幾何時，唐生智即利用此種機緣反蔣，成爲北伐軍中第一個反叛的將領。

而且蔣介石在人事處理上最大的失敗，還出自黃埔校門之內。李濟深初爲軍校教練部部長，後爲副校長，北伐時以第四軍軍長兼任總參謀長駐廣州。當蔣介石以軍長名義普遍的招攬軍閥部隊各師長時，李亦要求以所部第十二師師長張發奎升第四軍軍長，第十師師長陳銘樞另組成軍，而李本人則爲廣東省軍事廳長，如是仍繼續爲粵軍各將領之首長。此要求當時即未爲蔣容納。日後粵係將領之反蔣，李亦置身參加，此名位問題已早伏下遠因。

鄧演達爲黃埔創辦時七個籌備委員之一，後爲教練部副部長，一九二六年一月爲教育長，雖然中山艦事件之後與蔣介石有一段爭執，北伐時仍被任總政治部主任，蔣離武昌前線時加委鄧爲總司令駐武漢行營主任，有如其人身代表。從蔣致鄧的電信看來，兩人關係並非等閒，所以波爾門及何華德(Howard Boorman & Richard Howard)合著之《中國民國時代名人傳》(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即稱兩人之關係爲「友善」(cordial)。可是除思想上之差異外，鄧亦不可

REDS CALL SHANGHAI STRIKE AS CHIANG WARS ON THEM AND SETS UP A GOVERNMENT

RED CENTRES ARE RAIDED

Troops Act at Shanghai, Nanking, Amoy and Hangchow.

PIERCE FIGHTS ARE STAGED

15 Are Killed, Many Wounded and 600 Prisoners in Shanghai —Martial Law in Amoy.

CONCESSION GUARDS ALERT

Foreign Property Is Occupied at Chin-kiang—Chiang Rushes Nanking Defense.

Copyright, 1927, by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Special Cable to The New York Times.

SHANGHAI, April 12.—The second general strike in less than a month has been called in Shanghai as a result of the open warfare between the Communists in the labor unions and General Chiang Kai-shek's adherents, now in control of Shanghai.

The last twenty-four hours have found the battle thrown squarely into the open. Chiang Kai-shek's soldiers raided the strongholds of the Communists in the labor union centres throughout the Chinese city during the early hours of this morning. Bristle battles resulted and the casualties are at least fifteen armed laborers killed and one soldier.

The raids resulted in complete mass

Northern Forces Recapture Pukow Without Opposition

SHANGHAI, Wednesday, April 12 (AP).—Northern Chinese troops, it was officially reported today, have entered Pukow, on the northern side of the Yangtze River, across from Nanking.

They entered without opposition from the Cantonese.

It was said that Cantonese flags on the side of Nanking facing Pukow have been removed.

KUOMINTANG IS SPLIT WIDE OPEN BY FIGHT

Chiang Kai-shek Himself Thinks Break With Hankow Reds Is Now Unhealable.

STARTS RIGHT WING REGIME

Communist Intrigues to Hurt Him, Including Orders for Nanking Outrages, Are Charged.

By FREDERICK MOORE.

Copyright, 1927, by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Special Cable to The New York Times.

SHANGHAI, April 12.—The Nationalist Party, formed of a coalition between the Communists and the Kuomintang, is now hopelessly divided,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given to me personally by a Government official from whom there is none higher in Shanghai at present. My dispatches

▲《紐約時報》上海清黨當日頭號標題。

從人本主義的立場看來，一九二七年國民黨的「清黨運動」和以後的殘暴行動當然是革命過程中之悲劇。其引起很多家人父子兄弟投奔相反的陣營，不下於美國的南北戰爭。而當赤色恐怖及白色恐怖來臨之日，也真有如許倬雲教授所云「革命不仁，以萬民為芻狗」。尤特里女士 (Freda Uley) 可謂對蔣極

能甘心受蔣數百里之外遙制，替總司令作軍餉彈械上之出納，已在一九二六年年終之前開始獨斷的自由行動，經過蔣之指摘。此情況未見改善，只引起翌年鄧演達在武漢公開的參加反蔣運動，也成爲了他自己三年之後遭殺身之禍的重要關鍵。



爲同情的作家之一，可是她在所著之《中國最後的機會》(Last Chance in China)一書中對清黨一事也寫出：「在那暴怒、復仇、虐刑與死亡的日子，因之喪失生命，成爲囚徒，變爲玩世不恭，或從茲不與聞政治的青年，都是全國的精英。」其於中國人良心和母愛之打擊，又何可勝計。

可是今日距這些事蹟之發生已逾六十年，即生者亦已將當日之激情降低，我們應注意這些事蹟在人身關係以外的意義，這樣才算接受歷史之仲裁。蔣介石自己即曾說及：「今日認爲惡因者，或適爲他日之善果。」(詳本書第四頁)毛澤東也曾對日本之訪問者講出：日本之侵略行動適足以促成中國之改造與解放。從類此的技術角度看去，一九二七年的清黨運動不可能未在歷史上留下其積極性格。

一九二〇年間不容易看出，中國之全面改造，一方面要創造一個新的高層機構，以便杜絕軍閥割據，完成中央集權之體制，才能獨立自主，收回國權。一方面也要翻轉內地之低層機構，使貧農生活均有保障，才能談得上釐定各人權利義務，具備新社會之基本條件。這兩項工作既衝突又重疊，只能事後在歷史上看出有互相支撐之功效。一九二七年之清黨，判別國民黨與中共之所領導爲兩種羣衆運動，需要引用兩種政治思想，採取兩種外交政策，經歷過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完成。

北伐軍由廣東出發之後，至湖南而以一個Y字形的姿態分向湖北與江西展開，自攻克武昌及南昌之後，因地理因素產生的新問題，已使國民黨因容共政策內部之衝突尖銳化，於是清黨已不能避免。

經過清黨之後，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及國民政府之領導地位日益明朗化。「國民革命」脫離了蘇聯與第三國際之約束，使日後與英美接近之外交路線可能，也在江浙地區相當成功的實現了初期之財政集中，國軍也逐漸職業化。這些準備使十年之後的對日抗戰可能。

中共雖在國民黨清黨期間受到打擊，實際上也經過一段嚴重的考驗。以前由陳獨秀、瞿秋白和李立三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不離書本上的教條主義，也無從擺脫當日國際共產主義者支配，至是有大規模之轉向，才蛻變而為毛澤東領導下之中共。又整個的與城市生活絕緣，才開始走上了以中國為本位的農村改造之途徑。今日由鄧小平等人所領導的中共又與毛澤東當日的中共有了相當的距離，此是後話，總之，一九二七年是中國現代史裏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可是清黨從人身經驗看來，其付出之代價大，其所清除的則大致為機會主義及教條主義，其本身又不乏積極性格，所以一個革命期間之悲劇應否即是「中國革命的悲劇」，今日看來已成疑問。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蔣介石不時在他的日記裏記述他的處境艱難。既提到經費不能維持，也埋怨革命力量消沉，將領胸襟窄狹，不能在長遠處著眼。可是最大的問題仍是國內左右派的問題不得解決。

在離開廣州之前，他還抗議右派人士對他不能諒解。例如七月十日，他仍以西山派在上海的組織為「偽黨部」。《蔣介石先生》有下列的記載：「公以上海偽黨部抨擊整理黨務案，集矢於己，不勝鬱憤。」二十四日又有長信給張繼，內稱：「本黨與共產黨合作，為總理在日所確定。」他自稱繼續與共產黨合作之宗旨，決非「賣黨」。而指責張繼等人「老同志」。「能使本黨消滅者，其惟本黨同志，自己不革命，而猜忌其他之革命勢力」。「本黨每有一最負責任之同志，不避勞怨，即為一般老同志所不喜」。

可是他剛一出廣東境，他所抱怨之對向，已爲共產黨人。陳獨秀在《嚮導》所發表的文字，已令他相當震怒。而八月二十五日《蔣介石先生》則稱：「共產黨在後方根據地搗亂更急，運動黃埔學校，無所不用其極。」八月三十日又有「公曰：『我軍雖獲大捷，而前後方隱憂陡增，共黨在內作祟，非使本黨分裂與全軍崩潰而不止，遍地荆棘，痛苦萬分。』」

九月十九日又有「內部複雜，變生肘腋」的記載。二十七日有「本黨大會有人搗亂，是非不明」的記載。十一月二十八日有「內部兩派意見甚深，不能解除，亦無法消弭，令人痛心」的記載。十二月七日蔣在九江接見湖南省黨部執行委員，事後有「本黨與C P意見衝突，日漸明顯，可嘆也」的文字出現於紙墨。

如果這時候蔣已經有了清黨的企圖與腹案，則這些籌劃不見於現已發表之文件。而共產黨人的攻擊，却逐漸集中在他人身上。早在八月二十日他在長沙，就接獲廣州的共產黨人組織「迎汪」運動，他已知道迎汪即所以「倒蔣」。十一月十一日他在南昌，接到黃埔軍校有推翻校長的建議。同月二十一日也在南昌，他接獲黃埔同學會有修改會章取消集中制的建議。這時候他除了電令廣州黃埔同學會不得修改會章，指示第四期畢業學生一律調赴南昌，由他自己點名訓話後分發各部隊（詳本書六八、六九頁）外，沒有採取其他的行動。他的紀錄也一直是著重容忍。有如他讀《嘉言抄》後引用「知天下之長，而吾所處之短，則橫逆困窮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的辭句約束自己（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蔣介石今後還要用「忍辱負重」的標語在他有生之日督促他自己和他的部下，這四個字已在北伐初期提及（九月三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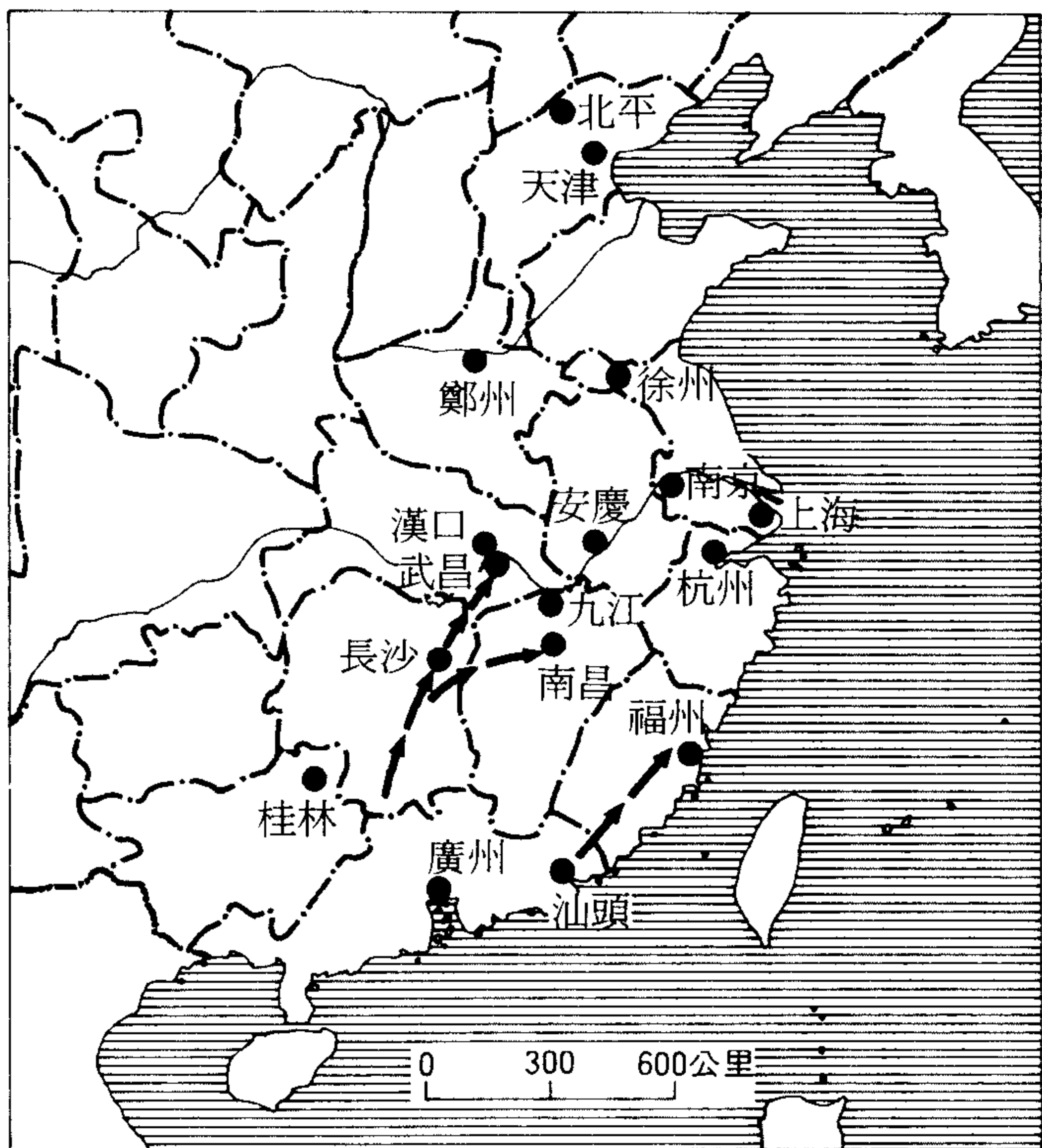
然則完全站在被動的地位不準備還手也始終不是蔣介石的性格。看樣子他於八月底九月初決定

離開武昌戰場而往江西時即對今後的局勢有了整面目的重新打算。雖說我們無法斷定何時他對清黨一事下有決心，只是這戰略的調整只更使清黨符合以後歷史展開之層次。

共產黨員在北伐初期之宣傳及組織民衆之工作的實效，常被誇大。在純粹軍事立場上講，這些工作雖有裨益，却很少發生決定性的影響，因為汀泗橋、賀勝橋之役，武昌與南昌之攻城戰以及南潯鐵路上的爭奪戰都是本格的戰鬥，其勝敗由戰場決定，不由民衆向背決定。當初蔣介石在廣州時以共產黨員擔任軍中之政治工作，只希望他們不預聞純粹的軍事問題，以保全統帥權之完整。殊不知俄紅軍創建時之體制，以沙皇留下之幹部爲職業性之軍官，以黨代表監視操縱並傳達中樞之指示，其觀念可謂與蔣之設計用心相反。

至今我們尚無從確定蘇俄對初期北伐之資助的實況，只是有了這些援助及應諾在途之援助，而北伐軍之八個軍又有四個軍之黨代表（代表國民黨）爲共產黨員，再加以總政治部之主任又爲親共之國民黨左派（鄧演達），俄顧問已不難左右戰略上之決策。蔣介石之紀錄中不時有與他們意見衝突之記載，有如「公閱鮑羅廷電嘆曰：『鮑等限制革命軍發展防範本黨北伐成功之心到底不懈，悲夫，中帥倏忽逝世，何時吾輩後死者艱難至此耶？』」（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當時鮑羅廷等主張，國民革命軍以佔領武漢爲主要目標，以後發展應北向窺取鄭州一帶以期與馮玉祥聯絡。他們對用兵於長江三角洲，或乾脆反對，或託辭推延。蔣介石既不能爲他們操縱，他們亦在武昌前線軍中造成排蔣風氣。劉峙之第二師被歧視，和蔣之對劉說：「爾等如再不爭氣何以立世見人？」（詳本書六四頁）即出於這種風氣下之反應。《蔣介石先生》又提及九月八日「公接某緘，意在諷去武昌」。此事亦發生於蔣介石親自督促第二師猛攻武昌城而不下（九月四日至五日）之後。其



後面有俄顧問參預，則可在下段看出：

上午，與鄧演達及嘉倫將軍談，決調第二師入贛作戰。攻城任務由第十師替代。嘆曰：「革命環境乃至於此乎？壓迫牽制監視之難，迴腸盪氣忍痛而已」（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五日）

其實蔣已在半月之前決心離開湘鄂前線，赴贛指揮，其目的在「杜絕共黨挑撥重啓內部爭端」（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十五日之後，則不僅蔣本人離開武漢戰場，其「主軍」之第二師亦繼第一師之後展開於江西戰場。

這種部署上的轉變與北伐全部

之過程甚至整個中國近代史都有深切之關係。表面看來，蔣介石身爲主帥，不能活躍於戰場而被迫前往主持次要之戰場。可是孫傳芳之全力增援江西，不久即將此次要之戰場提升而爲主戰場。武漢固爲兵家必爭之地，至此只剩下武昌之攻城戰。城破之後（十月十日）該地則成爲一個權力鬥爭之場所，失去其軍事上之吸引力。唐生智部果然與馮玉祥部於翌年六月在河南接觸，但從以後之發展看來，其會師並未爲唐或馮或武漢或蘇俄打開出路。

蔣介石在江西的三個月間仍留下了不少嗚呼噫嘻忍氣吞聲的字眼。但是在此期間除經費困難外他已有充分行動上之自由。他之消滅孫傳芳勢力，鬥力與攻心並用。他一面自忖的寫著：「此獠思想頑固，行動取巧，敗亡時日問題耳！」一面又於同日致電「南京孫馨遠先生」，請撤回援贛之江浙各軍「則東南和平才有真正之希望」（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甚至提出將來和平實現江西仍可「歸還五省範圍」（九月十八日）。所以用兵期間使節絡繹道路延至十月杪南潯鐵路決戰之前夕。從他致前後方的通信看來，蔣介石始終對戰局樂觀自信。即在南昌攻城戰尙待重新部置之際，他已決心進兵浙江，爲加倫反對（十月六日）。他之感到胸有成竹，固然由於孫外強中乾，企圖避免苦戰，一方面也因爲他蔣能控制何應欽在汕頭之部隊，而他本人又親自主持對駐在杭州陳儀的策反，預料沿海之大包抄已實際可能也。至於翌年初又有駐安慶之陳調元的歸順，所以以後之取得京滬，不過在江西將孫部主力囊括之後的軍事行動之尾聲。因此舉蔣介石經歷生平第一次之指揮大兵團作戰其戰果輝煌亦爲以後未有。迄至年底前他也仍寫下不少自責責人之辭句，但是他已不能全部壓制自己胸頭喜氣。他之自負可以從下段看出：

遇軍事最危急時，即是轉勝之機。如一輕舉妄動，即足招敗亡而貽羞恥。以後不論何事總要熟慮斷行，切勿隨人主張而轉移也。軍事第一要貫徹到底，即使錯誤亦須錯誤到底，所謂將錯就錯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然則軍事上之成功只使內部分裂愈爲惡化，在這數月內南昌與武昌間政治關係之距離日益遼遠。北伐開始時之二個口號依次爲「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和「廢除不平等條約」。軍事行動不久，即發覺照字面做去之不合實際。九月間美國公使麥加利由香港訪問廣州，蔣介石即自前方電令所部給予禮遇，開與西方國家接觸之門（九月二十三日）。次日亦由於他的催促，國民政府通令解散廣州罷工委員會糾察隊，恢復廣州香港間的正常交通，自此結束了一年三個月的對英大罷工。茲後廣州政府宣佈徵收華盛頓會議授權中國徵收之進出口貨品物品附加稅，也未受到外人阻撓。中英關係繼續改善，倫敦授權英國新任公使蘭浦生往北京到任之前，於年底先來武漢拜訪，作爲承認國民政府之先聲。這種接觸與改向，不免使在武漢之顧問及國民黨左派感到徬徨。在沿海城市中組織工會之共產黨分子尤對新發展感到威脅。他們也預料蔣介石向江浙進軍，必將對西方各國更爲接近而對蘇俄更爲疏遠，因之影響到國民黨之整個聯俄容共政策。

至於蔣與上海商人接觸尙出自軍事行動之前。從紀錄上看來，蔣在出師北伐之前即已在廣州招待商界領袖王曉籟等（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在江西的期間又以他的摯友張羣爲駐上海之代表，設立自己的通訊機構，呼籲銀行界的支援，迄至十二月，他已能利用上海法國領事所設電台傳遞密碼消息（十二月十三日）。況且他又親身接見陳調元、張作霖與閻錫山所派代表。凡此都有將左派人士認

爲北伐係一種廣大之羣衆運動的概念改變而爲一種單純的軍事行動之趨向。

他和鄧演達之交往，最能反映南昌與武昌間的內在之衝突。從已公佈的蔣之文件看來，他對鄧可謂深注信心。他固然經常委託鄧執行分發兵器糧餉等瑣事，可是也仍在數百里外，讓之參預機密，及於敵後狀態及幹部人選。有次曾提及：「將才難得，甚苦！兄能帶兵否？然兄須常左右。總政治部有人替代否？」（一九二六年十月九日）顯擬授鄧師長職，而有意使之脫離總政治部。因鄧亦係保定軍校畢業曾任團長也。鄧演達如何推託，不可得而知。但是他與俄顧問接近，可能已在此時接受俄人軍中政治指導員高於部隊長之觀念。一九二六年秋天，他已用總政治部主任之名義指派雜牌部隊爲「別働隊」（九月二十四日）甚至委任軍長（十一月六日）。蔣與鄧曾在十二月二日於南昌長談，可是兩人間關係未見增進。以後更有總政治部所發宣傳品對總司令人身不利之情形，經過蔣對鄧之指摘（十二月二十二日）

翌年初武漢與南昌（一九二七年三月之後則爲另一城市中心——南京）全面決裂。二月二十四日漢口組織羣衆大會，參加者五萬人，其標語與口號著重黨權高於軍事權力，反對人身政治與軍事獨裁，其重點則在反蔣，鄧演達曾參加演講，爲大會之主持人物。當南京政府打擊沿海一帶之左翼工會時，鄧演達亦以總政治部名義報復，鎗殺在武漢之親右派工會之領導者。並於七月在《中央日報》撰文攻擊蔣介石。

武漢政府崩潰之後鄧化裝爲工人出走，抵達俄境，又在東西歐遊歷約三年，於一九三〇年五月還上海，在租界發行《革命行動》，對國共兩黨均有批評，號召組織第三黨。蔣之國民政府向租界當局要求引渡法辦。鄧演達以違害民國罪被判死刑，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執行。以當日情景

及蔣介石與他之特殊關係，此事極難如是解決而無蔣之示意或認可。



因爲《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記事至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卅一日而止。我們只能看到蔣所作「今日已是十五年最後一天……大海茫茫，何時能達到彼岸」之責身自問（詳本書五八頁），而《大事長編》續記清黨各事，則以已經發表之各種公告佔篇幅，不到一九二七年十月蔣辭職赴日之後未提引其日記，《蔣總統秘錄》也只引用蔣四月十八日奠都南京後演講辭內提及當年一月十三日鮑羅廷在漢口歡迎他晚宴時的講話，內中用無禮的態度警告他：「蔣介石同志，我們三年以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的事情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農工，反對C P的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來打倒的。」此外缺乏蔣親身切眼的經驗，反映到當日實情。

可是縱如是我們仍可從已經過目的資料，對清黨一事提出若干結論。

首先我們務必重申用道德名義解釋不足以答覆這樣的一個歷史問題，本世紀初年研究法國大革命之專家奧拉德(A. Aulard)認爲丹頓是好人，羅伯斯卑爾是壞人。他的高足弟子馬蒂耶(A. Mathiez)則把當中好壞翻一個面，指斥丹頓貪污好貨，對外妥協，羅伯斯卑爾倒是有心爲民造福之英雄好漢。今日之研究法國史者很少再從這類人身道德上著眼，並非道德應當抹殺，只是當日其人其事，如是突然，又牽涉廣泛，找不到適當的標準。即找到亦與今人之關係文不對題。另一研究法國大革命之名作家勒費爾(Georges Lefebvre)更指出：「道德主義者必讚揚英勇，譴責殘暴，可是不能解釋事故。」英國研究內戰弒君革新爲民國之歷史專家艾詩立(M. Ashley)早歲著書以克侖威爾爲小器

之獨裁者。以後他多年閱讀經歷愈多，才領悟到十七世紀英國情形之艱險特殊，自恨年輕時有眼不識泰山，今後著書，竭力讚揚克之偉大。

大歷史不能因籍於小眼光。中國之長期革命其範圍與深度早已超過法國大革命及英國之內戰。而一九二七年之清黨只是當中一個段落。國民黨並未因清黨而解決一切問題；中共也並未因被清而整個的被埋沒。只是因爲一九二七年之事蹟中國現代史進入於一個新階段。我們此時檢討北伐與清黨，不把一九二七年當作一個終點。經過一段分析，仍希望將所得歸納於歷史的全部過程中去。即提及蔣介石之人身因素也仍是在這種立場上著眼。

縱算我們過目之資料仍有各種缺陷，我們已可從中看出在一九二六年夏季至一九二七年春季的約九個月間蔣介石已充分表現其爲人作事之若干特性。遠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他覆廖仲愷信裏已提及實行主義與獲得政權爲兩件事（詳本書四九頁），此由於黨員與政客之性格不同，他甚至講明國民黨如要取得政權，必引用「中國式政治家」，既然如此，他也必已預先瞭解如望以武力統一中國若干軍閥行徑仍不可少，只因社會環境如斯，革命家縱異軍突出亦無從天馬行空也。所以他一方面向軍校第四期畢業學生訓話，承望他們向黃埔第一期同學學習（死去的已五分之三）不要向第二、第三期同學學習（有的已不願當連長，派赴前方已規避不去）（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一方面也仍以人身因素拉攏部下，用升官發財爲餌培植個人勢力。蔣介石軍事上之成功，大部得力於此種現實手段。可足此亦爲他今後立身做事之羈絆，他縱可能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他從未如此寫出，可是在各種場合中所發牢騷近此情調）爲自身解脫，他的態度已不能爲黃埔近身同事李濟深、鄧演達所諒解。

蔣之現實主義也使他保持行動上之自由。他只有一個大概的目標，旨在武力統一中國樹立國民

黨政權，而不堅持所採步驟。所以他從放棄整備廣東爲革命基地的方案而北伐，由內地發展而改爲向沿海發展，從親身督率武昌之攻城戰而主持江西戰場之部署，從仇英的態度改變而向西方國家諒解示好，這樣才能捕捉歷史上和戰場上的各種機會，而不爲既定方針所拘束。（他之所謂將錯就錯，係指軍事上之部署。）而最重要的則是蔣介石能著眼於實力之所在，當北伐軍席捲中國南北之際，我尙在髫齡於湖南上小學，每日看到軍隊幹部張揚「招募新兵」之三角形小旗，臨街招兵。長沙火車站附近空地經常有過境軍隊操習。當時剩餘之失業人口與流通各地之軍械可謂俯拾皆是，有能力之冒險家如能籌備相當數量之糧食與彈藥，不難瞬息成軍，此亦軍閥逞凶無可遏制之一大主因。中國未來之領袖如毛澤東及鄧小平皆利用此機緣發難。費正清教授亦在其標準教科書內提及軍閥爲一般待開發國家之通常現象，因軍事科技容易輸入，控制此種力量之政治體系則待長時間之培養方能成熟也。情勢如斯而謂蔣介石應絕對杜絕軍閥，使部下絲毫不沾染其氣息，並且與江浙之商界保持距離，才能保證其運動之純真，也可謂不識時宜，亦始終不瞭解革命行動之真諦。

不少歷史家在其他方面做文章時忽視了蔣在這個九月間雖然不著重參謀業務（他稱參謀爲「掾屬」，凡非正規之事項即親自處理），卻已充分地表現了他個人之組織能力，他在各部隊裏成立或不成立補充團及教導團，各別的批准其能否招募新兵，更利用分發軍校畢業生及分配俘虜的辦法，管制其成長。漢陽克復之後他立即注重當地兵工廠之生產（見《蔣介石先生》九月二十九日、十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賀耀祖部由湘北行軍至九江前線時即因他的手令撥付伙食費五萬元及步鎗子彈十萬發而立即生效（十月五日）。他有意升賀爲軍長而恐怕唐生智之嫉忌，所以多方疏通，甚至希望唐能出名對賀保舉（十一月六日），若非當日中國之特殊情形，此種措施已不符合任何統御及組織之原則。這種種舉動

表面看來，缺乏條理，已有似於戚繼光所說「教兵之法，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

然則蔣介石之作爲，保持著孫子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的宗旨（先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尋覓對方可被擊敗的機會）。江西孫傳芳部隊肅清之後，他即下令整備湖口與武當的兩個要塞，甚至以野礮充實這些地區之防禦（十二月十四日）。這當然也影響到尚在孫傳芳陣營內海軍礮艦日後之決心。

他在政治上的整備，也採取同一方式，先作守勢次取攻勢。有了以上背景上的分析，一九二七年的清黨與寧漢分裂不難瞭解。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黨部遷武漢。蔣介石亦在南昌召開軍事善後會議，又邀請中央由廣州赴武漢之中委先來南昌，由他招待遊廬山，在廬山舉行會議，有國民政府代理主席譚延闓及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張靜江（當日以黨治國，中央政治會議乃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常務委員會，所決策交國民政府施行，只是其成員常兼任黨國要職，所以多時係二而一）。只是一部已到武漢之國府委員及中央執行委員卻在當地組織「聯席會議」，聲稱在政府未遷來之前執行最高職權。大概蔣介石以爲此係臨時性質，所處理亦不過一般行政事項，曾表示贊成（十二月二十日）。即《大事長編》亦曾未稱其爲不合法。不料此聯席會議受鮑羅廷及中央跨黨分子暨國民黨左派人士把持，準備籌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二屆三中全會）以便全面改變政策。於是在江西之中委包括譚延闓及張靜江等才宣佈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暫留南昌。自此中國國民黨已有兩個中央。在寧漢分裂之前已因湖北及江西間之爭執，先已有了「鄂贛分裂」。在武漢之一派包括鄧演達在內除對蔣介石大權獨攬人身之不滿意外，尙反對其進軍於江浙，緩和對外關係，以及準備約束工會運動之諸般措施。

蔣介石於一九二七年一月乘軍艦由九江至漢口，有意彌補兩方意見，只是顯無成效。鮑羅廷之「歡迎辭」已形同警告（詳本書八一頁），而蔣一週之後返南昌，兩方裂痕更加深巨。南昌致電於第三國際要求撤換鮑羅廷則未獲答覆。

武漢之二屆三中全會於三月開會，到會者三十三人，除三人外，盡係左派及中共黨員，其決議可謂推翻自中山艦事件發生以來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各項措施，並且通過「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條例」以削弱蔣之職權，而蔣則執行其向江浙地區之進軍。可是四月十二日之清黨並非如艾薩克斯所說突然展開。即在武漢之聯席會議採取各種行動之前，國民黨之監察委員會由蔡元培領導已聚集於上海籌商對策。上海總工會受中共人士操縱組織勞工市政府時，國民黨右派亦組織全國工會聯合會與之對抗。當北伐軍軍行所至各地發生排外風潮時，外人在上海已嚴陣以待準備武裝干涉，蔣介石則發表談話表示尊重外商財產無意在此時以武力收回租界。凡此都使清黨無可避免。

四月一日武漢免去蔣介石總司令職務，更使今後衝突逼近一步。其所以未在此時全面決裂者，因此時蔣等期望汪精衛回國後或可吸引國民黨左派人士來歸。不料汪見蔣後逕往漢口參加武漢政府。

四月十二日上海事件發生之前，國共之間或國民黨左右派之鬥爭已展開於廣州、福州、重慶、杭州、南昌及鎮江等地，也及於黃埔軍校（時稱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一九八四年黃埔同學會發行《建校六十週年紀念冊》時即總結其「大事記」為「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軍校第五期，三、四、五隊學生八百人，在武昌舉行畢業典禮，由校常委惲代英致辭，繼續討蔣，八月十五日軍校第五期，一、二、六隊學生共一千四百八十人，在南京舉行畢業典禮，由何應欽代蔣介石發畢業證書，宣言反共」。

至於清黨終在上海展開者，乃因當地總工會組織糾察隊五千人，在孫傳芳、張宗昌部隊退出上海地區時，獲得鎗械數千枝，至此成爲嚴重問題。三月杪蔣介石及白崇禧已發出通令此等半軍事機構務必將兵器交出。如謂四月十二日事件出於突然，工會人物全無預感，只在矇懵之中被出賣，甚難置信。只是武漢方面不顧蔣介石新勝之餘威，尙望千里之外一紙命令即可以將之免職，鮑羅廷未做先說，鄧演達不顧中俄革命背景之不同，而蔣反擊時則用軍事行動之方式，先著重對方弱處，以上海總工會代替武漢聯席會議，表示兩方作法，具有現實主義者及理想主義者之差異，非盡用左派、右派、前進或保守等名目所能概括者也。

史達林曾謂中國國民黨只是一隻檸檬，國際共產黨人不妨將之一擠再擠，擠乾之後則可信手拋去。費正清曾引用此語，但是他隨即提及一九二七年之清黨，因此他悠閒的寫著：「看來國民黨之右派先擠。」

第二篇

安內與攘外

下野，訪日——

中原大戰——

權謀與道德——

內戰之社會背景——

津浦線、隴海線及平漢線——

戰後之財政及中央與地方之新平衡——

胡漢民——

江西剿共——

圍剿與反圍剿——

毛澤東與紅軍——

九一八與忍辱負重——

淞滬抗戰——

熱河事件——

長城戰役及塘沽協定——

「我屈則國伸」——

何梅協定與秦土協定——

憂患及修養——

精神訓練與國民道德

一九二七年清黨之後，國民政府奠都南京。蔣介石從茲在歷史上表現了兩種奇特的性格。一是在軍事上和政壇上反對他的人很多，他們卻推舉不出來另一個人作他的替身，因之他「無法替代」。他被排擠，曾兩次辭職（一九二七年八月及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又兩次被邀復職。雖說程序上好像是做作，復職後名位上也有差異，實質上他做黨政軍的負責人卻始終如故。其二，他還自命為革命家，仍企圖打破刻下的環境，旁人卻已把他當作國家最高主權人，甚至以為他是一個保守主義者，現下的情況由他造成，他也應對現況負責，包括中國的社會經濟情況。

在檢討這段歷史——尤其抗戰之前的一段——的時候，我們能引用自「日記」的資料非常貧乏。《大事長編》紀事遠不如《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之細膩。內中缺乏私人緘電，而代之以公告。而且一九二七年全年之紀事只引用日記四條，一九二八年八條，一九二九年五條，一九三〇年既有對付馮閻之中原大戰，東北軍入關，張學良就國民革命軍副總司令，桂系之李、白及共軍彭德懷部相繼攻入又退出長沙，國府又頒發大赦令，廢除厘金，實行關稅自主，而《大事長編》所摘引日記之處也仍只八條。

縱在引用日記之處，一般文字也過於簡短，不能看出紀事人心情之縱深曲折。有如一九二七年辭職後，「公返抵溪口故里，晚宿樂亭，深夜，憂念國事，自記曰：『如何可使革命根本解決耶？』」（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四日）

即使《蔣總統秘錄》應有參對補充的功效，其為用也極微。在數量上講，以上一九二七至一九三〇之四年內引用日記之處亦分別不過六、十八、四和八條。一九二七年辭職後，蔣曾一度往日本小住，自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七日逗留三十五天。往日本之目的，一是要求宋耀如夫人認可與宋

美齡結婚；現已發表的日記對此事全未提及。另一則是與當時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會見，《大事長編》及《秘錄》同摘錄日記一段，表示談話時兩方意見互不相牟，進見的目的全部失望。

《秘錄》在其他方面引用日記之處表示蔣對當時日本之贊羨，有如：「日本進步之速可驚，社會秩序與教育亦均有進步。未至日本以前，以為其物質進步，精神必衰退；今乃知其興盛猶未艾也。」（一九二七年十月四日）又：「日本建設猛進，不知吾國何日乃能臻此耳！」（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在逗留日本期間蔣遍訪孫總理故友犬養毅、頭山滿與梅屋莊吉，以及他自己在高田當上等兵受入伍教育時的師團長岡外史和聯隊長飛松寬吾，實業界領袖澀澤榮一、滿鐵總裁山本條太郎，可是他最重要的訪問仍是十一月五日於田中私邸與日本首相的晤談。

國民黨籌謀革命時曾以日本為根據地。孫總理早歲也有支持大東亞主義的傾向。再加以蔣介石自己對日本風土習尚的好感，他很可能希望自己的企劃得到日本人士之支持，至少亦不受其侵預干涉。即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他尚在南昌軍中，已因大正天皇逝世，囑部屬向九江日本領事館弔唁，其用意無非在尋常範圍之外的睦鄰示好。日本在一九二〇年間的初期，因著政黨政治之抬頭，參加華盛頓會議，確保持著對外和平共存的態度。尤以若槻禮次郎初度組閣，以幣原喜重郎掌外交，被胡適稱譽為日本之「霸權無害」的時代，蔣介石此時盼望與日本獲得諒解，似乎符合內在的及客觀的需要。只是事不湊巧，正值中國清黨期間，亦即一九二七年四月，日本政局變化，次任首相田中義一大將代表軍部侵略性格，力主向大陸拓土，又自任外相。蔣介石之訪見，可謂注定的必然失敗。

他與田中的談話，發表於《大事長編》的似由蔣日記修訂而成，因為當日參與會談的中國方面

惟有張群，日本方面則爲田中倚爲「中國通」之陸軍少將佐藤安之助。他們的紀錄與回憶都與《大事長編》所記有參差的地方。

《大事長編》所記如次：

訪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於其私邸，公告以中日兩國將來之關係，可以決定東亞前途之禍福。田中詢公此次來日之抱負，公以三事告之：略曰：「余之意：第一、中日兩國必須精誠合作，以真正平等爲基點，方能共存共榮，此則胥視日本以後對華政策之改善。第二、中國國民革命軍以後必將繼續北伐，完成其革命統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第三、日本對中國之政策必須放棄武力，而以經濟爲合作之張本。」又曰「余此次來貴國，對中日兩國之政策，甚願與閣下交換意見，且期獲得一結果，希明以教之。」田中則曰：「閣下闡不以南京爲目標，統一長江爲宗旨，何以急急北伐爲？」公曰：「中國革命志在統一全國，太平天國失敗之覆轍，詎可再蹈乎？故非從速完成北伐不可，且中國如不統一，東亞不能安定，此固爲中國之大患，而亦非日本之福利也。」田中每當提及統一中國之語，輒爲之色變。

公辭出，自記所感曰：「綜核今日與田中談話之結果，可斷言其毫無誠意，中日亦決無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許我革命成功，而其後必將妨礙我革命軍北伐之行動，以阻中國之統一，更灼然可見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

《秘錄》指出在會見後之九日，即十一月十四日，日本外務省根據佐藤安之助的紀錄，將兩人談話分送日本駐華使館以及上海、漢口、瀋陽三總領事館。內中證實田中曾提及中國亟應「先要使

長江以南的基礎鞏固下來，似可不必急於北伐，而專心於南方統一」。蔣則辯稱「如果不繼續北伐，則南方反而有禍亂之虞」。此外蔣明白抗議日本之支持張作霖。他說：「中國之所以有排日運動，是因為中國國民認爲日本援助張作霖。」田中則說：「日本沒有給張作霖任何援助。」此外方雙方同意清除共產黨。

《秘錄》之作者古屋奎二於戰後訪問張群，證實蔣曾提到張作霖。田中則說他對張非常厭惡，已準備支持他的總參議楊宇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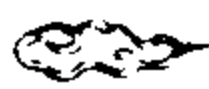
其實日本不甘心中國民族意識之高漲，以及蔣所揭櫫之「平等」（蔣此行在有馬溫泉題字「平等」，現藏該地極樂寺），和廢除不平等條約之諸般要求，已成爲一種長期間及歷史上之趨向，並非領袖人物之爭辯與折衝所能左右。田中義一固然是傳聞之中的「田中密奏」執筆人，態度強硬囂張。即民政黨之若槻與幣原雖採取和平政策，也還是主張維持現狀，斷不會放棄日本之既得權利。所以蔣在當日日記所書，「余此行之結果，可於此決其爲失敗」實屬定數。他隨又寫：「余雖不能轉移日本侵華之傳統政策，然固已窺見其政策之一般，此與吾固無損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只見《秘錄》，不見於《大事長編》）也算得符合情景。翌年蔣繼續北伐，果有田中內閣之出兵山東阻撓，釀成濟南慘案。北伐軍終忍辱負重，退出濟南城，不予田中以口實，避免與日本全面衝突，只繞道北進，最後則迫至張作霖放棄平津，退返關外。急進派之日本軍官見張不爲彼用，陰謀將之炸死，而蔣只誘導張學良在東北易幟。如此一連串之發展始終前後一貫。今日之讀史者尙可從中窺見列強自十九世紀以來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圈之真意義。如在本國用兵事前尙需鄰國認可，則中國縱有國家最高主權人，亦無從行使最高主權矣。

訪日期間蔣尙揚言來日僅是出國之初步，以後更須前往歐美。《秘錄》稱爲期在「二年之間」，《大事長編》則稱有「五年考察計劃」。側面看來，此種說法甚難置信。如果他有意長期逗留海外，則何必急於游說日本首相，企圖獲得諒解，以便持續北伐？又何以見田中後才二日，即決定束裝回國？古屋奎二之解釋，此時蔣介石已獲得汪精衛密電，謂可望復總司令職。然而自寧漢分裂之後，國民黨之力量已分置於三處中心：武漢、南京之外，尙有原基地廣州，此亦爲三個大經濟地區。武漢政府不能與第三國際融洽，也已在二七年七月之後清黨，至此已失去當初與南京分裂之邏輯。而且其任命之軍事首領唐生智揚言東征，反被在南京之軍事集團擊潰，在蔣回國之日，局面已見分曉。在南京之何應欽、李宗仁及程潛等雖聯合擊退孫傳芳最後一次之大反攻（龍潭之役，一九二七年八月）及唐生智之東征，仍缺乏有效之領導力量。胡漢民因不滿於「新督軍團」而自去，譚延闓可謂忠厚長者而非領袖人才。此時廣東亦有新的變化。張發奎在武漢原受汪精衛節制，已在東征途中向南京進軍。只是部下葉挺及賀龍在江西參加中共之武裝部隊，被圍攻之後繞道入粵，張發奎亦率部追蹤入粵。及至廣州，張一面制壓受中共影響之工會組織，一面侵蝕在北伐期間始終留守廣東之李濟深部。此時地域關係亦深具影響。因李濟深及所部黃紹竑均爲廣西人，而張及同事薛岳則爲廣東人也。汪精衛亦粵人，指望在排斥桂系之名份上可以在廣東樹立新政權，所以在十月杪離漢口往廣州。蔣介石在訪日期間得此消息，甚不以爲然，曾在日記上寫出：「從此黨國紛亂更難設想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

汪精衛之密電應於此後三數日內抵達蔣跟前。雖說其文字始終未見公佈，其內容則已洩露，大致汪掌黨政，蔣主持軍事。國民黨之三個中心既都已標榜反共，而又彼此相持不下，則此方案已具

有妥協之基礎。蔣既能復總司令職，則繼續北伐爲邏輯上惟一之出路，所以他接電不久即束裝返國。他是否真有遊歷歐美各國之企圖至此已不關緊要，總之即有時此計劃已終身放棄。他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曾往緬甸、印度，開羅會議時亦曾履足非洲，一九四九年訪問南韓及菲律賓，此外終身未離國土。並且他堅持除非中國確實取得獨立自主之地位，不願見羞於外邦。在我們看來，這是他個人人身上的一種犧牲，也是他做國家元首和世界大政治家的背景上一大損失與缺陷。

一九二七年的三十五天訪日，他已在彼邦留下不少的痕跡。有馬大旅社老闆的兒子幾十年後還記著住客蔣介石付小帳之慷慨。梅屋莊吉的女兒則樂於道出乃父以前輩的姿態指斥後輩蔣介石不爲國努力而逍遙海外。《秘錄》也翻印了好幾幅珍貴的影片。內有他與頭山滿彼此席地而坐的情景。還有在馬庭院中小憩的一幅，右臂倚著庭前欄杆斜坐，右腳不履地，左手抓著右手以保持平衡。日後他注重作中國式元首的雍容莊重，如此瀟灑的態度已不復多見。此幅亦爲訪日期間留下惟一之無鬚照片。其他攝影則帶有日式之短鬚。本來蔣介石面目適於拍照，此時他已四十歲，所攝照片則面目爽颯如二十餘許人。是否他以爲蓄鬚可以增加他的威嚴姿態？我們只知道他在諸如此類的角度非常考究，卻缺乏他在訪日期間開始蓄鬚的解釋。此外他既已辭職，實以個人及平民身分訪日，但所行仍有衛士二人攜帶手鎗，日夜維護，在今日看來也算奇特。



汪精衛發出密電後，蔣介石即於十一月八日在神戶上船回國。汪在此時應當躊躇滿志。蔣剛返上海一面準備結婚，一面即電邀汪精衛與李濟深同來上海先和他及譚延闓會商。所以國民黨第二屆

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四中全會）的預備會議由蔣、譚、汪、李聯名發起，預定十二月在上海舉行。

在敘述以後的經過時查登教授寫著：「十二月內汪精衛重新在政治上顯示頭角崢嶸的機會好像剛入掌握，而廣東的情形終使之事與願違。」這局勢之展開，首先由張發奎發動政變。當汪精衛與李濟深應蔣介石之邀剛一離開廣東，張發奎部黃琪翔軍即將李濟深所部繳械，佔領廣州，並且發出通電，顯然的在構成汪精衛之政治地盤，以作國民黨集會時及權力分配時之本錢。不料廣州剛一入其掌握，而張軍尙待對付李濟深及黃紹竑近郊與其他區域之部隊時，中共的暴動已揭竿而起。廣州市內潛伏在工會及海員中的共產黨徒，受有蘇俄領事館之援助，又策動張發奎全部之教導團攻佔警局、兵營、公署、銀行，獲取鎗械彈藥現金，在市內造成赤色恐怖。雖然變亂只經歷三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即被撲滅，繼之又有一段帶報復性之白色恐怖，時人已因整個變亂歸罪於張發奎。因張發奎而汪精衛不能辭其咎。他在過去南京已開始清黨時，仍潛往武漢，在武漢一事無成，又經發表談話自承繼續聯俄容共爲錯誤，此刻再因他曖昧游離的政治態度或個人權勢之野心嫁禍於廣州，至是他已成爲眾矢之的，不待四中全會開幕，即在上海之預備會議已使他無地自容，於是他辭職，於十二月十七日宣佈再度出國。

汪精衛之失敗即係蔣介石之成功。在上海之預備會議即已發表其繼續總司令職權。四中全會在 一九二八年於南京舉行，蔣被推爲中央委員會五個常務委員之一，又爲國府委員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至此只有譚延闓爲國民政府主席，其名目上之地位似高蔣一籌。可是不久蔣又被任爲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及國民黨組織部長。北伐於當年六月佔領北京而完成，十月國民政府重新改組，蔣爲主席

兼陸海空軍總司令，譚延闓爲行政院長，胡漢民爲立法院長。自此蔣介石最低限度在名義上已爲全國黨政軍最高負責人。



一九二八年北伐完成，年終張學良易幟，全國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中央任命張爲東北邊防司令長官，於是全國統一。一九二九年一月國民政府決定裁軍，預定全國軍隊不得超過六十五師，並特種兵總數不過八十萬人，軍費總額不逾全國收入百分之四十。此計劃始終未能付諸實施。當年年初即有桂系在南北抗命，隨後即有蔣與馮玉祥之交惡，彼此公佈對方違法之罪行。此時蔣介石之對策主要係收買敵方之部下將領，造成內訌。這種技巧在初期確有實效。一九二九年的內戰亦牽涉南北，其破壞之程度不深，其解決迅速而帶戲劇性。只是構成內亂之原因迄未能遏除，即已綏靖之區域其中動亂之因素亦似能死灰復燃。一九三〇年之內戰由西南（桂系）及西北之將領形成一個反蔣大集團，包括前國民革命軍之二個集團軍總司令（第二集團軍馮玉祥、第三集團軍閻錫山、第四集團軍李宗仁，其反對者爲蔣介石曾以統帥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至此在名義上都爲國民黨黨員。戰事展開時以粵漢、平漢、津浦及隴海四鐵路沿線爲戰場，即膠濟鐵路亦間接波及。其他凡有鐵道之區域（京、滬、杭、江西及山西）若非交戰者之後方，即爲張學良所控制之東北，而張即在戰局勝負將決之際以鐵道運兵進入關內。

當中原之戰展開時，雙方均大規模的使用騎兵及砲兵。據蔣介石報告，當戰事最劇烈之際，馮軍每日發射砲彈二萬餘發，此項紀錄即日後抗戰時亦所未有。戰事延長五個月（一九三〇年五至十月），

蔣自承其部下死三萬人，傷六萬人，彼估計對方之死傷在十五萬人左右。日後中國之讀史者閱至此段很少人不憤慨填胸，即歷史家面對是項資料也感到難於下筆。

從近視界看來，不僅李、白（白崇禧）馮、閻禍國殃民，即蔣介石身為統帥亦難避免道義上之譴責。他的日記即可以用以指責他自己。有如：「時局雖有發展，一再離合集散，但策略難定。——聯此制彼或聯彼制此，皆非正本之道也。」（一九三〇年三月五日）又有：「已叛而未歸，反覆無常者，不必姑息，此輩蓋無所謂信義也；無論聯甲聯乙，與其聯人以落邊際，不如任其自鬥，我則整理內部，充足兵力，或使甲乙皆得歸順而不敢鬥也。」（一九三〇年三月八日。以上兩條均出《秘錄》而不見於《大事長編》。）

他所謂聯此制彼或聯彼制此，無非出錢購買，產生分化作用，他在一九二九年已數度行之。例如桂系白崇禧有兵五萬人，均係唐生智舊部。當白崇禧擬統率之沿津浦線南下，蔣予唐生智一百五十萬元，囑其收回舊部，旦夕之間白軍盡為唐所有。馮玉祥部集中於河南，可能東取徐州，南窺武漢，蔣策動其部屬韓復榘、石友三叛變，使馮前鋒盡失，只好狼狽走依閻錫山。可是這樣的策劃，可一而不可再。閻錫山之部隊原與蔣部無直接接觸，可是閻亦看透蔣之籌謀遲早必運用於其部隊，因此與其坐待其分化，不如先糾集接受其挑戰，甚至出面主持反蔣集團。他在一九三〇年二月致蔣電「禮讓為國」，「共息仔肩」，彼此同時離職出洋，雖說挖苦尖刻，其諷刺並非無的放矢。如上段蔣提及「非正本之道」，但卻未申明放棄不用。既稱裁軍，而又「整理內部，充足兵力」，亦不能專責對方無信義矣。

他之所謂「非正本之道」，則係其謀略只能延緩問題，不能解決問題。對方既被收買，當然亦知

蔣對他們的節操並未重視。所以其交結，亦不過一時之權謀。既然如此，一到局勢變化，他們之「叛而未歸，反覆無常」，徹底表現其軍閥性格也只是意料中事。況且蔣所謂「我則整理內部，充足兵力，或使甲乙皆得歸順，而不敢鬥」也仍是武裝中立的姿態，推廣之則利誘不成只有威脅。所以陳志讓云，蔣待人辦法經常有三個：一是感情上之激勸，一是金錢上之策動，還有一個則是武力上的制壓，和蔣本身所記極少出入。

然則若不如此，如何應付北伐成功後之局面？克勞浦在他的《二十世紀中國》書中說出：「集權於中央的建議，基本上不是不合邏輯。但是這在黨內久已被人反對。他們覺得在過渡期間須要地方上的高度自主。」然則在當日之情形下所謂地方上之高度自主，仍無非軍閥割據，亦即是克勞浦自己所說，「繼續著自袁世凱去世以來為害於中國的軍事老套」，既與國民革命的宗旨相違，看來也難能支持一個過渡時代，因據估計，自北伐以來，中國之軍隊已由原有之一百四十萬人擴充到二百三十萬人，軍餉已超過國家之全部收入。

在背景上，中國國民黨經過中央政治會議而控制國民政府，又在武漢、北平、開封、太原及廣州設有政治會議之分會，各在李、白、馮、閻及李濟深之掌握中。一九二九年內戰之展開，即由武漢分會任免湖南省政府主席而肇始。馮玉祥加入時則稱中央斷絕其經費，使之無法發餉。蔣致馮部下各將領則稱：「自北伐以來，魯、豫、陝、甘各自之稅款，平漢隴海等路之收入，中央悉聽馮氏請求，且每月由中央撥款五十萬元。討逆軍興後，尤特別補助，計四月份所撥達一百五十萬元，而五月十六日中央尚在滬撥付五十萬元。以中央今日財政之支絀，實已竭盡能力。」電內又提及馮「曾由武漢取得一百萬元」，自此才參加李宗仁等之軍事行動。從兩方爭執之內容看來，其範圍早已超過

局部津貼或收買可能解決之程度。



我們有了以後幾十年歷史之縱深，才可以窺見，當日蔣介石企圖樹立的新中國高層機構，期望其能干預到現代國民經濟，是一個極為宏遠的打算，實為中國傳統體制所無，尤非當日之財政與稅收可能望其項背。在創造期間，只有全國有志之士一體犧牲，並且要前後經營幾十年，方見實效。因為全中國歷史中缺此成例，其全部程序不能由當時人預度。即蔣本人，也只能暗中摸索，這也可謂其「暝眩瘳疾」之所自來（詳本書一六頁）。

中國在一九二〇年代已失去有效之中央政府。當日軍閥混戰情形，可與東漢滅亡後之分裂局面相似。三國時之人物角逐於中原，彼此都用道德名義矜誇，亦即是失去中樞主宰時各人自圓其說的惟一辦法。歷史家錢穆即稱其道德觀念過於窄狹，流弊所及則是虛偽空洞，只能支持地方政權。我們今日讀到一九二〇年代包括北伐後各將領的通電，也有類似的感觸。既然無從在此混亂的局面中以尋常的道德尺度品評人物，我們只能在解釋這段歷史時，注重其背景上廣範圍的人身因素及非人身因素。

當日內戰之繼續連互不斷，主要的原因由於農村經濟缺乏出路，過剩之人口，只有當兵為匪。《晉書》〈食貨志〉裡所說「袁紹軍人皆資榷棗，袁術戰士取給贏蒲」，亦即三國時代驅飢民作戰以至樹上採桑實，田裡捉蛤蜊果腹。這樣子雖不必在二十世紀全部照字面上做到，大概的情形已相類似。而且各省財政一般的極端困難也是實情。即在北伐期間，一部軍費尚來自鴉片公賣，有蔣介石

之文件證實。各軍欠餉，士兵嘩變，已間常發生。如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賀耀祖部補充旅曾在平江搶劫，十二月新收編之黔軍在宜昌劫掠。一九二七年唐生智往長沙第五陸軍醫院視察，有傷兵代表進見，請發欠餉。唐當場指責爲首之一人軍衣上領扣稱「風紀扣」者未扣，爲目無法律，令衛士就地將之鎗決，因此恐嚇辦法可以對欠餉問題未作答覆了事。然則這種高壓手段，亦只顯示其局勢之緊張。

同時各將領之行止，又經常因部下軍官之態度而左右。因薪餉低微，上級對中下級軍官喪病或家庭變故予以私人津貼之情形，經常有之。於是在指揮系統內產生個人關係。長期休戚相共之後，主官不能坐視部下失業。裁軍既影響集體安全，勢必遇到全面抵抗。

各省區與地域間亦有其內在的利害衝突。因爲方言不同，風俗習慣迥異，這種種因素藉著軍隊之統御經理、人事派遣、財政稅收，而產生爭執。廣西地瘠民貧，桂系將領刻苦自勵，不免產生道德上的優越感，即對鄰省粵系軍人亦不相入，蔣介石又聯此制彼，更增加他們彼此間及共同之對蔣猜忌。馮玉祥發動中原戰爭時，即號召北方人抵制南人。至於思想上及純粹政策上之差異，不占重要地位。當一九三〇年形成反蔣之大集團時，既有汪精衛以國民黨左派之姿態加入，亦有西山派以右派之姿態加入。各將領亦曾未對裁軍之大方針提出異議。

蔣介石此時不利之處，乃因他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具有創造性格。五權分立之政府既爲傳統體制所無，而其職權尙在擴大。其他各系將領既爲之「打江山」，北伐勝利後未見「論功行賞」，反要他們裁軍，釋去兵權，去南京居名譽職位。而且他對旁系將領已有嫌忌，更不得不培養人所謂之「黃埔嫡系」。總之則民智未開，人民亦缺乏社會上及經濟上之力量足以控制代議政治，軍隊則不知本身

的職責何在。是保境衛民，維持現狀的憑藉？還是推翻現狀，改造社會之工具？各將領縱有爲國爲民之共同宗旨，亦有個別的、局部的及附帶之意向。北伐完成後，共同的宗旨可以暫時置之度外，於是只見個別的意向抬頭。蔣介石此時可自稱毫無私心，他於中原之戰前在日記上寫出：「人民貧困至此，而某等尙欲謀亂，必使國亡種滅而後已乎！嗚呼，天如有靈，其必不使中華如此長亂也。中正如有自私不公，而所爲無益於黨國與民眾者，則當立殛余身而速其亡也，勿使重苦吾民則幸矣。」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一日）

這樣信誓旦旦的態度，不能謂其爲不誠，在傳統社會裡應當接受到廣泛的擁戴與支持。可是在新時代裡，這幾句話即可以用作攻擊他之憑藉。中文之「吾民」與外文之“my people”不同，有帝王口氣。即算蔣介石出口無意，他之以天下爲己任，也只是傳統道德。其否定各個人之意向，即與西方民主與自由之觀念相違。並且有益於黨國與否，全憑他一己及宗教上之靈感判斷，也潛伏著不顧群眾意見及輿論之趨向。所以反對他的集團所發宣言，不責備其違反傳統道德，而指斥其「專制獨裁，剝奪人民公私權利」。

然則此時人民已受軍隊劫掠，索餉之士兵則由將官一聲叱咤而處死刑，此時此刻公私權利是否存在？若是蔣介石專制獨裁，則馮玉祥、閻錫山與唐生智可以算作民主之發言人？所以歷史家至此已別無他法，只有如蔣廷黻之相信中國無從避免獨裁。蔣介石之作爲可以在將來誘導出來一個民主體制，此刻卻不能立即成爲民主。

英國十九世紀哲學家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所著《論自由》(On Liberty)爲經典著作，內有一段稱：「不用多說，此項宗旨(全民自由)只在人類行使之能力已經成熟之後才可實行……迄

至人類能用自由平等之談判增進「他們的生活」之前，自由之原則毫無用場。他們只好不作聲響的服從於一個查理曼或一個亞克巴。這是說：要是他們運氣好，有這樣一個「領導人」的話。」

查理曼與亞克巴之威權樹立於戰場。蔣介石是否能與他們等品位，仍須在戰場判斷。所以我們讀史至此，不能由我們的好惡先作判語，只能承認一九三〇年之中原大戰，有它內在的原因，是幾十年內憂外患之後所存積的一個令人窒息的局面企圖打開現狀的繼續表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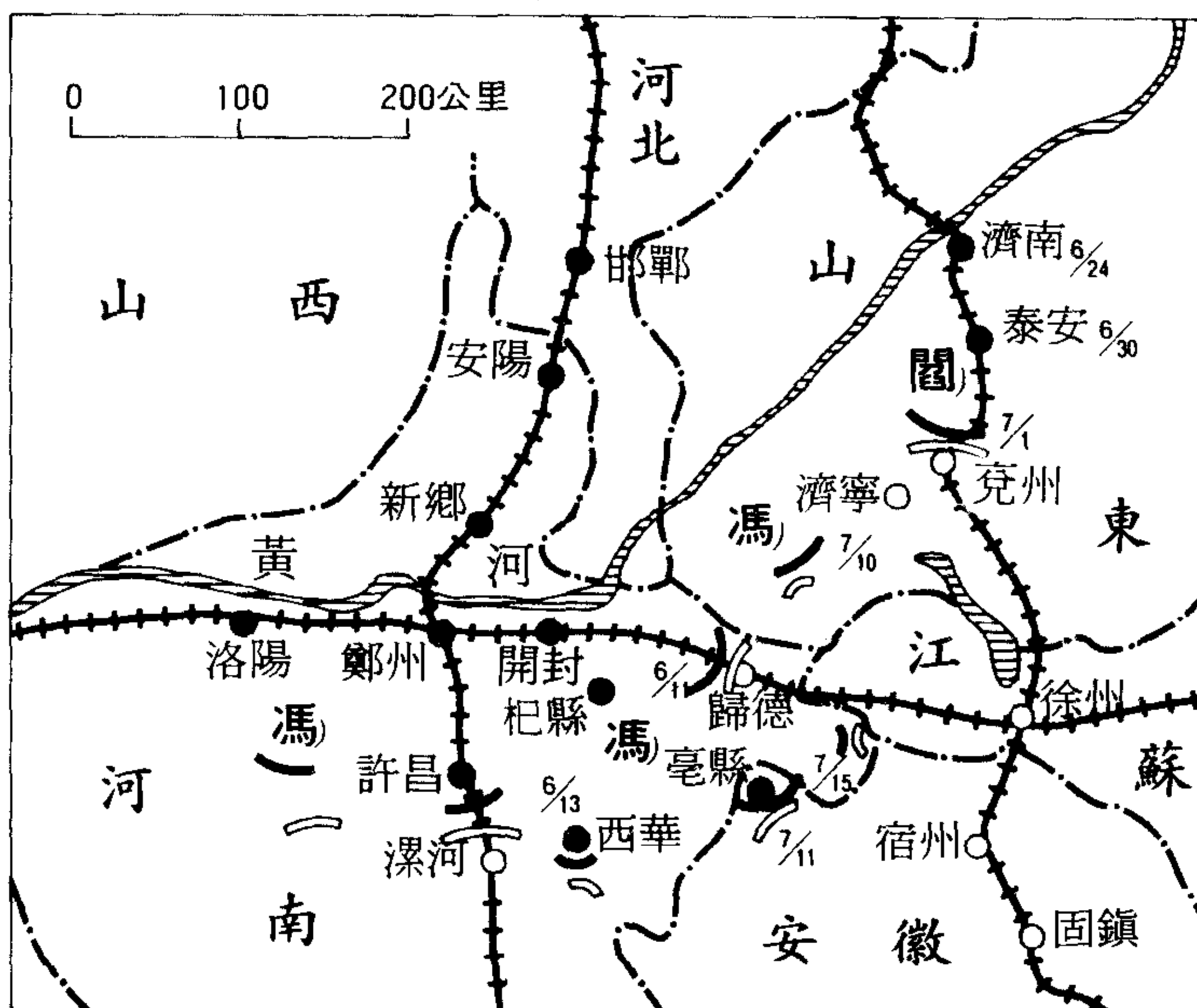


在日記上寫下向天發誓後之第二日，蔣介石又寫出：「此次討伐方略，須在戰略與政略上配合，而戰術則在其次也。先由襄宛佔領荆紫關，以通入陝之道，則戰略已大半勝利矣。」（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二日）

襄陽與宛城在湖北之西北，他這時候預想沿漢水上流入陝，有出敵不意，離開鐵道線，以大包抄的態勢，直搗對方巢穴的企圖。可是這預想無法實現。桂系與馮、閻已爭取主動。四月底閻錫山奪取天津海關，表示著他反抗中央的行動已無可折返。五月一日蔣介石發佈了他討伐的誓辭，中原大戰正式展開。

津浦鐵路在徐州與隴海鐵路相交，隴海西行至鄭州又與平漢鐵路相接。這一個大H字形上是一九三〇年主要的戰場。桂系在湖南用兵只有牽制作用。四月內蔣先在徐州舉行軍事會議，次在漢口舉行軍事會議。自五月十八日中央軍佔領歸德之後，此處為蔣經常駐在之所，有時司令部設在鐵道車箱內。並且蔣經常乘飛機西至漯河一帶巡視。六月二日他飛漯河後，曾低飛鄭州上空巡視，當地

中原之戰：圖示馮閻軍進展之最高潮 (1930年6月至7月)



馮玉祥軍配有高射砲，路透社發出消息，稱贛蔣行動勇敢。十日之後即有馮軍夜襲歸德之舉。據說「飛機大部被毀」。只是如此給蔣及時警告。當馮軍再襲入火車站時，蔣衛隊已有準備。

反蔣軍之戰略，以閻軍自津浦路南下，馮軍自隴海路東進，奪取徐州。同時李宗仁向湖南進兵，威脅武漢。六月初，李連陷衡陽、長沙、岳州。在漢口主持防禦之何應欽乃配合在湘江的海軍砲艇，調動粵軍，給進犯者夾擊。桂系南退，七月又在衡陽挫敗。桂軍只四萬人，從此對戰局不發生作用。只是在國民黨軍互相火併之際，共軍得以坐大。七月底至八月初，彭德懷部曾佔據長沙十日。政府軍不能在初期爭取主動，主要的由於前鋒多過去之雜牌部隊。把守濟南之韓復榘原為馮部叛將，當閻錫山部南進時，即不戰而放棄濟南，只向膠濟路東撤，脫離戰

場（日後在抗戰時他又如此，被處死刑）。五月中馮玉祥部東進，在平漢路留置部隊極少。蔣曾擬由南向北出擊，直搗鄭州，並曾在日記寫出：「彼以全力東侵，而對平漢線不留部隊，是可謂孤注一擲，並非膽大妄為也。果上天厭亂，必可為我一網打盡。」（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七日）其不能捕獲此種機宜者，乃因主持漯河、許昌戰線為何成濬，所屬大部為孫傳芳、張宗昌舊部，亦難能督成其冒險進取也。許昌即曾得而復失。

七月初可謂為反蔣軍進展之最高潮。閻部圍攻兗州城。中央軍企圖消滅亳縣之馮部突出部份則未能見效，馮之騎兵已出沒於微山湖之西北角，有與閻軍匯合之勢，中央軍在歸德之主力有整個被包圍可能。只是馮、閻、李三部時間上之會合，始終未能切湊機微。七月十一日蔣部生力軍陳誠之十一師投入戰場而兗州之圍解，閻錫山部自此只有退無進。七月十五日馮部不僅在亳縣獲勝，而且在河南省最東角安徽邊境進逼至徐州西南約八十公里處。然此時兗州之圍已解，閻部已退，蔣軍未致三面被圍也。

蔣記當日之情形有云：「當此之時，惟有堅忍鎮靜，維繫軍心，以待其定，而期有濟，若至萬不得已，惟有一死以報黨國。」（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五日）可見得其緊迫。此後隴海路及迤南仍經過一場劇戰，中央軍方能進入亳城，於是安徽無敵踪，蔣之側翼才算安全。他接續著又於日記中記出：「以後我軍後顧無慮，軍隊運用乃可自如矣，惟成功與失敗，常在一間，危險反可為安全之本，可不慎歟。」（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二日）蔣日後衡量將才，注重其雍容持重而不注重其高度敏感，因有他本身經驗在：「近年所得戰報每多危急，如無定力，未有不為所動者。無論接何急報，須休息五分鐘，再加審察，則真象漸明，心神亦定，不為所欺矣。」（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三日，此節見於《蔣總統秘錄》而

不見於《大事長編》。這種作風是我看到古今中外兵書及將領傳記之所未有，亦與蔣本人之秉性相違；但非如此，則他日後主持抗戰必難勝任。

他在亳縣勝利後，電報報呈中央，表示本人所在處爲歸德之西及杞縣之東之柳河鎮。文內已提及本軍番號內之十一個師，看來尙有未提及者。過去鏖戰十日之後，殲敵「足在一萬人以上」，有功將領六人則陞爲總指揮。北伐時原已將舊有之師擴充爲軍，至此中原之戰更將軍長擢升爲各「路」軍之總指揮，可見在名位上即已與原有裁軍宗旨相違。此次陞任總指揮六人中的一人爲楊虎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之西安事變時爲重要角色。在山東戰場蔣亦提及十個師和三個旅的指揮官姓名。

八月中旬中央軍大破閻軍，於十五日收復濟南。只是當時大雨不已，兩方在戰場上行動均感困難。在此前後，蔣均利用內線作戰之良機，將戰略單位超越省區調派，以遂行對敵各個擊破，如粵軍蔣光鼐、蔡廷楷各師，在擊敗桂系之後，即於役於山東戰場。在山東立功之陳誠師，在濟南克復後，調往平漢線，用在H字形上之西南支角。原在東北支角指揮戰事之劉峙，亦用在平漢線上左翼。尙有蔣認爲得意之作者，乃是八月初由後方抽出兵力一師，由海運在青島登陸成功。黃海海岸原受奉系海軍監視，迄至此時張學良仍對中原之戰武裝中立，但是既聽任此師登陸，則其中立之態度已不十分嚴格，蔣因之將此事記在八月三日之日記，提及：「無異奉方已參加中央戰線，惟未參加作戰。」但他又隨即警戒自己：「軍事瞬息萬變，吾惟戰戰兢兢，以期有濟耳。」

蔣及反蔣集團均前後彼此邀約張學良參戰，但是張一直待到局勢明朗，才於九月十八日發表通電擁護中央，並且派兵入關佔領平津，閻錫山殘部從此退返山西。中央軍亦不徹底尾追，以求擴充戰果，看來固然是補給困難，在河南之馮玉祥尙待解決，但是顧及張學良及東北軍在南北局勢中保

持平衡的力量，未嘗不為南京決策時考慮條件之一，有如當東北軍入關時，立即滙瀋陽五百萬元，並發表其將領為河北省平津各處地方首長為明證。

馮玉祥部失去各方支援後，仍表現西北軍之堅韌性。其在開封、鄭州、洛陽暨平漢線以南一個T字形地帶內，倚工事頑抗，支續至十月初。而且戰事結束後，其一部仍整師撤退至黃河之北。

中原之戰雙方動員一百四十萬人，其在各省尤以河南之破壞難以勝計。我人讀史至此，不免扼腕惆悵：要是此等耗費與犧牲能用以抵禦外侮，則他日匡救危難，又何止事半功倍？然則這種想法人情上固不可免，卻已忽視歷史上各種因素重重相關之性格。中國過去之存在，以文教為團結力量。二十世紀企圖組織一個新型的國家，能普遍的施行現代法律，保持地區間經濟之聯繫，不能避免再造一個中樞之威權。所以從技術著眼，中原之戰無非繼續軍閥割據、北伐興師之後之必要階段，以促進中國在實質上之統一。倘非如此，則由蔣介石出面代表之中央集權體系尚無眉目。而且此戰固為蔣之勝利，其去中央集權之期望仍極遙遠，蔣之日記已表示，作戰時困難超過於預期。中央軍擊破馮、閻主力之後，其所能確實控制之地區仍只有黃河以南近於北緯三十五度地帶，中央軍於十月三日入開封，六日入鄭州，九日而克復洛陽，蔣亦於同日飛返南京，表示其無意於向對方掃穴犁庭的清算，也只更表示問題背景之複雜，非盡當日交戰者所發通電及公告所能概括。

馮玉祥經此一戰之後，終身不再為問鼎中原之因素。然而西北軍雖不能保全其整個體系之完整，其部將如宋哲元、張自忠、韓復榘卻仍有各自控制省區及地方之力量。即閻錫山、李宗仁等一度被迫脫離根據地，亡命於他方，日後仍能返回省區重理舊業；而且中央之大後方如湖南及廣東，也漸落入何鍵及陳濟棠手中，尚且加強地方自主性格。

然以前四個集團軍割據一方，可能脅迫中樞，並與東北軍同時自辦外交之局面，則已藉中原之戰而打破。茲後蔣確保江浙地區，維持約三十個師之「嫡系」部隊，次用津貼方式控制一部份外圍部隊，對更外圍部隊則只要求名義上對中央之歸順，已造成一種新平衡。此種新平衡，亦在日後經過一段調整，如一九三五年因日本壓迫，將原駐平津之東北軍調往陝西剿共，其遺下之河北，則由宋哲元接管。可是從大局上講，這樣的大平衡一直維持到抗戰之前夕，抗戰開始時即以上三種部隊並中共人馬一併投入。亦惟因此種數量膨脹，質量馬虎之陣容，能配合中國農村社會之背景支續長期戰爭。

中原之戰亦間接增強了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地位。中國土地稅稅額極爲低薄，而且零星分割，只能供地方政府經理人員的開銷，爲中國不能迅速在行政上統一，立即現代化之一大主因。次之則其他稅收已盡爲十九世紀國際戰爭失敗後賠款借款之擔保。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遷南京時，首先即整理鹽稅，並且增加菸酒燃料等捐稅，曾遇到上海外商強烈反對（見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六日上海《字林西報》）。因謂鹽稅已爲一九一三年向五國銀行團善後大借款之擔保，不容另作支配也。

一九三〇年之宣佈關稅自主反而極少阻礙，因中原大戰初起時，閻錫山即截留北方鹽稅，並佔據天津稅關。天津稅務司亦封閉關口，於是進出口均不得通行，曾給上海外商甚大威脅。

當年五月，宋子文曾在歸德蔣軍司令部發露消息，稱國民政府軍費籌措不易，將進入財政危機。此舉出於非常，曾引起世界觀感之注意，《紐約時報》即作社論提及。蔣介石在軍中預言不久將獲勝利，亦與後方財政上之支持相提並論。至此國府奠都南京已三年，在外人心目中，已成爲穩定局勢之力量。蔣之軍費既大抵由上海等處商界承借或認購公債支付，至此外商亦不願其缺乏支持。



▲上海外報攻擊國民政府向商人納收捐稅的漫畫。

原則值兩抽釐，只有千分之一的稅率，但是關卡林立，小民負米載豬往市廛售賣亦被抽及，最妨碍農村商業之展開，而所得菲薄，多時僅夠關卡本身之開支，至此通令罷免，而代之以「統稅」。後者徵收止及於棉紗、水泥、火柴、捲煙及麵粉，以上均可駐廠徵取，為財政之重要改革。

中美關稅條約承認中國關稅自主，原在一九二八年七月簽定，然尚待與其他國家一體施行。一九三〇年五月，國府又與日本簽訂商約，以承認北京政府之西原借款為代價取得關稅自主。於是在十二月二十九日頒行新稅則，元旦即付諸實施，算是水到渠成。蔣亦在一九三〇年除夕記出：「雖經歷困難艱險，尚足自慰，免除釐金，固為最大成功，此外如今日發佈之大赦令，與國民會議代表選舉法，及宣告關稅自主等，皆為國家之要政，至討逆軍事之勝利，其餘事耳。」

「釐金」在太平天國起事時創辦，



當蔣介石記下上段年終結語時，他應當覺得得意稱心。中國近代史裏很少有機緣能使上層人物感到內外又安，可以與民更始。可是他沒有預料到即在此時，局勢的變化已將使他臨到莫大之打擊。實際上一九三〇年除夕之前一日，江西的「剿共」已經歷到第一次的大慘敗：「剿匪軍」前敵總指揮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率部一萬四千人向敵據龍岡附近山地前進，尚有五千人與主力隔離，致使其師部並所屬九千人被共軍四萬包圍，師長被俘後共軍將之斬首。其頭顱置放木筏之上，並具標幟，由贛江漂流而至政府軍地區。一九三一年初，蔣才在南京接獲失利消息。

當年二月，蔣又與胡漢民衝突。總理遺囑內原有「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的字句。蔣在河南軍中即已提議於國民政府召開國民會議，修訂約法，以便結束軍政，進入訓政時期。只是遇到胡漢民之堅決阻難。此事在旁觀者看來頗費理解，蔣既為國府主席又兼陸海空軍總司令理應維持現狀，以便繼續大權獨攬，胡則為國民黨元老之一，現任立法院長，理應贊成結束軍政，以便漸次施行民選民治。而實際上二人之爭執，與此背景大相逕庭。至此我人只能想像蔣介石多年軍馬馳驅，內政與外交均由其一手挈領，深望今後享有國民同意賦予之職權，不盡為黨內核心安擺控制，他尚可能覺得如此之名位，足以杜絕軍人叛變時動輒聲稱有民意支持之口實。郭廷以教授提出，當時蔣介石在國民黨及政府中竭力培植張學良之地位，被胡漢民反對。而且傳聞國民大會將制定總統選舉法，胡將與蔣爭總統。其實蔣於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已兼行政院長，以後又反對選舉總統，只主張由國民大會支持現有體制。

多年之後我們可以瞭解，中國最大的問題並非缺乏成文法，而是政府之後無新時代社會之架構，所以此時縱將各人權利與義務在紙面上分割詳盡，其執行時仍靠學誼鄉誼私人關係為轉移。蔣介石與胡漢民從政多年，何以尚有如是之爭執？是否彼此都覺得與一生宗旨攸關不容妥協？還是體面所在，爭執一經展開，即無法圓轉，以致兩敗俱傷？

結果國民會議於五月五日召開。除通過約法（以後內容如何始終未為人注意）外，又發表〈慰勉國民政府蔣主席文〉，內中讚揚蔣「振邁古之功勛，慰宇內之祈望」，「居政府則宵旰宣勤，在陣戰則躬冒矢石，如此曠古之辛勤，允為史乘所罕見」。可是接受如此之恭維，蔣已將付出至大之代價，當他與胡漢民爭執不下時，他一怒而拘禁胡於湯山，國民會議在此情形之下召開。國民黨監察委員四人，包括以後被選為國府主席之林森，已提出對蔣之彈劾。粵籍中委在廣州召開非常會議，有陳濟棠及桂系軍人支持。當他們另組政府時，儼然有當年孫中山南來景象，而他們也準備北伐。

這內戰再起姿態，不因九月十八日日本關東軍佔領瀋陽而改變。蔣恢復胡漢民自由之後，胡即逕赴廣州，再未北來，仍堅持必須褫奪蔣之職權，開除其黨籍，蔣不得已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離本兼各職。

而且這一年內剿共戰事也遇到接續的失利。原來自一九二七年以來，毛澤東樹立井崗山之根據地，朱德等人在南昌兵變，以及紅軍成立三個軍團，在江西創蘇維埃區，全在蔣介石之視聽集中於他處的時候。現已公佈之文件無從窺見蔣已立即發現事態之嚴重性。直到他離開中原戰場之次日，即一九三〇年十月十日，他在南京發表〈告全國同胞文〉，才指出「肅清匪共」為當前五樁要務之一（其他為整理財政、發展經濟、澄清吏治、推進地方自治），並於十二月七日往南昌巡視，可是將共軍與匪

並列仍有輕視敵人之態度。而且將巡視後，只限期規復被共軍佔領之地區，不待軍事行動之展開即離開江西。

〈告全國同胞文〉提及剿共之方略：「一面劃定區域，責令分區各負全責，以杜泄沓推諉之風；一面仍定整個會剿計劃，務使剷除根株，以絕各自爲謀，此剿被竄之弊。擬自討逆告終之日起，期以三月，最多半年，限令一律肅清。」所述三月即將於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屆滿，可見得限期之迫切，而且軍事行動，著重保持各地區治安之完整。他又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發出通令，責成各縣長堅守縣城，「如有放棄縣城任匪佔據者，必照軍法從事」。可見得至此他完全忽視對方可能集中全部兵力，取得局部數量上之絕對優勢遂行各個擊破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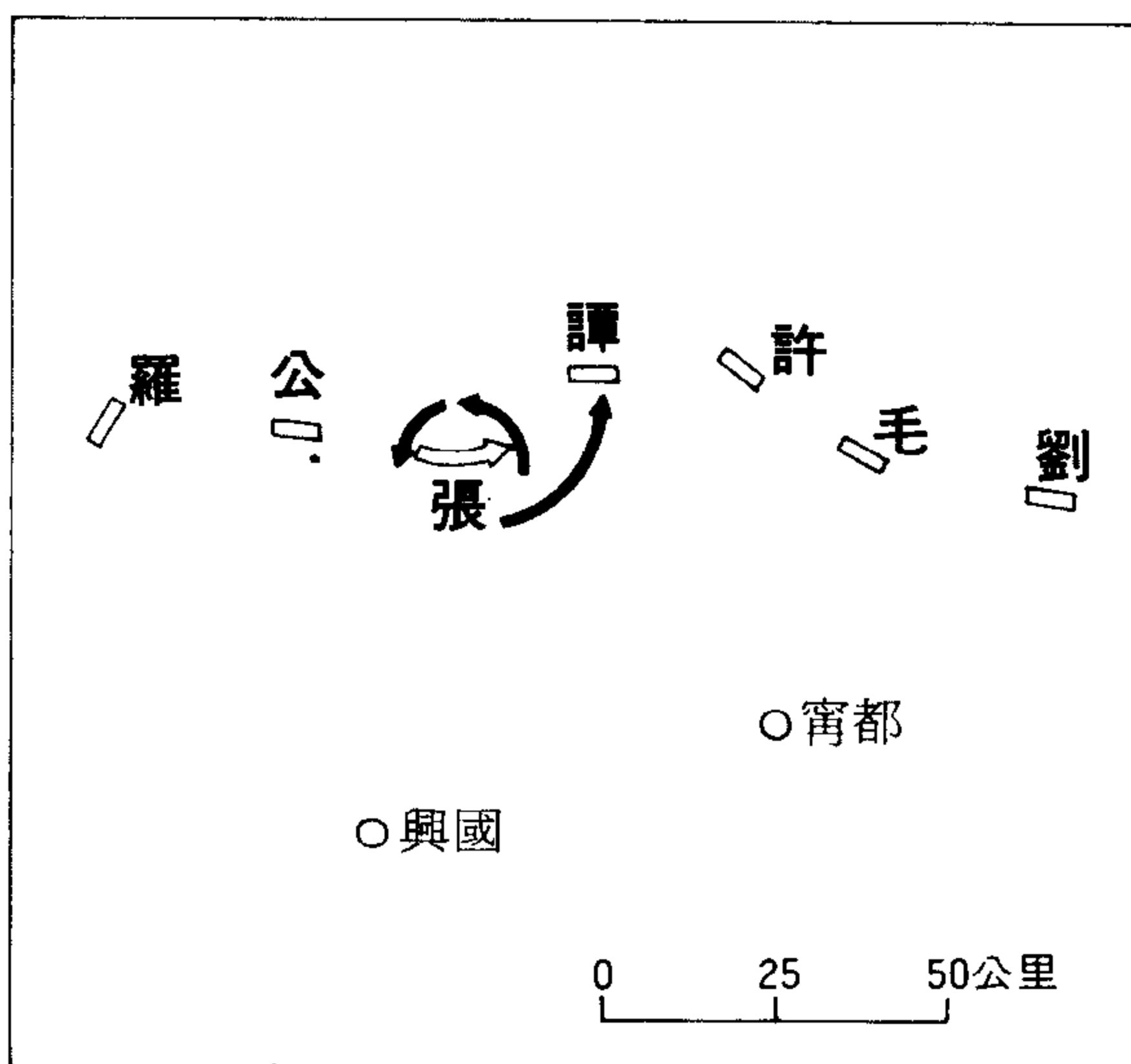
第一次圍剿開始於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兩日後張輝瓚即佔領龍岡，此爲四面環山之窪地。並且時過冬至，晨昏有濃霧。當地的居民則已全部被共軍引入山區。次日拂曉之前，張師已被敵重重包圍。原來張師由西至東，在國軍陣線上突出，其進展時沿途已被共軍監視。次日戰鬥時，其東北西三面遇敵，南方則爲高峯。這戰役經過在一般軍事史內甚爲罕見，倒與一六一九年清太祖努爾哈赤擊破明軍時先消滅杜松一路極爲相似。

張輝瓚兵敗被俘之後，國軍其他各師後撤，第一次圍剿不及一周而結束。郭廷以綜合紅軍勝利原因云：「一由於訓練有素，官兵一體；二由於民衆組織嚴密，與紅軍通力合作；三由於國軍進剿爲紅軍存亡所繫，必須死中求生；四由於戰術靈活，處處主動，集中兵力，以衆擊寡；五由於戰場地形複雜，易於掩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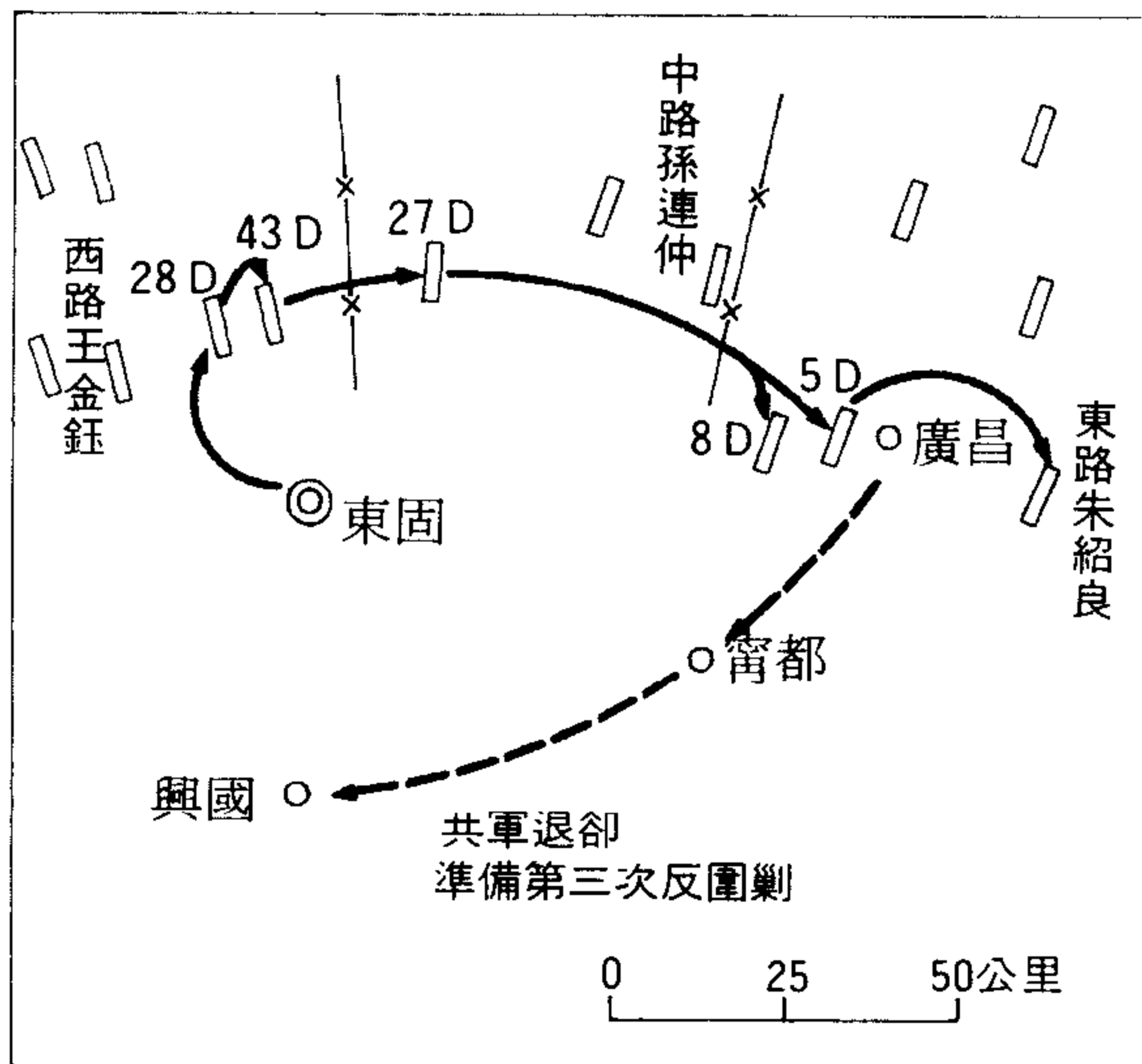
毛澤東於一九三六年著《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內中檢討著五次「圍剿」與「反圍剿」的大概

經過。他以戰爭指導人的地位，表示曾未經視對方的能力。他寫出：「須知敵人統帥部，是具有某種戰略眼光的，我們只有使自己操練得高人一等，才有戰略勝利的可能。」又他縱未明白承認，他所敘表示著共軍在敵後有精密的間諜網。凡國軍部隊長姓名，所屬私人關係之系統，是否屬於蔣之

第一次反圍剿示意圖
(根據毛澤東《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



第二次反圍剿示意圖
(根據毛澤東《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並參考《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



嫡系，士氣如何，由何路前進，他都有預報。綜合第一次圍剿開始的情形他說：「進剿軍不過十萬人，且均非蔣之嫡系，總的形勢不十分嚴重。」所以他自信紅軍的四萬人足能對付。

他在敘述這次戰役時，提及對方的七個師長爲羅霖、公秉藩、張輝瓚、譚道源、許克祥、毛炳文和劉和鼎。但是羅霖須防守贛江以西，劉和鼎在福建境內，都不可能產生決定性的作用。惟有張、譚兩師是圍剿軍總司令魯滌平的嫡系，倘使他們與公秉藩三師集中，「不易決勝」。紅軍「先想打譚道源，僅因敵不脫離源頭那個居高臨下的陣地。我軍兩度開進，卻兩度忍耐撤回，過了幾天，找到了好打的張輝瓚」。毛的要訣爲「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戰略問題》裏面說及：「機會總是有，不可率爾應戰。」至此也可看出國軍組成複雜，戰法不一致，遲早必有一部暴露其弱點。毛的集中於重點則符合他以下所說的「對於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於敵，擊潰其十個師不如殲滅其一個師。」當張師被殲滅而國軍其他各師後撤時，紅軍又給譚道源師相當的打擊。

第一次圍剿從初戰至結束只一星期。第二次圍剿據國軍的紀錄，自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開始至五月二十七日結束。可是毛之所謂「反圍剿」，始自五月十六日，結束於三十日，一共十五天。國軍十五個師，總數二十萬人，以何應欽爲總指揮。所部「和第一次圍剿時一樣，全部是蔣之非嫡系部隊，以蔡廷鍇的第十九路軍，孫連仲的第二十六路軍，朱紹良的第八路軍爲最強，其餘均較弱。」其實國軍之二十萬人，由十五個師編成。孫連仲之三個師爲馮玉祥舊部，六個月前尚在中原之戰與中央軍爲敵，王金鈺之六個師，兩個師之主力爲孫傳芳舊部，另兩個師亦最近以北方部隊編成，調來不久，其官兵對共軍特別畏懼，毛澤東已準備給以最先打擊，又此十五個師亦有缺員者，又擔任側翼警戒、後方勤務等，大概只十萬人實際參加戰鬥。毛所謂共軍三萬人，則加入輔助人員等，必

遠較此數爲多。所以兩方人數對比不如所敘之甚，但是共軍以少抗多，必須集中兵力，取得戰場上局部數量之優勢，則無可置疑。

紅軍根據地爲寧都及興國，兩地相距約七十公里，因前面臨雩山山脈，國軍兩次展開時均在一個弧線之上，與共軍成扇形。第二次圍剿時國軍鑒於第一次之失，採取步步爲營之方針。但是共軍全部主力集中於興國之北，始終未爲國軍發覺。至於兩方紀錄對戰役日程有巨大之差異者，乃因共軍在靜候國軍戰術上之失策。毛澤東寫出「我軍進到東固（興國正北五十公里），僅因等待王金鈺脫離其富田（東固西北約二十公里）堅固陣地，寧可冒犯走漏消息的危險，拒絕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議，迫敵而居，等了二十五天之久，終於達到目的。」

紅軍於五月十六日開始攻擊後，「十五天中走了七百里，打五個仗，繳鎗二萬餘，痛快淋漓的打破了圍剿」，這所記大致由《大事長編》證實，《大事長編》提到剿匪「失利」的有第五、第八、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和第四十三共五個師。第五師師長「受傷殉職」，第二十七師「損失甚重」。至五月二十七日，「我軍乃撤至進剿前之原陣地，第二次圍剿遂告中阻」。

紅軍戰略爲在王金鈺之左翼突破後，以大迂迴的姿態，自西至東蛙式躍進，沿途打擊國軍之素質較低各部隊，可是十五天之內經過五次戰鬥，而仍保持大部隊每日進展二十三公里之速率，其必利用集中之兵力的衝擊力量，對敵作個別的奇襲。既繳鎗二萬餘，則勢必亦因糧於敵。至於倚賴俘獲之彈藥補充，似亦不在話下。大部隊「迫敵而居」達二十五天之久始終未走漏消息，也可見得其所能控制之地區管理之嚴格。凡此都可以看出紅軍鋌而走險，孤注一擲之性格。《戰略問題》所提供最重要的消息，均在不言之中。至此我們無從否定政治工作人員在軍中之重要。毛行文所及隱現著

他自己隨軍在前線指揮，此點經俘虜供辭證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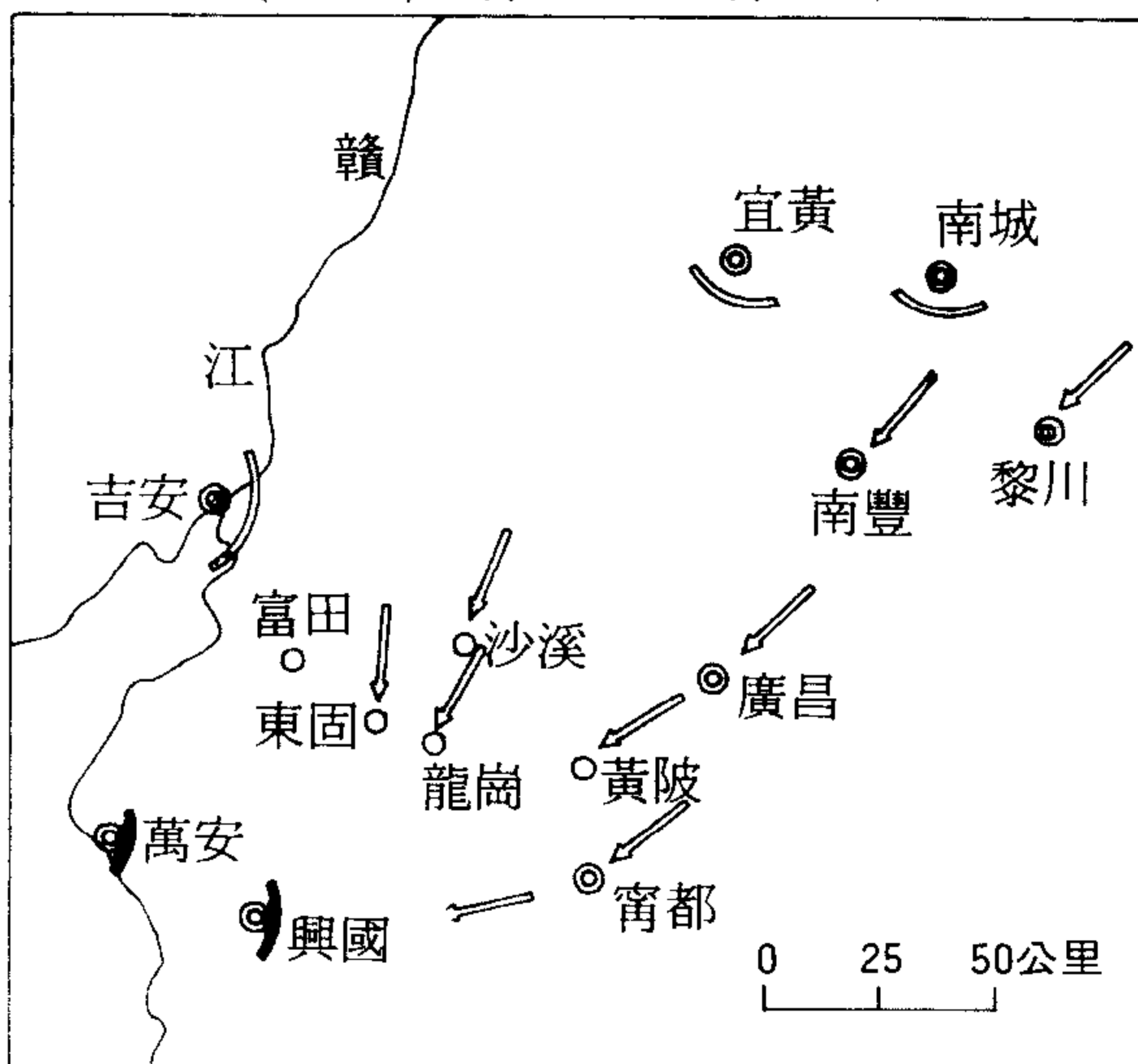
關於第三次反圍剿，毛澤東寫著：「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圍剿的戰役，「我們」都從容不迫的對付敵人。惟獨第三次戰役，因為敵人經過第二次戰役那麼慘敗之後，新的進攻來得那麼快（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我們結束第二次反圍剿的作戰，七月一日蔣介石就開始了他們的第三次圍剿），紅軍倉卒的繞道集中，就算得十分疲勞。」

他又提及這次圍剿蔣自任總司令。「進剿軍三十萬人，主力軍是蔣嫡系之陳誠、羅卓英、趙觀濤、衛立煌、蔣鼎文等五個師，每師九團，共約十萬人。」「進剿戰略是長驅直入，大不同於第二次圍剿之步步為營，企圖壓迫紅軍於贛江而消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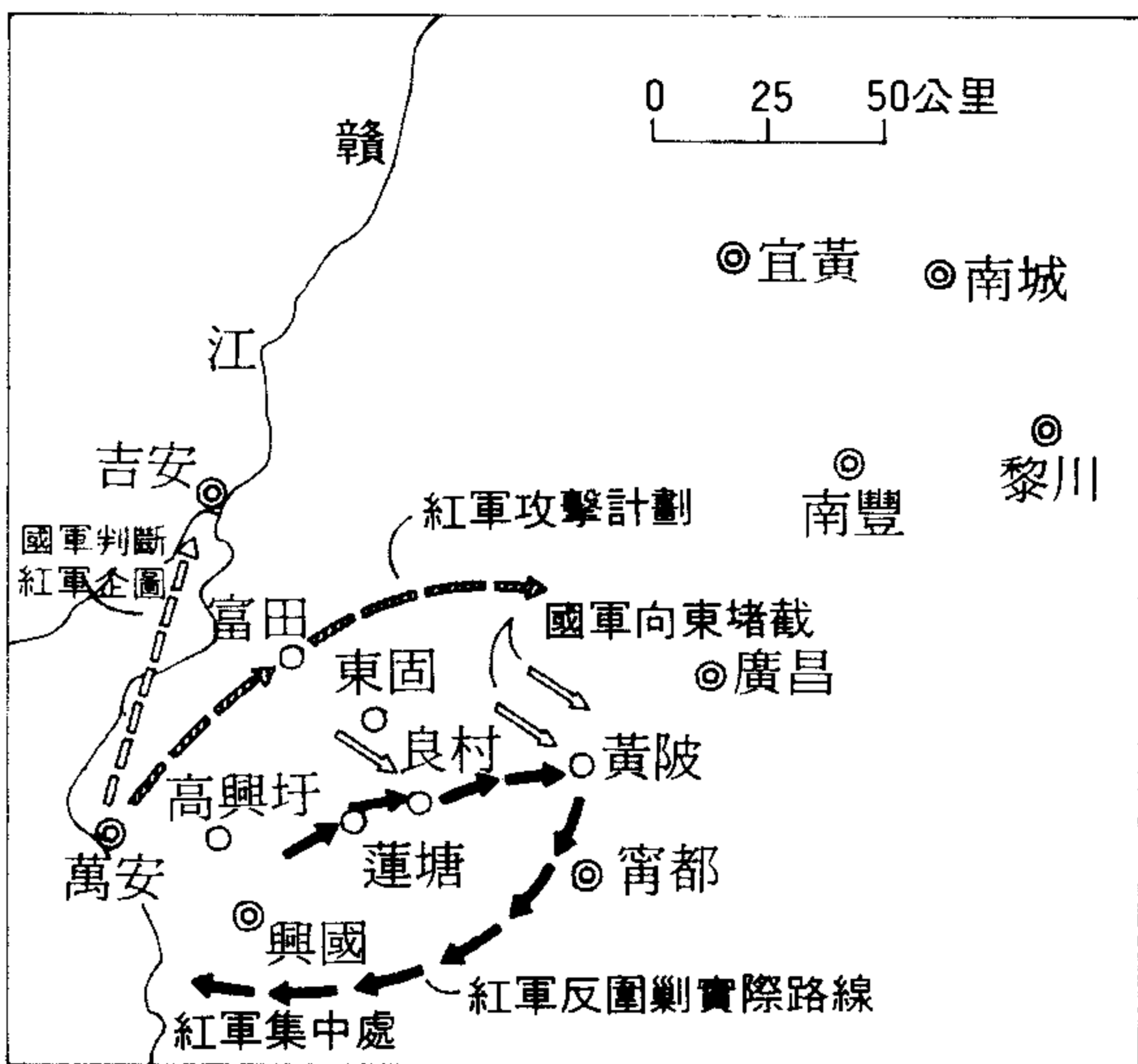
七月初攻勢展開時，國軍之重點在左翼。蔣介石於七月六日至南城，八日至南豐，逗留到十二日。他在日記裏寫下：「康都下後即攻廣昌，廣昌下後，即攻寧都、興國，贛匪不足平矣。」（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二日）這時候他表示著充分的樂觀與自信。果然不久在十四日寧都又繼黎川與廣昌為國軍收復。他們繼續向興國進逼。迤北的部隊又收復黃陂、沙溪、龍崗、東固。至八月四日進入興國時，好像共軍根據地都已廓清。這時候看來的一個可能性，則是對方可能渡贛江而北犯吉安。所以蔣又於七月二十七日親往吉安，逗留一日。我們再看毛澤東的敘述：

紅軍苦戰後未休息也未補充（三萬人左右），又繞道千里「從第二次圍剿時進至的廣昌東北以至福建境內」，回到贛南根據地西部之興國集中，時敵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況下，我們決定的第一個方針，是由興國經萬安突破富田一點，然後由西向東向敵之後方聯絡線上橫掃過去，讓

第三次圍剿示意圖：國軍攻勢
(1931年7月1日至8月4日)



第三次反圍剿示意圖：紅軍反攻
(8月8日以後)



敵人主力深入贛南根據地，置於無用之地，定此為作戰之第一階段。及敵回頭北向必甚疲勞，乘隙打其可打者，為第二階段。此方針之中心為避其主力，打其虛弱。但我軍向富田開進之際，被敵發覺。陳誠、羅卓英兩師趕至。我不得不改變計劃，回到興國西北的高興圩，此時僅剩此

一個圩場及其附近地區幾十個方里容許我方集中。集中一天後，乃決計向東面興國縣東部之蓮塘、永豐縣南部之良村、寧都縣北部之黃陂方向突進。第一天乘夜通過了蔣鼎文師和蔣、蔡、韓軍間四十華里空隙地帶，轉到蓮塘。第二天「八月六日」和上官雲相軍（上官指揮他自己的——個師及郝夢齡師）前哨接觸。第三天打上官師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夢齡師為第二仗。爾後以三天行程到黃陂打毛炳文師為第三仗。三戰皆勝，繳鎗逾萬。此時所有向西向南之敵軍主力皆捲旗向東，集中視線於黃陂，猛力並進找我作戰，取密集的大包圍姿勢接近了我軍。我軍乃於蔣、蔡、韓軍之間一個二十華里間隙的大山中偷越過去，由東面西到西面之興國縣境內集中。及至敵發覺西向時，我已休息了半個月，敵則飢疲沮喪，無能為力，下決心退卻了。

蔣並沒有完全否定這段記述。他在蓮塘之役後寫下：「剿匪之難，甚於大戰，蓋彼利用地形之熟識與脅從之民衆，避實擊虛，隨所欲為，而官兵則來往追逐，疲於奔命。余細思之，如欲剿滅赤匪，決非一朝一夕之間所能成功，惟有集中兵力，構築據點，開闢道路，使匪無所藏匿，不得竊發，而我之官兵，則行動自如，如是乃可制其死命也。」（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二日）

可是第三次圍剿並沒有因蓮塘、黃陂之役而結束。國軍仍繼續向共軍活動區域搜索前進，並且一度於九月九日佔領瑞金。毛澤東在《戰略問題》裏面敘及：「我又乘其退卻打了蔣光鼐、蔡廷鍇、蔣鼎文、韓德勤，消滅蔣鼎文一個師。對蔣光鼐、蔡廷鍇兩師，則打成對峙，讓其逃去了。」這和國軍的紀錄有很大的出入。即是《戰略問題》裏面也說及一九三一年八月在江西興國縣高興圩地區打十九路軍（即上述蔣光鼐、蔡廷鍇兩師），紅軍「吃了兵不集中的虧」，看來是被國軍打敗，損失甚重。

至於國軍之退卻，並非「飢疲沮喪，無能爲力」，而是因爲反蔣中委在廣州組織政府，興師北伐，已於九月初侵入湖南之祁陽。蔣抽調各師包括第十九路軍在內，於九月九日至十一日間往湖南堵截，而一個星期之後，復有「九一八事變」，日軍佔領瀋陽。

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九月間，蔣介石繼續奔波於南京、漢口、南昌之間，並於八月十八日在上海參加其岳母宋耀如夫人之喪禮，九月十四日在南京接見日本新任公使重光葵。他在當年最後一次往南昌督視對共軍軍事，事在九月十九日。抵達南昌後，方悉瀋陽事變，即於次日返南京，至此圍剿計劃才算被放棄，但是局部軍事行動仍持續至十一月初。至十二月十五日，蔣再度辭職時，江西之軍事行動方爲停頓。

而且又不止此也。當年十二月孫連仲往南京養病，其參謀長趙博生在寧國率旅長二人及其部隊投共。孫之回憶錄云：實際附敵者不過二千人至三千人，但孫所掌握之原有三個師，事後只能縮編爲一個師及一個獨立國，顯見得投共人數，可能接近外傳之二萬人。

我們雖注重大歷史，仍不能忽視此種之特殊情形。郭廷以書中敘第三次圍剿即云：「兵力約二十萬人，參加戰鬥的約十三萬人，半數爲中央軍，並出動空軍，蔣躬自督戰，十餘日間以雷霆萬鈞之力，急進猛攻，連克要城，深入蘇維埃區，宣稱十天之內可盡收復失地，肅清散匪。」及提及戰役之結束則云：「國軍主力自江西西調，紅軍跟踪攻擊，爲蔡廷鍇軍所敗，損失頗巨。此爲圍剿以來的一大勝利，可見得紅軍並非特強，時蔣的注意力集於粵、桂軍，放鬆了紅軍，「因」九月十八日日軍之突襲瀋陽，更無法再對紅軍進攻，第三次圍剿完全停止。否則紅軍侷促於南北東西不及二百里的山區，久戰力疲，不僅不能乘勝追擊，以其有限的物力人力，如果戰事持續，最後勝負正不

易言，所以中共對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並不特別強調。」

蔣介石之辭職，原由於國難當頭，南京召開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四屆一中全會），希望粵中代表放棄另組政府，一體出席。但胡漢民等通電，非蔣下野，解除兵權，無妥協之可能。蔣辭職後，四屆一中全會如期召開，選舉林森爲國民政府主席，但又推舉蔣及胡漢民、汪精衛爲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均未到任）。至是才結束多災多難之一九三二年（當年東南大水）。日軍則於除夕之前準備攻佔錦州，完成東三省之佔領。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淞滬戰事爆發後，中央政治會議又任蔣爲軍事委員會委員。至是除軍政部長（何應欽）及參謀總長（朱培德）外，仍無軍事上之領導人。至三月六日政治會議復推蔣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從此國軍不設總司令，蔣以「委員長」名義重掌軍權，至抗戰之前後亦仍如是。

迄至一九三二年五月，蔣介石未預聞剿共軍事。即其再度主持進剿時，其本人所主持之部份仍限於長江以北，湖北、河南、安徽間地區。緣在江西紅軍擴充時，張國燾與徐向前亦在鄂、豫、皖邊區發展，糾集紅軍四萬人、赤衛軍約二十萬，足以威脅武漢。經蔣圍剿後，被逼入陝西南部、四川北部。蔣至此間軍事告一段落後，方往江西，所以第四次圍剿在一九三二年底之前才準備停當，於一九三三年初展開。

關於第四次圍剿及反圍剿，毛澤東所敘非常簡短。他說：「第四次圍剿時的情況是：敵分三路向廣昌進，主力在東路，西路是暴露於我面前，且迫近我集中地。因此，我得以先打其西路於宜黃南部地區，一舉消滅李明、陳時驥兩個師。敵從左路分出兩個師配合中路再進，我又消滅其一個師於宜黃南部地區。兩役繳鎗萬餘，這個圍剿就基本打破了。」這段敘述也大致由國軍紀錄證實。國

軍「失利」的爲第五十二師及五十九師，他們於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在宜黃以南「遭匪伏擊，傷害重大」，「師長李明殉難」。而且三月二十一日，又有第十一師並附第九師及第五十九師之一旅在東陂（宜黃正南四十公里）「剿匪失利」，師長蕭乾負傷。可是這也由於日軍進佔熱河，蔣介石於三月初北上，他自己也承認「此次剿匪挫失，短期內必難進展。且各將皆屢求北上抗日，故亦無鬥志」（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出人意外的則是蔣介石遇到國民黨內內訌之困難時，毛澤東也遇到共產黨內爭執的困難。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好像與國民黨四屆全國代表大會對壘，中共也在赤都瑞金召開「贛南會議」。除了七日以後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推舉毛澤東爲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外，更重要的乃是一至五日的中央蘇區第一次大會。一九六七年出版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說及此「會議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指摘爲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主義」，強調「集中火力反右傾」。

換言之，自一九二七年在井崗山組織紅軍部隊以來，至此四年餘，毛澤東的戰勝取攻，也有半個職業軍人模樣，今後他必預接受黨的領導。過去毛之戰鬥指揮，保持部隊間之流動性，不惜在短期間內放棄根據地，在捕捉敵方弱點時空巢來犯，主要的用兵方向，只有一個。可是「打爛纒纒罐」（爲害無辜小民）並且翻來覆的只在舊地打轉，看來亦無前途。消滅地主殘餘也不徹底。至此他已受得中共國際派初以周恩來爲首，次有秦邦憲、陳紹禹諸人參加的批判。今後紅軍的策劃，「禦敵於國門之外」，「兩個拳頭打人」，希望兩頭獲勝，甚至「六路分兵」，「全線抵禦」（引號內辭句均出自毛澤東）。

在上項政策實施時，適逢蔣介石於一九三三年復至南昌。當他發動第五次圍剿時，注重建築碉堡，使對方之流動性失其效用，而且可以對蘇區實施封鎖，斷絕其醫藥及食鹽之供給。據毛澤東說，此意見由「國民黨反動將軍柳維垣」提出，後有戴岳的支持，為蔣介石採納，在廬山軍官訓練團宣佈施行。

對於第五次圍剿，毛澤東只有如下的概述：「敵以堡壘主義的新戰略前進，首先佔領了黎川，我企圖恢復黎川，去打黎川以北敵之築「堅？」固陣地和北區之硝石，一戰不利；又打其東南之資溪橋，又不勝；爾後輾轉於敵之主力與堡壘之間，完全陷於被動地位。終第五次圍剿一年之久，絕無自主活躍之概，最後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據地。」

一九三四年之春夏，共軍與陳誠所指揮之國軍部隊在黎川、南豐、廣昌之間激戰，損傷慘重。國軍所築碉堡初以千計，後以萬計，「三里五里一進，十里八里一推」（也是毛的辭句），以致蘇區根據地日為狹蹙。在突圍開始，「二萬五千里長征」之前，毛澤東曾提議「紅軍主力無疑地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不著說，這計劃未被中共中央接受。



蔣介石與毛澤東都不失為一代人傑，他們決心獻身革命，就各依己見的在特殊環境裏獲取到領導權，以後即鏗而不捨，無論如何困難，總不放棄初衷，在這方面兩人有相似之處，第五次圍剿的

過程中因著毛之敘述，也可以看出蔣介石之行動的梗概。

至於毛澤東所謂馳騁於長江三角洲及閩贛省會之間，是否事實可行，甚成疑問，尤其太湖區域蘇杭之間，水道交通便利，共軍以山地行軍所造成之優勢甚難在此際發揮。以當日政工人員之能力，亦至難管制此間之人口。總之毛澤東一手創設之紅軍有濃厚之農民軍性格，見長於內陸腹地，得力於社會情形之均一簡單，維持三萬至五萬之最大數額，可以在戰略上取守勢，戰術上取攻勢，全部集中使用以出敵意表。若違反此原則，則其效率降低。這種情形在江西表現，也在豫鄂皖戰場表現。至於日後人民解放軍之行動，則已情勢轉移。

揣測未經施用之步驟理想上之功效，非大歷史著眼之所在。只是如上之分析，可以使我們看出毛之運動與中國社會之基層接近。「長征」無非是輾轉於內地山川人文最不通暢之處的一陣大流徙。紅軍核心人物能在一年餘艱苦流離的條件下生存，表示著他們與基層接近之長處。可是他們「打爛纜纜罐罐」尚只是改造中國基層組織之初步。此時看來，確有英雄主義、浪漫主義，而不脫盲人瞎馬的蠻幹姿態（也與蔣介石自謂「瞑眩瘳疾」的姿態相似）。當日中共中央站在歷史之前端，怪不得要責難毛澤東。

在《戰略問題》裏，毛澤東指出國民黨「已改造了它的軍隊——改造得和中國任何一個歷史時代的軍隊都不相同」。而且其軍隊數量之多，超過中國任何一個歷史時代的軍隊，超過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常備軍。他沒有想出這是他給敵手蔣介石最大的恭維。這幾句話也和我們認為蔣介石已替中國開創一個新的高層機構之著眼至為接近。

可是此時距蔣介石在黃埔開始建軍不及十年。一切尚在流動狀態之中，只能以戰場為實驗室。

而且這數量多的軍隊大部仍是過去軍閥部隊改編而成，後面既無支撐它的社會架構，也缺乏新的軍需財政體系，因之也極難維持，經常此服彼叛。蔣介石企望擴充他的人身威權，則反被指斥爲獨裁者，尙受到黨內之彈劾。



遠在一九三〇年之際，蔣介石即已在日記中寫道：「無父無母之身，又過一年矣。」這種自我憐惜之態度非常奇特。他這時四十三歲，有妻有子，任國府主席，兼陸海空軍總司令，剛指揮百萬大軍在中原之戰獲勝，不久之後尙且將一位黨國元老（胡漢民）監禁，又在他部屬處理之下將一個舊日同事（鄧演達）判死刑。有了這樣生殺予奪之大權，手掌兵符，叱咤風雲，爲何尙且自傷身世，以孤兒的身分自命？

然而此句之後尙有下文。其全段讀來爲：「無父無母之身，又過一年矣。人只知我體面尊榮，誰知我處境之痛苦乎？若非爲國家爲民族爲主義，則此身可以遂我自由。今不知何日始可以清白之身還諸我生者。詩曰：『毋忝爾所生。』我其以此自念哉？」（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全段的意義則是不由自主，他和他最仰慕的張居正一樣，只能認定「己身不復爲己有」，即做國府主席與陸海空軍總司令也不過是遂行革命、執行政策的一種工具，與他本來面目的蔣介石不同。他稱後者爲「清白之身」。只因不能享受此清白之身的自由，才眷戀生他之父母。可是另一方面若是恣意於人身自由，卻又辜負了出生的真意義。

蔣介石沒有明白道出，他所創造的高層機構，以龐大的軍隊爲主體，因缺乏適當的架構在後支

持，他只好以自己的人身抵擋，他所主持的政治大率都是人身政治，於是才有與胡漢民等的各色糾紛。他在軍隊裡的統御經理，也經常帶著靠人身關係維持的色彩。例如一九三三年長城戰事吃緊時，他自己秘密北上（詳本書一三一頁），即電邀何應欽同行（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於是他的軍政部長日後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北平行營主任之名義，甚至以「代委員長」之名義，主持幾個省區間之政務。他又責成陳誠在自己不在時，對江西剿共的軍事負責（三月六日）。如此處理全國軍政，有如黃埔之校務。

中原之戰後不久，他令宋子文北上與張學良洽商（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至十二日後，宋南返復命，其間經過詳情迄未公佈。但是據以後任華北財政特派員之甯恩承之回憶錄道出，此職位名屬財政部，實由張學良派出，下轄河北、山西、綏遠，與察哈爾四省之統稅、礦稅、菸酒稅與印花稅，並撥發四省之軍費與政費。此亦係蔣氏高層機構之一部份，其協定必由張、宋協商而達成。否則張學良主持戰後馮閻軍之編遣，即不可能如是迅速成功（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八日）。從各種跡象看來，類是之半公開處理的情事必多。蔣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因林森、胡漢民等壓力，辭去本兼各職時，曾「迭接各軍師長電以軍費多未領到，膳食無法維持」。他也在日記裏提及：「財政不充實，何以爲國？何以禦侮？當力圖之。」（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可是軍師長因平常軍餉之不繼，不按程序向軍需機構催問，而打擾業已下野之總司令，而此已卸職之總司令也不推說應由繼任人負責，而竟承當「當力圖之」。可見一切草創伊始，尙無從脫離人身掌握。

事既如此，其經理即無從合法，因合法必有成例可循。因無固定之經費，亦難能合理，蔣介石因此中蹊蹺，經常被指責，爲排斥異己，犧牲其非嫡系，甚至以毒攻毒，任共軍消滅各雜牌部隊。

第十九路軍出於粵系，在他指揮之下頻年轉戰南北，無役不從，又在淞滬抗戰而載譽內外。最後在福建不顧蔣之剿共指示，並與共軍訂立協定，成立「人民政府」（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陳銘樞多年爲蔣奔走於南京與廣州之間，調解南京與粵籍軍政領袖間之糾紛，至是亦以第三黨名義加入此反蔣運動。而蔣介石則堅持惟安內始能攘外，並且他自恃惟有他一己才能達成此任務。九一八事變後不久，他即已在日記中寫出，著重他個人所可發生的決定性之影響，有「萬人皆醉我獨醒」之氣概，原文如下：

此次對日作戰，其關係不在戰鬥之勝負，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長，與夫國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國民固有之勇氣與決心早已喪失殆盡，徒憑一時之興奮，不具長期之堅持，非惟於國無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慮，無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與人格，以及革命精神與主義而已。是故余志已決，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於絕境，迫我民族至無獨立生存之餘地，則成敗利鈍自不暇顧，只有挺然奮起，與之決一死戰，恃我一己之犧牲，以表示我國家之人格，以發揚民族之精神。（一九三一年十月七月）

這段文字不能在戰前公佈。嚴格說來，他這時候（至少在一九三一年）對於和日本作戰沒有必勝的把握，相反的，以他深知兩方的實力，如即此倉卒應戰，只有自取敗亡。可是逼不得已又只有一戰。其應戰之目的已不在求勝，而只在保全國格。這也和他以文天祥、史可法爲典範的態度接近。如果我們不計較當日情勢，單獨的閱讀此段文字，很難不對作者生反感。他把整個中國國民說得全無是處，只有他蔣介石一人氣概萬千。可是另一方面，想到九一八事變之後，北方大學生南下請願，毆

打外交部長，報紙雜誌充滿著慷慨激昂的文字，動輒稱東夷島寇不足計較。汪精衛因張學良之不抵抗，憤而辭職。及至抗戰軍興，遇到困苦艱難之際，汪精衛首先投降。以後各處怨聲載道。重慶中央大學學生因公費伙食不好而發生風潮。日後《史迪威文件》公佈，內中載有未具姓名之人士在戰時向史將軍建言，揭發中國政府黑幕者共十五起。此等人士已完全將「軍事第一，勝利第一」之信條置諸度外。是則中國人「五分鐘之熱度」事實有之。則不能責備領導人之預存警惕也。

同時上段文字也表現前後只五年餘，蔣介石的思想與觀感在廣州經歷中山艦事件時，有了很大的區別。前時他尚在日記中記出：「今而知革命心理皆由神秘勢力與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實極微弱條件。」（一九二六年三月三日）至此雖不能說他已放棄以前之見解，可是他反對「徒憑一時之興奮」，而著重「長期之堅持」，又將「良心」與「人格」與「革命精神」及「主義」並列，反映著在這五年餘時間內，他已從一個奪取地方政權之將領成爲一個國家之負責人。蔣介石一生經歷與衆不同之處，乃是他事業上之發展過速。當他組織部署一個新國家的工作方在伊始之際，他當然尚以革命家自居，而旁人則已視之爲國家之負責人。他不僅要對國事負責，也要對現下之社會狀況負責。批評他的人很少想及，他既認識「余固深知我國民固有之勇氣與決心早已喪失殆盡」，即不可能對刻下社會滿意。

中國舊社會既已崩潰，新社會尚未登場，如是只產生一批「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人物，而外面又有強鄰壓境，蔣介石只有兩途鬥爭，又加著兩途遷就。他所謂失去人身自由，不能返諸清白之身，至是不難瞭解。

上面一九三一年十月七日之日記既已用「此次對日作戰」作破題，可見得遲早好壞之間，他仍

準備和日本一戰。可是對中國講能愈拖延下去愈好（這與剿共戰事之立即爭取主動，成爲對照）。此方針亦係日後他所標榜「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之宗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五全大會對外關係報告）。

很少人能想及，即使蔣氏自己也可能未曾料及，自九一八事變至盧溝橋抗戰開始的五年九個餘月的時間，也是他一生對祖國最有貢獻的一段時間。其貢獻的方式不是戰勝取攻，而是忍辱負重。但是此中情形至今尙少爲人洞悉。



九一八事變之後，蔣介石於年底之前被迫辭職，他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亦即上海戰事展開之後，始被任爲軍事委員會委員，三月六日方爲委員長。然而實際上除去約三十日左右他逗留於奉化及杭州之間以外，他對重要國家之決策始終未曾置身事外。舉凡東北問題訴諸國際聯盟解決；淞滬戰起，遷都洛陽；以第八十七師及八十八師編成第五軍，增援第十九路軍；又準備抽調第一師胡宗南部往江南，作次一步防衛戰之部署；茲後淞滬停戰，由西方國家調停，南京政府接受，但不帶政治條件，均由蔣介石主持決策。這一方面固然由於繼承人無是經驗及氣魄擔此重任。另一方面實際情形則係南京政府之財政已倚靠上海銀行界維持，蔣去職，宋子文亦不合作。而且失去蔣之保證，借款尙成問題，又況黃埔軍人亦只有蔣能隨意擺佈調遣。

以上情形都可用作攻擊者之口實。一切由於蔣之「軍閥體系」及「家天下」之作風構成。但是世界上任何機構，其最基本及最原始之核心組織皆無從脫離人身關係，只能先私而後公。蔣介石之

權位由旁人對他之信仰而產生。更甚者，恭維他的人尙可讚揚他在一九三二年國難當頭時，接受群人指責，甘心奉彈劾他的林森爲國府主席，多年對頭汪精衛爲行政院院長，自己首先（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只以「國難委員」的名義，從旁襄助，可見得他胸襟寬闊，願意任自己手創之權職公衆化。況且經他擺佈，他的部下都有做無名英雄之性格。至今多數人已瞭解第十九路軍首先在淞滬挺身抗日，卻只有少數人知悉二月中旬之後戰局擴大，江灣以北迄吳淞戰線全由第五軍張治中部承當，一週之內八十八師即死傷二千餘人，以後戰事後移，第四十七師上官雲相部亦在嘉定一帶參戰。至於後方之部署，不致使日軍以四萬之衆挾新勝之餘威進軍南京，均由蔣策畫，更無人道及。

然當日攻擊他的「恐日病」亦非全無根據，只是他所恐懼者爲國力及民族意識，而非個人膽力。他首先聽到瀋陽淪陷時，即在日記上寫出：「天災頻仍，匪禍糾纏，國家元氣衰敝已極，雖欲強起禦侮，其如力不足何！」（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翌年初他仍無職位期間，聽說南京外交部長陳友仁主張對日絕交，他又寫出：「內無準備，遽爾絕交，此大危事也。」（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這種種思潮亦不能在當日公佈。

此中更有一層複雜關係，則爲日本之態度亦不可捉摸。九一八事變原由於關東軍少壯派製造而產生。事變次日，若槻內閣即宣佈「不擴大」政策。至九月二十四日又宣佈關東軍僅採取「自衛行動」，且即將撤回南滿鐵道。可是至此軍方已完全不受政府控制，若槻內閣本身亦意見分歧，至年底辭職。繼若槻禮次郎即於一九三二年組閣者爲犬養毅，此人與蔣舊識，蔣於一九二七年遊日時曾往訪。犬養亦希望和平解決，曾派私人代表往謁蔣介石及南京首要。但其內閣本身亦意見分歧，贊成關東軍激進政策及主張予以約束者包括首相本人約各相半。經過淞滬戰事之後，犬養毅於一九三二

年五月十日被激進派暗殺殞命。所以事變之後，希望日本政府能約束軍人，恢復常態，最初並非奢望，事實上似有可能。此旨既存，中國政府當局即不便以劍拔弩張之姿態，更加刺激對方之強硬派，而削弱其溫和派希望和平解決之立場。

對國際聯盟及九國公約諸簽字國干預之期望，亦使蔣介石舉棋不定。他在九一八事變後之第三日，在南京接見國聯公共衛生處長拉西門即已提及：「君須知日軍既佔瀋陽城，必不肯隨便退出。余知日人對我東北之心理，寧使其東京或日本三島全毀，決不願自動退出東北也。望君牢記余言，切勿輕易視之。」（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此觀察可謂一針見血，以後全部證實。但是國聯盟約有調解制裁諸條款，中國為弱國，本身無力收回東三省，又不能不對國際正義有所希冀。所以才兩日後蔣介石聞國聯議決，中日兩國停止軍事行動，雙方軍隊退回原防，又不禁將當時感想記在日記中：「此為一外交之轉機，亦為我國內統一之轉機，如天不亡吾中國，則此次外交或不致失敗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此段已明白道出如因國際干涉，而使中國死中復生，其機緣已非人謀實為天授。

以後國聯調查團來華，日人在東北成立「滿洲國」，美國提倡對日經濟制裁因英國作梗而罷。中國人懷抱著無數次之希望，每次又眼見希望在國際政治之現實場合中幻滅。迄至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國際聯盟召開特別大會，決議東北宗主權仍屬中國，但地方自治（autonomy），日人在境內擴充其鐵道特權。投贊成票者四十二國，反對者惟有日本，棄權者惟有暹羅（今日泰國）。而日本代表團竟在投票後，由松岡洋右率領離開會場，表示日本退盟。況且東北三省紛爭未已，日本一面退出國際聯盟，一面又進攻熱河。此舉已非軍人逞凶。在動員來犯之前，外相內田康哉在貴族院發表外交方針，闡明熱河係滿洲國領土之一部份，所以熱河問題全係滿洲國內部之問題。從戰後之資料看來，

奪取熱河之軍事行動經過日皇批准。



熱河事件因一個所謂任「關東軍囑托」的石本權四郎，在由錦州至朝陽間的火車上被中國義勇軍拉走而產生，事在一九三二年七月。迄一九三二年下半年，日軍不斷的整備進攻。蔣介石時在江西籌劃對共軍的第四次圍剿。當日最大困難，即是無從判斷對方之目標與最後企圖。從過去之經驗，小事可以化爲大事；下級造成之既成事實，可以據爲方針與國策。至年底蔣已回南京，他即在日記中寫出：「倭寇攻熱，必不能免，恐不出三個月之內，甚或進佔河北，捧溥儀入關；或另覓漢奸作爲傀儡，以偽造華北之獨立，使我中華分塊離立，不得統一，而統屬於倭寇卵翼之下。其狂枉之慾，且得隴望蜀，不征服我全中國不休也。……」（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見於《秘錄》，不見於《大事

長編》）

自中原大戰之後，張學良即以北平綏靖公署主任之名義坐鎮北方。自石本事件之後，蔣介石即令張群轉達口信，囑其派兵入熱（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但張意態游離，甚可能因部下不願單獨犧牲，亦可能因軍費不繼。此時曾引起汪精衛致張之公開電訊（八月六日），內稱：「今兄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最後汪自行辭職出國，並囑張「以辭職謝四萬萬國人」。張學良果然因之辭職，但是又引起宋哲元諸人反對。最後只能採取妥協辦法，將綏靖公署取消，改設軍委會北平分會，由蔣介石自任分會委員長，而以張代理，張之東北軍亦一部入熱，只是如此對方之意向未明，中國方面之企圖與弱點全部暴露，及至年底，情況愈爲險惡。日軍於十二月在山海關製造

衝突事件，於一九三三年元月三日佔領山海關，九日又在秦皇島登陸。

新年之前，蔣已準備派中央軍北上，以第二、第四、第二十五、第三十二、第五十六及第八十三共六個師運往河北。以楊杰主持中央軍參謀團。此即以後日本參謀本部所編《滿洲事變史》內提出中央軍六師北上之由來。但經文件證實，參與長城戰事者為黃杰之第二師、關麟徵之第二十五師及劉戡之八十三師。第四十四師則駐防密雲。至以後（五月十三日）又抽調第八十七及第八十八兩師北上，則已不及參加戰事。

蔣介石本人於三月六日由南昌飛漢口，因氣候不佳，改乘火車北行，於八日抵石家莊。事前已電囑軍政部長何應欽由南京逕往北平。至此熱河省會承德業已失守，全國輿論大嘩，衆稱應由張學良負責，南京中央主張查辦。蔣於九日至保定，與張成立諒解，准張辭職，以何應欽代。宋子文則以張離職後所部軍隊處置爲難。此日蔣之日記稱：「此時情形，固使余心難堪，而此後之事又不能直說，更感遺憾。然處此公私得失成敗關頭，非斷然決策不可。利害相權，惟有重公輕私，無愧於心而已。」（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可見得對日戰事組織尙無頭緒，統帥須先顧慮者爲內部人事派系問題。

當蔣尙在南方時，張學良曾計劃不僅保衛熱河，尙且向義州、黑山、通遼、洮南之線出擊（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及蔣北行前夕（三月五日）尙望反攻凌原、平泉、承德。及蔣抵達河北之翌日（三月九日），戰線已退至長城線上。至五月底戰事結束，長城戰事前後互十星期。是役國軍綜合東北軍、西北軍及中央軍，西自古北口，東迄灤河以東，約二百公里之人爲屏障上鏖戰，閻錫山部傅作義等則擔任察哈爾東部之警戒，無疑的已爲四年後全國抗戰之先聲。此亦自十五世紀明季徐達築「邊牆」，

十六世紀戚繼光建堦樓以來，首次利用此工事爲國防線（清兵曾折牆而入，未遇明軍抵抗）。蔣介石於三月十六日區分指揮系統，於二十四日在北平召開軍事會議後，即於二十五日南返。因汪精衛已復職，蔣尙須向國防委員會提出報告，而江西之第四次圍剿又已慘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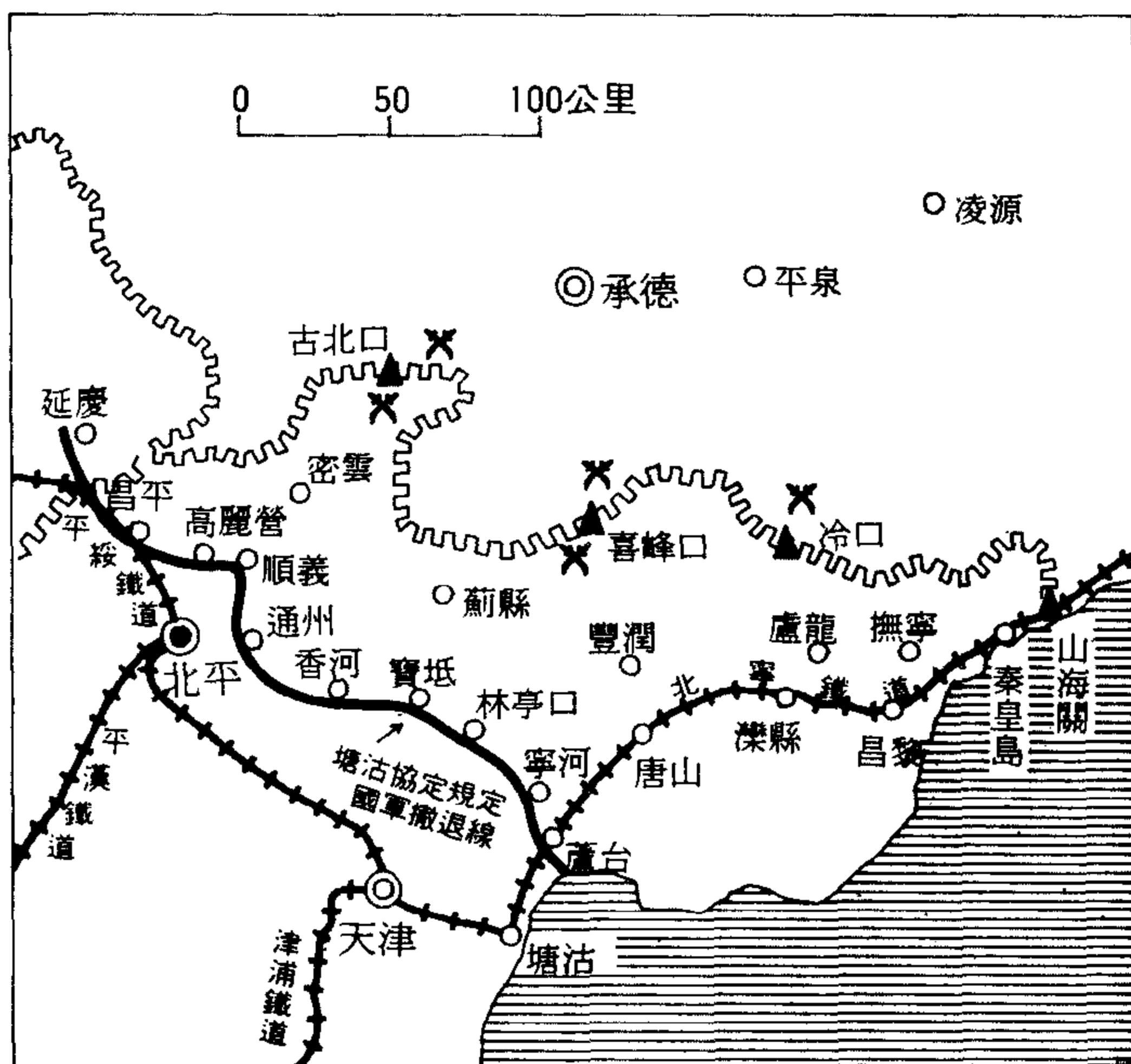
蔣介石曾在日記內寫出此次應戰之必要：「非與之一戰，對內對外，皆不能解決也。」（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他在北方巡視後南還，又寫出：「此時以穩定抗日戰線，加強北方防禦，爲目前之急務。至於江西剿匪，則只有付諸湘粵各軍。」（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可是長城抗戰雖持續兩月餘，結果帶災難性質。長城沿線全係石山，極難構築掩蔽部，又缺乏林木蔭蔽，是以陣地爲敵方飛機與火礮之理想目標。參與各軍無不死傷慘重，反攻則不見效，只有宋哲元部在喜峯口附近擊退日軍，並以大刀隊夜襲敵營。可勉強稱爲局部勝利外，戰報無喜訊之可言。國軍非不英勇，如第二師在古北口南天門之役死傷三千餘人，第八十三師當日即死傷一千餘人，以後，又稱「死傷慘重」，第二十五師師長關麟徵負傷。戰後蔣在日記中綜合當時情形：「此次第二、第二十五、第八十三師等師戰鬥結果，所餘官兵不過三分之一，而各團反攻時，有只餘六人生還者，其餘因傷自戕之官長，不可供僕數。激烈如此，總理之靈，當可慰矣。惟何以慰我陣亡忠勇將士之靈？勉之！」（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而且不止此也。當日敗兵折將之外，日軍之佔領平津似係指顧問事。冷口於四月十一日失守，由山海關西犯之日軍隨即取得昌黎。國軍又於喜峯口及古北口相繼撤退後，至五月下旬，日軍已佔領撫寧、盧龍、灤縣、唐山、薊縣、密雲，正威脅寧河。正東之敵距北平才五十公里。

蔣介石央請義兄黃郛前往收拾殘局。黃氏已隱居莫干山六年，因與蔣有「共嘗艱苦」之誓約，

長城戰役及塘沽協定



勉爲其難，以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長名義北上，與日人成立日後稱「塘沽協定」之方案（因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塘沽簽字）。仍經蔣介石通過汪精衛、孫科、羅文幹、王世杰接受。第二次大戰結束後揭曉，日軍後撤因在關內作戰未經日皇批准，軍部受到日皇責問。可是事雖如此，日軍在關內活動已數星期。而且塘沽協定之後，日本分裂華北運動迄未終止；全面抗戰亦因是展開。

次：

交涉期間，黃郛致蔣介石電報四通，最能表現當日實況。茲照錄原文如下：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抵平五日，危疑震撼不可言喻。自美國申請書發表後，日方態度驟變，既

往工作，盡付流水。趙敬時案，又適逢其會發生。昨晚敬之兄（何應欽）召集軍事會議，已決定在白河線作最後抵抗。但平津若動搖，則前在滬所商定之六百萬，事實上又成空話。財政如無新途徑，以資接濟，而維軍心，則全部華北情形，將不知紛亂至何程度，應請中央預為注意。郭等進止，尤須請示。北平既入戰區範圍，政整會自無工作餘地，現雖尚未成立，擬至必要時即隨軍事機關轉達，或即南旋面陳經過。如何盼覆。

（五月二十三日）時局至昨日極險，軍心不固，士氣不振，內幕尤不堪問。日方決定本晨拂曉大舉進攻。故一時不得已，預備軍政兩機關移駐平漢線。兄思平津一失，中央政局亦必動搖；財政無辦法，糧餉之源絕。平漢、平綏、北寧、津浦各線之交通樞紐，盡落敵手，國土變色，地方糜爛，潰軍且將波及豫魯。種種不堪設想之後患，均意中事。且昨日已接精衛電略稱：「只要不涉及承認偽國、割讓四省問題，一切條件均可商訂。」並稱：「決不使兄獨任其難，弟必挺身而出，共同負責」等語。故於臨出發移駐之前，思為最後之努力。於昨午夜十二時赴一私友處，不露聲色，與中山代辦、永津陸軍武官、藤原海軍武官，徹夜討論，天明始歸。商定結果已與敬（何應欽字敬之）季（黃紹竑字季寬）兩兄聯名另電詳達。事機迫切，間不容髮。未及事前電商，至為惶懼。好在交涉僅以停戰為範圍，條文上加意審慎，當不致受大指摘。然而兄（黃郭本人）淚內流，兄膽如裂，想吾弟亦必能想像也。特聞盼覆。

（同日與何黃聯名電）關於最近前線軍事部署，昨電已詳。惟各部隊兼月作戰，將士傷亡甚多，疲敝之餘，戰意已不堅決。就昨晚情形觀測，方成不戰自退之勢。經職等再三籌計，若竟任其

自行崩潰，華北局面將至不可收拾。當即召集重要將領，多方激勵，衆人意志稍轉堅定。同時日本中山代辦及永津武官與郭約定晤談，結果由日方提出如下之四項條件：(1)中國軍隊撤退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以南以西，今後不准一切之挑戰行爲。(2)日本軍亦不越上述之線追擊。(3)何委員長應欽派正式任命之停戰全權員往密雲，對日本軍高級指揮官表示停戰之意志。(4)以上正式約定後，關東局司令官指定之日本軍代表與中國方面軍事全權代表，定某日某時於北寧線上某地點作關於停戰成文之協定。比由職等就此條件詳密商議，僉以此時前線情形如彼，而日人復以多金資助徐燮元、孫傳芳、白堅武等失意軍閥，有組織華北聯治政府之議。熟權利害輕重，與其放棄平津，使傀儡得資以組織偽政府，陷華北於萬劫不復，何若協商停戰，保全華北，徐圖休養生息，以固黨國之根基，較爲利多害少。衆意既歸一致，於是遵照汪院長迭電指示之意旨，由應欽答覆日代辦，對其四項條件完全接受，並擬於今日派上校參謀徐燕謀爲停戰代表，偕同日本武官前赴密雲表示停戰之意。嗣後進行協議情形，自當一秉鈞旨，隨時密呈核示。職等爲黨國爲地方人民著想，惟有犧牲個人，以求顧全大局，是非毀譽，所不計也。肅電奉聞，伏乞鑒核。

(五月二十七日)有申電奉悉。停戰協定，豈兄所願？因二十一晚開軍事會議聽各將領所表示，知危機已間不容髮。二十二晨日使館又由津增兵兩連，而前線各路急報頻來，城內反動團體躍躍欲試，津埠暴動相應而起，一時人心恐慌，秩序大亂，其時環境之險惡，較之當年在濟南退城時之程度，有過之無不及。在平同人見大勢已去，認弟(蔣介石)所稱「最後關頭」已至，決

定一面收城，一面將軍政最高人員暫移駐長辛店。惟猶慮離平以後，華北局面必至不堪設想，故遲遲未發。延至晚間十時得汪院長養電略稱：「欲謀停戰，須向對方問明條件。其可答應與否，弟（汪精衛）以爲除簽字承認偽國、割讓四省之條約外，其他條件皆可答應。且弟決不聽兄（黃郛）獨任其難，弟必挺身負責。乞速與敬之、季寬、岳軍（張群）諸兄切實進行」等語。得電時，敬之兄正與徐軍長庭瑤研究城防，岳弟未在側，乃與季寬兄密商。時已深夜十一時，不容有躊躇之餘地。遂決然偕李擇一君電約中山代辦、永津武官至某私人宅會談，直至次晨六時始散。徹夜週旋，心酸膽裂。勉強緩和，重留北平。今後談判進行，自當遵囑認定以停戰條件爲範圍。偽國承認問題，雙方均非瘋狂，深信決不至涉及。蓋局部軍事長官所派代表，其資格並不足以代表國家，何得議此有關領土完整之政治問題？所當注意者，條款文句之間，彼等或用偷關漏稅之狡猾手段，插入滿洲國境線等之字句，爲將來交涉東北問題之伏筆，此則當時時防範耳！總之，弟既強我以肩此重任，弟必給我以同等信用。兄山居六載，雖不敢謂已達悲智雙修之域，然自信悲願決不至賣國，智慧決不至誤國。深盼彼此把握住既定之方針，勿爲外來蠱惑之詞所矇蔽，更勿爲南來不穩之消息所動搖（當時廣州倒蔣情緒並未完全放棄，至年底即有福州之人民政府）。蓋國際援助一層，以兄平素所具之國際常識判斷，敢斷其不過一片空言；讓百步言之，其實際之援助爲時必甚迂緩，遠水不救近火，爲量必甚微薄，杯水無補車薪者也。至南部情形，彼等早已決策，所謂「你東我西」，無論如何無可避免，惟有用種種方法以圖應付。至尊電所謂「應下最高無上之決心，以求得國人之諒解」一語，則兄尤不能不辯。兩年以來，國事敗壞至此，其原因全在對內專欲求得國人之諒解，對外誤信能得國際之援助，如斯而已矣。最高無上

之決心，兄在南昌承允北行時早已下定，無待今日。兄至今尚未就職，弟如要兄依舊留平協贊時局者，希望今後彼此負責的遵守「共嘗艱苦」之舊約，勿專為表面激勵之辭。赤手空拳蹈入危城，內擾外壓，感慨萬端，神經刺亂，急不擇言，惟吾弟其諒之，並盼電覆。（本書發行後見李君山在《歷史》月刊文下有「使後世之單閱電文者疑愛國者為弟誤國者為兄也」二十一字）

塘沽協定經過蔣、汪同意後，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簽字，內容與五月二十三日黃、何、黃之聯名電所敘相同。惟國軍撤退線南端加列渤海濱之蘆台，日軍有權用飛機偵察保證撤退確如條款執行，日軍則撤退至長城線，當中緩衝地帶以警察維持治安。

事後蔣介石在日記上表明心跡：「我屈則國伸，我伸則國屈。忍辱負重，自強不息，但求於中國有益，於心無愧而已。」（一九三三年六月三日）

塘沽協定自是使全面抗戰延緩四年。蔣所謂「我屈」見諸事態，「國伸」則未有痕跡。日方仍繼續壓迫。黃郛經過是項折衝後南返，翌年其上海住宅被人投擲炸彈，又接到恐嚇信。但受到蔣激勸之後，仍繼續北上交涉，直至一九三五年年初。此人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去世，未及見臨抗戰之展開。



可是塘沽協定雖有停戰之功效，卻未能制止日本之繼續侵略。當日本對中國之壓迫節節加緊之際，以前似為關東軍少數幹部之擅自行動，自此不乏政府出面支持。一九三四年，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天羽英二承外相廣田弘毅之命發表聲明，稱維持東亞之和平及秩序乃日本之使命，中國如有利用

他國勢力，以圖排斥日本之企圖與行動，必遭反擊；其他各國對中國財政及技術之援助，包括售賣飛機及建造飛機場等，亦為日本反對。現已發表之蔣日記只有在天羽聲明之次日寥寥數字：「我國宜如何發奮圖強，以雪此恥也。」（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八日）但是他在四月二十三日在江西撫州剿共軍前線將士訓話時，提及十年之後必驅逐日本出境，光復朝鮮，收回台灣。六月十六日又在中央軍校舉行黃埔創辦十週年紀念，說及當初他只有由兵工廠秘密運來的五百條步鎗，即可以「奠定今日革命武力的基礎」。同日又發表〈十年來革命經過之回顧〉，內稱：「世間唯創造艱難者，其植根必深，其綿延必久。」七月十三日又在廬山軍官團訓話，說及「凡我革命軍人應有收回失地與鞏固生命線之決心與準備」。

在這既不能戰又不能和的關頭，蔣介石採取了一種非常之步驟：他用「徐道鄰」的筆名，於當年十二月在《外交評論》發表〈敵乎？友乎？〉一文，內中指出日本之錯誤，也指出「中國方面之錯誤與失計」，例如自信過度，倚賴其他國家，不願能屈能伸。但是錯誤更甚的仍是日本。如果日本以美國或蘇聯為預想敵，則中國為其側背。除非日本真能在十天之內滅亡中國，要拖上三個月、十個月或半年的時間，「則日本地位甚為危險」。將這些考慮縷列之後，徐道鄰更將中國持久抗戰的宗旨宣佈：「中國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將大受犧牲，這是中國人所不容諱言。但日本的困難，亦即在於此，中國正唯因沒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輕侮的力量所在。戰爭開始，在勢力相等的國家以決戰為戰爭的終結。但是在兵力絕對不相等的國家，如日本同中國作戰，即無所謂正式的決戰，非至日本能佔盡中國每一方里之土地，徹底消滅中國之時，不能作為戰事的終結，兩國開戰之際，本以佔領政治中心為要著。對中國作戰，如以武力佔領了首都，制不了中國的死命。」

不久對方日本即看清此文最低限度爲蔣介石授意所作，於是各刊物翻譯轉載，一時展開了和平談判的空氣。蔣亦在日記上寫出：「……表明對日外交方針與態度，國民已有諒解，並多贊成，一月之間外交形勢大變，歐美亦受影響，自信所謀不誤。」（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蔣總統秘錄》則在「方針與態度」之後添入「實爲余政治生活之一大重要事項」十四字）

蔣當時提出雙方以道義解決僵局，對方外相廣田弘毅自稱生平嗜讀《論語》，理應與此方針接近，中日關係似有改善希望。王寵惠被任爲國際法庭法官，在往海牙赴任前，以蔣私人代表身分往訪廣田，事後發表談話亦稱「結果圓滿」。表示雙方的趨向接近，即有當年五月兩國使節之陞格，由公使而爲大使。可是即在此時，發生親日報社社長胡恩溥、白逾桓在天津日租界被暗殺事件，爲日本「支那駐屯軍」引爲藉口，發動分化華北運動，已使局勢無從改善。而廣田亦依存於軍人，主持所謂「廣田三原則」（日方稱爲「外陸海三相關於對支政策之諒解」）：一爲中國放棄以夷制夷政策，不得藉歐美勢力牽制日本。從以後側面之文件看來，尙要中國退出國際聯盟。二爲承認滿洲國，即不公開承認，亦須含默承認；並改善關係，徹底制止排日言論與行動，而進行經濟文化合作。三爲共同防共，防制「某國」自北南下。換言之，中日締結防蘇軍事協定。在北方邊境中國受日本節制。此人以後繼續爲軍人支持，於一九三六年任首相，但終不得急進派之滿意而辭職，戰後被押爲甲級戰犯，爲東京國際法庭判絞刑。

蔣介石當時之態度可以其在五全大會（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所提出報告看出。他說：「和平未到完全絕望之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以個人之犧牲事小，國家之犧牲事大；個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無窮故也。」這政策具體的表現爲國民政府六月十

日發表「睦鄰敦交令」，內稱：「凡我國民，對於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爲，尤其不得以此目的組織任何團體，以妨國交。」

蔣之日記亦有以下一段：

(一)倭寇要求我河北黨部取消，中央軍隊撤離河北，免冀于「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學忠」察宋「察哈爾之宋哲元」二主席之職，並派飛機任意偵察監視我軍撤退之行動，十八日且飛至濟南、徐州縱橫盤旋威脅。嗚呼！國勢至此，何以爲人？凡有血氣之倫，黃帝子孫，其將何以雪此奇恥？若不圖自立，復有何顏立於天地之間？小子誌之！

(二)此次事變，實等於九一八之鉅禍，而全國智識階級與軍人皆能仰體政府之意，忍辱沉毅，而毫無幼稚蠢動之氣，此實四年來國民最大之進步，而其對政府信仰之程度亦可測其大概，此實爲復興之基礎，對此不禁興喜懼之感。以後全在吾人如何振拔而已。小子責任綦重，可不自勉乎？

(三)倭王昭和當蔣作賓大使呈遞國書時，特提此次華北事變，表示其抱歉之意，曰：「此次華北事變，實對不住；對汪蔣二公之苦心，深表敬佩，煩爲轉達」等語。此國王面示道歉之例，實所罕見。彼或深愧不能制止軍人非法行動。倭政敗壞亦可見矣。（一九三五年六月三十日。《大事長編》及《秘錄》所載字面有出入。此間根據《大事長編》，但最後一段引號內標點含糊，照《秘錄》修正）

以上三節均各有其歷史上之下文。第一節之要求已成爲「何梅協定」及「秦土協定」。雖然所謂

「內蒙國」及「華北國」並未出現，但是冀察之特殊體制已成事實，盧溝橋事變，即從此特殊體制上發生，蔣介石在第二節慶幸他的退讓政策為全國人士諒解，未免言之過早，及至當年年底及翌年之初，各地學生發動罷課請願遊行示威情事。國民政府拘捕愛國人士，封閉取締抗日刊物，亦在此時產生。再至年底則有西安事變，是可算作軍人之反應。關於第三節，則抗戰後蔣委員長在國際場合中，尤以在開羅會議與羅斯福交換意見時，竭力主張天皇制應由日本人民自決，間接亦即對日皇裕仁人身不再過問，以情理論，此不可能與彼十年前接見中國大使時所留印象全無關係。



親日人員之被殺，日方稱「藍衣社」為之，亦為國民黨排日政策之一部。由日本武官高橋坦會見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提出質問。此時日軍（此為義和團肇事後根據辛丑條約在平津之駐軍，稱「支那駐屯軍」）已對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與中國國民黨市黨部威脅挑釁。五月二十九日又由高橋會同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向何應欽提出要求撤退黨部、中央軍、憲兵、藍衣社各團體，並對蔣委員長陽稱親善，陰在準備抗日提出警告。迄至六月九日，何與酒井商談三次，後者除提出撤退黨部及駐軍等外，又加入「禁止全國排外排日行為」之條件，限十二日正午之前答覆。何應欽限於中央電令，只稱照辦，不得書面答覆。但蔣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及十六日接見中等學校校長及學生代表時，曾提及：「何部長回一封極簡的信答覆他說：這些事不待你要求，我們中國已自動辦好了。」《蔣總統秘錄》則稱此緘經過汪精衛同意，於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郭廷以之《中國近代史綱》稱七月八日）以下開方式致梅津美治郎。觀其語句，日文風味甚於中文：

逕啓者：六月九日酒井參謀長所提各事項，均承諾之，並自主的期其遂行。特其通知。

此致

梅津司令官閣下

何應欽

在同一時期察哈爾則發生「張北事件」，有日本特務機關工作人員四人被宋哲元部隊拘押，八小時後釋放，但亦因此招致日方威脅。由秦德純於六月二十七日出具文書致土肥原賢二，承認察境亦撤退駐軍，取消反日團體，協助日本在內蒙活動，中國不得對察省移民。

戰後土肥原賢二被列為甲級戰犯，被東京國際法庭判處絞刑。此人曾為「奉天特務機關長」，曾往來南北，致力於中國之分化，策動關東軍之「對支政策」，包括「依據塘沽協定暨附帶協議事項伸張日本既得權，導引華北政權絕對服從」；並於華南「秘密給予物資援助，使能與中央對抗」。

酒井隆則在戰後為中國逮捕，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日被南京軍事法庭判處死刑。據日本資料，一九三五年日本陸海外三相已訂有「北支問題處理要綱」，內中提及各項要求，並附「希望事項」。酒井擅自擴大其範圍，並動輒威脅，謂不接受即將採取「自由行動」。何應欽於一九七〇年間對《產經新聞》古屋奎二稱：「梅津司令官是一個規矩人。但是他下面的參謀們——像酒井隆、高橋坦這些人為求表現，便極盡其為非作歹的能事，而梅津則無法加以抑制；他們瞞著梅津做了許多壞事。」至於華北「自治運動」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進展到決定的階段。日本內閣已通過「鼓勵華北自治案」。新任駐屯軍司令多田駿發表文書，盼華北五省自治，人民自救。在物色傀儡政權之領導人物

時，日方曾屬意於孫傳芳、吳佩孚舊部白堅武，甚至閻錫山。但在各種條件均無法遂行後，決定壓迫引誘韓復榘、商震及宋哲元（時已調至河北）。土肥原限宋十天內表明態度，否則日軍進攻河北及山東。

在日人壓力之下，蔣介石於十一月二十日接見日本大使有吉朋。有吉問及蔣對廣田三原則之態度，蔣一度稱贊同。但事後由外交部長張群否認，謂贊成係贊成自三原則商討，並非接受三原則本身。北平軍事委員會分會於十一月二十六日撤消。三十日又派何應欽為行政院駐北平辦事處長官北上。何氏自六月離平後即不願再往，蔣介石曾請國府主席林森及各院長敦勸，始得成行。但從此何被多數國人認為「親日派」或患「畏日病」。

最後中日兩方協商後，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宋哲元為委員長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委員十六人由中日雙方擬定，郭廷以之評語云：「中國認冀察政務委員會係中央設置的地方機構，日本視之為華北自治行政機構。」

蔣日記有以下一段：「倭寇橫暴狀態，已無和平之望，故毅然斷行，一面抗議其倭軍在華北之暴行與土肥原之脅迫，一面準備如華北『自治』發表，則明示為倭寇以軍力逼成，而規戒華北之主官。籌維再四，另無他道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這情形之下，遂有民間遊行示威抗議的普遍展開。



自塘沽協定至抗戰展開前之四年一個月，中國之內憂外患方殷未已，日本之繼續分化華北已如

上述，尙且又在南京（副領事藏本英明「失蹤」）、成都、北海各地釀造事件。並引用德王佔領察哈爾大部，再次西犯綏遠。蘇聯雖與中國復交，仍與盛世才成立片面之協定，負責新疆之秩序與安全，獲得採礦築路權利，控制盛屬下之政治軍事。一九三六年之協定又與日滿關係相似。國內之反中央運動既有一九三三年末之福州人民政府，而兩廣在陳濟棠領導下進軍湘南，直至一九三六年九月方完全解決，實已爲抗戰之前夕。各省區內之戰爭，尙有一九三三年二劉（劉湘與劉文輝）之爭及一九三四年貴州內黔軍之爭。共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之後構成陝西之根據地，不僅侵入山西，而且擊敗前往進剿之東北軍，此戰役已構成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遠因之一。

生爲當日之中國人，對此局面無不愧恨交并。尤以大敵當前，國運如絲之際，軍政領袖仍不能放棄小處嫌隙，至堪扼腕。作爲中國領導人之蔣介石瞻望全局，必有滿目瘡痍之感。而他處置各事之方法與能力，也近於捉襟見肘，他如何能有如此超人之忍耐與毅力，甚可以在其日記中窺見之。

他有時也表現心頭之疑惑，有如：「倭寇橫蠻，人心陷溺至此，豈天果亡我中華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甚至嗟傷埋怨。有如：「茹苦負屈，含冤忍辱，對外猶可，對內尤難，何黨國不幸，使我獨當此任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六日）他間常也爲憂慮而失眠。但是這樣消極疑慮的情形不多。即是他自己提出以上情緒時，也在短時間用意志力量克服。

當日本軍人向何應欽逼迫至極時，他曾寫出：「倭寇蠻橫，非理可喻，未到最後關頭，當忍耐之。」「本日性燥心急，內憂外患相逼而來，若不靜敬知命，何以擔當未來重任？」至此他已引用宋儒式之修養保持心境之平衡，有如次一段「靜敬澹一之功夫不可須臾離也」（以上均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日）。

「澹」爲恬靜，「一」爲視心神與宇宙爲一元。凡此均非儒家本來面目，宋儒得自禪宗，西人統稱之爲「新儒教」(Neo-Confucianism)。(可是西方治漢學重分析而不重綜合。研究儒教者不過問近代中國，研究近代史者則不屑過問此「陳舊」之思想。)其旨在心神凝聚之餘，「將發未發」之際，有頓悟的解放與超脫，可以體會，無從理解，蔣介石好遊歷，喜山居。他遊峨嵋山時曾作占：「雲海雲山雲頂寺，道天道地道中人。」這種天人合一之觀感，可以消除塵世之欲念，也能解除身心之負擔。當日(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七日)他又作五言絕句：「朝霞映旭日，梵唄伴清風，雪山千古冷，獨照峨嵋峰。」詩中所稱梵唄應指寺廟內之諷頌，與朝霞、旭日、清風同爲寫實。然則此詩精義則在「雪山千古」四字，象徵著宇宙的奧妙與永恆，接近西人所謂「超驗哲學」(transcendentalism)之情趣。

可是這種接近佛教與道教的趨向，又常爲基督教之人身的神替代。蔣介石之頓悟亦在此時代之以基督徒之虔誠，有如他聞報日軍佔領平津車站，而朱德及徐向前部亦逼近成都之西南時，曾在日記中寫出：「每遭非常禍患，應以泰然自處，凡事皆主於上帝，由我信心而生耐心，由耐心而獲成全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所以要分析蔣介石之宗教思想至爲不易，不如綜合。大概他保持著中國傳統習慣「諸說混合」(syncretism)的辦法，更因他一直被環境逼迫，也帶著「折衷主義」(eclecticism)的成份。

以後在抗戰期間，有一日史迪威被蔣邀晚餐，主人遲到。史在日記裡留下：「蔣介石來遲。他在晚禱。這晚禱不由任何事而中斷。這是一個新的角度。他虔誠與否不說，總之他即鄭重其事。或者他以爲與主神交而增強他的直覺。他大體上依賴他所謂對心理上之了解(中國心理)。如何策動這樣的一個人？他能用他的『直覺』超越邏輯與理性。他不顧業經證明之原則與方法而堅持中國人之

心理不同。他直接下結論而強以某種以前想像之中的相同爲經驗。他的頑強拒絕討論。」（一九四二年八月四日。以上括號及心理一辭之重複均依原著。）

這一段牽涉了很多個性與習慣的問題，可是也始終與思想相關聯。蔣介石缺乏應付事態之資源。他的高層機構尙在草創，不僅缺乏適當的社會條件在後支持，而且本身尙是牽扯湊合。有如他的軍隊即經過下列三段程序組成：在黃埔時責成部下以革命精神樹立基礎，北伐時收買對方將領而擴張數目，中原之戰後接受軍閥部隊之歸順而建立內圈與外圍之新平衡。因爲如此，他的組合即不能構成一個大一統之系統。他之處理人事，也只能依賴農業社會內人與人之交往乃注重「雙邊關係」（bilateral）之辦法，而不能進入商業及現代社會內「多邊式」（multi-lateral）的體系。因爲他之部下對他的服從與信仰的程度不同，他自己也不具備將軍需物資均平分配之能力。他部下之部下亦復如此，總之則新社會尙未組成，無從責成各按此理想社會「應有的」習慣態度辦事。因此，蔣介石之接對部下不能脫離「中國心理」。

在以上各段我們已經敘述到他對汪精衛、胡漢民不同的辦法。他之引用黃郛，更不在首領與僚屬的範圍。他之指示陳誠及何應欽等人，亦逾越通常組織之原則。一九三四年七月監察院彈劾鐵道部長顧夢餘，因顧爲汪精衛舊屬，而此時他蔣介石又倚賴汪精衛之合作才能對日交涉，所以他不得不逕電監察院長于右任請撤消此案。一九三五年九月日本提倡華北自治時，他已在日記內留下「魯韓（山東主席韓復榘）態度可慮耳」（九月二十九日）。此因韓爲馮玉祥舊部，態度游離。他對宋哲元及其將領秦德純、馮治安、張自忠及劉汝明，則已於七月頒發青天白日勳章，此舉當然有濃厚之政治意義。但隨後他仍顧慮宋哲元「來電有動搖之意」（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對有吉朋提及接受廣

田三原則，出自此情勢瞬息變化一週間，顯有緩兵用意。

諸如此類之發展，使蔣介石無從掌握主動。雖說他堅持由信心而生耐心，他經常之工作仍是隨機應變，以權謀為利器，無論敵友都要窺測他們的長處與弱點，以期捕捉戰機。如此將千絲萬縷之人身關係集於一身，必給他心胸無限困壓。所以他定下了早晚禱告的習慣，決心以不變應萬變，聽隨上帝作主。可是另一方面他仍經常感到「危險未過，困難更多」（此句摘自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日記，當時日本少壯派軍人已發動二二六事變）之煎逼，如果有一日或半日間，他又在尋求暫時之解放與超脫。此時之救主已非人身之神，因為他蔣介石自己亦復成了一個「身外之人」，此種境界可以描寫而無從分析，因為其著眼在乎美感，不沾染邏輯。

在這情形之下，史迪威不能質問他祈禱的虔誠，而大可懷疑他因祈禱而增強了他處事時依賴直覺之習慣。我們也很難分辨此是宗教上的信心暨哲理之覺悟助長了他蔣介石應付艱難局面的能力，抑或是環境之困苦使他有各種牽扯牽錯，因之構成了他的複雜心情。



在一九三〇年代，蔣也從未忘卻對部屬精神訓練及提倡國民道德的重要。這種精神動員在一九三二年淞滬戰後開始樹立定型，至一九三三年塘沽協定之後而加緊。當年即成立廬山軍官訓練團，次年又發起新生活運動，一九三五年復成立峨嵋軍官訓練團。《大事長編》提出即在一九三四年一年之內，蔣在各地演講四十一次，尚有若干並未列入，如前述當年四月二十三日在撫州軍前之訓話，他在南昌時曾召集中學校長與學生（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即短期休假家居，猶且對奉化縣保衛團及

武嶺學校生員訓話（七月三日及四月又十二月二十五日），演講內容除偶一提及實事，如黃埔軍校成立十周年紀念時（六月十六日）提及當日籌謀經理的困難外，幾全部為精神倫理與道德，他的態度不能謂之為不虔誠。他曾與黃郛談「對日計劃」（一九三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其結論則是「先立其本，以人格與精神樹信於國民」。這種出發點不可能臨時憑空製造，也不可能為矯揉造作，用以蒙蔽他的盟兄與摯友。

他所謂人格與精神，集中於「禮義廉恥」四字，這春秋時代管仲所標榜的「四維」，經過他的提倡，成爲了國民黨的座右銘，出現於治下的各建築物。可是他蔣介石也不時穿插出入於這四字標語之內外，有如表揚「忠孝廉節」（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提倡「禮樂」（一九三四年三月五日），揭櫫「智信仁勇嚴」（七月二十五日）、「智仁勇」（九月十八日）、「質樸誠信」（一九三五年三月三日）、「拙誠公勞儉嚴」（六月二日），與「公誠樸拙」（六月三日）。有時四維也與八德並列，只是變動了傳統的序次，讀如「禮義廉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在先（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日）；有時則代之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後者出自《三民主義》。

這些出入並不表現思想上有何重要改變；無非他經常席不暇暖，講稿信手呵成，有時尙無講稿，只是引用傳統之文句。這不足以修正蔣介石之宗旨：他一生作事集中於三民主義內民族主義裡的恢復固有的道德一項。對他說來，這是他的目的，亦成爲了他作事之工具。這些道德實以禮義廉恥領先，尤以「恥」字開道。以下還要提及。

然而我們仍不能忽視：蔣在修辭的錯綜重複之中，也確有主意上矛盾之處。例如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他在廬山軍官訓練團說及「戰爭爲生存之本能，與促進人類文明之動力」，已有歌頌戰爭

的趨向。接著他又說及：「宇宙萬物皆爲戰爭而生，從事戰爭必利用宇宙萬物。」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日他又鼓勵成都大學的學生去「冒險」，要他們「宰制宇宙，征服自然，創造文化」。這更帶著社會達爾文主義之色彩。同年九月八日他又在峨嵋軍官訓練團提到「軍國民教育」，其內含爲「鐵與血的精神和武德與武藝」。可是他前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十日卻在廬山軍官團說道：「要以中國固有的武德來抵抗日本的武士道，要拿我們和平的三民主義來抵抗侵略的帝國主義。」這樣一來，就難判斷和平與戰爭究竟以何者占先了。

把「拙」當作一種德行，也與他要求部下「迅速確實」的旨意相違。如果「拙」代表傳統社會裡的「大智若愚」之世故，又難避免「不誠」之指責，至少也與新時代之習慣不合符節。

可是我們在揭發這些矛盾之處時，仍不得不重新考慮：蔣介石之目的和他可能採取之手段本來就難以調和。他於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二日在廬山軍官團的演講辭，以後題爲「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抗戰開始後全面公開傳佈，成爲重要文獻之一。今日我們有了更多歷史之縱深，才可以看出他所謂「復興民族」，牽涉到將一個舊式農業社會改造而爲一個新型商業社會的艱鉅工作，即在工商業先進的國家，也要流血犧牲前後奮鬥幾十年，才有成果。蔣自己所領導的工作，不過在這蛻變的當中創造一個新的高層機構，亦即構成一個形式上統一的政府，得到外強的承認，組織一支受中樞軍令指揮的軍隊，使中國能在二十世紀裡立足。這種工作大部由對日戰爭完成，此即是他所謂之「抵禦外侮」。

所以在他看來，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互爲表裡。然則執行起來，前者不過是後者的一階段。復興民族需要全部改造，不得不大規模的去舊從新。抵禦外侮則是千鈞一髮的危機中救亡圖存，只能

在團結對外的號召之下接受現實。很多人沒有想到：中國要動員數百萬的兵力，以全國為戰場，在統一的軍令之下，和強敵作八年生死之戰，是可謂洪荒之未有。當日蔣介石所能引用的工具，最初只有各地的散兵游勇，次之則省區間的軍閥部隊。他所能支配的資源，最初只有統稅特貨，以後才能發行公債，伸手於鹽稅關稅。此中前後不過十年。

〈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裡面有以下之一段：

現在中國軍隊練不好，要給外國人欺侮，不當作我們中國的軍隊是一個軍隊是什麼道理？就是因為我們一般軍人，有一個最壞的習慣，以為外國什麼東西都是寶貝。我們中國什麼都是廢物沒有用的，以致自己固有的什麼東西既「概」視之如敝屣，同時外國的東西也只學得一點皮毛。大多數的軍人都不三不四，不文不武，外國人不當作我們是一個軍人，而我們現在用的武器和戰術也是不新不舊，不中不西。說他完全是照中國舊的道理辦嗎？他又不是；說他完全是照外國新的辦法嗎？也不是。

聽到這裡，我們都希望他提出一個整體化和全面化的改革方案。可是蔣介石沒有提及。緊隨著這一段他只說起：「鑒於以往的失敗，我們應當覺悟，以後再不要有新舊和中西的成見，只應選擇合乎中國國情和需要的辦法來做。」

軍隊為推進社會之工具，但本身又為社會產物。除非社會已進化到某種程度，軍隊無從全部放棄現有之生活習慣，使用戰術武器如此，處理人事亦如此，蔣介石雖責成部下研究，其融合中西新舊的程度仍有限制。抗戰前夕，國軍仍是不新不舊不中不西，甚至非中央軍也非地方軍。其指揮系

統無從全部正直無私；但是也不全然依存於私人關係。

一個舊式農業社會要蛻變而為新型商業社會，政府之權力只能擴大。在這過渡期間必有侵蝕人身自由之事，而且從事改造的人物也必具有犧牲精神。蔣本來可用「革命」號召，可是黃埔建軍至茲已十年。當日之「子弟兵」，今多高官厚祿，國民黨不僅在朝，而且專政。他蔣介石尚且說及自身「體面尊榮」（摘自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日記），又主持「剿共」。刻下他只企望推進三民主義中之民族主義，猶感力之不逮，則不便將革命二字使用於日用辭彙中矣。

要是蔣不顧利害，他甚至可以用抗日作為團結人心的憑藉。可是即在淞滬喋血、熱河事變、塘沽協定之過程中，他親自部署與日軍交鋒，又主持和議，猶且要避免張揚，使不得為內外藉口。以後他尚要解散愛國團體，禁止排日運動，以作華北緩兵之計。以徐道鄰為筆名發表之〈友乎？敵乎？〉更直接乾脆承認他自己「所標榜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政策，實在只表示當局的無辦法」。這樣看來，弱國不僅無外交，尚且要放棄對內宣傳之利器。

一九三〇年間南京聘用德國陸軍顧問，購買德國器材；且一度對義大利感興趣，曾派遣軍官學生往義留學，並與義國簽訂合同，籌建飛機工廠。此氣氛可能助成法西斯軍國主義之成長。一九三二年軍校畢業生組織「三民主義力行社」，亦稱「藍衣社」，即有此徵象（但據我個人所知，即與易勞逸[Lloyd Eastman]教授筆下所述有重大之出入。易大概將一時之衝動視作業已展開之運動）。而蔣片面之接受，亦可視作承認此趨象之表現。此期間他准許以他的小像作為軍校學生外出服之第一鈕扣，任人稱之為「領袖」，均有模仿德義之色彩。抗戰開始之後，尚有軍校師生組織「正統派」。西班牙之佛蘭哥進軍馬德里，中國報紙承政府指示，均稱之為「國民軍」，以後方始稱之為「叛軍」。但此種之接近

法西斯之趨向，均無實質，也均只曇花一現。國民黨固非左派或自由人士組織之政黨，但其構成複雜，亦斷不容倡導軍事獨裁之右派小團體壟斷也。蔣介石過去曾被迫辭職兩次，每次壓力均來自黨內。一九三一年提出彈劾之監委之一人，日後尙取得蔣之地位爲國府主席，此即林森。所以堅持蔣介石被法西斯成份所支配之人物，可謂尙未明晰當日之背景，亦可謂已高度簡化蔣所面臨之問題。



中國在此期間所缺乏者爲宗教思想。專制時代皇帝爲天子，所頒「聖旨」有如天命，民間亦供奉「天地君親師之神位」，於是融合宗教思想、政治體系、倫理教育與社會習慣爲一爐。所以其衙門結構簡單，其向心力仍能凝聚。民國肇造後，舊思想既已與舊體制一併推翻，新人物復視所有宗教均屬迷信。（崇拜西方者不可不察：今日美國重要官員就職均須手按《聖經》宣誓，國會開幕即有牧師禱告，所有軟硬幣均鑄有「我們對上帝存信心」[In God We Trust]之一貫字樣。）相形之下，中國缺乏宗教上之向心力，亦爲當日企圖率領全國之人士所感重大困難之一。馮玉祥被稱爲「基督將軍」，親用水龍頭爲部下行浸禮；唐生智軍中拜佛，以「大悲大慈，救人救世」爲號召，即是針對此缺陷之補救辦法。

蔣介石較此二人含蓄。他雖於一九三〇年受洗爲基督徒，但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一日之日記仍寫出：「余之贊美耶穌者五：一曰犧牲精神，二曰忍耐精神，三曰奮鬥精神，四曰純一精神，五曰博愛精神。」這樣看來，他所崇仰的仍是耶穌之人身屬性（human attributes），而非接受三位一體（trinity）之神學。再加以我們知道他對王陽明之崇拜，所以敢於說蔣之宗教思想已具有深厚之人生哲學成份。

他在孫中山逝世後不久，即在黃埔舉行紀念週（實為週紀念）。其儀式包括向總理遺像及黨國旗行三鞠躬禮、靜默及宣讀總理遺囑。凡此已有濃厚宗教色彩。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又在舉行儀式時加入宣讀「黨員守則」十二條，一九三六年三月更加入「軍人讀訓」十條。守則及讀訓各有其序文。守則稱「務期父以教子，師以教弟，長官以教僚屬，將帥以教士兵」。所標榜已有恢復傳統「尊卑長幼」社會秩序之用意。讀訓更包括下列之詢問：「如何而後可以保我祖先遺留之廣大土地？如何而後可以保我繁衍綿延生生不息後代之子孫？如何而後可以保我國家獨立自主之國權？」此種問題不僅具有教義問答（catechism）之模式，並且希望透過政黨及軍隊組織，強調中國人在血緣關係中求永存（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之傳統觀念，次一步才推廣至保全領土及主權之完整。

這樣不算，蔣又經常向他的部下灌輸他的人生觀。遠在一九二四年年底他在廣州時，即作下一幅對聯：「生活之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之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蔣是作對聯之能手。）雖然至今吾人尚不能決定証實其作對聯時思潮之線索，但可猜度其可能受有佛教影響。華嚴宗提倡「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西方學者間已有人認為此種思想有助於隋唐帝國之統一。馮友蘭解釋此教義：「現象世界中每一事物皆是真心全體所現。真心包羅一切事物；故現象世界中每一事物，亦包羅一切事物。」蔣介石亦甚為崇拜陸象山（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對南昌中學生提及）。馮闡釋象山哲學，則說：「吾人之心本是宇宙全體，但普通人則常有所蔽。」這種思想固然偉大，也可能危險，即可能以個人意志當作宇宙之執行。本文上節即提及唐生智之廝殺以「大慈大悲，救人救世」之名份為之，第四篇尚有機緣提及。此間所敘只說明蔣之宗教思想及哲學思想來自多處。

他於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一日在廬山軍官訓練團講到「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研幾於心意初動之

時」，則更見得他受到新儒教的影響。此中要義即信仰 (faith) 不必從神秘主義 (mysticism) 產生，亦可得自直覺。只要在「將發未發」之際接受了某種靈感，以後則只要「擇善固執」，即可以用意志力克服一切困難。

宗教思想與人生哲學過於遼遠，在提供日用的場合上他仍藉力於「禮義廉恥」。管仲提倡四維時，以內政寓軍令，本來有全國皆兵的姿態，又開始將西周以來在各地區保持平衡的國家賦予活力，推進而為東周時代帶競爭性的國家。他也主張尊王攘夷，這標語成爲了日本明治維新時的口號。本來這些成份都可以作蔣介石團結人心，擴張本身權力之基礎。但是他到底不能在二十世紀利用法家與霸道去宣揚一個二千六百年來的復古運動。經過他解釋：「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爲，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這樣看來禮義廉恥沒有固定的內涵，視時代與環境而定。

然則一九三〇年間中國是復興民族的時代，也面臨著抵禦外侮的環境，於是蔣介石才能因著這些條件充分發揮。在他倫理體系之內，四維以「恥」爲先。對他講來，五卅慘案首爲深恥（自是在日記內每日寫下仇英字句，持續一年餘），次之濟南慘案也是奇恥（自是之後，日記內添「雪恥」一欄，前後數十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佔領東北，在他看來也還是「濟南慘案」之國恥未雪，而瀋陽慘痛之國仇又來（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日記）。在這情形下，知恥者必雪恥。所以他所說規規矩矩正正當當，決非消極在旁應付日常的生活，而是通過嚴肅的紀律參加他領導的群眾運動。

在重整道德的要求之下，蔣介石作爲領導人也不能規避。他在日記裡寫出：「以本人生命與主義合而爲一，預備犧牲一切，爲其多數人受苦，就是完全人格的表現。」（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兩天

之後他又寫下：「從前只以豪傑自居，不願以聖賢自待，今日頗欲以聖賢自責，不復以豪傑自居矣。」

(十一月十日)

此間應注意者，「自責」與「自居」不同，亦與「自待」有別。蔣介石從未自承已為聖賢，並且年近五十尚一直不願作聖賢。所以自責者出諸外界要求。以上兩條均寫在日記之「雪恥」欄內。所以雪恥運動縱由蔣介石發起，他自身亦感到所造成氣氛之壓迫。

古今中外革命家甚難成為聖賢。革命家志在改造社會。當舊道德業已崩壞，新道德標準尚未樹立之際，他們著眼於集體之成功，即不能以個人名節自矜。並且此時私人道德亦與公眾道德衝突。至此我們只能直截指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不是蔣介石之行徑，更不可能為毛澤東之行徑。日後主持抗戰，蔣尚要在長沙大火，黃河決堤，並於河南產生饑饉之情形下求得勝利，他更不可能受著傳統道德之束縛，倒與「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之思潮接近。

在他寫下前面兩段時，距西安事變只一個月又兩三天。從一個歷史學者的立場看來，這不可能再是蔣重新立志的時候。兩段文字只表現時間緊迫，和作日記者所感到的責無旁貸。



蔣介石之精神教育到底有何成效？

這個問題不能得到一個公平而確切的答覆。抗戰逾四年後即有太平洋戰爭，中美並肩作戰，以後又有內戰展開。凡與蔣軍事政治意見不合之人物，包括本文業已提及之史迪威、白修德諸人以及不少受過西方教育之人士，尚未閱及蔣之文字，已認定此人陳舊呆板，看錯了時代，誤解了他本人

在歷史上之任務。即使是很多不願公開批評他的人士亦以爲他不注重實際問題，在百忙之中仿效宋儒，圖解《大學》，殊堪遺憾。尤在此方面影響他至深之戴季陶及陳布雷，又均在大陸淪陷之前自殺，可見得他們都以一死卸責，表示他們生前提倡忠孝觀念及哲理已使蔣誤入歧途。反面則與蔣接近之人士認爲整個問題不容辯論，不僅蔣所頒傳之一字一句皆爲真理，而且在他受頓挫之後橫生議論均屬「無恥」。

即使數十年後我們從歷史之角度分析亦感困難。首先即無從找到一個足以比較之憑藉。當日中國缺乏合乎時代之社會架構，一般人民知識未開，高級人士則議論多於實際貢獻，軍人亦受地域觀念及將領之人身關係束縛，一般離心力強，向心力薄弱，倘非蔣在此時以神學與哲學、道德與紀律拳拳規勸，其結局如何無法臆度。

中國知識分子慣以本身之觀感視作全國民意之向背。但蔣介石之精神教育不僅利用多方面之文教因素，其旨意亦對社會各階層放送，有如在廬山軍官團鼓勵青年軍人與自然接觸，曾以「日光空氣水」爲題（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一日）。不久之後即有人作爲軍歌：

起得早，睡得早，

日光空氣水，

蔣委員長說他是三寶！

這對不識字之農民士兵產生如何印象始終無人注意，遑論及衡量其影響。

管仲提倡禮義廉恥旨在富國強兵。蔣介石提出精神與人格，其著眼在對付日本，此已在與黃郛

談論時道及。我們仔細閱讀他當日之演講辭，即可窺見他企圖與部下成立協議（Covenant）：如果你們絕對服從我，我可以保證你們打敗日本。（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有下面一段：

我們有一個革命的領袖，一定有抵抗外侮復興民族之革命戰略和戰術。只要大家能絕對服從革命的統帥，在一個最高命令之下，要我們守就守，要我們攻就攻，要我們退就退，要我們進就進，要我們生就生，要我們死就死，如果能夠如此共同一致，服從命令的話，一定可以有革命的戰術戰略，可以戰勝一切，達到我們最後的目的。

以下又有一段，更將第三人稱的「革命的領袖（統帥）」換為第一人稱的「我」：

我可以相信，如果有六十萬以上真正革命軍，能夠絕對的服從我的命令，指揮統一，我一定有高明的策略可以打敗這小小的倭寇。老實講，他們那一般驕妄愚蠢的軍人，完全不在我的眼中，我一定有辦法可以戰勝他們。而最要的条件，就是要指揮統一。

我們無從否定如此之訓示與抗戰初期中國士氣的旺盛有絕大的關係，甚至懷疑以當日的情形而論，若非有此精神上之激勵，中國是否敢於與日本作戰，又開戰後不出六個月而平津京滬相繼失守，此戰局是否可以繼續維持。但是即在提議作以上口頭協議時，蔣並無充分把握。他在講後數日即在日記中寫出：「禦侮抗日，決非以武力可與之競勝，亦非以外力可以牽制，此時惟有在內政、社會、教育制度中，即在國民軍事教育與團練保甲之中，積極努力，行之五年，由小而大，則或有萬一之效也。」（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盧溝橋事件即在此段寫出後四年尚欠二十天內爆發。

即是在講述〈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時，他已暗示外援的需要。下列一段出現於上抄兩段之間：

雖然緒戰失敗，我相信到最後必能得到一戰成功。因為用這種革命戰術「拿我們的血肉來抵抗敵人的鎗礮」，他們佔領我們一省，至少時間就說是一個月。如其統計起來，他們要佔我們十八省，至少要費十八月。這十八月時間，**那國際形勢的變化還了得？**何況他一個月必不能佔領我們一省呢？（文中黑體字出自本文作者）

他在長城抗戰期間，也會在一次軍事會議裡提及：「……長期的抗戰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預料國際上總有新的發展……」（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

中國之弱點不一定是蔣介石個人的弱點，可是身為統帥，蔣委員長卻要對這些弱點負責，中國之抗戰不能不依賴外界之干預及援助，雖說太平洋戰事展開之前，國軍單獨撐支了四年五個月，已算是創造了奇蹟。而蔣不能最後一戰成功，已使他的勝利無光失色。再接著又有美國輿論之指責和一般中國人之怨聲載道，更使蔣之長處看來不如他的短處。

原來蔣之精神訓練在內容上確有虛浮而不相啣接的地方。有如宗教與哲理甚難今日講說，明日付諸實施。過度的依賴心學的理想主義與意志力，也難持久。即算蔣介石能用紀律約束自己，他貼身的部下也不見得能如是。所以他主持的精神訓練造成了一種對他人身崇拜之氣氛，而用以作為一般人之倫理道德標準則為效甚微。因為如此，他的標語與口號不免被傳統的官僚主義之作風籠罩。承認它們為現實，有等於繼續專制時代真理自上而下的習慣。一到戰後，不少的人索性以為他的節目全屬本末顛倒，無一是處，而他所標榜的道德也可以用作口實，對他反唇相譏了。



然則這樣的發展並不是一九三〇年間的情況。在抗戰展開之前五年內，蔣介石引用德國顧問，將陸軍之典範令修訂公佈；任用俞大維使步兵兵器標準化；設立軍用化學工廠，使最基本之軍械彈藥自足；空軍擴充至飛機六百架（雖則實際能對日作戰的只二百二十架）。南京政府又積極在各省督導修建公路，粵漢及浙贛兩鐵路也在這時期完成。一九三五年共軍開始「長征」之後，中央軍亦因「追剿」，將力量推廣至雲南、四川、貴州三省，茲後此地區即與陝西同為抗戰後期之大後方。這種種種措施構成了對日戰爭最低度之準備。此外幣制改革，法幣用紙，白銀國有；公佈兵役法，開始徵兵，才使全面抗戰可能。而蔣又令宋子文、孔祥熙、蔣廷黻諸人遊說美、英、蘇聯各國，以爭取外交主動。大概愈近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以上準備愈為明顯，蔣介石之聲望愈為提高。一九三五年蔣曾親赴太原及泰山，面邀閻錫山、馮玉祥來南京。當年八月胡適曾說及：「蔣先生成為全國公認的領袖，是一個事實，因為更沒有別人能和他競爭這領袖的地位。」一九三六年粵桂稱兵不成之後，李宗仁來廣州，蔣先往拜見。西安事變時，周恩來主張不對蔣人身危害，因再無他人可作國家之領導人。

蔣自述他在這段期間之所謂「埋頭苦幹」，曾在日記內寫出：「以和日掩護外交，以交通掩護軍事，以實業掩護經濟，以教育掩護國防，韜光養晦乃為國家惟一自處之要道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四日）

他無力打敗日本，卻對日本之必敗深信不疑。他的日記內對彼邦有以下之一段：「（一）對中國思

不戰而屈。(二)對華只能威脅分化，製造土匪漢奸，使之擾亂，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國。(三)最後用兵進攻。(四)中國抵抗。(五)受國際干涉引起世界大戰。(六)倭國內亂革命。(七)倭寇失敗當在十年之內。」(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此節所敘與〈友乎？敵乎？〉裡面的設想符合。內中除第(六)節未成爲事實外，其他均切合日後事實之發展。

但是直到西安事變之前夕，他仍希望將全面抗戰之展開延遲。有如下段日記所述：「三年之內，倭寇不能滅亡中國，則我何患其強迫，但此時尚不可不隱忍耳。」(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他在觀察空軍表演轟炸戰術之後又記下：「空軍成績漸著，以三年之精神與夫人之協助「當時蔣宋美齡任航空委員會秘書長」，而得有今日之成績。五年之內期趕上倭國空軍，則可以保我國家安全矣。」(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二日)實際上則他沒有三年五年的時間，寫下上段之後不出九個月，即有盧溝橋事件之爆發。

第三篇

不畏鯨吞，而怕蠶食

盧溝橋事變——蔣之「四點最低立場」——
廬山談話——淞滬戰役——華東戰場被突破——
南京失陷——軍令與動員——初期作戰的犧牲及其意義——
供應與後勤——和議與德使陶德曼之調停——
「戰敗者無禮之言辭」——武漢期間之整備——
蔣之「三種賭博」——各種作戰因素無法協定情形——
台兒莊及徐州——指揮系統內實情——
「中共問題」之初期露面——兩種群眾運動——
黃河決堤及長沙大火——汪精衛之降日——
軍校校長、四川省政府主席及農民銀行理事長——
戰局僵持與磁鐵戰術——「中世紀國家」之實情——
「貪污無能」——吃缺與走私——人力資源之每下愈況——
高層機構與基層組織——「敵必殺余而甘心乎？」——
蔣人身上之弱點——「正義——權宜——正義」——
豐悌、程澤潤、廖齡奇、張德能——
「若非中華民族其誰能之？」——新四軍事件——
刻板印象與機動外交——《走上珍珠港的道路》——
「臨時妥協辦法」及「基本整體提議」——「物極必反，能不戒懼？」

盧溝橋事件發生在深夜，蔣介石之反應見於次日日記，現已公佈部份，只有以下兩段，顯見當中文句有被剪截或遺漏之處：

倭寇已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或故與宋哲元為難使華北獨立乎？

倭已挑戰，決心應戰此其時乎？（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大事長編》與《秘錄》所摘全部相同。）

既然兩段都以疑問號終，只有此中省略的或未寫下的文句才能表示他實切的反應。當日他的為難可想而知。如果環境容許，他當然希望將對日戰事拖延下去。自一九三五年以來在中日衝突中間愈見得對中國有利。一九三六年兩廣稱兵失敗後全國之統一達到前所未有之程度。而蔣之空軍擴展計劃尚需一段時間完成。蔣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五日接見《大公報》之張季鸞及《申報》之陳景韓亦提及整理軍政，延攬各省人才，由近及遠，尚需三年至五年。但即在此時期，民間要求對日作戰之情緒已如荼如火，如果政府再有任何忍讓或即缺乏積極的行動，必為民意所不容。

國共兩黨之談判已開始於西安事變之前。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周恩來及潘漢年曾與代表南京之張冲在上海接觸。潘隨即赴南京與陳立夫談判。當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又致書國民黨稱「貴黨」，呼蔣為「委員長」，謂彼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所作外交報告內稱「假如有人強迫我們欲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為共黨所歡迎，可以作為重新合作的基礎，可是未見下文。

關於西安事變已有蔣之《西安半月記》及蔣夫人之《西安事變回憶錄》。歷史家獲得共識，蔣在

被釋前口頭承允停止內戰、釋放愛國人士、與共黨談判等要求。現尚為專家所爭執者，為該等要求是否曾由宋子文及蔣宋美齡簽字擔保。但從大歷史角度看來，蔣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向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報告時列舉張學良等八項主張，即等於承諾，以後並付諸實施。簽字與否之細節已無關重要。總之自此蔣已不能繼續其剿共軍事。一九八七年出版之《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並指出：

「一九三七年」二月至六月中旬，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等同國民黨代表顧祝同、張冲、賀衷寒、蔣介石等，先後在西安、杭州、廬山進行了多次關於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談判。在談判中，周恩來多次重申中共中央向國民黨三中會所提出的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並提出中國共產黨草擬的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共同綱領。蔣介石等雖然多方延宕刁難，企圖限制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革命根據地的發展，以達到其「溶共」的目的，但也不能不在原則上承認國共合作抗日，並同意紅軍編為三個師四萬五千餘人。

這種談判業經國民黨文件證實。《大事長編》即有：「電西安顧祝同主任，指示與共黨周恩來談判要點。最要注意之一點不在形式之統一，一國之中不能有性質與精神不同之軍隊。簡言之，要其共同實行三主義，不作赤化宣傳工作，若此點同意，其他皆可商量。」（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日）

在此之前蔣已於一月三十一日指令發給共軍津貼每月二十萬元至三十萬元，《大事長編》更敘及蔣於三月二十六日在杭州及六月八日、九日在廬山三次接見周恩來證實他自己參與兩黨談判，所以聯合戰線已在盧溝橋事變之前粗具規模。其唯一邏輯上之用場即在對付日本，因此永定河畔之午夜

鎗聲不論，蔣介石已接受到西安事變之前之後的壓力，除非他出面主持對日作戰，他在內外領導的力量都會成爲問題。

盧溝橋事變由於支那駐屯軍在夜間演習時一名士兵失蹤而產生。要是過去類是情事重見疊出均被日人用以稱兵而作爲提出要求之藉口則此次事件更爲特色。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十時三十分演習時據稱有人向日軍實彈射擊，中隊長立即停止演習集隊點名，此時發覺一名兵士失蹤。雖即據日方紀錄此兵士志村菊太郎已於二十分鐘後歸隊，但只因此事已向上級報告，於是上下混同，無人認錯，立意要追究實彈射擊之由來。全大隊已得有聯隊長之許可開始向永定河岸中國軍之陣地攻擊，企圖捕俘作證，以作交涉之藉口，並於天明前要求入宛平檢查。戰後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之被告證人則稱向日軍射擊者爲「學生」、「第三者」、「共產黨人」。

蔣介石在七月十九日發表他的「四點最低立場」時（詳本書一六九—一七〇頁）即已提及：「這次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或有人以爲是偶然發生的，但一月以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的徵兆。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後還是傳播著種種的新聞，說是什麼要擴大塘沽協定的範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第二十九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見這一次事件，並不是偶然，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求平安無事，只有讓人家軍隊無限制的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鎗，而我們不能還鎗。換言之，就是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極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

既然如此，爲甚麼在他七月八日的日記蔣仍用三個疑問號質詢自己？

日記分兩段。第一段又提出敵方行動包含兩種可能性：一是敵軍全面進犯，消滅南京政府之一切軍事配備，席捲大陸。一是擴大塘沽協定的範圍，增強駐屯軍在華北的地位。在他看來，由日方主動而採取第一路線的公算不高。日方之著眼在不戰而屈人之兵。當一九三六年夏日本藉成都事件與北海事件要挾時，曾由駐華大使川越茂向蔣提及如此類案件不得完滿解決，日本將佔領青島及海南島。蔣即在當日日記裡寫出：「倭寇威脅間接甚於直接。若無卓識能力，鮮不爲其所撼也。」（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數日之後他與吳鼎昌、王世杰論外交，又留下以下之紀錄：「余始終認定倭寇此時尚不敢與我正式戰爭，不久彼必覓一迴轉之途徑也。不過我早準備整個之計劃，如戰事一開，決爲長期戰爭，以期最後勝利耳。」（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日方之企圖似在鞏固華北之地位。蔣介石在〈友乎？敵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文中推測日本之真正敵人爲蘇聯。其所以在華北孜孜經營者，旨在保持側背之安全。而蔣亦無意爲俄打先鋒，而希望在日俄衝突之過程中發展中國之實力。在這大前提之下，只要對方不強迫其承認滿洲國，彼亦願意將此東北問題擱置不談，但須日本保證不再侵犯中國之領土與主權，並取消塘沽協定，此亦即他與川越談判之基本條件。一年之前他曾寫出：「在中立原則上而不妨礙倭之抗俄程度以內與之談判。」（一九三六年三月三日）西安事變之後此情形已不可復再，但他仍提醒自己：「而最要者，在使共黨明瞭中國抗日須以中國爲本，而非爲其他國家抗日也。」（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直到盧溝橋事件之前夕他仍未放棄「全師爲上」之宗旨。他的日記裡有此一段：「中國應具必戰之決心而後可以免戰，必如是乃得達成不戰而收復失地之目的。」（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至此距事變只六天。以後看來，

無論對內對外，此種公算均極渺茫。只有七月八日日記之最後一句「決心應戰此其時乎」才切合事實。所以寫下這段之次日即七月九日，他命令孫連仲等所屬之四個師開往華北，向保定等處集中。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的中日戰爭包含著不少的特殊情節。中國最高統帥在日本受過入伍生的訓練，在其部隊裡當過兵。他的助手像何應欽、黃郛、張群、熊式輝和蔣作賓等，均對日本有深切之瞭解。對方日本無此現象。中國為被侵略者，內部組織鬆懈不全，但反有一個主帥從前至後主持，日方缺乏同樣之對手。而且日本之注意力完全著重短期間之優勢。蔣介石雖說在局部的爭執中經常對日容忍退讓，他在公私場合中卻又一再提出：他要和日本較手的話，必為長期間大規模的戰爭。可是這立場從未為日人重視。遠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在南昌主持軍事整理會議時，蔣即已提出：

所以我們如果採取一線配備與之一次決戰的抗戰計劃，就是所謂孤注一擲，一敗之後將永無復興之望了。因此我們現在對於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就是作長期不斷的抵抗。他把我們第一線部隊打敗之後，我們再有第二第三等線的部隊去補充；把我們第一線陣地突破之後，我們還有第二第三各線陣地來抵抗。這樣一步復一步的兵力，一線復一線的陣地，不斷的步步抵抗，時時不懈，這樣長期的抗戰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預料國際上總有新的發展，敵人自己國內也一定有新的變化，這樣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線希望。

這話講在盧溝橋事變之前四年，雖說蔣在開戰時尚無從完成他理想上的準備，以上要領卻已構

成八年抗戰之決策，包括迎候國際環境之變化。日方缺乏如是一個全般作戰之概念。即以智囊見稱之東條英機，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九日猶在參謀本部建議：「以支那民族性而論，日本方面如對國民政府進而謀求親善，則只會增長其排日侮日態度；反之，卻宜有給予之一擊的必要。」所述口頭親善必更引起中國人之反感，反足以鼓勵排日運動，非不真切。此段言論之弱點在其忽視問題之嚴重性，亦即未曾看透「一擊」可能產生之後果。

林三郎大佐曾在一九四〇年間任日本大本營內之蘇聯課長，後又主持動員。他所著書稱《太平洋戰爭陸戰外史》（此間根據英譯稱《皇軍》，即 *Kōgun*），內中說及盧溝橋事變前日軍計劃注重對蘇聯作戰，雖然向蘇進攻時須同時應付中國，但參謀本部並未準備實際與中國軍作戰，不過預定以兩個至三個師團兵力佔領平津一帶，一個至兩個師團佔領上海及其周圍，另一師團佔領廈門、福州、汕頭。以上最多不過六個師團。（戰事結束時，在中國戰區之日軍包括越南北部共三十六個師團又四十一個旅團。）一九三六年由參謀本部作戰課長石原莞爾所擬對天津駐屯軍之訓令，猶囑其訓練官兵時應以蘇聯為對象。及至戰局展開，參謀本部仍以永定河為進兵之限度。淞滬戰事展開之後，大本營（成立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則以南京為最後之目標。直至次年徐州會戰之後，方始放棄所有局部化及不擴大之政策。

當盧溝橋之消息傳至東京時，首相近衛文麿、海相米內光政、次官山本五十六與外相廣田弘毅均以為此事係陸軍製造。近衛組閣至此才一月。當初他確有和平為懷之趨向，也稱不擴大、就地解決，但已無從掌握全部局勢。林三郎書中提及：「這不擴大的政策亦不徹底，日本政府、軍部，及駐屯軍內各有強硬派。他們堅決的相信，日本應利用這機會給中國以打擊。」軍部之擴大派在事件

消息傳來時即在草擬增兵計劃。七月十一日駐屯軍已與第二十九軍（宋哲元）成立協議，但同日獲得孫連仲部北上消息，東京之五相會議（首、陸、海、外、藏）仍發表向華北增兵之公告。至七月二十七日指令出動之軍隊有關東軍兩個旅團、朝鮮一個師團、日本本土之三個師團。這樣的兵力不僅遠逾條約之範圍（義和團肇事後，各國協議日本得在平津及秦皇島間駐兵二千六百人；一九三六年日本擅將之擴充至六千人，此次增兵已近十萬），尤與駐屯軍保僑自衛之宗旨全不相侔，於是大規模的戰爭已不能避免。

近衛爲日本貴族，年輕時提倡個人主義及社會主義，主張國際間之正義及和平，雖在九一八事件之後開始與右派政客接近，至此猶負有「新人近衛」之名。及至派兵往中國，戰局展開後，則數度發言「膺懲暴戾支那」，打至其「屈膝」爲止。戰後被盟軍列爲戰犯，在將被逮捕之前舉鎗自殺。



七月十六日蔣介石在廬山召集全國知名之士一百五十八人舉行談話會，次日又有中共代表周恩來、秦邦憲與林伯渠的參加。蔣發表的談話以後見諸文字，內有：

戰事一起，則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均應抱定爲國奮鬥之決心，與敵作殊死戰。如有中途妥協與喪失尺寸土地者，即爲中華民族歷史上之罪人。軍人守土有責，雖戰至一兵一鎗，亦必與敵抗戰到底。

十八日他提出對日交涉之四個條件爲：

(一)任何解決不能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

(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

前面一段讀來如誓辭，後面四條有如「反最後通牒」，亦即不待敵方提出，先已將其想見之要求代爲列舉，並以四個「ない」斬釘截鐵的拒絕。七月十九日再將這些文件全部公佈。

中國被逼而應戰，但是這一紙文書卻與宣戰相去不遠。蔣介石作此宣言，當然也知道對方極難含默承受。其癥結不在文中之是非曲直與國際法，而在東京之政治氣候。一九三〇年間，日本已被陸軍中激進少壯派及右翼團體包圍威脅，舉凡主張公平持重之政治家、堅持穩健保守之理財者、約束軍紀之將領均經先後被刺殺，其壓力及於文化界教育家及實業家，輿論亦只能支持急進政策，所以也缺乏轉圜餘地。近衛之以強硬言辭鼓勵對華軍事行動，廣田之標榜三原則，日後使兩人同以戰犯之名目殞身，山本五十六反對對華戰事不得，成爲珍珠港奇襲之策劃者，終至「機上戰死」，都只表示當日日本國策已被實力把持，不容煞車。

蔣如果此時對對方政府負責人具有同情，則不見於當日之文墨。只是盧溝橋事件擴大後雙方不宣而戰，又五個月後南京棄守，與蔣接近之《大公報》主筆張季鸞在上海租界內邂逅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川越對張言及要救日本即救不得中國。張以此口語傳告蔣，給蔣印象至深。又五年餘，他在日記中猶提及此語，有云：「在我軍由南京轉進後，季鸞在滬遇倭駐華大使，彼語季鸞曰：『今日欲救日本，即不能救中國。』其意此時若放鬆中國就不能救日本。當時吾聞之悲慘無已，終身莫忘，可知倭國文武皆以爲非滅亡中國決不能求生存，其愚昧至此，乃有今日之遭遇。故倭之亡國，

咎由自取，要無足惜。然吾人不能以此爲恨。吾人心志與懷念，實苦無法以挽救今日倭國之危亡也。無如若欲救日必先自救。自救即所以救彼乎？思之悵然！」（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此已是抗戰後期事。在他發表廬山談話時，只加入這樣一段：「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爲東方民族作一個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於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致於漠視。」

當日之日記則有：「政府對和談表示決心，此其時矣。人以爲危，我以爲安。立意既定，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對倭最後方劑，惟此一著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九日）

從這幾句話裡看來，他並未認爲和平的希望已完全斷絕。此際他所發的仍是「和談決心」，而不是宣戰宗旨。他所謂最後方劑，也仍是引用《書經》裡所謂「藥勿瞑眩，厥疾弗瘳」的解釋，亦仍望在不擇手段之餘有起死回生之功效。

然則這也不過是寄希望於萬一。寫下上段之後，他又接續的記出：「談話稿既發表，只有一意應戰，不再作迴旋之想矣！」（同上，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九日）他所謂不再作迴旋之想，乃是策勵自己不要再作迴旋之想，並非早已不作迴旋之想。抗戰關係國家之生死存亡，他自稱中國爲弱國，早已洞悉兩方力量之懸殊，即是應戰此決心亦不容易遽下。

一週之後他又再度寫出：「自昨夜至今晨九時，倭向廊房我三十八師攻擊，申刻又在北平廣安門挑戰，是倭必欲解決冀察與宋哲元部也……」〔以上代字號照《大事長編》原文〕茲既遭此必不能免之戰禍，自當一意作戰，勿再作避戰之想矣！」（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在這一週之內，他已經過看來好像是再三反覆的階段。派往華北的軍隊亦只駐在保定與滄州，

再未前進。這一方面固然由於他希望獲得國際同情，不願主動的擴大糾紛。他在七月十六日尙且邀請英國駐華大使許閣生 (Sir Hughes Knatchbull-Hugessen) 出面調停，提議彼此停止增兵，但無效果。另一方面則由於宋哲元部態度不明。宋哲元爲馮玉祥舊部，雖在中原之戰後歸順中央，並參加一九三三年之長城戰役，但在軍令軍政各方面始終保持半獨立之姿態。盧溝橋事件發生後，蔣曾三次電令宋哲元移駐保定，宋均未遵行。蔣所獲得前方消息，全係戴笠 (軍委會調查統計局科長) 之密報。宋在七月二十四日由熊斌 (參謀次長) 帶回之書呈尙稱：「刻下擬請鈞座千忍萬忍，暫時委曲求全，將北上各部隊稍爲後退，以便和緩目前，俾得完成準備。」三日之後局勢不可收拾，他才電請中央軍「星夜兼程北進」。而同時期內，蔣予第二十九軍之訓示亦有前後矛盾之處。迄至七月二十六日蔣寫下「勿作避戰之想矣」時，日軍已完成準備，決定於次日拂曉前發動總攻擊，先佔領北平次及於天津。

所以七七抗戰之決心包含著許多複雜因素，牽涉內外遠近。表面看來全由蔣介石一人作主，其實不然。而且蔣所表現之矛盾牽涉到不能由他全部控制之因素。

自盧案發生，至日軍於七月二十八日向南苑發動總攻擊，當中約二十日。這二十天內蔣之態度可謂極端堅決，又仍離不開內在之猶豫。除因身不自主之外，此間出入也不可能與蔣介石本人之情緒無關。自九一八事變之後，他一直稱日本爲「倭國」；在被日人一再凌辱時，他曾產生對彼等深絕痛惡的態度。可是他又始終保持個人對日本精神之敬佩及與若干日本國民人身上之好感。抗戰後期，一九四四年一月十日，他在重慶對青年軍第一團從軍學生訓話，講到一九〇一年他在本州北部新瀉縣爲入伍生時，時值地凍天寒，但所有的士兵仍要在清晨到馬廐裡以稻草擦馬，一直擦到馬的血脈

流通，而擦馬的人自己身體也發熱出汗。接著說：「這是我生平最大的學業，到如今還覺得以苦爲樂不懼艱險的精神，自認完全得力於此。」

對這種經驗的感激與留戀，不足以改變或束縛對日抗戰之決心。可是以最高統帥的身份對這樣的一個國家形同宣戰，則免不了胸中的塊磊起伏。我們知道蔣介石雖極端以紀律約束自己，也仍是一個極易情緒激動的人。從上面張季鸞與川越茂的故事看來，我們知道他情緒之起伏足以影響到他寫日記時之態度。

另一方面他對史達林一直不存信心。對日抗戰則必聯俄。當時蘇聯提出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蔣在其日記裡寫出：「蘇俄之外交詭詐無比。如蘇俄先與我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藉以威脅倭寇，亦要求倭寇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而作固守中立之計，此亦不可注意也。」（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

蔣介石原望日俄開戰，中國中立（詳一九三六年三月三日日記，本書一六〇頁）；現在的局勢則是中國與日本進入長期的戰爭，蘇聯中立，史達林觀望。蔣介石對這事態的發展也不能無介於懷。

在七月八日盧溝橋的消息傳來時，蔣介石立即感覺到他自已僅有可能的行動及其長期之後果，總之就無可規避。但是在決策的當頭仍有很多側後之顧慮及牽掛，這也怪不得當時的日記引用了很多肯定的語氣，卻又穿拖出來不少的疑問號。



白修德在抗戰期間初爲中國僱員，在重慶國際宣傳處工作八個月，爾後繼爲《時代》週刊之客串記者，終爲特派員。他的報導，常將中國在世界潮流中落後，希圖趕上的過程中，各種因素脫節

而不能協定的窘態，視作各個人有心之過失或道德上之虧損；也常將舊社會之習慣解釋而為現代中國人之人身性格。所以他把抗戰期間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歸咎於蔣委員長（本書作者對他的批評及通訊見《地北天南敘古今》）。除此之外，他提供的事實卻也表現他身入其境，觀察犀利。他對蔣在七月初至八月中旬的決策有下面一段綜合的敘述：

蔣注視著日人初期在華北之活動，不能下決心。在這一個月內，他出入於兩端：還是決心作戰，還是承認中國之積弱不如人。可是主意既決，他著意抗戰時，他採取了一項辦法，將日人野心所構成的圓滑軍事政治體系拖垮。日人滿望在北方打，到南方來談判。蔣選擇了一個全民抗戰的辦法，引導敵人到長江下游他自己方寸之地應戰。這區域接近他的內部基地，他的部隊已在此集中待命。

此即是「八一三」上海戰役之背景。觸發戰役之事件至今尚不能全部解釋。八月九日，有日本海軍陸戰隊中尉大山勇夫與一等兵齋藤要藏二人駕駛黑色汽車往滬西虹橋飛行場偵察，與該處中國保安隊衝突。大山殺死保安隊員一人，保安隊亦將大山與齋藤射殺。

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件之後，日方即在公共租界北四川路底建有防禦性之「大日本海軍特別陸戰隊」營房，以鋼骨水泥構成，下有地道，儼如要塞。十一日後，即有日軍艦十餘艘泊吳淞口外及黃浦江內，陸戰隊之三千餘人亦增至七千餘人，但日方仍稱事件將不擴大。

但如日本海軍企圖製造事件，扼守控制中國海港，則中國方面已採取主動。當八月十三日戰事開始時，蔣立即指令第五軍之三個師向日駐軍攻擊，內第八十七及八十八兩師曾在「一二八」戰役與對

方交鋒。顯然中國之採攻勢出於敵方意外。八月十四日之《紐約時報》載有如下八月十三日之東京通訊：

上海局勢之展開，將強迫日本政府考慮在中國兩個前線作戰。雖說大山勇夫中尉之被殺，有如盧溝橋事變，事前無法逆睹，此事卻給中國政府一個機會去攪亂日本在華北的戰略。

蔣日記內無對兵力部署之詳細記載，但恰當此時提出：「對倭作戰，應以戰術補武器之不足，以戰略彌武器之缺點，使敵處處陷於被動地位。」（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此段可以證實《時報》及白修德所云蔣在上海採取主動，使對方無法避免大規模的戰事即迅速達成在華北作戰之目的。

《紐約時報》並且說起上海有日僑五千人無法將之棄置不顧，日本從華北抽兵亦不可能，增兵上海則其兵力必相當的大，方能應付蔣所部受過德式訓練之精銳。當日東京的電訊並已包括下列之揣測：

此間極端的猜疑南京政府已決計將日本捲入華中戰事之中，以分散其兵力，並增加其對各國產生糾紛之可能。中央軍已有三師在上海，其他部隊原以為擬調華北者亦在上海移動中。此間猜測中國遷都武漢之行動業已早在進行之中。滿載文書檔案之輪船數艘業已離京，現在揚子江之途中。

蔣介石選擇在淞滬地區作決定性的戰鬥，基於數個不同的原因。當五年前一二八戰役展開時，他名雖下野，實際仍在幕後調度主持。自此他深以為利用當地河流灣汊中國方面之劣勢部隊可以抵

擋裝備優勢之敵人。淞滬戰役一開，增援部隊調自廣東、廣西、湖南、四川、江西、浙江各地比較適用於江南，而淞滬地區也得有後勤的便利，尤接近他自己的空軍基地。上海是一座國際都市，他希望將中國抗戰精神影響到國際視聽。但是除了這一切之外，他最重要的目的還是要強迫日本和中國全面作戰，不給予東條英機所謂「一擊」之便宜，亦即否定日人以短時間局部優勢所獲得戰勝之成果。

這種戰略上之用心已由他在七七事變之前之後不斷的說出。其提到中國則「所畏不在鯨吞而在蠶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南京撤退後告全國國民書〉，以後在八一三週年紀念〈告戰地民衆書〉又再度提出），對日本說則「常備兵總額十七個師團全部調來尙且不敷……至此必徵調及後備役與預備役，如此則日本就是與中國正式作戰。與中國正式作戰，就不是我上面說過僅僅控制中國北方範圍以內的事……」（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友乎？敵乎？〉）

說來也難能相信，他所說在本國及日本印象淺，倒影響到海外傳媒。美國《時代》週刊在八一三後專闢一欄上載中國領土四百餘萬方英里之數下載本週之前被日本佔領若干方英里，本週又續佔領如是若干方英里，以托出蠶食與鯨吞之意義

戰後蔣緯國著文稱，抗戰初起時乃父顧慮日軍立即沿平漢路南下，所以一面在北方給敵側後威脅以分散其兵力，一面將本軍主力集中於華東地區強迫對方將主攻方面由南北軸心改爲東西軸心。

淞滬地區之攻防戰，國軍不能算是盡到戰術上之至善。最初一星期，蔣使用三師兵力企圖在敵

陸軍增援之前殲滅其海軍陸戰隊，並佔領其在閘北之據點。戰事開始第一日即有第八十八師旅長黃梅興陣亡，可見得戰況激烈。攻者雖佔領敵外圍陣地，並一度迫近其要點滙山碼頭，終因火力不如人而攻擊頓挫。戰後日海軍陸戰隊營房爲第三方面軍接收，此建築物上凡經鎗礮損傷之處，雖經日方修葺，但其彈痕仍特別留出標示，以作歷史例證。觀者可以看出，命中之處雖多，而所用非重兵器，不能盡摧毀殲滅之效也。此亦爲今後八年國軍作戰之最大弱點。

第二星期，敵第三及第十一師團已在滬北吳淞一帶登陸，國軍亦增援四個師，仍企圖爭取主動，於八月二十四日發動總攻擊，旨在消滅敵橋頭堡陣地，亦未能見效，以後攻擊只能採取夜襲方式。

淞滬戰役歷時約三個月，正面敵軍有六個師團及附屬部隊，亦曾發動總攻擊四次，陣線移動一般在五公里之內，所以寸土必爭，雙方死傷慘重，國軍所受損害又遠逾於對方。此爲八年抗戰中惟一一次之大規模的陣地戰，今後再無類是大部隊集中於一個小地區作戰之事例。

在此期間，蔣介石雖亦顧及華北戰事，但其主要視力則集中於淞滬戰場。自八月二十日之後即自兼第三戰區司令長官，下轄江浙，並曾四次往前線視察。

據參與戰役之官兵云，此期間最令人恐懼者爲敵礮彈。國軍陣地幾全在敵海軍礮射程之內，敵之野戰礮即可以全部支援步兵。九月之後，國軍空軍即因損失慘重，只能在夜間出現。德顧問法肯豪森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八月二十九日之報告已謂戰地制空權全在對方之手，所以日礮兵觀測員可以用氣球鳥瞰國軍陣地，國軍之整個部隊犧牲者，有九月七日寶山失守時之姚子香全營六百餘人，九月十八日又有秦慶武之全團殉難，其他部隊之死傷一般均在一半左右。

戰後何應欽稱：「此一時期淞滬會戰國軍表現最爲特出。日軍先後使用兵力達二十萬人，持續

進攻歷時約十週之久。國軍以劣勢裝備憑血肉之軀拚死抵抗，每天都要增援一兩個師補充傷亡。十週之內我軍消耗竟達八十五師之衆，傷亡官兵三十三萬三千五百餘人。」

從現已公佈之蔣日記看來，淞滬地區作戰無全般計劃。最初蔣希望以優勢兵力消滅敵之據點，此計未酬，他即下令嚴守一九三二年第五軍及第十九路軍在一二八戰役之防線，逼近黃浦江西岸，此陣線被突破，他再扼守羅店、大場、滙藻濱之線，距原陣地仍不過五至十公里。凡此在精神上不與不放棄「寸土尺地」之原則背離，他從未作敵方可能使用之兵力及進攻目標之判斷，本軍防守期間之預計，全面反攻計劃，次一步之戰略防禦，和總預備隊之區處與控制。從日記文字看去，這一切均未經考慮。

有如：「自二十三日倭寇在獅子林、小川沙鎮與張華濱各處強襲登陸以後，我六十七師進攻川沙不利，羅店爲敵佔領，吳淞線又被突破，我軍遂轉入被動地位矣。」（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日記內無爭取主動之表現。

及至左翼胡宗南之陣地被突破，他又寫下：「我抗戰決策既定，滬戰雖稍有不利而心神仍泰然也。」（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也仍缺乏次一步之打算。

即使陣地被突破他也只能施行局部之逆襲，談不上反攻。如是堅持近三個月，終有十一月五日對方新組成之第十軍下轄三個師團在杭州灣登陸成功。此舉顯然出蔣意外。前述德顧問八月二十九日報告，尙主張「長期抵抗宜永久依托上海」，並指稱日軍企圖在江浙各處登陸，不過佯動性質，其目的在「轉移我視線，使我向各該處分遣兵力」。而蔣自己更沉湎於敵方「常備兵總額十七個師團全部調來尙且不敷」之一觀念，不料日本動員立即及於預備役，在江浙地區可能使用之兵力達三十萬

人，凡第一〇一師團及第一一四師團之番號均爲常備役之所無。所以蔣介石在上海地區集結兵力迎戰，可能出敵不意，而敵之對策亦出蔣之不意。

敵方在金山衛登陸之後，蔣之反應見於次日日記，有云：「保持戰鬥力持久抗戰與消失戰鬥力維持一時體面兩相比較，當以前者爲重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這一段更暴露他缺乏預籌戰略上第二線防禦之計劃。如有此計劃，此間之體面問題根本不應考慮，撤退已毋庸躊躇。

日記更有一段：「蘇州河南岸以兵力使用殆盡，不能不令撤退，但並非爲金山衛登陸之敵所牽動。惟藉此戰略關係，使敵知我非爲力竭而退，不敢前進，此乃於將來戰局有利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

源於他自己所謂積極想法，蔣介石經常在失意時安慰自己，有時不免在日記中自圓其說。此時他希望對方將他的總退卻看作側翼行動之後果，而並非正面實力不支。其實此間區別，亦甚難矇哄熟練之軍事家。倒是今日我們看來，更可以窺見當時主帥蔣介石未及考慮情況尚在彼掌握時自動後移進入第二線陣地，利用有利地形及生力軍抵抗，而必候至山窮水盡時被迫後撤。

總退卻令於十一月九日下達，此時敵軍已迫近松江，於是國軍整個崩壞。《李宗仁回憶錄》有云：「各軍倉皇後撤，加以敵機日夜轟炸，人馬踐踏，秩序大亂，大軍數十萬竟越過鋼筋水泥所建的蘇嘉國防線陣地而不能停足。陣地上雖有堅固的堡壘，退兵因一時找不到鑰匙，不得其門而入，竟一一放棄，潰退之慘一言難盡。」

其實「找不到鑰匙」亦不過是奔潰時官兵支吾之辭。大兵團在敵前退卻，爲軍事上最高度及最難能的技術。即是訓練成熟之部隊，素質一致，彼此有信心，也須綿密的部署，經過演習，方能希

望行動不脫節，維持必要之秩序，斷無在不執行佯動，不指定掩護陣地，不派遣收容部隊，不部署通信聯絡，和不預籌兵站補給之情形下達成期望。從蔣介石日記及其他有關文件看來，以上各種舉措可能全未施行，即有執行亦不過掛一漏萬。

日軍登陸後施行大小迂迴，佔領嘉興、松江，又以汽艇橫渡太湖，直逼溧陽，更以一部兵力出安徽，經由廣德、宣城及蕪湖完成其對南京之大包圍，蔣對此出奇制勝之策劃不表示驚羨，反以輕蔑態度在日記中寫出：「倭軍所慣用者為奇襲與包抄而已！」（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這種矜持的態度也只表示其缺乏對策。

日記表示蔣個人倔強不服輸之個性，但不能表示其思想綿密與邏輯上之前後一致。日空軍曾以飛機九十四架分五批轟炸南京。蔣當日日記云：「敵寇以為反覆轟炸，可以逼我遷都或屈服，其實惟有增強我抵抗之決心而已。」（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然則不出兩月國民政府即於十一月二十日正式宣告遷都。

蔣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委任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此時即已準備離京。他又於二十六日謁辭總理陵寢及陣亡將士公墓，當日全未向外宣佈，只在日記內寫出：「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對國對民殊難為懷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翌日又更加上一節：「對上對下，對生對死，對艱難締造之首都實不忍一日舍棄，依依之心不勝言矣！」（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這些情緒彰顯著蔣介石是一個宗教性格濃厚的人物，可是另一方面也證明他的作戰計劃缺乏縱深。李宗仁說及唐生智受命之前，蔣曾召集高級將領及德顧問討論南京應防守或放棄。如果在淞滬地區作戰近三個月，而對南京的防守與否全未作過實切的計較，即不能說是顧及周詳。推而論之，

我們可以想見其未預料敵側翼行動，無打算在蘇嘉國防線的抵抗，以及過度重視淞滬地區守土的重要，前後如出一轍。

寫過以上各段之後，蔣介石又並未即離南京。他的解釋爲：「余能多留京一日，則國家與人民及前方軍隊，則多得一日之益，總理與陣亡將士，亦多得一日之安。」（亦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此後又逗留十日。十二月五日，他尙且往南京正東二十公里之湯山對守城部隊訓話。當時正面敵軍業已逼近。至七日清晨他始乘飛機離南京，駐節廬山。南京於十二月十三日棄守，蔣於次日抵漢口，此時他曾體發高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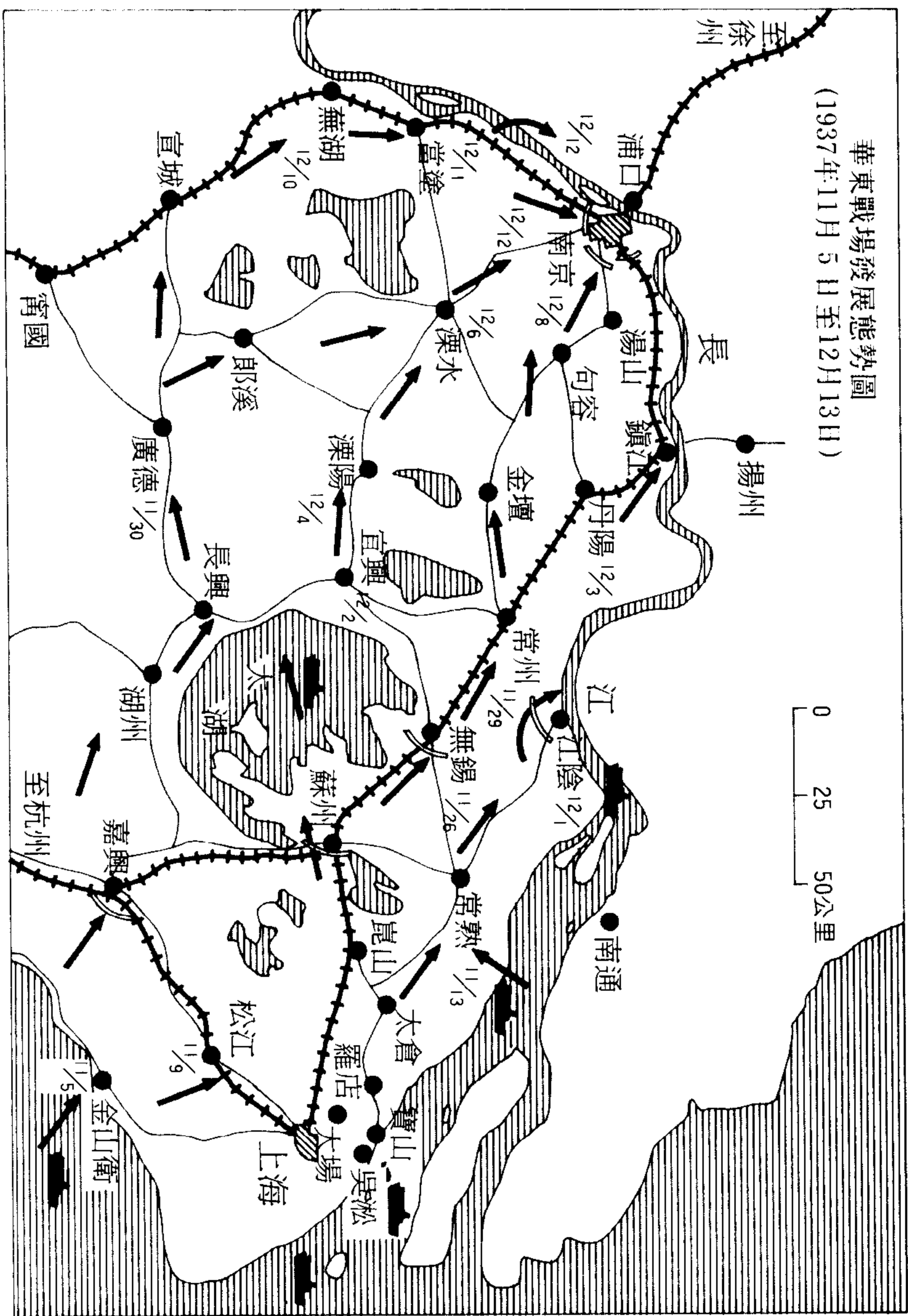


南京之棄守，距淞滬戰役之展開剛四個月。唐生智就任南京衛戍司令長官時，即對外國記者宣佈與南京共存亡。但在日軍合圍即將完成之際，已準備火車一列在浦口待命，準備向徐州出走。他在十二月十二日午後五時集合各軍長宣佈「突圍」，當夜與司令部人員五百餘人棄軍渡江。至次日日軍入城時，附廓各部隊均不知都城失陷，猶在零星抵抗。國軍之機密檔案稱：「我軍除一部擊破敵之抵抗突出重圍外餘皆壯烈犧牲。」

當日屬於衛戍司令長官之部隊有十三個師之番號，雖各師缺員，再加教導總隊、憲兵、警察及特種兵等應有十五萬人左右。所謂突圍大都均未成功。只有第六十六軍之兩個師向東出走，反能逃避日軍監視，以後輾轉進入江西、浙江邊界。

唐生智逃脫後，呈蔣報告，歸咎於蔣「嫡系」之第八十八師，謂該師潰兵於十二日由城南向北

華東戰場發展態勢圖
(1937年11月5日至12月13日)



之江濱出走時，局面即不可收拾。實際該師自滬戰以來已死傷過半，十二月十二日城南雨花台戰役，第八十八師之旅長二人又先後陣亡，師長孫元良以後化裝爲平民方始得脫。

從唐生智之報告看來，他部署未定即倉卒應敵。衛戍司令未能控制總預備隊，少數敵兵入城內時無反攻計劃，尤無撤退及突圍區劃。他所謂部下補充新兵，兵員過多，以致官不知兵，無從掌握，想亦是實情。

據經歷當日情況人員之回憶：及至十三日黎明，南京江濱下關一帶已擠滿散兵及難民，秩序紊亂。以後只有各人尋覓門板木片水桶各物浮游過江，水中淹死復不知凡幾，在城內外被日軍俘獲即慘遭屠殺。與平民同遭罹害者始終無確切統計。一般估計在十萬以上，有稱多至三十萬人者。各部隊官兵能得生還者亦無從查考，數月內後方各大城市之報紙仍有刊載之廣告，指示各部隊官兵歸隊之出處與辦法。

南京之災害擺在淞滬戰役大規模之犧牲，及沿京滬路倉卒撤退之後，國軍所受損害極端嚴重。有德式裝備之部隊八萬人，經過淞滬戰役即損傷五分之三，下級軍官死傷超過一萬人。若干礮兵及工兵器材以後始終無法全部補充。南京撤退時金陵兵工廠全部資敵，所有鐵道車輛器材亦未及破壞。以後執行焦土政策，將長沙之木質民房掃數燒光，但南京失守時，各官廳之堂皇建築則全部爲對方利用，如外交部之高樓作爲敵軍總司令部前後八年。縱然當時此等等事蹟已盡量彌蓋，但其內容仍不斷洩露。淞滬之攻防戰損害過重，非中國可能擔負，南京應早放棄，而不應作裝飾門面之防守，此等錯誤日後爲政敵用以攻擊蔣介石之口實。史迪威及李宗仁均以此等等差池與過失，作爲蔣介石不知兵之明證。

即是同情於蔣氏之讀者，至此亦難爲之解說，他不是已經說過對付日本不能孤注一擲，應當有第二線及第三線等陣地？他不是已經說過長期抗戰越久越是有利？何以他自己不顧前言，作不較利害的犧牲，招致無從整補的損失，並且以「維持一時體面」構成作戰之用意之一，因不避虛名而就實害？



沒有人能替蔣介石一一解說，而且蔣介石是一個歷史人物，他也用不著後人爲之解脫。況且以上之縷述，有些確是蔣氏過失，由他自己承認。比如說淞滬之戰約一年後，他在南嶽軍事會議即提出：「上海開戰以後我忠勇將士在淞滬陣地正與敵人以絕大打擊的時候，敵人以計不得逞，遂乘虛在杭州灣金山衛登陸，這是由我們對側背的疏忽，且太輕視敵軍，所以將該佈防部隊，全部抽調到正面來，以致整個計劃受了打擊，將士受了莫大的犧牲，國家受了無上的損失！實在對不起國家！」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其實所述錯誤不止於戰場上之部署，而且及於對敵方可能採用之行動估計過低，他於八月二十三日將龍華及松江的部隊抽調至滬西，此兵力亦不足抵禦敵方以海空支援構成三個師團之強行登陸，看來他的錯誤仍是未曾預期敵方立即動員及於預備役，即德顧問法肯豪森亦陷於同樣的錯誤，以爲側翼登陸無非佯動前已言之。

有時對方之企圖亦無從全部判明。日方資料稱，杭州灣登陸時仍只準備進展至蘇州、嘉興以東之線。但十二月一日參謀本部發下「敵國首都南京攻略」之命令，引起近衛（首相）及米內（海相）之

憤慨。其實日本部隊已在發令前向南京進發，戰後近衛文麿稱其本人僅能在閱報時獲悉日軍出處。所以蔣介石未能預籌對策亦不足爲異。李宗仁云，他在第一次在南京謁蔣，時在十月十三日，蔣精神飽滿，時作豪語，聲稱「要把敵人趕下黃浦江去！」當係對方尙未將事件高度擴大時之姿態。

當日蔣所倉皇集結之中國部隊，亦不能由他一己作戰略上及戰術上至當之區處。我們如果先以爲所謂國軍在開戰時，即爲軍令與軍政整齊劃一之兵團與部隊，實爲莫大之錯誤。我們從現實的眼光看去，只能認清先有抗戰然後有國軍，並非先組成國軍然後抗戰，將此關鍵前後倒置，我們才可以看出抗戰實爲歷史上必要之階段，通過此階段中國才能真切的統一。

當時蔣介石日記即已隱若的說出此情節，有如淞滬抗戰將近尾聲時，日記中有此段：「此次抗戰成敗得失固難逆料，但統一局面必可因益見鞏固。」（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此與我們所說，因著抗戰蔣介石替新中國製造一個高層機構之說法，至爲接近。

用此眼光倒看回去，我們可以認清一九三七年之所謂國軍，非似其他國家之陸軍，亦不似於對方日本之陸軍內中常備役、後備役、預備役之人員器材全可以互相對調。此時之國軍實爲三個五個或更多國家倉卒組成之同盟軍。李宗仁在他的《回憶錄》裡亦已說起，當盧案發生時，他奉蔣電邀往南京協商，茲後李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白崇禧爲副參謀總長。然則彼等成行之前，仍有四川之劉湘及雲南之龍雲勸阻，他們以爲蔣介石必乘抗戰之名拘留李白，攫得廣西，並及川滇。可見得內部缺乏團結及統一之情形由來已久。本文前提及明清帝國崩潰之後，實質上中國已不成爲一個國家，最初只有軍閥割據，蔣因北伐而消除若干軍閥勢力，因中原大戰而構成中央與地方力量之大平衡，因剿共軍事而更將中央力量漸推及於西南。茲後因抗戰而完成中國之統一。但蔣爲盟主，其所代表

者爲中國人之一般利害 (general interests)，此與各人代表各地區之特殊利害 (particular interests) 者迥不相同（所以才稱「不畏鯨吞而怕蠶食」）。但各人對蔣之猜忌，由於下層各種因素不易互相更換對調，亦爲超過人身關係之產物。

蔣介石如何能誘致各地方領袖參加他主持的抗戰？日記內無確切之說明。但其行動則極顯然，最先只有將「嫡系」部隊不惜犧牲的投入戰場。蔣之嫡系外人稱爲“Chiang's Own”（此因英國國王王后有所謂“King's Own”及“Queen's Own”之部隊而仿稱），包括德式裝備各師及機械化部隊已是如此，此外教導總隊原爲籌備新軍而設，數千人全部新式裝備，而且其人員經過極嚴格之遴選，所有士兵身材限於一定之長度，全總隊經過嚴格訓練，以便爲示範及儲備爲下士官之用，並爲來日各軍師標準化之基礎。此時亦毫無留戀，立即耗用於淞滬及南京戰場，以後始終無法恢復。我曾在各地說及，蔣之主持抗戰，「空城計」之姿態有之，「苦肉計」之姿態有之，用語粗俗，但接近於事實。

日記不及之處，我們亦可參見當日來往文書。七七之後蔣致宋哲元各電，只表示彼此企圖不明，不能互信。其原因則是冀察財政依然獨立，宋等不盡受中央節制。及至平津失守，宋哲元等移退保定，蔣方於七月二十九日「茲特先匯伙食費五十萬元以資接濟」。因至此宋突然失去其財政稅收來源，中樞不得不立即照顧也。

即在淞滬戰事吃緊之際，蔣致電余漢謀電訊一則，最能表現中央與地方之實際關係，全文如次：

廣州余主任勛鑒；此次抗戰凡參戰部隊死傷皆在半數以上，我六十六軍以奮勇挺戰犧牲甚大。中央同人同聲獎贊。已調至後方整理修養，但兵員缺額太多，遠道補充不易，中意由粵再

調三師來京增援，請兄准在後方加練補充師兩師，其經費可由中央擔任。中央同人以兄部精強，急望多派部隊參戰，爲我黨國爭光，而中盼望之切固不待言矣。立覆！中正手啓（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刻下無從查悉接電人之反應，但總之事關軍令與動員無適當之程序可以遵循，甚至尙無省區間之協議，只得由最高統帥以私人名義央請。如此調來之部隊，無法全般計劃使用，而且師與師之間編制裝備訓練亦不盡相同，其戰法與素質亦可發生至大之差異。所以，集中使用於一個狹小地區，並非全無理由。如果遂行戰術上之至當，應以各省雜牌部隊吸收敵之火力，控制中央軍之精銳爲機動部隊，候敵攻擊頓挫，或其能突破我第一線防禦時，從側翼投入（此亦爲半年後李宗仁在台兒莊取勝之秘訣）。但蔣介石無從採用。

初期抗戰無爭勝之可能，但對於鼓舞人心則收效極大。過去日本軍人與浪人在各地製造事件，動輒責成中國當局不得有排日拒日之言辭與態度，茲項壓迫由廬山談話而被否定，由淞滬喋血而整個被推翻，郭廷以摘錄國民政府遷都宣言文句，「各地將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其在前線，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等語（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爲「所說毫不誇張」。這種精神不因南京失陷而減殺。明年台兒莊戰役（一九三八年四月）的過程中，雲南部隊蜂擁上前，企圖以密集隊形捕捉敵軍戰車，四川部隊因軍紀不佳而兩個戰區拒絕收納，自慚形穢。這情景已與當初劉湘與龍雲企圖勸阻李白的疑忌，有了一日千里的距離。

因爲中國無法憑本身的力量取勝，只有更希望獲得友邦同情。當國軍由上海以北向蘇州河南撤

退時，有所謂「八百壯士」，原為第八十八師五二四團之一營，由團附謝晉元率領佔領四行倉庫，表示死戰到底，結果在敵後單獨作戰四日後，奉蔣命令退入租界。蔣當時日記云：「我軍留守閘北之謝晉元團孤軍奮鬥，中外人士均受感動，且表示崇高之敬意，此與敵軍野蠻殘忍受世人之唾棄，兩相比較則不啻有霄壤之別，此戰雖退，猶有榮焉。」（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直到不久之前各人之回憶錄問世，讀者方獲悉此「孤軍」係蔣親自指派，其目的在將中國抗戰精神表揚於國外，並在九國公約簽字國集會於北京布魯塞爾時，引起國際注意。初擬留置閘北者，尚不只此一營，而為第八十八師全師，只因師長孫元良反對作此無益犧牲而罷。謝營作戰四日後死三十七人，蔣亦改變心腸，命令其繳械退入租界。當時記入日記：「為主帥者，愛惜所部與犧牲所部皆有一定限度，今謝晉元團死守閘北一隅任務與目的已達，故令其為榮譽之撤退，不必再作無謂之犧牲矣。」（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此語證實各人回憶錄之所述。

蔣及國民黨之宣傳政策過度炫耀，尤至抗戰後期所說不能兌現，仍以一己之設想與希望，當作業已構成之事實，曾引起外界極端反感，我們以後當再提及。可是在一九三〇年間，此同一政策却曾產生實際效果。涂克門書中稱上海戰役為「自一九一八年突破興登堡防線之後全世界經歷到最易目見，最經過宣揚，而且最為重要的一場戰鬥」。她又敘述著：

上海的防禦戰使全世界意識到中國「之存在」。一幅最富於人性的戰場圖片乃是一條無人的街道經過爆炸之後一個嬰孩坐在「電車」軌道之間哭泣。新聞記者麕集在這戲劇之前。一天兩次又有中國政府舉行的新聞報導講出許多英勇流血與慘痛的故事。中國被視為為民主而作戰，

其代表人物則為意志堅決的委員長和他出奇漂亮毫不畏懼受過美國教育的夫人。美國認為中國意志堅決，衆志成城。這印象一經接受就已固定，不受從上海撤退時軍事失策的影響，也不受空軍犯大錯的影響「此指企圖炸日軍艦時彈落租界死傷平民多人」……

此文結尾處帶諷刺性質，已意味到美國人日後認為被騙之由來。但全段則表示，緒戰時蔣確已在世人心目中造成良好印象。當日美國民意測驗，同情中國者占百分之七十四，同情日本者只百分之二。涂文中提及各人印象初入為主，事誠有之，中國縱有差失亦能掩飾帶過，但在背景上國軍之表現慷慨激昂，具有實質。此初期印象，不足以立即改變各國對華政策或對日政策。只是有此印象，在日後改變政策方為可能。



國民黨黨史委員會所編《對日抗戰時期重要史料》，容納了淞滬戰事期間蔣介石所親擬的緘電，並附有經過他過目的報告等共七十三件。這批文書，補日記之不足，可以看出蔣主持戰事之真情實況。它們證實蔣經常干預機微，甚至積參謀業務之文牘於統帥几案之上。其流弊所及，不僅可以使下屬職責不明，而且足因衙門機關官僚習慣債事。例如從這些文件看出：日軍可能登陸於浙東海岸，太湖內之舟艇可能對作戰有用，均曾一度在事前提及，但以後即無下文，終至紙上文章輕輕帶過，日後戰場上之將士即須付出代價，接受疏忽之後果。

可是如此互不啣接之事重見疊出，則又使我們猛省，此中弊病可能尚不只蔣之個人作風。如果

國軍並未構成一個軍令統一之有機體，中國則不能在戰前，即有一個類似於對方日本之大本營及參謀本部型之機構，如即有，亦不過裝飾門面，縱或在七七事變後，倉卒湊合如是一個機構，亦難能具備掌握局面之功能與實力，推而廣之，其缺陷尙不只在軍中，而是國家與社會尙未具備對外全面作戰之技術能力，亦無從動員。

蔣在各省抽調部隊，以個人磋商激勸之方式行之，已如上述。其所發津貼各處不同，各部隊到滬日期及沿途所需交通工具，則按路途遠近及與中央之關係，分別責成交通部（俞飛鵬）、軍事委員會第一部（黃紹竑）及侍從室第一處（錢大鈞）就地辦理。因皆臨時到達，亦無從全般計劃，只能在到達後，由統帥指令分屬於戰鬥序列。補充兵之徵集，除由蔣介石以行政院長之身分手令各省主席在保安團隊中每省抽調五千人外，又責成軍政部長何應欽在大城市招募。特種兵之訓練，在戰前即由各特種兵學校如工兵學校、礮兵學校、交輜學校主持。蔣則兼任所有各該學校校長。至此由他手令各校教育長遣派所屬。剛作戰不久，從德國購得一部器材開始到達，有如二公分之高射礮六十門，已由蔣手令區處。此外電話線之架設、預備陣地之構築、得力官兵之犒賞獎勉、屍體之掩埋，均由統帥親自指示。

九國公約簽字國在北京集會時，中國代表團之發言態度由蔣授意，此不僅因蔣介石兼行政院長，而且和戰之關鍵又盡在其掌握也。滬戰剛開火，有英軍一營從海外開來，擬進入公共租界，亦須候蔣批可。

淞滬戰事緊張之際，蔣曾手書宋子文以麻袋「交南市朱逸民五萬只，南翔第六師轉陳辭修五萬只，其餘三十萬只皆運蘇州交顧墨三兄可也」（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如是許多麻袋有何用場？視

其下令日期及指定之交納地點，似爲準備填塞泥沙作爲巷戰之用，然則茲項處置，不由軍需軍械人員籌辦，亦不經參謀設計分配，即由統帥決定，麻袋又不在此後方購買向前輸送，而在租界內採辦，似此種種舉措均超過常情。主要原因爲缺乏經費預算及交通工具，而此時宋子文則爲資源委員會之副委員長，而又以中國銀行董事長之身分，在上海外灘置有寫字間，所購麻袋可以朝發夕至也。

又在滬戰期間，國軍發覺探照燈之重要，於是由蔣電令另一姻兄孔祥熙購買。此時孔正以慶祝英王加冕特使之名義，遊說於歐洲各國，籌商借款，茲項器材不難迅速取得。

只是類是公事私辦之方式可以了無止境。以後在武漢作戰期間，蔣又發出以下一電：

香港。中央銀行孔秘書令侃：昭轉三姨母，兄今到洛陽，約下星期二回漢。現在急需步鎗三十萬桿，每桿配彈一千發；自來得手鎗三萬桿，每桿配彈一千發；重機鎗二萬挺，每挺配彈一萬發；法國迫擊炮五百門，每炮配炮彈二千發；三生的七口徑戰車防禦炮五百門，每門配彈一千發。請在港設法購辦爲盼。兄中正。寒午機洛（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四日）

此電已同樣的發至孔祥熙。孔令侃之三姨母，即蔣宋美齡，時以養傷名義在港。值得注意的，採購單所列軍火，非萬噸莫辦。須火車數十列載運，值價數千萬元。在當日均爲令人咋舌之事，而蔣以鄉人進城託買衣飾鞋襪之姿態，通過家人行之。除非此電有意將內情外洩對敵威嚇，應由歷史家查考所需是否購得、如何付款交貨。我們可以推斷者，則歷史家發現德國檔案中有孔祥熙諛頌納粹絨件，涂克門謂大宗中國政府公款轉入孔令侃私人帳戶，似皆與採購軍火有關。其癥結則是，統帥權由蔣人身掌握，人身財政與人身外交與之配合亦事勢必然。



上文說及蔣介石在南京謁辭總理陵寢之後，並未立即離京，又逗留十日。此中之一個關鍵，則是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Oskar Trautmann)調停和議。當蔣約見德使時，曾在日記內記出：「爲緩兵計，不得不如此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似對議和未具有任何希望，不過藉談判爭取時間防衛首都。但既經與陶使接談，態度已有相當改變。當日日記云：「聯俄本爲威脅倭寇，如倭果有所覺悟則濟矣。」(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原已在八月二十一日在南京簽字，條約無聯盟之實質，但有聯盟之聲勢。而德義日則於十一月六日在羅馬簽定「反共公約」。迄至此時中德關係良好。納粹德國立場，當然希望中蘇關係瓦解，日本對華停戰，以保持反共實力。從蔣日記看來，此項提議未嘗不可考慮。他雖未言明互不侵犯條約可以取消，但如中日和議有進展，中蘇關係轉向，從以上日記言外之意看來，已是指望中事。

十二月二日，他曾向德使要求停戰，並保證國民政府在華北之主權。在他看來此要求並不過份。日本侵華戰事雖節節勝利，但亦已付出相當代價。陸軍省軍事課長田中新一戰後發表之《支那事變紀錄》，述及至九月底上海方面之日軍即已死傷逾一萬二千人。中國軍之戰鬥力及戰鬥意識已「推翻了三宅坂」日本陸軍省官衙所在「一向的判斷。」蔣介石深知日本如預期對蘇作戰，不應亦不能持續在中國之消耗。

在離開南京前一日，蔣再記下：「倭寇對德大使所提調停辦法，以我不能屈服，彼已決絕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至此敵軍已兵臨城下，日記也不免帶失望情調。

日方原望德國斡旋人向蔣提出對其承諾成立內蒙古自治政府，在平津一帶構成非武裝地帶，將一九三二年所訂上海之停戰地區擴大，使中國在此地區不設防駐兵，中國更停止一切抗日行動，共同防共，降低日貨入口關稅。此等等條件尚未獲得正面答覆，德使已傳達蔣之反面要求，恢復華北主權，實質上需要取消塘沽協定。於是近衛閣議認爲此不過「戰敗者無禮之言辭」，因之在堅持前項要求外，又加入正式承認滿洲國，凡日軍所至地區均屬非武裝地帶，中國對日賠款三項附加條件。

此新要求由德國駐日大使轉陶德曼，陶送中國外交部長王寵惠，由王轉呈蔣，時爲一九三八年一月二日，南京早已棄守，蔣駐節漢口。他的反應見於辭語：「日方所提條件等於征服與滅亡我國，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之爲愈。」但爲保持德使體面起見，外交部之答覆仍非一口拒絕，只謂條款過於廣泛，希望日方更詳細而具體的解釋。於是東京認爲蔣無誠意議和，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爲交涉對手。



蔣日記中提及對日關係，續有：「此一星期中，自敵人藉口於所謂宣戰，否認國民政府，繼續軍事行動等等觀之，對我威脅逼迫，可云極矣。顧以余視之，覺不值一笑。固無論其出如何舉動，皆不能動搖我抗戰之決心及勝利之信念。彼本未停止軍事何謂繼續。本未受有約束，何謂自由行動，此種外強中乾，求和不得進退維谷之醜態，日益畢露，盍不早日覺悟，明言撤兵爲計也。」（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

此一段有自圓其說、憑空辯論之姿態，也暴露出來東方人愛以道德解釋一切事故的趨向，然則

這也反映著蔣以寫日記作爲一種修養與施政之工具之實際表現。原來寫此段時中國已面臨極大的困難。郭廷以提及，在此期間中國曾數度向蘇聯提議結盟或成立互助協定，均被史達林拒絕。《大事長編》除記載「中俄軍事航空協定」於一九三八年二月七日簽字，又蔣在三月九日接見蘇聯大使外，凡此期間對莫斯科之央請，均未提及。

蔣對蘇聯態度始終未脫離「蘇俄之外交，詭詐無比」之一概念（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與日本比較，則「俄狡而倭暴，吾中華實處其中」（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十日）。即向史達林求援之際，蔣仍記出：「尤以對俄問題處理爲難，蓋國之禍患有隱有急。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隱而叵測也。」（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

自淞滬作戰至南京的大屠殺之後，蔣介石所受到的羞辱與挫折，可以使多數的人肝膽俱裂，而且痛不欲生。開戰未逾六個月，敵方已佔領上海、南京、杭州、北平、天津、包頭、太原、濟南、青島，看來打通津浦路已是指顧間事，而且國軍從南京至漢口兵力不足，部署未定，白修德事後說來：「要是日本人立即向內地進軍的話，他們可能遇到最了不得的阻礙，恐怕也無逾於叢山與丘陵。」史迪威當時任駐華武官，他當日即寫下：「蔣介石不能放手。他呼籲全國，全國響應，現在他只能繼續下去。」美國駐華大使詹森(Nelson T. Johnson)則在他的報告裡提出：「現下之中國政府無法媾和也無從堅決的作戰。」

初期作戰，沒有蔣介石希望的打得漂亮，而國際間的反應更足令人寒心，向國際聯盟的呼籲沒有效果，九國公約簽字國的會議，只有八國參加，日本只要拒絕出席，即可以推卸一切責任，使會議流產。日本飛機擊傷英國大使，不足以產生事故，炸沉美艦也不足以構成事故。蘇聯之援助限於

志願空軍及少量軍火，仍須中國物資償值，兩方向在猜忌之中。

蔣介石於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日致羅斯福總統，縷列歷史上美國主持正義的事蹟，及中國感激受惠之處，希望美國物質上的援助，由駐美大使王正廷面遞。而此時美國孤立主義的呼聲正高，去信只贏得一個在「繼續注意與考慮中」的空泛回答。德義兩國已在京滬戰役期間與日本成立防共協定，又先後承認滿洲國。陶德曼調解不成之後，希特勒已準備禁運往華軍火，召回駐華大使，並要求蔣介石之德顧問解約。

當時對中國局勢悲觀者，除汪精衛外，尚有陶德曼大使及史迪威上校。馮玉祥與法肯豪森可謂為樂觀派，他們的樂觀，亦不過相信中國仍能繼續單獨作戰六個月。胡適認為中國是「一個中世紀的國家」，如此對一個現代國家全面作戰發生懷疑。他主張保持對日接觸的門徑。

蔣介石寫下「固無論其出如何舉動，皆不能動搖我抗戰之決心及勝利之信念」（詳本書一九三頁），今日讀來平淡無奇，好像不過自言自語，要擺在上述環境之艱危的狀況裡去，才能使讀者體會他在督促自己的心境。同樣的漠不經心讀去，我們也不能對他所說「盍不早日覺悟，明言撤兵為計也」感到有任何奇特之處，看來也仍是他個人的想法，與「戰敗者無禮之言辭」相去不遠，直到再發覺以後日本因迫蔣介石講和不得，確曾一度計劃準備單方撤兵（詳本書二二九頁），才能瞭解此種頑健態度一方面出自蔣介石的天性，他能雖敗而不服輸，一方面也仍由於他確有一個對事的長遠看法。



到武漢後，蔣介石的工作急切的有如主持軍事會報，封鎖馬當，佈置江防。從長遠打算的有如

改組軍事委員會，他自己仍只稱委員長而有元帥之實，軍委員亦只稱軍委會而漸有大本營之實。又重訂戰鬥序列，計六個戰區，內中司令長官三人代表原中央系統，三人代表省區軍事領袖，下轄二十五個集團軍及稱前敵總司令部之部隊。內總司令六人代表中央軍，十八人代表各省區或出自原軍閥部隊，其他一人則為朱德，下轄中共部隊稱第十八集團軍。此時由前方調至後方整訓部隊尚有二十六個師。一九三八年一月之後，才明定「統一兵員徵募及補充方案」，在九個省份內成立軍管區，厲行徵兵。一部雜色部隊，如原屬財政部之稅警總團及各地之保安團隊，亦升級為正規之步兵師。三月四日，又決定再編練新軍二十個師。一般人尙未看清：至此中國方談得上初步的動員。以前純不過糾集已有之部隊倉卒應敵。駐武漢又三個月後，蔣介石在他日記裡寫出：「今我軍事上整理漸有頭緒，再經兩月之補充，當足以應戰無虞。」（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

從各種資料看來，蔣介石之能在此黯淡期間發揮其長處，端在其有氣魄能將京滬地區之失敗一筆勾消，決心重新做起。他在南京退出前已有各種傷感情調，有如上述，但也曾記出：「成敗利鈍，非所逆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又有：「今後當如何整飭軍紀，整頓部隊，補充實力，振作精神，此全為余一人之責任，頂天立地，旋乾轉坤之事業，此其時矣。」（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唐生智在南京失守之後不久，報告稱：「比以待罪之身來鄂晉謁，反承溫慰，並覺惶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這幾句話也表現蔣介石之大度。《大事長編》提及他於十二月三十日接見捍衛首都撤退來漢之軍師長，詢問當時作戰情形，並未有任何追悔震怒埋怨責備之事。蔣又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歸德召集團長以上軍官訓話，此當係李宗仁在《回憶錄》裡提及「共到師長以上

軍官八十餘人」的會議。蔣當場講出：「尤其我作全軍統帥第一個有罪過，我們對不起已死的官兵和同胞，對不起國家，尤其對不起自己的良心。」有了這樣的決心與自責，他才不會被陰沉的氣氛纏綿而不能自拔。

二月五日，他又將以前的〈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的講稿在後方各報紙發表。這是一九三四年七月在廬山軍官團的訓話，裡面早已提及「古人所謂深溝高壘，雖不能守到兩三年，至少也要固守一兩個月，不能守一兩個月，至少總要死守一個星期。我們雖無十分戰勝的把握，然而一定要使他受到最大的犧牲。」其目的不是將對方打敗，而是將之拖垮。這種戰術被史迪威稱爲「待得久的得勝」(winning by outlasting)，日後成爲蔣史間人身衝突主要原因之一。不過在長遠的眼光看來，確有實效。而且三年半以前所下決心，至此符合情景，所以蔣在其日記中又加一段：「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講辭發表後敵必對我恨入骨髓。彼夢想我屈膝之意可以休乎？」(一九三八年二月六日)

〈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尚有一段前已提及：「如此雖然緒戰失敗我相信到最後必能得到一戰成功，因爲用這種革命戰術，他要佔領我們一省，至少時間就說是一個月，如其統計起來，他們要佔我們十八省，至少要費十八個月，這十八個月時間那國際形勢的變化還了得？」至此他雖不時提醒自己不要依人成事，有如日記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及一月三日所敘，但並未放棄對國際情勢變化之期望。日記內不久即有此段：「只要我能抗戰到底，則國際情勢終必演變而日本終歸失敗也！」(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

敵方未能保持以每月侵佔一省的速率進攻，但是也確保持三、四個月淪陷一省的態勢。蔣於敵沿長江進攻漢口時曾寫出：「今日長江之敵已入掛形(易攻難退之地)與險形之地矣！不知地形之不可

以戰，此倭寇之必敗也。」（一九三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只見於《秘錄》，不見於《大事長編》）

次日他再寫出：「《孫子》作戰篇云：『勝則頓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頓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此倭寇之謂乎。」（一九三八年九月一日）

再隔一日所記則為：「《孫子》謀攻篇曰『敵則能戰之，小則能逃（守？）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兵力相當則與之對陣，佔劣勢則取守勢，再不如則退卻。能在弱小敵前逞強的兵力只會被強大的敵部隊所俘獲。）今敵既不能勝我（不戰而屈人之兵），此其謀攻之失敗，我為長期應戰，度勢量力，不與硬拚，敵終必為我擒矣！」（一九三八年九月二日）

當中第二段說到持久戰對經濟的損害。然則既能挫折日本，難道就不會拖垮中國？答覆這問題，我們只得再度參考蔣在戰前以筆名徐道隣發表的〈敵乎？友乎？〉一文。作者坦白指出，中國尚是一個在革命階段組織未就遂的國家。其他國家有「土地、人民與主權」，中國則只有「主義、群眾與領袖」。所以「佔領了中國首都，不能制中國的死命」。甚至在「中國重要都市與海港全被佔領時，在中國誠然將陷於極度的困苦與犧牲」，可是中國依然存在。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斷言蔣介石對日作戰無全般計劃，只有一般概念。看來全面抗戰不能避免，他立即對來日戰場畫下一個大輪廓。日記中有：「抗戰最後地區與基本戰線，將在粵漢、平漢兩鐵路以西。」（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可是不能預作防禦及全面反攻計劃。實際上他在對三種趨勢賭博：

一是因為中國之落後，可以無視於現代之經濟原則，甚至可以不顧法制。縱使有形的條件被摧

毀，仍有一個無形的中國在，所以比日本耐久。

二是以人口與土地論，日本數目字上的劣勢。這種劣勢之影響只有愈來愈明顯。

三是日本侵略中國招惹了一個大規模的國際戰爭，打破了戰前國際間的平衡，遲早會引起第三者干涉。

從以後的發展看來他的三項賭博，項項成功，但無一爽快利落的兌現，而是在縱橫曲折之中通過無從預料的局面，多時凶多吉少，才突然柳暗花明。這種賭博，今日半個世紀之後我們看來猶有餘悸。所以當時只能以意志力作主，不能按手頭之資源計較，這也就是蔣介石所謂「瞑眩瘳疾」與「孤注一擲」之由來。



中國雖占數量上之優勢，內中人力物力的資源不能互相交換，因之無法構成體系，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無從預作計劃使用。這種情形開始於戰前。

一九二六年全國人士發起「捐機祝壽」運動，以建設空軍爲蔣生辰賀禮。據當年十月二十四日航空委員會的報告，收款約得六百萬元，再由航委會補助二百八十七萬元，可籌辦飛機發動機工廠一所，預計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可以開始出品，以後每年生產飛機發動機九十六架。此案經過蔣親自批准，設廠於湖南湘潭。可是原料如何供應，技工如何徵集，製成發動機如何裝配成爲飛機，用何設計，以後經費如何維持，均未見提及，尤未考慮到此項企業如能成功，必與其他兄弟姊妹工業聯繫，如製成飛機而不能上裝機鎗，有機身而無輪胎，亦無益於事。抗戰後期中國所用空投炸彈猶須

自外輸入，缺乏飛機零件時，只能截彼補此，將數機拼作一機。我們只能想見在類似情形之下，國軍內外必有無數不相啣接的地方，也曾多次嘗試著執行不能連構的設計與方案。

日後涂克門女士提及中國向美索要租借法案之軍備時，列入的戰車礮架超過道路橋樑之支重。她沒有想及，中國人之觀念是先有戰車礮架後有道路橋樑，並非先解決交通問題次覓取新式裝備。可是集數個不同世紀的品物於一堂，極難協同的發揮功效，而往往是最前進的部門被落後的部門牽累。抗戰初期的超級空軍英雄劉粹剛與高志航均未殞身於空戰：劉因無夜航設備而觸城樓以致機燬殉難，高因警報傳遞過遲而被炸斃。高志航殉國之日蔣爲之悲悼，只因不願引用哀傷消極文字，僅在日記中書「憂患生忍耐，忍耐生智慧」數字紀念此事（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而其實類是令人扼腕長嘆之事蹟又何可勝數。

南京戰役前江陰要塞的過早失守，使日艦立即威脅國都附近，是爲影響士氣人心因素之一。以後大武漢的保衛戰，又因馬當要塞之失陷，門戶洞開，再蹈覆轍，經過蔣在南嶽會議的痛責。兩處要塞均不因正面新設備被摧毀而放棄，而由於敵登陸部隊迂迴至側後，擊破支援之步兵，使要塞陷於無用武之地。馬當失守後，戰區司令顧祝同報告提及奉命增援之第一六七師「曾經德顧問檢查，機鎗迫炮全係廢鐵，步鎗堪用者不及半數」。另擔任湖口江防之第二十六師則完全新兵，武器又劣。重機鎗全無，輕機鎗僅及半數。至於要塞內之礮位則「對江面設置，對野戰軍作戰完全不能支援」（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七日）。我方既有此參差不齊之缺點，對方當然先集中擊斷鍊條中最弱之一環。

因此之故，日軍可以長驅直入。九江失陷之日，蔣日記有云：「觀測敵勢，在直接溯江而上，僅佔要塞據點而不作野戰，以期先佔武漢爲其唯一目的。余對防守武漢，決不作無謂之犧牲，應保

持相當兵力，待機運用，以作最後勝利之基礎。」（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亦即有準備放棄之打算。但是如此不利消息不斷傳來，亦足以令人膽寒。次日蔣日記有：「未知上帝何日拯救我人民於水火也。」（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七日）雖未表示焦悴怨憾，然則失望的心情已見於言表。



現已發表之蔣日記，未對任何戰役詳細分析檢討，通常對每一戰役只提及一二句。所記以南方諸戰役較北方為多，其親自督導之戰役較常提及。又通常憂慮之情形見諸紙間，反面則雖經宣傳機關高度渲染之勝利，在日記中無驚喜情調。例如日軍攻略河北時，《大事長編》引用第三人稱：「滄縣保定告急，華北大戰又起。公以部隊複雜指揮困難，至為焦灼，旋自記：『惟有堅守城堡各據點待機出擊，方可致勝。』晚間公覺心境一舒又自記曰：『此殆為樂從憂生之兆乎！』」（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如是戰局影響他的情緒是為常態。

第三次長沙會戰，國軍發表「殲敵五萬六千人」（日軍只承認死一、四六二人傷四、〇二九人），蔣日記只有「此次長沙勝利實為七七以來最確實而得意之作」（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一日，見於《秘錄》而不見於《大事長編》），未再加詳盡闡解或潤飾。

一九三八年四月李宗仁所指導的台兒莊大捷，蔣以低調處理。當各地鳴鞭慶祝時，蔣以統帥所發的公告稱：「此乃初步之勝利，不過聊慰八閱月來全國之期望，稍弭我民族所受之憂患與痛苦，不足以言慶祝，來日方長，艱難未已，我同胞應力戒矜誇，時加警惕，唯能聞勝而不驕，始能遇挫而不餒，忍勞耐苦，奮鬥到底。」（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日記之提及台兒莊只出現於當年四月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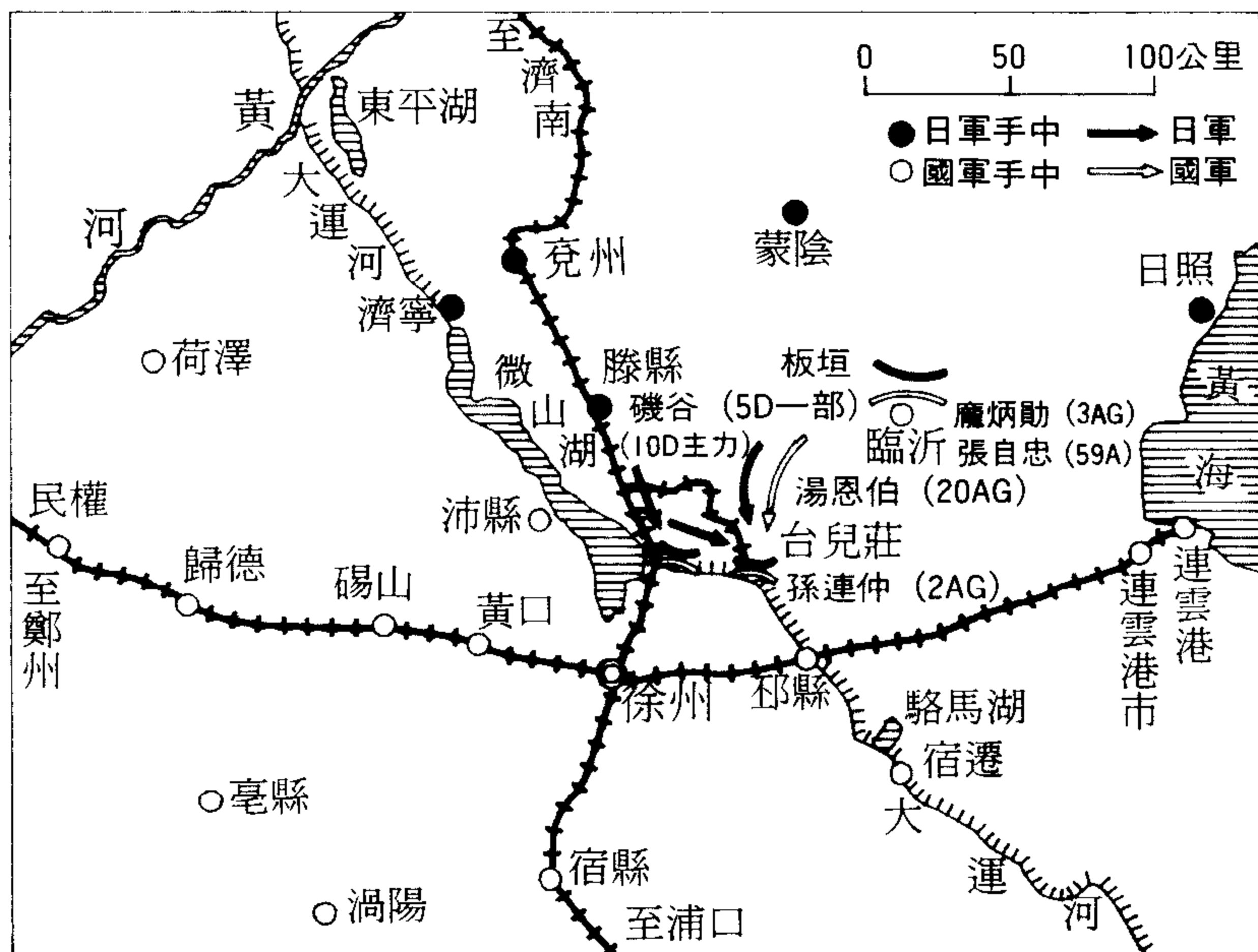
月工作檢討」，內稱：「台兒莊勝利不僅關係戰局之成敗，實使民心士氣爲之一振。」（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至此不出二十日（五月十九日），徐州棄守，蔣介石雖未明言，但已在日記裡對李宗仁切責。

台兒莊戰役一般公認爲初期戰事中之最大勝利，有些人甚至認之爲八年抗戰中唯一一次可稱爲無條件的勝利。日本資料自承死二千三百餘人，西方資料稱日軍死傷一萬六千人，喪失戰車四十輛，裝甲車七十輛，華軍死傷數大致相埒。涂克門稱「自日本建立陸軍以來第一次顯要的戰敗」。中國政府宣傳機構稱：「殲敵三萬餘衆」。

有了蔣李間人身上的齟齬與競爭，蔣介石對於這次戰役的看法，免不得要受「忌才」的批判。可是我們檢閱這段史料，可以相信從統帥部的角度看來，這戰役的評價實在值得再檢討，就此也可以窺見蔣任統帥所面臨指揮系統內若干問題。

李宗仁在淞滬戰事期間，受命爲第五戰區司令長官，經過南京戰役之後，第五戰區南部已在淮河遇敵，而北部的韓復榘又不戰而走，將部隊撤至魯西，使津浦路門戶大開，李已經兩端被夾擊，而所部八萬人又代表東北軍西北軍，江蘇保安隊以及李氏在廣西親自訓練的第三十一軍，居然也能南北應敵。台兒莊之戰役則以孫連仲之第二集團軍（原西北軍根底，但至此早已中央化）爲守，湯恩伯之第二十軍團（中央軍）迂迴側翼，才發揮了四月七日之功效。這樣的利用機動戰術，爲抗戰以來所未有。史迪威一向爲中國悲觀，經此一戰後，已認爲中國可能取得最後之勝利。至於徐州之放棄，則因日軍效法南京的大包圍又將完成，所有的交通線都已或快要截斷，如不及時退走勢成捉鱉。在李宗仁指揮之下，所有的大兵團無大損害的撤出。李云：「敵方不特沒有擊潰我軍的主力，甚至連我方一個上尉也沒有捉到。」蔣介石應當對這一串事實有較積極的看法。

台兒莊戰役概見圖
(1938年4月6日)



蔣介石從未與李爭辯。但是他所見必與李不同。李所謂雜牌部隊七八萬人，此是抗戰剛開始時部署戰區的情形，只經歷到一個極短的時期，及至一九三八年初劃分戰鬥序列時，其所轄已有二十七個步兵師三個獨立旅並特種部隊。及至孫連仲與湯恩伯部隊之到達，第五戰區之人數已逾四十萬，李又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有他自己財政稅收的來源，可見得中樞所付與他的，非只一個獨當一面的野戰軍。至若將台兒莊戰役之後派往增援的部隊加入計算，即據李宗仁自己所說，又有八個軍和一個師，總數已擴充至六十萬人，即自淞滬戰爭以來無此集中的兵力，與敵軍相較至少也有二比一之優勢，以後國軍也再無法湊集如此數量及質量的兵員與器材於一個戰場。

蔣介石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往開封召集第一、第五兩戰區團長以上軍官訓話

時，最基本的一個要求即是「提起攻擊精神來轉移戰鬥心理」，並且又提出「服從命令，嚴守紀律」。訓話完畢當場逮捕韓復榘。及至此時韓尚為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不久之後（一月二十四日）即以「失地誤國」的罪名將之在漢口鎗決。即李宗仁本人亦在他的《回憶錄》裡承認「此事確使抗戰陣營中精神為之一振」。所以隨後在三月十七日，即有隸屬第五戰區的四川部隊之一二二師師長王銘章在滕縣殉國。以後五月十四日日軍攻陷荷澤時，第一戰區派往支援之第二十三師師長李必蕃引咎自殺，也可謂出於同樣的壓力。徐州會戰之前後，將士用命有了這樣的背景。李宗仁亦說及台兒莊戰役的過程中，他曾向孫連仲及湯恩伯提到若有差池「軍法從事」。這樣看來他之主持第五戰區，並非完全自己獨當一面，而實有統帥部的密切支持。

李宗仁將兵力南北抽調，爭取了內線作戰的便宜，又讓部隊避免與敵軍正面衝突，只暫時向鐵道線兩側趨避，候敵主力通過後再度合圍，截斷其交通線，誠然已表現其指揮大兵團之能力與膽識。可是他從不歸功於人。其實蔣介石於一月後，又在台兒莊決戰之前夕往鄭州、徐州、洛陽各地巡視，以協定各戰區之作戰，又留白崇禧（副參謀總長）及林蔚（軍令部次長）於徐州（三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作為中央臨時參謀團。而且德顧問法肯豪森之建議也當有決定性之影響。李宗仁在他的《回憶錄》裡，對此類事或輕輕提及或毫不過問。

台兒莊勝利尚有意外之原因在，日軍有了過去八個月在華北及華中戰勝取攻的經驗過度自信，當國軍在台兒莊合圍之際，日方機械化部隊之汽油用盡，而板垣之第五師團之一部與湯恩伯軍團平行行軍三日彼此均未發覺。再則湯部配屬德製一五五榴彈重砲至此初次使用，孫連仲部配屬有戰車防禦砲，亦均足以影響戰局。

李宗仁在戰場上最大失策爲在台兒莊勝利後僅清掃戰場，未作任何有意義之追擊。據說法肯豪森急得把他自己的「頭髮也扯下來」，以國軍任千載機緣從手指縫中逸失也。此時蔣介石已急調增援部隊於徐州，李亦未用以擴張戰果，其在《回憶錄》之解釋爲到達過遲。實際湯恩伯部損害輕微，亦未用作追擊。以後第七十五軍及九十二軍於四月上旬及中旬到達，板垣及磯谷部隊尙在向西集結等候援軍，李仍未下令反攻。第五戰區之部署，只將防線向東延伸，有似第一次大戰時之「延翼戰」，所恐懼者爲敵側翼行動也。四月二十日又有第四十六軍及六十軍之到達，此時也只用在「運河兩岸加強這方面的防禦兵力」。

所以對國軍而言，「徐州會戰」無會戰之實質，除台兒莊一役外，始終採取被動，逸失將敵各個擊破之良機。一到日軍合圍將近完成，只有下令突圍。

日軍雖由津浦鐵路南北進攻，又在連雲港登陸，但其主攻採取鉗形方式。一面從西北角荷澤以東渡過黃河，一面在西南亳縣、宿縣間北進，以截斷碭山至黃口之隴海鐵路。李宗仁人身上之勇氣無可置疑。但是他何以始終未採取攻勢，他至少應可能在其選擇之地區，集中絕對優勢之兵力，消滅對方之觸角？看來他仍被南京作戰之經驗震懾，此時「全師爲上」的觀念使他不計及其他。李之《回憶錄》內說及，他在徐州退出後與湯恩伯狹道相遇，湯建議並自告奮勇的向宿縣日軍攻擊，亦未被李採納。

只是李值得稱羨之處，乃是一經決心撤退即毫不猶豫。並指令一部部隊由徐州向東南退往蘇北湖沼地區，以後再設法透過敵軍防線向西集結，因之損害低過於全面潰退。李本人繞過縣之東南始由友軍接應。其撤退命令下達於五月十五日，五月十七日執行，李於二十一日脫險。

據日方資料，徐州會戰在華北部份之日軍於四月下旬發動，華中部份於五月上旬發動，均於五月中旬開始總攻擊，雖然包圍殲滅之計未酬，但亦給華軍「一割」（即十分之一）之損害。六十萬人之一割爲六萬，四十五萬之一割爲四萬五千人，所以國軍之損害亦不如李宗仁所稱之輕微。李五月二十四日致蔣介石之無線電報告，即自稱其司令部除高級幹部外，馬匹及通信人員均被敵衝散，所部器材之損失尤不可勝計，以鐵道上之機車爲著。孫連仲以後之「口述歷史」，亦稱其本人「收容近萬士兵」，他自己及參謀長奉命築臨時飛機場，由中樞派飛機接出，可見得實情不如當日宣傳機構所公佈之簡單。合衆社記者白爾登（Jack Belden）隨軍中政工作人員退出，他事後所著書稱，突圍時實屬萬幸，因最危險時間有晨霧掩蓋，且撤退人員在徐州之南由東向西行，而日方部隊各奉有攻擊目標，蓄意由南向北急進，不計其他，如是才能兩方錯過。

從李宗仁之電文看來，徐州會戰誤在整個敵情估計錯誤。四月七日戰勝之後，國軍之部署仍偏重於台兒莊至臨沂方向，而敵之南北鉗形攻勢，則著重微山湖以西隴海線上。李與副司令長官李品仙六月二日之「喪師失地請議處電」原文如次：

爲職等措置無方喪師失地請予議處由。職等於去冬奉命北上督師，進駐徐郡。擬遵照鈞座意誓以兩淮爲根據，捍衛齊魯，屏障武漢。台莊一役雖獲小勝，卒以指揮失當未竟全功。鈞座以最大之決心，轉用他戰區大部兵力，亦以未能窺破敵之詭計，致被牽制於魯南（此指台兒莊臨沂方面），魯西淮北之敵兩方包圍之勢已成「此即微山湖西隴海鐵路方面」，雖抽調魯南之兵，卒以敵機妨礙，運輸遲鈍，應付不及。現主力雖已突圍而出，但徐宿失之過早，有一部被阻於蘇皖之

處，敵打通津浦之目的已達，且威脅我汴鄭，又勞我友軍致最大之努力，此皆職等措置無方，喪師失地責無旁貸，追悔無及，憂心如焚，應請鈞座從嚴議處，以明賞罰，而肅紀綱，待罪行間，聽候鈞裁，不勝惶恐待命之至。（一九三八年六月二日）

此電不離官僚主義之作風，名爲請罪，實圖卸責。蔣介石只能以官僚主義辦法批「慰勉」。李宗仁之《回憶錄》除不提敵情估計錯誤抽兵應付不及外，尙云及桂系第一七一師師長楊俊昌過早放棄宿縣，受十年監禁，「多少有點冤枉」。可是從紀錄看來，他自己於六月四日呈報此次會戰功過人員，計有功者軍長一人（劉汝明）、師長七人，有過者師長二人，當中一人即楊俊昌，其罪名在「作戰不力未能與宿縣共存亡」，李又提議對他的處分「經撤職扣留解軍法執行總監部訊辦」。此呈全部經林蔚簽「擬照准」，統帥蔣批「如擬」。

從其他的文件看來，在李宗仁放棄徐州之前夕，蔣介石央請（電文無命令語氣）李由東向西進攻，並且即由湯恩伯部抽調三四師執行此計劃，蔣自己亦準備督導第一戰區，以兩軍的兵力由西向東進攻，互爲策應。電文又說及敵軍雖取鉗形攻勢，但其後方亦不安全，並且其冒險深入，「此爲殲敵唯一之良機」（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三日之後只接得李宗仁回電，謂已離開徐州，由孫連仲斷後（五月十七日）。蔣不得已，只能派部隊收容接應突圍部隊，並派員赴渦陽一帶訪尋李之下落，因李已與湯孫各部均失去聯絡也（五月二十四日）。

蔣不能因此放棄李宗仁。徐州會戰之後，國軍等於失去整個戰區。以後第五戰區開府於湖北樊城，仍以李宗仁爲司令長官，但已西退六百公里，如在歐洲必爲另一個國家。蔣不能公開表示對李

之不快，但他可以在日記裡發洩他的情緒。徐州失守之日他的日記裡有以下一段：「不能料敵增援黃口，致徐州被陷，深用惶愧，而知人不明，用將不察，尤當引以為戒。」（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然則寫至此處他亦仍無可如何。



從大歷史的角度看去，我們的重點不在各人之賢愚得失，而在締造新中國的高層機構之艱難。採取如是之立場，我們首先從歷史倒看回去，可以想見孫中山所謂中國乃是「一盤散沙」的真情，與蔣介石在廣州所說奪取政權與實行主義是兩回事的實際意義。抗戰之前，蔣看來已經奪取政權，但其背景仍是一盤散沙。實際上，中國在組織上講，有如胡適所說仍是一個中世紀的國家，而蔣介石也仍與前美軍駐天津之第十五步兵團內的史迪威中校所云「一派系之頭腦」，相去未遠。其所以如此，乃是社會組織尚未進化到現代之階段。

李宗仁說及他組織第五戰區時，所部龐炳勛稱第三軍團，其實則只有五個步兵團，其中尚有一個係特務團，看來也只是龐拱衛本身之用，不預備參與第一線之戰鬥，所以中央指令其裁撤。龐為一人「圓滑」，內戰期間總是避重就輕，有「不倒翁」之名。四川部隊則所用之鎗「半係土造極為窳劣」。經李呈請每軍撥給新鎗二百五十枝，已各認為恩遇。張自忠則在北平與日方交涉被人指摘為漢奸，私人則與龐炳勛為宿仇，凡此李均為之包容收羅，使之不生嫌隙。只有第三十一軍「究係我所直接領導的，指揮起來可以得心應手」。

如果只考慮到軍隊組織之實效，則抗戰本來即是一座大熔爐。凡有防礙軍令統一，色彩複雜，

傾向可疑，效率過低之部隊，當即投入而「滅度之」。豈有烽火漫天，殺人盈野，山河變色，將國運作孤注一擲之餘，其目的尚在一切保全原狀？誰還記掛著龐炳勛之年資，與川軍每軍分得步鎗二百五十枝之公平合理與否？

費正清教授說及軍閥之產生爲一般待開發國家之通常現象，因爲軍事科技輸入容易，不如管制軍事力量的社會組織之衍進需要長久時間。我們看來，中國需要利用前者之力量，抵擋住外強之干預，才能掩護後者之滋長。蔣介石之組織不能脫離此中複雜情形，亦無從全部合理合法。他之引用李宗仁，亦無非利用他爲蔣自己所代表的一般利害，與各省區私人集團所代表的特殊利害之中的經紀人。

蔣介石尚有一層困難。以組織裝備補給訓練全不如人之部隊與敵軍作戰，有賴各人之犧牲精神。我曾在滬戰期間訪問過教導總隊的士兵，他們即說起，蔣曾在他們開赴前方時訓話稱：「你們趕快去死！」以後我自己在成都中央軍校時，親自聽到校長蔣介石大聲疾呼的鼓勵我們，也是「你們趕快去死」！可是他自己的全般戰略，則是「待得久的得勝」，則已有一個「全軍爲上」的打算。〈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也說到不期望各地死守三兩年，即守至一星期也算達成任務，則誰願意作此超過限度的犧牲？

美國自我教練出來的群眾心理學家哈化 (Eric Hoffer) 所著書稱《真實信徒》(The True Believer)，內中說及，在黯淡絕望之期間作烈士易，因爲人人都願「拋棄一個不如意之自己」。反過面來說，既然「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則每一個人都希望能生存下去，眼見富強康樂之國家情景。蔣自己也曾寫出：「爲主帥者愛惜所部與犧牲所部皆有一定限度。」(詳本書一八八頁)已經充分表現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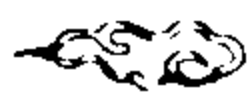
國人之入本主義，不能容納日本神風突擊隊的有死無生之作法。

以上種種均影響到蔣與李之和衷共濟與實際之貌合神離。李宗仁提及徐州附近全係平原，為敵軍飛機戰車活動之理想場所，國軍勉強與之作生死戰，很難避免淞滬南京之覆轍。他提及統帥，則「蔣先生個性倔強」，一定要做不可能之事，並非全無根據，至於兩方都以傳統官僚主義之辦法對付責任問題，則只是社會尚未進化到各人權力職責皆可以明確交代之境界的明證。

所以我們雖敘述事故，不能忘記背景上有一個時間之因素在。即評議蔣之專制獨裁，不能不關懷以下之背景：蔣所希望的成就，遠逾於當日社會之功能。在多種情形下，他發覺無理可違，無法可守。上文已提及雖購麻袋之瑣事他亦為之，憑他自己的信用購買足供五十個師所用軍火他亦為之，總之凡力之所及他即已做去。

在這關頭我們可以注意：國民黨中常會授權蔣組織大本營準備賦予大元帥名號時（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他毫無動靜，因為大元帥與否，不能脫離李宗仁、龐炳勛之現實。倒是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推舉他為總裁，他倒慎重其事，當日日記有云：「為黨國奮鬥三十年，至今方得全黨之認識，本黨動搖已十有五年，至今方得穩定，其為不幸中之幸乎！然余之責任愈益艱巨矣。勉之哉！勉之哉！」（一九三八年四月三日）總裁名號亦不足在事實上擴大蔣行動之範圍，卻可以保障他所行之事為合法，可以杜絕黨內各派別，尤其特別人物如汪精衛之公開異議。注意日記提出可供慶幸之事為「穩定」，可能排斥者為「動搖」。

蔣介石是一個注重現實的政治家。



一九三八年初至十月，是爲抗戰過程中的「武漢時代」，當時的士氣人心仍保持在最高度。蔣在年前進駐武漢，全國文化界領袖即發表「我們只有一個信仰，一個政府，一個領袖」。蔣被推爲國民黨總裁已在上段提及，汪精衛則爲副總裁。蔣已辭去行政院長兼職，但仍掌握著軍政大權。例如任各戰區司令長官兼所在各省主席，由歸德軍事會議宣佈後，以中樞命令執行。

另一方面國民政府也確實作了不少延攬人心的表示，有如設立國民參政會，以共產黨人七人包括毛澤東爲會員，任命周恩來爲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授權《新華日報》在大後方發行，聘郭沫若、田漢等任職於政治部。

但是蔣介石日記曾未表示在任何期間有對中共推心置腹的信用。即在抗戰剛一開始國共軍合作在平型關殲敵（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後才一月，他已寫出：「共產黨之投機取巧，應切實注意。此輩不顧信義之徒，不足爲慮，吾當一本以正制邪以拙制巧之道以應之。」（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再十天後他又寫出：「軍事失利，國內各反動派逐漸猖獗，共黨尤爲跋扈。外患未消，內憂日增，不有大勇，何能旋乾轉坤？凡事應以國家利害爲前提。如我自認爲是，則當以大無畏精神行之可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日）。

即在武漢時代，他的文件裡也留下不少對中共猜忌的紀載，有如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他獲得沈鈞儒與葉劍英談話的紀錄，據稱共黨欲利用聯合戰線作擴張實力的工具，一俟時機成熟將與政府作戰。六日蔣電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注意中共在陝北創辦抗日大學，「誘騙麻醉無知青年」應加防範。四月五日張國燾與毛澤東決裂，張發表《敬告國人書》，提及毛「不以國家民族爲重，缺乏團結抗日

誠意」。引起蔣的注意。十月五日周恩來面呈蔣毛澤東親筆信，內稱：「因此同人認爲此時期中之統一團結，比任何時期爲重要，唯有各黨各派及全國人民克盡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統一領導之下，嚴防與擊破敵人之破壞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勝利信心，並施行新階段中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達到停止敵之進攻，準備我之反攻之目的。」蔣閱後認爲此係蘇聯主使，因爲歐局緊張，史達林深恐兩面受敵，此時外間又有蔣政權即與日方媾和之傳言，蘇大使亦以六十師之裝備及飛機五百架相助示意，所以毛周「辭甚恭順」，同出於此一時之權宜。

蔣對中共的警惕並非無端猜忌。即在平型關殲敵之日，中共中央發表「在國民政府是國民黨一黨專政，還不是一個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府的情形下，共產黨一般的就不得參加這個政府及其附屬的各種行政會議及委員會，因爲這種參加，徒然模糊共產黨人的面目，延長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對於推動統一的民主政府的建立，是有害無利的」（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這還不算。劉少奇又在〈抗日游擊戰中的若干基本問題〉提出，在華北以國民黨爲主的正規戰被打敗之後，共產黨所領導的游擊戰將作爲主要的鬥爭形式。此時「要堅持長期的游擊戰爭必須建立根據地，必須改造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使它成爲真正的人民抗日政府」（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引號內文句根據《中共黨史大事年表》）。

中共既拒絕參加國民政府，又要從外間「改造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使它成爲真正的人民抗日政府」，那就已開以武力奪取政權之徵兆了。劉少奇又特別提出在敵後建立游擊區根據地，所以一年餘之後，國共部隊爲爭取敵後領導權開始武裝衝突，可謂在抗戰初開始時即已伏下遠因。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正當南京陷敵時，中共中央舉行政治會議。《中共黨史大事年表》有下列的敘

述：

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會議。十一月底剛從蘇聯回國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王明在會上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王明在堅持聯合國民黨抗戰問題上，發表了一些正確意見，但在如何築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面，提出了比較系統的右傾投降主義的主張。他批評洛川會議過份強調獨立自主和民主、民生，抹煞共產黨和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原則分歧，輕視共產黨的游擊戰爭的偉大作用，幻想依靠國民黨軍隊求得速勝，強調「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和「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王明的錯誤思想一度影響了一些同志，但因毛澤東等的抵制，王明的錯誤意見未能形成會議決定。

這段敘述，表現著受蘇聯影響的國際派要求中共與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切實合作，以毛澤東為首的國內派卻堅持獨立行動。

政治局的決議，包括成立「中共中央長江局」，作為策動南方行動的機構，又設立「東南分局」領導新四軍，如是伏下了一九四一年初「新四軍事件」的導線。

毛澤東也在給蔣介石親筆信後一個月，出席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報告：「在現時有些先得國民黨同意，例如將三個師的番號擴編為三個軍的番號，這叫做先奏後斬。有些則造成既成事實再告訴它，例如發展二十餘萬軍隊，這叫做先斬後奏。有些則暫時斬而不奏，估計他現時不會同意，例如召集邊區議會之類，有些暫時不斬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防礙大局的事情。總之，我們

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線，但又決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脚。」（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

這演講發表於國軍退出於武漢後約十日。不過從他的語氣看來，所謂先斬後奏和斬而不奏等辦法，必早施行多日，由來已久。以四萬五千人的部隊，只一年餘已發展至二十餘萬人，可見得共軍無心全力對敵作戰，其主要的行動在兼併敵後潰退的國軍，並且收編地方部隊所謂之「民鎗」。這些行動不可能完全和平貫徹。從毛澤東報告看出，他尚有其他給國民黨更不能容忍的作法。

國軍方面盛傳抗戰剛開始，第八路軍由陝北出發時毛澤東的訓話發表了「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的基本政策，可是此說不能由中共方面的文字證實。見於紙面的，乃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七日他給朱德、彭德懷及各師正副師長的電報，內中提及：「紅軍此時是支隊性質，不起決戰的決定作用」。



從以上節錄的文件看來，戰時國共衝突，蔣介石所採地位為被動。在偶一場合內國軍向共軍出擊非不可能，但在全般設計用心則以中共為戎首。

如此解釋蔣日記中所謂「投機取巧」及「不顧信義」之由來之後，我們卻不主張以他當日之見解作為歷史上最後之評斷。本文已一再提及以狹義的道德觀念作主，無從掌握大歷史。從中共的立場看來，蔣自己也曾奪取政權。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的清黨也是先斬後奏。蔣介石與毛澤東限於他們的人身經驗，彼此都以為他們所領導的群眾運動代表中國長期革命之全程，從以後迄至最近的發展看來，他們只各自完成當中三個階段之一個階段。

中國在二十世紀新舊體系青黃不接，有似秦漢帝國業已崩潰，隋唐帝國尚未登場的艱難困苦，而時間之迫切則遠過之，因之沒有三百六十九年的長時間去開拓一個「六朝金粉江南」的局面，靜候局勢之衍化。白修德誠然對中國現代史有誤解的地方；但他說及「中國若不改革，只有滅亡」，今日看來確是敷切事實。只是當日白與我們和蔣及毛都沒有看透需要變化之程度之深，之範圍之廣之大。此已不是改組，而是再造。

上文已約略提及國民黨所作所爲，在替新中國造成一個高層機構，贏得國家之獨立自主。現時我們縱橫批閱此期間蔣介石日記及其他文字，看來他之作爲始終未脫離此疇範。我們再檢討毛澤東、劉少奇的演講言論，中共之宣言決議及毛致蔣之親筆信，內中實包涵如此一段消息：「勞駕你們去組織一個高層機構吧，可是你們樂意與否，我們將重新改組中國的下層組織。」

本文已陸續提及，以下還要再加闡釋國民黨所造成的高層機構，由蔣及他的信徒提倡自我犧牲以抵擋物質條件之不足，內中仍吸收了不少過去之軍閥及官僚組織之成份。他們救死扶傷之不暇，不能也無意去翻轉低層組織。他們之所謂動員，無從脫離地方保甲之架構，亦即沿用舊社會之殘餘力量，不波動土地佔有租賃典當之現況，在徵兵納糧時以傳統辦法攤派。可是舊時代之組織原只能保衛本地治安，無從擔任現代任務，尤不能支持一個劃時代的國際戰爭。所以抗戰愈至後期，國民政府愈感到捉襟見肘，依賴外援之程度也愈深。

中共之民主，亦非代議政治之自由發言，只不過在字義上講以人民爲主體。如果抗戰期間當兵納糧的義務全由農民承擔，那麼政府的設施就應當儘量的爲他們著想，這原則本來無可厚非。可是以這樣一個抽象的觀念加在本身無現代組織之農村之上，就產生了無數技術上之問題，即流血暴動

之餘，還不知如何適可而止，也引起共黨內之清算整肅與平反，此是後話。

初期他們以抗日的名義動員農村，避免全部動亂，只用局部威脅，如不參和，即是漢奸。但即如此，國民黨已無從仿倣。而且中共也得到地區偏僻的好處。如是索性不製造行政上的高層組織，甚至全部城市文化可以擯斥不要，又拒絕金融經濟，大部隊只用無線電聯絡，各級幹部經常開會討論，以代替職業性的官僚組織，其轄區之傳媒一般無逾於油印報紙，所以雖落後而素質均一。但是他們缺乏一個整體形貌，不能如國軍之全面對敵作戰。

因著以後歷史之展開，使我們看出以上兩種群眾運動都不可少。一在倉卒之際因陋就簡的拼成一個高層機構，表現於自蔣介石至李宗仁至龐炳勛等的戰鬥序列，以及蔣的人身外交。一在敵我罅隙之間去整理基層組織，仍保持中共作風，如用「整風運動」作推動的工具。兩者同為歷史之產物，同因內外壓力煎逼而出現。這兩種運動既連續又重複，既在歷史上有彼此支援之功效，又在人身上造成生死對頭。縱然雙方當事人同有解決問題、為國為民之宏願，卻都在製造問題，甚至資敵以作難對方。此間矛盾複雜之處，不僅使當事人眩惑，而更使外界感到疑難。綜合看來，則由於短時間須完成大改革之故。

戰後蔣日記有以下一段：「史達林對經國稱，其對余個人之研究，比研究其他任何一國之領袖為澈底；認識余之性格，亦比任何人為真切。此可知其對余注意為何如矣。」（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五日）蔣自稱「以正制邪，以拙制巧」，何以其性格尚如是不可捉摸，竟值得克里姆林宮之孜孜研究？因其環境背景有如許之矛盾複雜也。因不論其出自主動或被動，蔣曾先後容共、剿共、撫共、反共也。

再回到前述之歷史上的道德問題：如果我們半個世紀之後，仍不能忘懷於當日之負因素，則對全部中國近代史之信心動搖，已不待此時。本書讀者想當記得，蔣在廣州時曾在日記中寫出：「政治生活全係權謀，至於道義則不可復問矣。」（詳本書四六頁）及抵南昌，又續記出：「三年來酸辛淚時自暗吞。歷史無事實，事實決不能記載也。知我者其惟鬼神乎？」（詳本書五八頁）所以他自己要通過如此之陰沉之境界，方能認識歷史上之長期的合理性。

以世紀末期的眼光看來，中國國民黨之領導抗戰，專注於民族主義，無從兼顧民生。中共則以民生為首務，寧可把抗日當作一種機會，而不以之為一種事業。又直到今日台灣海峽之兩岸，一體重商才可能談得上民權。以前以十七世紀的組織承擔二十世紀的任務，尚要擰節完成初期的存積資本，各人只有義務毫無權利。今日在高層機構與下層組織之間敷設法制性之聯繫，有賴經濟展開、社會上分工合作之安擺愈為繁複之際，才能釐定各人之權利與義務，才能對國民有最低度之保障。大歷史採用長遠之歷史眼光，也免不了引進新的歷史思想，所以縱敘述事實經過，極難避免更變時間上之層次。可是唯其如此，才不致將歷史割斷。



徐州由李宗仁下令撤退而棄守，武漢亦因外圍據點盡失而無法支持，於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自動放棄。先此四日，日軍已入廣州城。至此可以視作抗戰前期戰事的結束。中共亦稱之為自「戰略防禦轉入戰略相持階段」。

在這一轉變期間，蔣介石藉黃河決堤、長沙大火之辦法遲滯敵軍的行動。

現已發表之蔣日記不提及黃河決堤，《大事長編》只有「河南省花園口黃河南堤決口，黃河氾濫成災」的一段簡短的紀載，事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八日。當時徐州已入敵手，日軍且沿隴海路西進，立即有奪取鄭州直趨武漢之可能。花園口決堤由蔣指令施行。合衆社記者白爾登時在當地，他的報導提及蔣親自電話商震，催促商依計畫實施。當時黃河水量不多，決堤後氾區流速只每小時三公里，水深處約一公尺。但是四千個村鎮處在洪水氾濫之中，二百萬人戶無家可歸，洪水所過之處，耕作物蕩然無存，抗戰後三年黃河才恢復故道。

長沙大火似未經蔣親自指示，時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晚間，但是以「焦土抗戰」方略對付日軍，經過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之策劃，並且將士兵三人組成一個縱火小隊，均已佈置就緒。此事甚難使蔣介石毫不知情，因蔣於十一月三日抵長沙，居留十日，並在當地主持軍事會議指示機宜，即於十二日離開，而大火則發生於當晚也。只因縱火過早，日軍即停在岳州未即南侵，於是湘人抱怨，蔣乃問罪於長沙警備司令鄧悌及警備第二團團長徐崑與警察局長文重孚，三人均處死刑。所謂「高等軍法會審」如曾確切舉行，恐亦不過徒具形式，因蔣於十六日返長沙，死刑已於十八日定讞，蔣於二十二日電行行政院長孔祥熙，謂業已執行也。

應付此等事，蔣必有難言之隱痛，他的日記裡已暴露痕跡。有如：「上星期處理廣州失守重案之後不料又有長沙失火重案之處理……南北奔走，難關重重，何日得已！但只要所發生不測之困難皆能爲我所克服，則勝利更近矣！」（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見於《秘錄》而不見於《大事長編》，刪節處如原文）

如果縱火之罪確在此三人，或者所判死刑又係經過軍事法庭憑公定讞，又何至使最高統帥感到

難關重重？所謂不測之困難爲他自己所克復，表示他曾以本人人身力量干預各事，並以非常手段執行。

此事蔣必有「非如此不可」之理由，但很少的人對他同情。李宗仁評他心狠。陳銘樞後在重慶告尤特里，他依然敬慕蔣，但對蔣不經開庭審判處人死刑，始終無法接受。我們將各事提出旨在保全當日實況。

長沙大火案了結後不久，時值西安事變二週年紀念。蔣日記云：「今日之處境雖在倭寇多方困迫之中，然較之西安遇難之危急狀態則勝千萬矣。上帝既能拯救余出此萬惡絕險之境，自能拯救余四萬萬生靈於塗炭之中也。惟祈上帝能早日赦免余之罪惡，而使余國家民族即脫離壓迫實現獨立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二日）雖以蔣介石之宗教性格，他仍一向保持中國人之立場，很少提及本身罪愆，此處情形特殊。



汪精衛之出走，使蔣介石相當震驚。從紀錄看來，蔣與汪曾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在重慶會商，到有孔祥熙、張群、王寵惠諸人，此似爲汪最後主持之國防最高會議。《大事長編》所載無會議紀錄，只有蔣堅持不與日本言和之主張。

蔣於二十日由重慶飛西安主持軍事會議，二十一日接得汪精衛由昆明至河內之消息，當日日記云：「當此黨國空前未有之危局，彼竟不顧一切，藉口不願與共黨合作，拂袖私行，置黨國於不顧，此豈吾革命黨員所應有之行動乎？不勝痛惜之至！惟仍望其能自覺回頭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

一日)

汪精衛對戰事悲觀已始自開戰時，李宗仁說及當他自己奉蔣邀往南京之次日，汪即已向他表示戰局無望。郭廷以稱汪曾目睹傷兵無醫藥，當時已說：「此仗如何能打下去！」郭又說及汪在出走之前，曾於十二月十六日訪蔣，蔣不待汪開口，即拒絕討論與日和談，似此證實李宗仁之觀察：蔣不把汪放在眼裡。

汪既出走，蔣即認為此係企圖給他自已以打擊的舉動。日記接續的有此表示：

不料精衛之糊塗卑劣乃至於此，誠無可救藥矣。黨國不幸，竟有此類寡廉鮮恥之徒，無論任何待之以誠心義膽，而終不能邀其一顧，此誠奸偽之尤者也。（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至此他全未考慮到汪出走有一個和戰關鍵在，他仍認為問題全在汪和他自己的人身關係。

又有：「彼雖蓄意加害於余，而余仍應以善意救彼，對於此種愚詐之徒，只有可憐可痛而已。」（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其重點亦仍在「彼」與「余」之關係。

再有：「回憶民國十五年，彼投共賣友，不惜禍黨誤國，余以至誠待之如總理，而彼為共黨所欺，以一時之利害，而放棄公私情誼，不惜與蘇共協力謀我，思誘我上中山艦運往海參威，此種非人所為之事，而彼竟樂於為之，是則何怪其今日通敵圖降，以打破我抗戰計劃，使我不能成功，其不識大體，不顧國家至此，余乃復與之合作，尚欲使之自拔，豈不拙乎？然而要亦力求余心之所安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亦見本書四〇頁）至此他更強調抗戰乃一己之事業。

《大事長編》所載蔣在一九三八年年底，曾想用各種辦法使汪不致投敵，如央請與汪交好之

彭學沛勸汪赴歐，又與駐英大使郭泰祺交換電訊作同樣安排，再囑香港《大公報》主筆張季鸞，在言論上對汪暫留餘地。日記有云：「以德報怨固非人情之常，但救人即所以自救，忠恕待人，寧人負我，我決不負人，惟求心之所安而已。」（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但恐怕去此不久，即已派遣刺客謀殺汪。

刺客在翌年三月二十一日在河內誤殺汪之秘書曾仲鳴，汪既已發出通電，至此除投敵外更無他法。古屋奎二指出刺客名爲王魯翹，後往台北任台北警察局長。

在對付汪精衛時，蔣介石表現其最大長處和人身極大弱點。當汪精衛發出「艷電」時，我剛在四川銅梁接受軍校入伍生之預備教育。凡我之所接觸，舉凡軍界民間上下左右曾無一人考慮到與日本議和之可能及必要。校長蔣公之抗戰決策既有西安事變作導引，又有廬山會議談話之根據，他又經國民黨推舉爲總裁，並經中共及其他黨派擁護，則在戰事展開一年半，全國軍民已付出極大犧牲之後，他認爲和戰之決策早定，不容再提出討論，不是沒有公意之支持，而這種公意亦出自一種信念。蔣在當年十二月九日對汪等說起：「只要我政府不與日本言和，則日本無法亡我」，與他過去所說不畏鯨吞而怕蠶食，都已深入人心。在提出這些主見之後而能對之負責，正是蔣介石偉大之處。

可是事後從歷史的角度看來，以上信念仍不過一種信念，要是我們把當日交戰國兩方實況拿出作客觀的分析，汪精衛所說「此仗如何能打下去」並非絕無理由，而且除了以後不能預料之情事疊次發生，影響到歷史之過程外，汪之現實看法可能較我們的信念爲切實，縱然過去汪精衛再三反覆，有主張而無決心，好標異而不能負責，但是他爲國民黨之副總裁，國防最高會議之主席，蔣亦不當在他於公私場合中提出意見時，將之封殺。蔣介石不可能對此事全無悔恨，不然他不會與龍雲緘電

辯論，並引入上述彭學沛、張季鸞等人關注，他又於日記內寫至一九三八年之年終檢討時提及：「就余個人而言，德性進步甚少，修養不足，暴躁未減。」（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然則再說回頭，「抗戰必勝」只是一種主見，與他以前日記所述「惟信仰可以移山也」（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亦見本書一三頁）以及「寧爲玉碎，毋爲瓦全。存亡盛衰之理，冥冥中自有主宰，吾何憂何懼！」（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亦見一三頁）同有宗教上之力量，只能意會無法理解。更追溯回去，我們尚可以在日記中看出「今而知革命心理皆由神秘勢力與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實極微弱條件。」（詳本書四六頁）既然如此，那又如何能拿出分析解剖？

汪精衛最大的危險不僅因爲他是副總裁獲悉國家機密，而是因爲他所說「此仗如何能打下去」一經傳播，可能影響到士氣人心。在一九三八年底和一九三九年初，接著失陷徐州、開封、廣州、武漢四大重鎮之後，汪之說法實已成爲敵方宣傳之利器。這種危險尚有動搖蔣本人信心之跡象。《大事長編》用第三人身稱：「公省察最近心理，常有悲時憂世之感，因深自檢束。」當日之日記則云：「此一病由乃以人情世態之變異靡常，致有以轉移我之憂樂耳，以後應特別矯正。凡事只問我心之公私是非，而不必競競於恩怨利害。只要我能積極於今日之進取，則明日與將來之禍福成敗更不必作杞人之憂，但須時時謹慎，處處戒懼，事事有備而已。尤須切戒暴戾忿怒，勿使自棄自餒，務以養心修身，不虧抗戰建國之任務自勉之也。」（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注意此段寫在汪發出艷電後只一個月零兩天，亦在王魯翹河內行刺之前不久。

以後汪在蔣日記內由「精衛」而「汪兆銘」，終成「汪逆」（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此時最大之顧慮在他可能影響龍雲及粵籍將領。汪投日後曾往廣州以粵語廣播「如何能實現和平」，事後經張發奎、

余漢謀及李漢魂之辯斥。將日記稱：「張等對汪逆痛憤之切情見乎辭。因此其買空賣空之舉，將更爲敵人所輕蔑與唾棄矣！」（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八日）此後蔣雖在日記中間常提及汪精衛，但汪既不能發揮如日方期望之力量，他在蔣心目中的地位亦逐漸散失。只在抗戰後期汪之南京國民政府資敵動員，以「偽軍」出現於戰場，復經蔣在日記中痛斥。



一九三九年雙十節，蔣蒞臨成都，我們軍校學生第一次得瞻「校長」丰采。我們心目中的蔣介石得自黃埔建軍和北伐期間的印象，想望著必是一個英風爽颯的人物。及至近眼看上去，才覺得與想像完全不符。他雍容持重則有之，卻不像一個步伐輕快、氣勢奪人的百戰英雄。這一次他與孫夫人、蔣夫人與孔祥熙夫人同來。及至在閱兵台上就位，他堅持孫夫人以總理夫人的資格爲閱兵官。孫宋慶齡堅持不就，於是他也不居正位，最後宋氏三姊妹在一邊，他自己在另一邊，當中留下一個空位置，我們才在軍樂之中以正步步伐通過閱兵台。及至讀「黨員守則」和「軍人讀訓」，他以濃厚的浙江口音說：「我讀的時候，你們不要讀，等我讀完一段你們才跟著覆誦」，更帶著塾師之情調。

直到最近我看到《大事長編》，才發覺五十多年前的那天，他的日記裡帶著憂鬱情調：「際此雙十國慶，適值湘贛告捷，宜乎歡欣鼓舞之情，無逾於此者，然而余內心之痛苦，實非筆墨所能言喻，十五年以來，部下學生之死傷集累日增，不知凡幾，緬懷革命先烈之創造民國與總理付託之重任，以及抗戰前途之艱巨，與遺族之待哺育，究不知此身將置於何處，若不努力盡忠，或稍不自愛將何以對總理以及爲革命而死難先烈在天之靈乎！」（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

然而抗戰至此階段，國軍中之派系依然存在，而人員武器裝備則有急劇的退化，宣傳機構所報的捷信，一般甚少實質。更大的困難則是後方社會的情景。如果抗戰初期，國軍所在的沿海地帶社會情形有如晚清，則內地情況大似於明朝。除了物質環境的困難外，社會上缺乏適當的架構去支持數百萬大軍及應有的文官組織。蔣實在是以一己填補此中罅隙。白修德書中寫著：

有一次新聞局的局長穿著長袍去謁見他。蔣告訴他，他年紀尚輕，不應著長袍應著西裝。蔣決定誰可以去美國，誰不當去。他決定政府公辦的新聞學院研究生誰可以留美。國立中央大學的學生抗議「政府供應的」伙食不好，蔣委員長親自到該大學吃一餐飯，他結論飯菜並不差。

傳統社會裡人與人之關係單元，各在小圈圓謹守「尊卑、男女、長幼」的序次。新社會尙未形成，亦無法令各人根據「應有的」權利與義務行事，於是蔣只有自行牽拉拖派。他原已兼各軍官學校校長，以後又兼中央大學校長。

一九三九年的雙十節他來成都，其主要目的不是校閱我們軍校學生總隊，而是就兼職為四川省主席。四川因承受行在政府的新負擔，更觸發省區人物內在之爭執。省主席王纘緒幾與川康綏靖公署副主任潘文華兵戎相見。蔣日記曾有云：「寇患日深，尙有何權利可爭，川事實極嚴重，上帝佑華必能使之化險為夷也。」（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一日）

經過調停之後，決定令王纘緒率部赴前方抗日，川省主席由蔣自兼。潘文華之權責如何整飭，未見提出，想另有區處。蔣對各情當必一覽無餘，我們已讀過十五年前他在廣州處理此等事之經過。至此大凡涉及財政之事，無不有蔣參預。他既為農民銀行之理事長，又係中央、中國、交通、農民

四家銀行聯合辦事處主席。兼職既多，他必被獨裁之名。其實他如果有獨裁實力，則不妨督成各省主席及軍政財政部長照己意去做。其必各處兼職，只暴露中層以下互不相提派，各自為政，亦即未經過長期間之成長與磋磨。各銀行既無證券交易在後支持，亦無公家戶頭抵押貸借款辦法，尚不知本身業務志在營利，抑或僅供各級衙門開銷，只能由委員長每事臨時決定。

當日我們看到校長缺乏拿破侖之英爽，而有塾師之囉嗦，他卻早已幾度滄桑，嘴裡說：「你們趕快的去死」，內心則又記掛「驅我同志就死難者中正也」（《軍校第三期同學錄》序，詳本書四四頁）。見及成都軍校學生，想及當年黃埔建軍，觸景生情，才寫下憂鬱徘徊的一段。

既重紀律又富情感，蔣介石不能避免在矛盾中兩方走極端，所以也有人認之為偽君子。他會有以下一段之自白：「本日在國民參政會致閉會辭中談《詩經》〈鴟鴞〉四章，不覺淚珠盈眶，自信聞吾言而不受感動者必無心肝之人也。」（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鴟鴞〉原文如次：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採荼，予所蕃租，予口卒瘝。曰余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飄搖，予唯音嘒嘒。

專家指出，此詩作自周公以貽成王，表示他盡力於王事之艱難，以鳥語道出。讀至此處，我們也領悟當日校長雖百戰英雄而風采減色之原委，藉「鴟鴞」道出，他已羽毛疲敝，叫聲淒楚，因為整個巢穴危殆。可是其精義則他仍在奮鬥，並未放鬆責任的慘澹經營。這樣看來，主持抗戰僅有氣

魄膽識仍是不夠，還要有超人的忍耐與堅毅。蔣介石在此方面表現特長，得力於古典教育。



經過武漢階段之後，抗日戰爭進入長期的僵持局面 (stalemate)。國軍無力作有決定性的反攻，日軍亦因佔地過廣，將可能使用之兵力，用至最大限度，一直至一九四四年發動「一號作戰」(Operation Ichigo) 之前，未曾使作戰地圖產生劇烈之改觀。白修德憑他實地採訪的經驗寫出：

我所看到的無非散兵坑裡一群一堆的士兵守著生鏽的機關鎗或者擦拭著陳舊的步鎗。中國兵之前哨總是二、三十人一處，以傳令兵向營部聯絡，營部用電話線向師部聯絡。日本部隊則在村莊裡二百人至三百人一處，有輕礮兵支援。你可以從山上下瞰日軍，遠至千哩，任何一處中國兵比日本軍為五比一。可是日軍全有重機關鎗及野礮。任何中國武裝士兵想要通過開闊地一兩哩的地方接近日軍總會被敵方火力擊倒，「這火力」此方無從制壓。

他所敘戰爭之僵局當中生意往來：日方與中國投機商人勾結，汽油、汽車、輪胎、醫藥為中國抗戰所不可少，由沿海區域運至內地；中國所產之錫、鎢、錫為日本兵工業之必需，亦由內地走私進入淪陷區，戰線則長期膠著。所以這是一種「奇怪的戰爭」(a curious war)。

現有美國寫中國近代史的著作，根據上述印象，即稱中國之抗戰有名無實。費正清教授之遺著《中國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 內中也對八年抗戰之軍事行動全部一字不提。他的理由為：「歷史家總是著眼於因果關係之嬗遞。中國之前途出自延安，是以日軍及以後國民黨軍之戰敗，少

有人研究，相形之下比不上中共之勃興。成功帶創造性，具有趣味；失敗則悲慘而沉悶，誰愛理它？」

這種看法不僅排斥我的大歷史觀的全部觀念，而且忽視了中國對日抗戰在世界歷史裡獨樹一幟的奇特性格。中國誠然是一個大國，卻也是一個弱國，戰前戰後最高統帥即已明白道出，中國無力在軍事上單獨取勝。唯一的辦法則是長期不承認失敗，一心要將對方拖垮，而且要靜候國際情勢的變化。八年之後，這全部方略一句一字的做到，這已算是離奇。而當中經過，更有不少驚險之處。而整個戰爭的長遠意義，有如表現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四川省主席兼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兼中中交農四行常務理事——進行創造國家高層機構，以原始而粗率之方式立時交出——要到事後幾十年才可看清。倘將此八年歷史之積極性格一筆勾消，則所寫歷史難能避免去精華而留糠渣。

白修德所謂中國兵人數比日軍爲五比一仍不能取勝，經蔣日記證實。日記有云：「我之兵員數量大過於敵。我軍各期作戰之初，約以三師人數抵敵一師。若就全局而言，我軍幾以八師或十餘師人數與敵軍一師對戰，然尙不能戰勝敵軍者，以我守一線，且取守勢，故敵軍用錐形戰術，突破我正面之一點，即可動搖我陣地，此我軍不敢攻勢之誤也。以後應以我之大單位六師或九師兵力，取廣正面攻擊戰術，尤應注重側背包圍，與襲擊其弱點及空隙，並在緒戰時即用優勢兵力取攻勢，則不難致勝也。」（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

但中國軍缺乏戰鬥力，不盡如蔣所云只是戰術錯誤。日軍一師團通常有兵力一萬六千人至一萬七千人，配屬特種兵後，可能接近二萬人。中國一師通常編制一萬人，但除抗戰前期外，一般缺員，以每師六千人至七千人爲常態，雙方火力之差異尤無法簡概的形容；國軍不僅兵器落後，而且彈藥補充不繼，各戰鬥單位素質不齊，亦不易協定，各部隊均對友軍行動視作一個未知數。日軍謂我軍

對側後感受性強，他們用小部隊或中央突破或側翼包圍能使前方國軍敏感，可能開始潰退。反之日軍在敵國作戰無法逃遁。

在僵持之局面中，戰線無重大之變化，但並非戰場常久沉寂，林三郎書中說起：「他們（國軍）經常的將兵力轉移，利用游擊戰術，既進且退，使日軍疲於奔命。因為中國之持久戰術，日軍之殲滅戰大多失效，只能攪得一段狹窄的土地。」

而且國軍亦非僅守不攻。一九三九年的「冬季攻勢」，即發動全國整個的九個戰區。一九四〇年中共部隊施行的「百團大戰」，也牽動了一個廣泛的地區，吸引了大部日軍偽軍，共方發表包括「大小戰鬥一千八百二十餘次」。此外值得稱為會戰的戰役約十至十二次。不過除最後一階段外，很少的戰役足以視為全部戰史中值得注意之焦點，有如前述之淞滬、南京、徐州諸役。本文除在次編敘及後期之鄂西、常德、衡陽諸戰役外，此間只概述戰事一般狀態。

林三郎書中續云：徐州會戰為戰爭中之一個重要轉捩點。迄至此時大本營仍企圖控制二十個師團兵力，備而不用，所以仍以蘇聯為假想敵，以後進攻徐州，才將此二十個師團之一部投入，自是之後侵華戰事了無限制。從此關係看出：台兒莊之勝利，可能較戰場上所見為深遠。蔣介石之全般戰略以「不畏鯨吞而怕蠶食」作基礎，所以雖節節戰敗，仍在整個戰爭中保取主動。若對方拒絕深入，則他反而失去掌握。

一九三九年國軍的冬季攻勢，曾在南北攻克日軍佔領的崇陽、通山、崑崙關、包頭、信陽、沁陽。翌年又克花縣、合肥、五原。以上只算得二等三等城市，但為日軍的防禦態勢之不可少。只是到底國軍之戰鬥力有限，主要的攻擊目標全未得手，截斷日軍在長江內交通之計劃也無從實現，而

且以上各城市也都得而復失，然則如此已使對方疲於奔命。繼著冬季攻勢之後，國軍也在一九四〇年春季入唐河、新野、襄陽、棗陽、黃陂、開封、商邱、諸暨、龍州。一九四一年秋天又再攻入福州、鄭州與宜昌。以上都只佔領到一個短時間而放棄。

我們不要忘記：蔣介石被迫與日本作戰，並無決戰計劃，從戰前以筆名發表的〈敵乎？友乎？〉和開戰後方始公佈的〈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都只僅保證誘敵深入，長期作戰。前者指出：「如日本同中國作戰，即無所謂正式的決戰，非至日本能盡佔中國每一方里的土地，不能作為戰事的終結。」後文更坦白表示：「他要佔我們十八省至少要費十八個月，這十八個月時間，那國際變化還了得？」這三兩句話已包括他一切的必勝秘訣。

對日本人講，蔣介石敗而不降的辦法給他們無限煩惱。迄至一九三九年日本之「直接軍事費」已超過六十四億日元，為一九三七年之二倍，占全國歲出百分之五十二點九。並且尚不知作戰目的（war aim）何在。與蔣介石之疊次和談接觸均未得要領，納降汪精衛又未收到預期之效果，遂有自動撤兵之企圖。

種村佐孝大佐任日本大本營戰爭指導班班長多年。他所著書稱《大本營機密日誌》直至戰後方將當日秘密揭穿。撤兵計劃在一九三九年年末由陸軍省提出預算時肇其端倪，至一九四〇年三月由陸軍省首腦及參謀本部決定。預定自一九四一年開始由中國內地撤退，但至一九四三年仍須確保長江三角洲及華北內蒙之各一部，只是此計劃剛一經各方同意，即有歐洲局勢之直轉急下。一九四〇年德軍在西線突破，六月法軍退出戰爭，日本軍部亦再度轉向，認為機會突然出現可以「乘坐巴士」（不費力而憑空達到目的地）。於是將整個撤兵計劃放在腦後，代之以南進政策。情報部設立南方班蒐集

東南亞之兵要地誌，參謀本部及軍令部考慮對英美作戰、菲律賓登陸，又任命西原一策爲「佛印派遣監視委員長」，準備進軍越南。預計截斷越南及緬甸之援蔣路線，支那事變將不解自決或不決自解。

此與蔣所述「那國際形勢的變化還了得」相呼應，他的賭博也一步逼一步，接近結采的階段。

不過自希特勒之突破馬奇諾防線至山本五十六之突襲珍珠港，當中有一年七個月，此中仍有不少縱橫曲折。在當日蔣介石的角度看來，一切發展不見得對中國有利。

況且敵方自動撤兵，也與他的期望相違。佔領上海及長江三角洲、河北及察哈爾之一部，正是日本開戰時之目的，也是近衛通過德使陶德曼之和平條件之主體，與蔣介石之要求一切恢復到盧溝橋以前狀態去，並撤銷塘沽協定，相去至遠至巨。如果敵方竟貫徹其作法，今後可以節省兵力，更有系統的搜括佔領區資源，將開戰以來之「臨時軍事費」自每年之五十五億元，降低至每年二十五億元，可以長期立於不敗之地，並非中國之福。

其實在敵方陸軍省提出撤兵計劃之前，日軍在戰場上已表現企圖節省兵力、縮短防線之徵象。以下之觀察見於蔣介石日記：「敵正式軍隊似有撤退趨向，以後其必盡力封鎖海口以圖斷絕我之對外交通，而一面則在我內地固守據點，以維持其重要交通線，我應及早確定對策以破之也。」（一九三九年七月十四日）

這樣看來，當年發動冬季攻勢，以及次年在各地的反攻，雖未歸復城池奪還失土，至少已盡牽制之效。敵人攻入固然要節節抗抵，希望寸土不失，他企圖退出，又要設法阻攔不能令之自去。蔣介石所謂「磁鐵戰術」，並非虛枉。



《大事長編》提及一九四一年十月之第二次長沙戰役時稱：「殲敵四萬餘，死傷枕藉，並俘敵二百六十九名，鹵獲戰利品甚夥。」但最高統帥在第三次南嶽軍事會議卻於訓話時提及：「像這次長沙會戰，我們有這樣雄厚的兵力，有這樣良好的態勢，我們一定可以打敗敵人，一定可以俘虜敵人很多的官兵，一定可以繳獲敵人無數的軍械！即使沒有一萬俘虜，也總應該有一千！一千沒有，總要有一百！一百沒有，少而言之也應該有十人，但是現在你們連十個俘虜都沒有！如何對得起自己的職守？」（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日）

虛報戰功及誇張戰果，為古今中外交戰國常有現象，即以對方日本為例：他們所公佈殺傷國軍數，通常無例外的在他們自己損害數二十倍以上，以後蘇聯在第二次大戰將終結前，對日作戰一週所公佈之死傷，又如以前日方之所發表同樣人多已少，超過常情的不成比例。中途島海戰，日本航空部隊可謂全軍覆沒，但大本營仍稱擊沉美國母艦二艘，日本只損失一艘，擊落美機一二〇架，日本只損失三十五架。即美國第十四航空隊所報擊沉日本船艦噸位，亦經常有超過日後能證實之四倍以上之趨象。但是縱如是，其虛報與誇張，以敗作勝，以敵方自動後撤為「大捷」未有如國軍之經常一貫。而尤以國軍之兵員素質、裝備訓練、補充後勤均不如人之情形下，所虛張聲勢甚難令人置信。上述蔣介石之訓話，即在戰區司令長官及第九戰區高級將領之前講出。

戰報之不可靠，有多數背景上之原因：中國歷來重文輕武，文官集團又不對外負責，所以以文章辭藻粉飾戰功，由來已久。鴉片戰爭時，清軍擬反攻寧波之前十日，揚威將軍奕經令幕僚作文字競賽，預草戰勝之露佈，及於衝鋒陷陣之詳情。如此偽飾矜誇，已成文教上之習慣，社會上期望如

此，倘再低調更在絕望時搖動人心。軍中一部如此，其他部隊即不得不效尤，雖最高統帥洞悉詳情亦無從矯正。

在考訂歷史時，前項作風產生兩種附帶問題。一則誇張戰功，強稱力之所不及，同時自圓其說又必掩非飾過，甚至將環境背景情形一體包瞞修訂，殊不知如此只有使功過倒置。中國之抗戰成爲奇蹟，原係客觀條件不容許，有如胡適所說，中國是一個「中世紀的國家」，與汪精衛所說「此仗如何能打下去」，如將種種逆勢一概不提，則雖戰勝亦不足爲奇。偽飾則易被識破，實質上既無所誇說之成就，弱點暴露，更易爲人認作貪污無能。二則各人功過不說，茲項誤解亦足以用之錯評歷史。費正清教授即已提議將八年抗戰之詳情全部剔去，而立即迎候「中國之前途出自延安」，則又必對毛澤東及中共亦生誤解，如此輾轉因循，讀史者對本人今日之立足點亦茫然無所憑藉。因之，此非僅對蔣介石及國民黨之褒貶問題，亦爲治史者所臨的一個基本問題。作者與讀者是否能對中國近代史存信心，可能關鍵在此。

刻下有系統而帶善意的鋪陳抗戰時社會背景方在伊始（所以我於一九九二年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報告時亦呼籲及早加緊此方面工作）。有時我們尙只能引用自己人身經驗。蔣介石之日記以策勵他本人向樂觀方向著想爲主旨，雖有時偶一說及中國弱點，此種出處不多。但是他在南北各地軍事會議之訓辭保全良好，內中所述確切剴實，可補日記之不足。



經過武漢之階段後，國軍被驅入內地。本來中國工業已經落後，而內地所在區域之工廠數只有

全國百分之六，發電量只全國百分之四。迄至一九三九年，內地各省年只產鋼鐵一千二百噸，以後經過資源委員會之經營，此渺小的生產量增進十倍，但至一九四四年仍只有一萬餘噸。此與當日各工業先進國家每年生產數千萬噸及今日中國每年所用鋼材近九千萬噸無從比較。最近西方一篇敘中國戰時經濟的文字說起：「很顯然的，除了幾座微暗著照明的都市和幾百個政府經營的小型工廠，發動力不足之外，自由中國乃是一片幽暗，這是一個全然未工業化的區域。」

白修德書中說及，國軍兵工廠最多每月生產步鎗子彈一千五百萬發，平均每兵只分得四發。「在儲備量這樣渺小的情況下，沒有神志清爽的指揮官敢於去作攻擊計劃，軍隊的攻擊精神也逐漸消失。」

交通工具之短缺，尙且更使有限之資源分配爲難。抗戰後期殘破之鐵道線幾全在最前方，後方之機械化運輸，多賴汽車。據估計滇緬公路通車時中國有汽車一萬五千輛，三年之後缺乏保養，僅有五千輛依舊行駛。重慶、貴陽、昆明、柳州間各有未鋪瀝青之碎石公路一條。一九四一年七月我往部隊報到時，旅行於貴陽昆明間，途中南盤江上唯一橋樑被日機炸毀。兩岸高山上壅集新來後到之軍用民用卡車共約一千輛。當日臨時的救急辦法，乃是在河床上架設浮橋。但仍怕敵機來襲，只能在日沒後燃煤氣燈架橋，工作數小時後橋成，兩岸卡車蠕蠕而行下山過渡，兩方循序對開渡過卡車約二百輛，天已黎明，浮橋拆去，所用船舶木板分往上下游樹叢處覓得蔭蔽，所以待渡歷時三日。又一般車輛經行上述各城市間，每日極難超過一百五十公里。一九四三年此中幹線平均每日只有各色車輛一百二十三輛在途。蔣介石曾於訓說時提及：「雖然我們現在對外還有飛機和汽車可以運輸，但一架飛機能載重多少？普通一架飛機最多只能載重兩噸。一架空中堡壘亦至多只能載重四五噸，而從前一個很小的輪船至少能載三千噸，現在一百架最大的飛機，他一天最大的只能運輸三百噸，

還要經過遼遠的航程。至於汽車的運輸又是怎樣呢？從前一系列火車可以載重五百噸，現在一輛汽車只能載兩噸，最多三噸。這就是說，現在二百輛汽車，還抵不過從前一個火車頭所拉的噸數。」（一九四二年九月六日）因之即是交通運輸，已使國軍之戰鬥力大為減損。注意上述輪船火車大部在對方日軍掌握之中。

當時中國人由沿海至內地之大遷徙，稱爲一時佳話。但遷入者大都係公務人員，軍隊學生，亦即消費者多於生產者。郭廷以稱上海之五千餘家工廠，併江南各地遷入內地者不過二百餘家，由武漢遷入者約一百五十家，廣州工廠全未遷移。至一九四〇年內遷工廠不過四百五十家，器材物資只十萬噸上下。此等工廠能使各大城市內市場上之消費品不缺，但對戰事之貢獻至微。

軍中物資缺乏情形，甚少爲外間詳悉。我當少尉排長時，士兵無牙刷、肥皂、毛巾。全排用一塊粗布洗臉，以致一個士兵眼睛發炎，次日十人發炎。士兵入廁時以竹片瓦片作手紙。又無鞋襪，草鞋各兵自織。輜重部隊用油桶取出汽油，以橡皮管作虹吸管，駕駛兵深呼吸將油吸出，到嘴時緊快的吐去。汽車下山時概用空檔以節省汽油，極易出事，並濫用煞車。因缺乏滑潤油，兵器不能有效的保養。第十四師爲國軍勁旅，可是一九四一年有一段時間士兵無換洗衣服，只能在晴天時整隊往河中沐浴，就便將身上制服洗濯，在樹枝上晾乾。此與蘇聯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時，將全部菸草，大部肉食，以及一半以上之皮靴交付與紅軍有了絕大的區別。也與各工業先進國家之戰時動員，民間日用品缺乏，軍中供應不斷無從比較，因中國尙爲農業國家也。

當部下報告補給經理情形困難時，蔣指示他們只有咬緊牙關硬拚。如果沒有騾馬，則敵兵部隊的官兵要依自己的臂力肩力抬轎。如果制服沒有發給，則只有將破舊的制服縫補，一套制服要著用

三四年。吃飯只能吃夠，不當吃飽。士兵患眼病，則可以用土法用棉花蘸紅茶治療。部隊裡本來彈藥不夠，蔣的辦法則是子彈只一百發時，寧可再用六十發作實彈教練之用，則其他四十發可望在作戰時百發百中。同樣的剩至手榴彈兩顆時，也仍可以將一顆爆破以獲取經驗。次一步則是「前方補給」，希望奪取敵軍兵器彈藥。

說及以上情形時，蔣介石沒有顧及彈藥將用盡時的士氣與人心。他也沒有想到部隊扛機關鎗爬山越嶺、長途行軍之景況。此時今日不顧來日，只要軍械彈藥無缺，部隊長已不能過度督責部下。軍毯可撕作綁腿，裝具也可能拋棄。蔣說及軍服應著三年，言之成理，他未計及無換洗時的情形，而且士兵死病逃亡相繼也難得在同一部隊裡共生死三四年，使經理人員能負責前後對數。蔣根據北伐時經驗，革命軍可望敵方彈械。他沒有注意前述白修德的報導：此時日軍駐紮於村莊內，凡開闊地均用火力封鎖，無法近接。

當蔣用各辭推諉，不實際去替部屬解決問題時，他的答覆引用了傳統官僚主義的辦法：真理與權威同時由上至下，不由分辯。而下級也用傳統辦法陽奉陰違，人人如是，最高統帥亦無可何如。難道蔣介石真是被蒙蔽，不知實情？從下面尚將敘及的訓話辭看來，他洞悉各種情弊，而是實際上無辦法。本來抗戰就是以一個落伍的國家，接受超過時代的任務，孤注一擲的企圖打開出路，此時只能鼓舞各人之犧牲精神，在無辦法之當頭，合理的與不合邏輯的想方設計。若能人人如此，才能不畏鯨吞，也才能將歷史的發展縮短數百年，否則只有接受現實，隨著汪精衛去投降。



以下數段，揭發國軍在抗戰後期經理之實況，見於蔣介石向高級軍官訓話時之講辭及致各戰區之通令。蔣日記無類是的記載：

本來我提倡軍隊設立合作社的原因，為改良官兵生活，這種良法美意應該推行盡利，但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現在我們軍隊當中竟有藉口合作社名義來經營商業，反作為營私舞弊的淵藪，尤以沿江沿海附近一帶交通衝要的駐軍為甚。（一九四二年九月九日）

現在軍人經商的流弊恐各戰區都不可免，希望各位司令長官與總司令嚴切取締與禁絕，如有經營商業販賣仇貨的，一律視作通敵論罪。（一九四二年九月九日）

我前方部隊兵額之空虛，已為全國皆知之缺點。各級層層欺瞞不一而足，至有一師之中缺額至三千人以上者亦相率視為故常。平時領一師之餉，臨時不能作半師之用，及至事後申報戰役經過則又任意浮報，動稱一師死傷五六千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

從用辭的語氣看來，以上情弊不僅普遍，而且有不能阻遏的趨勢。如果統帥不能堅持「禁絕」，而只「希望」各司令長官與總司令如此如此，已徵示著雖「營私舞弊」，所列舉的不法舉措有社會力量的背景在。縱以蔣介石的威權，他無從因著「一言九鼎」的力量撥開雲霧。

以上不正規之經營縱屬可怕可恥，足以危害整個的抗戰大業，但我們僅斥之為「貪污腐化」，仍不能深切的透解歷史，腐化出於一個原來健全的有機體，受外界污染，浸淫日久，減色變質，終至內部結構崩壞。我們目下討論的現象，則是組織尚未就遂，經不起外間壓力，內中各單位各自作生存的打算。有了這樣混淆的局面作掩蓋，所謂貪污才能為所欲為。

追溯回去，我們可以將病源歸咎到明清帝國的財政稅收（我所著的《十六世紀中國明代的財政與稅收》即從此著眼）。當日全國以小自耕農為主體，納稅人付稅力歉薄，政府財政支配的力量極為有限，政權靠儀節及文教的力量維持，於是對內不設防，亦無中央銀櫃，因循到二十世紀。本文已提及，雖北伐前後，軍費仍靠鴉片稅捐支持的情形。

南京政府時代各事有顯著的增進。一九三一年後關稅自主，又加以食鹽公賣，廢除厘金，改向新型輕工業徵收「統稅」，並發行公債，已造成一個小康的局面。蔣介石的德式軍備靠這財政基礎支持。

但直至抗戰軍興之前一年，國民政府之預算仍只十二億元。以當日的匯率三比一計算，是為美金四億。即算貨幣購買力今昔不同，亦無從以此款維持陸海空軍，供應全部政府機關學校，並興辦公用事業。看來即在戰前已有預算未曾覆蓋部份，在各地不正規的挪取拖欠。地方軍隊之費用，更未列入上述預算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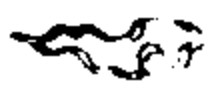
抗戰軍興才一年，以上所敘南京時代之收入，幾乎全部脫離掌握，各交通孔道重要城市又盡落入敵軍手中，而軍隊數額尚不斷膨脹，自此地方部隊之供應亦漸由中央負擔，蔣介石之困厄可想而知，當時政府應付辦法除多發通貨之外，很少其他出路。

在背景上，蔣和他的理財者尚經過一道好運：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即距抗戰開始前一年餘，國民政府宣佈白銀國有，以後公私付款概用法幣。原來前數年因世界白銀價格劇烈的波動，中國硬幣已有大量向海外流出，造成國內通貨緊縮。此時代之以紙幣填補此空隙，利多害少。抗戰之第一年承接此趨勢，法幣因軍興逐漸流入內地及鄉村，使物價波動甚微。再兩年通貨膨脹之程度仍不過劇。

及至一九四一年，即太平洋戰事爆發之一年，物價突破十倍大關（專家估計一九四一年物價指數為戰前之一九點七七倍），以後方成螺線式的陡長。

回憶此時我為少尉排長，月薪四十二元，制服自備。但在雲南駐地村鎮街頭吃一碗麵即法幣三元，是以軍中待遇已與無給制相去不遠。當地土匪出價收買我們的輕機關鎗，每挺七千元，是為我們一個上等兵四十年之薪餉。若干部隊長晚間將鎗械加鍊條鎖在鎗架上，以防士兵攜械潛逃。此時軍政部發下士兵夏季制服一套，另一套即付代金由師長購辦，但發下的錢即已不夠，而雲南馬關縣三百里內外亦非產布區域，只得由師長指派軍需扮作商人，往日軍佔領之越南買得大批白布，回時以土法蘸染為黃綠色，就地縫製，衣料不夠，則剪製為短袖短膝無領之衣褲，有似於運動員服裝。如此軍需之供應，已逐漸採取承包制，部隊經商，亦只為情理上之次一步。蔣介石既已說及成立合作社的主旨，在「改良官兵生活」，已在暗示之中承認官兵待遇低於合理的標準。他又說及：「所

以一切補給問題，總要以就地解決為主。」（一九四二年九月六日）即此更很難區分合法與不合法。



蔣要求其將領取締的不外「吃缺」與「走私」。

逾越常規情事以吃缺最為普遍。原來軍中若干業務無預定款項支付，如補修裝具，而部下家人貧病特殊情形，亦賴部隊長解囊周濟。一般辦法，為由上級默許各部隊虛報兵額若干，通常連長得報二人，以上營團長遞加。各部隊軍官出缺亦可按情緩報一二月，其薪餉即由主官截留。再超過此範圍方始由上級問罪。如此截留之薪給，有如明清衙門之「陋規」，雖不合法已在暗中被承認。我曾

見鄰部餉冊有「中尉排長魏德仁」一款，我常出入該部而未見此人，後經詢問，方始知實係司書取巧以諧音影射「未得人」，他已認爲吃缺爲公開秘密，無庸隱諱。這種作風何時創始，我尙未查悉，但我懷疑已始自戰前。

蔣介石稱虛報名額以千計，當係每次戰役前後人員損補有大幅度變動之情景，亦反映軍中經理愈近包辦。蔣既已揭發其濫枉而不能指名問罪，則不僅顯示弊端已廣泛展開，而中樞亦不能辭其咎，癥結在本身未能對野戰軍作適當之供應。大概抗戰後期，每師人數以六千至七千爲常態。所以戰役前虛報三四千將近足額。戰役損失二千人左右，則可併以前缺額報稱死傷五六千人也。此等情事似由師長作主，因師爲經理單位，但甚難無戰區司令長官支持。因人數相去數千，至難在現地矇哄也。

部隊經商在抗戰後期爲普遍情形，但其機緣視駐地而定。通常各部隊在大城市設有「通訊處」及「辦事處」，以軍需主持，即大致爲分店或堆站。各城市之衛戍司令部及防守司令部，亦間常查勘取締此等半官半商之機構，但無實效。昆明防守司令部之兵站組織，本身即具濃厚商業性質。當法幣快速貶值時，「工不如商，商不如屯」，軍政部既常以現金代實物，各部隊長亦發覺除搶購物資屯儲價值之外，別無他法。因之亦不能查禁。戰事愈至後期，軍隊依賴經營之情形亦愈深。

高級軍官經商扣餉，可保持其戰前生活程度，多時亦爲維持各人家庭關係之必需。如重慶召開軍事會議時，所到皆私人汽車，早在正常薪給所能支付之範外。但除戰區司令長官兼各省主席可以自行抽稅外，軍人甚難因非正常收入而致富，首則其收入仍須支付軍中開銷，分潤同僚，二則至難掌握大批交通工具，而內地經濟落後區域走私市場亦有限度。中下級軍官擅自營私非不可能，但極危險。我軍駐雲南時，第五十四軍軍長黃維即下令鎗決上尉軍需一人，初以爲此人營私至巨，事後

查覺爲數甚微。

我們再度仔細閱讀蔣訓辭時，即可想見他所關注已非普通日常不正規之處，而係大宗巨案，涉及前線敵我貿易，有如白修德述及「奇怪的戰爭」中之情節。

恰巧我也與此等事有一段接觸。一九四一年十月，我得第十四師師長許可，往日據老街視察，在紅河北岸河口時，發覺國際走私貿易情形輸出以桐油、水銀、及礦砂爲主，進口則爲香煙、鴉片。運輸隊常用騾馬數十頭，不可能無前線駐軍協同勾通。除提出向師長報告外，我又於翌年以「黃禾」之筆名作中篇報導，將實情刊載於重慶《新華日報》。當日少年氣盛，我甚以爲冒險揭露黑幕於國事有益，不知此間情節早經中樞洞悉。不久之前陳誠遺稿在《傳記文學》發表，即說及他自己爲遠征軍司令長官時，雲南各駐軍不僅經商走私，尙且聚賭，吸食鴉片，盜賣軍械。看來以他的高風亮節，尙且無可如何。

至此，我才想見蔣介石訓話時的真實心情。前已說及，他日記裡避免此類事。但有以下一段：「所部不切實，不努力，不奉命，私心自用，惡習難改，每念國人之欺僞蒙蔽，而不肯切實研究與準備，實爲心寒，而此身幾爲此愚妄之流所葬送矣。」（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三日）但是他未想及，此等情形已受非人身因素支配。



林三郎書中又根據日本大本營的判斷，中國軍隊經過初期抗戰，亦即徐州、武漢、廣州棄守迄一九三八年底時，總人數曾一度低至九十萬人。此後經過歸隊補充又及三百萬，此亦即太平洋戰事

爆發時之總兵力，但至此中國方面裝備及人力資源 (human resources) 均極差。

我不知道他憑何標準稱國軍人數曾低至九十萬，但他所說裝備及人力極度低下，則極爲中肯，切符當日情形。

關於人力資源貧乏的程度，目前研究方在展開，有如中研張瑞德的工作。在茲資料尙未蒐集充分之前，我們也只能再度在敘述時摻入當時的人身經驗。

我在軍校畢業後，分發至第十四師，亦原屬蔣之德式裝備部隊。及至一九四一年，不僅全師大量缺員，而且大部所補充新兵在體力與智力講，不堪教練。其原因不難想像：國民政府之兵役法在抗戰之前一年公佈，抗戰之後才會卒付諸實施。徵兵既有免役代役各項規定，其徵集之對象自始即擺在農村社會之最下層。徵兵之機構，即無非地方上之保甲，傳統上是承奉官衙旨意、了卻地方責任之基層組織。所以徵兵之程序亦無非從上向下加壓力。至於「師管區」與「團管區」全係紙上文章，最多亦不過以官僚主義之方式，將軍政部頒下的數額由上至下攤派。及至實際施行，則由接兵單位，至此爲駐防雲南之第十四師派遣官兵組成之「接兵隊」，前往後方之師管區，至此則爲湘西各縣。到頭免不了由保長甲長領導，以鎗兵按戶搜索，多時被徵派之人戶亦即無力抗拒此上層壓力之人戶，徵兵效率既低，亦無從作智力及體格之甄別，只有來者不拒。於是出錢買替身也儘量收買價廉質劣的人身商品頂數。

戰後我在美國陸軍參謀大學上學，講授人事及動員之教官提及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陸軍動員八百萬人，已接近於「搜括人力桶子之底層」(scratching the bottom of the manpower barrel)。此語給我印象至深。一九八七年，我在哈爾濱第二屆國際明史研討會提及抗戰期間國軍徵兵及於「人

類之渣滓」，用辭不當，曾被抨擊。其實我無意把人不當人，而是無法不加重語氣的表現當日困窘。如以「軍事人力」(military manpower)當作流質，以桶盛裝，則國軍確已扱出當中混雜沉澱。

蔣介石訓辭中曾有一段提及：「我們一般高級將領平時既不考核研究，不知軍隊自身缺點所在，而完全歸咎於兵役機關。」(一九四二年九月九日)雖然他仍叮囑各人引咎自責，但已暴露徵兵情形惡劣，眾人嗟怨。

第十四師及鄰師對付人員不合格的辦法，乃是組織「突擊隊」，只挑選各單位堪訓練之士兵集中訓練。其餘留在各營連，專重管教，以維持軍紀而節省彈藥。表面看來這辦法反應著傳統「軍無選鋒則亡」的原則，其實「選鋒」及「突擊隊」原應有超越之技能，我軍之選鋒則只能保持尋常尺度，原屬尋常的又更低下。這樣的部隊可以在每一處較日軍為多，可是攻擊時不免蜂屯蟻附死傷慘重。戰敗退卻則又各自逃命，作鳥獸散。

又不論新兵老兵，舊社會習慣無法革除，各人「有面子」和「無面子」的觀念隨時都可以現實化，「權利與義務」只在虛無縹緲之中。上級與下級之間和下級軍官與士兵之間，人身恩怨甚過於階級服從之紀律習慣。一個軍官贏得士兵愛戴，端在他表現自己是一個粗線條的英雄好漢。這些條件可以使指揮系統紊亂，也可以使執行命令的程度打折扣。在如此情形下，我們不能確定我們是在領導列兵，還是受他們群眾心理支配。我們在軍校所學大抵無用。因為即是「協同動作」和「發揚團體精神」等簡單的抽象觀念，也要從幼入小學時，從基本教育實地體會做起，又經過競技與體育比賽等，成爲一種紀律與風尚。這些觀念與習俗，甚難在五十年前憑空的灌入全不識字的農民頭腦中去。

下級情形如此，團營以上的協同動作更難，因為很多條件足以使側後友軍的行動成爲一個未知數。我後來任參謀時，看到不少帶兵將官將所有軍語，擯棄不要，也不說「搜索前進」，只對部下發令「看到敵人就打」。其他「主攻」，「側翼威脅」，「火力網」，「佯動」，與「逆襲」等，更不在話下，即在圖上表示攻擊腹案時也只說：「敵人從那邊出來我們就朝這邊打」。如此粗陋作法，與日軍全部照典範令行事，考究到每一兵器每一小單位，每一兵種都能發揮戰術上之至當，有了霄壤之別。

全局如是，此時各個人之人身勇氣很難發生功效。易勞逸教授引用一個美軍觀察員的報告，內中提到國軍攻擊時，近距離不匍匐爬行，而挺腰直進，有些排長近接到日軍胸牆之前一兩公尺處被打死。

這些情形蔣介石並非毫不知悉。他在軍事會報時，經常講到戰術與參謀業務，又經常督促各將領研究學習，不時又提及日軍之長處。他沒有講到的，則是一個農村社會很難產生一支新型現代化的軍隊。裝備火力後勤之外，人力資源有決定性的影響。蔣所講到的，卻很露骨。有如他有一次在西安軍事會報述及接送新兵的情形：

比方我們部隊駐老河口要派官長到四川去接兵，接兵官在四川並不領到足額新兵，沿途更放任新兵隨便逃跑，或遇途中士兵發生疾病，更是任意丟棄不顧。如此即可以省出火食費用歸入他接兵官的私囊。等到行抵駐地老河口附近，爲要歸隊復命起見，就拚命在其附近捉拉民衆充數。以致發生張冠李戴，冒名頂替之事亦不少。更有新兵既係臨時牽拉而來，爲要防其逃走，乃用繩索串縛，視同罪囚，這種現象到處沿途可以看到。

以上情事誠然是中國歷史中的一個污點，也是中國人之羞辱。史景遷教授所著中國近代史教科書即有插圖一幅，題為「農民被徵兵爲國民黨部隊牽去」。內有赤足而著軍服之士兵多人被繩索縛束，馬後步行。從牽引者之鋼盔、軍刀、軍便帽及彈藥盒看來，則係日軍，圖爲處置中國俘虜情況，爲史誤植。但國軍視新兵如罪囚，早已傳播遐邇。注意上段蔣已說及：「這種現象到處沿途可以看到。」然則縱如此，我們不能因之過度簡化歷史，稱此等事爲蔣人身上之罪愆或籌劃失策，其背景決無如是單純。

在追究責任時，我們仍須看清蔣介石及國民黨之籌劃經營，只及於新體系之高層機構。日後史迪威與蔣衝突曾寫下：「中國人首先安置屋頂，只賦與必要及極少的基礎與支持。既然誰也看不透地下的情形，又何苦爲它操心？我們「因此倒只好」苦幹，儘力於低層及地下的工作，使「這」房屋站得住脚。」（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其實史迪威也低估了中國在歷史中空前轉變的程度與範圍，他爲自己已提供一個解決全部問題之方案。這一誤解，構成他在個性之外不能與蔣共事之一大主因，第四篇將有機會詳及。

上面各節我們已提及蔣介石製造新高層機構之困難情形：如在國防最高會議即與汪精衛發生和戰決策之衝突，組織戰區即有唐生智、李宗仁等不能真切用命；控制四川省政府則須放逐王纘緒；

整備財政則須自兼四行聯合辦事處主席；爲防制大學生及教授被敵對人拉攏，尙要自兼中央大學校長。至於他禁止新聞局長著長袍，則又係引用傳統之「尊卑長幼」標準，因爲新時代以「權利義務」作準繩之原則，至此仍不過一個籠統觀念，缺乏實效。

及至徵兵，則須通過社會之基層組織，自鄉、鎮、保、甲而達至各人戶。我們從包大可教授及Martin C. Yang諸人之著作看來，可以想見終國民黨執政期間，此中甚少有意義之改革。其所以如此，乃是土地之佔有未曾因政府之干預而更變。

這樣一來，上端結構草創伊始，最多亦不過代表新時代之理想。下端則依然故我，與現代社會有了互世紀的距離。上下之間亦無從產生有法制精神之聯繫。現有之聯繫則不能脫離傳統方式之威權。要使上下之間以權力與義務互相連鎖，互相約束，互相支持，互相保證尙是幾十年後之事。

此種社會結構，無支持現代軍隊能力。加以財政上無出路，自四川至老河口缺乏帶服務性質之機構，如公共食堂、宿舍、醫療所、娛樂場與現代交通工具。於是只能採取承包辦法，由接兵官一手包辦。此時發下來的錢亦不夠，何以接兵任務尙有人角逐？因當中仍有利可圖也。因可以用威權代替責任也。所以買放之事有之，綁架作數亦有之。蔣介石明知此中情形，在軍中提出時，他無力解決背景後之問題，只得責成前方部隊長作面目上的糾正。

如果蔣介石真有決心，他是否可以在抗戰前後執行他自己的社會改革？這問題曾使我苦思多年，但是最後仍只能接受歷史之啓示。中國社會基層之改革，不能在短時間局部見效。以中共的經驗而論：有意義之改革只能首先對外隔絕，從內陸腹地農村文化水準最低處著手，而且要計公平，不顧利害，將現有文物制度全部放棄，從新再來。背景上，多數地區之田賦，尙用明代底帳。土地

佔有情形之複雜，又加以比鄰近親放債收租之參差，至於不可爬梳。即主持人亦須身入其境，方能逐漸瞭解問題之實況。此時即希望保障最低人戶之生存權利，亦必視他們為主體，而不能以他們爲附帶條件。不僅以自由主義者身分參加此社會革命之人物日後均受檢舉，即中共內部之理論家已難倖免，可見得問題範圍之大與解決方案之不容妥協。經過幾度反覆之後，中共發覺不如將一切土地收爲國有，又經過近三十年之集體勞作，才積集得一段國家資本（專家估計約六千億元，一九七〇年間價值）作爲鄧小平經濟改革之本錢。所以中國的長期革命，規模宏大，段落分明，因抗戰而創設新國家之高層架構，因內戰而再造基層組織，因對外開放一體通商，而重訂上下之間法制性之聯繫。凡此都表現新舊之間距離之大，無從再從中躡等。

讀史至此，我們只能想見抗戰爲歷史賦予中國之第一個考驗：這國家能否獨立自主，由八年苦鬥而決定。在此八年苦鬥之過程中，其組織上不合現代生存條件之處，無不經過徹底暴露。蔣介石雖預度前途荆棘，從他的文字看來，他未曾在抗戰之前猜及日後艱難困苦之程度。他的日記裡也不時表現憂鬱情調，如前述〈鴟鴞〉詩篇及在成都閱兵後之觀感，可是這種悲觀及自憐的心境如汐如潮，只在短時間來去。他經常祈禱，每日靜默，不斷的用意志力緊束自己，也表現於日記各款。以下一段表示他拚死不服輸之氣概。注意他寫此段時，正準備通令各戰區發動冬季攻勢，但正在此時，南方戰線則日軍攻陷崑崙關；北方戰線則有中共之薄一波煽動山西新練成之「決死團」十餘團一體投共。日記文云：「決大難，定大計，理人事，了瑣細，動心忍性，益我不能。處此時代，瞬息萬變，不可捉摸，殊非常人之所能堪，苦則苦矣，然余生丁其間，適逢其會，轉覺幸事，故不僅不悲，而且饒有興趣也。」（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八日）



以史迪威對國軍無情之批評，他的文件裡也仍留下了一段一九三八年他任駐華武官時，在江西德安親眼見及一個「王上校」的作戰紀錄。此王團長只有輕機關鎗四挺（應有百挺以上），每挺配子彈二百發（可能在數分鐘內耗用完畢）。史迪威與他接近時，王團已死傷過半，但是當晚仍在德安街頭夜襲，由團長王上校親自指揮。一座日軍重機關鎗阻塞去路，中國軍從側面潛行至敵後，以手榴彈將此機關鎗巢消滅。當晚及至次日，雙方仍在鏖戰中，相去只數碼。史迪威寫著：「沒有汽車也沒有電話，躺在稻草上。」至黃昏才有師長之傳令兵至，令該團後撤。原來之一千五百人，至此只剩四百人。死傷之一千一百人內，有六百人陣亡。

一九四二年底，蔣介石命令以陣亡之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等三十八人祀忠烈祠，內中有師長十六人。此後，據我所知，即在一九四四年尚有暫五師師長彭士量，一五〇師師長許國璋，及預備第十師師長孫明瑾在常德殉職。新二十九師師長呂公良死於洛陽。一三一師師長闕維雍死於桂林，九一師師長金瑛在禹縣失蹤。再有防線被突破時，舉鎗自殺之第二十三師師長李必蕃均未列入此十六人之內。前後由蔣手令鎗決者更有第八十八師師長龍慕韓，第五十八師師長廖齡奇與第九十七師師長傅維藩。自此看來，國軍冒險犯難非不壯烈。

從所有紀錄看來，無人置疑於統帥蔣介石人身之勇氣。李宗仁在北伐期間早已指出蔣氏在敵彈橫飛之際不失其鎮定，「頗具主帥風度」。抗戰初期，李也曾陪同蔣往蘇州巡視，李之回憶錄裡更強

調是晚敵機轟炸之危險。蔣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飛離南京，當時日軍已逼近城郊。漢口於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放棄，他於即日凌晨才飛離武昌。即在當日烽火連天，而飛機之整備及地上設置均極簡陋之際，經常飛行已具有相當冒險性格。

蔣介石在日機威脅之下幾陷於危，也業有多次。例如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二日駐在武昌，省政府官邸四周均被炸燬，死衛士二十餘。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一日於重慶黃山官邸附近曾中彈，蔣在三樓。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二日駐節於柳州羊角山，行營所在地被炸傷衛士十二人。一九四一年八月三十日重慶黃山官邸又被炸，死衛士二人傷四人。一九四二年一月七日，在緬甸美苗有一彈墜落於他所在五十碼處，但未爆炸。

他記在柳州遇空襲之情形云：「午睡初醒，二時十五分聞機聲，命衛士審其方向，旋忽警覺敵機必來炸余，乃急披衣整裝外出，其匆促之情殆不啻於西安事變之初焉。」

「當余外出時，侍衛長王世和稱：『敵機已由頭上飛過，似不緊要。』余知敵機如來炸柳州，其目標必在余，乃急入後山之上層防空洞，少頃敵機二十餘架齊向洞上投彈……旋又來襲低空俯衝投彈……彈皆著洞上右方五十米突至一百米突之山巔，計傷衛士十二人……」（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三日，見於《秘錄》略出字如原文。茲段日記不見於《大事長編》，但《長編》記此事載在二月二十二日，稱「敵機三十餘架」。）

此外，日機於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炸溪口蔣宅，大概蔣毛福梅是役殉難，日軍佔領溪口後據說曾於一九四一年掘蔣祖墳，曾記在蔣日記（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日）。一九四三年元旦日空軍炸贛州，似以蔣經國為目標，其專員公署被燬。蔣介石日記稱：「嗚呼，倭寇必欲毀滅我全家與絕滅我

子孫者，乃如此之毒也。」（一九四三年一月二日）以後日機再炸蔣經國住宅，經國之子孝文頭上負傷（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此一串行動果出自全般計謀如蔣猜測，則日人似與蔣作神經戰，立意動搖其心境之平衡。

又真係如此，蔣對家人庇蔭亦深具理由。他在武漢即已在日記內寫出：「目覩近日敵機轟炸武昌與漢陽之悽慘，以及人民與士兵死傷之悲痛實不忍心之至！戰例：凡最高統帥必在後方者，不令其見聞軍民在戰場之慘景俾專心主持最高之戰務，而無所動其心也。今余既任最高統帥而此身又不能不在前方指揮鎮攝，且事必躬親，此余處境之不同，不得已而爲之耳。惟甚恐以理繁治劇之故而貽忽重要戰務戒之勉之。」（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

蔣介石本能上是一個非常容易情緒激動的人，我們已讀及他日記裡自述「淚涔涔下」（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和「淚珠盈眶」（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之情節。他不時在軍事行動之中雜以人身之反應。一九三八年徐州失陷之前，日機曾集中轟炸城內第四號行轅，是爲他經常駐節之處。其實當日他在鄭州，但聞訊仍在日記寫出：「敵必殺余而甘心乎？似此殘暴凶橫實古今所未有，若不予以消滅，何以維持人道？上帝有靈，當必有以懲除此一惡貫滿盈之衣冠畜類也。」（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三日）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四〇年一月，日軍第五師團與國軍十餘師，激戰於廣西南寧以東北之高地。崑崙關之敵軍全數消滅後，國軍始獲得此要隘。但次一陣地九塘，則由日軍放棄。而且撤出之前其指揮官尙從容捧靈牌作招魂祭，退走之後又留下一種佈告，稱「璧還九塘於蔣軍」，內中稱讚此次作戰「蔣軍比任何方面空前的英勇」，值得欽佩。但是公告的主旨，則是自誇以寡敵衆殺傷過當；並且「粉碎蔣軍的目的已達」。蔣讀罷引爲奇恥。除在軍事會議一字一句朗誦此文外，又即宣佈桂林

行營主任白崇禧及政治部部長陳誠均降級，兩個集團軍及三個軍之番號撤銷，各主官查問。第九師師長已陣亡，該師官兵未能營救，改稱「無名師」，「以明廉恥」。

蔣介石處理大事時能沉潛而有氣魄，大概他有意志力及哲學宗教思想從長對付。及予以短距離及近身之刺激，他反易產生衝動性之反應，是為其終身弱點。



蔣以革命軍人自居，又叮嚀部下「你們趕快去死」，則他的自責也應當超過旁人對他的責備。但他認為他全家都已暴露於敵方陷害陰謀之下，業已付出充分代價。自此他更可循戰例，避免直系親屬捲入戰火之中。蔣緯國往德國習軍事，一年半而抗戰爆發，蔣切誠其不得提前回國。緯國於一九四〇年回國後，蔣亦不令之獲軍功陞遷。當經國與緯國聯袂赴重慶謁父時，蔣介石在當日日記寫出：「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此為余今日家庭融融之寫照也。若非上帝眷佑，曷能臻此哉。」（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一日）

其後未一年，則有第二次長沙戰役，第五十八師師長廖齡奇以臨陣脫逃罪名，由蔣在軍事會議場中宣佈處死刑。廖臨死前留下遺書三封，一呈其母處理家事，一致其表弟囑代算結師部帳目，一囑其妻改嫁。又囑執行死刑之憲兵團長將各緘抄件送蔣閱（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一日）。蔣是否閱及反應如何，不見於現已公佈之文件，但憲兵第十八團團長之報告述及各節，則存在檔案，此與上稱「樂爾妻孥」之融融寫照成爲一個尖刻之對比。

蔣宋美齡在蔣心目中佔極重要地位，日記不時提及，有如：「夫妻相愛之切誠能消愁去憂，在

苦痛患難中，惟此足以自慰耳。」（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可是在重慶時他們也不常口角。蔣自奉淡薄能與部下共甘苦，雖政敵李宗仁亦不能否定。但蔣夫人、孫夫人及孔祥熙夫人相遇時三姊妹在曾家岩官邸以撲克牌消遣，坐侍從室汽車出外兜風。報載香港吃緊時，政府派飛機往接在港人士，但通過孔家，產生「飛機載運洋狗」之新聞，引起西南聯大學生抗議。蔣剛責問，蔣宋美齡則在一怒之下出走，避居黃山，數日之後蔣往解謝了事。

蔣夫人也數度以養傷名義出國（她在上海戰役期間，所乘汽車在京滬國道受日機攻擊，車覆受傷）。先往香港，後去巴西。最後一次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出國，至抗戰勝利之後始歸。當她滯留海外時，謠傳蔣宋婚姻發生問題，甚至蔣納藏情婦，經蔣召集茶話會否認，事載白修德、涂克門各人書中。

難道大歷史不能脫離私人生活之細節，及於風聞謠傳？又有如何之大人物全無私人生活之疵瑕？

正因為本文宗旨在縷述蔣中正字介石在舊體制業已崩潰新體制尙未登場前，補苴罅漏的製造一個新國家的高層組織，他已遇到無數技術上的困難。如果在道德上呼籲，可以作為他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則我們務要指出：樹立一個完美的私人道德標準，不是歷史賦予他的任務。因為兩種事業都是驚天撼地的工作，決不可由一人兼容並包。新中國的道德標準，還待在傳統價值與新經濟生活切磋之下樹立。過去所寫歷史，凡一提到蔣介石這樣的一個題材，作者或引用狹義之道德否定他一切作為；或以道德作為屏風，遮蓋規避事實，造成一種令人不能置信的地步。這也即是本書第一編第一節第一句所提出希圖避免的局面。我們搬出當中瑣聞細節，縱無法完全避免「褒貶」之指責，卻立意不在褒貶。但既有可靠消息則諸事無用隱避。本文希望輔助歷史研究之展開，不以小節封殺

歷史。

從蔣介石的日記看來，他希望留下一個模範家庭之典型，是則在他看來仍是籌備一個新國家高層機構之一部，而實際上大抵無效或者結果相反。有如蔣宋美齡當初向外遊說，造成超過事實之美好現象，日後一被攻擊指摘，外間之公眾意見亦作一百八十度之轉向。美國《新聞記者》雜誌（Reporter）曾將孔宋家利用權勢炒買外匯支持「中國說客團」（China Lobby）各節儘量張揚，至今在國外人士心目中構成深刻印象。亞爾索浦（Joseph Alsop）為羅斯福之堂表陳納德之隨從副官，在蔣介石與史迪威衝突時，竭力支持蔣氏。他的自傳題為《我曾見此中妙處》（I've Seen The Best of It），在身後出版，內中述及蔣「有偉大之本質」，但是卻也有「超過平均限度之與偉大相衝突的地方」。



曾任蔣隨從秘書的曹聖芬，在《懷恩感舊錄》裡敘及他的居停主人「宅心卻極為仁厚」。與蔣數度作對的李宗仁，卻強調他為人心「狠」。我認為兩種觀察都有著用的地方；並且非如此，蔣不能繼續保持為中國政壇台柱數十年。

當抗戰將要結束，戰後外交形勢轉趨重要時，蔣介石曾對當前國際形勢作過一段分析，全長一千五百字，是他日記裡最長之數段中之一（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內中提及中國需要利用美蘇間矛盾及他們彼此對中國之需要與顧慮而劃策。「北疆與俄合作」，「內地與美合作」。似此不能脫離「以夷制夷」之窠臼，然則全文卻又重視「個人人格與國際之地位」及「中國民族性之堅忍與守信重義

之道德」。至於不得不暫時放棄道德而就權宜，乃因「今日國際交涉無所謂公理與感情，只有實力與利害關係，更無是非可言」。因之只能以「正確之政策爲之運用指導以補實力之不足」，而最後目的「乃在求得獨立與解放」。

這段文字構造了一種「正義——權宜——正義」的曲線藍圖。也有「理想——現實——理想」之構思。再參對他以前所記，則六年之前他也曾寫下極爲相似之一段。當時所記如次：「國際形勢瞬息萬變，吾人惟有緊握機紐，操之在我。在我之道，以正義眞理爲主，而以策略與權宜爲輔。若至策略無效，則純以正義處之，此所謂以不變御至變者也……」（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後文重複之處由我略去。）

其實蔣介石不僅處理外交如此，在對付內部問題時他亦表現一種「正——奇——正」之傾向，因之亦帶有「仁厚——狠——仁厚」之雙重性格。他將一己與中國人之「一般利害」視作一體由來遠久，對他講來公衆道德與私人道德已至難區分。前面之一段已提到黃河決堤與長沙大火的情形；他一方面想到遺族之待哺育，一方面又在製造遺族。

他看到重慶附近人民生活的情形，曾在日記裡寫出：「川民最痛苦而其工作最殘忍者二事即背長絳上灘與提大錐鑿石，令人目睹耳聞悲傷難忍……」（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以下數句由我略去。）

看到勞工與苦力以血汗營生尙不能忍，又如何能主持造成九千餘萬之難民的戰爭？當中必有一個「見牛未見羊」的關鍵。只有如是一個任直覺的主帥蔣介石，才要叮嚀自己，不要看到前方慘況，而鬆懈戰意。而對方日本，似已看透他的弱點，偏要在人身角度去激刺他。



前述廖齡奇的死刑由統帥在南嶽軍事會議宣佈，翌日執行。第九十七師師長傅維藩「作戰不力，自動後退」，則僅憑胡宗南來自西安的報告，由蔣批示指令「就地鎗決」，這樣的行動沒有人世間的威權能對之寬恕，而蔣亦已於祈禱時承望上帝赦免他的罪惡（詳本書二一九頁）。既然如此亦無庸我們置喙。

但是寬恕不論，作史者仍應在背景上加以闡釋。如果當日類似案件一概憑眾公開處理，其結果甚可能超出一般意想之外。本來抗戰即是糾集不合格的兵員器材，缺乏後勤組織，與強敵長期拚死活，有些場面上伏有高度必死公算。「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並非虛語，應從字面上領略，每一戰役成功的機會這樣的渺小，而對方日軍又並非等閒的戰士，則每人和每一部隊應盡力的程度至難客觀的決定。況且一兵一將的鬆懈，至可影響到友軍之安全。這種種因素都加重了上級與統帥督促的責任。

蔣介石所訂的連坐法，抄襲自明將戚繼光，本來帶有中世紀色彩，但是國軍在多方面也確是中世紀之產物。外人很少談及：當時嚴厲的軍法並非僅間常施於高級將領，而經常的而相當普遍的施於一般士兵。榮譽第一師（所有士兵均曾負傷一次）克服崑崙關之日，第一線戰鬥兵已少至一千人左右，但仍即時檢舉，一次在戰場上鎗斃後退之士兵十餘人。我自己無道義上之勇氣參與執行此種嚴酷軍法，亦無力疵議具有此粗硬性格之同僚與長官。因為我知道國軍無此軍法難於生存。

以國軍之編組複雜，如公開審訊將領，究及各級職責，極易牽涉上政治問題。從上文我們已經看到李宗仁自身檢舉第一七一師師長楊俊昌（詳本書二〇七頁）猶謂其判罪不公平。當蔣於一九三八年放棄武漢之前六日，余漢謀亦不戰而棄廣州。不久之後蔣日記有：「上星期處理廣州失守重案之後，

不料又有長沙失火重案之處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詳本書二一八頁）可見得兩案均涉及政治因素，處置棘手。

抗戰期間經蔣指令鎗決之將領除韓復榘、李服膺、石友三原出自軍閥部隊亦無後台外，尚有數人實爲其親信。本文前已提及因長沙失火案獲咎之鄧悌。以後蔣又於重慶近郊目擊新兵用繩索束縛來去，於是問罪於兵役署長程澤潤，不久程亦處死（一九四五年七月六日）。一九四四年常德戰役後蔣又揚言將親自審問第五十八師師長余程萬（詳本書三五九頁）。此三人均經蔣識青，在廣州時代即被派有重要任務。即因長沙棄守而獲罪之第四軍軍長張德能，亦曾受統帥蔣賞識。張曾以第五十九師師長資格出席第一次南嶽會議，其所作報告被蔣稱讚「最爲扼要得體」（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後不僅以戰功陞軍長，並於第二次長沙戰役後獲最高榮譽之青天白日勳章（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最後亦遭鎗決。張之案情如果窮究，可能牽涉至戰區司令長官薛岳。

因著諸人之受刑，統帥部繼續將壓力加於野戰軍之上，同時亦增加蔣個人威勢。對外，則此等案件只維持官僚主義之邏輯：凡事既有差錯，總有待罪之人塞責。此種傳統作法行之於二十世紀，與保障各人身上之公平的一觀念大相逕庭。統帥蔣介石既不能沿用後者，只得遷就於前者。所以他是否「狠」不說，他所拼組的高層機構仍未能具現代性格。除了在邊緣上涉及鄧悌等人事前已提及外，蔣日記不提以上不幸之諸將領。



一九四一年初，中國對日戰事已進展三年半，與日軍僵持亦逾兩年，以上所敘諸般艱難錯綜複

雜之情景均已在位。除極少例外，此種種條件將與今後抗戰之全程共始終。

歐洲戰事爆發時最初蔣無法權衡其對中國之影響。當時日記云：「我國抗戰兩年期待國際變化，今果已至矣。國際情勢雖甚險惡，如我擇善固執謹慎運用，余深信必能使我國家從此復興也。」（一九三九年九月五日）前句帶機會主義情調。但隨即以現實之眼光煞住，下文雖仍保持作日記者一貫之樂觀，已具有懷疑與保守之成份。

果然翌年五月德軍突破馬奇諾防線，日本立即威脅越南，封閉滇越鐵路，封鎖香港，英國迅速與日成立協定，交出中國存天津之白銀，承允封鎖滇緬路三個月，俾日本覓得「光榮之和平」，日軍則發動棗宜戰役，攻佔棗陽、宜昌。自五月開始，經常以飛機一百架以上轟炸重慶。至八月十九日出動一百九十餘架，使市區廣泛的燃燒數小時。

蔣在陳英士殉國之日寫出：「英兄殉國至今二十五年矣。如其尚健在，余當不致勞苦至此也。」（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八日）至此有疲憊而希望息肩之表現。

但經過日機「疲勞轟炸」之後，他反而氣象萬千，以不服輸之態度寫出：「徒憑滿腔熱忱與血肉，而與倭寇高度之爆炸彈與炮火相周旋於今三年，若非中華民族，其誰能之。」（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在此兩者之間，他尚留下一段敘當日重慶市民：「其扶老攜幼，負重行遠之情狀，見之心酸，下代國民應知今日其父母挈其避難之苦痛，為空前史所未有，為國為家，更應特盡忠孝之道，庶不愧為中華民國之子孫也。」（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迄至年底，日本並未覓得和平，重慶主持抗戰如故，滇緬路亦在被封鎖之三個月後重開。一九

四一年爲世界近代史劇烈變化之一年，但初時並未即有此徵象。對中國及蔣介石而言，與日軍對陣情形大致如前，此時有兩種趨勢可以改變局勢形貌，一爲國共衝突已開始表面化，進展而爲新四軍事件，一爲美國在日本對西歐各國採取行動後，擴大對日禁運終導引至珍珠港事件。以下雖仍據蔣介石日記作起點，在敘述各事時則儘量注入外間資料，以期接近於今日之歷史觀。



在記述八年抗戰時，《大事長編》摘錄蔣介石日記之七百八十一則中，有六十七條提及中共。內中無一例外總出入於中國共產黨之壞性格，其記載亦與日俱增。例如一九三七年不過三條，一九三八年二條，至一九四三年驟增至十七條，一九四四年二十三條。此種趨向表示中共問題及於作日記者之壓力逐漸增高。

本文前已提及蔣介石之反共，初時無意識形態之成份在。多年之後，此態度已有相當改變。抗戰期間之日記指出共產黨皈依唯物論使「人類均將降入禽獸之域」（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二日），「以仇恨鬥爭爲主」（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毒辣凶狠」（一九四四年二月八日），其必「毀滅本國歷史與倫理」（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一日）。跡近重複。

即在承認共產黨組織上之長處時，蔣亦不能忘却其暴力政策。抗戰開始不久，蔣曾閱讀中共所刊《黨的建設》一書，他在日記裏留下他的反應：「共黨因其共產國際百年來之秘密活動，故其紀律最嚴，方法最精，組織最密爲任何黨派所不及，因之其手段最毒，情義與道德掃地無餘，設使其人能趨向民族國家之路則幾矣。」（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其實，歷史上的中國共產黨爲一個多面體，在多方面也是一個有機體，經常的成長改變。陳獨秀所領導的共產黨即和毛澤東所領導的共產黨有極大的差別，以後鄧小平所領導的中共更與毛澤東的中共不同。至於受共產國際的操縱，即在抗戰期間已無此跡象。我們也很難說中共曾在任何時期完全不顧中國民族國家的利益。

但是中共與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有一個基本不同之處：蔣所組織新國家的高層機構兼容並包，來者不拒，只要站在共同抗日的立場，不究既往，願與之妥協將就。這一方面迫於事實需要，一方面也源於國民黨的政治哲學，接近於傳統的倫理觀念。因之國民黨沒有改造中國的社會，反先被傳統社會籠罩，中共軍隊及幹部活躍於鄉村，所過之處將地方組織翻轉改造，造成清一色體制。而更使蔣介石煩惱的，則是中共又不組織本身的高層機構，而是任蔣去承當這種負擔。毛澤東所說「先斬後奏」和「斬而不奏」，即是利用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國家組織去遂行他們的個別利益，或稱「無產階級領導權」。所以中共在他們自己控制的地區構成一種與國軍平行而帶競爭性的力量，不能由重慶指揮協定。在國民黨統治的地區有同地下組織，具有顛覆破壞的作用。

國共武裝衝突由爭取敵後游擊區與收編非正規部隊肇始。日軍佔領各大城市之後，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線，在各省區產生了不少「袋囊地帶」，內中有所謂「民鎗」，一部爲傳統地方武力，也有抗戰軍興後離伍脫伍的散兵游勇之所流及，也可能雜入一部偽軍匪軍。因地屬權力真空，爲兩方所必爭，國軍希望以之增強側背之支援，共軍即如毛澤東、劉少奇所指示，建立根據地並爲國軍失敗後之打算。

在雙方競爭中常是共軍佔先，因爲他們與基層接近，又帶有大批政工人員，又作全般打算，不

像國軍認之爲「次要作業」。共方襲擊友軍時動稱對方爲「漢奸」，甚至同用共黨名義時，也可稱對方爲「托匪」。

武裝衝突成爲公開問題，始自一九三九年六月，共軍賀龍及呂正操部攻擊河北民軍，擊斃民軍旅長李俠飛以下二百餘人，以後用同樣方式收併各地團隊及保安隊，襲擊敵後縣政府及專員公署，漸及於國軍之正規部隊。發展之區域有陝西、山西、山東、蘇北。以致數處地區落入中共掌握。以後西方資料極少例外著重報導國軍之報復行爲，而不及當初共軍行動。大概國民黨宣傳機構當初掩飾飾過不敢申張，及至局面不可收拾，仍不能爭取主動，尙又誇張謂共軍全不對日作戰，亦非事實，因之喪失自身信用。

一九四〇年七月，蔣介石授權何應欽向中共代表團周恩來等提出妥協方案：中共部隊准擴充爲三個軍六個師，並下轄兩個補充團，由中央點驗發餉，但須調往黃河以北。中央確認中共所轄之陝甘寧邊區範圍，中共並得參加河北省政府，但不得對過去之反共人士報復。國軍亦不得採取敵對行動，不知如何此談判破裂。於是蔣介石令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胡宗南編築碉堡，封鎖陝北地區。同年十一月胡呈報碉堡網已遵令完成，胡並已收復宜君、淳化、正寧間地區。

所謂「新四軍事件」中共稱「皖南事變」。原來抗戰剛開始時，中央於一九三七年准共軍留置於江南之部隊一萬餘人編爲新四軍，後歸第三戰區顧祝同指揮。此次事變根據《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稱：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九千餘人奉命北移，從雲嶺駐地出發，繞道前

進。六日行至涇縣境內丕嶺一帶時突遭國民黨軍七個師八萬餘人的包圍襲擊。新四軍被迫抗擊，奮戰七晝夜終因寡不敵衆彈盡援絕，除約兩千人突圍外大部壯烈犧牲或被俘。

事後蔣介石的正式公告稱：

統帥部自去年十一月以來迭次命令要他北上，移駐指定地區抗戰，他偏按兵不動。到了最後限期已過，他還是要自由向南移動，作一種有計劃的軍事行動，明目張膽，來襲擊第四十師及上官雲相的總司令部，實行叛變，所以我們要執行軍紀將他全部解散。（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國民黨的檔案中有蔣於十二月十三日預先電顧祝同的警告，謂新四軍可能違反調防，應「妥籌防範對策」。又保存著顧祝同一月十三日的電報呈蔣介石，證明事件發生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至十二日。據俘獲新四軍參謀次長趙凌波的供稱，該軍無意北移，擬候第四十師調防時予以襲擊。以後則企圖在金壇、溧水之間建立根據地。

白修德作《雷霆後之中國》時（一九四六年）稱，真象已無從確定。但新四軍大部人員業已渡江北，被包圍的以軍司令部及附屬人員為主，只有少數戰鬥員，總數最多不過五千人。因為重慶政府指定渡江路線將引入日軍虎口之中，曾由周恩來往見蔣介石。蔣允許改變路線之後邀周聖誕晚餐，互祝和平友誼。及至延安傳來消息共軍已被包圍，周企圖再見蔣，已不得見。蔣只傳言政府已下令不妨礙新四軍行動，周無庸著慮，記完此段之後白修德更用問句寫出：「誰在說謊？」

他所記的新四軍人員也與中共黨史有很大的出入。可是他的報導，也是很多西方人士前後對此事態之發展所看到唯一之文件。白又說出中共有很多隨軍女工作人員，經過是役被國軍士兵強姦，俘虜之中有被活埋，中共黨史無此記載。白書之中另一處則又說及中共經常叫嚷狼來，有時好像「他們的拳頭竟被對方的眼睛打青」。可是這幽默的文句擺在前述強姦活埋之後一百三十五頁不相連接之處，很少的讀者會引用後段去重新評定前段。

事隔三十七年之後，白修德出版他的自傳，稱《我在蒐尋歷史》(In Search of History)，說及另一段前未公佈的故事：

新四軍案件發生後兩星期，周恩來與白對談幾個小時。當日周的激情業已下降，能對當時局勢作冷靜的分析。他說及聖誕與蔣對談時，蔣保證新四軍的安全通過。他確信蔣未下令攻擊共軍，而是在事後方才獲悉各情，但是蔣必會對部下表示，他們要打共產黨，他並不在乎。以下是白修德的原文：

「蔣在對你說謊？」我問著。

「不是，」周說。「有人對委員長說謊。但是委員長多少也扯一點謊。委員長要增強他「自己」在各派系的地位「才」說謊話。他的成功在利用各派系之衝突，來達到他「自己」的目的。全國的矛盾衝突愈大，他的權力愈大。如果這種趨勢繼續下去，他會成爲一個失敗「的人物」。」

不論周恩來對蔣的評論如何，他的敘述卻已確定蔣介石組成中國的高層機構，希望各派系參加，仍在遇到相當的困難。同時中共沒有衷心與他合作，因爲此時中國共產黨在重慶也仍是各派系之一。

在動手改造中國之基層組織時，他們卻有另起爐灶的打算。這一點也由中共黨史証實。周恩來主持的機構，對外稱「中共中央代表團」，在中共內部卻稱「長江局」，後稱「南方局」。以他對白修德的坦白，他也並未說明他自己奉到的任命是「長期埋伏，儲蓄力量，等待時機」。直到一九八七年《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付梓，才由官方將他的雙重身分揭出。

我們述及這些細節，旨不在阻礙海峽兩岸的接觸。今昔兩方的成員全部不同，數十年後所處理的問題也已整體改觀。如果過去的情節有任何直接取用作為參考的地方，則是不能開誠佈公之處無從永久蒙蔽，雖數十年後亦必暴露。這樣的瞭解應當有助於各方之共識。當日兩方最大的困難即是時間與環境之緊迫。

新四軍事件使蔣介石感到相當的困窘。只是當日之衝突尙未至最緊張的階段，至此他也仍保持著相當的實力。他的公告並未譏罪於人，而由他蔣中正以統帥的名義出面負責。理論上新四軍仍是他的部下。他們不守紀律，應予處分。日記裏却寫出：「共黨陰謀暴行，雖使國際援華心理因之動搖，余仍秉以拙制巧，以虛制實，以靜制動之道處之，自信必能見效也。」（一九四一年二月四日）這樣的態度已與他的公告聲調不同。

當時他最大的顧慮在於對外而不在對內。蔣的紀錄提及一月十六日接見蘇聯武官崔克夫（Vasily I. Chuikov），二十五日又接見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A. S. Panuyskkin）。他的日記裏有兩段說明他下決心時之心境：

制裁新四軍問題此為抗戰成敗最大之關鍵，若無最後制裁之決心，彼更可藉外力以事要脅，

而俄國之允撥武器者，其亦必以此作為容共之要求，故予以斷然處置以示我對中共制裁決心，而不因俄助我武器有所遷就也。（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

新四軍案餘波未息。共黨與蘇俄皆對國際宣傳甚烈，此應早日徹底發表其罪狀，以粉碎其陰謀。俄使今日正式質問實為變相之壓迫與恫嚇，余以嚴辭正色對之，彼乃技窮。（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其實，史達林對中共無深切的愛好，支持蔣介石繼續對日作戰倒反與他本身利害有關。他的抗議也還是維持官僚主義之邏輯。指摘抗議之後，蘇聯運華軍火並未停止。蔣介石沒有想到對付蘇聯他尚可容易脫身，日後再因中共問題他要對付美國時，卻不是一個同樣簡單的局面。



不少人士業已提及，蔣介石為軍人可是他的政治頭腦強於軍事，不易為人發覺的則是他之過問於外交尚且超過對內政之注意。此亦不足為怪，本來軍事即是政治之延長。蔣介石主持抗戰，又尚包含一個將中日間之軍事衝突升級而為國際間共同的衝突之方略。在這方面，他的成功可謂在世界近代史中無出其右，然則如此，他自己也仍要在人身上付出至大之代價。

在主持外交時雖有專家供諮詢，但大小決心無不由他親自籌劃。現存檔案內，有無數文件曾往來於蔣氏及中國駐外使節之間，若干尚出自蔣之親筆，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羅斯福準備競選第三任總統之際，蔣曾在日記中寫出：「於溽暑中，手擬致英美兩大使長電，執筆深思，雖覺

疲困，然我外交前途實決於此故不能不審慎將事也。」（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二日）因當時盛傳英法有意與日本妥協，羅斯福又將出面斡旋中日間之衝突，此皆與中國長期抗戰之宗旨相違。蔣雖在國防最高會議研討情勢，最後致郭泰祺（駐美大使）及顧維鈞（駐美大使）電仍親自擬稿稱郭、顧爲「兄」，自署爲「弟」。電內有「且其「日本之」海軍實力在中日戰爭（抗戰）中毫無損失，故日本以後尤在歐戰中，將取北守南進政策爲無疑義」之文句，在權威語氣之中，甚具煽動力量。

雖主持瞬息萬變之外交，蔣不能擯棄對各國、尤其對各民族之刻板印象。論及日本則「倭人氣量短窄，事尙徹底，非生即死，決無對弱者中途妥協與讓步之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是以他在戰時經常不放棄與對方接觸之機會，但對作城下之盟又始終不具信心，蘇聯則「損人利己」爲其「一貫慣計」（節自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日記）。西方一般人觀念蔣介石崇拜德國，但蔣日記內有「德人只知武力不懂政治亦殊可憐也」之觀察（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一日）。從我已閱及之日記看來，蔣始終未忘記英國爲西方帝國主義之台柱。他在一九四二年訪問印度，日後看來並未因此使他在印人心目中增進好感，倒引起他與邱吉爾即時之嫌隙。日記內有一節稱：「英國邱吉爾首相致余之緘，表示其對印度政策之決心，而且帶有威脅性之辭意，並以印度問題，比之我國共黨問題，擬於不倫，只有置之一笑而已。」（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四日）

蔣介石對美國抱有長久之好感與期望。當羅斯福當選第三任總統時，蔣記出：「此雖爲美國內政，然有關於世界安危與人心振靡者極大，美國之民主令人羨慕不置，特電羅斯福總統祝其成功。此乃出於余之至誠，非可以普通應酬之電文視之也。」（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六日。見於《秘錄》而不見於《大事長編》）以後他又解釋他對美國曲意將就。「……美國之傳統政策，固爲扶植與解放弱小民族，萬不

可以其一時之態度變更我之基本政策也。」（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二日。以上百餘字由我略去。）

法國在馬奇諾防線被突破後，國際地位一落千丈，蔣介石提醒自己：「法大使乃國破家亡失意之人，宜特別禮遇之。」（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六日）義大利乘人之危參戰，則在蔣介石心目中產生極不良印象。他的日記述及：「此時英法處境固更艱難，但歐戰勝敗誰屬，則未可逆料，獨以義國敗因爲最多。故義之參戰，未必於德國有利也。」（一九四〇年六月七日。原文作「意大利」。）

他的外交姿態有其缺點，蔣亦自承其過失：「外交不可太直太切，尤其不宜太實太輕。應以沉重靜敬爲主。余對外交之失敗，乃在太過與不及，而輕易直率毫無隱曲之態度尤非對外之所宜。蓋余以爲至誠，而人反以爲輕矣，以後事事應以中正沉靜處之，其庶幾乎？」（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此段似與前述之「道義——權宜——道義」之宗旨相衝突。但如以以前兩段言著眼構思，此刻所叙爲態度辭令亦無不可。值得注意之處乃是蔣介石擬以一人總攬全局。他不能任職業性之外交家作主，乃因「實以軍事與外交，在在堪虞，稍一失著，則崩潰乃可立至。」（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

蔣之檔案中尙有一節秘聞，刻下與本文關係不深，但可供專家參考。古屋奎二在《秘錄》中提及南京失陷後史達林曾對中國駐蘇大使楊杰說及，希望他轉告蔣委員長，如要消除人民對中國政府不忠行爲，蔣應鎗殺四百五十萬人。所謂四百五十萬，似爲當日估計之全人口中之百分之一。但此說未見於《大事長編》。見於後者，則有史達林對蔣經國之談話，謂他自己對蔣介石研究至詳，前已提及（詳本書二一六頁）。

蔣對日軍奇襲珍珠港，事前無截獲任何消息之痕跡。但在德軍奇襲蘇聯之前則似有所預聞。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二日蔣曾電羅斯福之行政助理居里（Lauchlin Currie），其轉告羅：「六月中如美德

關係不加惡化則德國決於一個半月內對俄發動戰事。」爾後德軍果於六月二十二日凌晨侵入蘇境。蔣接得居里二十五日來電稱：「蘇聯之被侵使敵總統深感閣下情報之精確。倘閣下能將日本可能之動向或其他重要急切之發展等項惠予見示，當尤為敵總統所歡迎也。」

不止此也，六月十八日德國與土耳其簽訂友好條約。蔣聞訊在日記中寫出：「德之攻俄，必不出數日矣。」實際距戰事之發動只四天。但重慶方面始終未有向莫斯科提出警告之跡象。惟在二十四日，即德已侵蘇四十八小時後，蔣接見美國駐華大使高斯（Clarence Gauss），謂美國如欲避免戰爭應迅速發表援蘇聲明，以防蘇日諒解，因此諒解可鼓勵日本南侵。似此蔣之外交手段並非如其自評之欠靈活。

如果盟國之中對珍珠港戰事之展開有何徵兆，則係由美國通告中國，非由重慶警告華盛頓。蔣日記稱：「美國陸海兩長皆告我謂至十二月十日遠東備戰即可完成，屆時對日當作強硬表示。而其陸長史汀生則更有滇緬路為中國唯一生命線，豈可不加維持之語。由是足見美確有協助我保衛滇省之決心，甚至於十二月中旬或有參戰可能，亦未可料。尤其菲島防務已秘密完成十分之九，是為遠東制日最大根據地。以此推測，美似有先制日而後對德之決策也。」（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九日）此段仍表示蔣未能掌握美國政府及官僚機構作和戰決心之程序，但其預度美國參戰日期則至為接近，此段寫出距珍珠港事變才二十八日。

又不止此也。十二月七日午後十二時三十分（華盛頓時間）羅斯福接見中國大使胡適。蔣紀錄稱羅曾告胡：「昨致日皇電乃為和平最後之努力，惟不見樂觀恐四十八小時內日本海陸軍即將開釁。此為人類之一大悲劇，但為中國計，亦可謂大轉機也。」

西方紀錄稱胡適在一時十分鐘告辭，距日機投彈於珍珠港只九分鐘。



珍珠港誠爲抗戰期間中國之一大轉機，但並未輕易獲得。即在最後兩星期，蔣介石仍在焦慮與懸望之中，在他看來美日似可中途妥協，蔣曾謂此兩星期之經驗爲「絕處逢生」，非深入其境無從體領此中滋味。

美日關係進入危機，始自德軍西線突破之後。一九四〇年九月，日本與德、義成立三國軍事同盟，內稱結盟國受除現在歐洲之外及中日戰爭之外任何國家攻擊時，其他兩國應以軍事、政治、經濟方法援助，雖其辭意含混，實以美國爲主要對向。日本又於法國戰敗後進據越南。一九四〇年九月佔據北部，一九四一年七月復在西貢登陸佔領南部。美國報復時於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凍結日本在美資金，八月一日禁止石油輸日。至於日美間之友好商務通航條約，則已於一九三九年宣佈廢止半年後生效，所屬範圍及於機器廢鐵，但仍不足致日方死命。及石油之禁運，則直接影響日陸海空軍作戰能力。美國禁運，英荷亦禁運（荷屬東印度爲主要出產地），當日已無其他供應者。日本估計存儲只夠兩年之用，因此愈遷延，日後處境愈危殆。另一方面既侵佔越南，邏輯上次一步之動作爲繼續向東南亞伸展，包括菲律賓、荷印、新加坡各處。事實上囊括此區域不如想像上之困難，因須消除者爲西方各國準備未充分之據點，不致惹起似中國之全面抗戰。當時德軍攻蘇尙所向披靡，更增加日本軍人之自信，所以一九四一年之御前會議即已通過向英美開戰之決策，不過軍事衝突之前

仍展開外交談判。

野村吉三郎爲退役海軍大將，前任外相，於當年二月奉命向華盛頓呈遞國書，成爲此非常時期駐美大使，此人有親英美之名，其獲得西方諒解之宏願非不真切，然和戰之樞紐在東京，尤被陸軍之激進派操縱，非駐外使節所能左右。上述德軍攻蘇，西貢登陸，石油禁運均在野村爲大使任內產生。而且此期間近衛文麿已取得第三次組閣大命（一九四一年七月）又匆匆辭職（十月）。近衛尙有意與羅斯福高峯會商，繼任者東條英機則爲「日米開戰論」之倡導者。但蔣介石重洋注視，仍不得不存戒心，尤以羅斯福公開稱野村爲其「好友」，深恐其人身外交，可能改換局面也。

日人外交密碼之譯法早經美國技術人員識破，有了茲項綽號「魔術」(Magic)之技術情報，華盛頓已能閱及野村與東京間之無線電文牘。既已窺見其外表辭句與實在企圖互不相符，美京對談判更乏信心。羅斯福原有意與近衛文麿高峯會談，則爲僚屬勸阻，蓋因近衛無實力，不足以左右和戰決心，與之促膝商談徒增誤會，以後無從解釋。似此諸細節又非中國所能洞悉。

野村任大使之十個月間，尙曾與國務卿赫爾 (Cordell Hull) 經常接觸，其談判經過無數縱橫曲折，亦在美國內部留下積箱滿篋之幕後資料。牽涉之所及，有總統與國務卿間之差距，各人個性，海陸軍及財長專家意見，各次長顧問之建議，甚至海外傳教士之進言。最初之腹案，搬出世界各國彼此公平合作之理想，甚至由美向日貸款（一九三〇年間之經濟恐慌波及日本爲促成日本軍國主義膨脹之一大主因）購買其商船，保證其需要之物資，只要日本全面自華撤兵，恢復一九三七年以前之姿態（不提及東北與台灣），取消三國同盟。以後繼續交換意見，方始涉及近身事項及比較合實際之方案。在交涉過程中，羅斯福與邱吉爾保持密切聯繫，在八月中尙與之在紐芬蘭面商，發表「大西洋憲章」。赫

爾亦與英國大使接近，及至最後階段諮詢方及於中國、荷蘭、澳洲之大使。羅斯福深恐行動過激，不能爲國民諒解，陸海軍首長則希望談判多遷延一日，軍事方面多贏得一日之準備，及至情勢無望時彼等亦不願作開釁之罪人，而只得坐待對方先下手，此所以內容至爲複雜。

至今處理此間過程之威權，仍爲前國務院顧問費易士 (Herbert Feis) 所作《走上珍珠港的道路》(The Road to Pearl Harbor) (一九五〇)。只因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之審判紀錄及「魔術」之檔案逐漸爲各學者採用，又有以上提及各關係人之回憶錄問世，是以在同一大標題之下，已出現大批書刊。但各人之爭辯集中於當事人之功過，珍珠港事件是否可以避免，其損害可否減低，與我們之著眼無重大關係。

從基本文件看來，當日美國最大顧慮爲東南亞之安全。因不僅菲律賓仍爲美屬，而且美國亦不能容忍日本囊括東南亞之資源，使其本身備戰困難。次之，則美國參與歐洲戰事之需要日益迫切，不願兩面作戰，深望日本退出三國同盟。甚至因爲蘇聯已吸收德軍大部，不願見日本威脅其側背。美國對中國之考慮不能超過以上諸要求。是以蔣介石於十月二十八日及十一月五日間迭次呼籲美國，囑其警告日本不得由第三國攻入雲南，否則美國出面干涉，遲至十一月十四日始接得國務院之答覆，其要求未被接受。然則吾人亦不能對羅斯福指責謂其對中國漠不關心。蔣之電文已交海陸軍首腦研究，均謂空頭警告無實力支撐，於事無補，可能發生與期望相反之功用。此時唯一援助中國之方案爲增強陳納德之飛虎隊。

並且將中國列爲爭端之一者實爲日本而非美國。羅斯福原望宣告越南與暹羅 (今日之泰國) 爲中立國，由英美中日共同擔保。日方則稱原則接受，但自越南撤兵須俟中日衝突結束。羅斯福尙未要

求日本自中國撤兵，日本已提出對策：撤兵在簽訂和約兩年內履行。但仍須留置一部於華北蒙疆及海南島，以二十五年為期，似此廝殺已逾四年，尚無從強迫蔣介石接受之條件轉而承望羅斯福一手交出，況且華盛頓尚要保證日本獲得荷印之物資，美國尚要恢復資金凍結前之商務狀態，供給日本石油。至於美德交戰，日本如何解釋三國公約則由日本作主，此種種要求無異武裝威脅，日本未對美國作任何讓步。除非美國屈服，則只有日本之自由行動。



蔣介石所謂「憂憤交集」以後又「絕處逢生」，發生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間（重慶時間，與華盛頓有十一小時之差距）。此時幕後尚有一段奇特之外交史：

羅斯福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左右（原件無日期，國務院檔案註稱「十一月二十日稍後」）交下與赫爾國務卿便箋一紙，頗似手令，文句尚不完整。中文直譯如次：

六個月

1. 美國恢復商業關係——目下若干限量之油與米，以後增加。
 2. 日本不向越南及滿洲邊境及南方任何處（荷英暹）增兵運兵。
 3. 日本承諾即美國參與歐洲戰事亦不採用三國同盟條款。
 4. 美國促成日人與中國會談，但不與聞其談判。
- 以後成立太平洋協議。

根據總統指示又針對日本使節之提議，國務院更與財部磋商草擬備忘錄一件，在發送之前，赫爾召集英澳荷使節及中國大使胡適傳示此草稿，各使節可以抄錄要點詢問本國意見，下文係根據羅斯福致邱吉爾之副本譯出。想與中國大使胡適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國務卿辦公室內所見相同。

本政府即此通知日本政府認爲日方之提議與兩國政府決心解決問題之原則有不調和之處。茲再提議另一妥協方案足以容納彼此決心和乎之宗旨，又彼此保證不向亞洲東北部，大平洋北部，東南亞，及南太平洋區域內增兵，並由日本自越南南部撤退，不「用其他部隊」替代，限定在越南北部之部隊如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之數額，其總數不得超逾二萬五千人，又不派遣其他部隊入越南。本政府當改變凍結「商業」之條款准許每月最高額六十萬元之船舶煤庫需要，食物及有條件醫藥品暨棉花自美輸日，石油則按民間需要按月計算，美國候與英荷政府磋商後決定其輸出量，美國原則上允許進口，但生絲量至少爲輸入三分之二，輸入價款可以抵付輸出並償還在美「借貸」之本息。本政府當向英荷澳政府接洽採取相似之經濟行動。本條款有效期間三個月，一方提出認爲對太平洋全面和平有助益值得延伸時，雙方得會商延伸此方案。

此條款未提及美國促成中日談判及日本承允不使用三國同盟之條款，但因提議本身係和平解決問題之初步，不排除以後更接近之步驟，所以算是將上開總統便箋上之手令具體化之表現。

當赫爾傳閱此稿時，美方紀錄稱胡適當場問及，備忘錄是否制止日本進攻雲南，赫爾答稱無此效用。

二十二日爲星期六，至星期一亦即二十四日所謂 A B C D 四國（澳、英、中、荷）大使再度集會

於國務卿前時，只有荷蘭大使表示贊同，其他使節尚未接得本國訓令。此時重慶已在極度震撼之中，蔣介石稱，其憂憤及於他的「家人及僚屬」。



直到戰後歷史家方能拼合各方情形，使讀者瞭解當中之縱橫曲折。

東條英機於十月組閣後，奉天皇意旨對和戰問題再度檢討，曾於十月下旬召開大本營及內閣之連席會議，集會重要閣僚、企劃院、陸軍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意見，仍認爲「打開僵局」與「自存自衛」應與英美荷蘭作戰，並於十一月二日構成「帝國國策遂行綱領」，預定開戰在十二月初，因之尚有一個月左右時間，與美國交涉。如在十二月一日午前零時以前達成協議，則停止軍事行動。所以以後外相東鄉茂德致野村吉三郎之指示，經「魔術」截獲，限定協議如成功，簽約務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前，及至最後又延伸至十一月二十九日，逾期則各事將「自動的」展開。

日方交涉方案稱爲甲乙二案。大概甲案有如和約具長遠性質。提及商務時，只稱「通商無差別全世界實用」，即已自動的包括解禁。駐越南日軍待中日和議之後撤離，及日軍在華北蒙疆及海南島駐屯二十五年，均由甲案提出，美國應強迫中國接受。中國如拒絕，美國即停止援蔣。此案於十一月七日夜間由野村提出。

但即籌議此方案時，日人亦猜測被接受之機會至微，是以又立乙案，乙案則注重刻下利害，有如停戰協定。內稱除已在越南之日軍外，雙方停止在東南亞一切軍事行動，在越南南部之日軍轉移至越南北部，雙方協同取用荷印物資，美國對日商務解禁，供給日本需要之石油，並且不阻礙日本

與中國間趨向和平之行動。此方案由野村偕同其助手來栖三郎於十一月二十日遞交赫爾。

此甲乙二案均以中國爲問題的中心。「魔術」曾截獲東鄉致野村電訊多節，囑其注意中國。十一月二十四日電稱：「杜絕援蔣爲我方主要要求之一。」

當提出甲案時，日方使節尙只有野村。十一月十七日後則有來栖之登場，此人以特使名義襄助大使。雖然野村英語欠佳，曾電東京派遣如是職業性之外交家，但來栖三郎過去以駐德大使身分曾主持三國聯盟，自羅斯福以下美方人員對之感覺懷疑，歷史家亦在猜測此人必預知開戰前日軍行動狀態，只無從斷定其知悉之程度。以後看來來栖三郎確善用外交手段，成爲「臨時妥協辦法」(modus vivendi)之提案人，幾曾以此影響大局。

英國方面之消息來源稱：來栖曾提問，要是希望日本在越南撤兵，美國是否也可能作一點善意之表現，譬如稍爲放鬆禁運，輸出極少量之石油與稻米，即算遠低於日本之需要？如可能時日本當保證不將之配給陸海軍，只用以緩和一般日人對美敵視態度。此提議比停戰協定又更實際，爲初步之初步，不費力而討好，是以來栖提案受得歡迎。以後在調查珍珠港事變時，赫爾作証稱當時政策在竭力避戰，不願在日人面前說「不」字。赫爾本人與羅斯福既對甲乙兩案均不能接受，正感困窘，深覺得臨時妥協辦法有其妙處。赫爾又在其證人席上稱：「在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和二十五日我們在拚命在想辦法阻止日本海陸軍，就是幾天也好，幾星期也好，只要有公算的話。」

擺在上述背景裏，才有總統之一張簡紙，以及經過國務卿傳示A B C D四國使節對日備忘錄之草稿，美方如是遷就旨在爭取時間。從「魔術」截獲消息，已知對方之軍事行動正如箭在弦上。海

上情報傳來，又謂日運輸艦三十艘至五十艘之間正循中國海岸南行，十一月二十五日其先頭已過台灣海峽，當時西方軍事專家深以為將遠程轟炸機B-17及B-24配置於菲律賓，又將英艦「卻敵號」(Repulse)及「威爾士親王號」(Prince of Wales)調新加坡必可阻嚇日本。

蔣介石不能詳悉這一切，即能他亦不能全部置信。當他繼續接得胡適及宋子文自美京來電，獲悉美國已將承認日本在越南駐兵，並提議將西貢附近之日軍亦調至雲南邊境，又將對商務開禁，並及於戰略物資，其憂憤交集乃意中事。總之自己的命運操縱在他人手中。中國人拚命四年餘，其所犧牲之成果，甚可能經友邦在一紙文書上簽字而斷送。



美方稱其技術情報為魔術，但是國務院整十一月份之工作亦為魔術。

上述日方提出甲乙二案，羅斯福之手令，國務院已起草傳閱尚未發出之備忘錄，及臨時妥協辦法這一觀念，由來栖三郎發起，顯然已經美方考慮既已震撼中外，則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三午後五時，野村吉三郎及來栖三郎於赫爾之辦公室謁見國務卿時，後者交授一紙文書，稱「基本整體提議」(Comprehensive Basic Proposal)上註有「暫時性質，絕對機密，不牽涉任何義務」，使此使節二人受驚之程度又遠甚之。邱吉爾日後在其回憶錄裏述及兩人「不知所措在最極度的苦惱中退出」。他們既提出甲乙二案，預料對方必將討價還價，即縱不接受，亦將以外交辭令拖延。但「基本整體提議」與上述四種提議與辦法毫無相似之處，內分十款，其中兩款如下：

日本政府須自中國及越南撤退所有陸海空軍及警察部隊。

美國政府及日本政府不在政治經濟軍事上支持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以外之中國政府及政權，國民政府刻下暫駐重慶。

費易士敘述此文件時，稱只有醉心於「死硬細節」之學究才須推敲其全文。意即其立場顯然，不僅強硬且不妥協。他又說及「基本整體提議」等於使九國公約復活。

次日，即十一月二十七日，華盛頓向夏威夷及菲律賓發出戰事即將來臨之警報。何以此警報未能生效，何以長程轟炸機均在地面被炸燬，而卻敵號及威爾士親王號均無空衛而被日機炸沉，不在本文論叙範圍之內，但檢討此段歷史時我們即可大率看出：當日若未獲悉對日交涉之詳情，甚難揣測最後關頭之嚴重情形，即在宣戰後而未實際交鋒時，亦不能確信敵方已經整備之程度。因此我們必須追叙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五日間，美國作一百八十度轉向的由來。

接悉美國將向日本提出臨時妥協辦法之備忘錄，蔣介石由蔣宋美齡協助曾偏向美國政府各首長呼籲。胡適即於十一月二十五日面謁赫爾，宋子文亦與華盛頓之陸海財部接洽，在重慶則有經羅斯福薦介之美顧問拉體摩爾 (Owen Lattimore) 出名，電總統行政助理居里，囑將委員長對此提案之強烈反應告羅斯福，蔣並將此反應電邱吉爾。《大事長編》摘錄此電要旨有「如果在中國侵略之日軍撤退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之前，而美國對日經濟封鎖政策有一點放鬆或改變，則中國抗戰必見崩潰。以後美國即使對華有任何之援助皆屬虛枉，中國亦決不能再望友邦之協助，從此國際信義與人類道德，亦不可復聞矣。」文中雖未明言對美絕交對日妥協，有此要挾之功效。

西方文件只稱蔣極度困擾，認為如美國對日解禁，中國士氣人心即將崩潰。但羅斯福總統及赫爾國務卿均謂蔣之反應「愚蠢的過激與不公平」。所謂不公平即錯中猜測美國心腸，控訴其出賣中國。胡適於二十五日謁見赫爾時曾備受教訓。

可是英國對臨時妥協辦法亦是表面贊同，實際反對。外相艾登之回電，首稱英國政府對赫爾處理此事有完全信心。如果國務卿覺得如是，英國自當全力支持他。只是應付對方日本，「要價應高，還價要低」(Our demands should be pitched high and our prices low)。日本應自越南全部退出並且停止繼續向中國進犯，而且對石油輸日一節表示懷疑。

這還不算。邱吉爾給羅斯福十一月二十六日的覆電有以下之一段：「當然的處理此事，全部在你，我們當然不需要再增加一樁戰事。只有一點使我感到不安。其如蔣介石何？他不是已饑不果腹了嗎？(Is he not having a very thin diet?) 我們的憂慮在於中國。假使他們垮台，你我之間的危機將大為增高。」

戰後邱吉爾在他的回憶錄裏說起他自己處理此事不得不存敏感。他恐怕美國人說「英國人將我們拖入戰爭」之中。所以他「把這問題放在它應當存放的地方，換言之，「美國」大總統手中」。這樣看來，他好像替蔣介石與中國撐腰，卻處處不離開給自己的打算，亦仍不離古今中外之外交的二法門。

對赫爾講，還有日本運輸艦通過台灣海峽的消息，還有政府內之首長如財長摩根索 (Henry Morgenthau, Jr.) 的反對妥協，還有向公眾意見交代之顧慮，況且又已說及臨時妥協辦法原不過緩兵之計。所以至此，這辛苦寫成之文件也曾向大西洋及太平洋兩途傳送，却始終未向野村、來栖提出。

如是美國外交，也擬採用「道義——權宜——道義」之路線，只因爲權宜未成，則只有道義到底，對赫爾報告「基本整體」時，羅斯福立予同意，注意邱吉爾上述給羅斯福的電報也發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即赫爾向野村來栖面遞「基本整體提議」之日，只是英美之間也有一段時差，邱吉爾慣於午夜至凌晨工作，國務卿接見日本使節則在日無暇晷的時刻。

檢閱過以上國際外交之變化，我們回頭看蔣日記，才能體會當中文句的意義，也表現其特殊觀點。日記內有：

美國對日經濟封鎖有放鬆之意，余乃要求美國立即宣佈對日不妥協之態度，此種智慧與真機，非至危急時不易表露，更覺憂患乃人生之良藥也。絕處逢生之妙機當在此時矣。豈僅憂患不足畏懼而已哉。（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此日期可能錯誤，亦可因以後補記所致。蔣日記間有事後補記情事。）

美國對日所提議之內容，蓋完全依照余之所要求者而提出，較之昨日以前之妥協態度則根本改變矣。昨夜當余家人與僚屬正憂憤交集之時，余曾謂外交形勢變化靡常，今日之不好消息，焉知不可變爲明日之好消息？今果應驗，此乃窮理盡性之效也。（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大事長編》在同日載出當日羅斯福接見野村吉三郎。美國資料羅斯福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華盛頓時間）最後見野村及來栖，聲稱：「既爲友邦，即無最後之諍言。」蔣日記又再有：

此次美國對日態度之轉趨強硬，當在余態度之堅決與決心之堅強，而又不稍遷延時間，乃得於千鈞一髮之時，旋轉於瞬刻也。（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倭派專使來栖三郎赴美交涉。彼仍抄襲甲午之戰遷就於列強，唯獨脅迫中國之故智以售其狡計。果爾美國務院幾乎爲其所算，且其勢已成百分之九十八，只差其妥協條件尚未提交來栖而已，幸賴上帝眷佑得運用全神，卒能在最後五分鐘當千鈞一髮之際轉敗爲勝，內助之力實非渺也。（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見於《秘錄》，不見於《大事長編》，應摘自日記內之「本月感想」。）

至此只一星期而有珍珠港事變，蔣聞訊未作任何矜誇及先見之明的表示。只記出：「抗戰政略之成就，本日達於極點。物極必反，能不戒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

第四篇

「四強之一」及其負擔

中國之「大轉機」——印度蘭伽——
中國駐印軍之由來——史迪威：「約瑟夫叔父」——
「槓桿作用」——中國戰區與遠征軍——
「戈登心理狀態」——第一次緬甸戰役——
「出乎意外之和善」——人本主義——
器材或人事？——蔣之「三項要求」——居里——
蘇德戰爭、新疆與中共——衢州慘敗，河南饑荒——
《中國之命運》——「整風運動」——
鄂西戰役——三叉會議——「摩洛哥的蘇丹」——
索摩維爾——美和愛娜——宋子文——
「宮闈政治」之由來——開羅會議——
邱吉爾與羅斯福——十億借款與成都機場——
常德戰役——余程萬——迪克西代表團——
東西兩戰場——一號作戰——第二次緬甸戰役——
英發爾及密支那——Y部隊在滇西——湘桂戰役——
「拒絕，接受與緩和」——衡陽及方先覺——
不要「一死報國」——最後之攤牌——「斧頭落下來了」——
「不開明，冷心腸，獨裁之政體」——魏德邁及「黑金鋼鑽」——
「抗倭戰事之理想恐成夢幻矣」——勝利廣播——

蔣介石所謂物極必反，經過後來歷史的證明。抗戰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達到了最高之成就，也影響到他個人之聲望。在此之前他受到中外的崇拜。即是處理新四軍事件，他也毋須對外負責，今後雖然有了英美參戰，抗戰必勝等於有了擔保，又於一九四二年取消不平等條約，使列強放棄治外法權，一九四三年出席開羅會議，對收回東三省、台灣與澎湖得到公認，可是這些成就不過步過去四年半單獨抗戰之後塵，自此他免不了因人成事，因此一舉一動難於逃避外間的批評與指責，他自己也從被人欽仰的對象，逐漸變為被人輕視的對象。

就此，我們不妨檢討大歷史與一般歷史著作不同的地方：

我們雖說放寬歷史的視界，並不完全放棄細節，不過有些歷史家注重細節，只爲了它們本身之興趣。我們注重細節卻是從小處著眼大處著想。譬如說十二月七日，當南雲忠一中將所指揮的機羣快要到達珍珠港之際，羅斯福偏在邀胡適一字一句誦讀他給日本天皇之最後呼籲。羅斯福夫人打斷談話進來告訴他家人已羣集，星期天的午餐已經整頓就備，胡適起身準備告辭，羅還是要他坐下聽他對自己文書的解釋。自此我們也可以想見他要在中國人的面前強調自己爲和平與正義奮鬥的著眼，間接也在澄清外間對他原來採取妥協方案的誤解，即此表彰自己的道義。赫爾國務卿卻對這事一直沒有原諒蔣介石和邱吉爾。他批評蔣：「發出無數歇斯底里的電信送達內閣及政府首長，不經過國務院，有時甚至不顧總統，不明瞭實情，而干預於一段機微而嚴重的事勢。」其實兩人所見相同，只是一陰一陽。

前後看去，十二月七日蔣所謂「政略之成就」得益於長期苦鬥，非僅一時之智慧與真機。

遠溯回去，我們可以看出抗戰之前四年，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在南昌軍事整理會議蔣介石曾

說，「若是能抵抗二年五年我預料國際上總有新的發展，敵人自己國內也一定有新的變化」，南京失守後不久他又在日記裏寫出：「只要我能抗戰到底，則國際情勢終必演變而日本終歸失敗也」（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兩段前已提及，見本書一九七頁），至此都已實現。

他承認中國軍備不如人，抗戰在保持中國人的精神與人格，初聽迂闊，至此回味卻有長遠意義。爲甚麼甲午之戰時沒有外強的干涉？他們認爲中國要保持對朝鮮的宗主權，本來就有懷疑。爲甚麼凡爾塞會議會將山東的權利轉讓日本？因爲中國人沒有表現一個獨立自主國家之姿態。一九四一年年底則已是今昔不同。這樣看來不僅初期空戰的勝利與台兒莊的勝利更換了國際的視聽，即淞滬南京慘敗的犧牲與重慶挨疲勞轟炸的犧牲，也沒有白犧牲。根據克勞塞維茲《戰爭論》，戰爭是政治的延長。只要戰略能支持國策，雖敗猶勝；反之如日本之失去外交之主動，只能鋌而阻險，卻是雖勝猶敗。有了過去四年半的抗戰，雖友邦擬作局部上外交上的妥協與退卻，只要有了出賣中國的嫌疑，已難避免內外輿論之指責。即算蔣介石要挾，他也能以單獨拖上百萬日軍的實力要挾。我們不要忘記在鄧克爾克撤退之後，邱吉爾曾提醒羅斯福，萬一英國不能得到美援，他和德國談判的本錢，只有海軍艦隊。

及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蔣介石的三種賭博都已結彩。他曾預計中國能耐久，日本不能遮蓋數目字上的劣勢，不到決戰之前會有第三國的干涉。在這三方面講他都是贏家。

他的弱點亦即是中國的弱點，乃在不能即此收拾籌碼退場。他雖然沒有把美國直接拖入戰爭，人家也不能如是指摘，可是心裏卻不難如是著想。我們只要再讀邱吉爾及赫爾的回憶錄，次及於羅斯福與胡適談話之紀錄，就知道美國未負中國，今後中國如不爭氣，即是貽害盟邦，非僅面子問題。

自此我們再向遠景看去，日後史迪威之強硬態度，馬歇爾及杜魯門之對中國放手的政策，都不能說是與此時美國未負中國的立足點無關。換言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蔣介石已將以前存儲國際間之好意全部支出，尙且大爲透支，才替中國賺取了一個他所謂絕處逢生之妙機。

除了「能不戒懼」的警惕外，蔣在日本奇襲成功之後又在日記裏提起：「日美開戰之初，日本不宣而戰，偷襲檀島，使美國遭受重大之損失，觀其行動之速是其早有充分準備，即使美對日提出臨時妥協辦法，犧牲我中國，日本亦不能接受。故由於我國之反對，美乃提強硬原則，要不失爲大國之風，而保全其立國之榮譽。然美英荷在太平洋上早已成立共同作戰計劃而始終不通知中國，徒利用我消耗日本之實力，今日之閃擊英美，我國對之亦更無所歉然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難道真的他毫不感到歉然？那他又何必在日記裏和自己辯白？要是羅斯福始終未曾覺得對日本供給石油，在越北留置二萬五千日軍不限制其行動實爲犧牲中國，又何必在改換政策時對中國大使稱此爲中國之「大轉機」？

國際間不時有此等事，非我負人即人負我。

要友邦主持公道是一件事，要他們參戰、令子弟暴屍異域又是另一事。

凡盟國作戰彼此齟齬情形乃意中事。在中美關係上講，美國加入戰爭時已有了前述糾紛，再因爲中國之生活程度與社會習慣和西方的長遠距離，更加以軍備與組織未能趕上時代，其不能和衷共濟已是不言而喻了。



蔣與史迪威的衝突可謂開始於剛接觸，亦即在一九四二年的第一次緬甸戰役。

在這一年內中國經歷到第三次長沙戰役（一九四一年年底及一九四二年一月）與浙贛之役（四月），蔣介石訪問印度，希望在甘地尼赫魯等與印度政府間斡旋（二月），並得英美同意廢除不平等條約（十月）。

雖說日軍在第三次長沙戰役的目的在牽制國軍，以便其攻佔香港，但在戰鬥角度上講仍屬國軍勝利。此役日軍未能攻入長沙，在撤退時被截擊只得化整為零。為追擊部隊困擾，充分表現已失去主動。蔣在日記裏提及：「此次長沙勝利，實為七七以來最確實而得意之作。」（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三日，見於《秘錄》，而不見於《大事長編》）惟戰報稱「殲敵五萬六千餘眾」，則顯有逾恆的誇大。

浙東戰役由於杜立德空襲東京之後日軍著眼毀壞華東機場。因已牽涉到蔣與史迪威之爭執，容在下段追叙之。

蔣介石對印度之關注，日後未能獲得尼赫魯任何善意之回饋，只贏得刻下邱吉爾之高度反感。甚至美行政助理居里對之明言：「羅斯福總統因不欲刺激英國，故不擬採任何措施，俾免影響聯合國合作。」亦不能使蔣氏改變態度。他尙且在日記內箴勉自己：「決定以印度獨立與亞洲各民族一律平等為對英美外交方針之基礎。」（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

可是他也批評自己：「對印度駐華專員薩福萊臨別贈言，為英印關係計表示英國不智之意太切，似又陷於誠實太過之病矣。但余並無他意，且屬滿腔熱忱，英國之願與不願則不計也。」（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自是讀者亦可對蔣為人多一重瞭解。

廢除不平等條約對蔣介石為一生大事。雖然當時日本對汪精衛放棄治外法權，英美不得不仿效，

並且英國仍保留九龍之主權，但此已爲當日蔣氏交涉成果之最大限度。他除對宋子文表示來日必取得香港與九龍（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外，此時只在日記寫出：「此乃總理革命奮鬥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將由我手中達成，中心快慰無言以喻。」（一九四二年十月九日）

翌日爲國慶日，他往重慶較場口宣佈。恰巧當時我和弟妹蹣跚街頭，忽見蔣乘敞篷車至，車行極緩。雖有憲兵指揮羣衆清道，但無特別戒備，車行所至，兩側羣衆自動鼓掌，至今已逾半個世紀矣。



史迪威事件亦距今約半個世紀，第一次緬甸戰役即係一九四二年事。我自己於重慶街頭蹣跚後不久，即於一九四三年二月調爲新一軍上尉參謀，於役於印度比哈爾(Bihar)之蘭伽(Rangarh)，對當日之中美關係有了一段親身切眼觀察之機會。因爲所見爲原始資料之所無，在敘述之層次上不妨先爲提出：

第一次緬甸戰役時（詳本書三〇〇頁）蔣委員長派史迪威爲遠征軍總指揮，又派羅卓英爲司令長官，並且直接指揮各軍師，史認爲「被騙」，並且認爲指揮權分散，爲戰敗之一大主因，所以在蘭伽成立中國駐印軍時，在組織上有徹底之改正。

新一軍下屬三個步兵師，除新二十二師（廖耀湘）及新三十八師（孫立人）共有九千人從緬甸退出外，一九四二年十月開始，又從國內空運補充兵，一九四三年更將重慶附近之第二十五補充兵訓練處改編爲新三十師（胡素），於是完成新一軍一軍三師之戰鬥序列，除新一軍外，駐印軍尚有礮兵三

團，工兵二團，汽車一團，裝甲兵六營，並且蘭伽訓練處又抽調駐雲南各軍師幹部前往接受美械訓練。大概蘭伽中國軍人數最高時，營房內外共達四萬餘人。所有軍械車輛全由美方供應，成爲日後租借法案內美國援華之帳目中之大部分。官兵之被服裝具給養汽油等則由英國（印度）政府籌辦交美方。中國官方責任，純在管理及維持軍紀（administration and discipline）。

新一軍軍長鄭洞國原任第八軍軍長，黃埔第一期畢業，曾參加長城抗日，保定、徐州、崑崙關諸戰役，爲人含默不愛爭執，在國軍中素有忠厚之稱。蔣置遣之任職史迪威麾下，並使新一軍另起爐竈，各師脫離以前建制，即有息事寧人自茲更始之意。

一九四三年三月，鄭及史迪威尙在重慶，新一軍司令部在蘭伽組織伊始，有如先遣支隊，受參謀長舒適存指揮，即因事與美方齟齬。

史迪威在蘭伽之辦公室稱指揮部（Chih Hui Pu），因史係中國駐印軍總指揮，但史又爲美軍之中緬印戰區（CBI）之總司令，在德里設有司令部，在蘭伽之指揮部亦爲此美軍司令部之前進指揮所。兩種職務下之參謀長均爲柏德諾准將（Brigadier-General Haydon Boatner），柏亦如史迪威及馬歇爾，曾服務於駐天津之美陸軍步兵十五團，通曉華語，其爲中國駐印軍總指揮之參謀長已經中國政府委派。在史迪威不在蘭伽時則爲美方對華之負責人，但其階級職位又比新一軍軍長及各師師長爲低。

我等剛履足蘭伽不久，即獲悉柏德諾責備新一軍司令部組織過於龐大，因中美間成立協定在比哈爾練軍時載明華方只負責管理及維持軍紀。經過柏德諾之解釋，則新一軍司令部無指導戰爭、派遣部隊、蒐集情報之任務。凡重慶派往指揮部之華員，柏均使之有官無職，以後此等人員除自動參

加翻譯工作獲得美方顧及外，只得蒐集整備各項統計資料向國內報告。指揮部職掌盡落入美國軍官手中，柏亦以史迪威總指揮名義，偏任美國戰區司令部人員爲中國駐印軍指揮部人員，亦不問此等校尉官能否通華語，是否到過中國。惟兼職而不兼薪。所有命令通告及備忘錄亦皆以英文爲正本，美軍又在各部隊偏派聯絡官。換言之，茲項組織及實用程序已使駐印軍與殖民地軍隊無異。事實上我曾遇見印度軍士詢及中國軍是否美軍之附屬部隊，因自彼看來，我等受美國軍官層層節制，即如印度軍受英人節制，而所有參謀業務亦由英人掌握實大同小異也。

當我等抵達駐地後約一週，柏德諾撥給新一軍司令部橄欖色軍用轎車一輛，謂供新軍長使用。並由新二十二師派來駕駛兵一人。翌日，此司機在司令部前撐開引擎上車蓋檢視油料，引起軍部官兵多人之好奇心，因各人均不知汽化器爲何物，亦未悉水箱由風扇轉動可以使引擎冷卻也，司機則賣弄不久前學得之技能。柏參謀長每晨在營房內散步，見及羣人麇集，司機則拆卸轎車零件，但未提出質問。

次日舒參謀長乘坐此轎車拜訪柏參謀長，會見亦無非禮貌上之周旋。當舒起身告辭時，發現乘車已不在停車處。此時柏德諾正告舒適存此車已由指揮部收回，不久當有備忘錄說明原委。舒無奈只得步行返軍部。

翌日，總指揮部之公文到，內稱總指揮爲對新軍長表示善意起見，將蘭伽訓練中心唯一僅存之轎車撥歸其使用，但新一軍人員對此珍貴器材不知愛惜，任意處理，現指揮部決心將之收回，仍交汽車調派室保管。此備忘錄由柏德諾簽名，我親眼見過。事後舒因恐新軍長尙未到任之前已生嫌隙，只得開具當初司機檢視機油水料情形，辯說並非拆玩，此轎車亦由指揮部再度撥給軍部。但經過此

段羞辱後，舒適存向軍部人員訓話，叮囑必要時立志效法田橫之五百壯士。

新一軍軍部人員未致迫作五百壯士，在鄭任內亦始終未取得指揮權（一九四四年攻克密支那後孫立人升軍長方有權指揮所屬三個師，但仍受指揮部嚴格管制）。當一九四三年十二月駐印軍發動第二次緬甸戰役時，事前曾得重慶最高當局許可，但軍部迄未接得任何方面通知。指揮部之作戰命令，最初稱曰的在掩護新平洋機場之建築，直接下達於執行命令之營長，經過部隊向上呈報，軍部方略知行動狀況。以後戰局逐漸展開，作戰命令仍用英文寫出，方始由各團營長而及於孫廖兩師長，軍部仍只能由各師部之報告見及。軍部派往之前線觀察員，亦因無從取得指揮部之通行令，只能用各種名義混入戰鬥部隊之內。

鄭軍長提出抗議無數次，又在回重慶述職時，一再向蔣委員長辭職請另派遣，甚至向蔣耍賴，如蔣不任彼解職，彼亦不回印度（我在事後由鄭夫人處得知）。但終由蔣說服返任。史迪威最擅權時，曾將指揮部副參謀長溫鳴劍改任高級參謀，又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克復密支那後，撤新三十師師長胡素及所轄第八十八團團長楊毅及第八十九團團長王公略職，均限於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印緬戰場。



在敘述史迪威事件時，史之個性，不可忽視。當史迪威將軍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以第十軍軍長資格參加米蘇里軍艦上日本投降儀式時，曾將當時所見緘告其夫人，後經涂克門女士摘錄其大意為：

英國人是一隻紅色的肥餃子，澳洲人是一條香腸，加拿大人是一個調戲女人靠女子倒貼的

男人，法國人頗為雅致，可是他的兩個隨員像巴黎來的一對流氓。荷蘭人又肥又禿，新西蘭人看來像個外行。在日本人眼裏看來這是如何一堆在漫畫裏湊集的角色，全人類沒有找到合適的代表。

固然這是他的私人緘件，而且寫此段時他已經歷到被蔣介石斥退的羞辱，他自己也深知一生抱負無從兌現，可能在這時候已患肝病，接近他生命最後一年。可是他的尖酸刻薄，稱蔣委員長為「花生米」，曾被馬歇爾指摘，又稱羅斯福為「橡皮脚」，可謂始終前後一致。（羅斯福患脊髓灰質炎，終身癱瘓。為尊重他的權威起見，所有人在他有生之日不提。）



我們習寫歷史，警惕著自己不要被感情支配，但是這種趨向極難避免，即我自己的文字在內。有時縱不加評論，在材料取舍之間已使讀者思潮起伏。我還記著約半個世紀之前，指揮部所油印的每日新聞摘要有一天頭號標題為“Uncle Joe Got His Fourth Star”（約瑟夫叔升四星上將）。因為史迪威在第一次緬甸戰役在瑞波附近決心撤退時原可乘飛機脫出而決心與司令部人員步行，於是被美國軍士譽為英雄，加以親暱稱呼，其他將領無此情景。其升官則因羅斯福、馬歇爾要求任命其指揮所有中國陸軍，而不出三個月後此油印報紙又在頭條新聞標出：“Our Joe Relieved on Chiang's Demand”（我們的約瑟夫被蔣要求去官）。前後只六個字，已對公眾心理有充分之煽動力量。

至今，在美國敘述史迪威與蔣介石衝突之暢銷書，仍為涂克門之《史迪威及美國在華經驗》。此

書初發行於一九七一年，刻下仍可在各大小書店隨時購得。涂克門曾在史夫人處翻閱史迪威所留文件，也曾廣泛的引用西方資料。雖說書中也對美國外交政策屢有指摘，例如「離不開白種人之優越感」，羅斯福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至蔣介石之電文則「很可懷疑的會送至歐洲任何國家的負責人「之跟前」。作者也指出，美國與中國的政策根本互不相牟，「美國之目的不是中國之目的」，但是她所引用原始資料，仍包含著很多對蔣介石及中國之譴責與謾罵。作者行文極為流暢，因為每章每頁都有激情之資料在後支持，所以能如長江大川，一發而不可遏止。何應欽與陳誠如是之不同，作者曾未考究何以蔣對彼此同時信任。她也相信中國人堅持美援成批總數的撥給，勢必有貪污舞弊不可告人之處，卻曾未考慮是否受援者亦望保持其自尊心，不願一椿一件一噸一元盡受拘束。即將物資囤集，是否亦有不得已的打算。所以，在這些方面，涂克門未能完全脫離當日激情之影響。

站在相反的方面，梁敬錚在台北出版之《史迪威事件》與《美國在華經驗》同年發行，其激情論調則又遠過之。史迪威「跋扈陰謀」，他背諾凌人不算，還有意阻礙空運。作者卻未顧及史迪威所提理由：如果美方承受中國之要求，每月空運物資五千噸，則必先由印度及雲南各建大型飛機場五處，每處能接受運輸機五十架，尚不論及其他條件。至於史迪威企圖獲得對華軍之指揮權則幕後有美軍部主持，亦僅非個人之陰謀。

這也就是說：如果被當時人的情緒牽制，我們極易將一個範圍龐大的技術問題，視作多數規模狹小的道德問題。或否或臧，我們對當時人之褒貶是否公正不說，總之，就使我們因著大時代所產生之歷史觀失去了應有之縱深。流弊所及，使我們對自己今日所站在的立足點惶惑。



史迪威事件涉及軸心國及同盟軍之戰略，也牽涉到東方與西方文教上之差異，更牽涉到中國從一個中世紀國家，蛻變而為一個現代國家的過程中之各種未定因素。只因為以後約半個世紀所賦予之縱深，使我們猛省到問題之龐大。

前已提及，蔣介石在珍珠港事變後，曾在日記內叙及其觀感：「抗戰政略之成就，本日達於極點，物極必反，能不戒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他所謂政略之成就達於極點，無乃開戰前後之所謀劃旨在將中日間之軍事衝突擴大而為國際間之衝突。經過四年半單獨抗戰之後，這種目的業已達到。因為他再無次一步辦法取勝，今後只能因人成事。中國對日戰爭之勝利可算因蔣之籌謀奮鬥而獲得保證，他自己在歷史上的主動地位，卻自此降為被動地位。

一九六四年距上述情態切近四分之一世紀，毛澤東在北京接見日本社會黨議員多人訪問。佐佐木更三代表諸人為日本侵華道歉。毛謂無庸道歉，若非日軍犯境，中共未能奪取政權。此語曾給海外華人讀者相當反感。然則毛提出歷史上長時間大範圍之因果關係，只是事後看來如此，並非事前設計如此，或事態過程中指示應當如此。他的見解與蔣介石所叙「今日認為惡因者或適為他日善果」（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日記）出於同一邏輯。本來塞翁失馬，其成敗得失利害，於長期間領悟者與短期間感受者不同。在大歷史之疇範中，各人行事之目的與著眼，很可能與所行事的長遠意義迥異。中國在二十世紀的長期革命，使全世界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在衣、食、住、行、思想、信仰、人與人之關係各方面經過整體的變動，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之一種群眾運動之後又有一種群眾運動，第二步尚且不足，由第三步完成。

從今日的立場看來，史迪威事件使蔣介石所領導的羣衆運動將本身及最後力量用至最大程度，

至此猶感不足，才暴露了毛澤東所主持的土地改革之必要，和日後陳誠在臺灣所主持的改革之必要。正如日後毛澤東所領導的羣衆運動又將一切功能施展到最大限度，猶且不能得到蘇聯之援助，才徹底彰現著鄧小平所主持的經濟改革之必要。從這種觀點上，我們可以看出史迪威事件在中國歷史裏產生槓桿作用。

有了這樣的理解，我們檢討茲段史料，縱仍免不了觸及情緒因素及私人瑣碎事，即可以利用如此成份「疏導」歷史之解釋，而不致以之「壅塞」歷史。



史迪威與蔣介石的衝突，至一九四四年而至決裂點，但是事前醞釀兩年餘。我們可以說史將軍於一九四二年三月到任爲中國戰區之參謀長，已萌肇日後之爭端。甚至可以說，自珍珠港事變，中國與西方國家並肩作戰即已產生了彼此之間的嫌隙。

我們試想：中國因爲基層未能脫離傳統體制，所謂國家實爲無數農村併成的大集團，並無實質上的組織結構，因之軍隊也具有地區及部落氣息，極難在上端協定。蔣介石爲最高統帥，無時無處不得不注意各將領人身關係之影響，與之相較，中國與美國不僅重洋阻隔，而且兩方社會有了互世紀及超世紀的距離，要是雙方的軍事組織即能協同動作成爲一個高效能之有機體，也就是逾越情理了。

一個窮人穿著敝衫與著狐裘的同等對立而不生自卑感已經很難。可是刻下說及兩方更要合夥經商，在公司的董事會上爭發言權，則遲早撒手已不出預料，只是作戰又與經商不同，亦不容易拆夥。

羅斯福既爲現實的政治家，也爲理想主義者，他賦予中國以「四強」之一的名號，高度的表彰了他的作戰目的在實現一個新世紀的世界觀。可是他的主張首先即不能得到邱吉爾的贊助，自此也牽引出來他日後與職業性的官僚組織如以馬歇爾爲代表的陸軍部之相持不下的局面。上層感情主義之慷慨是一回事，下端在實用的場合內能否協同的執行是另一回事。蔣介石不能毫無預感，他在二十六國發表共同宣言時寫入日記：「我國簽字於共同宣言，羅斯福總統特別對「宋」子文表示：歡迎中國列爲四強之一。此言聞之，但有惶懼而已！」（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見於《秘錄》而不見於《大事長編》）

將其善意更作具體之表現，美國提供對華貸款，並推舉蔣介石爲同盟國中國戰區之最高統帥。一九四二年之貸款美金五億元，供中國穩定貨幣，繼白宮之提倡，國會迅速通過，未附帶任何條件，日後中國支用此款不向美國交代，極爲美國輿論攻擊。蔣爲統帥則曾由他自記：「二十六國共同宣言發表後，中、英、美、俄四國已成爲反侵略之中心，於是我國遂列爲四強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之後，越南、泰國亦劃入本區內。國家之聲譽及地位，實爲有史以來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虛名之害，能不戒懼乎哉。」（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秘錄》作「中英美蘇」。又蔣自稱「我」而不稱「余」，亦與習慣不合，想見此段經過修訂。）

一般盟國的「戰區」(theater)受英美聯合參謀團(Combined Chiefs of Staff)指導，中國戰區則不在此例。美方解釋此因委員長已爲國家元首，不能聽命於人。可是也因爲如此，中國無權參加聯合參謀團，不能對英美之全球戰略置喙，亦無從對租借法案內物資之分配有效的表示意見。

及至蔣邀請羅斯福派遣其「親信之高級軍官」一人爲中國戰區之參謀長，史迪威卸命前來，他

已自稱其首一任務爲「指揮在中國緬甸印度之美國軍隊」。緬甸與印度既不屬於中國戰區，史即有與蔣分庭抗禮之態勢。再因他又爲租借法案之監督人，更可以用此職權鞏固其地位。不數月後（一九四二年七月）雙方因運輸機之分配發生爭執，史即對蔣提出備忘錄：他爲租界法案之監督人，應使器材作最效之使用，甚至將業已分配尚未交付之物資移作他用，只對美國負責。至於他爲蔣之幕僚，則純在戰區參謀長任內，其職權爲計劃作戰編組訓練，籌集器材非其責任。

史迪威被任命爲中國遠征（入緬）軍總指揮（一九四二年三月十日），已在其來華之前內定。因宋子文（外交部長）與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交換緘件（一月二十九日及三十日）已承認中國戰區參謀長除指揮駐華美軍外，尙指揮「撥其指揮之中國軍隊」，又有「整備、維持、管理中緬公路」之責任，而史迪威之權力又及於印度緬甸，則「一個大於九十八又不超過兩位數字之整數」非九十九莫辦也。

但在美倡言美籍將領可指揮中國軍隊者爲宋子文。蔣雖承認「此一軍官在緬甸戰區中，爲中英三方面均有關係之地域內，與以聯繫三方面之行政實權」，看來他只準備以榮銜加在美國將領頭上，以之對付英方，籌辦供應。而實際上他自己保持對出國各軍師之掌握。他曾一再鼓吹凡在緬之中英軍概歸史迪威指揮。如此計劃實現，則中國遠征軍各軍師自爲一兵團，即不在史切身掌握之下。他任史爲指揮官後又任羅卓英爲司令長官（四月二日）。而杜聿明（第五軍軍長）見緬甸總督時更率直說出：給美軍軍官銜，只有紙面價值。

但蔣如果以爲史迪威可以如此對付，則爲莫大之失誤，因史迪威來華前，美國陸軍部對蔣之打算，較蔣自己對史迪威之打算更高一籌。直到戰後美國陸軍官方戰史關於中緬印部分以作者爲名之

《羅曼魯士·孫德蘭》（Charles Romanus & Riley Sunderland）一卷出版（一九五三年），將若干不見

經傳之細節提出，才使讀者徹底瞭解蔣史衝突之內幕後之背景。

當一九四二年初，蔣介石邀請羅斯福遴派美國軍官爲中國戰區參謀長時，美國陸軍部已對中國獲得極爲黯淡之情報，均以爲中國不能持久，可能單獨對日議和。蔣之電文又謂此美員不必熟知中國情形，而且以不通曉華情者更佳。在他看來此爲避免軍閥時代所謂中國通之成見，但在美國構成不良印象，因爲如是指派之美員，只供中國驅使，凡蔣一面之辭則爲真理，實際反成爲中國對美發言人。至此馬歇爾亦主張以美國軍官掌握華軍。他在派及史迪威前，曾與擬派來華之段瀾(Hugh Drum)提及，應率堪任中國軍長級之美員數人同往(段瀾後因意見不合未果成行)。馬歇爾不僅無對華派兵計劃，而且無大量物資供應。中國作戰可使用「內部之資源」(既稱資源[resources]則應包括人力資源)。但凡此幕後瞭解，均不見於正式之通知及任命狀。惟史迪威見租借法案主持人霍浦金斯(Harry Hopkins)時，霍預言蔣將華軍歸其指揮(一九四二年二月九日)。史迪威謁見史汀生時，又自稱本身任務能否成功，端在其能否率領中國軍隊。史汀生認爲滿意，寫入其日記(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四日)。史迪威更在其日記自述其任務爲「合作協定使「中緬」公路行運圓滑。使各派系合作，抓取指揮權。一般情形下派他們以差遣，錢不成問題」(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

此與蔣請派美籍參謀長之目的有極遠之距離。蔣之希望，有此參謀長他之指揮權可伸至盟軍頭上去。美方之瞭解，有此參謀長蔣之整個指揮權將爲之國際化。宋子文在兩方修飾辭句，日後被指摘。

我們且看此期間蔣介石自敘近況。日記有云：「菲律賓與馬來亞半島皆於本月中全部陷落。其他如婆羅洲以及西南太平洋各島嶼倭軍所向可謂戰無不利，攻無不克。而彼獨於長沙一役，遭我軍

痛殲，爲彼此五年以來所受最大慘敗。於是英美各國方知敵寇之強與我國之勇，遂公認我五年抗戰之艱難，非若其預算之易也，至我民族道德與精神之偉大始爲世人所深切認識矣！」（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此種自負態度，亦非無力支應須將指揮權交出之姿態。



美方賦予史迪威各種任務，亦代表國務院陸軍部之態度。史迪威爲武官時，即與馮玉祥、李宗仁接近，對蔣缺乏好感。至於對蔣介石之不信任，已及於駐華大使高斯以下之外交人員和新聞記者，更及於一部分傳教士。「中國老百姓好，政府裏的人不好」已爲一般見解（今日仍未消除）。可是我們既已說及中國社會改組尙未到達某種程度，不能立即責成各人照未來之標準行事，則此種考慮亦應及於當日之外人，他們至難因爲中國有了立志成爲一個現代獨立自主國家之趨向，則立即處置之如是一個國家，有時縱在情緒上及禮貌上如是，亦在技術上執行困難。

難道中國在一九四〇年間即已爲四強之一？美國之擊敗日本，須動員其大部艦隊。轟炸其城市時出動成百上千之飛機不算，尙須製造原子彈。中國不能出產飛機一架，連空投炸彈尙須外方供給。以後蔣介石向美行政助理居里提出中國應參加聯合參謀會議時，居里即言英美以其剩餘生產供給其他各國，其商船行駛於世界各地。聯合參謀會議，即以此情形作協定之基礎，中國只接受而不供給。至於中國認爲獨自對日作戰四年半，已對各盟國作有具體貢獻，則甚少有人認真相信。駐美武官朱世明認爲中國「有權」取得美援武器，即受馬歇爾駁辯。

羅斯福所說是對的，史迪威並無自利的企圖。這也是說他無意構成一種永久的美國權力基礎，而在這種機緣中樹立本人地位（麥克阿瑟有此趨向）。可是他符合我們所說的，有了「戈登心理狀態」（Gordon Complex）。

查理·佐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英國陸軍少校，在剿平太平天國時繼美國人華德（Frederick Townsend Ward）之後，率領上海商團組織之僱傭軍之稱「常勝軍」者四千餘人，配之以「洋鎗」，用輪船輸送，以西人任軍官，在太湖沿岸具有戰功，時人稱之為「中國戈登」，其人其事本來也有若干值得爭辯之處，可是戈登羅曼主義之聲譽，馳播遠近。一九四〇年間在扶華抗日之風氣下，不少的美國將領具有戈登心理狀態。涂克門在敘史迪威自緬甸退出後，即稱之為「美國的中國戈登」。日後魏德曼接替史迪威，魏之隨從副官亦以戈登對魏期許。

戈登之成功，在將西方科技及組織能力用在適當之處，因之所用資源少，功效大，名為替中國效勞，實際仍對本國有益，在一九四〇年間，戈登在歷史上的榜樣令美國不勝欣羨，各種刊物公然指出，在中國給日人一分打擊，即減少美軍在其他戰區一分損害。我們不能想像史迪威放棄已是他囊中之物的非洲登陸之總司令職位，屈就中國戰區參謀長，沒有這樣的企圖與打算。他在緬甸作戰時，即已預定在印度訓練華軍十萬的計劃。即在臘戍失守之日，他仍在日記裏寫出：「上帝，只要我們能把這十萬中國人搞到印度，我們就有了一手啦！」（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當他在更的宛河坐竹筏即將退入印度之前，就已在講述再度克復緬甸的計劃——需要美國供給飛機與物資，需要英國人重新改組，需要中國人合作。和他同行的新聞記者白爾登聽得不耐煩，就說：「目下先要退出「緬甸」再講。」

史迪威和一般美國人講到當日國軍的各種弱點，大都切近事實。史說編成三百個師，人員武器不能有效分配，不能集中發生力量。涂克門說中國的一個軍官不是已經制度化了的軍隊之一員，在指揮系統裏服從負責，而是在人身上忠於他們的上司，所以一般師長和很多團長只有蔣介石能下令指揮。白修德說及國軍無領導、無運動能力、無實力，均非無稽之談。

但是他們都沒有看出，即我們自己在當日也沒有看出：這種種弱點大都由於一個農村社會企圖維持一個軍令統一之數百萬大軍之故。農村社會內，人與人之關係為單元，不如工商業社會內，人與人之關係為多元。由經濟生活即影響到社會生活，此刻各級軍官亦由社會生活決定他們在軍隊生活之行止。軍隊亦如一個大公司，要是當中各單位不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移轉接替，其做生意的範圍與效率必受限制。

可是史迪威提出改革，日後馬歇爾在戰後又向蔣委員長提出改革，都未見到問題之深度。改造軍隊即必先改造社會。改造社會之一部，則引起改造社會之全部，由日後內戰期間執行其範圍之大即當事人亦未料及，此是後話。

有了今日之眼光，我們可以看出，史迪威不能成爲二十世紀之戈登，因爲中國不能因接受洋鎗用華兵受洋官率領解決問題，亦等於蔣介石不能成爲二十世紀之曾國藩。保甲制度爲農村社會之產物，蔣用之動員抗戰，將舊社會之實力用至最大限度，只促進新社會之興起。



太平洋戰事展開之後，蔣介石雖然疊次以豈不惶懼的辭句約束自己，一面仍喜氣洋溢。他在—

九四二年二月訪問印度，希望調解國民大會領袖與英政府間的爭執，三月又訪問緬甸。行前他在日記裏寫出：「此時訪印，可爲戰後我對英外交奠立根基也。」（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邱吉爾却給他一道電文：「我們內閣認爲尊意此時往瓦德哈訪問甘地，可能防礙我們動員全印對日作戰之願望。」（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二日）日後他給外相艾登一電又提及：「稱中國爲世界四大強國之一乃是一個絕對的笑話。」（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史迪威在這種背景之前，奉派新職。並且在他受命之日迄至他到達新任所之前，遠東戰局有了全面目的變化。當他在二月杪遣派爲中國戰區（盟軍）參謀長及中緬印（美軍）總司令時，新加坡及爪哇尚在盟軍手中，緬甸及整個南太平洋區域屬於ABDA（美、英、荷、澳）戰區，聯軍總司令爲魏菲爾（A.P. Wavell），總司令部設在爪哇，盟軍戰略爲防制日軍南進，以爲掌握著荷印即可以阻止日軍侵犯澳洲及印度洋。雖曾感到仰光可能被波及，曾未預及整個緬甸可能在數星期內易手，一九四一年聖誕節前，魏菲爾訪重慶時，蔣介石提議中國軍入緬增強防務，尙爲魏拒絕。而英人尙有在仰光截留美國援華物資情事。

當三月三日史迪威在來華途中不意於臘戍見蔣時，仰光已危在旦夕。美英荷澳之南太平洋戰區業已解散。英將亞力山大（Harold Alexander）在最後關頭派爲英緬軍總司令，然已無能爲力，他於三月五日到任，仰光即於次日失守。在此一個多月期間英人雖改變初衷，催促國軍入緬，但首先因供應汽油及給養問題，次因指揮系統問題一再遲延。因蔣介石始終不欲中國軍隊供英人指揮，第六軍於二月底方輸送完畢，第五軍之先頭部隊的第二百師於三月一日方始入緬。以後第六十六軍開入時已達到撤退的階段。

以後蔣介石常被指摘主意不定。其實經過英方反覆，他對英人之不信用超過外間觀感。他在史迪威未到任之前寫出：「觀英軍之處置與精神皆無作戰之誠意也。」（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仰光失守後，他甚至打算整個的不依賴於英美，如日軍進攻蘇聯，他亦進攻中共。日記有云：「爪哇、萬隆、泗水、仰光各要點，皆被敵寇於本月十日，即其陸軍節以前如計佔領，新幾內亞亦已被登陸，澳洲命運，不過時間問題，太平洋戰局已定，倭寇南進計劃至此可謂完全告成矣。此後若徒望英美之援助以取勝，甚少可能，惟先求自立自保，而後待機取勝。使時間延長，敵必自敗也。爲今之計：(一)倭寇如不北進，則我惟充實兵力，整頓軍隊，鞏固現有之根基。(二)倭如北進，則解決惡化與腐化等封建勢力，統一內政，推進邊務，以備決戰。(三)最後目的，收回失地，恢復舊有領土與民族固有地位。」（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四日）

此段與他一貫之政策不同。是其情緒最低潮之反映？是其擬與日人不戰不和之打算有如當時外界之傳說？惟其所謂「封建勢力」，則指中共，由《中國之命運》證實。「惡化腐化」則應指盛世才等在新疆之親蘇政權。



第一次緬甸戰役摘要如示意圖（頁三〇二），但當中多數有決定性影響之因素，均在戰鬥之外。簡概說來對盟軍而言，這次戰役在天時、地利、人和三方面都極端的不利。事後看來即無指揮系統、人事個性的衝突與文教上的差異也極難獲勝。戰況不利只將以上弱點充分暴露。

第一則情況不明。日軍參與戰役者共四個師團。日軍每師團再加配屬之特種兵，可達一萬六千

人至一萬八千人。國軍曾用九個師，但各師兵制裝備戰力不同，即最整飭之第二百師亦不過八千五百人。其他各師均在六千人左右。而且中國部隊零星投入，所以敵軍在每次重要之戰鬥如三月下旬第五十五師團之主力攻擊守同古之第二百師時，及四月下旬以第五十六師團全部配屬戰車礮兵突破第六軍防線時，均在火力及局部數量上佔優勢。第六軍則在景東一帶對泰國防守。全軍有六十餘哩之正面，無預備隊。因當時情報，日軍及泰國軍隊共五萬人包括第十八師團在內，集結於泰國北部。以後看來全屬虛傳，而第十八師團則已出現於緬甸戰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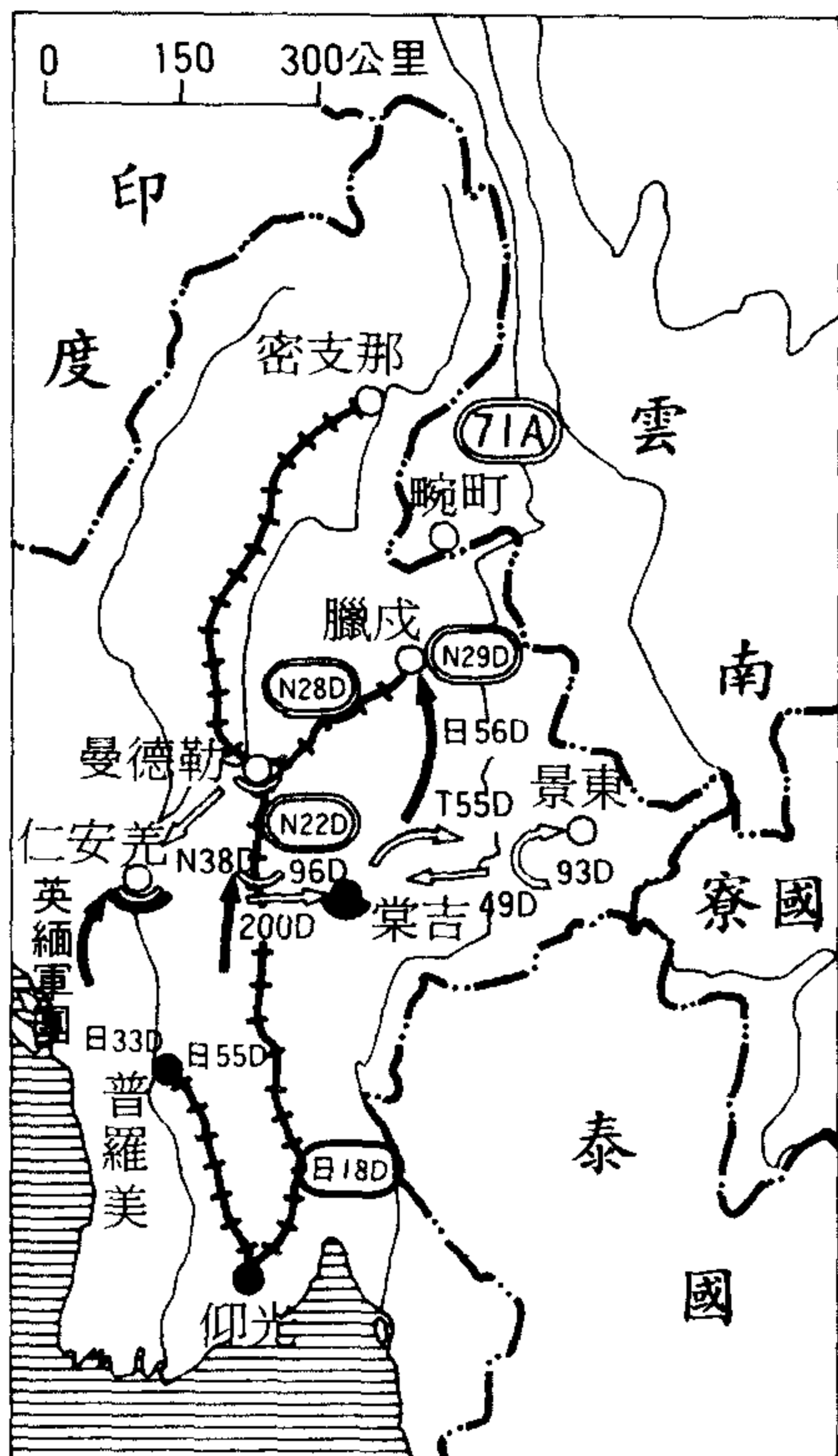
三月杪四月初，英海軍與優勢之日艦隊交鋒不利後，即退守孟買及非洲海岸，所以仰光在三月六日失守後不久，盟軍在緬甸南部作戰已失去戰略上之意義。

並且盟軍又失去制空權。日機每日可以出現四百架次。三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二日日機二百架襲盟軍在馬格威(Magwe)空軍基地，盟軍損失慘重。茲後英空軍殘部退入印度。美國志願隊（五月一日後收編為美陸軍航空隊）亦飛至中國境內整備。史迪威自己在三月二十三日日記裏寫出：「從此無空軍支援。」

緬甸人口約二千萬，內有一百萬印度人。印人爲英國招募，擔任統治者與本地人之間之技術工作，如警員、書算手以及於鐵道及機車駕駛，平日爲緬人深恨。太平洋戰事展開後多逃避他去。以後留下紀錄即有鐵道運兵須用鎗兵脅迫才得成行情事。蔣介石於四月七日在美苗接見亞力山大時，彼即稱印緬員工在空襲警報下逃避一空，務請中國派員接收其鐵道電訊。緬甸鐵道當局已提出反對。五月初，羅卓英擬往密支那收拾殘局時，即因臨時勒派之火車一列與另一列車互撞，而使整個鐵道支線陷於癱瘓。

第一次緬甸戰役示意圖 (1942年3月至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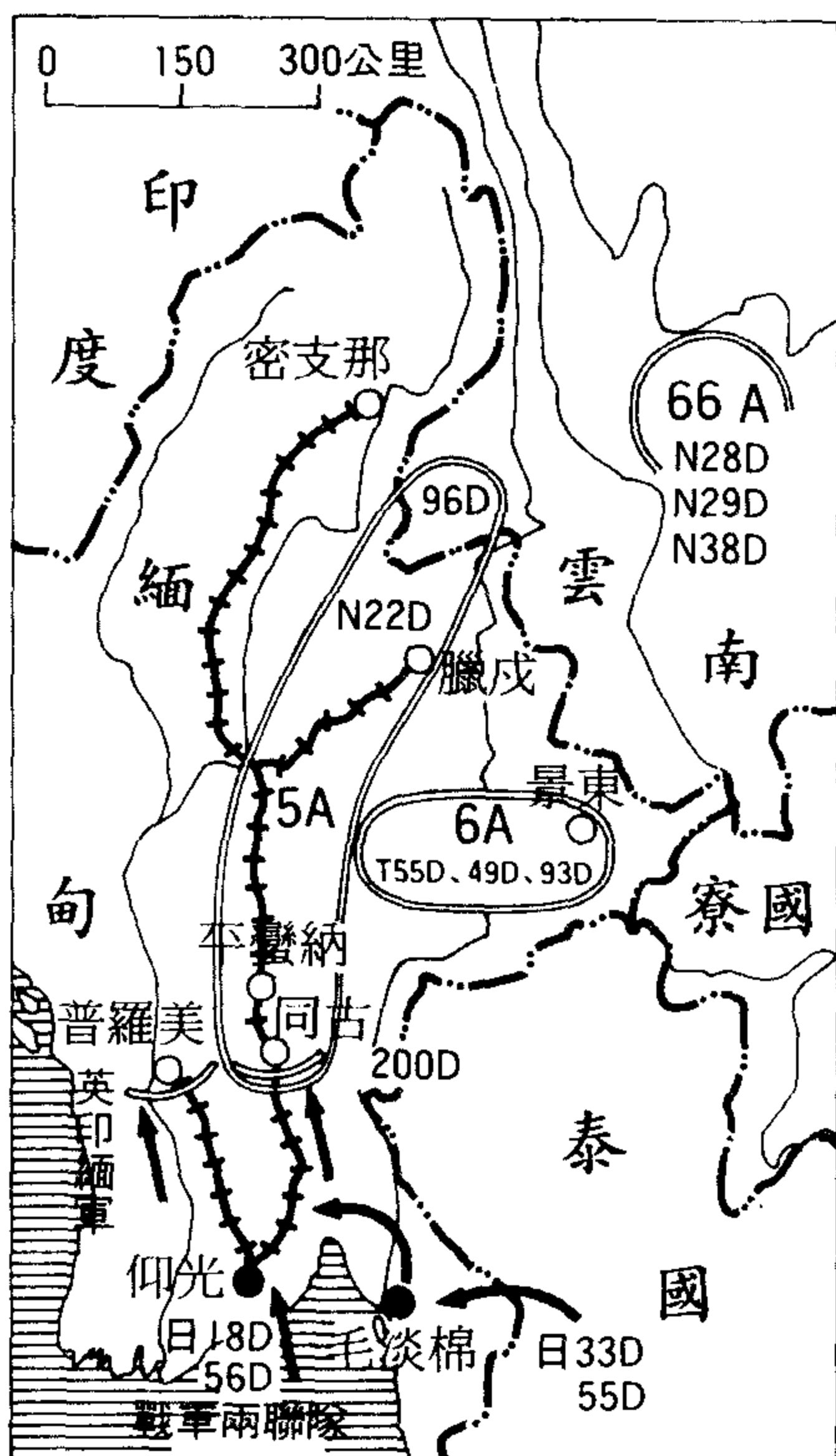
(根據 Romanus &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但圖解由本書作者加入)



② 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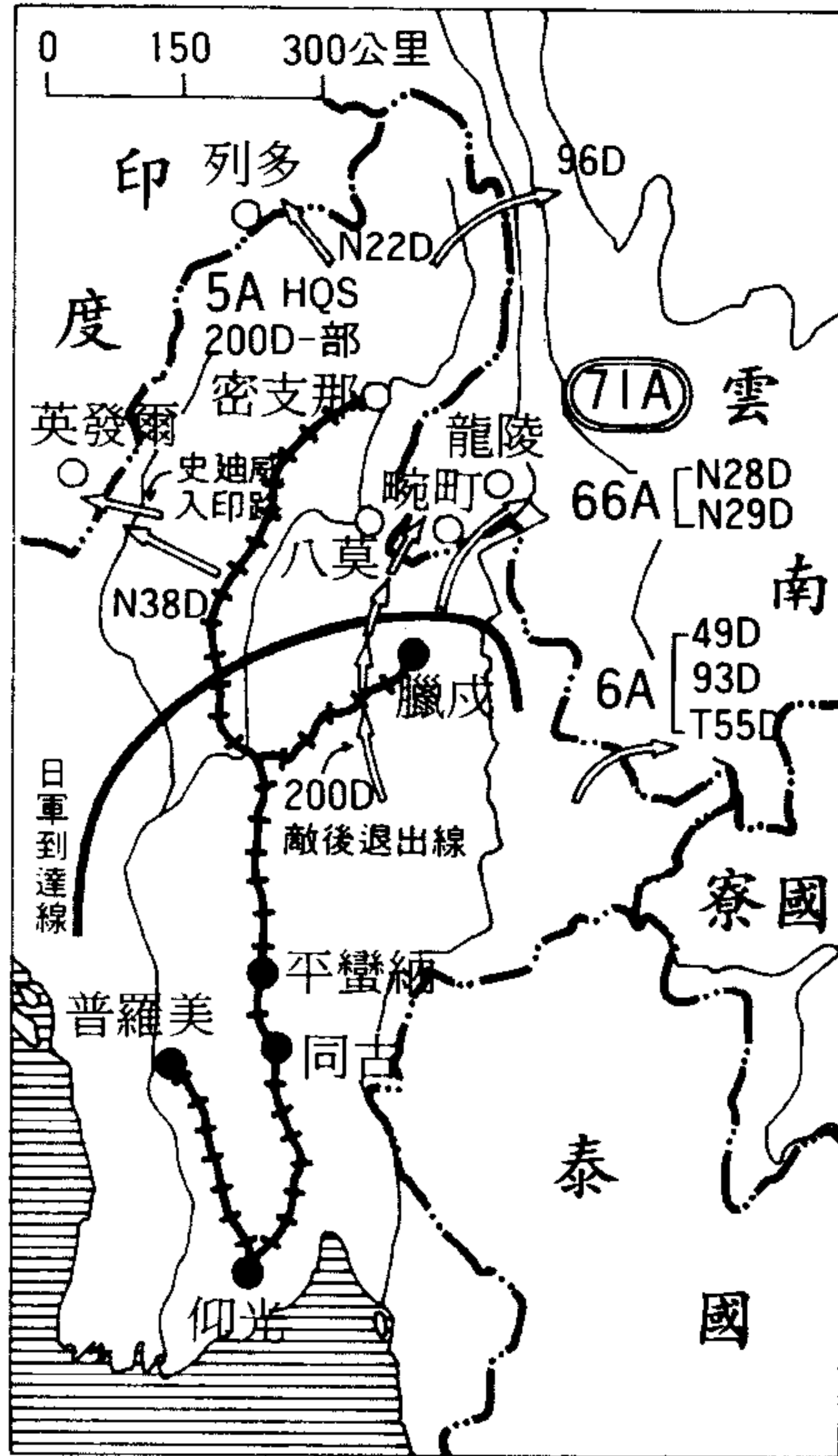
② 史迪威次一步計劃為在平蠻納殲敵，N22D及96D沿鐵道線互相掩護抵抗。200D則肅清棠吉之日軍，第六軍之T55D亦已配屬於第五軍以填補兩軍間之空隙，但T55D缺乏訓練，經優勢日軍迂迴後向山地潰退。敵既深入，93D原已向西移動，49D亦擬與200D合圍，均奉第六軍命令東撤。

第六十六軍(N28D, N29D, N38D)正由雲南調緬，尚在臘戍及曼德勒行進中，首尾相去二百餘哩，但因西線戰事緊急，N38師立即赴仁安羌增援，救出英緬軍七千餘人。



① 三月一日左右

① 日軍於三月六日佔領仰光 (實際於三月八日始完成佔領)，繼續北進，中國軍第五軍之200D防守同古，與英緬軍(步兵二師裝甲兵一旅)在普羅美之陣線平行。史迪威極力主張將第五軍之其他兩師調至前線，開始攻擊，但中國將領不應命，史提出辭職，蔣委員長與之同往緬甸(四月五日)，並任羅卓英為遠征軍司令長官，助其指揮。史繼續任職。此期間200D與日軍第五十五師團在同古作戰十二日(三月十九日至三十日)，最為壯烈。



③五月一日以後

③日軍第五十六師團配屬戰車一聯隊、礮兵二大隊，又以汽車輸送由薩爾溫江山谷地帶突入，於四月二十九日入臘戍，又立即東向腕町、龍陵，北向八莫、密支那進展。

同日聯軍首長猶決心向密支那集中，蔣委員長亦電令中國軍向密支那集結，然已不能執行，史迪威於五月五日決心率其司令部人員一百餘退入印度，中國各軍師大概均各自退出緬甸。

中國軍以 T 55 D 及 N 28 D 損失最重，200 D 自敵後撤退向北行軍，至八莫附近始放棄往密支那之企圖，而東入雲南。師長殉職。

中國後方勤務部部長俞飛鵬在臘戍掌握租借法案之卡車八百五十輛，四月杪當戰事吃緊時，史迪威索派汽車一百五十輛運兵，只得五十輛，而俞仍用汽車輸送汽油食糧，此事最爲美方資料詬病。然亦不過表示搶救物資與軍中後勤不相銜接。

國軍在國內作戰時破壞鐵道公路，只因軍事需要可以肆無忌憚，徵用人力亦經常事，至此到處掣肘，在曼德勒，即在市區建築防禦工事亦不可得。蔣之日記有云：「英既無力防守，而又不許我軍入城構築工事作固守之計，余自帶兵作戰以來從未見有如此疏忽之軍情也。」（一九四二年四月五日）而且當時英緬政府只許國軍一師停留或經過曼德勒。

但是國軍在後勤方面毫無準備，亦至爲引起反感。亞力山大機警圓滑，在蔣史間相處完滿，日後在其報告內寫出：「他們靠我餵養，何等的寄生物！」

現有資料不論來自何處，概指緬甸人民仇恨英人，愛慕日本，因此對國軍亦存敵意，緬甸獨立運動人士曾往日本受訓，據云日本諜間身著袈裟來往於緬甸村落之中。參加此役之軍官後云，到處都可遇著身著袈裟之第五縱隊，在我軍後方縱火。而難民以牛車阻塞公路，尤爲國軍行動之障礙。

緬甸氣候亦使作戰困難。當四月中旬新三十八師攻仁安羌時，溫度竟高至一百一十度，四月二十日暫編五十五師被日軍擊潰之前，士兵無水可飲。以後英聯絡軍官設法以卡車載運飲水至，中國部隊即奪取其卡車。當夜該師亦不派警戒，不遺搜索，只在路旁宿營。日軍即在附近森林內潛入國軍之後，次日三面攻擊，該師士兵始向山地逃遁。我們不能斷言此部日軍經過特殊訓練。但自日本佔領海南島後即在該處訓練部隊，在亞熱帶作戰已有長久經驗也。

至於五月中旬以後國軍退出緬甸時，適值雨季來臨，則又趕上天候上無可再壞之安排。雨季五

個月，自五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五日，平均每季雨量二百吋，以印緬邊境爲盛。從密支那到印度列多，最多不過二百五十公里。在一般地圖上不過兩三吋，可能引起不少誤解。像拉班附近沿孟拱河附近道路不經整理即可通行指揮車無阻。然則至新平洋附近叢林深處，第二次戰役國軍以緬刀開路，有每日只能進展數百碼之經驗，況且撤退時霖雨如注，最後印緬邊界高山逾六千呎。大概首先成行者，所遇困難少，以後道路泥濘，愈遲愈困難。雖有美空軍投糧，多數官兵均有挨餓經驗。最遲者至八月底始抵印境。我初至藍伽營房時（一九四三年二月）曾遇一排長，他說及當絕糧時曾立願若得出險當買米一袋置放左右終身不離。《羅曼魯士及孫德蘭》書中提及英人估計約三萬人企圖出險，內中二萬三千人成功抵印。所述包括英印緬各色人，因中國軍抵印者遠低於此數。第二次緬甸戰役時，有人稱發現兩年前病餓死者樹下枯骨。中國軍自此路退出者喪失所有武器裝備。第二次戰役時尙有軍士前往尋覓兩年前焚燒汽車場所。



五月上旬，蔣介石曾以無線電傳史迪威三次，囑將中國軍向密支那、八莫一帶集結，均未獲得回音，只從第五軍軍長杜聿明來電獲得由史指示前往印度消息，以後又由駐重慶之美軍代表團證實此消息，蔣曾在日記內寫出：

此與余欲指令全軍向密支那轉進之旨相背也，其或史氏爲戰爭失敗，神經不安所致歟！（一九四二年五月六日）

此時日軍已侵入雲南西部，蔣忙於指揮第七十一軍防守，日記又有：「怒江戰爭，如能再支持三日，則可轉危爲安矣！」（一九四二年五月七日）可見他當時神情之焦急。

同日，他從美代表團獲得史迪威已開始向印度進發，蔣又記入：「史迪威竟於脫離我軍，擅赴印度之時，只來此電作爲通報，不知軍紀何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七日）

〔梁敬錚影印蔣親筆：原文爲「史蒂華華脫離我軍擅赴印度時只來此電文作爲通報不知軍紀何在。中正」則係批語，必定已在內部傳閱，亦與日記性質不同。〕

然則如此不快之反應，全未向美方提出（美國文件無一字提及）。反之蔣於五月六日仍電在美京之宋子文：「中對史迪威參謀長始終信任，至於派印人數，預定爲十萬名，已由史之助手格羅柏（William Gruber，時任准將駐守新德里）起草訓練計劃，惟史氏最近期內，恐不能來渝面商也。」同日又由蔣夫人出名致羅斯福之助理居里，表示委員長對史迪威有「完全之信任」。

其實此時華府眼見中國對外完全隔絕，對其態度至表不安。馬歇爾於五月九日電美國駐重慶軍事代表團人員，囑其「對中國之前途，保持安靜的樂觀態度」。涂克門述及此時情形，也寫出：「緬甸失守，中國完全被阻絕，引起美國人之懷疑，中國抗戰之意志力是否能在孤立之中繼續下去。她確切的需要具有具體性的支援作爲鼓勵。問題則是如何送達。」

她又覺得史迪威堅持在緬甸南部作戰，強蔣委員長之所難，使中國惟一之機械化第五軍遭受重大損失，包括所屬礮兵，所以當史迪威步行往印度，轉新德里後返重慶見蔣夫婦時，他所受的接待，尤其是委員長邀他在黃山修養多日（史辭謝）實爲「出乎意外的和善」。

因此他們以後發現史迪威毫不自責，只指斥蔣干涉其指揮權，埋怨部下不應命，必更出乎意料。



在檢討第一次緬甸戰役作戰經過時，如果我們完全根據戰略上及戰術上之至當，則只有相信史迪威之英明果決。他相信曼德勒無戰略價值。並且防守緬北則必須進出於緬南。而他到任後不久，第二百師即已與日軍第五十五師團之兩個聯隊打成平手，此時亟應將第五軍的其他兩個師迅速投入，以爭取主動。及至敵第五十六師團由東線滲入，局勢非不可為。棠吉已經第二百師克復，他又已令隨從副官令第四十九師立即西進堵塞缺口。倘使第六軍不過早撤退，又倘使俞飛鵬能將所有汽車用之運兵，則最少在五月初無秩序的撤退之前，遠征軍有一次與敵軍全面較手之機會。

此間一切的假設不能逃避當日實際情形，因為國軍非現代社會產物，即不能以現代眼光責成其執行戰略上及戰術上之至當。

蔣介石雖然越級指揮，並且預先示意各軍師長不必猛進，在他看來他無意於欺騙史迪威。他已和史說及中國之三個師才能抵擋日軍一師團，至少五個師才能向敵之一個師團攻擊，第五軍是中國最好的軍隊，不能讓他們吃敗仗，尤其不要讓他們為英國利益犧牲。在緬甸作戰的重心為曼德勒。史迪威一定要瞭解中國人之心理和中國戰法。假使他和委員長虛心學習六個月，他自己也可以成為這些門道中之能手。從這些地方看來，他的用心非不誠懇。從我所聽到的傳聞及曾過日的紀錄看來，我還未看到其他任何人能在談吐之間，使蔣委員長發笑。蔣必在美國客卿之前卸除了平日莊嚴，史的紀錄裏提到蔣莞爾不止一次。

可是因為文教上之隔閡，善意常被誤解。史掌兵緬甸之日，蔣見該地出產西瓜，山中多松木，

因之致緘史迪威可給四人一個西瓜，陣亡士兵則以松木製棺運送回國。他無非想及史以客卿初掌兵符，可以就此示惠於中國士兵。即算瑣屑，亦出自善意。但日後經過渲染，由白修德等寫出則認作蔣介石不識大體，在軍書旁無時無分寸尺度之囉嗦。

如果我自己沒有經過在國軍的指揮系統裏之各階層一度實地觀察之機會，亦必同情於史總指揮對蔣委員長的訓辭所採取一種言者頻頻聽者藐藐的輕蔑態度。我們在軍校之所學，以及日後在美國參謀大學之所學，都著重任何指揮官在戰場上之首要品質在爭取主動。「捕捉戰機」和「擴張戰果」都是如是堂堂響亮的辭語。天下沒有一個缺乏攻擊精神之能將。「不為與遲疑可能較方法錯誤為尤甚」已經寫在日本的美國的和中國的操典裏。在「兵間拙速未覩巧之久也」與「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的前提以下不能又來一個綸巾羽扇的「諸葛一生惟謹慎」之作風。

可是這些原則與前提必須與當日國軍伙夫埋鍋煮飯引水挑柴的慢吞吞之習慣情調對照。很多人尚未想及，在駐印軍於藍伽軍營編發給各級軍官手錶（來自美援）之前，軍中尚無計時器。也很少有人知道，照圖上作業的辦法所製作戰命令一般無用，有些尚是事後補寫以保全紀錄之完美。實際上作戰指揮全賴電話，所以也更強調下令者及受令者之人身關係，而無從使戰鬥行動標準化合乎典範令之要求。若提及裝備則因為器材難得，已失效之防毒面具與不能發火之手榴彈不能放棄，而主要兵器之彈藥又不敷用。如此編組之軍隊甚少經過連教練，遑論及諸兵種協同演習。

本文已一再提及國軍已在其組織及指揮系統之中摻拌著人本主義(humanism)之性格。人本主義不同於人道主義(humanitarianism)，其主旨在不窮究組織上及邏輯上之完整，願意將就現實，趨向妥協，注意人與人之間的特殊情形，與單元的雙邊關係。在己所不欲不施於人之條件下提倡對人謙

虛抑讓，以期對方同樣報答。李宗仁之回憶錄提出人本主義事例甚多。例如台兒莊戰役時，孫連仲不要令他部下過度的犧牲，「好讓第二集團軍留點種子」。李見龐炳勛則說：「你是老大哥我是小弟，本不應該指揮你。」川軍鄧錫侯孫震所部調到第五戰區則說：「一、二兩戰區都不要我們，天下之大，無處容身，李長官要我們到第五戰區來，真是恩高德厚，長官有甚麼吩咐，我們絕對服從命令。」讀來有如《三國演義》裏各章回。

李宗仁的麾下情形如是，蔣爲統帥，其所須應付之人事關係可想而知。我們再看以上之引語，當中之精義已不再是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而是企望生存。史迪威也不是毫不知情。他在緬甸退出後，剛回新德里，向馬歇爾和史汀生提出的報告也說及國軍將領人身上勇敢缺乏精神上之勇氣（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追究之，即是個人在偶然情形下冒險犯難容易，將部下長期置於生死關頭難。指揮時將人命當籌碼賭博簡單，要將各個人之能力恩怨氣量利害加入計算麻煩。

蔣介石是否在這種複雜情形中故弄玄虛，滿足他的領袖慾，有如很多中外人士指摘？我看過他的多種文件，和聽到不少與他接近的人士之談話，則覺得他不過忍受歷史之考驗。本文也已一再提及，中國要在六、七十年的時間，完成近三個世紀的改革，當中不得不略去若干步驟。在準備不完成的階段與強隣作戰也是當中方案之一。當初只發現軍需工業不如人，抗戰愈至後期，則社會之組織不堪重任也逐漸暴露。蔣介石準備以一身抵擋，他對部下牽扯誘導，干預機微，違反軍隊組織之基本原則，卻並非無事實上之需要。

在這種情形之下，專用防禦戰術，也是簡化技術上之需要、避免變數的辦法。戰略價值可以人爲的授與。如在交通樞紐人口中心佈置重兵，則敵人無法不顧，而且以日本軍人之好功，必將窺視。

蔣之常用戰法，乃是佈置如是之一個據點或三兩個如是據點互為犄角。正面機動部隊只稍稍抵抗即退入側背，候敵攻堅不克，補給困難方開始三面合圍。過去國軍在長沙三次會戰均用此戰法奏效。所以史迪威抱怨他的攻擊部署未得戰場上試驗之機會，蔣亦可以責備史未接受先守曼德勒次退守密支那之指示。

他在史迪威從印返渝後，未加切責，反示以出乎意外之和善，也不離人本主義之立場。他想到史以五十九歲之高齡（長於蔣約五歲）跋涉山川，失去體重二十磅，不能不示以善意。至於希望由史保持與美國之好感，尤為餘事。

蔣並未否認他在任史迪威為總指揮後又下令於他的部下，當居里奉羅斯福差遣來重慶調查時（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六日），他們的談話紀錄中有蔣對此事之辯白：

倘中緬交通不困難如此，余本可隨時以電話與前方交換意見，蓋余平素指揮作戰，向利用電話與前線將領取得密切聯絡，重要時且不分晝夜不時用電話指示，此幾乎成爲五年來中國作戰之習慣。蓋惟如此，始可參照余平素習知各將領之性格與能力，隨時糾正其缺失。中國抗戰能支持五年，迄今不致失敗者，此實為重要原因之一。

余念史迪威將軍不能熟悉中國將領之性格，故作各緘協助之。余之動機實具助其成功之至意，不幸另作解釋，誤會甚矣！

可是史迪威從未忘記或寬宥蔣之「欺騙」。他在回渝後，即要求懲辦違反他將令之軍官。中國紀錄稱及於撤第五軍軍長杜聿明職，懲辦暫編第五十五師師長陳勉吾，可是史自己呈馬歇爾之報告除

陳勉吾外，又提及第六軍軍長甘麗初第九十六師師長余韶，及新編第二十八師一未具名之團長。他建議此四人均判死刑。



史迪威曾未認爲他可能侮蔑中國人。他的日記裡提及英人帶種族優越感，看不起中國人，「日後將付至大之代價」（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三日）。在中國則有「三億九千九百九十萬人值得援助」。（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日，亦即其他十萬盡係貪官污吏，亦仍是「中國老百姓好，政府裡的人不好」。）他對國軍一直抱有極大的希望。他在二月初到任之日，即寫下了一個「一般計畫」（general plan），預備整備三十個師，可以東向歸復武漢南取河內（至戰事結束，國軍仍去此目標甚遠）。

當日中國人和蔣介石的觀點，認爲我方最大困難即是武器裝備不如人。美方認爲中國人全不注意後勤，醫藥也若有若無。其實則無法講究，各種器材也只有到手則用。汪精衛所說「此仗如何能打下去」即爲缺乏醫藥而言。而且中國亦正以將不可能推作可能而自豪。

以國軍素質之低如何能達成恢復失地之任務？史之先決條件在增強其領導力量。剛自緬甸撤出後（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他即上書蔣委員長將國軍師之數目減少。將各師人員武器裝備兼併。文中尙未提及美援裝備，只說：「缺乏礮兵高射礮，戰車與飛機早已如是，由來已久，叫嚷無益，問題是如何將手頭所有的發生作用。」在他看來中國士兵刻苦耐勞用命，下級軍官也無問題。團營長好壞參半務必去莠存良。問題在軍長師長，「當中很少的有效率」。

在同時給美國陸軍部的報告（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史迪威也提到整肅中國軍隊的高級將領。

蔣委員長務必指派他能信任之人一員授以野戰軍之全權，「不受重慶的電訊緘件拘束」。他雖未明言非己莫屬，從他受命來華之背景以及日後與蔣攤牌的情形看來，此人已是非己莫屬。

史迪威可能未曾想見他的方案如果實現必侵犯中國之最高主權（美國野戰軍更換軍師長並不重要。然則集體更換則又無成例）。他也未曾顧及蔣之最高主權尙缺乏外表所示之實質。現下一個軍令與軍政統一之局面，並非完全由蔣一手造成。而半係西安事變，而尤以盧溝橋事變後諸人擁戴之所賦予。至於以減少戰略單位之方式裁軍，蔣介石自北伐後即已嘗試，中原之戰即係此企圖之反應。從藍伽營房之經理情形看來，史迪威如取得國軍全部之指揮權，他足以使美國介入之程度超過美方之支配能力。

「史迪威事件」連續約兩年半，以後時緊時張，還要附入其他因素，但是其基本的及內在的原因，在最初三個月即已見其端倪。蔣主張先作物資之供應再談改革，史則反駁除非改革任何外援不能發生效用，他沒有明言的則是只有改革他自己才能取得領導權。

在處理此事件時，蔣介石陷入極端困難之中。第一，他不知道所對付的是羅斯福之理想主義抑係美國國務院陸軍部之現實外交。如果他真是盟軍戰區之最高統帥，則他已不能乞援求助，而只能以下命令發通報之方式爲之，可是事實上不能如此通過其參謀長。第二，他亦不知應以中國人本主義之方式磋商或據理力爭，看來軟硬都不討好。第三，本來對日抗戰即以精神勝於物質爲基本原則，不承認失敗爲當中必要之條件，最先出於一種信念，以後成爲一種紀律帶強迫性，所有宣傳公告都受其限制。再加以蔣本人受王陽明哲學思想之影響，他以爲想來如此即可以等於事實如此。亦即一種希望，可以當作一種現實之成就。過去中國人之支吾張揚，美國人也隨聲附和，至此都要兌現，

蔣介石也感到對內對外同樣的困難。《史迪威文件》裡即記有匿名之中國人士向他美國客卿私下貢獻意見，提出蔣介石及中國政府之黑幕者十五起（不一定是十五人）。第四，史迪威方案縱有不實際的地方，它提出一項計劃，揭開一條出路，表示國軍可以收復失地，對盟國作具體的貢獻。倘使蔣介石不接受，他是否另有辦法？中國縱貧乏，她有的是人力資源，難道這人力也不當作有效的使用，必使美國既出錢又出力，而中國坐享其成？此種種問題，中國官方無法解答。

這些問題日後還要在重慶牽涉上美國駐華使館，陸海空軍代表。在美京華盛頓也引起白宮與陸、財、外各部之牽扯拖拉。羅斯福曾先後派遣邀請居里（行政助理）、威爾基（共和黨領袖）、安諾德（空軍總司令）、索摩維爾（供應部長）、華萊士（副總統）、赫爾利（私人代表）和納爾遜（戰時生產局長）先後來華。一方面希望貫徹他自己的對華政策，一方面也希望解決「史迪威問題」，最後仍只能令他去職。無疑的「史迪威事件」在蔣介石生涯中極為重要，如果我們敢於將歷史高度壓縮的話，即可以說中國在蔣介石領導之下全面對日抗戰八年，前半截希望將中日間之衝突拖成一個國際戰爭，此目的既達，後半截雖依人成事，仍掙扎著希望保持獨立自主之門面，維持最低限度的尊嚴，給自己以自我表現的機會。在此情形下，對美交涉佔住了蔣之大部時間與精力。



史迪威從緬甸退出返重慶一個月後，蔣介石在日記裡寫出：「史迪威參謀長稱空軍第十軍派赴埃及增援，而置中國危急於不顧，心殊憤慨，而不願表示於顏色使之自悟。余妻則不假顏色，亦甚當也。」（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美國航空第十隊駐在印度，專任中國及緬甸作戰，受史迪威指揮。此時因德軍隆美爾之非洲兵團威脅蘇彝士運河，派赴埃及。除抽調所有之轟炸機外，亦抽調所有支援之運輸機及後勤人員。後者在緬甸失守後，在中印空運中佔重要地位。此外尚有經租借法案擬派中國之飛機，亦因北非戰爭吃緊臨時在半途中改交英國空軍。

蔣介石認為第十航空隊既屬中國戰區，不應未經過統帥他調。正切責史迪威時，亦提及史本人對爭取中國戰場之飛機裝備未盡心力。因此時宋子文由美京來電謂史返渝後，對陸軍部提出報告使宋「在美洽商空運及飛機機械彈事進行異常阻滯」。宋並建議撤換史迪威，甚至說及史汀生已表示「如以史迪威不適當，務請直言無隱，俾得更換」。蔣則一方面指出對史不滿情節，一面回電宋子文主張容忍。大概此時他已獲悉史迪威與馬歇爾間密切關係，而且他自己向美方提出對史評議，亦由馬反饋告史迪威也。

六月二十六日會議尚有蔣夫人在場，如委員長日記所敘。此時蔣宋美齡發言，據紀錄為：「每次英國軍事失利，輒奪我軍備，或強取撥歸我國之器材，如此事不中止，實不知中國抗戰有何裨益。」美方紀錄尚有一段為中國紀錄所無（或在編撰《大事長編》時截去），亦為蔣夫人語，譯作中文為：「委員長必須於七月七日中國抗戰五週年時演講，他必須對中國人民報告實情，親日派現正活躍。委員長必須有一個是與否的答覆，盟國對中國戰區是否認為必要，願否對之支持。」

三日之後，蔣向史以書面提出：一、美國派陸軍三師協助中國恢復中緬交通。二、保持中國戰區飛機五百架。三、維持每月對中國空運五千噸。史迪威將兩事擺在一起謂此係蔣夫婦對美之「最後通牒」。他承允轉交美政府，但拒絕以中國戰區參謀長之名義支持此三項要求，因彼為美國軍人不

能參附他國，對本國政府提出威脅也。事實上他電告馬歇爾，謂蔣夫婦以爲「強烈的抗議」即可以使他們「占上風」。不久之後（七月二日），他亦向蔣送達前述戰區參謀長之職責在計劃編組訓練，無籌集器材之備忘錄。

在此情形下，蔣對史提出對軍隊改組各種計劃及建議，擱置不批亦不召見。羅斯福遂派居里來華。蔣在七月杪八月初與居里十七日之間接談十四次，提及中美間各種問題，而以史迪威爲重心。

蔣一度以爲居里作主即可撤換史迪威。他日記內有云：「正午居里又談史迪威去留事，彼於昨夕與今午談話後，始知我國習慣與心理所在，乃令史先赴印度，另派惠勒 [Raymond Wheeler] 少將，時在印度主持供應」來華暫代，以爲過渡辦法。勿使史太失體面，以致其回美後有反華之意，余即允之，此乃爲中美能否合作之癥結，亦可表明余並非意在多接租借物資，此種精神應使其徹悟也。」（一九四二年七月三十日）

並且他尙以爲自己在外交上成功。日記有云：「近日對外交經驗所得，無論爲友爲敵，凡我應得之權利與地位，只可進取與堅持，而不可有私毫退讓。蓋我退一步，不僅不以我爲知禮見情，而反將視我怯弱可欺也。古訓『克己復禮』與『相忍爲國』者，乃對內之道，而非對外之言也，吾故曰：對外應據理爭取，對內應約禮退讓，但亦一於中和自持耳。」（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

可是居里並未給蔣任何表示可以解釋爲史迪威可以輕易撤換。相反的，他證實史迪威有處置對華租借法案內器材之權力。他尙且率直的告蔣：「美國軍政部一部分人士曾公開聲稱，中國之反響如何，不必顧慮，蓋中國抗戰，不問其能否取得器材，必繼續推進，絕無中止之虞。」他又告蔣事關純粹行政事項，例由各部專門職掌人員負責，亦即白宮不便遇事干預。看來他多次與蔣對話之成

功由於彼此恭敬和藹誠懇。他恭維「委員長與羅斯福總統均為歷史上之重要人物」。蔣亦申明他不願再提緬戰，因為他為戰區統帥即應對全局負責。但目下因為美國供應情形已使他不能維持，例如空運低於每月一百噸甚至全月只三十噸，美國在華飛機則只有驅逐機四十五架轟炸機七架，美國年產飛機一萬八千架，中國要求五百架亦不算過份。措辭間毫無威脅情調。

至此蔣已三星期未見史迪威，八月三日史與居里同來，具陳雨季後反攻緬甸計劃，蔣因聞有英國海軍參加，準備收復仰光，頗為欣慰，前所要求之美軍三師減為一師。飛機五百架空運每月五千噸則未具確切實行日期。此兩項要求以後由羅斯福十月十二日來緘表示接受。

居里離華時蔣在其日記記出：「此次居里來華疏散與觀察，余始剛而終和，彼初來之態度，帶有威脅與示惠之意，余則據理力爭，以剛毅之氣應之。及其自知理屈，余乃以寬和無求，毋必毋固之心對之，勿使其認余為固執難與之人也。若始終強硬，則對羅斯福輔助中國為四強之一政策，有所背棄，是於吾為最不利，然余亦明示其如非美國參加領導則中國決不願列入同盟國之內，現我國雖列為四強之一，但余只有自覺慚慙，而毫不覺有榮施也。」（一九四二年八月七日）此段雖然離不開東方人之面子觀念，也仍暴露缺乏實力在軟硬之間為難情形。反面則美國國策之理想主義成份，只能在最上層代表一種未來式的抽象觀念，在執行時不能脫離下端官僚機構之現實外交。

居里返美後，卻完全相信羅斯福與蔣介石間之阻礙，為當中之代表人物。他主張史迪威與高斯他調。美方有一段不能證實的資料，述及他自己有意為下任駐華大使。他想撤離史迪威的計劃卻沒有成功。首先他得到羅斯福的許可，將此意面示馬歇爾，被馬言語阻折。次他又讓羅斯福以短簡詢馬歇爾對史迪威如何處理，由史汀生及馬歇爾力勸羅阻止他調。馬所持之理由乃是反攻緬甸非美國

將領莫辦，也無人比史迪威做得更好。此時不應當派去一個「談判者，一味只顧及提倡重慶之和諧」。史迪威則已在居里來華之日寫下了自己的策略：

現在看來我惟一的辦法在逼陸軍部一手——在緬甸——也要他們逼蔣一手。要他們付與援助時附帶條件。美軍派來一師時我準備要我指定的三個「中國」師，全權指揮這混合軍，及於賞罰升降。以後看成功的機會逐漸增高權力，擴大能控制的部隊。如能克復緬甸將為一師對五師，克復漢口以一師對十師，克復徐州，以一師對二十師，那時候我們就有了一點「實力」。（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日。只見於羅曼魯士戰史，不見於白修德編《史迪威文件》。）

這時候他已被蔣任為駐印軍總指揮，不久之後，羅卓英已因經費問題自請離職，杜聿明早已因他的拒絕接受而他調。這也即是藍伽營房開始訓練整備（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六日），鄭洞國任命為新一軍軍長（當年年底）之前的一般情形。



一九四二年中國得自世界二次大戰之裨益，來自一個未曾預料之方面。德軍發動高加索攻勢，蘇聯不支，新疆之盛世才乘機歸順中央。蔣介石在接見居里後即巡視西北（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四日），曾蒞臨蘭州、西寧、嘉峪關各地，並在西安主持軍事會議。但因迪化仍有蘇聯之驅逐機，各軍事長官不欲蔣前往，只由蔣宋美齡前往代蔣宣慰。

蔣日記內對盛歸順時有以下之記載：「本日中午，由朱長官（紹良）轉呈盛世才來書，敘述彼與

俄國一切秘密交涉之經過，詳盡無遺；於是俄國在新疆全部陰謀根本暴露，而其新錫協定，比之倭寇強迫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者尤過之，此種舉動，昔日倭寇在東北對張作霖所不忍爲者，而俄竟忍爲之，其狠毒可謂帝國主義之尤者矣，我國何不幸而至此，東受倭患，西遭俄毒，而英國在我西南數百年來殺人不見血之陰謀，早已根深蒂固，最近復加凌侮，野心未戢，若不有此五年來抗倭之血戰，則今日之新疆，決不能使盛世才懺悔歸誠，此種浪子回頭，與金甌重補之奇蹟，非上帝之賜予，能致此乎？於此可證明公理與正義，必能戰勝一切也。」（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一日）

及抵蘭州又記下：「青海之柴達木盆地與金沙江上游之通天河流域，此兩區之面積，每區縱橫各至二千五百華里以上，如建立兩省不爲太過，甚喜中國事業待開拓者多，不禁憂樂交集也。」（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六日）

這兩段表現蔣提及對外關係時激情過度。而懷想中國之前途，又超過時代的不合實際（至今此兩地區尚未聞有大規模的開拓）。類是之弱點，常作爲評議者攻擊他蔣介石缺乏組織頭腦之口實。按其實，此不過表示蔣以補苴罅漏的方式勉強拼成一個上層機構，卻無實際上之組織將理想達至下層，所以他對舊時代的世界觀盡極痛恨，可是本身對未來之憧憬卻提不出一個具體實施之方案。然則中國之全面的改造規模宏大，史無前例，除非如此大規模的大膽創始永無進入現代階段之希望。

一九四二年中共亦一度陷入低潮。日軍之掃蕩及胡宗南部之封鎖，使其所轄面積與人口收縮減小，蘇聯無從預聞國外情形，使其形勢愈爲孤立。秋間毛澤東曾遣林彪往西安謁蔣，以後林又往重慶，留駐達十個月之久。此間詳情雖歷史家尙難確定。林謁蔣日期，有稱爲九月十三日，或稱十月十三日。郭廷以之教科書稱林以黃埔學生身分叩見校長，並節錄其進言有「毛澤東一再告學生「林彪

自稱」今後兩黨應當彼此接近，打成一片，以求現在能精誠合作，更求將來永遠團結。」又「中共雖奉共產主義，但決不能照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之具體辦法。」林在重慶又兩度謁蔣，所請接濟軍餉彈藥，解除封鎖均未有結果。

現已發表之蔣日記則只有簡短一段：「對共黨應以軍令政令之統一爲先決條件。」（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五日）

《大事長編》則載有毛澤東與蔣介石交換之緘件，毛緘寫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內稱：「前承寵召，適染微恙，故派林彪同志進謁，嗣後如有垂詢，敬乞隨時示知，自當趨轅聆教。」蔣之覆緘則寫在蒞年六月十日，內稱「茲乘周「恩來」林「彪」二同志回延之機，特泐數行，以伸悃忱，如能駕渝惠晤，尤爲欣慰」。似此亦即表示國府在考慮中共之要求前責成毛親來重慶，自此可以想見前述軍令政令之統一，已非以前之口頭應允可能算數，而必由毛人身擔保。至於兩緘相去六個月，則徵象著林彪之長期接洽無成就，雙方以言辭掩飾，只不過使談判之門不致完全閉鎖。蔣日後著《蘇俄在中國》則稱中共之趨向談判，只在蘇聯戰事不利期間。一俟蘇軍在史達林格勒獲勝，其部隊又開始襲擊江蘇與山東之國軍。

中共之文件則證實在此期間毛則加強其對黨之控制。他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所發表的「整頓黨的作風」，提出應排斥的爲「主觀主義」、「宗教主義」與「黨八股」。其名目既已如是之廣泛，則任何阻礙毛一元領導之人物及活動，均被整肅，實已開二十五年之後「文化大革命」之先聲。他攻擊「那些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當作宗教教條看待的人」，而主張「在各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已揭開了徹底清算中共內以陳紹禹爲首的國際派。《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也記錄著：「要求

嚴格執行民主集中制，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和「強調黨的領導一元化」。如此極權的組織，即極難真心誠意與其他黨派合作，遑論及受國民黨及蔣介石的指揮。

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來，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三年間，中共已逐漸展開土地革命之總動員。《中共黨史大事年表》提到西北局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從年前之十月十九日開至次年之一月十四日，從此也樹立了以大規模之幹部會議代替職業性官僚機構之先聲。同時肅反「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和「軍隊工作中的軍閥主義」，亦即全部與舊社會的各種影響絕緣，包括本文前後提及國軍中常有之各種關係，人本主義與包辦制度。毛澤東之「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表現著他有擯斥整個現存都市文化之決心。自是中共也越來與國民政府的距離愈遠。

這樣看來，抗戰已入後期，日本威脅中國生存的危險好像已經減輕。中國可以考慮到她面臨的一個基本的問題，如何在人口過剩、耕地不足的局面裡完成現代化。可是除非舊社會的一切力量都已用至山窮水盡，新體制之因素無從產生。當事人礙於當時眼光，瞻前則不能顧後，所以無人能作整體的籌劃。即是領導人物也只能顧及於一面；他們也要因藉著內外空前的壓力，才能下超乎常人之決心。



蔣介石的困難在於他不能放棄他的職位與工作。世界的局勢變化過速。無疑的，當初他是推動全球運轉一個主要的力量，可是現在他無法放棄自己的立足點。今後人們對他立場之解釋，因時不同，因事而異。首先改變態度的有他陣營內之知識分子。他們以為中國社會之表現，全係蔣個人之

人身性格，如有差池，亦必蔣之過失。此想法次及於外國駐華新聞記者，更推廣而為海內外輿論，甚至日後歷史學家對他之評價亦因之轉移。

抗戰初開始時各人讚賞蔣英勇有決心，至此不乏人懷疑其繼續作戰之誠意與能力。一九四二年五月至八月之浙東戰役增加了各方之懷疑。事後史迪威在日記中寫出：「除了衢縣西南外，全部無抵抗」，「比我們想像還要壞」（一九四二年十月六日）。

浙東自杜立特轟炸東京後，被日人視為有對他們本土具威脅性之地區，於是在五月中以五個師團兵力進攻。最初蔣準備決戰，並囑顧祝同（第三戰區司令長官）沿途設伏，但勿將主力過早投入。臨時又因國軍從緬甸退出，滇西吃緊，昆明告危，僅有的美國空軍志願隊全部用於西戰場，於是決定避免東戰場之戰事。只是決心改變過遲，全部經過有如蔣日記所敘：「此次浙贛線戰爭，始則嚴令在衢州城決戰，嗣以敵方兵力厚集，乃臨時改變方略，不令決戰，放棄衢州城防，然其時敵已逼近衢州，且通常山、玉山之後路，已被敵人截斷。守城部隊與敵兵不易撤退，而顧長官不即下令撤防，以致守城部隊已被敵包圍之外，又遭洪水之困，及至冒死突圍損失難計，因之全軍心理與戰鬥精神為之低落。而此項損失竟過於決戰之犧牲。經此次教訓，凡決心決戰，準備完成待敵逼近時，即再不可變更初衷也。」（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

八月下旬日軍退後國軍稱反攻勝利，連克義烏、上饒、衢州、溫州等地，大體恢復戰前態勢。美國武官巴瑞德(David Barrett)上校之實地調查，證實衢州之國軍正準備交戰時，奉蔣命撤退，但命令未及下達各部隊，於是秩序大亂，所有火礮全部喪失。巴又稱國軍部隊「只有最不堪用之武器，無醫藥及交通工具，多數士兵患病。補充兵大抵徵調而來，用繩索牽吊交付」。日軍在佔領期間則破

壞當地半數之建築物，又將鐵軌、金屬品、鍋釜一併掠去，在稻田灌水，將衢州飛機場每隔四十尺掘成深塹。以後國軍之正式紀錄承認有四個軍之損失均達三分之二。

此種種令人耳聽心傷之情節，尙敵不過當年河南饑荒之慘聞。

據白修德書中稱，該省連年小麥歉收。政府之田賦徵實，幾將當年收成取去一空。至夏間乾亢無雨時，曾發高粱及玉蜀黍接濟，不料秋間此兩種耕作物亦顆粒無收。官方事前未及預料災情嚴重。及至發覺，只匯撥巨款，但紙幣又無濟於事。白於一九四三年三月前往巡視時，曾目睹居民食穀糠樹皮野草，他估計河南之三千萬人口，有二百至三百萬因饑饉喪生。

三十五年之後，白更在他的回憶錄裡寫出，當年他曾在洛陽郊外眼見野犬噬食人屍，據教會人士告稱，曾有飢民食人肉之事數起，但回重慶後政府大員均不相信白之報導。最後他因孫夫人宋慶齡得面謁蔣委員長。但蔣稱該省田賦已經豁免（白稱只抵下年數），並否認食人之事。白提供野犬噬屍之照片，蔣見及時顯然震動。

此後不久西安之賑糧方由火車載往河南。

白修德未曾提及他見蔣之日期，但以下蔣日記之一段應在白謁見之後記出：

公務員生活窮困萬狀，妻室以產育無錢多謀墮胎者，有醫藥無費，病貧亦深者。華僑在粵，有鬻子女過活者。河南災區，餓莩在道，犬獸食屍，其慘狀更不忍聞。天呼！若不使倭寇從速敗亡，或再延長一、二年，則中國勢難支持。余將不能完成上帝所賦予之使命矣！奈何蒼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一日）



一九四三年，中國對日抗戰之第六年，更是外交與內政糾纏一起的年代。即這年最重要的戰役——五月初至六月中鄂西戰役，也因判斷敵軍之企圖及審查國軍之戰果牽涉到中美關係。蔣夫人則已在年前十一月赴美，逗留到當年七月。史迪威之「去留問題」在這一年也有很大的起伏，直到十一月開羅會議之前夕又覓到暫時妥協之方式，使他能指揮駐印軍，展開第二次緬甸戰役，將他與蔣的攤牌擱置約一年。也在這一年蔣介石發表他的《中國之命運》內稱中共為「變相軍閥」與「新式封建」，引起毛澤東在《解放日報》發表〈質問國民黨〉一文，使兩黨的領導人針鋒相對的以傳媒既作武器也為戰場的鏖戰。

中共的「整風運動」則以整肅「國民黨特務分子滲入」為名，懲辦「內奸分子」。其為禍之烈，雖四十多年後《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也承認「作了過於嚴重的估計，以致導致後來的反特鬥爭的擴大化」。

《中國之命運》書內抨擊近百年來列強侵略中國，雖列舉事實也無端的刺激英國。蔣日記云：「本日增補文稿指斥共黨為變相軍閥與新式封建一段時，誠精思入神。此文如非自撰，恐任何人不能深入此境也。」（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即已表示文責自負。數月之後他再寫出：「《中國之命運》出版以來，最反響者一為英國，一為中共。此乃預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有如此之大也。」（一九四三年十月七日）

當蔣與中共之宣傳戰正入緊張階段時，宋子文正往倫敦參加英美之太平洋會議。八月十一日由

美軍駐歐總司令部派員向宋致達馬歇爾由美京發出之急電，謂蔣限中共於八月十五日前歸順國民政府，否則採取行動。馬希望宋阻止。宋子文以此意旨轉蔣介石，並附稱此電似由羅斯福授意。日後調查馬之消息出自莫斯科出版之刊物稱《工人與戰爭》者內中有八月十五日之限期一說。

但在此期間蔣確有與中共一戰之傾向。他在這時期之日記表現著：「中共問題不能不有解決之方案，如果始終要用十軍以上兵力防制陝北，則不如肅清陝北以後，可抽出兵力在後方各地分別肅清，否則養癰貽患更不可設想也。」然則此日之日記全長二千字。緊接上文，他又提醒自己：「宣傳重於軍事：當先以明白之表示，堅定態度，決定宣佈中共在抗戰期間之罪行，以澄清國際視聽。」「故應先用宣傳，說明中央對共一貫政策，只要服從命令，放棄割據，即可承認其軍隊與地位。」則又和重於戰（以上均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將全局與國際關係分析之後，他再將中共問題與《中國之命運》之關係寫出：「本書重要之點，即試驗其對軍事政治有否拋棄其割據之局勢，而可以政治方法和平解決之意。」（亦出自八月二十五日日記）

這樣看來，他已陷於莫大之失策。首先他沒有看清中共之群眾運動之真性質，仍以爲中共全係被蘇俄「豢養利用」，「爲其傀儡」。次之他在對付內部問題時實取被動。如八月十二日共軍在阜陽襲擊國軍第二十八集團軍李仙洲部，以致李報告「游擊部隊畏共甚於畏敵」。八月二十三日又有共軍襲擊榆林高雙成部，此等事均未曾引起外界注意，而只有他自己之宣傳張揚，在西方人眼中先造成怯於公戰而勇於私鬥之印象，有等於他亟需英國支援時而偏作反英論調。

史迪威同情中共由來已久，但是並非贊成其政治企圖與革命理論，而是欣賞其部隊有效率。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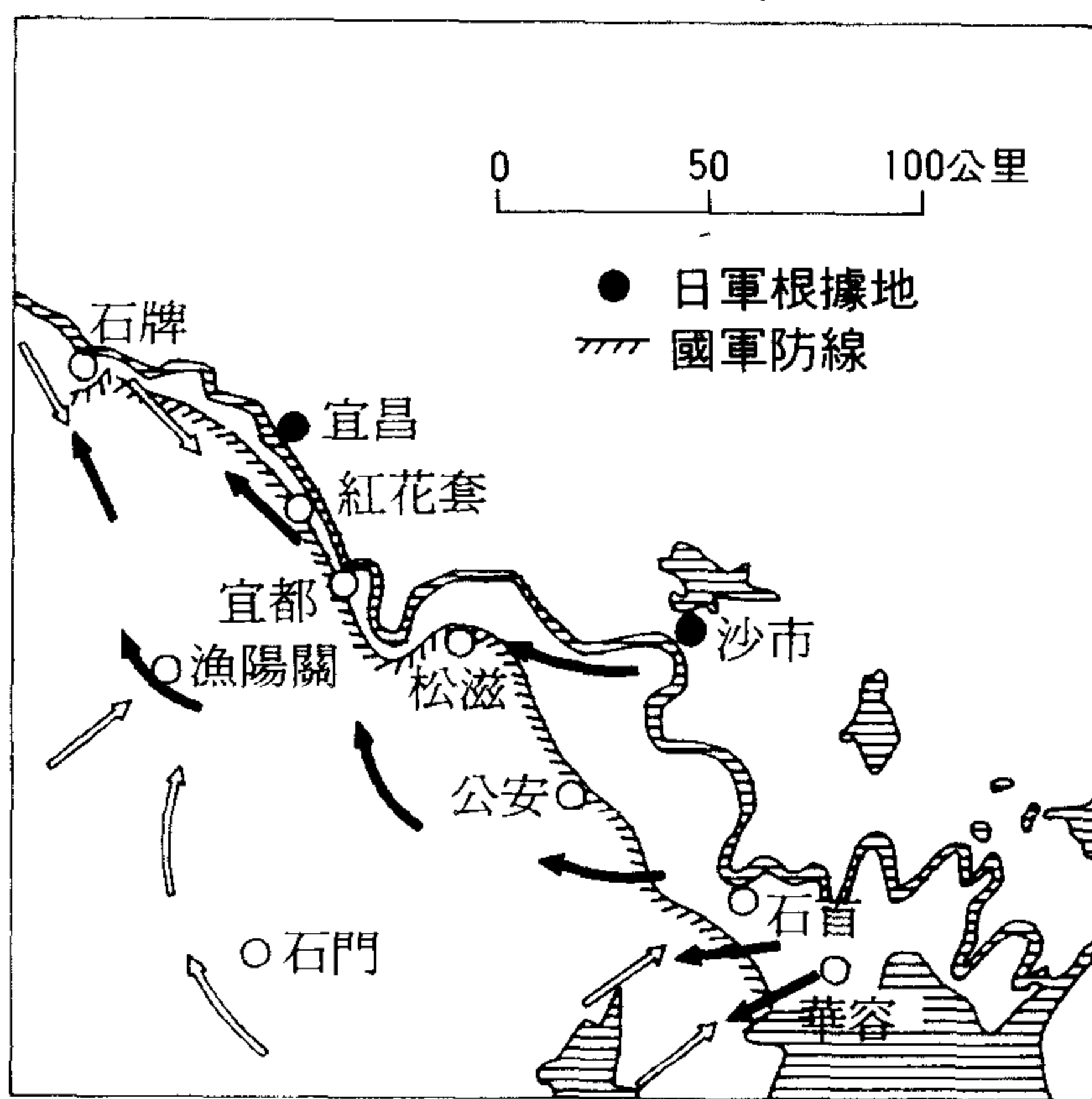
後他表揚他所愛慕的中共人物爲朱德而非毛澤東，有等於他愛慕馮玉祥與李宗仁。以上各人都樸實而與士兵接近。美國駐華大使館秘書戴維士(John Davies)及謝偉志(John Service)生長中國，爲史之政治助手及顧問，又有將他在此方面繼續推前的力量。國軍之每下愈況，只增強各人信念。

在第一次緬甸戰役時，史迪威即有指揮中共軍隊之幻想，曾將此意告他的情報課長羅拔茲(Frank Roberts)。一九四三年正當國共軍在阜陽及榆林衝突後不久，史迪威向蔣提出三件條陳(九月五日、六日及十六日)，內中主張將國軍首批三十師調雲貴訓練，次批之三十師，只以軍官集中在桂林訓練，均接受新軍器，建立補給制度。再次之三十師則不予新裝備，只負責地方治安，此九十師以外之部隊則逐漸解散，或留作以上九十師之補充兵。但內中九月六日之條陳，主張將所有晉綏部隊包括共軍在內一併出擊，牽制日敵以減輕平漢路及隴海路之壓力。蔣介石只對建軍計劃批覆，對出動共軍則不作答。其日記云：「史迪威此次來書，雖署中國戰區參謀長之職銜，但其書中多不遜之言，令人隱痛。」(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鄂西戰役發動於五月初旬，結束於六月中旬，爲時約四十日。最初日軍從華容、石首之間渡江突破國軍防禦陣地，後者向洞庭湖南岸撤退，當時尙以爲敵之目標在繞過洞庭湖之西岸進窺常德。至五月中旬戰況漸爲明朗，敵之攻擊已向西至西北迴轉，同時紅花套及宜都之間續有敵部隊渡江登陸。五月二十二日山地之門戶漁陽關失守。二十四日宜昌附近之敵軍亦渡過長江，至此石牌要塞爲敵爭奪目標。

鄂西戰役示意圖
(圖示5月29日前態勢)



此要塞為長江三峽之門戶，去今日築堤之處葛家壩不遠，如果失守，則西北之巴東為通重慶之鎖鑰，西南之恩施，乃第六戰區長官司令部之所在，均失去屏障。守石牌者為長官陳誠之嫡系（方天之第十八軍下轄胡璉之第十一師，俗稱「土木系」），向蔣委員長保證死守要塞而能貫徹其誓言。

但此戰役最緊張期間曾使中外震動。蔣宋美齡自美來電，云在美所聞戰況極壞，心緒不寧，擬提前回國。宋子文亦經常促問戰況，蔣以電話叮囑各將領必達成任務，並將前擬調往雲貴參加緬戰之部隊調回。

石牌守軍曾與來犯之敵作戰八晝夜，該處地形利於守軍，日軍在山地迂迴則為國軍截獲，國軍又有中美空軍掩護，所以終能獲勝。五月二十九日由西南到達戰場之生力軍克復漁陽關，可算為戰役之轉捩點。日軍從此腹背受敵。

日軍中又有一部偽軍（發現之番號為偽第十一師，新二十四師及九江保安隊）在戰況不利時首先棄械崩潰。五月三十一日日軍開始向東退卻，一部渡返長江北岸，曾受空軍不斷打擊。國軍於六月一日開

始追擊，但日軍退卻時仍能施行局部之逆襲，至六月十四日國軍已恢復宜都、松滋、公安之線，亦即大抵戰役前之狀態，只有華容及石首仍在敵軍手中。

鄂西戰役所產生一個特殊情形則是其經過爲美國確切注視。重慶傳出勝利消息時，陸軍部各員均判斷言過其辭，仍認爲日人目的不過搜掠洞庭湖沿岸糧食，目的既達自動退去。宋子文在美京迫不得已，除向重慶詢問外又逕電陳誠請供給「切實真確之憑據」，俾供羅斯福及「友華派」參考；電文尙稱：「美軍部及史迪威等，根本不信有進攻陪都之企圖，以爲敵決不致遠道輕入深山峽谷冒第五、九兩區夾擊之險違反兵法原則。且中國士兵營養不足，軍械窳陋決無殲滅多數敵人之可能性。」所以美國新聞界如白修德等始終只承認日軍死傷三千至四千人，國軍所受損害則在七萬人至八萬人之間。

陳誠六月十五日之覆電指出，日軍爲三個師團及一個旅團之全部，又五個師團一個旅團之一部分（偽軍則未提及），重砲兵一個聯隊，因地形關係未用戰車，其他以山砲爲主，總人數在十萬以上。國軍總數爲十個軍約二十一萬人。國軍戰略以石牌爲核心，爲最高統帥決定，正面部隊只逐次抵抗，而以兩翼反攻捕捉敵軍爲要旨。以後在石牌要塞前作戰之日軍有十一個聯隊之番號。全戰役敵軍死傷約三萬，「死屍纍纍可數，傷斃騾馬約三千餘頭」。國軍之傷亡超過對方，約四萬人。「但我戰線各縣人民生命物資遭敵兵之燒殺損失，則不可數計。」

在此電文，陳並駁斥華盛頓之見解：「國內外亦有一部分負責『人』認爲鄂西山地崎嶇，百分之九九敵不敢冒險深入，今敵竟冒險矣。」「此次戰役誠始終不敢認爲勝利只能作爲教訓。」最後尙有數語專注於史迪威，指出：「史迪威以過去北平政府看我中央，以少數不肖軍人例我全般。國人

之上下，對之全無好感，足爲中美兩大民族接近中之障礙，私竊憂之。」

注意《史迪威文件》內表示史對陳一直崇奉。他寫著：「陳誠使人高興，這是一種啓發，要爭取他。」（一九四三年春季）



鄂西戰役可以視作兩次戰役，也可以視作一次戰役包含著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日軍在洞庭湖北岸南犯，美方所謂掠取糧食確係實情，而且已相當的成功。可是整個戰役卻以奪取石牌要塞，掌握長江水道，進一步覬覦重慶爲目的。倘非如此日軍不會將第十一軍司令部由漢口移至宜昌，而且進攻漁陽關這樣的險地。這戰略的目的既未達到，部隊所受損害又相當龐大，則雖有陳誠之節制性的綜述，國軍在戰略上之成就仍未足輕視。

這次戰役，是抗戰以來國軍首次享有同等或優勢空援的機會。尚有一個罕爲人道及的因素，則是防衛軍內除礮兵一團、重迫擊礮一團外，尚有要塞工兵一團、野戰工兵一團、通信兵一團，爲過去一般戰役所無。戰役將結束時，兵工署長俞大維謁史迪威，告知全國儲存七點九二步機鎗彈僅四千萬發，鄂西戰役即用去一千萬發（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蔣介石在戰役後之講評（一九四三年七月三日），也揭露不少關於此次戰役之實況。國軍缺乏各部隊間橫的聯絡，爲其重要弱點。六月初，國軍之六個師已將日軍第十三師團在宜都附近包圍兩天，但日軍終能增援反攻，甚至已撤至江北之部隊又回師向國軍一部攻擊，終能脫網。各部隊間之素質也有很大差別。第十一師爲國軍中之精銳，雖作戰超過一星期，但每次只使用兵力兩個營，表示其

部隊能按戰術上之需要展開，不像其他部隊之蜂屯蟻附。戰後各部隊虛報傷亡，也爲最高統帥深悉。蔣承認在華日軍「都是一些老弱落伍的軍隊，這就是他把我們中國當作一個落伍的國家看待」。這次戰役可算由蔣親自指揮，他提及總預備隊之投入是他個人之決心。既已使用總預備隊，可見戰況曾一度危急。

我們既知國軍具有各種缺點，多方情形這些缺點之由來尙出在軍隊本身之外，則可斷言一九四三年鄂西戰役，第六戰區已盡到它能力之最大限度。雖無俘獲及渡江規復失地之戰果，仍不失爲有程度之勝利。尤以最先預期敵之主攻來自東方，結果來自南方，各部隊尙能作適當之調整，業以難能可貴。再對之過度批評則爲苛責。至於所報殺傷敵軍人數不能確實，則我自己有了在野戰軍及以後在國防部服務的經驗即知無法避免，因一部出自傳統官僚主義之作風，甚至中國文字不顧及切實亦與之有關；一部則來自國軍以標準方式賦予各部隊長責任之習慣。如有任何單位卸責稱功，其他部隊只能變本加厲。美國方面之資料則一致稱日軍之目的不外搜掠食糧奪取船舶，至此全部達到目的。

只是是勝是敗或是打過平手，至此國軍之作爲已須向美國負責。各方估計要解決日本非在其本土登陸不可，美軍之損害，可能多至一百萬人。減低此死傷數之方法之一爲在中國打擊日本。所以援華已不全是感情主義的見義爲懷，而有自身之打算。既如是，則對其支付物資所使用之效率不得不講究認算。照宋子文之電文看來，雖美國總統及「友華派」亦不能推卸此要求。雖有陳誠之憤怒，半年之後在開羅會議時（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六日）史迪威對羅斯福說及，「局勢嚴重。像五月份的「日軍」攻擊再來一次，他「蔣介石」即會被推翻」。此時之蔣介石牽扯著中國之上層機構，必有鶉衣百結之感。

那一年他兼國府主席，是年中央大學鬧學潮，他又自兼中大校長。鄂西戰役後不久，他已派陳誠往雲南主持遠征軍，而又責成新任第六戰區代長官孫連仲，準備對宜昌反攻。他在日記裏寫出：「共黨爲俄作俵，汪僞爲倭作俵，內憂外患之情勢並未減殺。然而我所恃者，惟理與義故寸衷能泰然自若也。」（一九四三年八月九日）

至此本書讀者當能想到：他所說「泰然自若」，並不是完全忘却當前危難的泰然自若，而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以意志力強作鎮靜的泰然自若。我們知道，他在此期間從未放棄早晚祈禱靜默閱讀聖經和其他宗教哲學書籍的習慣，而只有繼續加緊。



一九四三年，當鄂西戰役正在展開之際，羅斯福與邱吉爾在華盛頓舉行軍事會議，到有兩國戰略專家，史迪威及陳納德亦在列，中國則有宋子文出席。會期在五月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是所謂「三叉會議」(Trident Conference)。羅斯福曾私下問及史陳二人對蔣介石人格與個性之觀感。據陳納德事後回憶，史迪威曾說蔣乃是「一個意見反覆，狡猾而不可靠之老無賴，所說之話，全不能算數」。當時蔣夫人尙在美國，蔣亦曾電夫人（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八日）稱史迪威「時加誣陷與脅制令人難堪；而且出言無信，隨說隨變，隨時圖賴」。電內又說及國軍將領不願聽其指揮之情形，望她轉告羅氏。蔣宋美齡即回電如照此意旨提出「恐礙連繫」，希望乃夫熟思之後再作指示。於是蔣再電「不談亦可」。想見其控訴並未提出。

其實史迪威對蔣無禮情形已非只一日。當年一月羅斯福與邱吉爾曾在卡薩布蘭加會議，會後派

美空軍總司令安諾德及英空軍總司令狄爾來重慶通知中國當局。原來第一次緬甸戰役後曾預期雨季終止，盟軍反攻，至此情勢變卦。主要的爲英國不能供應攻仰光之船艦。由印度出擊之英印軍原計劃之七師亦只有三師。盟軍能支持中國者爲增強中國戰區之空軍力量。蔣即謂應使中印空運增至每月一萬噸，中國空軍保持飛機五百架。史迪威即在安狄二人前發問「是否所言若不辦到即不對日抗戰之意？」蔣只能以中國曾獨自抗戰六年相對。史迪威仍追問：「此是否條件？」已使中國戰區統帥相當羞窘。

羅斯福從各種緘電內，對史迪威態度已有所聞。他曾於三月八日致緘馬歇爾，內中最重要之三段爲：

謝謝你給我看到史迪威二月九日有關安諾德及狄爾行程來緘之副本。我將此緘仔細看過，我首先想及史迪威對蔣委員長採取了完全錯誤的接近方式。他是中國人，總之就不能期望他如我們一樣的辦法行事。當史迪威說及委員長事實上急躁，不容易對付，疊次增加他的要求，當係實情。但是他說及用嚴峻的聲調對付他，那才卻是不對的辦法。

我們必須記著，委員長經過艱難的行程才成爲了四億人民無從爭議的領導人——從各色各樣的領袖人物——軍人、教育家、科學家、公衆衛生管理人、工程師等得到任何形式的團結，是一個極爲龐大而困難的工作。這些人都在爭奪權利或全國性與地方性的領導力量。「他」在一個短時期內，要在全中國建造我們兩個世紀所得之成果。

而且委員長發覺到他必須維持他的最高地位。如果我們易地而處，我們也會同樣的做出。

他既是行政首長又是三軍統帥。任何人不能對如此人物以嚴峻的聲調要他提供切切確實之承諾，像對付摩洛哥的蘇丹一般。

馬歇爾接緘後謂已將此信認真讀過，他要求羅斯福的同意將以上第二三兩段只刪去摩洛哥之蘇丹一句（看來他尚不願冒犯小國家）抄送史迪威參考，從羅斯福與史迪威與陳納德對談看來，史並未受到此緘的教益。

而且又不止此也。在三叉會議的會場上，史迪威又在強調中國軍隊無戰鬥力，蔣委員長無一定戰略，如果日軍進攻，滇桂不保。他懷疑中國能保衛機場，中國人對英國人任何建議都感懷疑。會後邱吉爾邀往商談。又不止此也。《華盛頓郵報》之出版人梅亞(Eugene Meyer)邀史晚餐，到全國聞名記者數人，餐後又續來記者約二十人，史迪威「坦白而率直的」對談，政治問題則由戴維士答覆。此後史又派遣戴維士回美數次，專程向新聞界報告中國近況。涂克門敘述此佈置時稱：「從此新聞界以理想主義處理中國「題材」的辦法，才開現了一條裂縫。」

三叉會議同盟國意見分歧。邱吉爾主張置緬甸於不顧，不如先在蘇門答臘登陸，次進攻新加坡。原來英美聯合參謀團已有一種腹案，以美軍從東向西，中英部隊由西向東，在香港、廣州間匯合。突擊成功，再向華北發展，後以華北機場作基地戰略的轟炸日本（此時美軍在太平洋的逐島攻擊尚未見效）。看來英國人總以他們帝國的利益為前提，況且艾登又向羅斯福說過，他們「不願見中國人在太平洋「邊緣」上上下下的奔來跑去」。可是邱吉爾所說即是攻緬，滇緬路也只能在一九四五年供行駛，每月吞吐量還不過兩萬噸。如果立即整備越過喜馬拉雅山的航線，則每月空運量可高至三萬噸，看

來又言之成理。史迪威則堅持攻緬，因為這計劃與他自己和陸軍部的方案改組中國軍隊，在蘭伽練兵稱爲X部隊，又在雲南整訓三十個師稱爲Y部隊，然後X與Y在緬北匯合的設計不能分離，卻講不出一個衆人都要接受他的設計之理由。羅斯福對整編中國軍隊無興趣，倒覺得國民政府的情勢危殆，目下需要救急，救急則莫若加強同盟國在中國的空軍力量。如果攻緬要分散這種力量，則放棄攻緬亦無不可。可是他又要將就於蔣介石的意見，因為他始終認爲蔣的政治地位與中國的士氣與民心都極重要。

現已發表的蔣日記，提及三叉會議之部分及來往緘電，顯示著中國的外交過於人身化，蔣日記云：「華盛頓之羅邱會議事若其不邀中國代表參加會議，是爲我在外交上最大之失敗。故深切研索，惟有直接告知羅斯福總統，凡羅邱會議有關中國之事可約吾妻與子文參加之意，使其不能不約會也。」（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

蔣宋美齡未參加羅邱會談。但蔣介石以姻兄爲外交部長兼個人代表不足，又使乃妻在海外一再介入國際間高層之協定。從各種電文看來既有「文兄」、「三妹」（蔣宋美齡），又牽入「大姊」（孔宋鸞齡），甚至孔令侃亦在傳遞消息。不久之後重慶發生政潮，外人認爲由於宋家兄妹釀成，不可謂非由來有因。

然則霍浦金斯主持租借法案爲羅斯福之政治顧問，馬歇爾掌握陸軍爲其戰略之協定者，兩人平日情投意合，至此爲中國政策至於互不交言。以後赫爾利與魏德曼在重慶同居一屋又爭吵到互不交言。亦只可見中國之事不易在上端協定擺佈。

蔣對三叉會議之要求表示其尷尬與困難。中國參加會議原在支持陳納德之空軍攻勢。陳預計在

華中及華東發動攻勢六個月，可以控制空中優勢，進而轟炸日本本土。但蔣又不願放棄攻緬計劃。攻緬則須增強在雲南之Y部隊，至此空軍之油彈及陸軍之訓練裝備器材均須在空運噸位中支付。而且因鄂中戰役，國軍又已將原派雲南之補充兵七萬人改派湖北。蔣始終堅持英美應維持以前協議操縱孟加拉海灣，克復仰光，美國亦應派陸軍三師參加。宋子文亦在會中以「顧全諾」切責。可是英方業已將其海軍使用於他處，馬歇爾及美陸軍部亦不改變中國須運用本身人力資源之宗旨，則實際上仍是僵持局面。

在羅斯福領導之下，邱吉爾之攻蘇門答臘方案被認為不合實際而遭否決。攻緬計劃注重由列多及雲南進入北緬。三叉會議無一字提及仰光，只稱「應擾亂日本由海上進入緬甸之交通」。喜馬拉雅山上之空運則從現在之每月三千七百噸立即增至每月七千噸。九月之後更增至一萬噸。自七月始每月最初之四千七百噸撥陳納德使其能遂行空中攻勢。次二千噸則供「一般需要」，再有多餘噸位，亦撥空軍。

以後看來，此決議未曾使任何方面心滿意足。英人以爲緬甸可以棄置不顧，對於攻緬無精打采。陳納德未曾掌握空中優勢。遲至八月他尚只有戰鬥機八十五架輕轟炸機九架，另有飛機二十七架可供修復使用。史迪威則謂他只有每月五百噸之物資裝備在雲南之部隊。蔣介石曾在三叉會議時令宋子文及蔣宋美齡提出：「非先佔領仰光決無克復臘戍與曼德勒之可能。如去年徒然犧牲我軍，不僅無益，而且真有滅亡之危險。」（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三日）自此亦不願在縮小範圍內攻緬。但他稍一猶豫，史迪威又在他自己的日記裏及給馬歇爾的報告裏，用各種粗獷辭句責罵他意見反覆，所說之話全不能算數，總之也仍只能以嚴峻的辦法對付。



一九四三年十月，重慶發生了一件極爲離奇的事件。蔣介石希望撤換史迪威，至此業有年餘。至九月底十月初好像水到渠成。三叉會議時羅斯福對史迪威印象業已不佳，茲後宋子文再三游說，又值盟軍機構改組，印緬隸屬蒙巴頓之東南亞戰區。宋子文更鼓吹史迪威不宜留任。大概在九月間他已獲得霍浦金斯默契，只候蔣介石正式要求，即將史調離。至此史汀生及馬歇爾已不再阻撓。馬歇爾準備調史迪威爲美第四軍軍長駐阿拉斯加，遺缺準備由陸軍供應部長索摩維爾接任。

《史迪威文件》有以下之一段，未註日期，但所敘應爲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六日事：

與路易士「蒙巴頓」長談之後，與索摩維爾返住舍，至此他告我：**委員長說我必須離職**「黑體字原文大寫」。原因是我已經「失去部隊「對我」之信心」。他說得非常剴切，所以我想事勢已定。（索摩維爾說羅斯福總統要求喬治「馬歇爾」將我調離已不止一次。「我的」好靠山。）

現已發表之蔣日記則有：「甲、東南亞盟軍副總司令美員無適當人選。乙、在華之美軍指揮官亦無適當代替之人選。丙、馬歇爾掩護史迪威之程度。丁、美國政府未必肯決心調換。以上四項應加研究，但余對索摩維爾，可實告以史之言行與中美邦交及軍隊精神與人民感情，以及將來作戰有損無益之憂慮，望其政府重加考慮，而不必作非撤換不可之主張。」（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五日）

《大事長編》在摘引以上蔣日記一段之後續有：

〔十月十六日〕美軍供應部長索摩威爾來謁，商談史迪威去留問題，公直告其一年半以來爲史隱忍已極，然總不能使其與我軍精誠合作，殊爲遺憾。

〔十月十七日〕美軍供應部長索摩維爾再次來謁，續談史迪威去留問題。既出，公囑蔣夫人約見史迪威，告以此時回美，恐於其個人不無損失。如表示悔改，則公或有寬假之可能。史迪威來謁公自陳，表示其護衛中國原出至誠，如有誤會，皆出無心，此後極願合作。公告以統帥與參謀長之主從關係。史亦矢言，此後決不再有凌越與專擅之情事云。

〔十月十八日〕與美軍供應部長索摩維爾續談史迪威事，公告以准予史迪威悔過自新，取消昨日之議，索氏欣然，甚感公對史之始終寬大也。

十月十七日蔣夫人約見史迪威事與所敘大致相同，只是內有孔夫人宋靄齡參與，而史之「悔過」並無誠意。《史迪威文件》內有：

（午後十時）八時美（宋美齡）叫我去。愛娜（宋靄齡）已在。她們確實是一雙鬥士。愛娜說釜底抽薪爲時未晚。我不作聲色只說不願居留於人家不歡迎我的地方。她們以「中國」與責任相勸，叫我放大胸襟，貫徹始終。愛娜說要是過了這一關我的地位要較前堅強得多。「你將星高照」。她們叫我去告訴花生米（蔣委員長）我只有有一點著眼，無非想中國的好，如有過失乃無心之錯，我準備全力合作。我游疑了一個長時間。但是她們勸說得如此有力，我最後說好吧。美提議我們立時就去。「我於是」去了裝腔照說一遍。花生米盡其可能的表現不念舊惡。他提出兩點：

(一)我要知道指揮官與參謀長職責「之差異」(二)我應避免優越感。這無乃一派胡言。但是我恭敬的聽著，花生米說既然如此，我們可以重新和諧的合作。

只有一點，愛娜何以有把握這「辦法」一定會結局圓滿？今日下午她曾指摘花生米。他拂袖離室。這是何等的侮辱。但是她只靜待著，他終於返身踱回。她和美都願為我效力。或者有如她們的所說，她們已將他推過半轉，只待我來完場。或者花生米已經覺悟，「如果局勢繼續僵持」，只有醜名四播，於是才猛省回頭，利用她們構成煙幕下台。「這不失為」半途裝飾門面的好辦法。其實他損失顏面已多，無可救藥。這樣一來他必會對供給假情報的人憤怒。這班人在不意之交弄得瞠目失措。愛娜說得好，他們把我們逼至最後之壕溝，我們仍然能堂皇的反攻。她說我從此必更實力雄厚。這班人發覺我不可能被排擠而去，不禁要口噤目呆。不過我懷疑要是我自己作主的話愛娜能夠同樣的有把握。「所以」這事好像預有佈局。

不管它，這場糾紛業已過去，下一場想在不遠的將來。美說著她結婚後凡人都說不出一年她會和花生米離婚。她們兩人都說她們已將家中首飾珠寶賭在我的頭上，今後也必繼續的支持我。經過此場曲折我只有覺得無事一身輕。既無悔憾也不歉咎，真是大好胸懷。(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七日)

次日日記裏，他暴露對宋子文的懷疑，再三日後(十月二十一日)他證實了宋子文是他的對頭。索摩維爾已說及宋和他從印度到中國前，宋在德里的旅館裏告訴索幕後之擺佈。這時候大姊愛娜亦即孔夫人宋靄齡也出面告史迪威「她必須在自己家人骨肉和對中國有貢獻的「人」之間作選擇」。至此

他又記出：宋子文與蔣介石有一場吵嘴。

當日外間傳聞，宋子文因此失勢。他的真目的乃是奪取蔣的地位。涂克門的書中接受這說法，梁敬鐔所作《事件》說及史迪威「經蔣夫人之約謁蔣於官邸，自陳赤誠衛護中國」。未提及道歉係蔣指使，及有孔宋鬻齡之參與，尤未指出與宋子文有關。此節結論稱雨季終止，攻緬在即距開羅會議又只有一月所以蔣任史迪威依然任職。羅曼魯士之官方戰史則強調索摩維爾及蒙巴頓均在支持史迪威。



一四九三年重慶政局變化之內幕可以作數層檢討：如果目的在根究事實轉變之真相，則各種報導之中尚留出若干漏隙，其情節只能猜測。史迪威出言無忌，日記中一節表示其本人自大而愛恭維，應為可信。《大事長編》並所摘錄蔣日記，表示蔣亟望去史，又對美陸軍部之態度存戒心，已與其他電文所敘同。所謂令蔣夫人促史迪威道歉不算與蔣一向行事時滲入人本主義之習慣相違（例如西安事變時即以類似辦法對張學良，但以施於美國將領，則為奇特）。而且《史迪威文件》所敘史遇到宋氏姊妹突然垂青，始自九月中旬。他和她們私下商談至少已有五次。宋子文確有把握撤換史迪威，則因美國會調查時亞爾索浦宣誓作証証實。馬歇爾準備在一九四三年將史迪威調離中國亦在日後羅曼魯士及孫德蘭修戰史被訪問道及，當時並已物色繼索為供應部長之人選。但索摩維爾事前並不知情。他在華盛頓啣命來華時，稱為總統專使。及至他接悉電令暫留中緬印戰區等候指示，又有宋子文之解釋，方瞭解本人捲入事內。羅曼魯士等云他不願損害史迪威，方在蔣面前竭力支持史。另一說他已在進

行史之他調，馬歇爾云史如他調其所遺職務則由他接。他不願作史之替身方主張保留史之職位。

但是宋子文有撤換史迪威之把握又已事前電告蔣，何以不能當面說服蔣？索摩維爾見蔣時他任翻譯亦不能藉此機會解決問題？如果實因蔣宋美齡在美經驗深知逐史容易日後對付馬歇爾麻煩，則何以史迪威在悔過之前即十月十六日在日記中表示撤換已事在必行，「委員長說我必須離職」？是否蔣介石有個先緊後鬆之打算，其目的只在迫使史迪威恭順？

缺乏自宋子文角度之解釋，使此問題難於解答。

亞爾索浦因與羅斯福接近，在重慶被人重視。在這階段他與宋子文比鄰而居，朝夕過從。宋不僅向亞述及每日經過而且倚為顧問，所以可說為最親近宋子文之人物，他於一九八九年去世，他的回憶錄《我曾見此中妙處》由友人執筆在一九九二年出版，雖提供若干以前不見於書刊之內幕，仍未能將整個情形說得水落石出。

《此中妙處》提及蔣宋美齡與宋子文在美時即因誰有權力對美交涉而發生爭執。蔣委員長並且一度電羅斯福，蔣夫人無權參與折衝（此與現已發表之蔣夫婦間文電所表現不符）。在重慶之「宮庭派」首腦實為羈齡而非美齡，她亦因孔祥熙而與何應欽及CC系接近，「這一派系包括國民黨中最落後的分子」。如果宋子文之逐史迪威計劃成功，則他在蔣委員長面前的信用必大增，也必使他姊妹之間及其他附從者的權勢減殺，所以史迪威必須留著。她們的理論是史如被逐，馬歇爾必報復，美國對華援助也必被馬全部截斷。

蔣決定不再要求史迪威之撤換時，宋子文與之發生口角。蔣一怒之下將茶杯擲地打破，並且一再揚言宋該鎗斃。宋子文回寓時，他接近於「精神崩潰」。亞爾索浦云：「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體念到

中國最高級人士在過度情緒激動時可能爆烈到眼淚縱橫。」不及一年他又如此敘述蔣介石。

《此中妙處》說到這串事實發生後陳誠失勢，何應欽當權。他與薛岳素不相得，如是使薛幾個月得不到適當的補給。貝祖貽則被趕出於中國銀行，在孔祥熙經理之下中國的通貨膨脹更無法遏止。亞氏繼續敘述宋子文名義上仍為外交部長實際被軟禁的情形。他細膩的記出他自己與宋失去對外的交接在情緒低沉時只有開車至郊外散步。他們越過嘉陵江畔的小山上，面對冰塊覆蓋的稻田，所用車為公車，但緊隨著的另一公車則有特務人員荷鎗監視著他們。然則書中所敘重慶政治「內幕」仍似因襲美國人士之傳說。



敘述至此，我們能確定的則是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七日如蔣介石繼續堅持，他甚可能使美方將史迪威從中調出，但當日傍晚他的態度由硬而軟，只責成史迪威道歉了事。從史迪威日記驕驍未改的態度和蒞年「史迪威危機」之變本加厲看來，蔣之軟化實為失策。此時留史和驅史的主張已分別有宋氏姊妹及宋子文的支持。蔣介石極欲去史，却尚多顧慮。但從現有資料，我們無從確定其幕後受操縱或被影響之實況及程度。

至於說宋子文欲取得蔣之地位而代之，揆諸宋氏對外界靈通、對國內情形茫然的狀態看來，甚難置信。他此時亦必知道中國五花八門之軍隊非蔣難能掌握。至此唯一可能，則因當年八月一日國府主席林森去世。林在時不過以此職位接受外國大使呈遞國書，從未有國家最高主權人之分寸。以後此情形可能改變。洽在此時蔣亟望中國能參加英美之高峯會議，但羅斯福一再邀彼當面協商，他

又繼續推延（詳本書三四三頁）。蔣尚主張中國參加英美之聯合參謀團。此計劃實現，中國戰區之最高統帥勢必受參謀團節制（但並未實現）。所以在當日各種頭銜與職位之調整，非不可能。惟蔣於十月十日正式宣誓兼國府主席，則此種可能性亦已降低。

追索當時經過事實，只能至此而止。除非有新證據發現，甚難使各種傳說更具體化。但在作評議時，則歷史家雖根據尙未一覽無餘之事實，亦不能否定重慶之政權有其「宮闈內幕」之成份在。蔣介石使此重要之外交決策，繼之則政府人事安排，不能脫離家人間之爭鬥。翌年夏間，史迪威問題再度緊張，以前錯誤暴露，宋子文東山復出，且以行政院長資格主持外交，蔣宋美齡及孔宋靄齡及她之子女則遁迹海外。自是蔣介石亦難能避免外間指摘，其本身爲一缺乏實力之獨裁者，有如史迪威在日記內之斥責（一九四三年三月四日）。

然則以道德名義作最後結語所寫之歷史，常以小評大，有如法國歷史家勒費爾所述，「不能解釋事故」（詳見本書八一頁）。在刻下的題材上說，則是對以上各人口誅筆伐，不能脫離傳統作史之疇範，忘却本文所敘事爲人類歷史從來之所未有。我已前後指出：以一個中世紀的國家，動員三百萬至五百萬之人力，以全國爲戰場與強敵作生死戰八年，在中國朝代歷史裏從未有過。在世界歷史裏也無他例。蔣介石不能成爲一個有效率之獨裁者，首先即因他無適當的資源，難能使部下心悅誠服。史迪威建議胡宗南、鄧寶珊與中共部隊一體出動進攻日敵時，四川軍人潘文華、鄧錫候、劉文輝則反對國民黨的對共政策，拒絕參加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當日白修德謁見蔣介石陳述河南災情嚴重時，中國有難民九千五百萬。

簡概言之，當日外界對國軍的報導，只稱揭穿黑幕，卻未將實際危殆情形說得剴切。至此中國

抗戰已逾六年，全面被封鎖亦近兩年。各部隊首長走私販毒，盜賣軍械已屢見不鮮。至於虛報人數，剋扣餉項已不在話下。在若干情形下非如此營私舞弊即不能生存。各省區強人更加深他們對中央之敵意。一則地方部隊仍受蔣之嫡系歧視與監視；二則國民政府早已失去其稅收來源，近年來在內地竭澤而漁，又多發紙幣，只有使省區部隊感到他們之生存空間愈為蹙絀。明年湘桂戰爭吃緊時，滇省之龍雲已在傳說中邀約各省區部隊退出戰場。桂林行營主任李濟深則已與粵籍將領薛岳、余漢謀、張發奎商洽準備重慶政權崩潰後之出路。

讀史至此，我們固然可以引用道德批判。然則事態後之實情則國軍從未為一個整體化之有機體。大批省區部隊之凝聚力在其各別之軍官團。此等軍官又大率行伍出身，可能終生未離省界。官兵則習用方言。況且抗戰原為求生存，此時生死關頭已由國門之外進入於閭里之中，各人另有打算，即高級將領亦只能以部下之向背為依歸，此非大都會裏之文士認為「應當如此」所能左右。倘如此解釋尚不能充分令人置信時，讀者可重閱上文一九四三年三月八日羅斯福致馬歇爾緘，藉此可以瞭解西方社會之團結力量曾經互世紀之奮鬥而成。我個人提倡之大歷史觀，亦主張如要徹底瞭解中國在二十世紀之奮鬥，應先讀歐美近代史。至於評議領導人蔣介石，則最低限度亦當讀及他在九年前以徐道隣名義在《外交評論》發表之〈敵乎？友乎？〉（詳本書一三八頁）內云：「但是在兵力絕對不相等的國家，如日本同中國作戰，即無所謂正式的決戰，非至日本能佔盡中國每一方里之土地，徹底消滅中國之時，不能作為戰事的終結。」抗戰之後期中國已接近於此態勢。

外交而又涉及「宮闈」，亦無非國家最高主權不能合理化，其決心又不便公開之表現。蔣介石對付史迪威，尷尬隄杌，程度因國事蠅蟻而加深。他任用陳誠又代之以何應欽，不能僅以前進與落後

形容之，而係申明軍紀厲求整頓不得，只能妥善退讓接受現實。有如他之引用宋子文之積極政策不得，又從而將就孔祥熙。至於發動宋氏姊妹向外賓作說客則爲最後一著。其實他不僅對付美國客卿如此，蒞年三月龍雲成爲問題，他又使羈齡、美齡及宋子文聯袂往昆明呼籲。此事見於美國領事館向華府提出之報告而不見於蔣日記。然則他既曾寫出「奈何蒼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則他此時支撐著一個危如累卵的局面必有長夜漫漫不知幾極的感覺。



開羅會議之前，羅斯福即提議英美中蘇之首腦會商，並願於會商之前單獨與蔣見面。蔣不能利用此機緣而一再推託，殊難索解。

羅斯福之提議於一九四三年六月四日告宋子文。蔣覆電羅邱史可先期會談，彼與羅之會商可臨時再約。是他恐怕接受史達林之壓迫對東北領土讓步？（一九四二年八月三日羅斯福之行政助理居里則曾對蔣說及，「華盛頓部分人之印象已不將中國東北認係中國一部分，應作爲戰後日俄兩國間之緩衝國」。）或是他恐怕與史達林聚在一堂犯「親共」之嫌疑，而在國內產生不良影響？或是他雖對美國及羅斯福已有各種要素，卻不耐直接被詢詰而寧願保持相當距離？

茲後羅斯福又向蔣宋美齡提及，並於七月四日直接電蔣，預計於重慶及華盛頓之中途會晤。但此地爲阿拉斯加，蔣即以往阿拉斯加必經過西伯利亞，如不與史達林晤及，「則於中俄與國際皆受不利影響」爲由，而他又不願見史，所以此議又不行。八月中霍浦金斯建議蔣直接飛華盛頓拜謁總統，更爲蔣反對。他甚至電告宋子文要宋自稱此與蔣「平生之性情」相違，必無接受之可能，所以並未

轉詢。於是只有十一月之開羅會議。

蔣夫婦及隨員在開羅逗留七日，此為蔣首次亦即生平惟一次參加國際高峰會議，初看起來，成果輝煌豐碩。首先中國作戰之目的（war aim）經過開羅會議公報而為國際承認，事實上亦即由英美擔保。抗戰初期中日兩方秘密接觸和談時，中國尚不敢稱收復東北，只望不被強迫正式承認滿洲國，而以取消塘沽協定恢復戰前狀態為滿足。開羅會議公報則列舉凡日本「由中國奪取之領土如東北、台灣、澎湖列島等應歸還中國」。英外交次長賈德幹（Alexander Cadogan）尚爭執上開地域只稱「當然必須由日本放棄」。如此議通過，則公報上潦潦數字之差異甚可能在一九四〇年間開國際共管之機。會議另一決議為成立遠東委員會（Far East Commission）。戰後此委員會為盟國佔領日本主持復員之威權。

蔣介石在開羅會議所作重要貢獻之一為在戰後任日人自決國家體制。當時美國人士有要求廢除天皇制者，蔣與羅斯福商談後，決定將此點保留。蔣日記有云：「日本未來之國體問題，羅氏依余主張，待戰後由日本人民自己決定。」（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羅亦一度問蔣是否有意兼併越南，蔣立即一口拒絕。

羅斯福之子伊利奧（Elliott Roosevelt）戰後所著回憶錄，稱羅氏曾要求蔣與中共組織聯合政府，蔣要求美國保證蘇聯不侵犯東北之主權，羅承允見史達林時與之洽商，又支持中國對英之要求包括香港之主權。此事在伊書中重複的提及四次。小羅斯福又稱乃父與蔣對中國內部團結之意見至為融洽。《大事長編》不能直接證明是說，但所摘蔣日記有以下之一段：「與羅斯福談話時以」共產主義與帝國主義為重心，余甚贊羅氏對俄國共產主義之政策，已得到初步效果為慰，惟囑其尚須注重俄國

今後之行動與事實，明告余對俄國則不敢深信也。並希望其對帝國主義之政策，亦能運用成功，以解放世界被壓迫之人類，方能報酬其美國此次對世界戰爭之犧牲與貢獻也。」（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少其措辭不與伊利奧之所敘相衝突，邏輯上兩者實相銜接。

史迪威日記中述及軍事會議時，中國代表團無所措手足，只有彼與英帝國參謀總長舌戰（亦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國紀錄則載事前決定由史以戰區參謀長之資格發言。但中國要求多而貢獻少，亦暴露其弱點，及發問時間及英軍中多少師係白種人（二師）其用辭亦甚為魯莽。

開羅會議之軍事部分未具正式紀錄，或其紀錄未交中國代表團簽署送返。（會議之秘書處亦即在華盛頓英美聯合參謀團之秘書處。）但自蔣之觀點，中國之收穫亦甚圓滿。反攻緬甸限於緬北，但蔣要求之陸海軍協同行動則有英美攻佔仰光西南之安達曼群島（Andaman Islands）之計劃。蔣要求供中國之空運每月一萬噸尚與蒙巴頓爭執未下時，羅斯福承允每月增至一萬二千噸。

所以蔣離埃及時，甚為自得。其日記云：「此次在開羅逗留七日，其間以政治收穫為第一，軍事次之，經濟又次之，然皆獲得相當成就。本月大部精力，皆用於會議之準備與提案之計劃，慎重斟酌，未嘗掉以輕心。故會議時各種交涉之進行，其結果乃能出於預期，此固為革命事業中之一項重要成就，而內子為余傳譯與佈置，其協助之功，亦甚偉也。」（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日記內又有一段專記蔣夫人：「今日夫人自十一時往訪羅斯福總統商談經濟問題以後，直至霍氏（霍浦金斯）離去，在此十小時時間幾無一息之暇，且時時皆聚精會神，未能有一語之鬆弛，故至十時已疲乏不堪，從未見其有如此情狀也。」（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可是不出一月，他所謂軍事經濟之成就件件變卦。即政治上之成就經過公報公佈之領土主權，

亦將由一年餘後之雅爾達會議而虧損。至於他自己與蔣夫人在外人眼前所留觀感，須自各人日後所作回憶錄中窺見之。而戰後所發表之回憶錄，多撰寫於中國內戰期間，執筆人更無庸對蔣夫婦迴敬。本來即弱國無外交，蔣介石不能全無預感。他在日記上紀此次出國經驗云：

此次在埃及所經各地最大之感想，為英國在世界之勢力強固與遠大，而亞非二洲之回教國民皆使之服從聽命，其魔力實不可思議，東方民族欲求自身獨立自由，言之何其易也。以開羅會議之經驗，英國決不肯犧牲絲毫之利益以濟他人，彼對於美國之主張亦決不肯有所遷就，作報答美國救援英國之表示，其於中國存亡生死，則更不值一顧矣。是以羅斯福總統雖保證其海軍在緬甸登陸，與我陸軍一致行動，余明知其不可能而姑信之，並不願以英海軍如不同時登陸，則我陸上部隊亦停止行動之語出諸吾口，以為其他日推諉之口實。然而緬甸反攻時期，此心斷定其非至明年秋季決無實施之望也。英國之自私與貽害，誠不愧為帝國主義之楷模矣。（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蔣介石相信其本人之人身外交，卻不能體會英美政客在公事敵對時毫不容情，私人見面則又和藹親切之習慣。是以其初見邱吉爾時，即記下：「初見邱吉爾氏印象，較之平昔所想像者為佳也。」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蔣夫婦應邱吉爾邀宴後又記下：「宴會中邱氏與夫人談笑，夫人亦以幽默言態應之，當宴會之

前彼曾導余至地圖室，告余以攻緬時期及其海軍各種艦艇數字之大略（軍事會議時提出可用於孟加拉海灣者新式戰艦二，其他戰艦二，戰鬥巡洋艦一，大型航母四，小型航母十）。余問其海陸軍登陸時期，彼乃告余須待至五月間（一九四四年五月去盟軍在法國諾曼底登陸只六天），不禁大失所望。宴後邱又導余至地圖室，指示各戰區海陸空作戰之現狀。其實此等語皆為余所熟聞者，而彼乃津津樂道，約一小時之久。最後談至反攻緬甸時海軍登陸預想之各地點，而未肯明確告余（軍事會議時則稱一切由首相面告委員長），余亦不以為怪。蓋以日來余與邱吉爾氏相見，已有四次。認定其乃為一現實的英國式之老政治家，實不失為盎格魯撒克遜民族之典型人物，其深謀遠慮老成持重，於現代政治家中，實所罕見。」（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邱吉爾在其回憶錄中稱：「這是我第一次見及蔣介石。他的性格給我一個冷靜、持重和敏捷的觀感。這時他的名望和權勢都在最高峰。在美國人眼中他是世間重大脚色之一，『新亞洲』之魁首。」述及開羅會議中之蔣介石，邱卻毫不掩飾他的敵意，表示他原準備以近半世紀前俄人待李鴻章之方式待他。邱寫著：「我們『預先』恐怕蔣介石來臨之『問題』實際已經發生。英美代表團之接談不幸被中國之情節攪亂，此情節複雜而冗長又無關大局。而且以後『羅斯福』總統因著他將印度中國身分特別尊重之觀點，立即與委員長閉門長談。『我們』一切之希望勸蔣夫婦去參觀金字塔，儘量的讓他們去開心，等我們從德黑蘭回來再講『之計劃』全部落空。中國情事不在開羅佔末位而竟佔首位。總統不顧我的辯說，允諾中國人於最近數月內在孟加拉灣發動相當規模之兩棲作戰。這比我在土耳其和愛琴海之『攻略』計劃還要防礙在法國海岸之登陸作戰，尤使登陸用之艦艇及戰車登陸艦艇成為問題之隘道。這尚且會使我們刻下義大利大規模作戰之行動痛心的受阻。十一月二十九日『在獲得羅

斯福同意之前整一週」我通知「帝國」參謀總長，在紀錄上指出：首相曾拒絕委員長之要求在緬發動陸戰時同時發動兩棲作戰。又直到我們從德黑蘭回開羅，我才能說服「羅」總統使他收回成命，撤消「對中國之」之允諾。」

邱又在以下講到德黑蘭會議的各章，一再提及他身在伊朗一直未忘放棄安達曼登陸的計劃。十二月初他和羅斯福回開羅，他又一再央求羅斯福，但是羅說這是他自己對中國人的道義上之責任不容改變。美國軍事代表團也說總統的決心如此不容改變，無法考慮。但是十二月五日他終使羅斯福經過他疲勞勸說之下改變初衷。此事既經邱吉爾如是詳細講敘，應為他得意之作。在此時受無妄之災的尚有蒙巴頓。邱首相一面告訴他原已分發給他戰區的登陸艦艇調地中海，一面命他再作攻擊蘇門答臘的計劃（繼續三叉會議的提議），還申斥他，他所作攻安達曼群島的計劃，所對付的日軍只五千人要用如此大的兵力，無乃割雞用牛刀。



但是蔣夫婦在開羅最大之失策尚是在接近羅斯福時。

蔣介石見羅斯福時絕對的自信羅對他的處境完全同情，有求必應。蔣夫人宋美齡接待伊利奧時過度的殷勤奉承。《大事長編》載有蔣初見羅斯福後謂其有一種超脫風度，頗有一見如故之感。經過三次商談之後，蔣在日記內寫出：「會談完時，彼對余慨然曰：『現在所最成問題，令人痛苦者，就是邱吉爾的問題。』」又曰：『英國總不願中國成為強國』，彼且鄭重表示其對於殖民政策極不以為然。言下蓋已顯示其對於將來東西間民族問題頗有隱憂也。」（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此誠然表示

二人所見略同，言無不盡。

但是伊利奧回憶錄中說起，乃父第一次見蔣後謂與之一席談勝過與聯合參謀團四小時之會議，乃是發覺國軍只一意監視中共，無心作戰，相信蔣在阻撓史迪威之訓練計劃。伊利奧參加蔣夫婦之雞尾酒會後，報告乃父：蔣夫人假意恭維羅張擺佈，羅斯福稱她為機會主義，但只因中國再無旁人可以作全國之領導，只能與蔣氏合作。

涂克門檢閱各種文件之後，認為羅斯福在參加德黑蘭會議之後對蔣態度已有重要轉變。主因在史達林承允擊敗德國後六個月對日作戰，至此蔣與中國失去重要性。羅從德黑蘭回開羅時，召見史迪威（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六日），史文件稱有霍浦金斯及戴維士二人在座。羅斯福問及中國尚可能支持多久，史迪威答稱如果像五月間之鄂西之役再來一次，蔣介石即將場台。羅說既然如此當物色可能繼蔣之人選。此語說在史、霍、戴三人前表示羅已無意貫徹始終對蔣一意支持，尤足為史迪威對蔣攤牌之鼓勵。此確與數星期前準備得有蔣之要求立即撤換史迪威之態度豁然不同。經過開羅之後，羅斯福即再未見史迪威。但從茲霍浦金斯直接閱悉政治顧問戴維士對中國之報告，有時閱後提供羅參考。

蔣夫婦若能洞悉前後情景，當不致在開羅時又向羅斯福提出借款。《大事長編》云：「蔣夫人銜命往訪羅斯福總統，會商十億美元供款計劃，羅斯福氏表示對我經濟危急情形至為瞭解，當即面允借助。下午三時，公偕夫人再訪羅斯福總統，對其允予設法借款，面致謝意。」時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似此蔣尚未獲知羅斯福之性格。亞爾索浦與羅份屬堂表，彼此私人關係友善，猶且在其回憶錄中稱羅長於賣給人「金磚」(gold brick)，此美國俚語，即外表奉承，授人贗品，略似中國人所謂開

空頭支票之意。蔣夫婦亦可能未曾明瞭撥借此鉅款應有之程序，才再往面謝，彷彿十億美元已爲囊中之物。當羅斯福在十日之後接見史迪威時，已提及蔣要求借款十億但難能在國會通過。而蔣回重慶後不久則給蔣宋美齡青天白日勳章以褒揚其功績。

十二月七日蔣在重慶接得羅斯福在開羅來電，謂原擬用於孟加拉灣之登陸艦艇刻已調離。蔣可以立即攻緬而無海軍支應，亦可將攻勢延至一九四四年雨季之後。蔣覆電採取後策。但又提及中國情形危迫，恐難再支持六個月。爲維繫士氣人心起見，望批准借款十億，並增強空運。此舉被美國人認爲敲詐。史迪威在他的文件內提及：

德黑蘭後，計劃改變。F·D·R·致蔣介石：「你接受改變計劃？」或者「你延期至十二月？」蔣介石來了一個榨取的辦法：「好吧，你給我十億元，並將空軍及空運加倍。」（未具日期）

他未說明首先提及借款在開羅，改變計劃在蔣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飛離埃及之後。自此美國人亦均以爲蔣之態度爲提出條件，既無海軍支援則借款十億，非彼即此，若彼此均不得則中國亦不出兵，而完全忽視文電交涉及措辭經過。當年十二月史迪威獲得蔣許可使用稱X之駐印軍向緬甸發動攻勢，而未及於在雲南稱Y部隊之遠征軍。蒞年蔣史衝突重點在使用Y軍。

十億借款之要求，引起在華盛頓更強烈之反應。財長摩根索原在珍珠港事變前反對對日妥協，陸長史汀生多年爲熱忱援華之人物，聞訊均對蔣表示惡感。摩指出一九四二年對華貸款五億元，中國尙未能動用一半，更多美金貸款亦不能遏止中國之通貨膨脹。此時駐華大使高思亦提出報告，云

中國集結大量外匯。財部消息內中八千餘萬美元，已轉入孔令侃等私人帳戶。於是蔣之要求未提至國會，只由總統附摩根索之備忘錄通知蔣表示拒絕。內中提及中國所需者爲食糧、物資、機器、兵械。其數量之大，只能陸運與海運。爲達到重開海陸交通之目的，中國亦應參與其戰鬥，只有國務卿赫爾不滿意於此通知。

在此期間蔣之日記有：

昨日發表開羅會議公報以後，中外輿情莫不稱頌爲中國外交史上空前之勝利，寸衷惟有憂懼而已。（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

爲攻緬展期問題，內外阻力甚大，如無堅定決心，則此舉必被動搖，將蹈去年失敗覆轍矣。（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關於攻緬時期如不變更延緩，則必敗無疑。如果此次攻緬再敗則昆明不保，而空運根據地全失，國際路線斷絕，不僅國內軍民心理動搖，而美國亦更輕侮，決不肯再爲我援助，其他英俄更無論矣！此觀於去年緬甸失敗之教訓，不難想像而得者也。此余所以不肯任其播弄，雖不能開通滇緬路，甚至美國斷絕經濟亦所不卹也。以去年以來，滇印各部之兵額，至今一年有半，而尚不能補充足額，如再一失敗，則以後補充兵更難於前。而太平洋決戰時期，最多不過二年。屆時如中國兵額未足，毫無精強部隊參加決戰，則我國地位絕無矣！故此僅有之資本，決不願再作浪費，而爲英國所欺弄，致我國於萬劫不復之地也！（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開羅會議還決定美空軍 B 29 從中國基地出發轟炸日本。成都附近動員四十五萬民工，包括女人與幼童，興建飛機場九處，四處有九千呎的跑道。所有建築工程全不用機械。碎石用手搥成，鎮壓滾束以數十或成百民工拖拉，泥土以竹箕及獨輪車搬運。開工之後六十日首批超級空中堡壘降落，九十天後所有機場如數完成。

但是所有的建築費和駐華美軍在各地的消費成爲爭執之重點，中國政府要求除機場地價由中國承付外，其他以法幣二十元抵美金一元，由美政府償還。蔣所持理由爲中國經濟瀕於破產，如有十億貸款則可以用「反租借」辦法應付。今借款無著別無他法。這要求提出時引起美國官員極端憤怒，尤以當時黑市美金一元值法幣一百二十元。如果蔣認爲富強的盟邦對貧弱的國家應有的善意，則美國人認爲這是敲詐不遂之後的勒索。如果蔣仍認爲這不外出於儒家「君子周急不濟富」的原則，美國人公然指斥這是蔣介石內在的仇外心理 (xenophobia) 之表現，一方面嫉妒英國與蘇聯接受美國之意外垂青，一方面由於孟加拉海灣的計劃改變，損傷了他的自尊心。要出高價才能買得援助中國抗戰之特權成爲公開的諷刺。

當羅斯福來電攻緬助印，否則截斷接濟時，蔣說出：「此雖爲其參謀部所擬之稿，而非出其本意，然亦可知其對華藐視之態度矣！惜接此電適在余復其財政借款一電之後未能責之以大義，於此益覺余昨日覆電堅決態度之不爲過也，國際間只有強權與威信，吾惟有以威信對強權也。」（一九四

四年一月十五日）

一週之後再三考慮他再記出：「此事余自反而縮，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惟對羅斯福總統個人之情感，或有損失，乃為不宜耳。」（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這一段甚難解釋，我讀來的文義為：這段事情我經過自己的反省與收斂，又配合著個人行之所宜與道德上應有之途徑，那我就用不著如是之氣餒吧（或者說也就於義與道無所虧欠了。）！以下才接著損傷羅斯福的情感。

可見在主持這事時，蔣介石完全依賴人身外交，文電稿自擬，不參照專家意見。事後卻又自覺態度過於強硬而不妥，才用傳統道德安慰自己。

蔣介石所處時代與今日不同，他認為的道德問題，我們今日即可視作技術問題。歷史給他的任務為替中國保全一個獨立自主的高層機構。他既把自己的人身與中國之利益視為一體，則在抗戰後期，「自存」確是一個重要的打算。我們已經看到一九四三年二月八日羅斯福致馬歇爾緘，內中有「而且委員長發覺到他必須維持他的最高地位，如果我們易地而處，我們也會同樣的做出」。以上蔣日記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之一段，說出他不願出兵攻緬固然在引用第一次緬甸戰役之教訓，及不願為英人犧牲這兩方面都有可供眾人相信之理由，而最後數句卻也暴露他保全實力的用心。作戰如此，借款亦復如此，他在十二月七日給羅斯福電，再三提及士氣與人心。十億美元不能解除刻下的通貨膨脹，卻大可以增強蔣介石及國民黨的地位。戰時如此，戰後亦然。

蔣被羅斯福責備對史迪威練兵的計劃不熱心支持。此種指摘可以對蔣的動機引起各種猜測。但是一個無可否定的事實還是人力資源不夠分配。羅斯福自己說及中國尚在十七世紀，這樣的一個社會要出面擔當二十世紀的任務必定力不能繼，派兵籌餉同出一轍。赴蘭伽的補充兵又經不起美國軍

醫的體格檢查。至於將外匯公款存入私人戶下，在蔣政權內似已行之多年，大概抗戰初期蔣令孔宋在海外籌款購械，即已採用此種辦法，同時這辦法亦易於遮蓋情報費及特務費之開支。

可是這種種解說無一能邀得美方之同情。如果既伸手要錢，又不肯出力打仗，一味保存實力，那不是軍閥是甚麼？然則這問題由美國提出，也仍是把蔣視作摩洛哥之蘇丹。

當蔣介石寫出「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之際，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日，美國財長摩根索與陸軍部官員籌商對蔣辦法。供應部長索摩維爾主張停止成都飛機場之構築，次之收買一個和蔣競爭的對手，只要出美金一億不怕沒有應徵之人。索的建議激情而輕佻，提議人沒有想到他所敘正表現蔣需要資財援助的迫切。

蔣沒有得到十億借款，以一億收買他的對手之計劃也沒有實現，而是由羅斯福決定美軍每月在華之費用限額二千五百萬美元，由史迪威及高斯與中國交涉轉授的條件。

涂克門綜合各情寫出：經過一月二十日會議之後，美國對蔣之支持缺乏成功的希望與信心。我們也可以看出蔣失去了羅斯福無條件之支持。美國總統俯就於英國首相及蘇聯大元帥不算，從此他縱不完全放棄他的理想，至少也要接近於軍方及各部院之現實外交。



如果一九四三年可算作國際會議外交糾葛佔首要地位之一年，則一九四四年為各事攤牌、軍事行動見底之一年。而且此態勢已在一九四三年底前顯現。

自開羅會議之後，蔣介石一方面企圖保存實力，一方面他又希望在戰場上作一個類似史達林格

勒式的表現。因爲他知道非如此，中國之軍事、外交、財政與士氣均無出路。即在鄂西戰役時，他已通令部下，石牌要塞爲中國之史達林格勒。事實上鄂西曾未產生類似戲劇性之高潮。

蔣尙在開羅時，日軍已發動向湘西常德之攻勢，敵軍包括日軍五個師團之全部，三個師團之一部，又僞軍四師。因自一九四三年十月，國軍已在湘鄂間抽出七個軍參加Y部隊在雲南之整訓，日軍企圖對留存之部隊以嚴重之打擊，並進佔洞庭湖西岸各地。國軍亦集中九個軍應戰。第十軍來自衡山，第五十八軍來自江西，第十八軍則在鄂西威脅敵軍之後方。敵之攻略重心指向常德。守常德者爲第五十七師師長余程萬，在廣州時即由蔣委派爲海軍局政治部主任，應屬蔣之親信。十二月二日蔣親電余，告之已出席開羅會議晤及羅斯福邱吉爾後返重慶，意以此次戰役，關係國際視聽。電文內又稱：「務希嚴督所部，與常城共存亡，以完成此次輝煌戰績，勿使史達林格勒之戰史獨美於前也。」

蔣日記云：「本日幾乎終日爲常德戰況不明所困，繁慮無已，除補誌日記外，不能再事其他矣！」（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日）

又有：「與薛長官（第九戰區薛岳）通電話指示戰局，心甚憂戚！兩戰區部署散漫，演成各自爲戰之象，易爲敵軍各個擊破也。」（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五日）

其實常德已於十二月三日失守，蔣得息後記出：「此次常德作戰，一誤於劉（斐）次長擅令石門汪之斌軍之撤退，以致演成戰局不可挽救之痼疾，繼以余赴開羅，戰事擴展，而方略部署與指揮，遂紛亂無緒；竟將第九戰區所有兵力調集於常德一隅，而將後方重地各預備隊抽調一空，卒致有今日未有之危局。如敵果冒險前進則長沙衡陽皆莫保矣！廟算不精，指揮不當，徒遭無謂之犧牲憂惶

莫名！」（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六日）

在現已發表之蔣日記中，如此張惶焦慮之情形尚稱首見，這一方面由於蔣自信過度，凡部下經手不由他自己所部署之戰局首先即感到懷疑。另一方面則甚可能因國際視聽之監視，影響到他之鎮靜。從此，我們也可以想見蔣在抗戰後期應付羅斯福及史迪威等人時，離不開對戰場記掛之暗影，否則他不會一再提及史達林格勒。以後湘西轉危爲安，美方亦至少提及常德。惟華盛頓方面及史迪威謂蔣無心作戰，一意坐享其成亦殊欠公允。

蔣日記續有：「今日常德戰事比較沉寂，我軍仍在原線對峙，敵未敢積極擴張戰果，或有撤退之可能。惟今日我軍能在原線沉著穩定，不作退卻行動，未示敵寇以弱點，是乃轉危爲安之樞紐，此伯陵（薛岳）之所以能爲健將也，殊足慰焉。」（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九日）

接著再有：「預料敵軍必放棄常德，不致久留，以其德山要點不守則常德屏障盡失也。」（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又有：「接常德已於昨晚克復之報，此心略慰。感謝上帝保障中華之恩德使我常德失而復得也。惟常德以北地區戰鬥猶烈，石門、臨澧之敵頑強未退也。」（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九日）

他繼開羅面請之後正式要求羅斯福貸款十億之電文，於蒞日，即十二月十日發出。

一九四四年二月，他往衡山召集第三、四、六、七、九各戰區高級將領舉行第四次南嶽會議，會中之講評提出若干不見於公報之資料，可作抗戰後期國軍實況之寫照，亦揭露統帥蔣中正之心境可補助其日記之不足。

常德戰役國軍作戰積極，常德城曾二失二得，全戰役陣亡師長三人，營長十三人。至十二月三十日始恢復戰前狀態，全戰役經過幾兩個月。這戰役不能稱爲國軍之勝利，雖說日方佔領洞庭湖畔

產米區域及隔離第六與第九戰區之目的並未達到，但給國軍及常德地區極大之損害則已成事實。其退卻時依總退卻命令遂行。十二月三日軍令部已有敵情判斷，稱日軍將「企圖奪取常德後即退卻」。但是蔣對各將領仍保持極嚴格之操縱與督促。國軍增援部隊有每日行軍七十里到達戰場之紀錄。戰線無崩潰之情景。敵撤退時仍大致與之保持接觸，而且翌年衡陽攻城戰展開時，日軍原擬令第十三師團自湘江東岸渡河攻擊，據稱鑒於年前第三師團在常德戰役期間強行敵前登陸所遇困難，恐損害過大而將此計劃放棄，是以一九四三年之役日軍所受創傷程度已超過各方之報導。是役國軍雖未能徹底追擊，其俘獲敵軍文件之多，表示掃清戰場至為認真。

全戰役中敵軍仍發揮其行動自由之優勢。蔣介石在講評時說及：「現在敵人以一個大隊（加強營）組成戰鬥單位，到處竄擾，而我們在自己的領土上作戰，有自己的人民來協助，對他這種小兵力的擾亂竟不能作有效的打擊，實在是莫大的恥辱。」其所以如此乃是對方之裝備齊整，素質均勻，補給完好，所以能以參謀業務充分的協定。據稱是役日軍曾使用降落傘部隊並施放毒氣，從我現有之文件無從證實。數達四師之偽軍亦不見於戰鬥報告，想用在保持後方之安全，或分割於正規部隊內擔任輔助勤務。

國軍之弱點，緣於動員及後勤。戰鬥之前即有大量缺員隱匿未報，而在戰役後以虛浮之陣亡數申報，以致若干部隊之報告內死多於傷經蔣介石指出。國軍出入戰場沿途無接應，加以本身補給供應能力不足，官兵只能強迫的取給於民衆。傷兵則二、三百人一批，遺棄於戰場後遭日軍殺害。尙有更嚴重情形經蔣指出：「因當地民衆逃散，見一家只有數人在內，怪他不辦招待，其連長某就火焚民房，這樁事不知你們軍長師長知道不知道？」因此上文蔣說及國軍「有自己的人民來協助」，只

表示理想上應有狀態，不能認作實際情形。

武器窳劣，彈藥不繼未正式提出，但容易想見。此次日軍進攻常德時將側後兵力抽調一空。當時軍令部之建議及戰役後之檢討，均認爲趁此時機國軍發動反攻，可能歸復後方重鎮，甚至進入武漢。但以「在裝備未改進之前，攻勢力量不充分，恐損害過重」。而且「發動全線攻勢作戰之後，非經數月之修整，不能恢復戰力，在此休整期間，無力適應狀況之變化」。至於中級以上幹部死傷之多，即顯然由於對方火力之優勢。

倘無空軍之協助，地上部隊之活動當更困難。是役中美空軍經常出動飛機二百架左右，全戰役超過一八〇〇架次。但從空戰之紀錄及敵軍使用降落傘兵之情形看來，制空權之操縱並未徹底。

國軍在生存條件極端困難之下，得力於各部隊內部個別軍官團之團結才能避免崩潰。但此一因素，始終被中外之觀察者及以後之歷史家忽視。部隊長與各幹部之人身關係、鄉土關係及部隊歷史，雖使各部隊間之協同困難因之產生分化作用，但在每一單位此內部之凝聚力又不可少。蔣介石與各將領樹立各個之人身關係亦以此因素爲基礎。各將領對蔣觀感不同，有的貼身崇拜，有的不過參加衆議作有條件的服從。所以本文說及蔣對各將領越級指揮耳提面命，違反軍事組織原則，在實用的場合之下並不可少。說來說去，這也仍是社會未進化過渡期間的必然趨勢，即蔣之能操持此不完善之權威，亦須經過數十年之經營。其所產生之微妙關係，可以從蔣在軍事會議講評時彷彿窺見，有如蔣於南嶽對各將領之督責具有重點。只要不逃避作戰，其他縱有極嚴重之越規犯紀之行動，只寓斥責於規勸，因洞悉至此各人均力不從心，只能滲入人本主義，有如岳飛之不責備武官要錢文官怕死也。他甚至講出：「我對於部下和同志的過失，向來不願意公開的指出。古人說『揚善於公庭，

規過於私室』。我們於同志之間，都應該抱這種態度。」

說到這裡他提及余程萬。他講起：「這次第五十七師守衛常德，陣亡官兵已經證明的有五千多人；我們一師人守城半月之久，一般官兵爲了師長的精神和他的人格所感召，因爲要貫徹他師長的命令，達成他師長所授予他們的任務，所以犧牲一切。」聽來這好像是褒獎。

但是余程萬苦戰十餘晝夜之後，屢次向上峰通電乞援不得，最後彈盡糧絕，率領少數官兵退出城外。及至新十一師攻入常德，尙發覺內有第五十七師所遺留的傷兵三百餘人。說至此處蔣揚言：「我現在還沒有親自審問余程萬」。但是「余程萬師長必交軍法審判」。並且「當時其他同時退卻的官長一律都要按革命軍連坐法來處治，決不寬貸」。讀至此處雖數十年後我們都爲余程萬擔憂。

因爲以後的紀錄再未提及此事，我曾特請在臺灣的軍界朋友爲我代查，據說檔案內無余程萬受軍法審判之紀錄。余在一九四九年任第二十六軍軍長，駐昆明附近。在大陸全部受中共控制時仍與蔣介石保持直接聯繫，以後經過緬甸脫出，曾往臺北。在一九五〇年間在香港被暴徒狙擊逝世。

這樣看來，蔣介石對付部下的方法無奇不有。以上摘錄之訓詞避免了嫡系與非嫡系間的糾紛，旨在保全官僚主義式之邏輯的完整。

據我所知：經他如此處置之案件不止一起。當秦孝儀院長授《大事長編》給我時，曾告訴我蔣至晚年，爲人更「慈」。用不著說，我完全相信。但也有人爲我說起蔣爲人不守法。作此批評的有美國人士和與他親近的黃埔第一期學生。我也知道此語有事實上之根據，在某些情形之下所說不虛。



沒有人在對處理余程萬的程序中能替蔣介石開脫。歷史家只能指出余程萬給蔣介石極大的困難。事實上他已將全師官兵犧牲於常德城內，在作戰效率上講，除了他自身一死之外，已替統帥盡了最大的職責，常德能及時收復，主要的由於第五十七師的堅韌抵抗，要是蔣介石再懲罰余，而且按連坐法的硬性判予死刑，以後誰替他如此認真作戰？然則余程萬到底也是放棄守土。一個部隊長之有倫理與道義上的威權賦予部下以必死之任務，端在情況變更在更高及更大之範圍內，部隊

奉公老長官鈞鑒：二月九日

大北暨所附黃仁宇博士原函均敬悉，特將此事，任本局業務部門查證有關檔案及戰史資料後，函覆如次：

一、余程萬將軍任57師師長期間，與日軍在常德會戰時，經歷慘烈戰鬥後，率殘部突圍，無軍法審判及定罪之記載。任以軍軍長時駐防雲南，政府曾委任其為雲南省綏靖主任（詳見附件二），後來該軍撤入緬境，余員就定居香港新界，遭賊人光顧時在槍戰中斃命。

大的範圍內，部隊

長本人也能作必死的表現。余程萬爲師長即未履行這契約。在另外三個師長殉職的情形下，最高統帥又不能置之不問。

蔣的處置可謂先硬後軟，或者是外緊內鬆。

他這時所受的壓力超過世界任何交戰國領袖之所感受。其他國家是勝是敗通常壓力來自敵方。即像軸心國家有內部叛變的情事，卻不像蔣介石既要對付一個武裝而帶仇恨的敵對政黨（見上述整肅國民黨特務分子處，詳本書三二三頁），又須顧及爲虎作倀之偽軍，更要防制部下之獨立與分裂。再者抗戰陣容內之民主人士亦躍躍欲試。在盟國之中，他可以引以爲友的唯有美國，也只限於美國之中經宋子文稱爲「友華派」人物，以羅斯福及霍浦金斯爲代表。及至一九四四年友華派亦不復友華，最低限度不復友蔣。所以至此蔣介石發覺他所對付的問題日益複雜龐大，他手中能控制之工具及資源則逐漸萎縮。

一九四四年二月羅斯福正式通知蔣，請准予美國軍方派視察團往「山西陝西一帶」巡視。此提議發動於當年正月，由戴維士之報告經過霍浦金斯而達羅斯福。蔣並未一口拒絕，只是藉辭拖延。他的日記裡卻有以下記載：「最近共黨對美國宣傳鼓勵干涉我國內政，要求我政府准美國派視察團到延安，實地調查真象。此次共黨政治攻勢，國內外互相聯絡，可謂最大最猛之一擊，非毅然拒絕並乘機予以反擊，決不能平息此風潮，貽患且將無窮也。」（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九日）

又有：「中共在美宣傳稱，我軍已不打日敵，而集中力量將攻中共，此與其去年宣傳我政府將投降日敵之手段無異也。可慮者，美國朝野已爲其宣傳所惑，信以爲真矣！」（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蔣對中共之長處與短處至此並未完全以己意抹殺或武斷，他已在提醒自己：「中共之獨裁方式，業已造成，而在陝北控制社會與生產，亦已見成效。惟在晉冀魯各淪陷區內以後只有發展其地下秘密組織，蓋民衆雖被其控制，但不能持久，只要我軍隊到達其地，民衆必歡迎我之解救也。即其對黨員與幹部之控制嚴密，如果我軍與之接近，彼等如遇有機緣，來歸者亦必多。故此後問題，惟在我本身之組織能否健全，與能否深入下層爲斷耳。」（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日）

以後看來此段所敘確適合當日情景，中共之成功，與其土地改革相始終。但此爲一種革命行動，等於將舊社會拖出開刀，並絕非一般民衆所能輕易貿然接受者。從日後美國人韓丁所著《翻身》及最近張正隆中校所著《雪白血紅》看來，中共首先要克復一般人「安份守己」和尊重於「正牌」的傳統價值而且又要將「解放區」與外界完全隔絕，尙且不惜使用暴力，運用威脅，方能以累積的方式邊打邊改完成。在過程中，布爾什維克式之職業性的革命家及流氓型的土幹都不可少。只因在長時間內土地改革見效，才使我們體會其在歷史上的實用意義。在短期間內，蔣介石之人本主義之立場實較易於接近於群衆。只是蔣所造成新的國家上層組織不能亦無意放棄其城市生活，即無從如中共一般滲透入鄉村中去。內戰又繼抗戰而起，雙方之動員更加壓力於現存社會之軀殼，使其改革更無從避免。戰時環境亦使中共之行動與外界更爲絕緣。這諸般情形都對毛澤東之籌劃與行動有利。當日我們身當其事，猶且不能領悟各事之實際意義，遑論及隔岸觀火凡事均難透過語言文字間之隔閡的海外觀察。

美國人士對中共感覺興趣，不可能謂之均出自思想與信仰之同情，有如史迪威即以爲中共運動爲一種兵員之來源。當Y部隊缺少補充兵時，他曾考慮以中共士兵二十人補入一百名一連之國軍內

去。遠征軍參謀長蕭毅肅即回稱不出兩週全連都會變成共產黨，因之此項考慮並未提出。只是當日美國大選在即，羅斯福企望對全國表示他之援華政策具有實效。如須將美國對德作戰後之陸軍再東調來華參戰，對美國選民不能討好，在此情形之下，國軍在鄂西及常德之犧牲，吸收大量之日軍，不能算是對同盟國之貢獻，反只是無效率的暴露。軍援中共部隊及胡宗南部隊參加對日行動，已有美國本身的利益之動機在。

蔣介石之一再推諉，經不過羅斯福之再三要求。一九四四年六月副總統華萊士來華。蔣於六月二十三日對華萊士同意美國派往延安之代表團。此代表團早已組織就緒，由以前曾往衢州視察之巴瑞特上校率領，最初下屬八人，稱爲「迪克西代表團」(Dixie Mission)，取其美國在南北戰爭時，南方諸州稱爲迪克西也。

毛澤東見巴瑞特時，謂國民政府業已「破產」，現臨「死前之掙扎」。但是中共仍不稱其行動爲革命，只稱組織聯合政府。中共又向團員各贈呢料中山裝制服一套，軍帽上仍綴青天白日之國徽，呢料由本地羊毛生產紡織，爲各人量身裁剪之工匠爲全國人民大會之代表。各團員及以後續到之美國通訊員，亦均購買呢料，並一致對延安所見好評不絕於口。各人在國軍區域中想見日俘總是無法見到，在延安一次就見到日本俘虜數百人。此間雖勞工亦閱讀報紙，陝北一處貧瘠的地區，經過改革，牲口蕃殖，五穀豐登。中共士兵則較在中國其他任何地方所見的士兵「穿得好，吃得好，也更「有精神」。延安雖有一種自得和只承認自己對和旁人不對的態度，但是「無抑制及鎮壓之感覺」。所以《紐約時報》的報導以「延安——中國奇跡地區之城市」爲題。

四十三年之後《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對迪克西代表團無一字敘及。



一九四四年六月盟軍在諾曼底登陸，蘇聯紅軍對德之攻勢有如掀轉地毯。美軍正佔領塞班島，不久即可以不用成都基地（因後者所用油彈均仍須由印度空軍輸入）而直接自太平洋轟炸日本本土。中國則面臨抗戰以來最迫切之一次考驗。

如果我們不計表面之徵象而考慮到事勢後之實情，則可以直接講出，蔣在此時早已不是領導全國抗戰。他所掌握的後方不外四川、雲南、廣西、貴州，等於向各省區領導人借來。其他各戰區如最多做到收支平衡時，他自己即須利用此西南一隅支持東西兩大戰場。東戰場之湘桂戰役爲日人發動之「一號作戰」之一部，西戰場則在滇緬邊境，包括史迪威之反攻緬北。中共雖派林祖涵爲代表在西安與蔣之代表商談，一面又「向河南敵後進軍」，組織「南下支隊」，這種種運動與正在作戰中之國軍衝突。

再從以後發表的文件看來，只有東戰場才是蔣之切身負擔。西戰場免不了受史迪威之人身影響。蔣介石於當年十月九日致羅斯福電云：「史將軍置中國東南成敗與不顧。甚至在已運入中國雲南之租借武器亦斷而不發，以致中國遭受如此不利之形勢，閣下須知在本年六月以前，中國內地全部之軍隊除雲南之遠征軍以外，並未有租借案之一鎗一炮也。」所以東西兩戰場之成敗，即象徵著兩人事業上之一種競賽。因爲國軍在西戰場勝利，東戰場挫敗，史迪威即因此根據，經過馬歇爾及羅斯福同蔣要索對中國全部陸軍之指揮權。

但此兩戰區之發展不能相提並論，目下敘述兩處戰役之文字甚多，尙缺乏一篇簡明之記載，道

出兩者不能相提並論之衷曲。



「一號作戰」之目的，在作戰計劃上稱在破壞美國在華之空軍基地、佔領京漢及粵漢路重要地帶，以「封殺其跳梁」。但其戰略之構想超過此範圍。自一九四三之下半年，日本即考慮構築一個「絕對國防圈」。一九四四年元旦，大本營之作戰指導方案已提出打通京漢與粵漢路，以備太平洋戰局更惡化時能藉陸上交通與南方軍保持聯繫（南方軍司令官寺內壽一元帥駐新加坡）。種村佐孝曾稱之為「遠大而悲狀之決意」。亦有日人預期即是日本本土被侵佔，亦因此可在大陸持續作戰甚至將作戰重點轉移於大陸。一號作戰以後共動員五十一萬人，超過日俄戰爭動員兩倍，所以被稱「互世紀之大遠征」。此戰役經過天皇裁可，預先又經過多次兵棋演習。在湘桂部分亦使用兵力逾三十六萬員名。其一部兵力抽調自關東軍，其礮兵之一部野戰補充隊來自日本本土。整個空軍經過改組，大部飛機來自東北。全戰役兩方空軍大致相埒，可能中美空軍稍佔優勢，但彼此可能出動之飛機均在二百架左右。參加湘桂戰役之第十一軍參謀長中山貞武少將事後回憶，猶稱此役為「曠古之大作戰」。

作戰準備之徹底尤使一號作戰無可比擬，有如飛機補充預定每月五十架，航空油料足夠半年之用，空軍彈藥足敷兩年之用。以後戰局展開，日本地面部隊則經常在局部佔數目字之上優勢。而日軍之兵站後勤，如使用馬匹六萬七千頭，鐵道部隊、汽車部隊及水上勤務部隊或調自本土，或來自東北，使國軍不能望其項背。

一九四四年初重慶即獲得對方在華中及長江流域有非常活動之情報，但以後局勢之展開仍出中

國軍事領導人之意外。主要的不同乃是過去日軍進犯慣用「錐形戰術」。亦即以機動部隊或中央突破或側翼迂迴之後，冒險深入，只預備一個星期左右之糧彈，每日計程的奔向擬奪取之據點，候緒戰成功擴張戰果。及至一九四四年的一號作戰日軍之奪取長沙，有如英國作家威爾遜(Dick Wilson)所述，日軍「來自指南針上之任一方，只有南方例外」。

緬北作戰出於完全一個不同的曠範。首先駐印軍享有數量上及火力上之優勢及絕對優勢。新二十二師及新三十八師長期在胡康河谷至猛拱河谷所對付的敵人，只第十八師團的兩個聯隊，並且空軍確實掌握著制空權，白天我們可以相信每一架飛機都是友機，補給也絕大部分全賴空投。從新平洋到密支那約不過兩百公里，攻擊前進卻費了八個月的時間，平均每日進展不及一公里。

這並不是說官兵懦弱，部署差遲。我當日隨軍作前線觀察員，即看到無數中下級幹部英猛沉著的情形，即在進展遲緩的情形下，也都無例外的做到戰術上之至當。士兵成日與死為鄰，長期缺乏休息，也能安之若素。以下我摘錄史迪威日記：

帶著孫(新三十八師師長孫立人)去看傅(六十五團團長傅宗良)。他還沒有進入瓦康。佔領了「日軍」陣地之一半。日軍命令死守。發現敵傷兵割頸剖腹而死。有日兵在戰壕內自縊死。據稱數有敵屍七十。回程遇著大量車輛，見著戰車連去瓦康，他們前進至六十六團第一營之前一千碼而損失戰車二輛。(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一日)

又是一個陰天。我們坐著發愁。「新」二十二師已死連級軍官五十七人。在這情形下不能催二十二師，也不能幫他們。這是地獄。約(史迪威之子約瑟夫，任中校情報課長)來陪吃晚飯下跳棋。

基督，我覺得一身無靠。（一九四四年五月二日）

其所以如此乃是受天候地形的限制，遇著頑敵，長處無從發揮。當時我曾替《重慶大公報》寫〈苦雨南高江〉（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日）一文，內有數段也可作為參考：

即是沒有野戰工事的地方，敵人也還是以散兵逐段抵抗且戰且退。但是每退至多不到一百碼。森林和叢草視界有限，以自動火器封鎖道路確切有效，我們要驅逐敵人，必須派出搜索，展開一部分兵力，沿道路兩側，擊破敵人的抵抗，前進數十碼又派出搜索，又再展開兵力……各級幹部如果希望進展比較迅速，或想戰果有些決定性，則必須以一部迂迴至敵後。無論團營連排各單位，多少總要竭盡手段施展一點全面或局部的側翼運動，也就是要伐路到敵後去。但是這種戰鬥方式仍舊很耗費時間，因為既要披荆斬棘，又要秘密企圖，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河谷兩側壁的山地，並沒有被我們放鬆。經常都有強力的部隊受人類的最大限度在懸岩絕壁上運動，企求使正面攻擊容易。他們所選擇的路線決無道路可循。地圖上所標示的村落事實上都不復存在。他們必須攜帶全部行李輜重，他們必須自己在叢林內開天劈地，爬上兩千呎的一座山，下山，又再爬一座三千呎的高山。他們隨時可以在山頂山麓或山腹遇到敵人。就我所見到的丁克老緬而論：四月杪我軍爭奪這村莊一帶高地，我們攀登那七十度以上的陡坡時，簡直是四肢交互找著樹根枝葉連拖帶爬，剛到山頂，滿以為下坡可以少吃一點力，不知下坡還要困難。坡度還陡，全身的裝具使重心太高，腳底下的叢草滑得可怕。我想伙夫登山送飯，我想著雨天在這裏行軍的時候，就覺得戰慄。這時候山腹內還常常發現小股敵軍東西流竄。及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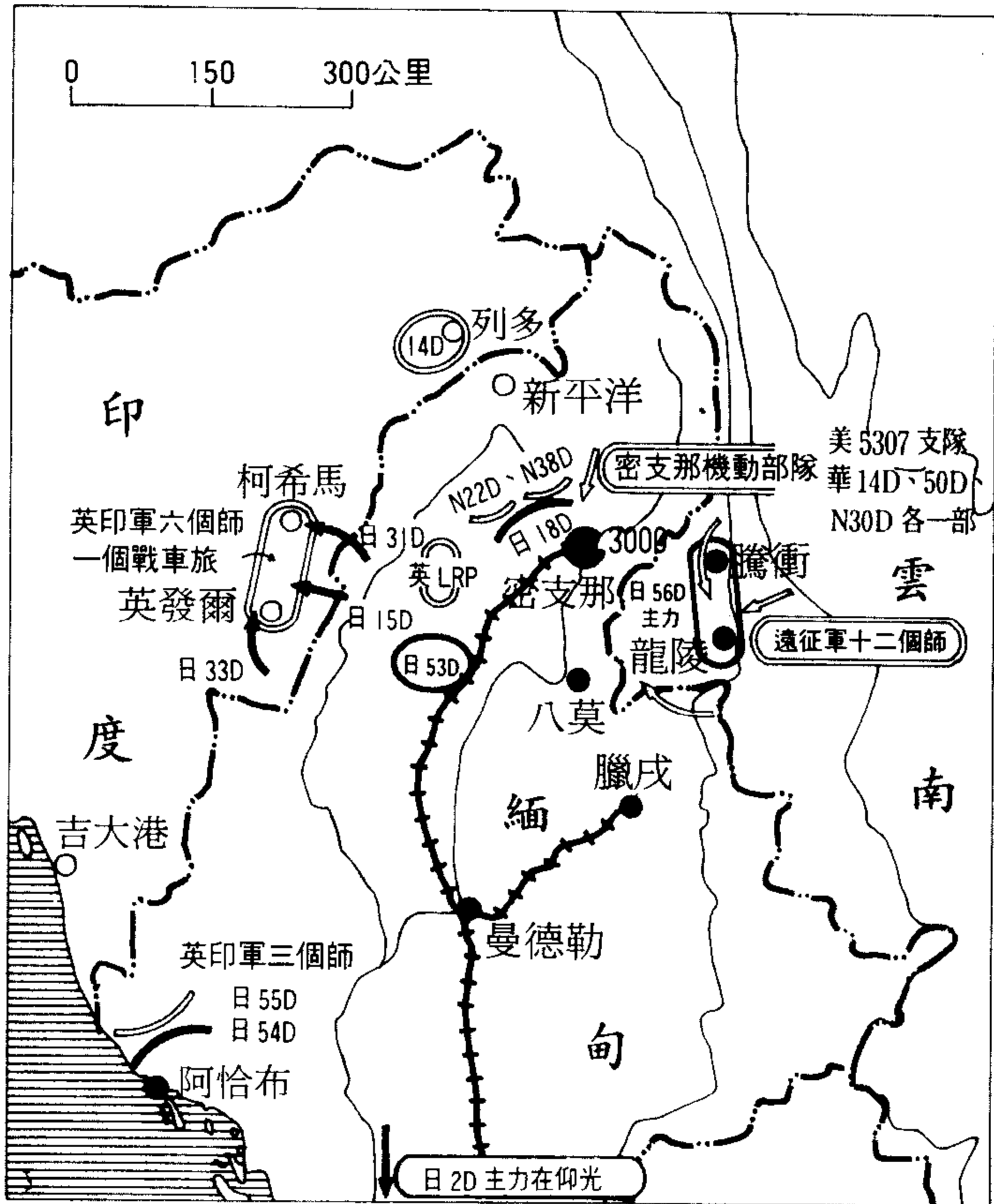
到達陣地，叢草拂面，只聽見左近鎗聲零落，看不到一個敵兵。

現已發表之蔣日記無針對駐印軍作戰事。只是我們知道缺乏英軍登陸仰光，他深不願在東戰場吃緊時又在西戰場冒險。四月二十二日鄭州失守，二十四日邱吉爾聞遠征軍亦將入緬來電預祝成功，實際則是緬北日軍三師團進犯印度，各方催中國出兵。蔣只在日記寫出：「際此橫逆疊來之時惟有整軍圖強，故告誡各將領謹慎從事，忍耐謙抑以冀挽回頹勢，竭盡職責也。」（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蔣介石所說的「忍耐謙抑」和「謹慎從事」正是史迪威蔑視的地方。此間差異由於兩方文教習慣之不同。可是一九四三年年底史發動駐印軍在緬北的攻勢，未及慎重的判斷敵情先暴露了自己的企圖，確是一種冒險。駐印軍沒有像第一次緬甸戰役那樣的吃虧受損，可謂走好運，因為對方尚有一個更不謹慎而更愛冒險的將軍在。牟田口廉也中將，日軍第十五軍軍長。七七事變時為聯隊長，在盧溝橋為吉星文之對手；太平洋戰事爆發後，以第十八師團長的資格攻陷新加坡，在日軍中向具威望。一九四三年九月見史迪威所統率的駐印軍向新平洋一帶窺視，而英國之長距離游擊隊（Long Range Penetration，簡稱LRP）又活動於更的宛河上游，可見盟軍進入緬北乃遲早間事，於是構想出
來一個以攻作守的觀念。如果日軍節省兵力對付中國駐印軍及遠征軍（以後如是部署只以第十八師團抵擋駐印軍第五十六師團應付遠征軍），大可以用第十五軍之主力進犯印度。印東重鎮英發爾只有公路一條

第二次緬甸戰役示意圖
(1944年5月，根據中日英美資料)



北通後方，如在柯希馬附近將之截斷，則英發爾不難攻下。從此印東可以無抵抗，日軍可以進出於亞薩密省盟軍基地，此處乃空運中國之基地，也是駐印軍與遠征軍補給之中心，如果在此獲勝不僅可望將緬北盟軍囊括，而且可以激動印度人之獨立運動。

此提議送呈東京時，曾由參謀本部作戰課長綾部橘樹往印緬交界處實地調查，認為地形不許可（所採取路線為第一次緬甸戰役時史迪威及孫立人入印路線）。但牟田口使凡反對

者皆他調。一九四四年一月，其計劃經過東條英機核准，如運輸困難則以象及牛運，運完即宰食牛。林三郎書中云士兵曾訓練食草。東條以爲此戰役之結果可以改變整個戰爭之態勢。

此三個師團於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出發，攜有三星期之供應彈藥。如此大部隊之行動無法全部掩飾。英印軍在國境地區者三個師，於是縮短防線，將前衛部隊撤回，準備固守柯希馬至英發爾之平原地帶。此地區之防禦作戰因數事與蔣介石發生關係。一爲蒙巴頓認爲英軍作戰已在非常緊急狀態，需要將印度以汽油物資空運中國之美機截用，增援英發爾之三個師。二爲史迪威正向瓦康推進中，他深恐列多根據地危險，他於三月二十九日飛重慶謁蔣，請准調在昆明附近之第十四師及第五十師飛印緬，編入駐印軍之戰鬥序列，以後英發爾局勢穩定，史將兩師之各一部編入攻密支那之機動部隊。三即因緬北情勢變化，英美敦促中國遠征軍向騰衝、龍陵出擊。我們要記著此時日軍正在華發動一號作戰，以上三事無一不拂蔣意。他終於四月二十五日令遠征軍總司令衛立煌渡怒江出擊。但是史迪威仍在日記裏埋怨。他寫著：「沒有人對『緬甸』戰役感到興趣。」（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更有一段：「赫恩 [Thomas Hearn] 少將，史駐重慶之參謀長」來電，報告羅斯福致蔣最近一段電文：「讓我們裝備訓練Y部隊之後，不能出擊，『實在是』不可思議。」（一九四四年四月十日）

這時候蔣介石只覺得唯有陳納德才可以和他共事。他寫下：「彼對援華蓋竭其精誠也。」（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但剛寫下上段，第十四航空隊出發轟炸黃河鐵橋，三次均未見效。最後一次因氣候不佳折回，沿途將炸彈拋棄，誤傷中國民衆，蔣日記云：「此事殊爲可痛，國無實力而借助於人之痛苦，竟如是耶！可不力圖自強乎！」（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兩日之後許昌失守，第二十九師師長、副師長及團長二人同日殉難。敵方打通京漢鐵路之企圖已成事實。一號作戰尙待繼續者爲次階段之湘桂戰役。



牟田口之攻路至四月而達到最高潮。第三十一師團已將柯希馬包圍攻入市內，又將英發爾之公路截斷。但英印軍之空運增援，不久即兵力增加一倍。從北向南攻之生力軍於四月十八日使柯希馬解圍。日軍已感到糧彈不繼，其空投計劃則因英之LRP部隊在後方困擾無從實現。牟田口仍不服輸，使其部隊再纏繞不放兩個月，在此期間更將第三十三及第十五兩師團長撤職，第三十一師團長佐藤幸德則抗命自動撤退後受軍法審判。及至七月九日日軍司令部下令撤退時已至雨季最高期，各部隊乃潰不成軍將武器拋棄，據生還者云傷兵眼鼻生蛆，各兵稱退路爲「靖國街道」（即其靈魂入供神社之道路）。戰後日方紀錄云三師團戰死三萬人，傷病四萬二千，殘存不及原額十分之一。三個師團長一體解任，尤爲日本歷史從來所未有。但全戰役英美空軍出動近三萬架次，幾與地上部隊行動相埒，也少有人道及。

對盟軍言，至四月之後，日軍在緬之九個師團之位置，及以後作戰能力才全部暴露。

迄此前史迪威之部署雖已將蘭伽訓練之成果在戰場上表現，並鼓舞國軍官兵之攻擊精神，但缺乏戰術上任何特殊光采之表現。英發爾戰局穩定之後他有了在這方面發揚的機會，此時駐印軍不僅有國內新調來之兩師，在蘭伽訓練之新三十師亦有兩個團可使用。美軍之五三〇七支隊三千餘人由太平洋諸島曾參加森林戰之士兵志願來緬服務者組成，擅長於敵後活動。於是史以此支隊爲先鋒，

以第五十師及新三十師之各一團爲基幹組成密支那機動部隊。四月二十七日從現地出發，向東翻越高達六千呎之山脈，奇襲此緬北重鎮及鐵道終點，預期兩星期後，取得密支那機場，以空運將後續部隊輸入。

以上所述全部照計劃做到。敵後行軍逾百餘公里了無差錯，保密不誤，支隊行至山麓，密支那已在眼前仍能休息二日，山谷內火車仍照常行駛顯示敵方毫無戒備。五月十七日奇襲開始。飛機場只有敵軍一小隊，即被一五〇團迅速殲滅，增援部隊早已在印度機場待命，數小時後飛機及滑翔機已在密支那降落。

而此後密支那敵軍持續抵抗八十日，使盟軍死傷超過五千人。引起蔣介石與史迪威之嚴重爭執，牽涉多種原因，美方資料一致指第一五〇團缺乏戰場經驗，進入市區後各營以友爲敵，互相開火爲敵所乘。其實此不過一時局部差失。其重要缺點仍在指揮系統及參謀業務，指揮部之計劃著重奇襲行軍，奪取機場，及空運增援，而忽略進入市區後之作戰及搜索警戒。並且敵情始終不明。最初眩惑於奪取機場之輕舉易得，判斷城內敵軍爲數無幾。及至對方抵抗堅實，則又誇大其辭估計其兵力超過五千或甚至七千。至此史迪威迅速將第十四師之第四十二團亦空運輸入，一週之內盟軍之實力，已超過兩個步兵師。但飛機場去市區邊緣不逾二公里爲所有部隊之後方根據地。結果則地區侷促無法展開，人數過多無濟於事反使指揮困難。

第五十師與新三十師各有兩團在密，師長潘裕昆及胡素事前未預聞密支那之奇襲計劃，臨時奉命倉皇就道，兩人只各有隨員三數人，而且又互不相屬，在最初極緊張之局面下無統一之指揮官。兩週之後史迪威以衆所不悅之柏德諾爲指揮官。最初英軍之LRP部隊亦已到達密支那，部隊長自

願參與攻城，史迪威拒而不用，只令之擔任戰場警戒。及至攻密頓挫又派英軍以艱巨任務，引起英人抗議。

史迪威之日記有：「趕著柏德諾去淋水浴〔暴露於戰場之大雨〕，他叫喊著而抗議著，對他說不許爭辯。」〔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麥里爾〔Frank Merrill少將〕來電，路易士〔蒙巴頓〕要撤我盟軍副總司令職，已與馬歇爾接頭。接代人爲魏德邁或蘇爾丹。天啦！被逐而讓魏德邁得勢——那才是羞恥，如果實現也是鬆一口氣。」（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戰後各情大白，才知道守密支那的日軍最初不過第十八師團第一一四聯隊之兩個大隊欠兩個中隊，應當不過一千餘人。但是五月底，已由第五十六師團增援，但總數仍不過三千餘人，當時第五十六師團已受滇西國軍攻擊，而仍能派兵增援者，據猜測因日方對英發爾之攻擊仍抱有希望。五月中旬，東京已接得該方面不利消息，東條英機不許發表，只希望咬緊牙關，得竟大功。第五十六師團步兵指揮官啣命增援密支那時，志在死守，以後他也確於盟軍入城前自殺。

在雨季之中以數千日軍抱必死之決心，又據預築工事頑抗則只有使攻擊部隊感到棘手。況且駐印軍至此又無裝甲兵支援，空軍之活動則受氣候限制，再因第一線距離過近步炮協同亦鮮功效，而且火力亦不夠。總之密支那之攻略全賴出奇制勝，不能一舉而竟全功，則已弊多利少，而又騎虎難下。日兵依著他們特殊的宗教觀念，有超過我們入世標準的人身上之勇敢，人人如此彈不虛發，其殺傷過當也就是指望之中的事了。據說戰後仍有密支那日兵數百突圍，但綜合報導之書籍，只稱其全數戰歿。有如林茂著《太平洋戰爭》之結論稱：「善戰的第十八師團對米華軍抵抗又接受到第五

十六師團之救援，在密支那死鬥八十日後全滅。」

滇西遠征軍所遇困難則又過之，從五月十日渡怒江的Y部隊號稱十二個師，長期與之對峙的似僅有日軍之第五十六師團，看來也是不成比例，但是Y部隊一般人數每師無逾六千人，其補充兵係經過美國軍醫挑選送駐印軍後不合格之剩餘，而且又大率只為步兵。日軍已盤踞此地兩年餘，居高臨下的築有永久工事。國軍每次攻堅，戰事洽當雨季開始時開始，至雨季結束猶未結束，惟一有利條件為氣候許可時得有美空軍作戰術上之支援，規復松山時國軍之第七十一軍之一部及第八軍主力攻擊九次費時三月，至敵軍步兵一大隊炮兵一大隊全部被殲滅為止。瞬息此戰鬥逾半世紀，最近旅遊者巡視該地猶謂當年戰迹歷歷可數。國軍攻騰衝時因美機轟炸城垣方始入內。

但以後逐街逐屋之爭奪亦費時一月，多時國軍官兵陣亡於日軍胸牆之前，距離僅咫尺。

英國官方戰史盛讚日軍第五十六師團長松山祐三，擅於發動內線作戰之長處，能使小部隊獨立作戰，國軍則動作遲緩。又述及某部隊因給養分配不均憤而將在敵後路障撤去，但因未述明部隊番號無從查考或證實，惟即據英方資料亦稱日軍作戰者不止第五十六師團。戰事後期第三十三軍軍長本多政材已獲得大批援軍，當即決定於九月初發動反攻，擬以第五十六師團為左翼，第二師團為右翼，並以第四十九師團之一部為預備隊沿滇緬公路東犯。惟正在準備時騰衝與拉孟（臘猛）之日軍已被國軍殲滅殆盡，餘存部隊只原額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之間。日軍仍於九月三日發動總攻擊，但已無能為力，剛開始時即已攻擊頓挫，至十五日停止，原據有各處據點均於此期間被國軍克復，日軍俱全員戰歿。自此可以想見，除非據有所述永久工事死守，日軍並未如想像之英猛無敵。

何以希望掌握大歷史而要牽涉此中如是之細節？以上情事前係左右上下相關聯，天候地理人

事，敵方戰法我軍實力亦此盈彼缺。此中含糊之處，正是盟國間爭執之來源。史迪威對蔣指摘重點在蔣規避作戰。第二次緬甸戰役之前曾與蔣爭辯。蔣謂日軍在緬有八個師團，史則堅謂只有五個，因此謂蔣執拗，已寫入其日記（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戰役揭開後證實原有九個師團（第二、十五、十八、三十一、三十三、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後又增入一師團（第四十九），共十個師團。

一九四五年一月中印公路方始通車，而五月英軍即攻佔仰光。其所以如此，林茂寫在《太平洋戰爭》乃因一九四四年緬甸方面軍已折兵二十萬。蔣介石從未以為怒江西岸作戰為勝利。他一面要部下查報有功官兵核發勳獎，一面卻又在日記內寫出：「霍揆彰軍（第二十集團軍）之攻騰衝，歷時三月餘，死傷五萬餘，卒得光復要衝亦足於失敗中以自慰也。」（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六日）

他所謂死傷數，甚可能包括各部隊虛報之陣亡以掩飾戰鬥前之缺額（見以上常德戰役）。但縱如是遠征軍之損害必仍屬可觀。有了以上的資料我們可以看出：第二次緬甸戰役發動前蔣之猶豫，他不願將駐印軍及遠征軍犧牲，非無實際上之原因。美方則不願只替蔣介石裝備訓練軍隊始終備而不用。



今日我們讀分析法所處理的史料，很難想像當日蔣介石切身感受內外煎逼的情景。一九四四年東西兩戰場之戰事同時發生。四月二十五日蔣令衛立煌渡江，鄭州則於二十三日失守。華萊士於六月二十日到重慶要求蔣允許美方派迪克西代表團去延安，長沙即於先兩日亦即六月十八日被攻陷。史迪威之駐印軍於八月四日完成密支那之佔領，而同日方先覺則在衡陽初報「救急」繼報「危急」終報「不好了」，蔣之紀錄是夜不能安眠，晨一時即起床禱告。而且蔣當日主持戰事與今日我們所見

不同，敵陷洛陽他即恐怕西安危急。湖南戰局緊張他又要考慮日軍由江西腰擊的可能。

在這同一期間在外蒙之蘇聯軍隊與新疆駐軍衝突。林祖涵仍與政府代表王世杰、張治中談判，但提出立即實施憲政與賦予共軍五個軍十六個師之要求，對政府提示案則拒絕接受。

在這期間，蔣曾主持國民黨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二次全體會議（五月二十日）、全國行政會議（五月二十九日）、國家總動員會議（七月五日）、整軍預備會議（七月二十一日）、黃山整軍會議（八月四日）、第三屆國民參政會會議（九月五日）。看來這些活動，無一產生實際成果，中國之社會不能改造，則上端之高層機構本身無從產生新生的力量。這些會議最多亦不過替現有的官僚組織吹說打氣，而在形式主義的情形下，為效愈微。蔣及國民政府的高層機構之功能大抵無非人事派遣與徵兵收稅。這些力量一部出自蔣之人身上的威信，而大部仍靠軍隊維持。抗戰已逾七年，國軍不僅戰力每況愈下，而且內中已有離德離心的趨象。在特殊情況之下，軍閥舊部孫良誠和龐炳勳業已降敵，這是抗戰初期不可想像的。從蔣處理各事的情形看來，他的方略只在督勵部下，希望能將戰局再支撐一兩年，此外別無他法。此時他給部下的指示已不是冒險犯難，而是「忍耐謙抑」和「謹慎從事」，也出於這種想法。

在十二中全會閉幕時他在日記中寫出：「此次會議自二十日起至本日止，計共七日，竟能在河南戰事危急，外交局勢不利，經濟危機嚴重，共黨危脅特甚，本黨內部紛歧之中，茹苦飲痛，持志守約，渡此一關，故結果當屬圓滿。」（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他所謂「持志守約」，乃是由於對日作戰並非他一人之決策。他從未說及此種事業容易，當初學生遊街，部下脅迫，敵黨請願，愛國人士說得義無反顧，他才毅然接受這艱巨的工作，並且提出「地

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均應抱定爲國奮鬥之決心，與敵作殊死戰」。所述並非改造社會，創造戰時體制，而是精神勝於物質，人人咬緊牙關救亡圖存。所以在他看來，無形之中，他與全國國民已訂有一種國民公約。

可是蔣縱能對付國內黨內的質問，已經不起盟邦之逼迫。一年之前，羅斯福仍能體貼中國是一個中世紀的國家，但有擔任現代國家之職責的宏願，所以不計目前短處對之刮目相看。一年之後戰事愈接近日本本土，戰場上之要求愈爲現實而無從推諉，羅對蔣的態度也愈多切責。這種情形表現於蔣日記，有如：「半年以來，美國態度不佳，此乃革命外交得失必有之過程。須知今日之失利，實爲以往外交勝利之結果。安知他日最後之勝利，非自今日失利之所生耶！凡事得之不足喜，失之不足憂，況外交全賴實力，決無感情可言。此時除積極圖謀自立自強，與立定不求不倚之志節以外，別無其他挽回今日外交與軍事頹勢之道也。」（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宗教信仰與哲學思想同爲蔣介石內在力量之來源。我們站在唯物的立場看著他身爲統帥，猶抱著唯心的宗旨，不免認之爲迂闊。其實他從未在任何情形之下，完全拋棄現實。他的經常辦法是先從抽象觀念之中把消極的形態，說成積極，使他自己得到慰勉之後，再對付實際的工作與情況，有如他在日記裡檢討一九四四年五月之所述：

（一）古人以身苦心樂爲修身養生之道，今余終日身勞心苦，毫無快慰可言，而又強顏悅容以

應世，不亦殆乎，但終身有憂處，終身亦有樂處。天下無易事，天下亦無難事。凡事有敗必有成，亦有成必有敗。今日認爲惡因者，或適爲他日之善果。而今日所獲之惡果，在昔日反認爲善因者。以此證之：無事不在矛盾之中，並無絕對之善果也。是在反求諸己而善運用之耳，何自苦乃爾。

(二) 上月爲外交逆勢最劣之一月，本月則爲軍事逆勢開始之一月。於政治、外交、軍事等之處置，獲一難得之經驗，此乃上帝使我動心忍性，自反自制之良機。余不僅不以爲悲，而反增我自立自強之決心也。

(三) 患難危急之來，惟有在己者可恃，而在人者尤其外援更不可靠也。若有私毫依賴之心，僅無補於事而且成爲他人之奴隸矣！此時除求其在我，力圖自強以外，決無其他挽救之道。

(四) 豫長水鎮敵寇之戰車，完全爲我中美聯合空軍所擊燬，於是其佔西安之野心亦被我阻遏，此乃大局轉危爲安最大之關鍵。美國空軍之援助，未始完全無效耳。

(五) 豫戰未完而湘戰又起，敵寇既打通平漢路，其勢必企圖再打通粵漢路，以確立在東亞大陸決戰之基礎。當此嚴重局勢，美國對於已存儲在成都之區區空軍油料猶靳而不予以濟我燃眉之急，而兩召史迪威，亦避而不來，惟陳納德竭誠援華爲可感也。（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他所提到的空軍油料，當中亦有一段周折：迄至一九四四年上半年，印度空運來華物資仍不過

每月一萬噸至一萬二千噸間。反攻緬甸又使此數一度降低。來華之前此噸位已預作分配，其中絕大部分用於空軍，約佔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用於陸軍者不及二千噸，內中每月數百噸為製造輕兵器械彈之原料，發交俞大維之兵工廠，餘悉數交駐雲南之遠征軍（Y部隊）。一號作戰轉移至湘桂，陳納德提出每月需一萬噸之供應，方能給地面部隊適當之支援。他此時已有每月八千五百噸之供應，其他一千五百噸必須商借於駐成都之遠距轟炸部隊，即B 29所用之油彈。

從戰後日方資料看來，湘桂戰役之初，中美空軍未能給予敵方至大之損害，實為莫大之失策。此時日軍集結九個師團又四個獨立旅團並特種兵及後勤之船舶器材於待開進地區，實已構成無數顯明目標。此機緣令之錯失。而日方則稱，自開設第五航空軍戰鬥司令部以來，即以「主力對華中華南而尤以西南支那米空軍捕捉殲滅從事」。五月份內曾先後空襲衡陽、零陵及遂川之美空軍基地。在緒戰開始時，即轟炸長沙之無線電台及軍事設施，在汨水曾將滿載國軍兵員器材之舟艇擊沉。在洞庭湖及湘江作戰時，對水上部隊作進路之「誘導」，對「軍之作戰指導作有重大貢獻」。此外「陣地施設爆炸」，「重慶軍大縱隊發現」，「阻止退卻重慶軍之脫逸」均具有輝煌戰功。表示已確切的使用制空權。

及至六月五日，戰局失利情況危急之後史迪威方往重慶與蔣商談，經他向華盛頓申請之後，美方允許將上述空軍噸位每月一千五百噸暫讓與陳納德，並將在印之重轟炸機一部暫作運輸機用，每月增加運量二千至三千噸。蔣及陳納德央請將B 29亦用於湖南戰場則被華府拒絕，其理由為「徵之歐洲經驗，僅有空中之打擊，不能遲延陸上攻勢至相當可觀之程度」。史迪威接電後立即覆電：「來示奉悉，這也恰是我之希望。你已經知道，我對空中力量給地面部隊之打擊不存幻想。只因委座之

壓力才發出前電。」他與陳納德之競爭在中國之領導地位至此已為眾人議論，雖英國資料亦在提及此事時道出。

但是陳納德並非置地面部隊之需要於不顧。亞爾索浦此際任陳之隨從副官。他的回憶錄裡說及他自己即以陳名義擬為中國陸軍求援之電文多件致史迪威。但史長期駐緬甸，他的請求等於「口頭傳喚，通過陰悶的大沼澤地帶」。雖說亞爾索浦並未一直袒護國民政府，同一段內他即指摘重慶之貪污無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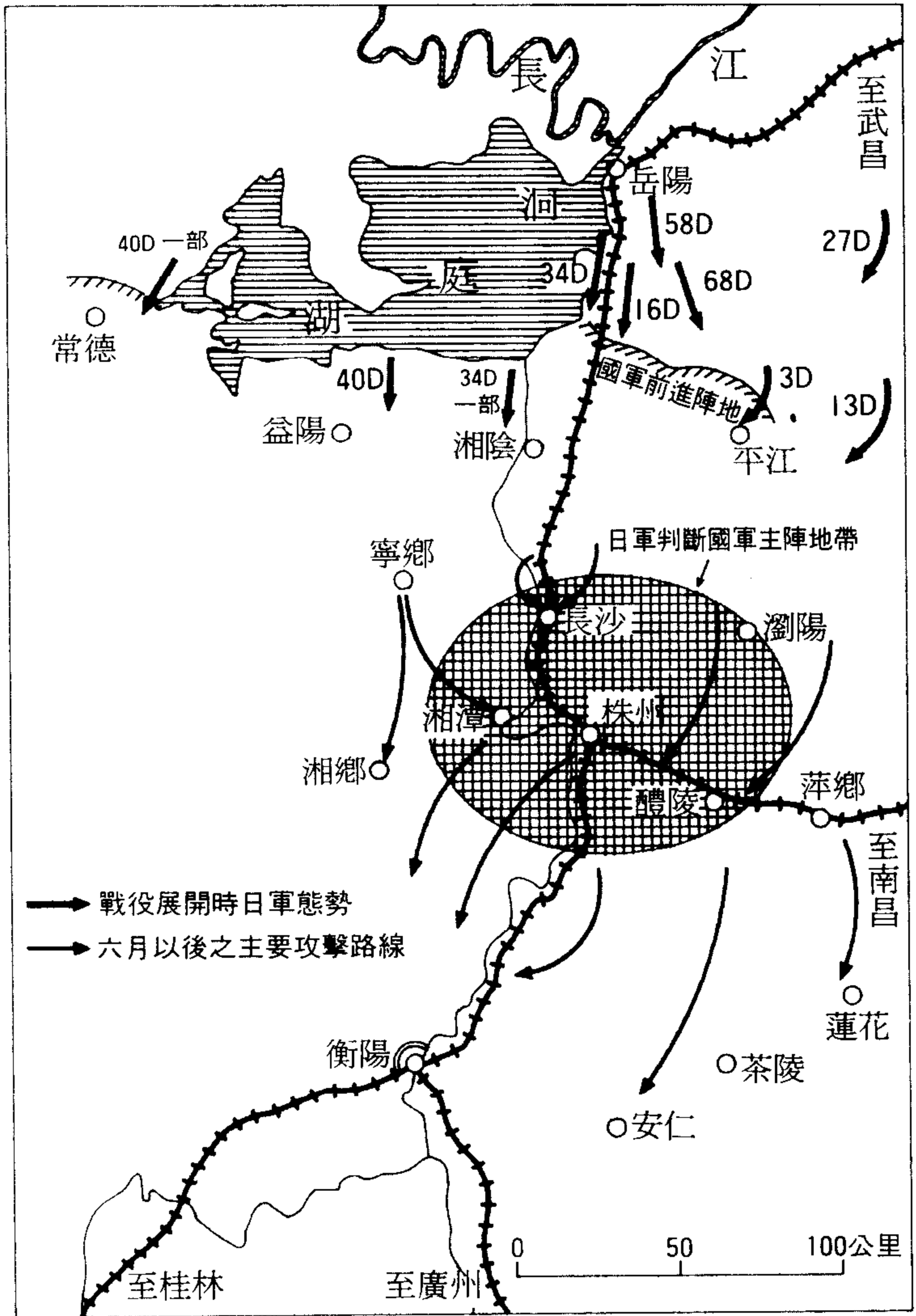


從戰後發表的資料看來，國軍在一九四四年對付日方之一號作戰，在湖南應戰實處於極不利情形之下。日軍之一個師團附有特種兵及後續部隊等可能多至二萬五千人以上，此次每師團併軍屬部隊之「師團拆分」(division slice)多至四萬人。國軍則一師通常不過六、七千赤足孱弱之士兵，全國之三百個師，僅有步鎗一百萬枝。後勤機關及後勤部隊只聊勝於無。白修德所敘應指此段時間。他說：「這軍隊能與日軍對陣六年是有關於它的奇事之中最特殊傑出之一點。要想它能實際打勝仗那未免期望過度。」當時他和我們都沒有看出：和一個現代國家的現代軍隊作殊死戰，不能立即提陞中國為一個現代國家，可是這已構成中國走向現代國家的旅程中之初步，此是後話。

針對當日戰場實況說，我覺得要使國軍能作有效抵抗的話，首先即如上說應使用空軍對敵集中的人員物資徹底轟炸，即使不能盡殲滅之效，也須攪亂其兵力部署與作戰計劃。此計未售，則當使民間力量對其後勤機構不斷襲擊。是役日軍司令部及通信機關駐屯於民間農舍，兵站勤務通過山地，

日軍攻略長沙衡陽示意圖 (1944年5月至6月)

根據日本防衛廳戰史室《湖南の會戰》



(國軍尚有64D一部配屬作戰，圖上未列入)

供應彈藥給養之帆船漁船溯湘江而上，野戰重砲（十加，十五加，十五榴）全賴水運，岳陽至衡陽間陸路三百四十公里，水道七百二十公里，如中國民衆預有組織，對方不可能如此通行無阻。可是提及動員事關社會體制，本文已前後約略提及，以下尙待從長檢討。

此戰役與以前三次湘北會戰不同，以前敵以佔領長沙爲目標，使用兵力約三個師團及特種部隊，戰事限於湘江之東，水道未發生決定性之作用，國軍在前線迎戰之後，即退至側翼候敵錐形作戰攻堅不克始三面合圍。尤以第三次長沙戰役（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在岳麓山之炮兵發生奇效，爲戰局之轉捩點。

一九四四年之戰役，日軍自始即以衡陽爲目標，其軍隊區分具有第二線兵團，對國軍之側翼進出，則已準備局部迴轉包圍殲滅，如以後攻瀏陽時則先進至縣城東南。攻擊前進地區包括湘江西岸。第十一軍之九個師團先保有一次會戰之軍需品十三萬噸，徵用僱用民船二、五〇〇艘，此項船隻即有一萬噸之輸送量。其糧秣有四個月之準備。軍用物品自汽車至軍靴均可在戰場修理。

長沙於六月十八日失守，但湘潭在先一日被「無血佔領」，瀏陽近郊亦已發生激戰。守長沙之第四軍被敵第三十四及第五十八師團暨第六十八師團之一部分段攻擊。根據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事後呈蔣電（七月六日），敵軍人數與第四軍比例應爲三比一，對方又以一部由湘江輸送，並挾有重砲。第四軍軍長張德能則又臨時被迫抽調一部守城兵力增援岳麓山，十八日更遭日機三十餘架轟炸掃射，此點已由日方文件證實。美機則只炸沉運送砲兵之船隻與彈藥。中國文件稱日軍施放毒氣，查戰後日方文件證實日軍作戰曾在不同地區施放毒氣並及於細菌戰，惟亦有中國士兵錯認敵施放煙幕爲毒氣者，現我批閱之文件不及一一對證，容日後歷史家查考訂正。戰鬥至最高潮時日軍奪得岳麓

山之制高點向下俯射，經行山麓之部隊亦包抄至國軍側背，「軍心動搖，遂難掌握」。長沙城繼岳麓山陷敵。張德能收容得該軍殘餘一千三百餘名，雖經薛岳解釋戰役經過，並有副參謀總長白崇禧請求從輕處理，仍終由蔣指示鎗決。

日軍獲得初期勝利之後，即以爬梳的方式通過正面約二百公里的地帶。舉凡湘鄉、衡山、株州、醴陵、萍鄉、蓮花、攸縣、茶陵、安仁無不侵及。從日方戰後發表的回憶錄及感狀（部隊長感謝部下作戰時特殊貢獻之書狀）等文件看來，中國官兵不缺乏個別的及局部的英勇事蹟，但極少有有組織和有效率的抵抗，六月中旬國軍曾一度反攻醴陵未具成效，以後則只有方先覺之第十軍在衡陽之守城戰。從各種跡象看來，國軍之統帥部及戰區估計敵情錯誤。各方雖對一號作戰抱有預感，然不料對方有如是全力進犯永久佔據之決心與準備，仍以爲可以據長沙爲核心堅守也。事後看來如自始即決心在湘江兩岸以部隊梯次抵抗，循環後撤，且戰且退，迅速將敵之補給線拉長，其全般防禦似較有出路；然則國軍根基脆弱火力低微，缺乏機動性，後勤馬虎，終難與二十世紀之戰爭機器抗衡則無可否定，美國空軍之投入則過遲過少。日方紀錄稱其死傷數內百分之十，出自美機之行動，若干部隊不敢白晝行軍。然則在衡陽攻城戰日機仍在陣前上空活躍。雙方亦迭有空戰。所以此亦爲湘桂戰役不能與緬北戰役相提並論之又一明證。

六月二十日，亦即戰役不及一月，日方發表國軍「遺棄死體」三五、四〇〇具，日軍則只陣亡一、五〇三員名。我雖然相信國軍損傷遠較日方爲大，但對此種無例外的超過二〇比一的陣亡數不能具信心。尤其我自己因葬父，曾於一九四二年一月返長沙東鄉，當時正值第三次湘北戰役之後戰場尙待清掃期間，即知道兩方死傷數無從確切統計。再則日方報告尙有「戰傷」及「戰病」兩項，

如加入計算，日軍所受損害亦超過九、一〇〇員名，似較切近事實。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正值盧溝橋事變七週年，史迪威之助手費立士(Brigadier-General Benjamin Ferris)謁蔣委員長面交羅斯福電文一件。以下乃《大事長編》所載之譯文：

自日軍進攻華中以來所形成極嚴重之局勢，不僅使貴政府感受威脅，且使美國在華基礎，同受影響。倘欲挽救危局，余意應責成一人，授以調節盟國在華實力之全權，並包括共產軍在內。余深知閣下對於史迪威將軍之感念，但余以為彼之優越之判斷，以及其組織與訓練之能力等，業已有所表現，在華軍作戰方面，此尤為明顯。余正將史迪威晉升上將，並建議閣下將彼自緬召回，置彼於閣下直屬之下，以統率全部華軍及美軍，並予以全部責任與權力，以調節與指揮作戰，用以抵抗敵人之進佔，此應請閣下速予考慮者也。余覺中國已瀕於危境，倘不立即實施激烈敏捷之補救，則吾人共同目的，勢將受到危險之挫折……（原電日期為七月六日，華盛頓日期）

幕後發動此通牒之人無非史迪威本人。他在七月二日致史夫人緘內云：「中國情形至為黯淡。要是能到陸軍部叫嚷：『我早告訴過你』，那也不失為一快事。但是我想他們已不言自喻，這是去年五月我的文章，不過那時候我孤立無援，那時候空軍裡的小子覺得他們能用飛機把日本人趕出中國而把我甩在垃圾桶裡……」

他又在日記裡寫著：「將關於中國危機致喬治·馬歇爾的無線電文發出。密支那無消息。雨。」

（一九四四年七月三日）

檔案中發現他所稱致馬歇爾電文內有：「假使總統能給他（蔣介石）一件措辭極爲強硬文信，著重我們在中國的投資與權益，並且中國忽視陸軍所產生的嚴重情形，再且急切的情況需要急切的拯救，委——長可能被迫給我以指揮之職位。我相信中國軍隊會接受我。」

數日之後他又在日記裡記下：「FDR及蔣介石電文，喬治·馬歇爾給我電文。他們把我向他大爲吹捧。FDR叫蔣介石授我全權擺佈場面。升爲上將。」（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事實上羅斯福致蔣電由陸軍部擬稿，羅一字未改即簽字發出。

蔣的日記卻有如此之記載：「本日爲七七抗戰七週年紀念，美羅斯福總統雖仍來電祝賀，不料又突來一電，即以中國戰局危急，欲派史迪威在我直屬之下指揮中國全部軍隊，並以一切租借物資置於史支配之下，言明共黨軍隊亦在其內；余於此不外拒絕，接受，緩和之三種方針，以爲應付之道。後來決心以緩和處之。國勢至此，若不自立自強，國家民族亡無日矣，今日之事，惟有奮鬥圖強方能挽救也。」（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

他所謂緩和，乃是不一口拒絕，亦不全般接受，只希望繼續拖延，將接受的條件之實際負擔減輕。他所謂奮鬥圖強，則寄望於方先覺所統率的第十軍，希望他們能在衡陽打一個勝仗。

七月八日他回復羅斯福：「閣下所提史迪威將軍在余直屬之下以指揮華軍與美軍之建議其原則贊成。但中國軍隊與政治之內容不如其他國家之簡單，更非如在緬北作戰少數華軍之容易指揮者可比……余希望閣下能派遣一私人完全信任之有力的全權代表，且能有遠大之政治目光與能力者，得以隨時與余合作，並可調整余與史將軍二人間之關係，俾得增進中美合作之效率。……」這提議引起赫爾利與納爾遜當年九月之來華。

只有宋子文有先見之明。他以私人關係電霍浦金斯，文件未具日期：「陸軍部要把史迪威硬叉在他（蔣介石）的頭頸上。……我私人無附帶條件的關照你，在這一點委員長不會也不能答應。」

羅斯福、霍浦金斯、馬歇爾與史迪威都低估了蔣對此事之反應。我們讀蔣介石日記至此，可以知道他有一個極硬性的「人格」之觀念。一個國家亦有其人格。甚至抗戰勝敗都是小事，保全國家人格之完整才是大事。在這幾天之內他不斷的考慮對美政策。他在日記裡自言自語，表示心頭之不安。有如：「對美國外交，自當力求補救。然若至無法挽救時亦惟有遵循天理與常道，奮勉自強以圖自立。凡事必求諸己，乃得有成，豈有仰人鼻息而得立國者乎？」（一九四四年七月九日）

華萊士返美後對新聞記者提及中國軍事危急，他又寫出：

自此強余交出指揮權事，必更加緊也。（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二日）

外交形勢至此惡劣已極，余惟強自忍性而已。（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二日）

國家前途多難，尤以俄國與中共問題為最大，但此乃關於國家存亡之機。在我者惟有天理與常道為準則，遵此而行，至於成敗存亡非所逆睹。對我黨國鞠躬盡瘁而後已也。此次美國態度惡化以及國內人心之動盪與軍事失利，余皆視為與我有益，而不以為害耳。即使美國利用中共政策，如我能運用得法，亦未始於我無益，然而用心之苦，負辱之重，亦云極矣！（亦一九四

四年七月十二日）

太平洋戰事未發生以前我國單獨抗戰性質簡單。國內雖有共匪之叛變，外交雖受俄國之壓

迫，夏季雖晝夜忍受敵寇之轟炸，然而心神自若，並不覺有今日之苦悶也，惟自太平戰爭爆發後，我國除獲得美國之接濟及借款美金五億元爲實惠以外，其他無論軍事經濟乃至於政治皆受其宣傳之影響，是爲二年以前單獨抗戰時代所未料及者也。美國現盡量宣傳我軍之嚴重與不利，以圖獲得中國軍隊指揮權，而使敵寇更恣意進攻，徒增我軍民痛苦，可痛也！（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

敵軍之深入無足爲慮，而盟軍友邦之壓迫，實難忍受，抗戰局勢至今受美國如此之威脅實爲夢想所不及，彼既不允我一猶豫之時間，必須強派史迪威爲中國戰區之統帥，以統治我國，如余不從其意，即將斷絕我之接濟或撤退其空軍與駐華之總部，不惟使我孤立，而且誘敵深入，然而余自信可獨立自主，中國必不爲其所屈服也。（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六日）

這數段缺乏邏輯上之完整。他說不爲其屈服，卻又有妥協之徵象。所謂天理與常道亦難解釋。不過很顯然的他已被逼得走投無路。雖然對日抗戰、對俄關係和對中共態度是他和美方爭執的起點，這一時期他卻以應付美國爲最大難關，其嚴重性超過上開問題，只有今日我們才可看出。如果史迪威之計劃無條件的實現，他自己將成爲一個傀儡型的獨裁者，所以才有一「用心之苦」和「負辱之重」。這樣仍可忍氣吞聲的接受。只是他苦心孤詣替新中國造成的一種高層機構，也同樣的失去其神聖與莊嚴，所以他才提出，不爲其屈服者究爲中國而非他蔣介石自己。因爲這種的顧慮，才涉及天理與常道。他說美國之威脅爲他夢想之不及。他自己的反應之深度，也非西方人所可忖度。

他雖與羅斯福文電往返，但孔祥熙仍在華盛頓與羅過從。他讀及孔的報告，覺得美國總統仍是

和藹可親，深具瞭解。可是羅斯福發送的電文則又生硬唐突儼如兩人。然而爲了蔣介石，羅斯福也面臨極大的困難。涂克門女士說羅此時已被馬歇爾「推逼到角落裡去」。

既爲美國大總統則必俯順輿情，何況又在決戰期間，大選關頭。一般美國人不能明瞭供應爲十三萬噸或只兩千噸，也不能區別敵方兵力爲九個師團或兩個聯隊，更記不起空軍出動爲三萬架次或兩千架次。他們只看到湘桂戰場與緬北戰場緯度不相上下，面積亦無多大的出入，卻不能理解何以此時西戰場節節勝利，東戰場則喪師失地，只給美國納稅人增加負擔。（所以我們今日雖提倡宏觀歷史亦仍注重歸納法，有如本文之宏觀資料以微視之起點蒐集而成。）而蔣則不論其批評出自惡意或善意，概視之爲美國「宣傳」。

在這一段時間他向羅斯福提出的，包括：一、賦予過渡期間，使史迪威熟悉中國政治情形後始授給指揮任務。二、所指揮者限於提出戰鬥序列中之部隊，以避免涉及中共。三、租借法案物資不由史迪威支配，四、希望總統私人代表長期駐在重慶，使史迪威有所約束。

當他尙用此「緩和」辦法之際，費立士又送來羅斯福七月十五日一電，內稱：「如吾人共同自華對日之努力，不幸遭受影響，則今後將鮮有中美合作之機會矣。」蔣在當日之日記裡記出：「余雖不注重此語，但不能不有最後獨立作戰之打算也。」（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七日）



當此文書往來之際，中國尙有一線希望，則爲方先覺之扼守衡陽。

衡陽爲粵漢及湘桂兩鐵路之交叉點，當然具有戰略價值。但是蔣介石之集中注意於此地之攻防

戰，非僅在軍事上著眼，尙具有政治上及外交上之用意。如果在他和華盛頓爭執中國軍隊是否缺乏適當領導之際，國軍能在此有較傑出之表現，也可以增進他與史迪威攤牌的手頭力量。當他愈感到無地可容之際，衡陽的情勢也愈爲緊張。他在研究增援時曾寫出：「……軍事憂惶，未足言危，而對美外交之頹勢，實爲精神上最大之打擊。但果能邀天之福，軍事獲勝，則外交危機，亦可轉安，萬事皆在於己之盡力耳。」（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可見得衡陽牽涉到華盛頓，也牽涉到尙在緬北攻擊密支那之史迪威。

更表現蔣之期望之迫切則有：「願主賜我衡陽戰事勝利，當在南嶽頂峰建立大鐵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全抗戰期間無比此更急切的表示。

方先覺，黃埔三期畢業。他爲預備第十師師長時，曾在第二次及第三次湘北戰役擔任長沙市區之防衛戰。二次戰役結束曾被記大過兩次。第三次戰役則因首先擊退來犯市區之敵軍因功升第十軍軍長。第十軍也曾參加一九四三年年底之常德戰役，在常德城南與日軍第三師團及第六十八師團交鋒。

守衡陽時第十軍下屬有四個師（第三師，第一九〇師，預備第十師，暫編第五十四師）。但此時像其他部隊各師均有大量之缺員。日軍戰役前即估計其實力爲兩個師，再從戰役後之敘述看來，守軍總人數應在兩萬左右。日本第十一軍最初即展開兩個師團攻城（第六十八師團及第一一六師團），第二次攻擊後又另投入一個師團（第五十八師團），再以一個師團截攬增援部隊（第四十師團）。湘江之東之日軍（第十三師團）則擔任對戰場之監視並賦予礮兵支援。軍直屬之礮兵亦參加戰鬥（十公分加農礮及十五公分榴彈礮），並有化學部隊等（支那派遣軍化學部）。總兵力攻者與防者比較應爲四比一至五比一。至於第十

軍留置於市區之外湘江東岸之兵力，則在我現有資料無從查考。

攻城戰斷續四十日，大部在衡陽市區之西及西南遂行，至第三次攻擊方始及於北面。市街戰未佔重要地位。因日軍侵入市區時，衡陽早已經日機轟炸成爲一片焦土。日方資料稱因此之故「市街戰準備設施利用價值低下」，並判斷此爲守軍不得不放棄抵抗之主因。衡陽東面濱湘江，日軍曾企圖以第十三師團渡江攻擊，據稱因鑒於常德戰役之經驗，此計劃終於放棄。

兩方均未能操縱制空權。日方稱戰役之前中美空軍有飛機五二〇架（美機三四〇架，中美混合部隊一〇〇架，「重慶空軍」八〇架，所敘似已包括B 29等）。日本之第五航軍則只有「可能出動機數」二二〇架。但日機較能爭取主動，有如七月十一日夜襲芷江美軍基地「炎上擊破」五一機。七月十三日攻擊桂林又「炎上擊破」八九機。從此中美空軍進入「大混亂模樣」。日空軍則「強行」推進至長沙及湘潭。戰役末期，日機已在湘江東之衡陽機場降落。駐漢口之日機亦進駐廣州，對盟軍在桂林及柳州數度襲擊之後，在八月初繞道台灣歸還漢口。看來如此渲染之戰果與陸軍提出之殺傷數有同樣程度之誇大性。但中美空軍仍有防衛後方各大城市及中印空軍基地及成都基地之任務，無從全部發揮數量上之優勢可以想見。美國空軍尤未能與地面上之國軍有密切之配合。

日方又稱，美空軍朝夕飛臨衡陽，在當中留出至大間隙，容彼方充分執行其「步砲飛協同」。當七月中旬第一一六師團之第一三三聯隊攻擊衡陽西南之蕭家山高地時，曾發動拂曉攻擊未見功效，改行夜襲亦不成功，只有死傷慘重。七月十六日乃決定於午後四時發動空軍與地面部隊之協同動作。據目擊者云，時值酷暑，午後黑雲來自東南吹向西北。到時群情以爲氣候驟變計劃受阻。至四時〇五分突有「友軍機四十餘架之大編隊悠悠在衡陽上空盤旋一周」方開始輪流俯衝轟炸。一時「蕭家

山籠罩在煙爆之下，土砂木片飛散」。在最後一機俯衝時，地面部隊已開始動作，工兵首將陣前之鐵絲網爆破，步兵續在豪雨及泥濘之間陸續攀登佔領此高地，至夜間十時已能完成佔領並對國軍逆襲作準備。

日軍亦稱衡陽上空每日均有美機出現，在國軍企圖解圍時「每日有十數機」從外圍方向飛來，可是日本偵察機蒐集情況曾未有受限制模樣。八月一日及二日十一軍軍長橫山勇中將等乘偵察機三架由長沙飛湘潭次飛衡陽亦未認作非常冒險之行動。

從各種敘述看來，國軍已在此丘陵地帶構有永久性之防禦工事。各防禦據點間又有長達數百公尺之交通壕，側防機關佈置完善。衡陽四周又有無數池沼，國軍即灌水至陣前使攻擊進度困難。此外第十軍作背水陣，無退路，應戰沉著，寸土必爭，經常夜襲日軍，必深具技術上及紀律上之修養，雖敵方亦稱「勇敢之重慶軍」。

在此長期間之攻守戰中兩方部隊至為接近，迫擊砲及手榴彈成爲最常用武器。日軍第一一六師團之第一二〇聯隊聯隊長陣亡大隊長二死一傷。第一二三聯隊因軍官傷亡，各中隊（連）只能以下士官（上士、中士、下士）指揮。第六十八師團之第五十七旅團旅團長志摩源吉少將一向率部擔任獨當一面之任務，號「志摩支隊」，在此攻城戰攻擊頓挫時親自趨前教訓士兵將國軍所擲手榴彈未發火前回擲，而在這行動之中被狙擊陣亡。日方資料數度提及攻入國軍陣地內之小部隊全員覆沒。

日軍攻城四十日實際分作三次。第一次發動於六月二十八日，當時湘江兩岸尚在鏖戰之中，日人總以爲衡陽有如長沙，可以輕舉易得。攻擊頓挫後於七月二日由第十一軍下令停止攻擊，候空軍挺進，重砲兵陸續到達，後勤整備完善後預定於七月十一日攻擊再興。攻城部隊備發築城工具，構

築臨時遮蓋掩體。據說此爲日軍新經驗。過去他們攻城只在敵前逗留一、二日，無此必要也。爲與本文主題聯貫起見，我提醒讀者，在此戰事稍歇期間內，蔣介石接得羅福斯來電將指揮權交史迪威。

第二次攻擊如期在七月十一日再興，一旬之後再告頓挫。各部隊只進展數百公尺，距衡陽之舊小西門仍有三百公尺至五百公尺之距離，已無法繼續前進。至此衡陽之防禦及解圍企圖，實由蔣介石親自主持。七月十八日方先覺向統帥報告，他的部隊已傷亡殆盡，刻下守城部隊由軍佐雜役編成。當日蔣日記云：「不料傷亡之大一至於此也。」（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八日）讀者亦可記得他已寫下必要時中國須準備單獨作戰。（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七日）

蔣再電告被圍之方先覺，不論兵員如何缺乏，仍應編成數營向解圍軍方向出擊。七月二十日赴援之第六十二軍進展至衡陽西南約七公里處。由西北增援之第七十九軍亦距衡陽不過八公里。蔣預計窮一日之力向東推進五公里即可解圍，但此計畫始終未能貫徹。方先覺則報告七月十九日被派去特務營向六十二軍方向接觸，途中遇伏全軍覆沒。在衡陽之守城軍則傷亡慘重彈藥不繼。日方資料亦稱在此時期美空軍夜間投下之迫擊礮彈落入日軍手中。《大事長編》只稱「公爲之鬱悒於懷者久之」（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

我們無法斷言此時蔣指揮各軍之電訊即已被對方截獲。但戰後日方公佈國軍統帥七月二十三日作戰指導之電文八條內詳及各部隊攻擊目標與進攻方向，則確落入日軍手中，並於二十四日由第十一軍司令部將其內容摘要通告各部隊。以上所述方先覺之特務營遇伏，又日軍第四十師團截攬國軍各救援部隊時，先從衡陽正西十二公里處指向東北再回師轉向西南，處處出現於國軍之側翼，其行動適時而有效，使人揣想其得有情報之助。蔣介石經常訓示部下曉諭無線電不能保密，而在此重要

關頭，自己反有此差失，只表現厄運好與人爲的錯誤俱發並至。尚有一個少爲人注意的地方，乃是七月下旬日兵站每夜向衡陽前線輸送物品三十噸至四十噸。

鬱悒爲懷後之次日，即七月二十一日，蔣主持臨時整軍會議。他的訓辭題爲「知恥圖強」，內中並未提及衡陽緊急情形，也未暴露他自己被美方逼迫限即交出指揮權。他曾一度提及最近「中原與長沙會戰失敗軍人應認爲莫大恥辱」，可是訓辭的主旨仍在立身處世之根本與軍隊需要組織與效率，換言之內容抽象重於具體。

讀者可以指責蔣之迂闊。他可謂不敷實際，在此生死關頭，仍只提倡空洞之原則，也可讚賞其沉毅，即是大敵當前，國勢危如累卵，他也仍能擱置目下之憂慮而重新檢討及幕後之根本。按其實，他在此時已失去主動，無論在軍事上及外交上他提不出來一個具體的方案。他提出的即已被否決，如以B 29在戰場上使用。因之他只能呼籲部下竭盡忠貞，希望奮鬥之餘打開一條出路。他再更具體的指示則不當衆宣佈，而對各將領個別的提出，因爲他知道各個人的性格能力及對他自己服從的程度。這也是他越級指揮之邏輯。中國尚無從有系統的管理，本身亦仍在革命過程中。



正當國軍內外不能聯繫之際，日軍也臨著一種選擇。當七月二十日他們的第二次攻擊頓挫時，首腦部也發現有幾個條件需要考慮：此時在湘東南尚有國軍的十六個師，應當將他們徹底殲滅還是先解決衡陽的第十軍？國軍的解圍部隊已近在咫尺，而且在廣西尚有後續部隊，日軍是否能應付一切？供應問題如何著手？

支那派遣軍之高級參謀天野大佐，主張迅速攻略衡陽。第十一軍高級參謀島貫大佐則認為整個地域之運動戰為「主作戰」，衡陽之攻城戰為「支作戰」。日軍應注重主作戰，並抽出第二線兵力擔任警戒修築道路。在後者主張之下，攻擊又停頓二星期。只到八月三日才攻勢再興。國軍有這樣的機會而無法利用，人謀之不臧，亦命也。及至攻擊再興對方已將其供應情形改善。

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在七月二十六日呈蔣電文，對衡陽作戰已不採積極態度。但不願拂蔣意，其用辭至為委婉，有如在某種條件之下「解衡陽一部分之圍似有可能」。但其上策則在打擊敵軍之補給線。並且「我軍最高戰略為消耗戰，在中印緬公路未通以前如何善為運用現有兵力，以待盟軍聯合反攻，究竟如何確保重慶、昆明、西安、桂林各要點，得以支持較長時日，想均在鈞座明鑒之中」。已隱約的規勸蔣介石對衡陽失守後之打算。

蔣致方先覺七月二十七日電係其手擬：「方軍長：守城官兵艱苦與犧牲精神余已深知，此時只有督率所部決心死守以待外援之接應，余對督促增援部隊之急進，必比弟在城中望援之心更為迫切，弟可體會此意。以後對於求援與艱危情形非萬不得已，不必發電詳報，以免敵軍偷譯。余必為弟及全體官兵負責全力增援接濟勿念。中正手啓。」

至此他已不許方發電請援，以下八月二日一電更囑其注意一死報國。

我守衡官兵之犧牲與痛苦，以及迅速增援，早日解圍之策勵，無不心力交瘁，雖夢寐之間，不敢忽之。惟非常事業之成功，必須經非常之鍛鍊，而且必有非常之魔力，為之阻礙，以試鍊其人之信心與決心之是否堅定與強固。此次衡陽得失，實為國家存亡所關，決非普通之成敗可

比。自必經歷不能想像之危險與犧牲，此等存亡大事自有天命，惟必須吾人以不成功便成仁惟有一死報國之決心以赴之，乃可有不懼一切，戰勝魔力打破危險，完成最後勝利之大業，上帝必能保佑我衡陽守軍之勝利與光榮。第二次各路增援部隊今晨皆已如期到達三塘、雞窩山、水口山、張家嶺、七里山預定之線，余必令空軍掩護嚴督猛進也。

此文之宗教思想與革命哲學必出自蔣，但已不計修辭，有如「心力交瘁」即與上下文不相啣接。想係在極端忙迫之中匆促寫出。顯然的至此美國已正式發表史迪威升四星上將，衡陽在政治上及外交上之意義大過於短期的軍事價值。蔣介石日記有「衡陽保衛戰已一月有餘，第十軍官兵死傷已過十分之八，而衡陽屹立不撼。蓋以衡陽之得失，其有關於國家之存亡，民族之榮辱者至大也」（一九四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當日軍於八月三日發動第三次總攻擊時，增援之第五十八師團已加入戰鬥，湘江東岸之第十三師團原已準備渡江作戰，一切已準備停當，但突然發現江中有大量之油料浮於水面，猜度國軍將於日軍半渡時放火焚燒，是以渡江計劃又臨時放棄。第十三師團除以礮兵支援攻城部隊，並作佯動牽制國軍外，未實際參加戰鬥。衡陽城內經日機轟炸，有大火八處燃燒。

正面國軍雖戰鬥力量業已減低，但戰鬥意識無鬆懈模樣。日軍之攻城部隊曾使用各種方式，如挖掘坑道，夜間將野礮推至步兵線，施行夜襲，組織突擊隊，施放煙幕，但始終無法擊滅國軍之抵

抗。日方資料稱因攻擊進展未能如預期，第十一軍戰鬥司令所內感到焦躁。司令官橫山勇連日患病，身體衰弱。蔣介石亦已正確的指出。日方之兵力已使用至最大限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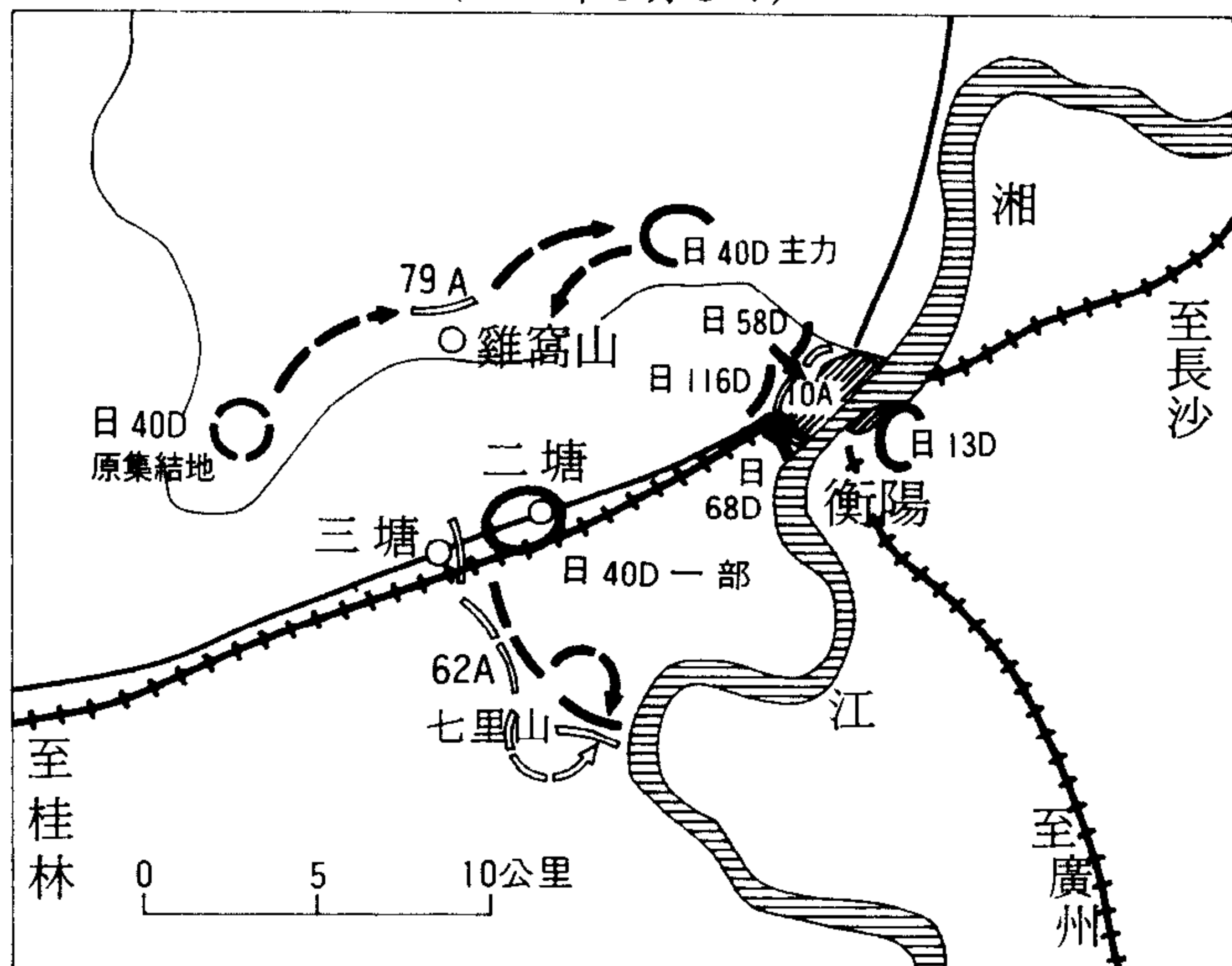
以後發生情形，至今尚無確切之紀錄可供憑證。當中細節關係國軍及各人生死榮辱至大。中日間之紀錄尚有至大之距離，亦無第三方面之資料可資參對，因此只得照兩方所述加入背景列入。

《大事長編》有以下的記載：

八月七日 公以衡陽戰況危急，特督令戰車部隊急進增援，並電方先覺軍長告以「援軍明日必到衡陽，決不延誤」。不料於下午三時突接空軍電話，轉報方先覺軍長率同參謀長孫鳴玉，師長周慶祥、葛先才、容有略、饒少偉等來電稱：「敵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後即在城內展開巷戰，我官兵傷亡殆盡，刻再無兵可資堵擊。職等誓以一死報黨國，勉盡軍人天職，決不負鈞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電恐為最後一電，來生再見。」公閱後憂心如焚。旋於四時許據衡陽電台報稱「情勢暫時轉佳」。至五時後又報稱「在混戰中」。繼又報稱「敵炮在猛攻中」。迄黃昏時據空軍偵察回報：「城西北角似有戰事，其他符號則仍指向西南，表示敵正進攻中云。」公於研判後自記曰：「綜核各報，城北一部雖被敵攻破，但其範圍未曾擴大，尚非絕望之局，只有督促援軍，明日能如期急進，以勢論之，此次戰車之參戰，應可如期成功也。」是夜公起床禱告凡三次幾未入眠也。

八月八日 公以衡陽會戰守軍苦鬥至此歷時凡四十七晝夜，故於凌晨四時即起默禱能轉危為安。至五時猶得衡陽電訊，詎十五分鐘之後電訊中斷，自此即絕不復通矣！旋於十時許接獲

衡陽攻防戰示意圖
(1944年8月3日)



空軍偵察報告：「衡陽城內已不見人跡。」於是乃確知衡陽已陷矣。公因自記所感曰：「悲痛之切實為從來所未有也。」

日文資料證實迄至八月七日國軍之抵抗仍極頑強。但當日第五十八師團已攻入市區，向湘江西岸挺進中。城西及西南之戰線仍在附廓高地。至薄暮時礮兵觀測所報告發現「白旗出現於敵陣地」。第六十八師團亦報告午後五時之後「師團正面森林高地重慶軍陣地白旗翻飛」。不久軍使亦來。右翼隊長第五十八旅團長太田貞昌少將奉師團長命告軍使須方中將親來。夜半第六十八師團長堤三樹男中將會見方先覺中將接受投降，同時投降者有第十軍之師長四人。在大西門附近集結之「重慶兵」則有「數千人」。在此期間日礮兵仍向衡陽射擊。第五十八師團則繼續佔領衡陽市街。

與蔣介石所獲報告符合。

古屋奎二編撰《蔣介石秘錄》時曾在台北訪問方先覺（原文未註日期，但應在一九七三年或一九七四年）。方說：「八月七日下午向蔣委員長發出電報之後便決心自戕。當手鎗對準太陽穴之際，被兩個副官打落地上。翌晨有自稱爲日軍第十一軍使者的竹內參謀來接洽停戰。當即告訴他：我們絕對沒有投降之意。同時提出：（一）保證生存官兵安全，並讓他們休息。（二）收容傷兵，並鄭重埋葬陣亡官兵等條件。竹內說：『中國軍勇敢作戰的情形，不僅在此地的日軍就連日本天皇和大本營都已有所聞。』特地表示敬意，並對我方的條件完全同意。而日本記錄說我們投降，甚至有說是舉行了投降儀式是絕對錯誤的。我以軍人的名譽發誓沒有那回事。」

他說到當時戰場情形，似和上述條件符合。他所說竹內參謀，則第十一軍司令部有情報參謀名竹內實孝少佐。以下是方的解釋，括號亦照《中央日報》的翻譯本所錄：「由於長期作戰，醫藥品和食品缺乏，極感困苦。沒有止血藥劑沒有繃帶，負傷官兵的傷口有發炎生蛆的現象。本來可以救治的官兵，很多都死亡了。我們給予敵人的打擊也非常之大（據日本資料，是役日軍傷亡一萬九千三百八十人），每天可以望到敵陣在舉行火葬的煙焰。整個衡陽城被死屍臭氣所籠罩，實在是很悲慘。」

當時支那派遣軍所發戰報謂國軍「遺棄死體」約四、一〇〇具，戰鬥間埋葬者不計。被俘則有方軍長以下一三、三〇〇員名，包括所有傷病。如果此項數字有任何可靠性的話，則以「死一傷二」的比率計算，餘存人數亦大多傷病。另有估計第十軍殘餘兵員只有一千二百餘。所以從種種跡象看來，兩方似有協議。加以日軍始終未發表投降之文件，不久之後又任此重要之戰俘方先覺與其參謀長師長一併逃脫，更令人懷疑。從其他材料看出，此際日方正想與蔣議和，已通過八月十九日之御前會議（詳本書四一九頁）。此是否與方及竹內之協議有連帶關係。除非有更可靠之文件發現，目下我

們的猜測只能至此而止。



蔣介石日記內說出的戰車作戰，出現於八月七日，亦即衡陽攻守戰最後之一日，日方資料稱當日國軍戰車二十四輛循著向衡陽之公路，自三塘方向接近二塘。有突破日軍陣地企圖。第四十師團第二三四聯隊候至三五〇公尺之近距離以速射礮射擊，使最前二輛不能行動，其餘各輛則向公路逃去。

此處未說明日軍所用係三公分七或四公分七平射礮，如係四七平射礮，則駐印軍已有此經驗，如經行山地，又未有飛機協同動作，輕戰車及中戰車無從與之抗衡。史迪威日記裡所說四月十一日在瓦康所損失的戰車，即與二塘之情形相似。我在《地北天南敘古今》之序內有以下一段的敘述：

我也曾爬上被敵人四七平射炮射穿的戰車，也真想不到，彈速如是之大，它們在一吋半裝甲上所截洞，竟像截洞機在紙上所截圓洞的完整，圓周全部光滑，內外的邊緣也毫無殘留的多余的鋼鐵和裂痕。我不禁以手指循著一個圓洞的內壁旋轉，想像著當時官兵油煎火化的光景……

一九四四年的夏天白修德也曾往湘桂戰區。在《雷霆後之中國》他證實了美國空軍盡力攻擊日方的兵站補給，飛行員極度的疲勞。書中有五頁描寫衡陽戰役，內無一字提到方先覺。他只說第十軍是薛岳「自己的部隊」。在另一段他卻又說及薛岳不遵將令，只向東撤而拒絕渡湘江西移，衡陽之失敗在他看來，由於指揮之不集中。「兩個月之內戰場上缺乏實在之司令部。何應欽之參謀本部、薛

岳、張發奎和白崇禧各存己見。」

涂克門書中則有：「在衡陽薛岳的部隊，得到第十四航空隊竭力之支援，在全七月抵擋住日軍，但是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援助或轉移方向的佯攻，史迪威此時仍在緬甸，批准付與薛岳的部隊一批軍火，中央政府在桂林的代表爲之抗議認爲「此批供應」將落入『匪手』。以後雖有陳納德和他自己「史迪威的」在重慶之代表赫恩的呼籲，史拒絕再付給。他在給赫恩的回信裡說及他之理由。這決心全在委員長。兩年來蔣堅持一切都交付陳納德。如果陳在六月份接到一萬二千噸而不能阻止日軍，他應當向委員長直說，委員長即可作他認爲妥當的打算。」

「因爲懷疑薛岳的忠心有問題」，涂的結論說及，「蔣沒有提出任何的打算。」

白修德與路透社的一個代表去前線參觀第六十二軍之反攻。他未記下確實之期及實在地點。他只說及火車末站(railhead)距前線三十哩(約四十五公里)，以後全賴步行。他所見中國兵三個有一個扛步鎗，其餘肩著給養、電話線、機關鎗零件等。但每人有兩顆手榴彈。攻擊前進之師有兩門七五野(山?)礮，乃第一次大戰之遺物。附有礮彈二百發，射擊起來，「有如守財奴算著金幣樣的「吝嗇」」。日軍踞在衡陽之南的一座較高山頭之下，國軍則在一座較低山上。國軍鎗上刺刀希望將陣地裡的日兵發掘出來。但是自清晨之前三時半至半上午，中國兵只能爬至日軍山峰之半腰。白和路透社的同事前去國軍最高點的一個山上，聽到迫擊礮噓嘯臨空，「機關鎗與步鎗在熱夏之空氣中長久間隔之後喋喋著，全戰線沒有一個人在行動」。至半下午仍如此。

他們等候了三天想看到實際的反攻。「我們發覺我們所見即是反攻，這戰役不會再有其他的後果」。因之返回後方。

他們當面的日軍乃第四十師團之第二三四聯隊。日方之紀錄，把對手第六十二軍說得比英美記者說得較好。比如說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二日彼我進入「接戰格鬥」的情形，陣線紛亂，聯隊激戰八日之後死傷慘重，一部因彈藥用盡，最後只能用石塊向「重慶軍」投擲。第二三四聯隊之中摻雜著一部中國人組成的「歸順部隊」，其陣地被第六十二軍突破時日軍曾集合馬伕通訊兵等反攻。聯隊所遇危急而不得援兵情形曾被比作日俄戰爭時之本溪湖戰役。

然則白修德縱有錯誤或遺漏，他以下的一點觀察我認爲確切：

重慶在野戰軍司令官的頸上呼氣，重慶決定每日之行動在何時，用何法於何處施行。生力軍局部投入作一點點咬著的攻擊。中國軍數量上之優勢曾未結集作一次集中的突破；新的部隊只填補了不斷之死傷。

但是我也不放棄從大歷史得來的觀感。只因爲中國之事，不容易在下端協定，蔣委員長才在上端牽扯。倘非如此，國軍早已能禦敵於浙贛，而用不著用兵於湘桂。衡陽戰役之失敗給他的打擊非常之大。在他看來只要每個人在不可能的情況下再盡一份超過常情的力量，即可轉敗爲勝。有如他在八月二日致方先覺的電文。

衡陽失守後又三日，他接到羅斯福八月十日來電。他所請羅斯福派遣的私人代表，羅已派定赫爾利，同時又有戰時生產局長納爾遜爲協助。可是來電又提及史迪威，內云：「中國戰場形勢危急，關於史迪威之事需要立即行動，否則將爲太遲。」

蔣原希望衡陽戰勝可以增強他對美交涉之實力，現在看來情形適得相反，他在當日記出：「如

余健在一日，則國家必有一日之前途。共匪雖有國際之背景與陰狠之奸謀，彼亦必有終無出路之一日，不可過於憂慮，只須忍辱待機，若至不得已時，惟有以快刀斬亂麻處之。否則余若一經悲觀憂世，甚至存一死以報國之念，則國家人民必淪胥以亡，徒使共匪與敵寇之陰謀得逞已耳。能不自勉乎哉！何況今日處境雖惡劣萬分，而較之十五年至三十年之間之情勢，猶勝多矣，惟在我能自求、自反、自主、自強耳。」（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一日）

這段日記有好幾點值得注意：首先他已數年不稱中共爲匪，現在又重用共匪之名目，這不能與美國政府因史迪威強迫他與中共合作無關。次之他叮嚀自己不要一死報國。他剛囑方先覺抱「一死報國之決心以赴之」，而自己則反其道而行，如何說得過去？我再三讀後，則覺得他所說乃是基於他自己的地位，一死報國易而忍辱待機難。照文字看來他甚至業已經過一死報國之衝動，雖說這衝動至何程度，很難設想。總之蔣介石給自己鼓勵慰勉的文字經常重複的出現於日記，而叮嚀不要一死報國只此一次，已可見得一九四四年八月，他的情緒激動非常。再次之他說及「十五年至三十年間」，應指民國十五年至民國三十年之間，亦即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四一年，乃北伐開始至抗戰已四年，而太平洋戰事尙未展開之前。當日他所創造的新中國的高層機構經常面臨生死問題，現在縱困難，最多不過榮辱問題。自此看來他對美國的援助始終曾未忘懷。他雖說過「最後獨立作戰之打算」也仍不過是給自己的鞭策，並未也不能立即實施，有等於「自求、自反、自主、自強」，只算是一種抽象的觀念，並未構成具體之計劃。又即在此兵敗之際，蔣對他賦予部下精神上之領導的力量仍有十分自信，是以「如余健在一日，則國家必有一日之前途」。徵之抗戰期間之百般困難及蔣無中生有的情形，此說並非全部虛構，即衡陽戰役亦曾顯示此精神因素。只是承擔艱危之時日愈久，此種因素之

功效愈微。而美國人士即全然不顧及其積極性格，只稱之爲違反邏輯，是以蔣與史迪威之攤牌無法避免。



衡陽之戰後，第九戰區之四十八師已有二十五個師不復爲有效之戰鬥部隊，其餘二十三個師亦損傷慘重。日軍整備之後於十一月九日陷桂林，十一日陷柳州，仍以每日三十公里之速率侵入貴州，至十二月五日陷獨山，白修德書中有詳細的敘述，記載公路上難民擁擠秩序紊亂的情景。日後他又寫了一部小說，攝製爲電影，稱爲《叢山之路》(The Mountain Road)，內中最精采的鏡頭乃是將軍用器材火藥庫在敵軍近接時爆破。白又假借小說中的一個美國軍士口中說出：「戰後我一定再來，看清這國家怎麼搞的。」八月二十三日蔣介石又接羅斯福來電一則，此爲第四次之敦促任史迪威指揮中國軍隊。蔣至此只得接受。他的日記云：「羅斯福總統來電迫交史迪威以指揮權，殊難忍受，惟考慮結果，對美外交方針，不能不用逆來順受之道，故決定極端容忍，接受其有限度之要求，如運用得當，對俄對共或有轉變環境之可能，乃不特不宜固拒，而且加以信任，期待形勢之好轉，此一政策之決定，乃爲國家存亡成敗之所繫，自信其能因禍得福轉敗爲勝也。蓋以余自反，對美對俄毫無欠缺與愧疚之心也。」(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史迪威將軍並非無限度的執拗唐突。他有時平心靜氣的思索，其所觀察亦有精到之處。有如：

「我對」中國人及中國士兵存信心。基本上偉大、民主化、管理不當。無宗教種姓的限制……誠實、節儉、勤勞、樂觀、獨立性、容耐、友誼、有禮。（未具日期，刪去字照《史迪威文件》）

他沒有想到在通常狀態之下蔣委員長也有很多上述之美德。

史迪威又寫出：

中國軍隊：在一九四四年在書面上講中國陸軍下轄三二四師、六十餘旅、八十九個所謂游擊隊，每隊二千人。在紙面上了不起。當你逼眼看出，你就看著：一、平均每師不是一萬人，而最多不過五千人。二、士兵不發餉「本文作者按，餉項之低等於無餉」，沒有吃的，營養不良，百病叢生。三、兵器陳舊不適用。四、無訓練。五、軍官以此為生「史謂軍官除帶兵外即別無他技謀生」。六、無炮兵，無交通工具無醫藥等等。七、徵兵只是如此如此。八、主要的事業在經商，除此之外，何以為生？

那你如何發動使這支軍隊有效率？（未註日期）

其實以上的缺點不僅本文前後提及，也見於統帥蔣介石與各將領會議的訓辭。這一切不是蔣無效率之後果，而是他無效率之前因。其情形不能稱之為腐化，而由於內地社會缺乏最基本的現代功能。將國軍的三百多個師，裁減為六十師或九十師或二百個師，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整個組織的成就全靠從上向下加壓力，有如鼓勵方先覺，明懲暗縱余程萬及犧牲張德能。如果手段一經軟化，壓力亦降低，其最後之功效亦隨著降低，以前缺員的三百多個師可能減低至兩百個師，而每師也仍只

有五千人（日後蔣受馬歇爾的建議將每一個軍降為「整編師」，行之無效之後又擴為軍）。在這期間各事都為一種革命行動則不能始終保持邏輯之完整。當初蔣介石挺身而出抗戰即已不顧眼前後果，這樣才逼著日本人也拋棄按常情的計算，有如進兵東南亞，奇襲珍珠港。甚至牟田口之攻略英發爾及最近由軍部主持之一號作戰仍不出此疇範，亦即在毫無出路的關頭，從意想不到的方面打開出路。史迪威以蔣介石之容忍為庸碌，確已低估此人。蔣當然是機會主義者，不然何以居里在前，赫爾利在後都稱他為革命家？史迪威還沒有看得清楚：當他一意要作國軍統帥時，蔣也準備把中國對蘇聯的問題及中共問題一併推付給他。

為甚麼很多事國民黨不能做而中共能做？因為中共專搞低層機構，索性不要高層機構，他們以一波又一波的群眾運動代替官僚組織。他們對國民黨的外圍必具侵略性格，因為他們無意容忍國民黨所處在的社會之五花八門。倘非如此，他們也會同樣的被「腐化」，即受這些五花八門的社會因素所支配。在這時期中共的行動較為帶創造性，但是他們的經營必與蔣介石之作為互相排斥。

蔣介石的遙制部隊確有很多壞處：例如本文提到衡陽戰役，即已發現敵情估計錯誤，側翼抵抗失去重點，第二線兵團與總預備隊區分含糊，投入未能適當，通信不能保密，戰車使用未顧及地形限制，陸空協同不如對方。可是當中多種情形並非全係遙制之誤，而出於軍隊本身性格，有如部隊素質不齊，無從協定，器材有限未爛習用，無車輛，不能機動。我們再讀及蔣與方先覺之來往文電，則又覺得此種遙制事實上並不可少。蔣介石不僅對方先覺如此，侍從室之檔案，及蔣自己頭腦中之印象，尚儲存著千百個將領之容貌與個性。這更超出凡事都公平合理可以按數目字安排的境界。

作文至此，我深知讀者已感到我對本文主題採取防禦態度有時用辭重複，此乃出於大歷史給作

者的負擔。

既爲大歷史則綜合重於分析。衡陽之役後一年中國成爲戰勝國。這國家雖未憑己力將日本打敗，但她已盡最大力量將對方拖垮，而最重要的她始終未爲日本征服。我們縷述此間經過，首先則須注重此意外成功的力量之來源。檢討每一戰役失敗之關鍵，當然也在歷史上有其重要性，但不能本末顛倒。我們不能忘卻縱有這些失策，中國仍能達到戰勝之目的。並不是因有這麼多的失策，整個神州大陸淪陷，中國成爲日本之殖民地。歷史學安置的大前提即已強迫我們從積極的因素看去。

衡陽之役及整個湘桂戰役，誠然已給中國一個重大的打擊，但是中國並未因之氣餒而放手。即是軍事消息最陰沉的時候，重慶並未發出妥協求和的要求（希望停戰言和者爲日本。詳本書四一九頁）。繼史迪威而爲中國戰區參謀長之魏德邁日後作回憶錄時，曾以中國軍事失利的情況，與法國在馬奇諾防線被突破時之形勢作對比。戰後日本公佈一九四四年的內情，我們可以從林三郎及種村佐孝諸人書中得其梗概。湘桂戰役之後在華日軍主張發動所謂「重慶席捲戰」，以爲再來如是一個討伐即可將中國打出戰爭之外，但是在東京的大本營否決這判斷，認爲中國在此時停止抵抗爲「令人不能相信的不可能」。我們也還記著史迪威在開羅時（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曾向羅斯福說及，再來鄂西這樣的一次戰役蔣介石即會垮台，但事實上鄂西之後又有常德，河南與湘桂，蔣介石並未垮台。

在這關頭我只能再提及他戰前所說：「古人所謂深溝高壘，雖不能守到兩三年，至少也要固守一兩個月，不能守一兩個月，至少要死守一個星期。我們雖無十分戰勝的把握，然而一定要作最頑強的抵抗。我們雖未必可以打敗敵人，但是被敵人打敗的時候，一定要使他受到最大的犧牲。」（一

九三四年七月）

蔣介石可能暴躁如雷，也能有超過常人之容忍。他在日記裡一再寫出一九四四年比一九四一年好，一九四一年又比一九三七年好，一九三七年更比一九二六年好，不僅今日我們讀來覺得重複單調牽強乏味，即我們在成都軍校聽到校長蔣介石類似的訓辭，當日已有不耐的感覺。以後想來，他的旨意經過各種媒體再三貫注到我們頭腦中去，已在下意識裡產生效用。如果蔣介石不是最成功的統帥，在抗日過程中，他已是最有效的政治指導員。如果他的戰略都欠實效，則「待得久的得勝」之宗旨則經過事實上之考驗。這些地方都為只講效率不計玄學與直覺的史迪威所未顧及。

蔣介石所見不僅具有縱深，而且也超過史迪威所見的幅度。史迪威要求凡事合理，他只能處理一個有限的局面，緬北也是一個無民事糾紛的戰場，蔣介石則經常應付三四處不同的變數。他因英發爾吃緊，駐印軍可能側背受圍，允許史迪威調第十四師及第五十師增援。及至Y部隊攻龍陵不下，局勢危急，他令史迪威發動攻八莫以發生牽制的力量，史則稱駐印軍疲勞過度拒絕用命。衡陽戰事吃緊時，史不許陳納德將軍用品交付中國陸軍，由陳私自授與，後經魏德邁證實。

總之，蔣介石主持抗戰有高層機構而無下層組織，是中外戰史裡很少有一次之大冒險。史迪威已正確的指出（詳本書二四四頁），「中國人首先安置屋頂，只賦以極少的基礎與支撐」。但是蔣經常懷注著整個國家生死存亡以及未來之前途。他的施展，在方法上已盡其極，不問是空城計與苦肉計，他已在各處挪借透支濫用超過合理的程度。但是正因為如此，他內層的將領更感到與他休戚相關生死與共。也因為如此，外圍的將領，縱是離德離心，也不得不慎重將事與之全始終，這樣他才造成一個無可替代之局面。史迪威則不能違背步兵操典，一定要按排連營團的序次由下向上交代清楚。他不能放棄陸軍為主空軍為輔之原則。他所認為不能放鬆之美國的利益，也是銖銖必較算及分毫，

而且專注於物質成效，忽略人情道義及士氣上之影響。把他兩人擺在一起也算命運之錯安擺。雖半個世紀之後，我們讀史至此，仍有《三國演義》裡周瑜所說「既生亮何生瑜」的感慨。



當衡陽戰事吃緊時，史迪威已往錫蘭島之坎底(Candy)代行蒙巴頓之東南亞盟軍總司令職務。九月六日他與赫爾利及納爾遜同由印度飛重慶。九月七日他由蔣召見，蔣先與他交談約四十分鐘，方始接見赫及納。此時蔣介石告訴史迪威，以前他的工作全屬軍事，以後既為國軍總司令，則軍事只佔百分之六十，政治應佔百分之四十。如果史迪威動用中共軍隊，必使他們接受軍事委員會之權威。至此宋子文亦參加談判。華萊士來華時，已提出美方願見宋盡力於中美間之友善關係。

史迪威指揮華軍之名稱與職權由蔣親訂，其官銜為「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兼中美聯軍前敵總司令」。所指揮之部隊受戰鬥序列之限制。所用軍需器材凡中國缺乏者，概由美國租借法案供給，租借法案由中國政府支配。中國軍隊內之人事行政應照中國法令處理。

美國方面資料述及赫爾利未接受租借法案之物資由中國分配之原則。

但蔣對赫爾利印象良好。其日記云：「綜核其大意，羅斯福總統所囑代達者並非羅斯福總統有任何要求余來做，而乃是聽取余要其所做之事來做云，且語氣甚為懇摯，與往日美員所表現者完全不同。」（一九四四年九月七日）此段繼續表現蔣一直朝樂觀方向看去之習慣，一方面也顯示與羅斯福接觸，個人人身關係與官僚系統之見於紙上者始終不同。白修德證實赫爾利與納爾遜見蔣時交談極為成功，蔣與赫尤有一見如故之感。白此時有機緣接見赫等。

以下兩段見於史迪威日記，內中充分表現他對即被派為指揮中國陸軍總司令之反應：

委員長要我們去八莫給龍陵鬆氣。緬甸戰役的確的改變了這些傢伙的態度了，不復有恩主的氣派。（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

災難即將降於桂林，無法阻遏日軍——五萬喪氣之中國軍面對九個日本師團。中國無補充兵，日本部隊補充齊全。全局稀糟，他們想望的無非我們有甚麼可以給他們。孫科要我們將美軍空運輸入。另有一人要武器。他們應當做的乃是鎗斃委員長、何「應欽」，與他們的黨徒。（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

十天之後蔣介石終於與史迪威決裂。當日史交遞羅斯福致蔣電信一件。蔣日記云：「此實為余平生「所受到的」最大之恥辱也。」（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



九月九日至十九日間一句的經過，各方敘述不同。《大事長編》云及關於由史迪威指揮國軍並及中共部隊事尚有細節由宋子文、何應欽與赫爾利等商洽中。至九月十五日史與赫見蔣委員長。蔣再要求史迪威督促駐印軍攻八莫，史仍不從命，蔣即謂將令攻龍陵之遠征軍撤回，史則謂如須援軍應派防制中共之胡宗南軍，並在會晤後報告馬歇爾，以後九月十九日史送呈羅斯福致蔣之電文，果有責備蔣「按兵不動或竟提議撤退」之文句。

白修德書中稱，在此期間史迪威曾往桂林巡視（史日記稱他於九月十四日飛桂林見張發奎，後經昆明回

重慶)。在飛行中他草擬備忘錄一紙。「這文件不準備帶外交口氣，這是一紙軍事文書，在殘忍戰役之中的緊急狀態寫出，需要立即行動。這是第一次表示美國總司令的作風」。數日之後史迪威奉命將文件面呈蔣，原本有美國總統的簽名劃行。

涂克門的研究發現羅斯福的電文，並非史迪威所擬。但史之報告至馬歇爾時，羅斯福及邱吉爾正在魁白克軍事會議，會議紀錄有馬歇爾將史迪威來電摘要報告邱羅之情節。但馬歇爾早已準備回電草稿當場請羅簽發。這電文六百字。涂克門稱內容「不無表示白種人之優越感」，「可懷疑的這電文可能送達到任何歐洲國家之最高主權人」。亞爾索浦替羅斯福辯護，要是羅斯福精神及健康情形充沛時，決不會簽發如此之電文。

至於九月十九日《大事長編》云：先是公正與赫爾利將軍、宋子文部長、何應欽總長及朱世明將軍等，商議任史迪威為前敵總司令之發佈手續，以及簽署中美協定，適史迪威求見，公令邀其入座，但史迪威傳言欲與赫爾利一談，赫爾利即離席見史，並於閱及羅斯福總統十八日致公電文後，意至驚訝，蓋當此已達成協議並將發表命令之際，卻面致如此咄咄逼人跡近脅迫之電文，任何一國領袖均將不能容忍，遂勸史迪威暫緩轉遞，史迪威執意不從，謂無權擱置電訊。遂執電入見，並請朱世明譯讀電文，赫爾利恐有傷公尊嚴乃起而言曰：「電內有譯文公可自閱。」公詳閱電文後，神色如常，僅徐徐言：「我知之矣！」惟正進行商討之事項，則因之而不能續議矣。公自記曰：「此實為余平生最大之恥辱也。」

史迪威自己敘述此事的經過有他日記所載：

待了很久很久之後FDR最後慷慨直言，直言多得很，每一句裡包含著一個爆竹。「趕緊認真，否則即是——」如此一個發熱的爆竹，我將這包胡椒粉交給花生米，微嘆之後坐了下來。這又魚鎗命中著這小壞蛋的神經中樞，將他打個透穿，這是徹底的命中。但是除了臉色變綠，和失去語言能力之外，他不眨一眼。他只對我說：「我知道了。」如是無言的坐著，輕輕的搖晃著一隻脚。（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

亞爾索浦在《我曾見此中妙處》裡說及赫爾利在史迪威將遞送來電時曾警告史，如他真要轉遞此電時，他以後即再不為史交涉。亞又說及他親自得自赫爾利及宋子文，史迪威自己已在唸著電文之中譯。蔣並未臉色變綠或變青，只伸出一隻手，表示會議告終，文件可留下。諸人去後只有宋子文在。宋說蔣曾抽噎的痛哭。

蔣當時即已看透電文係史迪威所發動，但並無立即要求撤換史之決心。《大事長編》續有九月二十日之記載：

宋子文部長來謁，談對美國羅斯福總統來電之處置方針。公囑宋氏轉告赫爾利與納爾遜兩氏：「(一)羅斯福總統十八日之電將在中美歷史記載上，為美國民主主義，與對世界平等自由之傳統精神留一污點，殊為美國惜也。(二)我國國民之特性與國父廣州蒙難之及余西安蒙難，和軍閥叛變之真相。目前此種反叛之部隊，尚保留百分之三十。軍人成份如此，史迪威處置一有不當，難免引起對彼之危險。且中國軍人不願受外人之侮辱，中國軍人不願受外人之奴視，如今日史迪威之所為者。」

二十三日又有「靜居黃山，對史迪威問題凝思再三」的記載。

二十四日蔣與赫爾利作五小時長談。二十五日又接見赫爾利，提出：「(一)我國之立國主義即三民主義不能有所動搖，故不能任共產主義赤化中國。(二)立國命脈即國家主權與尊嚴不能有所損傷。(三)國家與個人人格不能污辱。」並即席交出備忘錄，請赫轉告總統，調離史迪威。內中有「今事實證明彼（史迪威）非但無意合作，且以爲受任新職後余反爲彼所指揮」一句。

史迪威日記內有「佩特（赫爾利）帶來壞消息。花生米昨日翻轉整個局面」（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以下又有「佩特午後四時再去見他，又有一陣嘩啦嘩啦。九時半備忘錄至」。當日日記再有：「〔他〕下決心在我遞交總統文件之後。」（均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他猜想備忘錄出自宋子文手筆。



要求撤換史迪威之備忘錄發出後，局勢並未急轉直下。史一方面企圖對蔣讓步，使他收回撤離的要求，乃於九月廿八日通知何應欽，可以不提引用中共軍隊之計劃，而且一到戰事許可立即撤回Y部隊。可是局勢仍未打開時，他又於十月九日令第十四航空隊半數人員停止辦公，並延期交出租借法案內之飛機。在華盛頓亦引起不同之提議，有人主張以羅斯福的名義向蔣道歉，亦有人主張用語氣委婉的文書向蔣作強硬之回答——史迪威務必留任。

蔣介石本人亦受到國民黨內部之指摘，其詳情始終不明，亦未見於其他資料，只有以下一段蔣之日記道出：

國內共匪圖謀陷余者已十九年。國外倭寇與我惡戰者，亦有十三年之久。余實已心碎精疲，幾不能久持……（節略如《大事長編》原文）而今反遭黨內如此之凌辱，與國內如此之諷刺，此種橫逆與恥辱之來，實為有生以來未有之窘困。然余於此如不積極奮鬥將何以對已死之先烈乎？況今日之實力，猶遠勝於十三年以來之任何時期。只要余能自立不撼，當不足為慮也。（一九四四年九月三十日）

看來打開僵局的轉機在於孔祥熙與霍浦金斯之一席交談。白修德首先提及此事，以後涂克門也提及此事。霍浦金斯稱如蔣堅持，總統當考慮將史迪威調回，此事不見於霍浦金斯之傳記。涂克門稱孔祥熙於十月一日電重慶通知蔣，所以蔣能在十月二日出席國民黨中央常會時拍案咆哮，謂史迪威必須離職。梁敬錚之《史迪威事件》稱孔發電在九月二十八日深夜，梁稱其消息得自孔令侃。

《大事長編》不載孔與霍浦金斯之交談，倒有孔祥熙訪問羅斯福之報告，記在十月四日內。文稱羅斯福為史迪威事已與馬歇爾交談二次，第一次馬謂中國之事非人事問題，無論何人均感困難。陸軍部則除史迪威外無人可派。第二次羅氏又提出蔣介石係一國元首，既有更換史迪威之要求則當物色繼任人選。文中未提及馬歇爾之反應，讀者只能相信至此馬之態度業已軟化。孔電文內又說及羅斯福本人屬意陳納德，只未悉其是否已向馬歇爾提出。

十月六日蔣接得羅斯福之來電，準備解除史迪威戰區參謀長之任務，而希望彼能指揮在雲南及緬甸之部隊。蔣在九日之回電「不能再授彼以指揮之權」。羅斯福即囑蔣提名美國將領三人為史迪威之繼任人。《史迪威文件》內述及蔣提出艾森豪威、韓笛及柏區。但《大事長編》所記則提出者為「魏

德邁、柏區及克勞治三人」(十月十五日)。

四十八年之後，亞爾索浦之回憶錄問世，方始道出此中一段真相。當時蔣介石倚宋子文(外交部長)為英文秘書，宋即借重於亞爾索浦自己。蔣致赫爾利之備忘錄於九月二十五日交出，首先提出撤換史迪威之要求，被史認為宋子文擬稿者，實出自亞之策劃，宋之初稿，文字冗長，首先即充滿著對羅斯福之恭維，亞則指出此完全不必要，因為備忘錄之主要目的在給霍浦金斯、馬歇爾看，而非給羅斯福看。改稿之後才開門見山的說及蔣對史迪威失去信用，要求撤換。

及至蔣提名史之繼位人，亞爾索浦苦口勸告勿提艾森豪威，因只暴露重慶之無識。韓笛(Thomas Handy)為馬歇爾有力之助手，柏區(Alexander Patch)任第七軍長，正在法國作戰。亦少有派遣來華之可能。亞即提議魏德邁。因魏與馬歇爾接近，現任蒙巴頓之美國參謀長，本人亦對蔣委員長崇仰。《大事長編》提及之三人，與羅斯福十月十八日來電所敘相同。內克勞治(Walter Krueger)任第六軍軍長，於役於太平洋地區。羅之來電稱柏區及克勞治均不暇他調，所以任魏德邁為中國戰區參謀長兼美軍司令。在緬部隊即歸索爾登(Daniel Sultan)指揮。至此美國不再要求由美將統率華軍。

史迪威在他日記裡寫出：「斧頭落下來了。」又及「這樣羅斯福已經收兵了。所有的人都對華盛頓「之作爲」驚駭。」(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九日)

在記這最後十天的情形，《大事長編》與《史迪威文件》有相當的出入，可能由於赫爾利並未將他自己的真實感想告史，也可能由於史迪威自信過度，他以為有馬歇爾的支持不可能失敗。他的日記裡表示懸望華盛頓下決心時的徬徨，但是直到他自己接到被召回國的消息前後，他從未表示他與蔣介石交鋒有任何不當之處。在這過程中他已將他所見及所經歷告白修德及《紐約時報》之愛金生

(Brooks Atkinson) (十月十六日)。接到被召回命令之後他再告二人 (十月十九日)。

蔣提議贈他青天白日勳章，他拒絕接受。蔣邀他茶話會別，他卻與赫爾利同往。他的日記裡有以下之一段，讀來令人感動，也能表現對手蔣介石若干性格，所以摘錄如次：

花生米說著他非常抱歉，我替中國做事已算不少，訓練軍隊，領導士兵等等。只因彼此個性不同他才要求我的撤離，「他」希望我與他通訊繼續為中國之友。問及人事，可靠的美國人，中國前途好處何在。問及對組織的批評與建議，尤其關於上級。問及柳州情形，對我曾往該地覺得驚異。他說我仍指揮緬甸「戰區」迄至總統下決心時。我告訴他不問他對我的看法，我的動機總是為中國的利益著想，祝他「最後勝利」，於是惚忙退出，委員長甚至送到門口。(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

蔣之日記裡無此闌干情節。他在與史話別次日記出：「史迪威已得美政府之撤回，此為本年內對內對外各種困難之癥結，且對此事之隱痛，亦可謂極人生之所未有也……(節略如《大事長編》原文)中美國交不因史迪威而敗者實為莫大之幸運。中美已誤之國交，抗戰已頹之形勢皆得由此啓其機鑰，此後軍事外交與內政各要政，乃可按計劃實施歟！」(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史迪威即於此日(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離重慶，到機場送行的除宋子文外，尚有一向被他痛恨鄙視的何應欽，此際兩人如有任何交談，其言辭不見於現存之文獻。史迪威抵美之日正值大選前

之一週，白宮及陸軍部恐他出言不慎產生政治問題，所以飛機降停在偏僻場所，屆時無人迎接，馬歇爾亦只夜間來見，以避免新聞記者。

又八個月後，一九四五年六月，美第十軍軍長巴克勒(Simon Bolivar Buckner)戰死於琉球，史迪威接掌第十軍。以四星上將而願屈尊接受此職位者，一面因有機會率部登陸於中國也。此可能性曾使蔣相當惶恐，他曾與赫爾利及魏德邁會商對策。蔣日記有：

馬歇爾實有派史迪威爲華北美軍司令之準備，且已預定，故其致魏德邁電，請余坦白交換意見。此事如果實現，則兩年來所受苦痛與奮鬥全歸泡影，國家更增分崩之危機。以史之護共陰謀總不能消除也。故明告以不能再令史在中國戰區服務也。赫爾利與魏德邁亦竭力反對，此與去年孤苦獨戰，其勢已大不同矣。(一九四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不及一月對日戰事結束，蔣再接馬歇爾電，謂史迪威即將回美，行前擬往北京一遊逗留二日，拜訪舊友。蔣恐其與中共人士及共軍接近，去電婉拒，並稱全國秩序恢復，復員完成後當再邀史將軍來華重遊。此爲蔣一生最後與約瑟夫·史迪威之糾葛。再一年後，史迪威於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二日在美病逝。蔣於其私邸舉行基督教之紀念儀式，所邀集爲當時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諸人，並未對外宣佈。

但蔣希望史迪威與華絕緣，他自己即可以將中美關係導入正軌，啓各事之機鑰，則只有面臨失望。史迪威尚未回美即有愛金生打前陣。他所寫關於蔣史衝突之文章自身帶去，刊載於《紐約時報》十月三十一日之第一版。內中說及國民政府爲一個「不開明、冷心腸、獨裁之政體」，蔣介石則在「中

國即將垮台時，驚愕而恐惶」。美國則仍須同意於這樣的一個政權。只是中國人倒是「好盟友」，他們錯被「奄奄一息而反民主的政府」代表而已。從此「中國老百姓好，政府裡的人不好」的說法尙被其他報導員與作家襲用。至白修德等書出時，第二次大戰結束又已一年，戰時禁忌可以全部放棄，美國與國軍之關係是爲「與僵屍結盟」亦可隨便寫出。正值史迪威悒鬱而歿，作者更可以在取材用辭之間挑動讀者對「約瑟夫叔」之同情。史迪威之見愛則蔣介石必遭貶抑，連蔣夫人也一併受斥責。不久之前她尙是「白雪公主」，一九四四年後則成爲一個播弄是非之妖巫。茲後舉凡赫爾利辭職，謂國務院、美駐華使館及東京盟軍總部之職業性外交家對彼之任務阻撓，馬歇爾促成國共合作之失敗，麥加齊濫用國會調查之權威，脅迫左翼作家及藝術家，杜威競選受挫，民主黨反擊——均與蔣介石有關；如有任何差池，蔣介石均不能辭其咎。

美國人士對兩項抽象觀念之崇拜敬若神明。一爲仰慕自由，一爲注重效率。有時將此種社會價值施用於海外，甚可能產生不合實際之含義，因忽視各別國家之歷史在時間上之進展不同或地理環境之有差異也。在蔣史衝突時各人容易設想「約瑟夫叔」以人身代表新世界之美德，而蔣介石則處處相反。他們已看不見兩人有個性上之不融洽及技術上之齟齬。總之褒史則必貶蔣。蔣介石之所冒犯者非只美國人之自尊心，而及於美利堅合衆國之立國精神。因之很少美國人能對蔣介石同情。今雖五十年後物換星移，亦仍是如此。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愛金生在《紐約時報》之「不開明，冷心腸，獨裁之政體」的報導刊出後，立即經蔣閱及（想有專人剪譯傳送），他的反應見於日記爲：「史迪威回美以後，其反宣傳不僅詆毀我個人，且必推倒我政府。其各種誣蔑詆毀，以《紐約時報》愛金生之專論爲代表，可謂污辱

已極。而共匪乘機煽動，美國輿論更不待言矣。惟余寸衷泰然，不爲其所動，蓋此早爲預料所及也。」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四日)

數月後魏德邁去延安視察，擬帶白修德隨行，在蔣前請示時，蔣曾「直告不必」。他又在日記裡寫出「彼（魏德邁）或因此不樂，然亦只有聽之而已。」（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



中國戰場之形勢，並未由史迪威去職而改觀。仍是西戰場勝利，東戰場敗退。魏德邁於十一月一日就新職。三日雲南之遠征軍克龍陵，蔣認爲「滇緬路戰局轉危爲安」。但東戰場九日即失桂林。死難之將領有防守司令部參謀長陳繼桓，第三十一軍參謀長呂旃蒙，第一三一師師長闕維雍，第一七〇師副師長胡厚基，第一三一師第三九二團團長吳展。以後派往增援之軍隊也只有節節敗退。日後魏德邁在他的回憶錄裡說及，這些部隊送上去即「溶化了」。魏也說及在他到任的第一個月，「東京玫瑰」在電台上廣播，如果魏德邁將軍能吃感恩節（每十一月最後一個星期四）晚餐的話，其地點當在印度。

《大事長編》記載當時日軍侵入貴州時，蔣準備放棄貴陽，而防守烏江。魏德邁兩次建議遷都（十二月二日及四日）。但蔣拒絕討論。並曾在日記記出：「若至萬不得已時，乃堅守重慶，決與此城共存亡。以此決策既定，乃心神爲之泰然矣。」（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日）因此之故魏德邁也表示不離重慶。蔣乃續記：「聞其願與共患難同生死之言殊以爲感也。」（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四日）

魏德邁回憶錄所記與此段不同。魏稱他自己確信蔣與重慶共存亡之決心，不過蔣過去也會在南

京、漢口作過類是表示後爲部下勸出，所以他告蔣：「我不打算在重慶被俘或死在重慶，可能的話」

「最後關頭」我將前往昆明，儘其可能的組織一個最堅強的防禦工事。」

幸虧以後兩種情形都未成爲必要。日本最前進部隊曾至都勻，在貴州境內逾一百公里，但東京之大本營已決心退出，防守沿海。蔣日記稱：「……八年來抗戰之險惡，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幸余信心堅定，將士用命，卒將已失各地相繼克復使進入黔境之敵全部潰退。而戰局亦轉危爲安，此則殊足引爲自慰者。」（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八日）是爲日本侵華軍事行動之最高潮，距珍珠港事變太平洋戰事展開亦整三年。

在此期間將駐印軍之兩個師調回，及蔣之組織「青年軍」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爲號召，鼓勵學生志願從軍，不期而得十二萬人，亦爲意外之成功。青年軍以羅卓英爲總監，蔣經國爲政治部主任，雖未在抗戰期間產生實效，但在國運如絲之際實已鼓舞人心。

當衡陽失陷，桂林告危，史迪威案尙未妥決之際，日軍正準備由湖南向廣西推進。但另一方面東京則極度的希望與重慶講和（不稱國民政府，因已承認汪精衛在南京之國民政府）。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九日之御前會議已決定夏秋之間，進入「戰政局」。此中之「局」乃指一種局面。所謂「戰」即是繼續強力攻勢；所謂「政」無非期望與蘇聯保持中立，而向重慶發動和平攻勢解決「支那問題」。種村佐孝之《大本營機密日記》從當日起，至十月十二日止約八星期間所記無非對蘇及對重慶之工作，尤以後者爲重心。日本戰爭最高指導會議亦始終未離此宗旨。據其在九月五日決定之所謂「大讓步」，包括言和後只希望中國善意中立，即不強迫重慶加入日方作戰。蔣可返南京主持統一之政府。日本廢棄與汪精衛之同盟條約，另與蔣訂友好新約。日本在英美兩國撤退後完全撤兵，香港交割與中國。

此種條件如何傳達至重慶，蔣之反應如何，不見於我已過目之文件。可是我們綜合當日史蹟則不當遺漏如此一個重要之發展。當日皇主持御前會議時，正值羅斯福一再敦促蔣將指揮權交付史迪威之過程中。東京提出「大讓步」條件時則當赫爾利、納爾遜與史迪威在印度晤面準備聯袂飛重慶之傾間，距蔣在日記中寫出「此實為余平生最大之恥辱也」不過兩週。



蔣和國軍在一九四四年的厄運來得匆迫，一九四五年的好遇也來得高速的超過預期。駐印軍之X部隊與遠征軍Y部隊於一月在緬北芒友會師。以前貴陽危急時，還只承望得英美聯合參謀團之同意，抽調駐印軍之兩師回國應急，至三月，已決定將全軍五師並特種部隊在五月及六月上半月一體調回。內中新六軍於保衛芷江之湘西會戰中進駐於芷江。新一軍克復南寧。

年初蘇聯已開始向遠東運兵，至四月五日史達林正式廢棄日蘇互不侵犯條約。日本臨時由華中及華南抽調四個師團，增強東北至朝鮮的防禦，國軍因之能收復南寧及柳州。雖說這樣的收復失地，只是由於對方的縮短防線將正面兵力減少才成爲可能，可是南寧與柳州都是重鎮，光復一肇端倪，今後旗開得勝可以預卜。

日軍爲了避免中美空軍之威脅，再於春間發動一次攻勢，企圖奪取老河口及芷江的基地。鄂北戰役動用三個步兵師團一個旅團和一個戰車師團，終於四月八日佔領老河口。但是湘西戰役動用兩個師團和一個旅團，其結果有如林三郎書中所云：「日軍被對方強烈的火力所阻止，損害慘重，五月九日被迫放棄攻勢。」以前日方縱是失敗無此坦白的自承。

更足以鼓舞國軍士氣的是三年餘的封鎖被突破，戰力只有與時俱增。日本大本營的判斷：中美空軍在八月將有飛機一千架，至一九四五年年底一千二百架。美式裝備之國軍至八月將有十五師至二十師之間，至年底將有三十師。外援軍用物資至八月將至每月五萬噸，至年底每月十萬噸。

魏德邁的計劃是裝備訓練像駐印軍標準的部隊三十六個師，稱「阿爾法師」或甲種師，又集中用中國兵器之師三十師。他的攻勢計劃，稱爲「黑金鋼鑽」(Operation Carbonado)，預備以二十個裝備訓練完好之師進攻廣州香港地區，如日軍自殺防禦，則只將這地區封鎖，主力東向奪取溫州或福州或廈門。攻擊不會不成功，問題僅在補給，所以預備得很久。但是八月各部隊都已提前的到達指定的地點。

因爲德國抵抗終結，馬歇爾通知魏德邁美軍將領巴頓(Patton)、辛浦生(Simpson)及特魯斯考(Truscott)都能來華服務。再因爲魏德邁要指揮這些將領，經蔣委員長建議由赫爾利申請升魏德邁爲四星上將。

魏德邁的設施與佈局與史迪威的企劃有何不同？說來也難能令人相信：基本上很少區別。他也注重攻勢，他也著重於訓練與後勤，他也實際上以盟軍戰區參謀長的身分指揮華軍，他也準備以美軍將領任高級幹部。

但是，第一，環境業已改變。他用不著和史迪威一樣爭執空運噸位。他也無意如史迪威一樣自稱戰區參謀長無籌集器材之責任。不僅如此，而且中國財政方面也有很大的改進。美國已同意中國用尙未運用之貸款購買黃金拋售於市場，就此減低通貨膨脹的壓力，平抑物價。日後這政策還要在美國受指責，此時卻對戰時財政具有貢獻。魏德邁說，他已能使中國陸軍的給養統籌辦理，據我所

知在昆明附近的駐軍由美軍供應部(Service of Supply)經手，在質量有顯著之改進。一月四日孔祥熙之來電，美國承允負擔在華美軍費用每月五億美元，此數字至高，以後看來恐未全部兌現，但對當日士氣人心實為有效的興奮劑。

第二，魏德邁瞭解蔣介石的困難。他的回憶錄裡推及中國前此曾未成爲一個現代社會中所謂之國家。據此看來，草創伊始，不能立即責成其一切都已上正軌。魏的書中有以下的一段：「蔣一直在四種戰線上作戰：對付日本；因對付蘇聯而要對付中共；對付中國內部分裂的趨勢，以過去之軍閥爲代表也及於半獨立的省主席與將領；還要對付『西方帝國主義』，意指英國，因他們以本身利益及對中國的態度所採取之戰略不能令蔣信賴。蔣之長處與弱點同在於他不放棄國民黨最初之目標，亦即中國之統一與獨立。」

在一九四〇年代情形確是如此。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來，蔣因對外關係而創造一個新的高層機構，在三民主義裡也只能先盡力於民族主義，不遑及其他。魏既有此瞭解，即避免與蔣作戰之目的衝突。他雖往延安視察，但拒絕以美械援予中共或指揮中共部隊。他有一具文件箱，上書「阿克爾哈瑪」，因赫爾利來自此州，意指此等文件全屬政治性質，魏不過問，應由赫爾利負責。

他也深知蔣人身上之弱點，他在回憶錄裡甚至寫出：「委員長非常敏感，他的直觀之習性幾如女子。」在此他舉一個例：蔣曾要他邀請馬歇爾在波茲坦會議前後訪問中國，馬歇爾說事忙不容許，蔣則以爲因他要求撤換史迪威而馬歇爾生氣見怪。蔣又說及他本打算自己出名邀請，只因羅斯福總統去世，他曾發電向馬歇爾弔唁而馬一直無回音。魏德邁則說馬歇爾不會如是小心眼。後經他查出，馬確有覆信，經中國某上校接收，不知如何未呈蔣閱。有此瞭解，魏不尋縫覓隙的去利用這種知識

使對方感到窘迫，尤其不與新聞記者串通而向他交涉之對手的弱點上盡量宣揚。他說：「新聞記者」總是期待著將芝麻小事吹噓放大成爲一篇具刺激性的文章」。

史迪威經常說及蔣介石的「歪眼戰術」，魏德邁也承認蔣對現代戰術的瞭解有限。他是一個誠懇的愛國人士，一心只顧及他的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長於政治手段。但是史迪威與高斯絕對的悲觀；魏看來則一切都有辦法。魏德邁問及他的前任對作戰計劃如何決定，美國軍官即告訴他由史一手包辦，計劃「擺在他褲口袋裡」。魏德邁組織作戰室，備有各種圖表，主持聯席參謀會議，邀請蔣委員長參加。因之他的決心成爲了盟軍之決心。他對衛立煌說及某日某時必攻某地因爲事前有蔣的同意，他即講出：「衛元帥，我以委員長的名義命令你執行這攻擊。」當場衛立煌還有爲難的樣子，事後看來則已計劃施行。魏德邁之回憶錄裡指出，並不是他自己的建議全部被蔣接受。但是只要合理可行，蔣儘在考慮，有如貴陽吃緊時，他建議調胡宗南兵兩師空運南下堵截日軍，即蒙立刻批准。魏指出過去史迪威也曾作同樣的提議，固然今昔軍情緊急的程度不同，但也與兩人之態度有關。史過去有何主張，動輒以威脅的方式出之。魏說他給蔣極不安全的感覺。蔣如果覺得他能掌握當前局勢，他沒有退避作戰的道理。

第三，魏德邁與蔣之關係得到前任失敗的好處。他於一九四五年二月回國述職，見到羅斯福、史汀生、馬歇爾諸人，他說及與蔣關係融洽。尤其見史汀生時，他說及蔣介石對美國人士企圖在紛亂之中創造秩序，不僅竭力支持，而且非常感激。他有時甚至對魏表示，好像魏之作爲是對他自己人身上的好處一樣。史汀生也說羅斯福給他看過委員長的來信及赫爾利的報告，証實魏德邁和蔣及蔣的部下相處毫無困難。史汀生即在此時說：「無疑的他們覺得要不與你合作他們就再得不到美國

之援助，你是他們最後之希望。」魏承認此說有理。

其實，這謹慎從事的態度見於兩方。魏德邁回憶錄中提及他自己在一九四四年十月杪接到往中國繼代史迪威的命令後覺得恐懼。他已聽說中國為美國文武官員事業上的墳墓，他已聽到中國人不合作的各種習慣。只有他的隨從副官麥克菲(William McAfee)上尉勸他從好處著想，並及外國顧問在中國成功的例子。而魏德邁自己也記起史迪威對中國人一意輕蔑，稱蔣委員長為「苦力班頭」的舊事。前任既因此而失官，他自己又為中國人指名調派，那他也不可能沒有前車之鑒的警戒，如是他才盡力觀察到人情中機微之處，及於蔣委員長之敏感。

更有一種不見於文書上之因素，至今尙少為人道及。本文曾前後縷述中國軍隊阻礙改革的原因，大部源於各部隊基層之軍官團及其鄉土觀念。經過日軍一九四四年之一號作戰之後，國軍損害慘重。日方即稱第九戰區之四十八個師甚難在短期間內恢復戰鬥力，次之則有第四戰區桂軍之受創。是以魏德邁重新裝備阿爾發部隊時，所受各部隊內部之阻力必已降低。此間詳情仍待研究，魏只敘及美軍已替國軍幹部開設不少學校。他自己仍同意於史迪威之看法，認為國軍下級幹部用命，問題在於將領。但他也贊同他參謀長之意見，認為「優秀之連級軍官可能在作戰時將一個庸碌的師長拖向前去」。他未有整肅中國將領之提議。

只因日本於八一五降伏，「黑金鋼鑽」無從作具體上的表現。不過魏德邁於一九五〇年間著述回憶錄時，稱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韓戰時表現高度之效率，仍肇源於他自己當日之訓練國軍。如此放大胸懷的看法，和我們以宏觀的眼光檢討歷史同。蔣介石苦心孤詣製造的高層機構通過內戰而為毛澤東接收。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如果沒有蔣介石的這一段工作，也不可能單獨的有毛澤東的成就。有

如沒有史迪威的莽撞，也不可能有魏德邁的工作環境。我們不要忘記綜合所得則是有了這些縱橫曲折，中國已在現代史裡向前猛跨一步，有如在舊時代裡度過三百年。日本執行一號作戰當然未存心替中國解決問題，但已無意中削弱了國軍內部之地方勢力及私人勢力，使蔣介石替中國造成之新高層機構更具體化、更接近於現代標準。

大凡一種廣泛的群眾運動，當中各種層次的因果關係必前後連貫，只是積累性的發展與從人眼光的看法及從局部眼光的看法不同。我們讀至蔣介石日記已一再提及今日之惡因創他日之善果（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甚至過去外交勝利今日仍須補償代價（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此種情形至一九四四年夏間已達到極點，以致蔣在埋怨「敵軍之深入無足為慮，而盟軍友邦之壓迫實難忍受」（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六日）。以上我們縷舉常德、長沙、衡陽三戰役並及蔣對付處置余程萬、張德能與方先覺諸人之經過（方先覺事尚有下節），可見得他說的「心碎精疲幾不能久持」（一九四四年九月三十日），實係由衷之言。然至此，盟邦友軍猶謂其無心抗戰，只待坐享其成。

及至當年年底局勢已整個改變。現已發表之蔣日記無與美國參謀長爭執之痕跡，無越級遙制部下之情景，甚至再無對戰局感到焦灼之表現。其記魏德邁有云：「此人直諒勤敏，可謂毫無城府，與史迪威之性格適屬相反。而其辦事精神之積極緊張我國軍人應效法之也。」（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見於《秘錄》，而《大事長編》只有一段節錄，不用括號）其記一九四五年春間戰事更漫不經心的寫出：「美軍已在琉球登陸，而敵寇猶向我戰區發動攻勢，但已成強弩之末，不足為患也。」（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見於《秘錄》不見於《大事長編》）

他與魏德邁繼續商洽事項及於美軍登陸於中國海岸之區處，與戰後中國派兵進駐日本之準備（以

後因內戰此計劃無從實現，中國只派憲兵一排任駐日代表團之警衛。至此他確已依人成事坐享勝利之成果，反無人指責。公衆之觀察常比事實之發展要遲一兩步。

讀史至此，不禁引起我們的好奇心，蔣介石在抗戰後期感到內外煎逼，自己力竭聲嘶，如何保持他心境之平衡？首先任何猜測務必提出宗教力量與哲學思想絕不可少。蔣之日記中有他在此時課己的紀錄：「今後記事朝課（即體操十五分鐘，讀聖經一章，靜默三十五分鐘至一句鐘，禱告約五分鐘，記事與閱報各項）晚課（靜默三十分鐘，讀《荒漠甘泉》一章）每日如未間斷則不再記。」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

本文前已談到，蔣處世時其大宗旨不變，但執行時有在矛盾之中兩邊走極端的趨向。因之他能絕對的以紀律自持，也能讓情緒儘量發洩。一九四四年的困窘，在他確是一場惡夢。方先覺逃脫後，曾往謁蔣，當日蔣之日記云：「與之相見匪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方先覺則在日後向古屋奎三提出當時情景：「委員長就像是看到自己的孩子回到身邊一樣，非常高興的對我說：『回來啦，好，好，我每天爲你們祈禱，希望你也崇信上帝……』」三天之後他更邀方及其參謀長孫鳴玉和同守衡陽的第三師師長周慶祥晚餐。至此他已完全忘卻他自己曾電囑諸人不成功即成仁；他們也曾回電「來生再見」之誓言，更顧不得日軍曾發表第十軍懸白旗投降的消息。

在蔣看來，與他們相見既是「悲喜交集」、「隔世重逢」，他沒有責成他們死事兩次之理由。這種人本主義之作風誠爲可佩，也顯示著傳聞中的蔣介石之內在的仁慈並非虛語。只以此與他不經軍法審判即下手令鎗決師長軍長等情相較，很難談得上邏輯之完整。以此視彼也只算在矛盾之中雙邊走極端之表現。所以本書讀者可以相信，很多責備蔣委員長的資料和恭維崇拜他的資料可以同時存在，

都有實據。我們站在大歷史的立場則須指出：有了這些正反奇合，蔣介石放大了他行動的幅度。在刻下之題材內，他藉此維持了他獨特的「中正」的一個觀念。蔣介石不是大獨裁者，他缺乏做獨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爲一個民主鬥士。縱使他有此宏願，他也無此機會。他主持著人類歷史裡罕有的一次艱巨之群眾運動，在過程中他將自己的天賦與幾十年經營之成果用至最大限度。他的方法沒有邏輯，有之則是他的目的——在於中國之獨立自主。他以「瞑眩瘳疾」和「孤注一擲」的方式達成之。



接到羅斯福去世的消息，蔣介石親往駐華美軍部總部弔唁，並令全國下半旗三日。他的日記內有：「今晨六時後得羅斯福總統腦充血已於四時半逝世之報，甚爲世界與今後國際局勢憂也。羅斯福雖對俄姑息與對中共袒護，但其尚有限度與一定主張，並非徒恃強權之霸者。今後美政府恐受英之操縱有所變更而不能如羅之自主矣，中俄關係，因羅之死更應審慎出之。」（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

此段未提及他對羅斯福之愛憎或留戀，無感情用事的追敘羅之對日禁運引起日本對美襲擊，美國參戰，以後羅邀他自己參加開羅會議及提升中國爲四強之一等等事蹟，也未因史迪威事件及羅簽發各項唐突之電訊而發怨言。但是很顯然的過去亞爾索浦稱蔣介石對羅斯福人身上崇拜。蔣自己也曾曾在日記裡提出，以邱吉爾之深謀遠慮老成持重，仍不足與羅斯福之思想精神與氣魄相比（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詳本書二〇（二一頁）。至此其評價已相當降低。「非徒視強權之霸者」已不能算是恭維，「姑息」與「袒護」亦非主持國際正義之適當態度。所以美國人責備他不知感激，我們也可以在

這情景中想見及之。

再看此段文字內中無一字涉及日本，當他寫此段時日本尙有大軍百萬盤踞中國，一般估計即在德國失敗之後，日本仍可作戰一年以上。但蔣已提前將日本之失敗當作既成事實。他所憂慮的乃同盟國作戰目的不同，對戰後遠東之處理甚足對中國不利，他所構造成新中國之高層機構本身又尙無實力，是以至足憂慮。

當年二月英美蘇之雅爾達會議訂有密約犧牲中國之權益，但又不直接通知中國，而直至宋子文往莫斯科交涉之前夕，才由蘇俄大使彼德羅夫(Apollon Petrov)將其條件告蔣，至此史達林要求於中國的不過承認既成事實，很少有討價還價之餘地。從紀錄上看來，宋子文(時任行政院長)與王世杰(外交部長)雖往俄京折衝而實際在後作主定計的仍是蔣。其條款除了外蒙獨立之外，實際上再度承認帝俄一八九八年在東三省之特權。及至條約簽字時蘇軍已進入東北，蔣等恐無此條款，史達林可以更無忌憚，而希望有此讓步，可以贏得蘇聯口頭保證尊重除此之外中國之主權也。

他日記裡提及雅爾達及對蘇交涉共十七次(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三月十五日、四月五日、二十五日、五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六月三日、七日、十日、十二日、十五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七月五日、十一日、二十八日)，首曰「惶惑」，又曰「悲憤」，「抗倭戰事之理想恐成夢幻矣」，但終接受現實，並且又自爲寬慰。

旅順大連港口之使用權及中東南滿鐵路之所有權，經毛澤東談判又付出參加韓戰之代價後收回。

新疆之少數民族於一九四四年十月革命紀念日發生暴動，成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顯有蘇

聯支持，一九四五年一月並攻陷伊寧。蔣日記有：「新疆問題，如俄國侵略方針不能放棄，則我只有待對倭戰事結束後再求得總解決。但迪化、吐魯番、馬耆、哈密必須固守，不能放棄，以爲將來恢復全疆之根據也。」（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對蘇讓步後之另一諒解，即係蘇聯不介入新疆之變亂。以後蔣派張治中赴新疆與少數民族談判，和平解決。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央請張治中繼續主持新疆事務。

蔣介石尙有一段願望：即收回九龍與香港。羅斯福去世前曾委派赫爾利往英蘇兩國協定戰後對華政策，杜魯門繼任，囑赫照原計劃訪問。其見史達林時已獲得蘇聯贊成中國統一之口頭擔保。及見邱吉爾，邱則云：「如君欲得香港，可在我死屍上來取也。」

蔣日記有：「邱吉爾對香港交還中國問題，謂『誓死不願』。又謂『美國對中國之政策，爲一大幻想』云——其蔑視我國蓋如此也！」（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三十九年後由鄧小平主持，中英成立協議，中國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抗戰勝利之廣播稿蔣介石自擬。他日記中之解釋云：「近日忙迫，本托「陳」布雷代擬，以其病，至今未動筆，故不如自擬爲快也。」（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他的講稿內有：「我說到這裡，又想到基督寶訓上所說的『待人如己』與『要愛敵人』的兩句話，實在令我發生無限的感想。我中國同胞須知『不念舊惡』及『與人爲善』爲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一貫聲言，只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爲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爲敵，今天敵軍被我們盟邦共同打倒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是我們並不要企圖報復，更不可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污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爲他的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能自

拔於錯誤與罪惡。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覆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復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

白修德等書內記這次廣播的情形：

一九四五年八月蔣安靜的坐在重慶一間悶氣的廣播室裡準備告訴中國人民戰事業已終結。他和平日一樣凝固的沉著。他的頭頂剃得淨光，不著絲毫白髮的痕跡。他的咔噠軍裝上衣毫無疵瑕，不掛勳章，衣領緊扣在喉頭，上有斜皮帶鈎扣著，一管自來水筆掛在口袋之上。廣播室盪熱，內中的二十個人汗流浹背，只有委員長看來涼快。他調整著角質框的眼鏡，看著面前桌上紫紅色的花一眼，慢慢的對著擴音器用高調而清爽的聲音告訴人民仗已打勝。他說著的時候，室外的喇叭傳播著這消息。街上人衆認識了他明顯的汽車，麤集在石砌的建築之門外，他可以聽到輕微的歡呼之聲。

他的演講歷時十分鐘。突然的他的頭顱低垂，失眠的眼眶陷凹處見形，在這一剎拉的鬆弛他的平穩之外貌露相，緊張與疲勞在這勝利的關頭顯現在他人身上……

第五篇

卷尾瑣語

《蔣介石初傳》或《蔣介石粗傳》——

「上、下、中」的三段改革——

隋唐與英法——

知其不可而爲之——

二十世紀之動員、明清的社會——

土地改革爲勝敗之關鍵——

認錯與不服輸——

各階段奮鬥之成果——

二十一字結論

本書參照各方資料檢討現已公佈之蔣日記至抗戰勝利而止，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來，蔣介石對新中國的貢獻，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已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以後他的聲望降低，而且因著內戰之展開，其中較有創作性的工作已由對方中共做出，因之歷史發展之重心，實已逐漸轉移至對方中共那邊去。

我寫本書時初不過打算爲中篇論文，不料提筆構思，刻下已超過三十萬字，而實際引用之資料尙不及希望範圍之三、五分之一。因原始資料之殘缺（現有資料大部只根據短近眼光報導）在若干段落我只得注入個人實地之觀察，又因此而引用資料參差不齊，亦無從作有系統之注釋，只得在文中儘量述及消息來源。如果日後還有需要，不妨再出「學院版」（academic edition），以滿足那方面之要求。

如果還可以採用副標題的話，我倒想稱本書爲《蔣介石初傳》或《蔣介石粗傳》。總之，今逢中國在二十世紀之長期革命成功之日，我們亟待爲當中重要領導人之一蔣介石初步作傳，否則很多歷史資料無從綜合。縱使寫書作傳之條件尙不如理想，文辭也免不了粗率，但此項工作已無法拖延（注意蔣一生做事也是在客觀條件尚不具備時提前做出）。只希望日後另有高明隨著時代之展開將我所寫書向前修訂（但請勿向後修訂），以期化粗率爲精細，更能與時代融洽。我也希望替此一時期其他人物作傳之作家同樣放寬視界，先著重歷史之長期的合理性，次及於褒貶。使中國近代史先具備與現情切實啣接之輪廓，再提到各人對書中人之恩怨愛憎。

我在兩年來從書中摸索之最大成果，則在真切的瞭解蔣介石作爲中國領導人數十年，最初並無預感。而只是隨著情勢之展開，發現自己突居高位，成功固然出於意外之迅速，失敗也來得離奇。舉凡中山艦事件之發生；北伐期間在武昌城下頓挫，卻又能在江西打開局面；中原大戰；對紅軍之

圍剿與反圍剿；九一八事變及西安蒙難都是事前無從逆睹之場合。即是主持對日作戰，也不過胸中稍存概念，談不上籌謀計劃，所以日後被逼入內地之困窘情形，因著美國之參戰而絕處逢生，藉著羅斯福之提倡而中國成爲四強之一，又因中國社會不能對預期的理想對數，而須他蔣介石人身上負責，以後黑金剛鑽之計劃尙未實施勝利突然來臨，和談與內戰接踵而至，也很難在事前見其端倪。

綜合以上各事，我們只看出歷史已在他蔣介石眼前和手下高速的展開，他無從採取通常合乎情理的方法對付。於是他以直覺作判斷，先以道義爲手段，不及則雜之以權宜，多時仁厚，偶爾心狠。被逼不得已則以宗教哲學思想和御己的紀律堅持下去。這也是他所說「攻堅致強」，「蹈瑕抵隙」，「瞑眩瘳疾」和「孤注一擲」之由來（見於一九四四年二月五日日記，詳本書一六頁）。

蔣介石是一個大冒險家，他所寫「人生實一大冒險，無此冒險性即無人生矣」（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日記，詳本書一二頁）業經慷慨坦白的承認。他的日記裏更有一段概括他一生之特性與長處：「總理云：不知不能行。吾則繼之曰：不行不能知。惟行而後乃能知其知之真偽與是非也。」（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

所以我們與其說他眼光長遠道德完滿，還不如說他氣勢磅礴，膽敢能替民族國家打開僵局。



我所謂大歷史對刻下題材適用之處主要在將蔣介石、毛澤東和他們的繼承人所領導的群眾運動，視作中國長期革命之三個段落。這三項運動既相聯繫也相衝突。分拆看來有更換朝代之色彩；接連看去卻又完成了中國的長期革命。因爲缺乏近身事例，只能用較遼遠的史料對照。

民國初年中國實已處在一個類似於魏晉南北朝之局面。公元七世紀以前之「五胡十六國」亦無非舊有的體制全部不合時代需要，以致整個崩潰，因著軍閥割據引起強鄰犯境。這分裂的局面既終，隋唐之際採用《周禮》所賦予間架性的設計，創設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興建國都長安，開始科舉取士，是謂創造高層機構。人民則經過府兵及均田之安排，已具備著基層之新體制。再因頒佈律令格式之四等文書與租庸調「包紮式」(package)之稅制，是謂敷設了上下間之聯繫。

我們再看西歐史裏也有類是將國家社會整個再造的例子。本書劈頭即已提及英法。她們的奮鬥也是旨在脫離舊式農業社會之體制進入以商業條例作主的社會(馬克思派學者稱之為放棄封建制度新入資本家時代 [capitalist era]，這說法易為意識形態把持，而忽略內中技術性之發展)，因此與中國現狀相較，更多借鏡之處。

英國在斯圖亞特王朝有了內戰、弑君、革新為民國、復辟諸段落，及至光榮革命之後，確定了議會至上之原則，從此國王有職無權，又創設公債，由英倫銀行主持，更開始引入政黨政治及以後之內閣制，是為革新高層機構。次之，則自內戰以來逐漸澄清了「副本產業」(copyhold)所引起之混淆，使土地佔有歸律化，是為整頓基層組織。又發佈「人權法案」(Bill of Rights)，更將衡平(equity)之原則引用至普通法庭中去，是為重新確定上下之間法制性之聯繫。

法國大革命之過程亦復有此「上、下、中」三層改革之形貌。公眾安全委員會成為新組織最高權力，有權宣戰、媾和、任免將官，又通過國民會議操縱立法，更指揮特別法庭監視各界群眾。此機構最初由丹頓發起，後歸羅伯斯卑爾，熱天反動之後，其實權由巴拉及西野掌握，經他們交付與

拿破侖，是為現代法國高層機構之始。自從國都有巴黎公社之後，各地也在村鎮之中成立公社。一時法國好像又恢復到中古時代各村鎮獨立的姿態中去了。而其實通過此程序，這國家的基層也經過一段脫胎換骨的改變。巴黎有各種革命團體及俱樂部，各地也有分社和互相呼應的機構，此類革命性及愛國性的會社，後經研究數在五千以上。它們的各種活動使基層的改組通過無形的協定。加以國家沒收貴族僧侶的土地，拍賣與新領主，製造一批新中產階級，更使基層的組織變質。至於重新敷設上下間之聯繫，則首由國民會議派遣督導員至各省巡視，再因管制物價與工資由巴黎制定最高限額(maximum)在各地執行，因著戰時動員，更加強了中央向地方之操縱。而最後有關全民之法制，因頒佈拿破侖法典而完成。至此新法國之規模才確實具體化。

以上的例子均通過無數之縱橫曲折，我們不能過度渲染當中平行或相似之處。但是由一個舊式的社會遇到內外衝擊，需要全面改造時工程浩大，牽一髮而動全身，亦不能虎頭蛇尾，則已古今中外皆然。而且一經發難，即不能由任何人全部掌握，多時為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作主。即領導人物，亦只能因時就勢。我們不可忘記蔣介石在一九三七年之領導抗戰，並非全部出自一己決心，而實因西安事變時被各人擁戴逼就。不久之前我看到尼克遜在電視上追敘他初見毛澤東的情形。前美國總統尚在恭維毛。他大意說及，你主席寫了幾本小冊子，已使中國整個的改觀；毛即抗議的說：「我怎麼能改變中國！我不過在北京附近的地方，這邊和那裏，稍微修改了一點罷了！」雖然仍帶著傳統自謙的語氣，他所說已表示群眾的力量大，個人之力量小。背景上之決定性的因素，不易衡測，局部外間的表現易生錯覺。



不久之前我去台北，遇到幾十年來沒有見到的朋友。他們都以蔣沒有在抗戰結束日本投降時功成身退爲憾。然則這樣的想法卻又忽視了歷史人物蔣介石的性格。正本歸源這也還是由於蔣活動於我們所檢討的一段歷史之前端，他不能和我們今日一樣，對著中國在二十世紀更生再造的經歷採取著分割爲三段的看法。他以爲自己所總攬之局面具備著充分的力量解決一切問題；他的奮鬥也可以包括全部革命的過程。他的國家體制既是苦心孤詣忍辱負重的構成，他不得不相信任何向他挑戰之人物及派系皆具有破壞及搗亂性質。即使中國內部仍待整理，他想不出如何不能動用和平的方式遂行，而必須引用階級鬥爭至最殘忍的程度。在外交陣營上講他自己吞慚受辱，他不能再忍耐對方使中國自絕於美援，反與蘇聯沆瀣一氣。以上種種著眼均具有防勢及保持現狀的設想。即使初期軍事上採取攻勢，其作戰之目的仍在保守。對他個人講，所保全的是他幾十年奮鬥之成果或僅是自己名位，其動機出自思想信仰，或是對軍興以來所有陣亡將士之責任感，沒有實質上的差別。在很多情形之下，這些因素早已凝聚爲一，總之他已不能掛冠而去。

值得注意的，直到戰事尾期甚至黃埔將領已有開始脫離戰線之情事的時候，蔣介石仍然迭次往大陸和沿海島嶼部署軍事。他這時候名義上已下野，總統由李宗仁代。他於一九四九年八月赴定海再往廣州、重慶、成都、昆明，至十月三日回台北。十月又巡視廈門及定海，十一月留駐重慶及成都，迄至中共軍隊已逼至近郊，滯留於四川幾一月，至十二月十日方返台北。兩天之後他出席於革命實踐研究院的紀念週，講述此行經過，其重點則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本來蔣之不願與他自己

所領導的群眾運動分離已不足怪。是好是壞他已孜孜經營是項運動達數十年，則當初不過是一種手段，一項方略和一截過程，以後可以視作一樁成就和一段歸宿，本身即具有價值。

其實毛澤東也有同樣的表現。從歷史家的眼光看來，土地革命中的平等觀念不過是過程中的策略，藉此以掃除過去放債收租束縛經濟發展的桎梏，樹立一個新社會之基點。以後之經營無從不脫離此最初之底線，但是毛始終不能放棄全民吃大鍋飯穿藍布棉襖之原始的平等觀念。爲著保持這理想，他不恤發動文化大革命，使當初他自己領導農民暴動之餘焰又在城市裏燃熾十年，也阻擋著下一段的改革。我們不要忽視文革也是小具規模的內戰。

只是有了蔣與毛的「多餘與過剩」之行動，歷史之更換主題反弄得非常明顯。既已創造一個新國家的高層機構，則必須翻轉整備其下層組織（日後蔣在台灣也由陳誠主持一九五三年之「耕者有其田」法案，使農村體制能符合新時代之需要）。上下都已改組就緒，則必須在行動上重訂上下間法制性之聯繫。於今海峽兩岸都已主持重商政策，即是希望在公平而自由交換之中釐定各人權利與義務，以構成永久體制，是全面更新再造之最後一個階段。



一九四〇年間，我也和當日多數的青年下級軍官一樣，希望國共的軍事衝突不致惡化而爲全面戰爭。及至內戰既已展開，則又希望國軍早日勝利，使戰事迅速而圓滿的結束，曾未預料以國軍對日戰爭後軍備補給之優勢，戰局尙可能如以後之急轉直下，而尤以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之慘敗，實爲意料之所未及。

我在戰後流落海外，當初自然無從創造以上之三段看法，可是也不能接受「貪污無能」之皮相之談，又早已看出「中國老百姓好政府裏的人不好」之不合邏輯，當時各方尚在盛傳國軍始終無心作戰，只是棄甲曳兵而走。所述純係內戰已近尾聲時之情景，而無從包括整個戰事。一九四七年五月，整編第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與以下將領幕僚二十餘人，在山東孟良崗兵敗之後集體自殺，部隊亦死傷殆盡，一九四八年三月，原曾早歲在長城抗戰之第二十九軍軍長劉戡與其部下師長在陝西宜川同時陣亡，即當中犖犖事例，表示國軍並未缺乏戰鬥精神。即以最後一次之淮海戰役而論，《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亦指出人民解放軍參與者六十萬人，作戰六十六日，死傷十三萬，此死傷率已超過百分之二一點六。而且戰役前後國軍高級將領如第二兵團司令邱清泉與第七兵團司令黃伯韜又相繼殉職，面對如此雄偉而悲壯之史蹟，我們無從以自己主觀而狹義之「善惡」標準概述之。

再度來美後我與現場愈遠，避免了情緒之衝擊，也因著歷時愈久，愈能接受歷史之仲裁。及讀明史，更恍然領悟到一九四〇年間之內戰，表面看來可看作蔣與毛繼續著他們終身之仇怨廝殺，或者不出於國共兩黨之權力鬥爭，而實際其在歷史上長期之功用，則已超過交戰者企劃之外，旨在改組中國之農村。原來中國在二十世紀雖已廢除專制皇權，並曾一度在形式上創行代議政治，但並未實際作體制上之改造。除去沿海一帶已有有限度之現代化之外，中國之社會仍是明清社會。

這社會由「尊卑、男女、長幼」之序次構成，仍離不開《周禮》式由上至下之原則。其上級有權力，但除良心與道義之約束外，對下級無所謂責任。下級則只有義務而無權力。此種組織以今日之眼光視之不能避免矯飾之指責。其中任何情事只要能在官僚體系邏輯中解釋得過去，即可以對外不負責。又經常以儀禮代替行政，積習所至，只有阻礙民法之展開，而防制社會之多元化（因為民法

著重各人之權利與義務，社會愈趨繁複，對民法之解釋亦愈精細。況且自洪武帝以《大誥》治天下以來，已一意培植無數之小自耕農，他們之收入歉薄，從他們手中所收集之稅收爲量過微，也只能維持傳統之衙門，不足以言改革。此種體系既已持續著近六百年，於是司法簡陋，即使農業之收入縱有剩餘，亦甚難投資至其他方面去，以促進經濟及科技之發展，而另一方面農村內亦缺乏資金，只有遠親近鄰互相盤剝，放債收租，習爲故常。即毛澤東自己亦用「一窮二白」形容二十世紀之中國。

勞動力之僱傭亦與土地佔有有關。中國農民最大之困窘，不在失業，而在「未充分就業」(under-employment)。因爲耕地分割過小，農作方法又未能推進，只有季節之間農忙，其他時間閒惰。抗戰期間我曾出入湖南鄉間數次，每次均見年壯力強之轎夫自備簡易竹轎在道旁茶館行人休息之處兜人僱乘代步，足見農村人口與勞力，多有裕如，而軍中缺額須壯丁填補，兵站須運夫輸送給養，又不能徵用此等人，因其勞力仍爲農戶之生計不可或缺也。

我們述及國民黨及蔣介石之政策意在保守亦非使一切維持現狀。從他們在一九三七年前之財政稅收政策看來，又配以修築鐵道公路，成立四省農民銀行，設立資源委員會等等舉措看來，其政策在不驚擾現行體制之原則下，實際取法於唐尼(R.H. Tawney)教授之建議，先開發長江三角洲，使其成果分潤於內地，亦使工商業之發展分潤於農業。此種設想理論上非不可行，只是須農村問題不再惡化，中外又安數十年才能見效。事實上中國未曾有此數十年之又安（一方面由於中共領導之農民暴動）。蔣介石未曾在土地問題上動手，亦非代表地主之利益，只因農村問題之過於棘手，過去國民政府之減租令，無從執行，只得成爲具文。

從我已經過目之文件看來，中共之土地政策，也不能算是依預定之方案有秩序的做出。固然他

們於一九四六年發出「五四指示」（原稱「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之指示」，於五月四日發出），但是隨即對這問題之解釋已產生所謂「左傾錯誤」。我們只能想像以南北氣候、農產耕作方法之不同，背景上又缺乏有效之法律釐定土地租賃買賣之一定程序，況且無可靠之統計。土地改革即不可能成爲理想上之改革，其情形必逼近於韓丁及張正隆之敘述，最初以農民暴動之方式發難在恐怖政策執行，即局勢穩定方作各項調整，亦不能與過去情形對照做得公平合理，只有不承認以往之所有權，率性重新分配，反奠定了以後成立人民公社，實行耕地國有之基礎。他們之敘述也和毛澤東在一九二七年所寫「湖南農民運動報告」相呼應。毛在二十年前即寫出：「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

對內戰之出處講，土地改革實爲勝敗最大的關鍵。《翻身》及《雪白血紅》均曾說一班人民視「造反」爲畏途，東北民衆亦視國軍爲「正牌」。但一提及可以分得土地，其情形才如野火燎原。以下一段節自張正隆書中：

沒有土地的農民只能是土地的奴隸。

他們沒有權力，沒有尊嚴，甚至沒有妻子兒女。主人可以隨意霸佔她們，再把她們拉去看家護院。血性漢子流盡了鮮血，缺少血性的漢子和看得太多的血性漢子就忍氣吞聲和學會了忍氣吞聲，因爲沒有土地的農民，本來就一無所有，連自己都沒有。主人就是政府，主人的意志就是法律。國家朽到了極處，人民苦到了極處，那極處的極處，是占人口百分之八十還多的農民。

這段帶煽動性的文字，也還是糾纏著一個「中國老百姓好政府裏的人不好」的論調。五十年前完全沒有土地的農民，也不可能佔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即憑不完全的資料估計也只可能在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之間。我們無從否定地主霸佔佃農妻女的情形沒有發生，可是也無從相信這已成爲一種普遍現象。

然則再將所述與傳統的「尊卑、男女、長幼」的社會秩序相較，則其所控訴又並非全無理由。因爲上級對下級（尊卑）只有他們自己本身的道義與良心約束，則下層社會之群眾實已如被褫奪公權（disfranchised），不論地主霸佔佃農妻女的情形只有一椿或十萬椿，總之即是人身自由沒有保障。況且失去公權的表現也不僅於妻女被霸佔。有如被徵爲壯丁，用繩索牽縛來去，亦非自由公民之所應有。類似張正隆文字的煽動力量只有身歷其境才可體會。

所以國民黨與蔣介石希望保存社會秩序以增進人民之生活，至此被視爲舊社會之爪牙。分得土地的貧農不僅有「股本」在中共的群眾運動裏，而且深恐國軍臨境意存報復。韓丁的書中，也提到山西一座張莊裏經中共掌握後人民對蔣介石及「美帝」既痛恨也恐懼，其實國軍曾未出現於所在地長治縣與潞城縣之間，而實際代表美國的也只有他William Hinton本人。這些細節已無人注意。

土地改革解決了中共一切的動員問題。一到他們將初期的農民暴動控制在手，兵員補充與後勤都已迎刃而解。兵器的補充也不成問題，凡日軍之所駐在到處都有鎗礮彈藥，再不然即是俘獲國軍之美械。在國軍掌握的時候鎗礮彈藥件件都要點算核對；共軍到手就儘先使用發揮它們的效能。中國的內戰在一種奇怪的情形下展開。戰事既像全世界最大規模一次的農民暴動，也輾轉的在幾個地區繼續不斷的重複進行。國軍迭次擊退共軍進犯之後終於在最後一戰役失利。四平街戰役國軍三次

戰勝，只有第四次戰役才使四平街失守，而且失去即再無法規復，其背景則是國軍侷促於城市裏資源有限，對方則不斷的發展擴充，廣泛的利用農村內人民物力。我們常用的名辭如「消耗戰」(war of attrition)還不能道盡此中衷曲，其實情可稱「復原戰」(war of recuperation)，競賽之結局看誰能恢復舊觀捲土重來。人民解放軍之實力有如鯊魚之牙齒，雖打落仍可復生。及至一九四八年冬戰役後，由中共控制之區域逃回的朋友說起，敵後動員竟有如是之徹底，凡所經行之鄉間道路均有兒童把守，避免通渠大道之正規巡邏易，逃脫狹路上之「小鬼」難。

韓丁之《翻身》繼續述及中共後方情形：隨著土地改革各鄉村都經過一段改組。各村鎮最基本之組織為「貧農團」，只有赤貧的農民才能加入。以此貧農團為基幹才產生「農民協會」，由農民協會作主體，又成立「村民大會」。如此保障了最下層的權力。其整個組織既是由下向上組成，也一反傳統習慣——農村組織一定要秉承官僚旨意由上至下構成以便利行政管理為原則。雖然中共當初在村中組織煽動，一到組織就遂，他們自己小組內之成員仍要經村民審核，按次序經過貧農團、農民協會及村民大會之質詢。除非三道「過關」，各人黨員之資格仍未確定，也須送往他處改造學習。看來這種種之程序統經過詳細協定。《翻身》書內就說起，中共一九四七年在太行山舉行的一次會議，研討各項程序，出席部隊團長級及行政縣長級的幹部一千七百人，討論了八十五天。



我們無從斷定蔣介石是否獲悉這段改造農村的情景。即使全部瞭然，他也很難採取不同的作法。他既已被催逼著去領導抗戰，大功告成，他又因內戰之陰影而失去了已贏得的民族英雄之光彩，此

時他斷無法承認他自己的保守政策僅在維護明清社會體制，他也絕然不能相信他在褫奪無土地的農民之權力，使他們的妻女之安全沒有保障。既然如此，他只能認為破壞現有的社會秩序、唆使人民將各地放債收租的地主拳打腳踢鬥爭至死的人物為「共匪」。而對方中共也因為他的軍事行動稱之為「戰犯」。自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國革命之悲劇：這國家需要改造，但是新舊體制之間有了兩百年至三百年的距離，於是只能以暴力的方式執行之。在找不到適當的對象對這兩三百年負責時，只引起交戰者隔著遠距離呼叫對方為犯為匪。

當中共提名蔣介石為戰犯時，他會有強烈之反應。以後美代理國務卿及總統杜魯門亦提出此舉之不公平，蔣即記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本月反省中。

及至接近局勢最黯淡之階段時，蔣介石在日記中寫出：「近日軍民心理動搖已極，無人無地不表現其悲觀主義之情緒，可說對剿匪戡亂信心及對革命與國家之責任心完全喪失，尤對領袖之信仰心亦不存在，此種精神之影響，比之於共匪之暴動陰謀更為危急。上海同濟大學學生擊傷市長，舞女結隊搗毀社會局，以及申新紗廠之暴動，皆為共匪在我經濟中心搗亂，擾害社會，顛覆政府作有計劃之暴動。雖情勢愈急，險象萬狀，惟余之信心絕未為共匪虛聲暴行所動搖，自信盡我人事，不憂不懼，必能打破此一最大最後之難關而獲得最後勝利與成功也。」（一九四八年二月三日）

至此他仍將對共軍作戰視作他主持之對日抗戰之延長，上下信心之關係亦應一切如前。及至險象畢露，他之不服輸的態度，亦與在南京武漢撤退時無異。

可是，亦即在寫此一段時，文中已表示城市人口普遍的厭戰，他的組織本來脆弱，至此廣泛地區之基層組織都已被中共接收後強迫改造，他們的地位更為動搖，當年十月二十九日他在北平答覆

《紐約前鋒論壇報》的記者談及國軍節節敗退之原因，有如：「政府爲人民之政府，兵員之徵集，糧秣之籌劃均須顧及人民之利益，恪遵國家之法令。而共匪對於人民毫無愛惜，分區濫發偽幣，隨時沒收人民之財產，徵集壯丁，搜括糧食，極盡其殘忍之手段。最近一年來共匪更假借『土地改革』之名，作竭澤而漁之榨取，故匪力量一時有大量之擴張，而匪軍撤退時之焦土政策，進攻時之『人海戰術』更非國軍所願爲……」雖然談話中仍用道德之名義區分著「正牌」及「造反」之不同，他所縷述已勾畫著一個失去掌握之中央集權體制和另一系列新生而不受拘束之基層組織，在長期作戰競賽著恢復元氣的過程中主動漸爲後者掌握。共軍得勢其長處在動員。

蔣介石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引退」。他次日之日記有：「此次失敗之最大原因，乃在於新制度未能成熟與確立，而舊制度已放棄崩潰，在此新舊交接緊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國救民之基本條件，完全失去，焉得不爲之失敗！」（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在一九四八年國民政府行幣制改革之前夕，他的日記裏已提及米一石值法幣四千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四日）。引退後往故鄉溪口，他又在日記內寫出：「爲政二十年對於社會改造與民衆福利著手太少，而黨政軍事教育人員，更未注意三民主義之實行，今後對於一切教育，皆應以民生爲基礎。亡羊補牢未始已晚也。」（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

這一段也可以視作他日後在台灣執行土地改革之決心的準備。



專家估計：中國土地改革犧牲了三百萬至五百萬之人命，內戰之死傷數尚且不計，各人分得之

土地又自一九五八年後一體併入人民公社，於今則又以「承包到戶」的方式撥歸私人經理。沒有人能對這一串事蹟居功驕傲，也無人能對全部程序負責。

我所建議將中國在二十世紀長期革命分作三個階段的看法，並非漠視過程中之犧牲，而是主張數十年呻吟嗟怨之餘睜眼看清因各種代價所收穫之成果。如果一人一時一事不合情理無足為奇。甚至一個團體在一段時間所作事全有未當猶可分說。如果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前後數十年所作事全部錯誤，那也就難能令人置信了。歷史是時間之產物，有累集性。要是我們忽略每一情事之積極性格，亦必誤解以後發生情事之真實意義。

我對白修德所著書，多時不能同意（有如他提及第六十二軍在衡陽戰役未盡全力，即與日方戰後公佈之資料不符）。可是他在抗戰勝利後才一年即寫出：「在我們這一代的時間內希望中國風平浪靜，未免童癡。中國若不改革，只有滅亡。」當日讀來令人懷疑，現今四十七年後看去，則此段一句一字均已兌現。

其所以如此乃是中國之社會組織仍與歷史之發展脫節。本書讀者亦可看出中國對日抗戰實係僥倖取勝，其本身之缺陷尚多。以上業已提及日軍發動「一號作戰」時於長沙衡陽間佈置指揮系統兵站配備，水陸路程數百里，除受美機襲擊外全無阻障（詳本書三八〇、三八二頁），可見得除被徵派外，當地農夫漁民船戶與戰事漠不相關，其本身利害與政府之利害尚有長遠距離。而且他們之生活亦未解決不能作無償之供應（詳本書四四〇頁），甚至尚供敵方驅使，鄂西及常德戰役均有「偽軍」參加。衡陽戰役時中國人之「歸順部隊」尚且加入對方第四十師團內作戰（詳本書四〇〇、四〇一頁）。有此種種缺陷，中國無從成爲一個獨立自主之國家，遑論及履行「四強之一」的任務。內戰隨著八年抗戰

接踵而至，有其內在之原因。從白修德之預言看來，實由「非人身因素」作主。

我們對「階級鬥爭」無信心，但仍不得不承認中共之土地改革在中國長期革命之過程中產生了「槓桿作用」（槓桿作用一名辭前已用過，詳本書二九二頁）。縱使計口授田之原則只能用作創始，不能持久，因此發動之群眾運動即已使中國農村脫離傳統由上至下指派之典型。農戶欠債，土地小塊經營，勞力無法輸出，亦無處使用之阻杌亦一掃而空。中國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三十年間，由農業剩餘存積之資本據估計值六千億元（一九七九年價格），為鄧小平主持經濟改革之成本，至今中國仍為一個農產出超之國家。

這一串成就不可能與蔣介石之初衷相違。而且從長遠眼光看去，除非當初蔣介石挺身而出，以一己抵擋中國社會組織結構之不足，使中國贏得一個半世紀以來國際戰爭中之第一次勝利，以上所述之發展與收穫尚無從著手。即使人身站在敵對方面，毛澤東之土地改革亦須蔣介石在此方加壓力才能遂行。那種群眾運動全靠對外隔絕，以戰時動員之背景作支撐。蔣介石及其繼承人在台灣經濟建設之成功，尤對大陸之經濟改革有刺激及誘導的功效。

如此本書如何下結論？我發覺只有再度引用蔣日記中之一句：

不行不能知，惟行而後乃能知其知之真偽與是非也。